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設計、編輯及製作，並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 香港中文大學 1993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封面攝影：王苗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962-201-619-7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承印：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香港灣仔譚臣道 114 號廣亞大廈十樓 A 座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1840-1956) —
The Fate of Its Ultrastable Structure in Modern Times (in Chinese)**
By Jin Guantao and Liu Qingfe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3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1-619-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Shatin, N.T., Hong Kong
Printed in Hong Kong

導言：尋找歷史之路

只要從睡夢中醒來，
黑夜本身是不足畏懼的。

《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是我們研究中國社會宏觀結構的第二本著作，它是《興盛與危機》的續篇。在這本書中，我們試圖以一種新觀點來詮釋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現代史，提出超穩定系統在對外開放條件下的行為模式。在論述正文之前，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如何寫這本書，也許是有意義的。

1 大時代的歷史感

青年時讀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書，最難忘的是他寫《歷史研究》的經歷。一次大戰後，湯因比乘東方特快車自伊斯坦堡一路西行，巴爾幹半島上古遠縹緲的高山平野，使他想起昔日文明的光榮與血腥，一種奇異而壯麗的歷史感在心中湧起。他感到一次大戰的歐洲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寫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時代的類似。他把自己的構思寫在一頁紙上，從此一生就為實現青年時代打下的提綱而奮鬥。當時說甚麼也想不到，類似的故事居然也會發生

在我們身上。我們青年時代的探索，由自然科學涉足於人文歷史領域；我們為自己的歷史研究付出的代價——流亡，以及在流亡中繼續對近現代史進行思考，所有這一切也都起源於青年時代的歷史感。

所謂歷史感，是指人突然對自己生活的時代有所領悟，把人類今天碰到的種種問題和數千年來我們祖先生活的社會聯繫起來，從而產生一種企圖超越某一個特定時代、某一種特定文化社會規範來考察歷史的意識。它往往出現在社會或思潮發生重大轉向的歷史關頭。我們對中國歷史的思考最早開始於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這種企圖重新審視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走過道路的歷史意識萌發於文化大革命時期並不是偶然的。今天，在二十世紀即將成為歷史的最後幾年，幾乎沒有人會否認二十世紀最重大的歷史現象是全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實踐的興起和失敗。只要追溯1989年後社會主義國家紛紛解體的歷史因果鏈，就會發現中國的十年改革是這一制度內部出現巨大自我斷裂張力的重要根源。而中國1979年後的改革開放正好是文革摧毀了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後果。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實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在這種轉折關頭所激發出的思考無疑有着特殊意義，何況這麼多年的經歷為我們提供了海外人文歷史學家很難具備的特殊視角。

六十年代中期，社會批判意識有兩個基本角度：一方面來自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勝負難分的拉鋸戰，它們各自用自己的價值體系來批判對方，形成五花八門的理論；另一方面是青年人的普遍反叛，新一代以自己特有的敏感和熱忱向權威提出挑戰，對一切現存制度的合理性進行再思考。而我們恰逢這兩股潮流的奇特交匯點，既感受並經歷過紅衛兵運動的狂熱，又為席捲整個西方的憤怒青年之反抗而激動。但是和西方青年不同，我們是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灌輸下長大的，了解這一政治文化巨獸內部的五臟六腑。當

文化革命中烏托邦幻滅，那些被馬列主義詞匯和革命熱忱掩蓋着的社會問題向敏感青年顯現時，我們突然被一種重大的歷史意識所震撼，這就是發現了中國式社會主義和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類似性。

也許，很多老一輩的人早已察覺到這一點，1949年共產黨進城，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將其當作一個新王朝看待。我們和老一輩不同，深知社會主義本是批判資本主義、企圖超越資本主義的產物。無論是封建專制，還是產生這種專制的文化、經濟土壤，都是共產黨人力圖摧毀的東西。但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反傳統卻造就了一個做夢都沒有想到的後果——就在他們以為徹底砸爛舊社會並在它上面建立了一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新世界之時，實際發生的卻是在馬列名義下實行皇權主義、文字獄和封建專制。固然，馬克思主義者可以據此認為馬克思主義從未真正實行，現有的社會主義是假的，而自由主義也可以因此宣佈馬克思主義的虛妄。但我們認為，這一過程本身的意義遠超出這兩種價值判斷之外。它恰好表明在中國一百多年社會改造的歷程中，制約着中國社會變遷的深層結構沒有被意識到，結果是歷史好像在跟人開玩笑：本來想走進這一個房間，卻發現走進另一個房間。從世界範圍看來，社會主義實踐無疑是人類第一次有意識地干預社會演化，它的奇特後果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看都是全新的。當時，我們剛二十歲出頭，歷史感的湧現改變了往後的人生道路。我們放棄了自然科學的研究，決心轉向社會科學。我們隱隱感到，這個問題的探索也許要用一生的努力才能實現，它是向一個未知的龐大怪獸作戰。當時中國是最封閉的，幾乎看不到國外的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我們是從自然科學中吸取方法的。這就是把控制論、系統論引進歷史研究。

我們發現，從秦漢帝國建立一直到今天，中國社會深層組織方式一直沒有改變，這就是社會的整合建立在人們對某種統一意識形態的認同之上，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與社會組織一體化。正是這種

組織方式造成社會主義和封建專制的類似性。當時我們把這種思考寫成一份六、七萬字由三部分組成的提綱。第一部分是中國傳統社會組織方式研究，它包括在研究方法上批判經濟決定論，引進系統演化方法來建立社會變遷模型。由於中國傳統社會的組織方式是儒家意識形態與社會政治組織的一體化，就造成社會演化呈現出與西方完全不同的類型。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新結構難以在舊組織中成長壯大，舊社會結構瓦解後又會再次修復，社會演化呈一種奇特的動態停滯，我們稱其為超穩定系統。這種組織方式造就了中國古代盛大輝煌持久的文明，但社會進步積累又為周期性大動亂所中斷。當西方進入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時，中國也就從先進轉化為落後。超穩定系統假說解釋了中國封建社會在相對與世隔絕條件下長期延續的原因。

第二部分內容是研究超穩定系統受到西方文明衝擊後的行為，它應該包括用超穩定系統理論對1840年至今天的中國近現代史重新進行詮釋。當時，我們雖然明確地意識到，1949年大陸建立的社會是毛澤東思想和社會組織的一體化，在意識形態和社會組織關係上與兩千年的封建社會同構，但我們當時的學識不可能了解，傳統一體化解體後，中國為何還是會最終建立這樣一種結構。不過我們卻十分強烈地感受到，正因為在今天的社會結構中意識形態和政治一體化的組織方式未曾改變，當中國共產黨人用這種組織方式來實現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社會理想時，它就導致了封建專制主義借屍還魂。

當時，我們還用這種社會組織方式來探討文化革命的原因和它帶來的後果，它是研究提綱的第三部分。三部分中第一部分最為詳細，它後來成為《興盛與危機》一書內容的基本思想。七十年代中期，我們在河南鄭州大學任教，從那個時候起就開始廣泛收集材料，與來訪的朋友討論，為今後實現這一提綱做準備。

2 逃避近現代史

人在青年時代所抱的理想，如同一個向四面八方湧射之源泉，任何一個方向之水源都可能會轉化為洶湧的激流。但是當你選擇了某一個方向，也許一輩子就跟着這一方向的激流走。如果不是有巨大的意外事變，往往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有起點，去展開青年時代夢想的另一部分。我們的研究提綱也是如此。1979至1989這十年，中國大陸推行改革開放，出現了1949年後從未有過的思想文化發展的好氣候。我們研究提綱的第一部分獲得了充分展開。1980年，我們發表了論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的論文，在學術界引起廣泛注意，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再次成為歷史理論關注的熱點。1981年，我們進一步把論文擴充成專著，《興盛與危機》一波三折，於1984年在湖南出版。在兩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整肅中，我們的觀點都受到批判。有人批判我們否定歷史唯物論，發結構主義史學在中國的濫觴；有人則認為我們搞歷史控制論，對中國出現「三論」熱的科學主義思潮要負責任。1987年，我們結束一年美國訪問歸來，開始對《興盛與危機》作全面修訂。我們吸收了近十年學術界的研究成果，驗證和細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假說，以對海內外各種批評作出回答。（《興盛與危機》的修訂本，由於「六四」，拖至1992年才改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與此同時，我們必須進一步錘煉方法論之劍，把來自控制論、系統論、突變理論中的內容和社會科學歷史結合，轉化為我們自己在運用中不斷成熟的新分析工具。

1979年到1989年這十年的生活緊張而忙碌。我們出了一本又一本書，與朋友們一起開創了走向未來叢書等民間文化事業。光陰飛逝，正如詩人所說「活得匆忙，來不及感受」。中年人的忙碌和沉醉於忙碌帶來的成功感，實際上和吸大麻差不多，用佔滿每天時間

來逃避人生的空虛，使他忘卻那個青年時代立志一生去追求的理想。正如孫行者劃地為牢不讓唐僧離開以免受外界傷害一樣，當時我們所有探索都有一個不曾逾越的限制，這就是閉口不談近現代社會變遷。事實上，無論是我們在哲學方法論上的創新，還是歷史文化探索，都只是青年時代擬下提綱第一部分之細化。而青年時代歷史感的主體，卻是對中國現代社會和傳統的類似性的體悟，近現代史應比傳統社會分析更為重要。可以說，我們是為了解決近現代社會變遷之謎才去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的。攻其堅必先利其器，我們卻整整十年沉醉在磨劍之中，好像造劍本身就是目的。實際上，這是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逃避。

這種逃避來自中年人特有的以成熟和堅強為掩飾的懦弱。青年人在追求真理時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中年人卻由於深知前人之專業研究，了解這潭水有多深，就固守「不知深淺，切勿涉水」的信條。我們知道，無論從材料上，還是問題的複雜性上，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的研究都遠比傳統社會更難，這是一個更為龐大的領域。任何一個僅僅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學家是不可以憑主觀想像和直觀外推來理解近現代的。我們在已開闢的領域中比較容易取得成果，但轉到近現代史，就可能被史料淹沒而一無所獲。而且，我們提出超穩定假說已幾次被官方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中國近現代史涉及的問題在政治上遠比古代史敏感，即使寫出書來，也難以在大陸出版。

青年時代的歷史感猶如初戀時對愛情的嚮往，它雖被中年繁忙的應酬和社會責任而造成的心靈麻木所壓抑，但有時仍會如大鵬般突然振翅欲飛，在被專業和理性禁錮的鐵籠中，帶來陣陣不安和騷動。直到某一個重大轉折的來臨，往日努力的成果和瓶瓶罐罐被意外事變打碎，在十幾年耕耘中自己築下的所有藩籬均被重大歷史事變拆除，青年時代的目標才會再次在生命和真理的追求中凸現出

來。這一天終於到來了，這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我們又流浪遠方，像青年時代那樣聽從歷史感的召喚，再次進入新的探索領域。

3 孤獨者的回應

1989年4月初我們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邀請，作五個月的學術訪問。正在這段時間，中國政局出現了鉅變。我們所有的著作在大陸均被禁止發行，流亡的歲月開始了。當代學者常用「內在流亡」來比喻現代人內心的孤寂。在現代，人與人之間心靈的距離雖已被喻為如一個星球和另一個星球那麼遙遠，但仍不足以和真正流亡生涯中的孤獨相比。流亡是把一個人徹底和他原有的社會角色相孤立的過程。中年人慘淡經營十幾年的文化事業毀於一旦，多年共事的朋友群消失了，有的關在牢裏，有的亡命異鄉。他甚至不能照顧年邁的父母，不能再對兒女負起應有的教育責任。在原有的社會角色粉碎之後，一種類似於麻痺症般的無力感開始不斷擴展。本來，我們正努力推動事業不斷向前發展，是文化思潮的理性反思者，而在八九民運和稍後的時間，激烈的簡單化情緒代替了理性，批判意識被用道德為旗號的指責敗壞，中國和西方的關係一度退回到冷戰時期。作家失去了讀者，理論家失去了預設的論辯和說服對象。新文化的創造再次被政治干預和社會關切的變化所中斷。流亡者的鏡中形象不再是一個社會歷史和文化積累中的自我，而是赤裸裸孤立的靈魂和軀殼。對於流亡者，原來生活的社會賦予人身上的種種意義不再存在。薩特(Jean Paul Sartre)說，我寫作故我存在。加繆(Albert Camus)說，我反叛，故我存在。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中華民族歷史的苦難猶如蒼天一樣籠罩着我們的青春、生命和思想，從青年時代起，就意識到我們是為着中華民族未來的命運而

存在的。但是現在我們還能為祖國做甚麼呢？

香港中文大學位於八仙嶺之南，往北只要翻過兩重山峰就是中國大陸。我們常常站在陽台上，面對北方群山，看着太陽徐徐下山，身後華燈亮起，一個燈火輝煌的現代化都市和黑壓壓的北方構成明顯對照。我們在孤獨中痛苦地沉思，思考常被九廣鐵路上轟響疾駛而過的火車中斷。是的，對於孤獨的流亡者、立志把祖國的未來當作自己命運的中國人，我們既無政治權力，又無經濟實力，除了已被社會冷漠的文化學術研究外，我們甚麼也不會做，我們應該做甚麼呢？我們又能做甚麼呢？

中國也許真的又到了一切理論研究、任何文化創造都是多餘的時代，社會正在黑暗中醞釀着改變它的各種新動力。然而在中國歷史上，從來不缺乏各式各樣推動力。問題的關鍵在於，大多數新的動力出現時，它們往往是盲目的。我們的祖父輩不正是被它們推着走的嗎？到了我們的父輩，力的方向改變了，他們又被改變了的力推着走。八十年代，我們對父輩創造的精神果實和社會體制進行反省之時，卻發現自己站到了類似於我們祖父輩的立場。一代又一代人成了歷史重複和輪迴的工具。在巨大的歷史悲劇面前，憤怒開始平息，偏激之情也隨着時光流逝變得淡漠，熱情卻依然留在我們心中。一種把中國今天悲劇般命運和歷史遭遇聯繫起來的思考日益強烈，我們心中再一次湧現出歷史意識。正如歷史不能對十一億人的苦難無動於衷一樣，理論家也不能對自己民族在一百五十年中付出的代價無動於衷。尊重歷史最好的辦法是去大無畏研究她。我們再一次翻開青年時代的提綱，閱讀二十年前的文字，在種種不成熟的觀點和錯誤的史料背後，居然發現那些曾經激動過我們但後來卻認定是幼稚的東西仍然正確，心靈再次被青年時代的歷史感所震撼。

我們為十幾年來下意識逃避近現代史研究感到羞愧，決心着手寫《興盛與危機》的續篇，探索自1840年超穩定系統對外開放後的社

會結構的演變。思想家有自己的戰場，那就是去戰勝(認識)那些人們創造出來但又難以馴服的觀念。在社會鉅變中，有多少觀念如過眼煙雲被人遺忘，又有多少觀念被歷史積澱形變，上百年來它們吸收着民族血汗和精華，成長為龐然大物，使每一個後繼者都生活在它的陰影之中，視它們為理所當然。理論家與錯誤的歷史觀、不公正的偏見，以及控制着人們的意識形態之戰猶如解除魔咒，為了讓理性之光照亮觀念的群山，就應使它們恢復人創造歷史時的本來面目。這種戰鬥在本性上是孤獨的，有無讀者和觀眾多寡對戰鬥者沒有影響。在八十年代文化熱時期，理論探討如羅馬角鬥士進入鬥獸場，在社會眾目睽睽之下進行，新觀念一提出就立即得到觀眾響應，即使思想苦鬥毫無結果，參與者仍能從過程本身得到滿足而毫無怨言。但是在絕大多數場合，思想探索不是一項可以忘情於人群的公共活動，思想家必須習慣於孤獨的戰鬥，這是他唯一能對社會挑戰所做出的回應。

4 湧現「歷史記憶」

當我們沉入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時，才開始理解為何這一領域的突破如此困難。我們碰到的第一個障礙是：中國一百五十年來的社會變遷被人為地割裂成互不相關的幾段。青年時代，讀毛澤東詞〈念奴嬌·崑崙〉，最不滿的是詩人因環球大同理想，用倚天寶劍把莽莽崑崙山砍成三截，一段遺歐，一段贈美，第三段留中國，以達到世界「同此涼熱」的目的。整體的中國近現代史很像詩中崑崙山的命運，在當代人心中隔裂為三個難以相通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晚清(從1840年到1911年)，其主線為中國傳統社會受到西方衝擊，大一統封建王朝步步解體。第二段是自辛亥革命後至二十年代這十幾

年，這一時期中國社會變遷的主線是文化觀念大變革，爆發了全盤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產生了馬列主義和三民主義兩個新意識形態。第三段是1927年以後，中國社會再次整合，國共兩黨的鬥爭成為現代史的主線。這三階段因歷史主線不同，研究清末歷史的專家不一定熟悉在年代上只差幾年的新文化運動；研究新文化運動的學者則可能不了解國共兩黨的歷史。這種斷裂帶來的另一個嚴重後果，就是中國人對近現代歷史記憶的短暫。每隔十年，恍若隔世，正如代溝一樣，青年人往往對上一代的心態和經驗毫無所知。可怕的是近現代史專家也陷入了類似境地，他們只研究某一段的歷史，僅在自己熟悉的領域中提出問題，總結歷史經驗，從而使歷史反省受到無形的限制。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派的心理醫生常常用催眠和解夢來驅除籠罩着病人心靈之觀念壓迫，使人從過去的夢魘中得到解放。歷史學家恢復歷史記憶除了要突破專業藩籬、盡可能從自己熟悉的那種對過去之解釋中擺脫出來以外，還必須把自己放到歷史變遷中去，用自己的心來感受發生過的重大歷史事件。在閱讀近現代史的史料體驗中，我們發現，表面上發展主線完全不同的近現代史三個階段存在着結構性的關聯，這就是意識形態和社會組織的關係。晚清史的主線可以歸為在西方衝擊下士大夫對儒家意識形態認同出現危機和大一統王朝解體；新文化運動則是中國知識分子拋棄儒家意識形態尋找新意識形態之運動；而五四以後的歷史主線是兩種新意識形態相互競爭、稱霸並重新整合社會之過程。它符合我們在《興盛與危機》中已闡明的超穩定系統的基本組織方式，即意識形態和社會組織一體化的假說。我們認為，當傳統的一體化結構不能抵抗西方衝擊時，就會出現傳統意識形態的危機，以及相應一體化組織之解體，但是由於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與社會組織一體化這種組織方式沒有改變，危機的後果只會是意識形態更替，即用更換意識形

態以產生更具社會動員力的一體化組織來適應西方衝擊。也就是說，只要把超穩定系統的基本結構放到對外開放條件下去考察，其典型的行為模式已不是王朝周期性的崩潰與修復，而表現為「傳統一體化結構解體——意識形態更替——新一體化結構建立」的三部曲。在與世隔絕條件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和對外開放條件下更換意識形態，並出現與傳統同構的新一體化結構，都是超穩定系統基本組織方式的表現。

5 新意識形態的迷思

一種基於靈感的構思，不管它多麼誘人，多麼具有表面的說服力，但和社會科學理論仍有十萬八千里距離。走完這一路程不僅僅是收集事實材料的艱苦鋪路，還必須克服思想邏輯方面的困難。我們用來把握近現代社會變遷的新歷史觀是超穩定系統在對外開放條件下社會結構的轉化，它由「傳統一體化解體——意識形態更替——新一體化結構建立」這三個環節組成，雖然它在宏觀上與近現代史主線相符，但是在這三個階段內在的邏輯關聯被闡明並得到歷史材料支持之前，它仍不能算作科學假說。

人們很容易理解中國傳統社會和傳統意識形態因不能應付西方衝擊而解體，但是為甚麼會導致棄舊圖新意識形態更替運動呢？中國知識分子為甚麼會在反傳統之際認同馬列主義和三民主義？三部曲中第一階段和第二、第三階段有甚麼聯繫？這是整個模式的基本困難。以往的歷史研究，大多局限於對1915-1924這十年新文化運動思潮本身的分析，來闡明反傳統知識分子信仰馬列主義的理由，佔主導地位的觀點是訴諸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心理，即認為由於共產主義是源於西方又反對西方的意識形態，因此對於被西方侵略、

又不得不向西方學習的中國人具有特殊魔力。這種對中國人親和新意識形態的解釋是簡明而有說服力的。這種解釋最大的問題在於，它僅僅從文化心理層面來分析意識形態更替，而忽略了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的互動，新文化運動中新意識形態的出現就和十九世紀末開始的社會鉅變割裂開來。而且由於馬列主義明顯是一種外來意識形態，這種史觀由於看不到中國社會親和於外來意識形態巨大的內在結構性動力，其不可避免的結論是把中國現代社會看作傳統的斷裂。這就使中國現代社會變遷的一些重大特徵，都顯得怪異而不好理解。如三十年代三民主義向儒家傳統的復歸，馬列主義的儒家化——毛澤東思想的出現，以及1949年大陸新建立社會結構和封建王朝的類似性，都難以納入邏輯一致的分析架構。

我們決定把《興盛與危機》一書中用於研究傳統社會的整體分析方法運用到近現代史領域。如果說在古代社會研究中，這種整體分析方法主要用以解除馬克思唯物史觀中經濟決定論的束縛，那麼在近現代史研究中，則有助於我們克服韋伯式思想史研究的文化決定論。也就是說，即使是意識形態更替，它也並不只是(或者主要不是)一種文化現象。在超穩定系統中，意識形態與政治、經濟子系統存在着強耦合：意識形態內容的變遷和與它相關的社會組織解構存在着互動關係。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標誌着中國在不改變自身固有組織方式情況下進行第一次現代化嘗試——洋務運動的失敗。這時傳統意識形態中的社會觀和哲學觀已經開始部分解體，整個知識界對《天演論》所宣傳的進化觀趨之若鶩，於是出現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和意識形態認同危機蔓延的互動。1898年的戊戌政變，1906年的立憲改革，1911年大一統清王朝瓦解，均是這一互動必經的階段。意識形態更替只是一體化組織解構的最後階段，它和紳權整合社會失敗密切相關，即它只是超穩定系統中社會整合危機導致的後果。我們可以從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結構的互動關係來解

釋為甚麼新文化運動發生在1915年後(即清王朝瓦解後)，並說明傳統社會的組織方式如何潛在地左右着新知識分子選擇(或自行創造)新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更替是傳統意識形態的具體內容(政治文化符號)從深層結構中剝離下來的過程。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只是否定了儒家意識形態的具體內容，而沒有觸動用意識形態整合社會的基本思維模式，這樣，傳統的文化深層結構就和否定舊意識形態之逆反心理結合，成為選擇外來新意識形態或自行創造新意識形態之基礎。於是，在我們的歷史解說中，新意識形態對舊意識形態的代替不是傳統之中斷，而更像傳統結構的倒置。我們將其形象地比喻為意識形態面具的倒轉，在深層結構不變條件下實現某些傳統價值的逆反：如用群體的道德理想主義代替個體的道德理想主義，用未來的烏托邦代替古代的「大同」。這種解釋也許更能有助於理解為何新意識形態會那麼快地普及。正因為新意識形態符合了傳統的深層結構，但又不同於儒家，並以反帝反封建為內容，從而具備了比傳統意識形態更大的組織力。它一出現，就既可以促進中國社會實現內部整合，又可以對抗外來挑戰。中國出現了比傳統一體化結構更具動員力的組織結構，國民政府是三民主義和政治結構一體化，共產黨政權是毛澤東思想與政治結構一體化。二十年代後中國歷史正是具有更大社會組織力的一體化結構不斷壯大的歷程。這樣，近現代史在我們的解釋中就可以聯成一個有機的結構演化之整體。

6 知識分子邊緣化和民間社會的消失

超穩定系統說必須克服的另一個困難，是必須解釋為何中國現代社會組織形態和傳統封建王朝有着明顯差異。

海外學者把中國現代社會看作傳統的斷裂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中國傳統社會的組織者是儒生，他們或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大一統官僚機構成員，或在鄉村基層以縉紳地主身分作為地方和宗法家族的領袖，承擔政府機構控制向農村延伸之功能。中國現代社會結構的組織中堅是列寧主義式政黨，組織方式是以黨控政、以黨建軍和黨天下。黨員佔據了社會組織的中心位置，而知識分子則退到了邊緣。第二個重大差別是民間社會的消失。傳統一體化結構中，官僚機構的末梢是縣一級，縣以下則是民間社會。但在國共兩黨建立的現代社會中，官僚機構出現了歷史上從來未有過的大膨脹。國民黨南京政府官僚控制達到縣以下區一級，民間社會已經比傳統社會大大縮小了。而在共產黨建立的社會結構中，官僚機構比傳統社會擴大成百倍，上至中央下到基層，甚至每一個人，均處於官僚機構控制之下，民間社會和所有公共空間消失了，中國變成一個超級官僚社會。

這兩個重大差異如同深不見底的鴻溝，橫在中國現代社會結構與傳統結構之間，似乎把它們從本質上區別開來。任何一個研究者，無論有多少現代政治文化與傳統類似的感受，但只要不能填平這條鴻溝，現代和傳統的類似關係就只是一種直感，不能轉化為科學假說。人們要理解近現代史的渴望愈是急切，這兩個差異向人們提出的挑戰也愈強烈。1989年「六四」以後，這兩個問題也成為學術界注意力的焦點。1990年民間社會的討論成為西方學術界的重心之一；余英時在《二十一世紀》雜誌上提出，在近現代史上中國知識分子日益地從社會中心被排擠出來，成為邊緣人物。「知識分子邊緣化」一下子成為熱門話題。而我們深知，如何解決這兩個問題是考驗我們近現代史觀是否具有說服力的試金石。自從國共兩黨登上歷史舞台以來，知識分子邊緣化和民間社會日益縮小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問題在於，只要我們不把這些重大社會結構變遷歸為偶然，就

必須回答知識分子邊緣化和民間社會消失的原因。

在以往的研究中，均將上述兩種現象歸之於外來影響，如把列寧主義政黨興起的原因歸為向蘇聯模式學習，把民間社會消失看作列寧主義政黨擴張的結果。但是中國在向蘇聯學習之前，曾長期向西方模式學習，也曾把類似於西方議會政黨的組織（它們也是以知識分子為中心的）引進中國，為何這種嘗試不能成功，而列寧主義政黨卻能在中國政治上大行其道呢？歷史進程猶如洪水，而社會結構卻是不引人注目的地形和渠道。當山洪鋪天蓋地而來時，它流向一個方向而沒有走另外一個方向，表面上出於偶然，但實際上卻被地形所決定。然而要在洪水之後複雜的地貌中發現乾涸的河床卻是十分困難的事。

這時社會結構演化的整體論分析就可以顯示出獨具的洞察力。我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邊緣化和民間社會消失是超穩定系統在開放條件下進行社會整合時出現的必然現象。超穩定系統的組織方式是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的一體化，社會組織者只能由有統一意識形態的社會階層來充當。當超穩定系統與世相對隔絕，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是傳統社會的主流文化之時，社會進行文化教育和造就具有統一意識形態知識階層之過程是天然合一的。因此，在傳統一體化結構中，知識分子之形成機制就使得他們具有統一意識形態，成為社會組織的中堅。超穩定系統對外開放，培養統一意識形態的社會組織者的目標和造就知識分子的過程再也不能合二而一，出現了結構性分裂。在對外開放、思潮日趨多元條件下，以傳授知識為目的的學校（知識分子造就機構）是不可能保證知識分子具有統一意識形態信仰的，於是必須建立另一種組織來保證社會組織者的意識形態統一，這就是列寧式政黨。總之，開放條件下建立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一體化，社會組織中堅是統一意識形態之列寧主義式政黨，而知識分子自然退到了邊緣位置。

必須回答知識分子邊緣化和民間社會消失的原因。

在以往的研究中，均將上述兩種現象歸之於外來影響，如把列寧主義政黨興起的原因歸為向蘇聯模式學習，把民間社會消失看作列寧主義政黨擴張的結果。但是中國在向蘇聯學習之前，曾長期向西方模式學習，也曾把類似於西方議會政黨的組織（它們也是以知識分子為中心的）引進中國，為何這種嘗試不能成功，而列寧主義政黨卻能在中國政治上大行其道呢？歷史進程猶如洪水，而社會結構卻是不引人注目的地形和渠道。當山洪鋪天蓋地而來時，它流向一個方向而沒有走另外一個方向，表面上出於偶然，但實際上卻被地形所決定。然而要在洪水之後複雜的地貌中發現乾涸的河床卻是十分困難的事。

這時社會結構演化的整體論分析就可以顯示出獨具的洞察力。我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邊緣化和民間社會消失是超穩定系統在開放條件下進行社會整合時出現的必然現象。超穩定系統的組織方式是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的一體化，社會組織者只能由有統一意識形態的社會階層來充當。當超穩定系統與世相對隔絕，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是傳統社會的主流文化之時，社會進行文化教育和造就具有統一意識形態知識階層之過程是天然合一的。因此，在傳統一體化結構中，知識分子之形成機制就使得他們具有統一意識形態，成為社會組織的中堅。超穩定系統對外開放，培養統一意識形態的社會組織者的目標和造就知識分子的過程再也不能合二而一，出現了結構性分裂。在對外開放、思潮日趨多元條件下，以傳授知識為目的的學校（知識分子造就機構）是不可能保證知識分子具有統一意識形態信仰的，於是必須建立另一種組織來保證社會組織者的意識形態統一，這就是列寧式政黨。總之，開放條件下建立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一體化，社會組織中堅是統一意識形態之列寧主義式政黨，而知識分子自然退到了邊緣位置。

們決定進入近現代史研究時絕沒有想到，我們會在這一密林中長途跋涉將近四年之久。有好幾次，我們簡直不知道，青年時代的歷史感是不是一個虛幻的假象？有時，我們似乎有所發現，朝着看見的亮光走去，可轉了半天又回到了原處。《開放中的變遷》正文只有二十多萬字，但我們卻寫了五遍，只看見桌上的手稿越來越厚，不斷被修改、取消，換上新的內容。我們寫歷史書極像賈克梅第 (Alberto Giacometti) 繪畫，在矇矓中出現了某種整體形象，但它很快被歷史事實證偽、擦掉；當更多的事實顯現出新的形象，它又被擦掉換上了更新的。每次擦去都留下了某些痕迹，結果手稿層層疊疊，如積累歲月一般，思想在那裏沉澱。我們不知道甚麼時候寫作會有一個盡頭，也許，它永遠只能停留在未完成階段。

小時候，常有冬去春來時目睹映山紅漫山遍野盛開的喜悅。那時會感到表面上單調、枯燥的世界會在一夜之間變得那麼美，那麼動人心弦。也許，沒有一種閱讀會像啃近現代史的史料那樣枯燥，令人煩悶。中文大學的校園在吐露灣之畔的山上，我們常在校園中漫步、思考、討論。每逢三、四月間，紅色的、粉的、白的映山紅在濃霧中盛開，舊的花瓣剛落，新的花朵又綻開。歷史探索中的映山紅呵，何時才會在我們心中開放？

生活在二十世紀末的知識分子是十分痛苦的。在一切思想痛苦中最痛苦的是，我們對時代變化的思考遠遠跟不上時代變化本身。我們對中國歷史的探索自青年時代開始到今天，已經過去二十年了，我們仍在為解開中國為何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迷思而努力。然而在我們尚未理解現實之時，現實已經變了，社會主義陣營崩潰了。在福山和很多學者心目中，意識形態的歷史已經終結，社會主義運動已變成明日黃花。在這種世界和中國鉅變的潮流中，歷史研究顯得無足輕重。對於那些把社會主義看作即將成為歷史陳列品的當代人，我們的歷史探索除了告訴他們這一盛大陳迹的來由以外，

還有甚麼意義呢？在社會主義江河日下的當代思潮中，我們的研究極易給讀者造成一個錯誤的印象，這就是在把中國式社會主義看作傳統結構的舊瓶裝新酒之時，它不過是重複了自由主義一個世紀以來彈過多次的老調：肯定了資本主義的合理。社會主義既然只是一種傳統社會走向現代之時的反抗，它始終不能阻止社會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歷程，這不正是在理論上把今天雖已洋洋大觀但卻弊病百出的資本主義文明當作人類不可避免的前途嗎？在整個思考過程中，這種對當代資本主義商業社會批判意識喪失的痛苦，一直在折磨着我們，使我們懷疑自己研究的意義。

以科學認知為目的的探索和從價值出發的反思不同，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後一種批判一旦價值意義動搖就會失去進一步前進的動力，而前者卻不受價值失落的影響，因為把社會結構的變遷搞清楚，認知深化本身就可以成為意義。而且只要認知過程進行得足夠大無畏，它就可以成為重構批判意識的基礎。隨着本書快要完稿，一種立足於中國一百五十年社會變遷之上的新的批判意識漸漸在我們心中顯現出來。我們發現，如果人類真的要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那麼，歷史輪迴所告訴當代人的，決不是應該毫無保留地重返資本主義文明，而是要超越一百多年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極對立。

如果宏觀地概括中國在西方衝擊下走向現代社會的一百五十年歷史，它可以表示為社會應然模式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極之間的振盪。當傳統一體化結構解體之時，中國一開始想建立的社會是直接摹仿現代西方的形態。從1895到1915這二十年，中國一直以資本主義為藍圖推進現代化，只是當這一藍圖失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潮才開始興起，批判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成為應然模式。然而，社會主義的實踐實際上卻造就了一個與傳統同構的新的封閉社會，只有社會主義衰落，類似於資本主義的目標才再次顯現出來。

沒有一個民族的現代化歷程像中國近現代史那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各自在對方失敗時取而代之表現得那麼典型，反反覆覆，驚心動魄。這不得不促使我們去思考，社會演化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兩極擺動，是中國特有的、還是一種世界性現象呢？我們開始把從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得到的經驗放到世界近現代史中去思考。我們注意到博蘭尼(Karl Polanyi)在二次大戰後的著作《鉅變》，它在分析英國和西方近代社會起源時發現，西方近現代資本主義體系之形成直接和十九世紀中葉否定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斯賓翰連法案(Speenhamland Act)有關。而這些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濟貧法恰恰是更早期市場和工業革命帶來社會危機之產物，也就是說，人類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競爭一直是存在的，它甚至是從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到現在社會經濟史的主線。

我們突然領悟到，正如我們關於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方法有可能投射到世界古代史中、產生一種文明演化的新方法那樣，我們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也許同樣具有普遍的意義。社會演化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兩極振盪本身就表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者都是由傳統走向一個未知的現代社會之中間階段。資本主義的功能是打破傳統封閉，使社會走向開放。但它很快出現的弊病，導致社會出現危機。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弊病的批判和否定，但卻不得以重返一個封閉的類似於傳統的社會為結局。應該強調的是，對於不同的傳統社會，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形態均是不同的。一旦認識到這一點，我們自然可以感到：以資本主義為特徵的開放社會和社會主義一樣並不是人類社會演化之終極。人類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歷程至今尚未完成。一個開放、穩定的理性社會也許只有在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極振盪中吸取教訓後才能出現。

我們隱隱地感到，一種新的批判意識已在以中國為範例的歷史經驗中形成。正如中華民族走向世界本身意味着改變這個世界一

樣，中國學者必須為當代批判意識的重建去承擔自己的應有責任。今後，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對世界文化的貢獻不僅僅只限於孔子和數千年的傳統。和歷史悠久的古代一樣，它的近現代探索也可以成為批判和創造的源泉。我們正在走向新的批判。



第一章 超穩定系統的兩種行為模式

不笑、不悲、不怨，
只是為了解。

——斯賓諾莎

1.1 對新歷史觀的渴求

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令人困惑的時代：前八十年，人類思想所顯示出來的改造世界的巨大威力，是數千年文明史中前所未有的；而最後二十年，人類思想又遠遠跟不上現實。自中國對外開放，鐵幕拉開，短短十年左右，中國和世界格局都發生了鉅變，東歐蘇聯共產黨政權相繼崩潰，二戰後形成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大陣營長達四十年的對立霍然消失。在沒有預料到的現實面前，現有的社會科學和歷史理論無一不受到挑戰。每當社會發生鉅變，自然會激起人們追究其原因的理論興趣，並進而思考已有的歷史解釋是否合理。對我們來說，一個重要的課題是重新解釋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

現有的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解釋大致可分為六種：共產黨、國民黨各自的意識形態解釋；西方學者的「衝擊—回應」說、「傳統—現代」說、「帝國主義」說三種模式；以及不滿於上述五種解釋的另一種觀點，以余英時的說法最有代表性。他把二十世紀稱為中國歷史上「最混亂、最黑暗的時代」。他認為無論是「五胡亂華」、「五代十國」還是「蒙古入主」對中國發展的摧殘，都遠不如本世紀嚴重。

歷史上文化和民間社會尚有很大生命力，大動亂後又出現了文化復興與社會繁榮。而二十世紀一連串的激進革命卻徹底摧毀了中國傳統文化和民間社會^①。余英時的歷史感慨，無疑是來自於當前中國社會深刻的結構性危機。把危機根源歸之於共產主義革命和激烈反傳統，是港台、海外學者中具有相當普遍性的觀點。如果撇開價值判斷，在某種意義上說余英時的看法與國共兩黨的解釋有着一致性。余英時把當代中國社會視為與傳統中國社會的斷裂，而國共兩黨都認為他們領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旨在建立一個嶄新的現代國家，因此，都可以統稱為「斷裂說」。

「斷裂說」最大的問題是不能解釋中國大陸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差異。這種差異從五、六十年代就益加明顯，中國發生了蘇聯、東歐都沒有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從文革中期開始，大陸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感到，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政權很象封建王朝之繼續，在種種馬列主義名義後面，實質上是封建專制。「斷裂說」難以使這些人信服。在他們看來，傳統不僅沒有中斷，中國危機的根源恰在於傳統政治文化以新的形態出現。1989年「六四」以後，一個重讀和重寫中國近現代史的新探索已經開始。

西方史學界也有類似情況。據美國學者柯文(Paul A. Cohen)分析，本世紀七十年代後，西方對中國近現代史的三種解釋，即「衝擊—回應」說、「傳統一現代」說以及「帝國主義說」紛紛受到挑戰^②。它們都犯了一個共同錯誤，這就是西方中心論。「衝擊—回應」說把中國近現代所有重大事件均看作對西方衝擊的回應，嚴重

① 余英時：〈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總第2期、第6期（香港：1990、1991）。（以下簡稱《二十一世紀》）

② 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北京：中華書局，1987）。

忽略了中國社會變遷的內部動力，愈是靠近現代，這種史觀愈顯得缺乏說服力。這一理論的代表人物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其晚年，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在八十年代後期出版的《偉大的中國革命》一書中指出，中國在百餘年間，計有五次外來武裝入侵，但除了八年抗戰外，其餘四次影響和範圍均十分有限，決不能和中國近現代史上五次內部大變動相提並論。這五次內部大變動是：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國共內戰和文化大革命^③。「傳統—現代」說是把西方現代化作為普遍模式，其最大缺陷是不能理解東方社會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日本和中國幾乎是同時在西方衝擊下由傳統向現代轉變，但為何日本可以採取西方模式，而中國卻變成社會主義國家？至於帝國主義論，它雖然在價值評估上把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擴張作為批判對象，但出發點仍是西方中心論。東方國家在近現代變遷中獨特的文化、社會組織方式顯然被忽略了。

柯文在檢討上述觀點的種種缺陷後，呼籲歷史學家以中國社會本身為中心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他稱其為「中國中心觀」。雖然柯文也講不清楚，他所指的「中國中心觀」究竟是一種甚麼樣的近現代史觀，但這至少表明，西方學者從反對西方中心論而得出的結論，與中國知識分子的思考殊途同歸。二十世紀末期意識形態霸權和西方中心論退潮，使得被文化偏見或意識形態語言掩蓋的真問題如磐石般地顯現出來：那些歷史上形成的各種不同的盛大文明是如何走向現代社會的？傳統的文化 and 社會結構如何左右它們的變遷？這需要我們以理性開放精神再一次來探討中華民族一百五十年走過的道路。

^③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偉大的中國革命》 劉尊棋譯 「前言」頁2 (北京: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89)。

1.2 古代史和近現代史的統一觀

然而，這種探索的願望又如何付諸實際研究呢？雅斯貝斯(Karl Jaspers)在論述歷史研究的困難時曾這樣寫道：「我們能夠向史前投射那種暗淡光芒簡直衝不破漫長的黑暗」^④。對歷史的整體認識，一直有兩個最為晦暗的領域，一個是雅斯貝斯所說的遠古，另一個則是近現代。由於遠古離我們太遠，缺乏足夠的史料而難以把握。近現代則因為離我們太近，有太多具體事件，太多史料，人們不是迷失於繁瑣細節，就是囿於參與社會事務而被束縛於特定時代的價值判斷，把樹木誇大為森林，使理性之光難以穿透。歷史觀的形成，往往要在時間和空間上保持一種距離，才能發現當時不易覺察到的歷史事件之間的整體性關聯。時間則是對人們的現實感情的無情洗練，歷史學家可以從過分強烈的價值判斷中走出來。可是，對於今天尚生活在其中、或離研究者只有呎尺之遠的近現代史來說，要靠時間或距離感來達到對細節和事件的價值判斷之超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認為，有一個辦法可以幫助當代人越過時間與空間的障礙，這就是嘗試去建立一種古代史和近現代史演變的統一觀。

確切地講，我們先通過對近代以前歷史的長程研究，總結出中國社會在大時間尺度上呈現的結構特點和演化模式，然後再將它放到受西方工業文明衝擊的背景中去考察，看它發生甚麼樣的形變。可以把這種研究方法比喻為歷史望遠鏡之倒轉。通常，近現代史研究把中國一百五十年來的社會變遷分作若干階段，專家們盡可能熟悉每一段的各個方面，這猶如用放大鏡和望遠鏡詳盡地考察每一個

④ 卡爾·雅斯貝斯(Karl Jaspers):《歷史的起源與目標》魏楚雄等譯 頁1 (北京:華夏出版社, 1989)。

1.2 古代史和近現代史的統一觀

然而，這種探索的願望又如何付諸實際研究呢？雅斯貝斯(Karl Jaspers)在論述歷史研究的困難時曾這樣寫道：「我們能夠向史前投射那種暗淡光芒簡直衝不破漫長的黑暗」^④。對歷史的整體認識，一直有兩個最為晦暗的領域，一個是雅斯貝斯所說的遠古，另一個則是近現代。由於遠古離我們太遠，缺乏足夠的史料而難以把握。近現代則因為離我們太近，有太多具體事件，太多史料，人們不是迷失於繁瑣細節，就是囿於參與社會事務而被束縛於特定時代的價值判斷，把樹木誇大為森林，使理性之光難以穿透。歷史觀的形成，往往要在時間和空間上保持一種距離，才能發現當時不易覺察到的歷史事件之間的整體性關聯。時間則是對人們的現實感情的無情洗練，歷史學家可以從過分強烈的價值判斷中走出來。可是，對於今天尚生活在其中、或離研究者只有呎尺之遠的近現代史來說，要靠時間或距離感來達到對細節和事件的價值判斷之超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認為，有一個辦法可以幫助當代人越過時間與空間的障礙，這就是嘗試去建立一種古代史和近現代史演變的統一觀。

確切地講，我們先通過對近代以前歷史的長程研究，總結出中國社會在大時間尺度上呈現的結構特點和演化模式，然後再將它放到受西方工業文明衝擊的背景中去考察，看它發生甚麼樣的形變。可以把這種研究方法比喻為歷史望遠鏡之倒轉。通常，近現代史研究把中國一百五十年來的社會變遷分作若干階段，專家們盡可能熟悉每一段的各個方面，這猶如用放大鏡和望遠鏡詳盡地考察每一個

④ 卡爾·雅斯貝斯(Karl Jaspers):《歷史的起源與目標》 魏楚雄等譯 頁1 (北京:華夏出版社, 1989)。

王朝末期都有全國性農民大起義爆發，在動亂中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喪失，幾百年發展中積累起來的進步(財富)連同腐敗(無組織力量)一起被掃盪。在動亂後，和舊王朝類似的新王朝很快又在殘破的廢墟上重建。一個系統通過周期性崩潰遏制進步和演化，長期保持特定的組織形態，這正是超穩定結構所具有的屬性。我們提出的中國社會超穩定系統假說，正是從社會宏觀組織方式出發，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揭示周期性大動亂和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內在聯繫^⑤。

簡而言之，這種超穩定系統特有的組織方式，使得中國封建社會具有比世界上其他農業文明更強大的組織能力。每個王朝鼎盛時期，都呈現出高度繁榮，取得了在古代世界難以想像的成就。但是，也正是這種組織方式造成它在演化中的動態停滯。西方社會卻在不斷演化，一旦它長驅直入到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中國也就由先進轉化為落後挨打。那麼，能否用超穩定系統假說來研究中國社會近現代的演變呢？我們提出這一假說時，有一個特殊限定，即古代中國社會處於與世隔絕的相對孤立狀態。在這個條件下，中國社會特有的組織方式才表現為較為單純的周期性崩潰—修復的行為模式。我們發現，只要改變這一前提，當中國受到西方工業文明衝擊、再也不能保持其相對孤立狀態時，那麼中國社會內部固有的組織方式將和外來影響結合，塑造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的特有方式。也可以這樣說，中國近現代史上一系列重大歷史現象，正好是超穩定系統在近代對外開放、受到西方工業文明衝擊條件下的變遷模式。

^⑤ 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增訂本)(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以下簡稱《興盛與危機》)

1.3 中國社會的獨特組織方式

我們的整體研究方法由兩個基本環節組成，首先是根據中國傳統社會重大歷史現象去尋找制約它的深層組織結構，通過解剖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整合方式，指出它在相對孤立條件下是如何規定古代史基本特點的；然後把這種組織方式放到對外開放條件下去考察，以闡明近代社會變遷與傳統行為模式的聯繫。

中國文明最大的特點是它在數千年中成功地維繫了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農業社會的整合。因此，只要把社會組織分成上、中、下三個層次考察，我們就能發現，在這三個層次，中國社會均形成了和其他民族不同的組織方式。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層組織是以皇權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從秦漢到清朝，各個朝代官僚人數不等，但大都保持幾萬到十幾萬的規模[註一]。它們服從中央號令，執行對遼闊地區的行政管理，很少出現分裂和鬧獨立性。在以小農經濟為特色的傳統社會中，各個地區缺乏有機的聯繫，要維繫統一的官僚機構極為困難。馬克思(Karl Marx)曾根據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特點指出，封建社會的組織者常常被束縛於領地，全社會幾乎不存在一個遊離於土地之外可以建立廣泛社會聯繫之階層，從而不能「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⑥。布洛克(Marc Bloch)在其名著《封建社會》中也討論了封建社會政治組織的異化傾向，指出其典型形態——封臣制會不斷退化(Alienation)。「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意味着封建社會政府各級管理者演變為世襲貴族，它導致統一政府之解體[註二]。西歐統一王權的出現是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轉化中的產物，有效文官系統的建立是更近代的事

⑥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 頁90-91（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情。那麼，中國在兩千多年前又是如何克服馬克思和布洛克所形容的組織困難呢？

中國傳統社會的獨特之處正在於，春秋戰國時期，逐步形成了一個不甚強調身分等級、並與土地相對遊離的士階層。到秦漢時期，他們所信奉的儒家意識形態日益完備並佔主導地位。中國之所以能在秦漢以後維繫大一統農業帝國的穩定，是因為設立了一種用意識形態為標準的選官制度，從而可以依靠士階層作為大一統國家的組織者[註三]。用意識形態標準選官，就是把信仰儒家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我們稱之儒生——制度化地轉變為國家官員。這種官僚機構具有開放性和流動性，防止了官僚世襲，演變為貴族領主。儒家意識形態中維護皇權大一統的信念，促使儒臣主動服從中央。中央政府依靠意識形態整合力保持統治遼闊地區官員之間的互相合作，以防止分裂[註四]。

兩千年來儒生階層一直是這個超級大國的主要組織力量，用儒家意識形態標準選官的制度不斷完善，從秦漢的推舉，到隋唐已定型為科舉制。清代科舉制已極為成熟，當時凡讀書人必經童試，每次選拔25,000名，稱為生員(秀才)。生員三年一次鄉試，大抵每科新中舉人約1,200人，其中一半可得到官位。舉人三年一次會試，各科進士約在200-300人左右。清朝會試共112科，取進士26,000餘名^⑦。正是這些人組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骨幹。據何炳棣(Ping-ti Ho)統計，明清兩朝進士中有42.9%的人，其家庭是從沒有取得功名的。這說明，科舉制是用意識形態標準而不是身分、等級、財富標準選官，有效地防止了官僚世襲蛻變，保持了官僚機構人員的開

⑦ 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頁62-65（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放性^⑧。李國祁等對清朝五萬餘名地方官的任期做了量化分析，發現50%的地方官任期只有一年左右，75–80%任期在三年以下^⑨。官員具有高度流動性，表明中央王權對官僚的控制相當有效。

一個由數萬名官員組成的統一政府只實現了社會上層的整合。如果只有這種上層組織，還是不可能把一個巨大農業社會整合起來。與歷代王朝類似，清王朝官僚機構末梢到縣級為止，平均每個縣只有五名朝廷命官，但要管理約二十五萬人口的廣大地區。事實上，五名官員不可能執行稅收、治安等一系列政府行政管理功能。要實現廣大農業社會之整合，還必須依靠中層組織同上層官僚組織的有效配合。中國封建社會的中層組織方式是縣以下的地主鄉紳自治。本來，地主(領主)統治農村是世界各國封建社會共通的。由於地主(領主)對農村之統治常常造成各個封建領地割據，使得世界上絕大多數封建國家極難實現農村社會整合。但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地主紳士卻與之不同，一般說來，他們不僅不同政府對抗，相反，是與政府合作，幫助政府執行管理農村之功能。中國封建社會之地主紳士，不是一般的地主和領主，他們大多也是接受儒家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不少人從小飽讀詩書，甚至有低級功名，有的本人就是退休官員。紳士階級按照儒家意識形態原則行事，保證了他們和政

⑧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pp. 255–259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62); 另據張仲禮的研究，進入紳士階層的另一條途徑——「監生」(經捐納獲得)，差不多都是平民出身，其人數約佔紳士集團的30%。這些人形成一種平衡力量，以制約正途出身的紳士結成朋黨。參見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李榮昌譯 頁104, 110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以下簡稱《中國紳士》)

⑨ 李國祁、周天生：〈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嬗遞現象之量化分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以下簡稱《台師大歷史學報》) 第2期 (台北：1974)。

府的有效合作。在政府管理基層各類事務中，如徵收賦稅、調解民事糾紛、承辦公共工程等，地主縉紳都扮演著地方領袖的角色，而官方則以「一食廩，二免丁糧，三地方官以禮相待」等百姓沒有的特權，作為對他們為政府效勞的回報^⑩。中國封建社會在農村存在一個信仰儒家意識形態的地主階級，他們「官於朝，紳於鄉」，實現鄉紳自治，使得社會組織中層和上層官僚機構有效地銜接整合，起到溝通官府與民間的作用[註五]。十九世紀嘉道年間人士姚瑩說過一句話：「紳士信官，民信紳士，如此則上下通而政令可行。」^⑪這句話十分形象地表明縉紳地主如何發揮了把官僚機構的功能向民間延伸的作用。

我們把縣以下縉紳自治作為中國社會組織之中層結構，它的組織規模有多大呢？據張仲禮研究，十九世紀縉紳階層的總人數（包括生員和監生）在110萬到140萬之間，這個數目比全國官僚人數大了數十倍，但也僅佔總人口的0.3%，連同其家屬也不過550-700萬人，佔總人口1.3-1.9%^⑫。對三億人的農業社會來說，他們只是社會的一小部分。廣大農業社會之整合，還必須有某種更基層的社會組織。眾所周知，宗法家族和家庭是中國社會最基層的組織。日本學者片山崗研究清代圖甲制時考察了許多族譜，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從雍正到清末兩百多年的圖甲表中，總戶戶名使用同一個人名字的現象相當普遍^⑬。事實上，沒有一個人可以活得那麼長，戶名只不過是社會基層單元組織之代號。中國歷史上，宗法家族家庭與

^⑩ 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 頁36。

^⑪ 姚瑩：〈複方本府求言摺子〉《皇朝經世文編》卷23，轉引自馮爾康、韋建華：《清人社會生活》 頁121（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⑫ 張仲禮：《中國紳士》 頁109-111及頁166表32。

^⑬ 片山崗：〈明清時代的王朝統治與民間社會——關於兩者接點的戶之問題〉《廣州研究》 第6期（廣州：1986）。

社會中上層組織實現了銜接。本來，家族是人類社會組織的最直接和最原始的形態，它與國家組織存在天然矛盾。但中國宗法家族組織已不是簡單的血緣團體，而是以儒家倫理為組織原則建立起來的基礎單位。儒家意識形態以倫理為本位，把國家看作家庭的同構體，有效地消解了宗法家族組織與國家組織的對抗。

中國的宗法組織內部儼然是一個小社會，族長、家長握有支配財產、執行族規家法、決定同族人公共事務的大權。清代有諺語云「國法不如家法」、「鄉評嚴於斧鉞」，形象地刻劃出宗法組織在基層對每個人的控制。另一方面，宗法組織也能夠和政府管理銜接，宗法族長、家長往往把監督族人完課稅、服役、承辦官府事務作為自己的要務，宗法族長往往由本族中輩份高又識字的人來擔當[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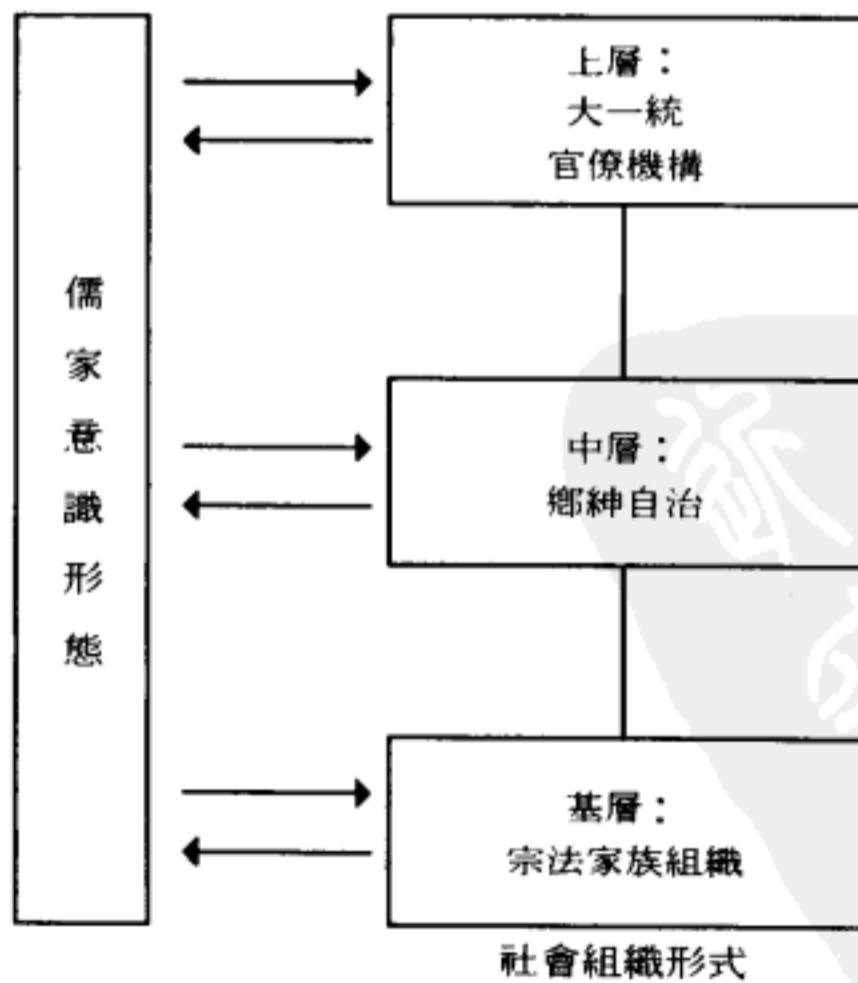


圖1.1 中國傳統社會組織的三個層次

六]。這樣，中國封建社會就通過上層國家機器——大一統官僚機構達到每一個縣，再以鄉紳自治為中介，最後由基層宗法家族達到每個家庭，實現了一個超級農業社會之整合。

綜上所述，中國封建社會組織機制的特徵是：儒家意識形態分別是社會上、中、下三個層次權威合法性來源，從而把三個層次聯成一體，使三者能互相協調(圖1.1)。為了把握這種組織方式的特點，有必要提出兩個基本概念。我們把人們信仰某種意識形態並將其規定的原則付諸於實踐，稱為意識形態認同[註七]；當一個社會各層次組織以統一的意識形態為前提，各層次組織骨幹由認同統一意識形態階層或集團充當時，這種組織方式稱為意識形態與社會組織的一體化(包括政治結構一體化)，簡稱一體化[註八]。很明顯，中國封建社會中，國家官僚機構、鄉紳自治、宗法家族三種組織層次，均認同於儒家意識形態，因此，我們稱之為宗法一體化結構(或傳統一體化結構)，它是中國傳統社會特有的整合方式[註九]。

1.4 一體化結構和王朝周期性更替

任何社會組織必須依靠經濟系統為其提供物質資源，當社會組織結構不同時，它的經濟系統也不同。那麼，與中國封建社會宗法一體化結構相適應的經濟結構又是一種甚麼形態呢？

首先，大一統官僚機構需要足夠的稅收作為龐大的行政及軍事開支，同時還需要社會提供足夠的兵源和服勞役者。在農業經濟中，只有自耕農才能為國家提供足夠的稅收、兵源和勞動力。因此，中國社會的經濟體系中必須存在大量擁有土地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一體化結構中下層組織也須有經濟支持系統。鄉紳實現鄉自治，幫助國家管理農村，必須有自己的經濟實力。宗法家族也需要

有族田收入來支付社會基層組織活動的開支。這兩個層次雖作為國家官僚機構管理功能之延伸放大，但性質上卻是民間社會，政府不可能拿出錢來供養這兩個組織系統。實際上，一體化中下層的經濟基礎是地主經濟成分。地主的存在，必須允許土地自由買賣，縉紳不僅是地方精神領袖，也是富甲一方的地主。由於一體化結構中下層組織比上層組織龐大，農業經濟產出中大部分都用作中下層組織的資源。清代縉紳階級不足全國總人口的2%，但他們卻佔有國民總收入的23%^⑭，其中，19%靠官職和主持公共事業所得，相當一部分(34%)來自於土地收入^⑮[註十]。

農業經濟中主要由自耕農、佃農、地主等成分組織的結構，可稱為地主經濟。供養一體化組織的三個層次，需要嚴格保持地主經濟形態，地主和自耕農必須有適當的比例。當地主大肆兼併土地，自耕農急劇減少時，國家稅源、兵源也將隨之驟減，這時為了維持一體化官僚組織生存，稅收和勞役又不得不加到土地數量日益減少的自耕農，甚至是無地佃農身上。農民的負擔就會隨土地兼併而不斷加重。當自耕農減少到一定限度以下，農村經濟在地主與政府的雙重壓力下崩潰，往往引發全國性農民大起義。歷史上，中國封建社會每一個盛大王朝初建之時，自耕農相當多，往往佔總農戶的60-70%；到王朝後期，自耕農越來越少，當他們只佔總農戶的30%以下時，社會大崩潰也就來臨了。

不僅地主經濟中自耕農和地主的成分要保持適當比例，城市和鄉村的關係也必須保持在合理的結構中[註十一]。大一統官僚機構

⑭ 梅谷(Franz Michael):〈十九世紀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食貨》月刊復刊第3卷第7期 (台北:1973)。

⑮ Chang, Chung-Li: *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 p. 197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2).

是社會管理系統的主幹，它以郡縣城市作為自己的基地。為了保持社會上層組織之穩定，必須維持作為首都、省會、府縣衙門所在地的大小郡縣城市的繁榮。城市僅僅是一體化官僚組織所在地，實現對廣大農村基層社會管理的鄉紳自治和家族組織的主體——縉紳地主和儒生，則大多數住在農村。一體化組織的種種制度是以農村為重心的。廣大中下層儒生在鄉間過着耕讀生活，科舉制以讀書人的籍貫鄉里為配額選拔單位，鄉村不僅是士大夫階層生活和精神關注的中心，也是培養這個擔負社會組織功能階層的溫床。為了實現一體化上層官僚組織的管理功能向農村基層的延伸，廣大儒生必須住在鄉間，成為中下層組織之骨幹，我們稱這種狀況為中國社會組織(動員)的鄉村中心。一旦城市過分發達，商品經濟過分繁榮，土地兼并就會隨之加劇，導致自耕農破產流離，流入城市做傭或成為流民，地主也紛紛搬進城市，鄉間控制網減弱，整個社會組織的鄉村中心就會動搖。為了保證一體化結構鄉村中心組織模式，城市發展和商品經濟必須得到控制。一般在一個盛大王朝建立之初，城市人口在10%以下，商品經濟不甚發達。到王朝鼎盛時期，城市人口可達20%以上，但王朝後期城市惡性膨脹則意味着經濟結構和一體化適應性的破壞，它往往是大動亂的前兆[註十二]。

顯而易見，經濟結構是不可能自動地達到這種理想平衡狀態。一體化結構的確立，還必須包括利用官僚機構和意識形態對經濟組織進行塑造、調節，盡可能保持它處於理想平衡狀態。這樣，中國封建社會特殊的組織方式，可以概括為圖1.2所示的一體化結構與經濟的耦合，它是由意識形態、政治結構、經濟結構三個子系統組成的互相維繫、互相調節的體系。

我們認為，正是這種社會結構規定了中國社會的宏觀行為模式。在相對孤立的條件下，中國社會所遇到的問題主要來自內部，這就是如何保持三個子系統處於良好耦合狀態。社會結構所表現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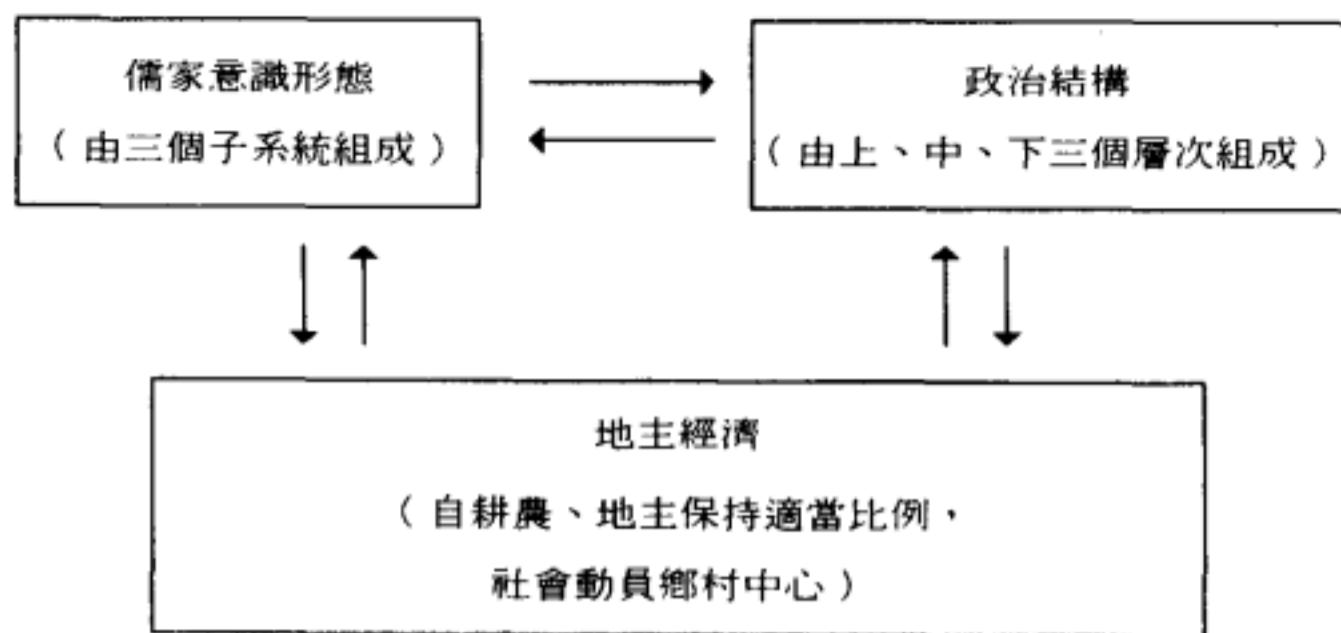


圖1.2 中國傳統社會結構

的行為模式可以用兩重調節機制來概括。第一重調節機制是社會結構在穩定時期的行為，其目的是通過一體化有意識地調節來保持三個子系統的耦合，如為了保證社會的意識形態認同，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實行獨尊儒術，儒家學說不僅是官方正統意識形態，也成為廣泛滲透基層對百姓實行教化的理論依據。在政治上是強化大一統官僚機構，防止官員腐化。經濟上則實行輕徭薄賦，重本抑末，盡可能抑制土地兼併，既保證中央財政有充分收入，又使地主鄉紳有經濟能力充當地方領袖。一體化結構在社會穩定期的行為模式通常稱為「仁政」。它是中國封建社會統治者出於對社會組織方式的理解，自覺地強化一體化結構、以保持整合社會之行動。清朝中前期在這方面表現極為出色。國家的農業稅一直保持在相當低的水平，地主經濟高度繁榮。清政府通過調節賦役、蠲免錢糧、攤丁入畝政策和法令，有效地控制了地價幾漲幾落，盡可能抑制土地兼併^{①⑥}。

^{①⑥} 馮爾康：〈清代地主階級述論〉《中國古代地主階級研究論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

太平盛世時期，郡縣城市和商業相當發達，但城市人口一直得到控制，清初城市人口只佔6-7%，據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估計，兩百年後即1843年長江中下游城市人口仍只佔7.4%^①。社會一直保持了鄉村中心。

但是以第一重調節機制為特色的行為模式不可能無限持續下去，一體化結構的各種調節功能會如鐵在空氣中氧化、刀在使用中變鈍那樣慢慢失效。失效的原因是一體化結構自身異化。一體化結構的各種調節功能對自身的腐敗和由調節製造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無能為力的。我們將調節機制的異化稱為「無組織力量」的增長。中國封建社會無組織力量主要有兩種形態，一種是官僚機構的膨脹和吏治腐敗，另一種是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併。各個王朝中後期，無組織力量由於積累而加速增長，最後如癌症般吞沒一體化結構，社會結構三個子系統的整合瓦解，社會宏觀行為模式轉化為全社會崩潰性大動亂。由於社會整合是被無組織力量增長破壞，而社會解體的大動亂恰好存在有效清除無組織力量之效果，大動亂就成為一種調節機制。農民大起義打擊地主，使土地兼併得到緩和，貪官污吏得以清除。城市是在動亂中受破壞最大的地區，儒生紳士在動亂中紛紛離開城市返回鄉間。而儒家意識形態和宗法家族是大動亂不能破壞的，於是在動亂消除無組織力量後，儒家意識形態認同再次成為社會三層次重建之基礎。我們看到社會結構的修復，一個新王朝迅速重建。這種由亂而治之過程，我們稱為超穩定系統第二重調節機制。

第二重調節機制作為中國社會在大動亂時期的行為模式，它由無組織力量引發農民起義、動亂打擊殺傷各種無組織力量、儒家意

①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 頁13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識形態認同在大動亂清除無組織力量後再次發揮作用、一體化結構修復等環節組成。它通常以新王朝取代舊王朝為結局。但在某些特殊條件下，農民大起義雖有效地殺傷了無組織力量，但卻未能推翻中央政府，其後果則可能是原有王朝的中興。中國自秦以後進入超穩定系統，到清朝兩千多年中間共經歷十一個大的王朝，在每一個王朝末期，我們差不多都能看到席捲全國的農民大起義。農民大起義清除了無組織力量，使得社會結構有恢復的可能。在清朝，第二重調節機制也十分典型，到十八世紀中葉，清王朝已被吏治腐敗和土地兼併折磨得衰弱不堪，終於在1851年初引發了以太平天國為首的全國性農民大起義。大動亂以極為殘酷的方式緩解了十九世紀中後期的人口—土地危機。太平天國起義雖沒有推翻清王朝中央政府，卻以席捲半個中國之勢橫掃清王朝的地方政府，大大清除了無組織力量。大動亂中，儒家意識形態認同在各層次發揮作用，重新修復一體化結構。以「湘軍」、「淮軍」為首的縉紳領導的地方武裝取代了朝廷的「綠營」，他們鎮壓農民起義後，在社會基層和中層再次建立地主縉紳鄉自治，鞏固了宗法家族。在社會上層，一大批新興儒臣和儒將進入官僚機構，特別是地方政府。歷史學家將經過太平天國大動亂後清王朝結構性調整稱為「同治中興」。它表明在第二重調節機制作用下，一個腐朽的王朝即使不被新王朝取代，也會出現一體化結構的復甦。

總之，中國社會特有的組織方式使它具備能有效克服內部危機的雙重調節機制。只要社會危機來自內部，這種雙重調節機制交替起作用，中國封建社會運行的典型模式，也就呈現出周期性王朝更替與儒家意識形態和政治一體化這種組織方式的長期延續。那麼，當中國社會所處的相對孤立封閉狀況被打破，這種組織結構不得不對外開放、受到工業文明衝擊時，它又會表現出甚麼樣的行為呢？在近代，對外開放與相對孤立的最大不同，是社會危機同時來自內

部與外部。對外開放時的行為模式由一體化組織方式如何應付內部和外部挑戰所綜合決定。

1.5 西方衝擊下的行為模式

早在中國遇到西方工業文明不可抗拒的衝擊前夕，龔自珍就以盆景中的梅花為比喻表達了對日益衰弱的中國社會的憂慮。他在〈病梅館記〉一文中主張「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棕縛」，預料被束縛在盆中的梅花必定會恢復欣欣向榮的生機。也許，龔自珍已敏銳地感到中國幾千年來相對孤立的狀態即將打破。但是，一個長久生活在封閉環境中的生命能否適應開放的環境呢？這是一個遠沒有解決的問題。

中國傳統一體化結構是在相對孤立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它的全部功能基本上是針對實現一個幅員遼闊的農業社會整合而設立，在對外開放、碰到近代工業文明衝擊時，它立即顯示出一個不可克服的內在悖論：當它力圖保持社會組織三個層次整合，在這一前提下去學習西方，其後果必然是現代化的失敗，傳統一體化組織會中斷現代化歷程。一旦由政府全力推行現代化事業，代價則是傳統一體化整合方式的解體，社會面臨日益嚴峻的內部整合危機[註十三]。

分析圖1.1所示的結構，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一體化結構依靠上、中、下三個組織層次保持農業社會之整合，這三個層次之協調必須依靠統一意識形態作為基礎。如果在推行現代化過程中同時強調保持社會整合，那就不能改變政治組織方式和觸及意識形態認同，向西方學習的現代化只能被嚴格限制在器物層面。大一統國家是通過縉紳鄉自治和宗法家族將政府的管理功能延伸到基層農

村，地主作為一體化中層組織主體，他們是全社會農業產出的最大佔有者，國家通過徵稅來集中財力物力，地主總要先佔有大量農產品，又要在為國家服務時中飽私囊，國家所得並不太多。如橫徵暴斂，則基層可能因動員過度而崩潰。傳統國家收入差不多已達這種社會結構經濟動員能力之極限，國家無力把農業收入轉化為國防和其他現代化事業的開支。即使器物層面現代化也會因為缺乏經費和與一體化組織矛盾而慢慢停頓。借用黃仁宇的比喻，傳統一體化結構三個層次如潛水艇夾肉麵包，上層官僚機構是上面一塊又大又硬的麵包，浮在農業社會之上。社會動員必須通過中下層組織，但中層恰如夾在中間的肉，它的組織結構鬆馳；而下層則是一塊代表宗法組織的硬麵包，唯有通過意識形態認同將三個層次聯繫起來。而意識形態的各種功能均以克服內部整合困難為主，社會組織動員也以農村為中心。這種組織方式對於保持農業社會整合和基層穩定十分有效，但現代化是要以城市為中心展開的事業，這三個組織層次既不能動員農村的人力物力進行現代化積累，也不能實現向以城市為組織中心之現代社會轉化。當政府不把社會內部整合放在首位、全力推行現代化過程時，立即造成一體化結構三個層次的斷裂。

十九世紀中葉到1911年辛亥革命中國社會變遷的主線恰恰是傳統一體化結構這一內在悖論的展開。1860年開始的洋務運動是傳統一體化結構在盡量保持內部三個層次整合前提下去應付西方挑戰，結果是沒有達到現代化之目標。1895年甲午戰爭宣告洋務運動失敗。在嚴重的亡國危機面前，中國儒生普遍覺醒，開始了一個全面學習西方工業文明、推動現代化的歷程。這就是1895年後的一系列改革和新政，但是在改革過程中傳統一體化結構的解體卻一發而不可收。

雖然清政府在推行現代化過程中盡量想保持社會整合，如維繫儒家意識形態的權威，使各項政治經濟改革不和一體化組織衝突，

但是現代化需要地主紳士把來自於土地的收入投資於現代企業，需要選拔在城市新學堂唸書並了解西學的知識分子為官，它和一體化結構三個層次的整合有着結構性矛盾：這些措施立即導致一體化三個層次的互相衝突。例如廢科舉和地主紳士投資辦工業促使紳士、知識分子由鄉村流向城市，造成紳士城市化潮流。本來，儒生作為一體化結構的主體，主要生活在鄉村，他們是一體化中、下兩個層次的組織者，擔負着一體化上層組織向基層延伸之功能。一旦他們向城市流動，一體化中下層組織空虛，傳統縉紳鄉自治破壞，宗法家族不再成為國家在基層功能之延伸，農村一天天混亂脫序。另外，中國的郡縣城市是各級政府所在地，紳權主要被限制在縣以下的鄉村，現在紳權進了城，並在現代化過程中擴張，於是引發了紳權和王權的衝突，中國發生了城市化紳權聯合革命黨反對王權的辛亥革命。傳統一體化結構三個組織層次整合解體，中國面臨嚴峻的社會整合危機。

在對外開放條件下社會整合危機會引發相對孤立狀態不可能有的後果，這就是意識形態更替。在意識形態與社會組織一體化這種整合方式中，社會組織被當作意識形態的規定藍圖的實現，那麼社會危機一定會反映到意識形態層面。但是在與世隔絕的條件下，中國社會的普遍危機大多是由無組織力量泛濫造成。無組織力量作為一體化結構調節功能的異化，它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均可以歸結為沒有真正有效地推行正統意識形態之故。吏治腐敗、鄉愿流行常被理解為君王和儒臣忽視了聖人教導的道德政治原則；土地兼併帶來的危機更證明「仁政」對於維護社會穩定之重要。於是，憎恨貪官污吏、捍衛正統意識形態之熱忱得以激發，危機反過來強化了社會對儒家意識形態之信仰。因此，在與世隔絕條件下即使社會結構三個子系統整合解體，出現大動亂，人口殺傷一半以上，儒家意識形態依然屹立，成為建立新王朝之藍圖。

但在對外開放、工業文明衝擊的條件下，社會危機並非單純由無組織力量泛濫引起，它再也不能單純地被歸為沒有實行儒家理想社會的原則了。社會組織不能應付外來挑戰之危機會反映到意識形態層面，成為人們懷疑檢討舊意識形態之理由。意識形態既然是社會組織合理性之依據，它必須對與其相對應的社會組織危機負責。防衛現代化的失敗會引起對意識形態內容的認同危機。一體化組織實體全面解構會帶來拋棄傳統意識形態的社會運動。

形象一點講，超穩定系統在相對孤立和與世隔絕的條件下，意識形態與社會組織之間的一體化關係構成了儒家意識形態認同自我封閉、自我肯定之循環。人們根據意識形態設計調節現實社會組織，當社會組織出現危機時，無組織力量的增長反過來使人們強化對儒家意識形態的信仰。而在對外開放條件下，封閉的、自我肯定的循環就會變成對舊意識形態的否定。但無論是對舊意識形態的自我肯定還是否定，在超穩定系統的組織方式中，只要把現實社會理解成意識形態規定的理想社會之實現這種觀念沒有改變，那麼隨着舊意識形態被全面拋棄，社會發生嚴重整合危機時，就會出現對新意識形態之需求。各種解決社會危機之觀念會重新匯集起來，建構或接受新意識形態。超穩定系統存在着一種特殊的應付外來衝擊的方式，這就是社會整合危機最後會引起意識形態更替。一旦系統找到新意識形態，社會又可能通過新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一體化組織起來，我們可稱其為建立新一體化結構。

1911年清王朝瓦解後，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內在邏輯的展開。當中國陷入愈來愈嚴重的軍閥割據局面時，爆發了全盤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無論新文化運動看上去有多麼複雜，有着創造和追求新文化的含義，但從宏觀的結構與歷史功能來分析，它正好是一次意識形態更替運動。

眾所周知，在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拋棄儒家學說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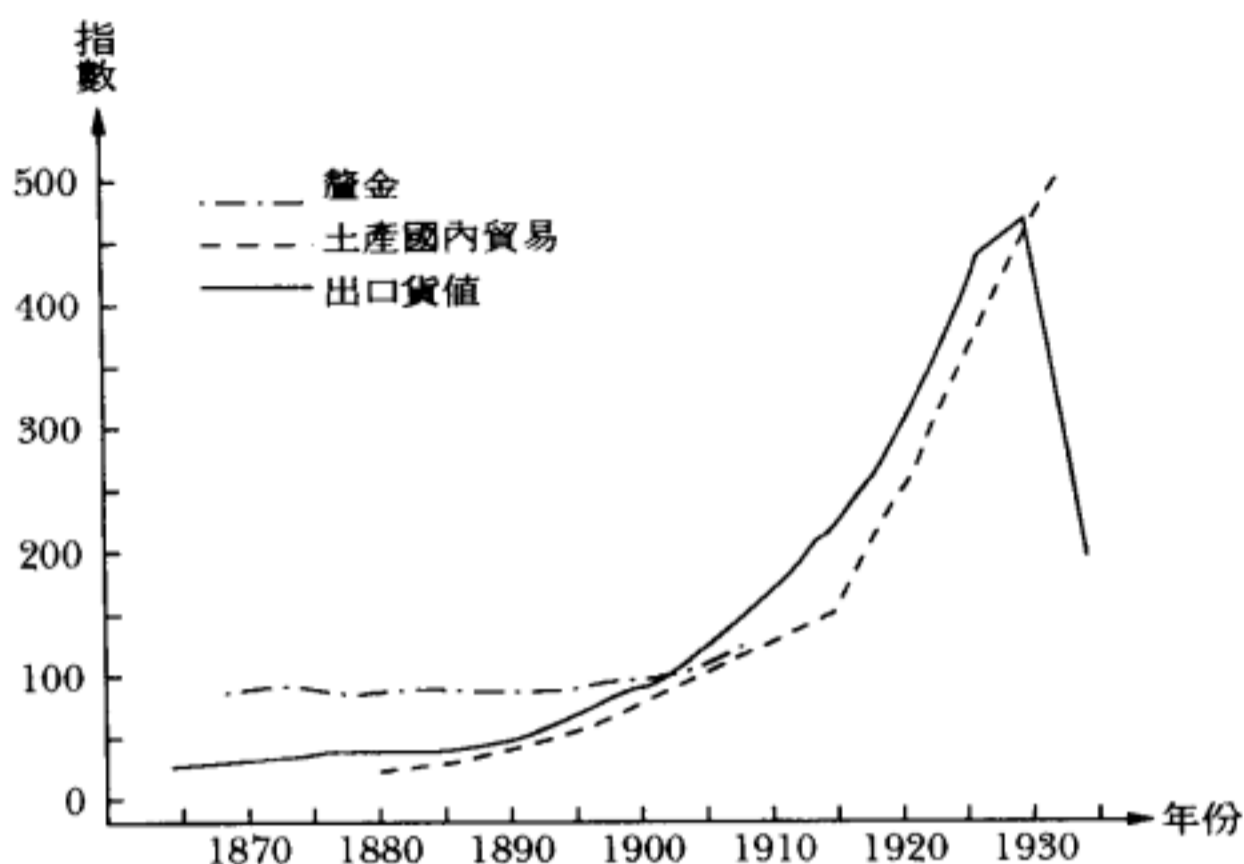
迅速認同了兩種新意識形態：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中國出現了以新意識形態認同為基礎的列寧主義政黨。改組後的國民黨和共產黨成為社會整合的主導力量，它們共同掃平軍閥。1927年後中國社會就形成了以新意識形態認同為基礎的政治結構，社會開始重新由分裂走向整合。只要我們進一步分析社會整合過程展開的順序，就會發現，它和建立如圖1.1所示的一體化結構存在着形式上的類似性。差別在於兩種新意識形態都不同於傳統儒家，基於新意識形態認同之組織逐漸填補社會整合必須的三個層次。

首先取代儒家正統的是三民主義，1927年國民黨在建立了一個以三民主義認同為基礎的統一官僚機構後，就力圖把這種官僚機構向下延伸，以代替原有一體化結構中已解體之中下層組織。但三民主義是一種弱勢新意識形態，它的組織力動員力不夠強大，國民黨一直缺乏管理基層農村之幹部，無法把建立在意識形態認同之上的官僚組織深入到農村基層，它只實現了社會上層和中層的部分整合，而不可能把這個鉅大的農業社會重新組織起來，結果無法與馬列主義競爭，終於喪失了在大陸的主導地位。馬列主義是比三民主義具有更大社會動員力的強勢意識形態，共產黨可以利用農民幹部認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真正地把建立在新意識形態認同基礎上的官僚組織深入到每一個自然村，從而具備更大的組織力量。1949年共產黨在大陸的勝利，標誌着新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三層次一體化之實現，中國社會整合完成。由於新意識形態整合社會可以用官僚組織代替傳統一體化結構中的鄉紳自治和家族組織，因此現代國家比傳統社會具有更大的動員能力。這一巨大動員能力的第一次顯示，是中國新政權一建立竟能在朝鮮戰場上與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相抗衡，並開始了一個由國家吸取農業資源、將其系統轉化為建設投資之工業化過程。中國近現代變遷雖然複雜，但卻可以看到一條主線，這就是傳統一體化結構不能適應西方工業文明衝擊

而解體，然後通過意識形態更替建立一種可以對抗這種衝擊的新一體化結構。

以上簡述只涉及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很少談及經濟，實際上中國社會的宏觀變遷還包括意識形態、政治結構與經濟的耦合。這種耦合關係表現在一體化對經濟結構的調節控制以及經濟為一體化組織提供資源兩方面。在封閉條件下，與傳統一體化結構耦合的是地主經濟。沒有一體化結構的調節，地主經濟在封建社會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穩定，它會向領主經濟退化。一體化結構的建立和解體一定伴隨着經濟結構形態的變遷。魏晉南北朝時，中國面臨外來文化的第一次大衝擊，傳統一體化結構一度因佛教衝擊和少數民族南遷而失靈，中國社會的地主經濟開始退化到類似於西歐、日本封建社會那樣的領主經濟中去。魏晉初期，自耕農農奴化，郡縣城市和商品經濟衰落。只有等一體化結構恢復，它對經濟結構的調節作用才再次發揮作用。隋唐帝國時期經濟結構就再次由類似於領主經濟形態轉化為有大量自耕農存在的地主經濟。超穩定系統在西方衝擊下對外開放，政治、意識形態變遷主線為傳統一體化解體，系統實行意識形態更替後建立新一體化結構。經濟結構經歷了一個從傳統一體化結構耦合中解放，又轉入和新一體化結構耦合之過程。

和傳統農業社會不同的是，在近代對外開放的條件下，中國被納入世界體系，近代工業經濟之成分一直在增長。正如中國傳統社會農業經濟形態取決於一體化結構調節一樣，現代經濟成分以甚麼形態存在，也和一體化結構是否解體有關。傳統一體化解構之前，中國發展現代企業，是國家控制之下的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特別是在洋務運動期間，新式企業大都以官辦形式存在。一旦一體化組織解構，近代經濟發展不受國家政治意識形態干預，對外開放又使得它和國際資本主義經濟趨同，互相交往，便呈現為自由資本主義形態。因此，在傳統一體化解構、中國實現意識形態更替時期，是



取自吳承明：〈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內市場〉，《歷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4）。

圖 1.3 1860至1940年國內市場的變化（以1900-1905年為100）

中國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大好時光，經濟結構變遷之主線為國內外市場和商品經濟的迅速增長。圖1.3為中國出口貨與國內貿易情況，從1890年到1930年前呈一遞增曲線^⑩。1927年國民黨建立了新一體化結構，開始利用意識形態和國家機構控制經濟，經濟結構中國家一官僚資本主義愈演愈烈。加上抗戰的影響，我們在圖1.3中看到自由資本主義之衰落。隨着共產黨在大陸的勝利，經濟結構又進一步演變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經濟結構之演變只是超穩定系統三個子系統在對外開放中整體演化模式之一個部分而已。

^⑩ 吳承明：〈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內市場〉《歷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4）。

1.6 各章內容簡介

總之，中國古代史和近現代史均是其獨特社會結構所表現出的行為模式。在相對孤立的條件下，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基本上來自內部。一體化結構只須應付內部挑戰，它具有雙重調節機制。在其作用下，系統的行為模式是封建王朝的建立、發展以及崩潰以後的再修復。中國對外開放，碰到的是西方工業文明的強大衝擊，社會危機來自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傳統儒家意識形態不變，系統將難以適應內部整合與對抗外來挑戰雙重壓力。於是，只能通過用更換意識形態來適應開放環境。變遷模式表現為：傳統一體化解體、意識形態更替、新一體化結構建立這樣三個階段。意識形態政黨、黨軍、黨國雖是中國歷史上沒有過的新事物，但它的功能卻如烏龜長出甲殼一樣來保證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一體化不受開放環境之干擾。新一體化結構用官僚組織充斥一切組織層次，也就有着更大的社會動員能力以對抗外來衝擊。雖然新一體化結構在深層組織方式上和傳統一體化類似，但是其意識形態在內容上又不同於儒家，這就造成新一體化結構在形態上和傳統王朝相似而不相同的奇怪局面。

我們在《興盛與危機》中提出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假說，是從系統的組織方式不變的機制來定義「超穩定結構」的。即超穩定結構是一種用周期性動蕩來清除一體化結構在調節中釋放出來的無組織力量，以保持這種組織方式的長期穩定的構制。在西方工業文明衝擊下中國傳統社會不得不開放，傳統一體化結構再也不能保持不變了，但系統卻呈現出一種新的行為模式：它用意識形態更替來建立新的一體化結構以適應工業文明衝擊下的新環境。這種行為模式使得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一體化的組織方式繼續保持下來，呈現出中國社會深層結構巨大的歷史慣性。因此，我們仍可稱其為超穩定結

構。

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只是一種假說。科學假說和思辯哲學的歷史觀的最大差別在於，它不僅僅是去建立一座邏輯一致的大廈，還要鋪一條由事實組成的可以讓人們走到那裏的大道。下面我們將用歷史事實來展示超穩定系統對外開放條件下各個行為環節。第二章寫洋務運動，這是中國傳統社會用傳統組織方式以實現防衛現代化之嘗試，它必然失敗的命運帶來對儒家意識形態的第一次大衝擊，中國出現了局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接下去用三章展開超穩定系統防衛現代化失敗後，如何出現一體化解構和意識形態更替之過程。第三章寫局部意識形態危機對社會組織的反作用，即意識形態在社會觀、哲學觀層面上的變化會導致一體化上層組織——大一統王權和官僚機構的解體，這就是戊戌變法後的立憲改革和辛亥革命。第四章指出，當傳統一體化上層組織解構時，由於中國仍深陷於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一體化之組織方式之中，西方民主制度和議會組織和一體化中下層組織脫節，無法捏合在一起，民主共和國只是一個注定破滅的幻象。一體化解構帶來中國社會嚴重的整合危機，軍閥混戰局面的出現不可避免。它的後果是導致社會徹底拋棄舊意識形態。第五章寫新文化運動，力圖向讀者展現為何馬列主義和三民主義會代替儒家意識形態，並為廣大知識分子所接受；這兩種新意識形態和傳統意識形態深層結構存在着甚麼樣的關聯。第六章通過描述國共兩黨興起和北伐，刻劃新意識形態在開放條件下是如何進行社會整合的，為了達到意識形態認同必須創造或引進哪些新組織形態。第七章寫國民黨建立的新一體化結構如何因抗戰和內部無組織力量的增長而衰落。第八章揭示共產黨整合模式怎樣與農民戰爭相結合，最終贏得政權。第九章分析共產黨建立的一體化結構，我們證明，與其相應的只有一種穩定的社會組織方式，新民主主義被放棄是必然的，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形態。第十章論述中國在魏晉南

北朝時對外來衝擊反應模式和近百年來社會變遷的類似性，並提出一種大歷史觀，以實現古代史和近現代史的統一。

我們希望讀者能以足夠的耐心和我們一起進入這一至今還是被意識形態帷幕籠罩着的迷宮。只有歷史發展的邏輯得到科學理性的闡述，一個民族心靈才能真正開放，歷史的代價、悲哀、憤怒才能得到平息。從此，過去不再是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它將成為後繼者可以通過它最終超越歷史的智慧之路。



第一章 註解

註一 表1.1為中國歷代官員人數。一般說來，在一個王朝初建時，官僚機構較小，人數在幾萬人左右，在朝代末年，官僚機構膨脹幾倍，可達十餘萬人^①。清代官僚(加上有虛銜者的人數)在太平天國前後則分別為8-15萬人左右。其中除了行伍出身的武官，大部分從生員或監生擢升而來^②。從表中可見，自宋朝以後，隨着人口膨脹，政府官員佔的比例愈來愈小。這時一體化結構三層次中，中層

朝 代	官員數	人口數	官員佔總人口的百分比
西 漢	132,805	59,594,978 (公元2年)	0.22%
東 漢	152,986	56,486,856 (公元157年)	0.27%
隋	195,937	46,019,956 (公元609年)	0.42%
唐	368,668	52,919,309 (公元755年)	0.7%
宋	24,000	51,206,872 (公元1064年)	0.05%
元	16,425	59,848,964 (公元1291年)	0.03%
明	(洪武)24,683	59,873,305 (公元1381年)	0.04%
	(憲宗)80,000	61,852,810 (公元1474年)	0.13%
清	22,000	292,924,451 (公元1796年)	少於0.01%

取自《興盛與危機》，頁27。趙文林等：《中國人口史》，頁236、382（北京：人民，1988）以及張仲禮：《中國紳士》，頁116。

表1.1 幾個主要朝代官僚數量

① 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 頁63-67。

② 張仲禮：《中國紳士》 頁119。

(縉紳自治)和基層(家族組織)管理職能日益顯得重要。

註二 布洛克在《封建社會》中曾討論過西方封建社會典型的社會組織方式——封臣制——的不穩定性，它存在着逐漸失去原有功能和結構的不斷退化傾向。布洛克將它稱為異化(alienation)。它有兩種變化方向，一種是封建國家解體，統一政府分裂為很多碎片。另一種可能是向官僚機構轉化。當農業社會中不存在統一的管理階層時，封臣制轉化為官僚機構是不可能的。在西方封建社會早期，由封臣制退化導致封建國家解體是一個普遍趨勢。它表現為農奴化和封建化。我們在《興盛與危機》一書中對此作過詳細討論，西歐查理曼帝國的瓦解，日本大化改新後建立的統一政府之解體，都是例子。秦漢帝國以前，中國也是如此，如周朝的分封制，它確實處於不斷退化之中，其後果也是國家由統一轉化為分裂割據局面。它典型地反映了農業社會中建立統一政府的困難^①。

註三 戰國以後中國日趨統一，如果我們以大時間尺考慮春秋至秦漢的社會變化歷程，可以發現士階層的興起和儒家意識形態日益佔主導地位是建立統一帝國的一個重要前提。許倬雲做過一個著名的研究，他選取見於《左傳》的516人，見於戰國典籍的197人作考察對象，將這些人物劃分為公子、卿大夫和士三個集團，又以三十年為一代劃分為九代，戰國也分為若干代，定量地分析這些集團在社會政治生活中重要性的變化趨勢。

從公元前692-663年，公子集團人數在政治生活中所佔比例由53%驟減至19%，而公元前542-513年以後，公子集團比例人數就常在10%以下。在春秋的516人中有335人屬於卿大夫集團，佔總數

^① 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第2章。

的65%。他們從公元前722-693年一代中所佔比例44%，逐代上昇，到公元前602-573年，佔74%。這一上昇趨勢與公子集團的下降趨勢同時發生，表明了政治活動的重心由公子集團向卿大夫集團的轉移。到了春秋後期，卿大夫集團所佔比例從74%的高峰跌至55%（公元前482-464年），卿大夫地位的下降，表明了「士」集團在政治生活上的興起。戰國時期，作者着重考察了社會上的「新人」，或出生寒微者。在春秋時代，來歷不明者平均佔總人數的32%，到了戰國時期則高達60%，這一趨勢表明了卿大夫集團的衰落以及戰國時期社會具有的高度流動性。

這一研究表明，春秋戰國時期，王室宗親的公子集團和貴族卿大夫集團一直處於逐步衰落中，而不以身分等級為固定標誌的士階層逐步崛起，成為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組織力量^②。也就是說，士階層的出現意味着當時中國已形成一個不同於貴族領主而可以在農業社會中進行廣泛聯繫的新社會成分，他們可成為跨地域政府的組織者。與此同時，儒家意識形態開始普及，慢慢地成為一種佔主導地位的文化。到了秦漢時代，這兩個趨勢結合起來，使得以儒生為大一統國家官員的條件得到成熟。馬克思和布洛克所描述的封建社會跨地域的組織困難得以克服。從此以後，大一統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形態，而不像世界其他地區，分裂是農業社會之普遍狀態。

註四 我們在《興盛與危機》一書中考察了封建大國內部三種自發分裂傾向。第一種是國家官僚機構慢慢失去流動性，世襲制漸漸盛行，其後果是王權中央政府控制之衰落，我們稱之為貴族化傾向，

② 許倬雲：〈春秋戰國間的社會變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期下冊（台北：1972）。

即國家官僚向貴族之演化。第二種為農民對地主人身依附關係的加強，從自耕農地位演變為農奴。與此同時，地主不但對農民存在着經濟上的剝削，而且有行政控制權和人身支配權。顯然，自耕農農奴化也意味着大一統國家的解體，領主莊園成為政府針插不進、水潑不入之獨立王國。第三種傾向是軍事將領擁兵自重，不再服從中央，使大一統國家蛻變為封建軍事割據。在中國封建社會，也存在着這三種自發分裂傾向，但是利用統一意識形態為選官標準，則可以有效地克服這三種自發趨勢，它使官員處於高度流動中，並防止世襲和官僚機構貴族化，儒將具有統一意識形態，有利於軍事力量聽命於王權。在官僚機構控制下，農民對地主人身依附關係日益減弱。因此利用統一意識形態的階層充當政府官員是保持統一政府的關鍵性前提^②。

註五 由於大一統官僚機構對農村基層社會的動員需要通過縉紳的合作，歷代王朝對官紳合作治理農村的鼓勵提倡是不遺餘力的。表1.2為清朝對湖南省知縣治績表彰之統計，其中表揚最多的是力倡文教(佔34.44%)，它是將意識形態認同貫徹到基層的重要措施。其次為賑救災荒(佔14.42%)，第三位是確保治安(佔13.15%)。這三項事業均是通過與紳士合作來推行的。那麼紳士在延伸大一統官僚機構控制方面的功能發揮得如何呢？這取決紳士階層的人數和他們與國家政府合作的積極性。張仲禮對紳士的社會活動參與進行了統計，得到表1.3。它表明只有32%的紳士對社會活動不甚熱心。因此，大多數紳士在積極執行着國家管理向農村延伸之功能。而活動積極的紳士中，下層紳士佔多數。上層紳士中對社會活動不積極者佔41%，而下層只佔19%。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結論，

^② 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 第2章。

治績 人數 朝代	確剿 保平 治匪 安亂	撫綏 苗 徭	力 倡 文 教	賑 救 災 荒	獎 勵 農 耕	地 方 建 設	操 守 清 廉	斷 整 肅 民 訟 風	合 計
順治	17	4	12	7	14		6	8	68
康熙	11	5	60	36	10	14	12	20	168
雍正	5	1	14	7		2	10	5	44
乾隆	9	8	75	23	5	8	15	29	172
嘉慶	3	3	26	6	2	5	5	8	58
道光	10	6	20	11		4	9	16	76
咸豐	28	1	4	1	3		2	4	43
同治						1	1		2
合計	83	28	211	91	34	34	60	90	631
比例	13.15	4.44	34.44	14.42	5.39	5.39	9.51	14.26	100

取自張朋園：〈湖南省地方傳統中的幾個方面：量化分析〉，《台師大歷史學報》，第10期，頁229（1982）。

表1.2 湖南省知縣治績

將農村社會和上層官僚機構整合起來主要依靠下層紳士，他們大多居住在鄉和小鎮。即使在王朝末年，商品經濟繁榮，很多上層紳士遷居城市時，相當多的下層紳士仍居住在小鎮和鄉村，執行着農村管理職能。這一結論對理解1895年後紳士城市化帶來的中國社會結構變化極為重要。

註六 在《興盛與危機》和本書中，我們均使用「宗法家族」、「宗法一體化結構」等詞組，來概括中國傳統社會的家族組織及其與社會結構的整體關係。「宗法」本來是有特定內容的專有名詞，最早在《禮記》的〈大傳〉和〈喪服小記〉有具體記述，它主要是在皇室貴族中實行的一套制度。但是，其區別家族血緣關係的嫡庶統系的原則、制度卻對中國傳統社會發生了持續的影響，它甚至影響到基層家族

紳士類別		為慈善組織籌款或代管財產	調解或仲裁地方糾紛	領導團練		為公共工程籌款並主持其事	維護儒學道統	充當官府與民衆的中介	為政府籌款（捐輸、報效）	私人設善堂施捨、賑濟	對社會活動不積極者	總計	消除重複計算	研究的實例數
				組織	指揮									
上層紳士	人數	238	96	680	176	280	470	172	118	521	1364	4115	836	3279
	百分比	8	3	20	5	9	15	5	4	16	41	126	26	100
下層紳士	人數	133	99	303	670	216	246	59	64	525	402	2717	523	2194
	百分比	6	5	13	30	10	11	3	3	24	19	124	24	100
合計	人數	371	195	983	846	496	716	231	182	1046	1766	6832	1359	5473
	百分比	7	4	18	15	9	13	4	3	20	32	125	25	100

取自張仲禮：《中國紳士》，頁223，表32。

表1.3 紳士的各項社會活動參與

組織。因此，中國大陸學術界習慣於將中國傳統社會特有的家族組織形態稱為「宗法家族」，我們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沿襲使用這一術語的。

社會基層組織必須承擔兩種功能，第一，在基層執行必不可少的社會管理，如調解處理各種人事糾紛，對受困無法生活下去的家庭進行救濟，以及從事部分治安、教育文化組織等活動。第二，基層組織必須和國家政府銜接，監督族人完田課，以及承辦上面交下來的公務。在中國封建社會，這些職能大多由宗法家族組織來實

現。《大清律例》賦予祖父母、父母以廣泛的權力。凡「父母控子，即照所控辦理，不必審訊」，已把處死權賦予宗法組織^{②④}。祠堂不僅是一族人聚集的場所，也是一個實行宗法族規之管理機構。宗族大多有族田作為公共事業之開支，它使基層政權具備相當的經濟功能。例如有人對清代族田經營的研究表明，在很多地方，「完國課」是族田租入支出的首要內容，佔收入的15-20%，而42%用於宗族公共事務，23%用於祭祀祖宗，墳墓修葺佔5%。在另一些案例中，國課佔32%，30%用來作子弟教學支助，20%用於救濟族中貧困戶或贍族費用^{②⑤}，而修家譜則有助於維繫宗族的共同精神認同。我們把社會組織分成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子系統耦合而成，而中國的宗族卻儼然是一個小社會，它的三個子系統和社會組織三個子系統存在着對應關係(圖1.4)。在《興盛與危機》一書中，我們將其稱為家族與國家組織同構效應。同構效應正好刻劃了宗法家族是國家政府功能的延伸^{②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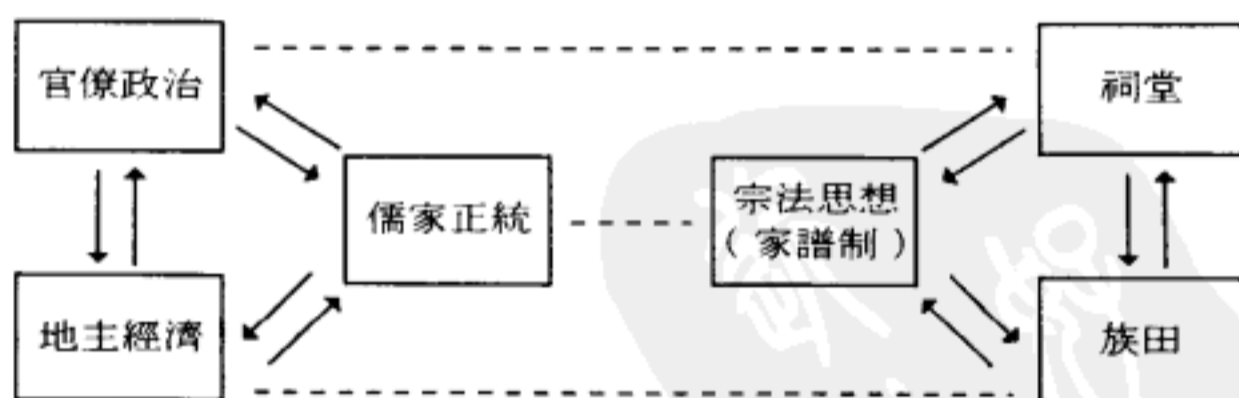


圖1.4 家族組織與社會結構的同構

②④ 張晉藩：〈清律初探〉《法學研究》第1期（北京：1979）。

②⑤ 張研：〈清代族田經營初探〉《中國經濟史研究》第3期（北京：1987）。

②⑥ 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第2章。

註七 意識形態認同(ideological identity)這一術語曾經為社會學家艾森斯塔特(Eisenstadt)所用，他認為在中國政治秩序與文化之間，存在着ideological identity。進而他又認為意識形態和政治秩序之緊張是現代化之動力，而中國則沒有這種動力。顯然，這種理論觀點和本書提出的論點存在着某種類似，但是，我們所說的意識形態認同和艾森斯塔特的ideological identity不同。我們用它來刻劃人們通過溝通達到信仰某種統一意識形態之過程。而艾森斯塔特的ideological identity似乎像是我們把意識形態認同和一體化結構兩個概念合二而一，指出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秩序和意識形態的同一性，社會組織是意識形態之典範化和制度化。因此，我們認為，正確的方法是把艾森斯塔特用一個概念定義的對象分成兩個定義：意識形態認同和意識形態結構與政治結構一體化。這無疑使整個分析大大細化了。因此，如果僅僅運用艾森斯塔特的概念，只能籠統地理解中國政治文化結構，而不能從中引申出整個中國社會近現代變遷模式。

註八 「意識形態」、「認同」是社會文化研究常用的概念，我們提出的意識形態認同和通常使用這兩個詞語所包含的直接含義稍有不同。社會科學家對意識形態的定義眾說紛紜，但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工作定義(working definition)可以簡單概括如下：「政治意識形態為一信仰體系，此一信仰體系為一個社會所選擇的政治制度(現存的或擬議的)加以說明並辯護其合理性，同時為此制度的完成提供策略(過程、制度、以及計劃等)②。」Martin Seliger從功能角度定

② 華家徹(Herber Waltzer)：〈政治意識形態：政治中的信仰與行動〉《憲政思潮》第31期 頁135 (台北：1975)。

義意識形態時，也有過類似說法^②。我們所說的意識形態除了保持上述限定外，還對觀念信仰體系內部加以進一步定義，意識形態不是一般的信仰與觀念體系，它由倫理道德之價值觀、合理社會模式之社會觀，以及對自然萬物解釋之哲學觀組成。意識形態是包含這三個子系統的整體性思想體系。根據這一定義，儒家學說是意識形態，馬列主義是意識形態，基督教、伊斯蘭教也是某種意識形態。而那些雖作為政治統治合法性來源但非整體性觀念系統就不一定是意識形態。認同(identity)的原意通常指持續存在於個人實體的人格，即一個人對自己的性格、目標或存在根源之確認。而我們所說的意識形態認同是一種人際行為協調的機制，即社會成員接受某種對自然或社會整體性合理的整體描述，自覺地依據其原則行事。

表面上看，中國封建社會上、中、下三個組織層面的合法性所依據的觀念是不同的。上層組織——以王權為核心的大一統官僚機構的支援意識，主要來自於萬古不變的天道與大一統國家學說。皇帝制度、君臣之間的服從等級制之所以合理，正因為它們是天道的反映。正如《荀子·王制》裏所說：「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鄉紳地主的地方領袖地位之所以被百姓承認，則基於他們是知書達禮的君子，「君子治人，小人治於人」。保證君子統治合法性的是一種文化及道德精英主義。下層宗法家族中家長權威的基礎則是家庭倫理關係。向這三層次組織提供合法性的觀念，好像分別屬於不同範疇。天道是一種哲學觀，大一統國家學說和由道德精英(君子)充當地方領袖是一種社會觀，家庭倫理則屬於價值觀的一部分。如果這些觀念之間互相獨立，甚至發生衝突，那就意味着三層次組織權威的衝突，這時實現社會三個層次的互相

^② Martin Seliger: *Ideology and Politics*, pp. 119-120 (London: Allen and Unwin Ltd, 1976).

整合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儒家意識形態中，價值觀的核心是「仁」，「仁」既是家庭倫理之基礎，也是推出合理社會觀的前提。例如孔子把對家長的「孝」看作「為仁之本」^②，由此推出臣對君的「忠」，同時又把國君實行「徠遠人」的「仁政」看作仁的表現。在日常感情中，人們的愛是有差等的，「仁」應是日常感情之典範化與合理化。於是「仁」必須符合社會等級和倫理規範的「禮」。「禮」是倫理價值的規範化，又是「天道」的體現。這裏我們看到，儒家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倫理)、社會觀和哲學觀三個子系統互相聯繫，組成一個整體結構。社會組織三個層次的組織者都認同以仁為核心之儒家學說，雖然每一層次的支援意識不盡相同，但它們屬於同一個整體性意識形態，使得各層次組織者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上下配合。七十年代後，不少學者都開始注意到，如果去分析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合法性來源，可以發現它往往建立在多種屬於不同範疇之觀念上。如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指出，清代的「法不可變性」有着如下五個規範來源：(1)法必須建立在自然之上，是自然不變法之反映。(2)儒家「道」的道德觀不變性。(3)大一統的不變性。(4)本末思想的不變性。(5)祖先崇拜的不變性^③。這裏，我們看到這五個來源中(1)和(5)是一種自然觀和哲學觀，(3)和(4)是一種社會觀，(2)屬於價值倫理。也就是說，法的合理性基礎來自不同範疇，而且它們是互相協調的，這正是一體化結構中意識形態成為政治制度合法性基礎的證明，因為只有意識形態才能提供這樣一個互相聯繫的整體性觀念系統。

^② 《論語·學而》。

^③ Thomas A. Metzger: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 Legal Normative and Communication Aspec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意識形態認同只是一種觀念的力量，而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的一體化則刻劃了這種觀念的整合力量如何轉化為現實的組織力量。實現一體化有兩個關鍵：一個是社會三個組織層次中均以認同同一意識形態的成員作為組織者；第二，三個層次之組織原則均為意識形態內容之制度化。這兩個特點在中國封建社會組織方式中都極為明顯。儒生廣泛分佈於社會組織三個層次，是他們能轉化為三個層次不同角色之前提。在上層，儒生通過科舉制被任命為國家官員，他們忠君愛國，維護國家統一。在中層，他們是縉紳地主，充當地方領袖，主動與政府合作。在基層，他們是族長家長，用儒家倫理管理宗族事務，實行教化。由於認同統一意識形態之階層轉化為三個層次的組織者，意識形態認同就成為現實的組織力量。它如強性黏合劑，使政府官僚、縉紳地方自治與宗法家族聯成一體。雖然不同層次的組織者的社會角色不同，但他們均來自儒生階層。而以儒家學說為內容和選拔標準的科舉制，則是建立大一統官僚機構和培育儒生階層的關鍵性制度。儒生之所以可以順利進入不同角色，並實現不同角色的和諧，基本的前提是這些角色均為意識形態內容所規定，意識形態認同保證了儒生的角色轉化。於是，三個層次的組織結構實際上必定為意識形態所制度化或規範化。大一統官僚機構可以說是儒家意識形態有關宇宙秩序(哲學觀和理想社會秩序社會觀)在現實中的體現，它是意識形態的典範化與制度化。一體化結構中層組織「鄉紳自治」的基礎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農村中廣大農民服從鄉紳統治，因為鄉紳有文化，是道德精英分子。因此，一體化中層組織是儒家意識形態中有關君子小人等精英主義內容之社會投射，它也是意識形態內容的制度化。一體化下層組織為宗法家族，其合法性根據為儒家倫理，而理想的家族關係恰恰也是儒學中「禮」的內容，因此宗法家族組織也是意識形態倫理內容的制度化與典範化。這樣，一體化結構中三個社會組織層次分別是意

識形態不同內容之社會投射。它們和意識形態不同子系統之間的對應關係，對於研究在近現代社會變遷中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出現的範圍和順序極為重要。

註九 在世界文明史上，不乏某一種宗教或佔主導地位的文化系統成為大一統國家權威來源和組織基礎的例子，但社會組織上、中、下三個層次的權威基礎均來自同一種觀念系統則很少見。例如奧托曼帝國，伊斯蘭教是其國家組織的權威來源。「軍人」(askeriye)、宗教系統人員(ilmiye)和公務員(mülkiye)可以通過伊斯蘭教義之認同成為一個大帝國的組織力量，並把帝國疆界不斷擴張。但伊斯蘭教充其量只是國家上層組織的文化基礎。大帝國的中下層組織均保持着這些地方被征服前原有的組織形態，其文化、信仰是多元的。羅馬帝國也是這樣，尚武精神與古代神人同形宗教只是羅馬人精神凝聚力的來源，而各行省的中下層社會則呈多元狀態。於是這種統一帝國在組織上遠不如一體化結構嚴密。每當遇到強大外來衝擊，或政府官員腐敗時，大一統帝國解體，社會瓦解為不同文化用不同方式組織起來的不同部分，統一社會結構的修復是不可能的。這正是奧托曼帝國和羅馬帝國最後的結局。而在一體化結構中，社會上、中、下三個層次均基於意識形態認同，當上層組織解體時，中下層組織沒有解體。這時意識形態認同可以促使上層組織之重建。

而某一種文化觀念系統能否成為上、中、下三個層次組織基礎，取決於很多因素，一個重要因素是它統治農業帝國時間是否足夠長，另外還要看它有無滲透基層之能力。儒家意識形態以倫理為本位，把家庭看作與國家同構，這正是它能同時為農業社會上、中、下三個層次提供權威和組織基礎的原因。因此，在農業社會中，只有儒家意識形態實現了和政治結構的一體化，這絕不是偶然的。

註十 紳士來自土地的收入佔總收入的比例，是一個學術界尚有爭議的問題。張仲禮先生的專著《士紳的收入》對十九世紀士紳的各類收作來源作了大致的數量估計(表1.4)。

收入來源	受益士紳數	歲收入總數(千兩)	所佔比例
1.官職	23,000	121,000	18.75%
2.幕僚	16,200	9,050	1.4%
3.地方紳董	675,000	81,000	12.55%
4.包攬詞訟等	300,000	30,000	4.65%
5.教師	604,500	61,575	9.54%
6.醫、書畫、書院、膏火等		9,000	1.39%
7.土地佔有		220,000	34.1%
8.商務活動	10,000	113,600	17.6%
總計		645,225	100%

取自Chung-Li Chang: *The Income of Chinese Gentry*, p. 197 (Seattle: Washington UP, 1962)。

表1.4 紳士各類收入來源歲收入總額估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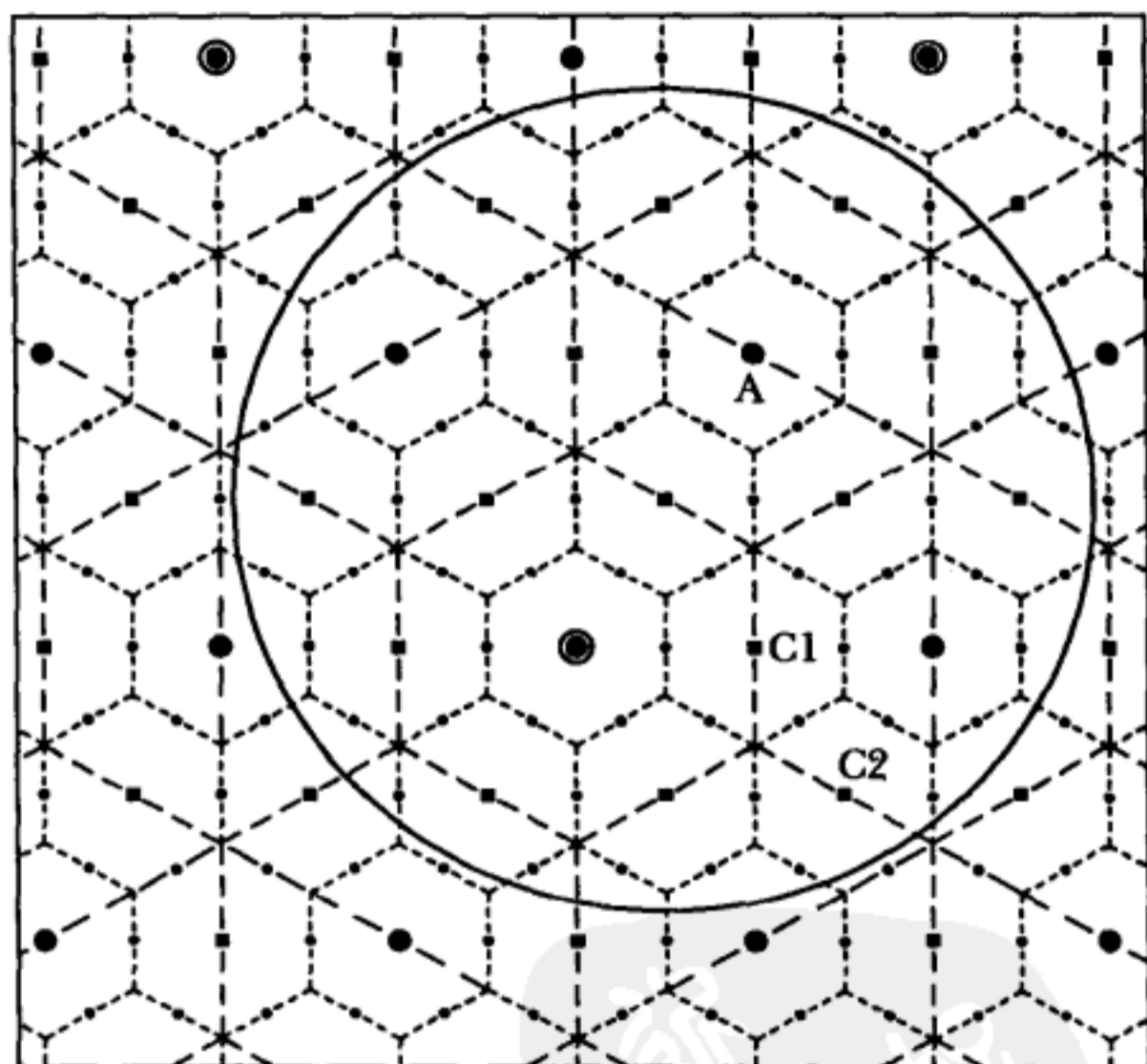
賀羅夫認為，張仲禮的估計偏低。因為張仲禮的估計是假定全國25%左右的土地為士紳地主所擁有，而他依據的土地數字是清朝官方記載的九億畝。學術界普遍認為，清代官方統計的土地數字偏低，不足信。王業鍵先生估計，十九世紀中葉全國耕地面積應為十二億畝。因此，按張仲禮的計算方法，士紳地主佔有的土地約為三億畝，從地租所得的年收入總約為三億兩左右，佔士紳全部總收入約41%^①。我們認為，士紳大多是地主，因此來自土地收益取決於土地兼併程度。它在每個王朝的中期和後期是不同的。

① 賀羅夫：《晚清士紳與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兼與日本幕末、明治士族比較》 頁84-85 中山大學博士生畢業論文（廣州：1992）。

註十一 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對中國傳統社會城鎮地理分佈與行政級之間關係進行過詳盡的研究，這項研究為地主經濟中城市和鄉村結構如何與一體化組織三個層次互相協調提供了詳細的圖畫。由於地主經濟是一種商品經濟相當發達的農業經濟，因此在這一經濟體系中，城鎮必須承擔某一地域商品交換中心和商品集散地之功能。施堅雅根據這一功能提出一個不同等級城鎮如何在農業社會中分佈之模式。他認為，由於農產品流通的需要，平均十八個自然村圍繞一個墟市(小市集)，六個墟市圍繞着一個大市集，六個大市集圍繞着一個市鎮(他稱為普通市鎮)，在普通市鎮之上的是中型市鎮和中心市鎮，再上面的集中地是地方城市、較大城市、區域城市和區域都會，處於頂端的稱為中心都會，它們一級級構成一個六角形等級分佈模式(圖1.5a, b, c, d)。他發現十九世紀中國農業經濟中城鎮網確實可以用這種模式概括。1893年中國有普通市鎮27,000-28,000個，中型市鎮8,000個，中心市鎮2,300個，地方城市669個，較大城市200個，區域城市63個，區域都會20個，中心都會6個^②。它們構成一個巨大商業流通網中大小不同之紐結。

中國官僚政治行政控制網正好是這一巨大經濟網紐結的子集合，即在1890年中國十八個省份中，總數為39,000個經濟中心地，其中有1,546個作為帝國地域行政首府。表1.5更清楚地表明中國政治行政中心之等級和這些城鎮在地主經濟中經濟交流的等級位置是高度一致的。這裏我們看到，中國傳統郡縣城市既是官僚政治控制的中樞，同時也是農業經濟商品交流之中心。它擔負着行政控制和地主經濟中商品流通的雙重職能，在很多時候，行政控制要通過商品流通網。因此，我們可以說，一體化上層組織基本上都處於郡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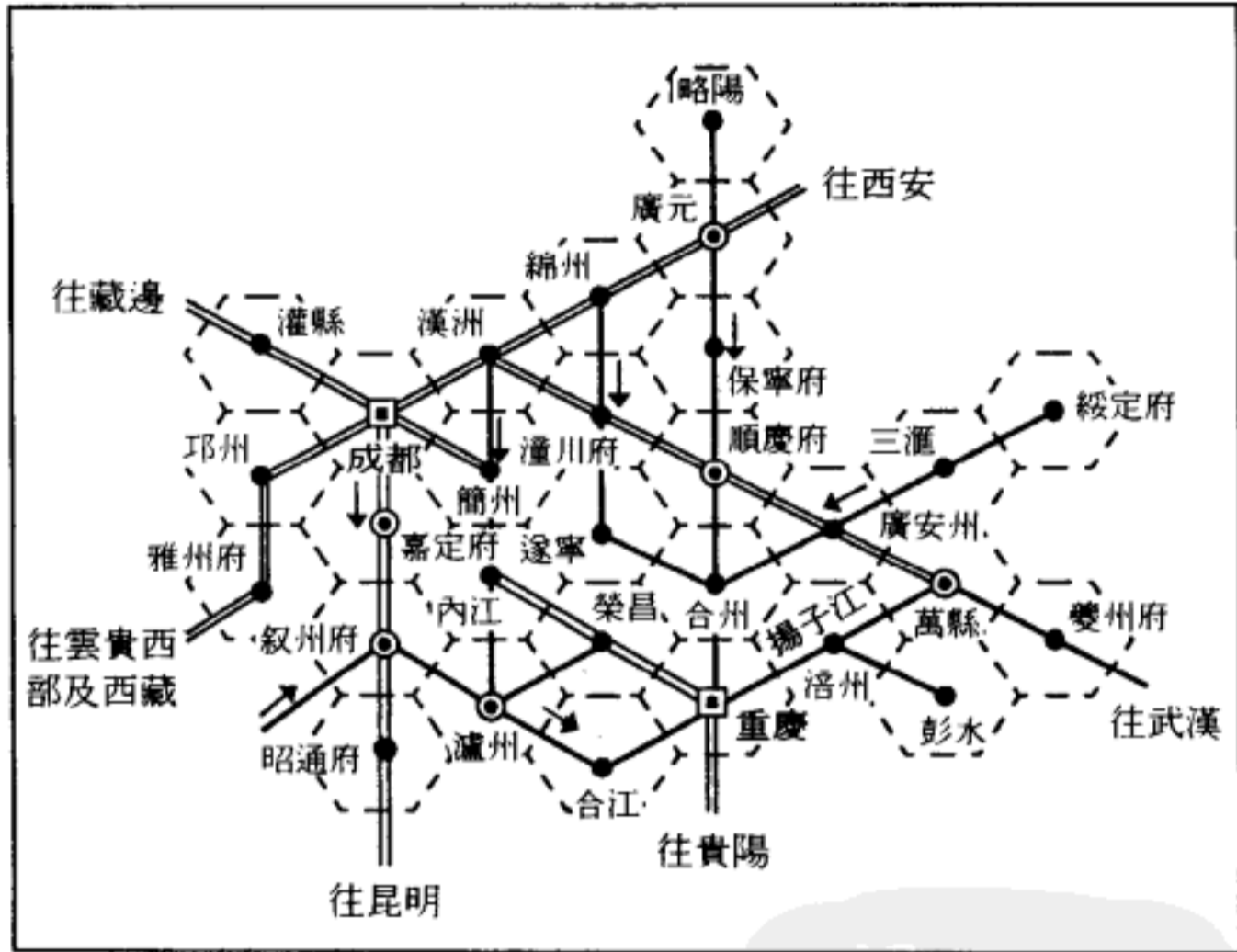
^② 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中國城市與地方系統的等級〉 余葦青等譯《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第1輯(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取自施堅雅：〈中國城市與地方系統的等級〉，《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第1輯，頁100（青海：人民，1986）。

D級腹地的界限沒有顯示 ● A級中心 ● B級中心 ■ C級中心
• D級中心

圖1.5a 中國城鎮市集等級分佈理想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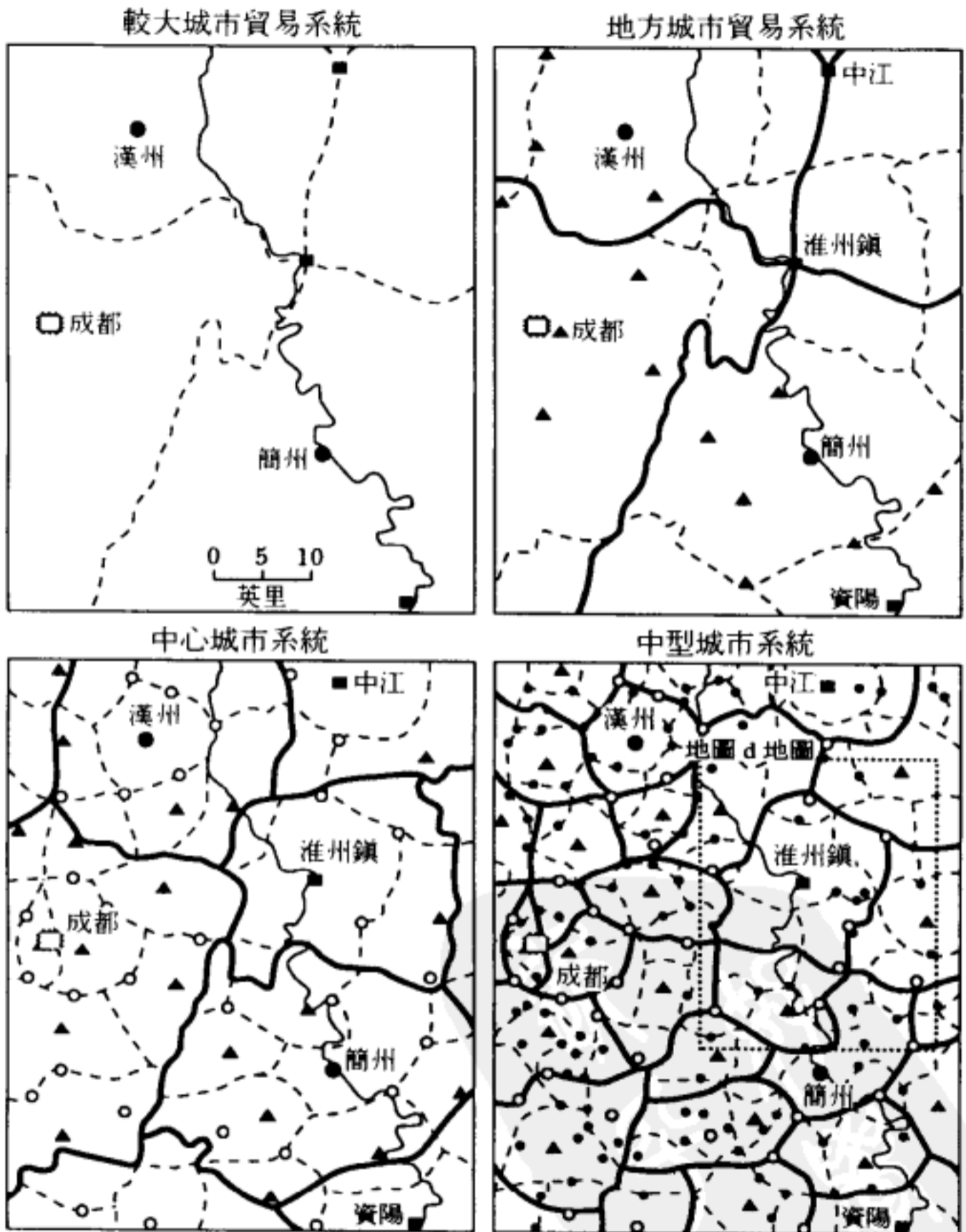


取自前引施堅雅，頁114。

箭頭標示河流流向 □都會 ⊙區域城市 ●較大城市

圖 1.5b 城鎮等級模型舉例之一：1893年長江上游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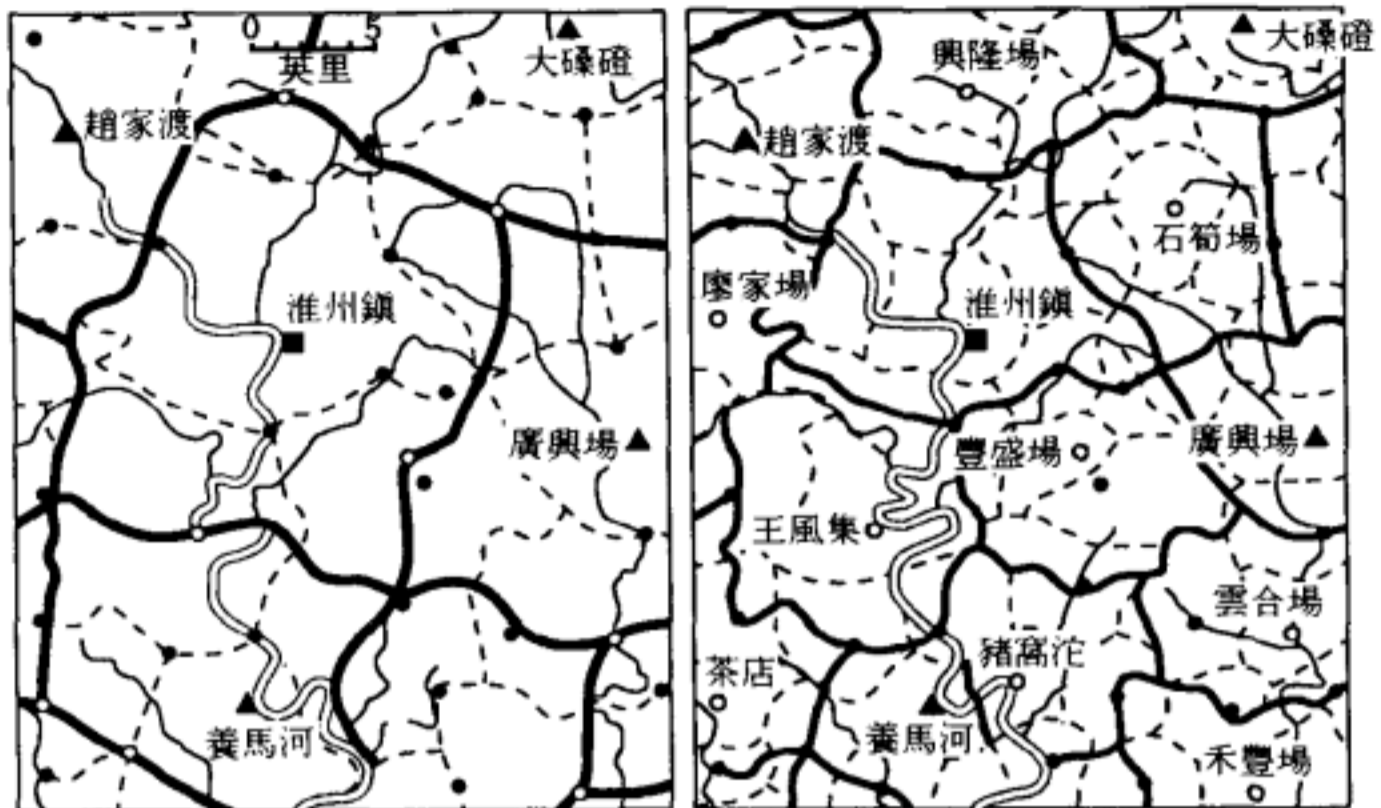


取自前引施堅雅，頁118。

顯示了較大城市和地方城市貿易系統及中心和中型市場系統的近似範圍

●較大城市 ■中心城市 ▲中心市鎮 ○中型市鎮

圖1.5c 城鎮等級模型舉例之二：1893年長江上游區域的一小塊



取自前引施堅雅，頁119。

顯示了中型市場系統和普通市場系統的近似範圍 ■地方城市 ▲中心市鎮
○中型市鎮 ●普通市鎮

圖1.5d 城鎮等級模型舉例之三：1893年長江上游區域更小的一小塊

經濟等級	行政等級						總數
	帝國	省	道	府直隸州	低級	無行政級	
中心都會	1	3	2				6
區域都會		15	1	3	1		20
區域城市		1	26	20	8	8	63
較大城市			19	77	85	19	200
地方城市			12	62	494	101	669
中心市鎮				17	581	1,721	2,319
中型市鎮					106	7,905	8,011
普通市鎮					12	27,700	27,712
總數	1	19	60	179	1,287	37,454	39,000

取自前引施堅雅，頁171。

表1.5 各級中心在行政等級和經濟等級中的分佈(1893年)

城市中。那麼一體化中層組織——鄉紳自治在經濟交流網中處於甚麼等級呢？施堅雅發現，它處於經濟等級下緣，縣級官僚機構和鄉紳自治的交匯點是地方城市或中心市鎮。在中心市鎮以下基本上都是地方紳士政治權力所影響的地方。這樣，我們可以得到圖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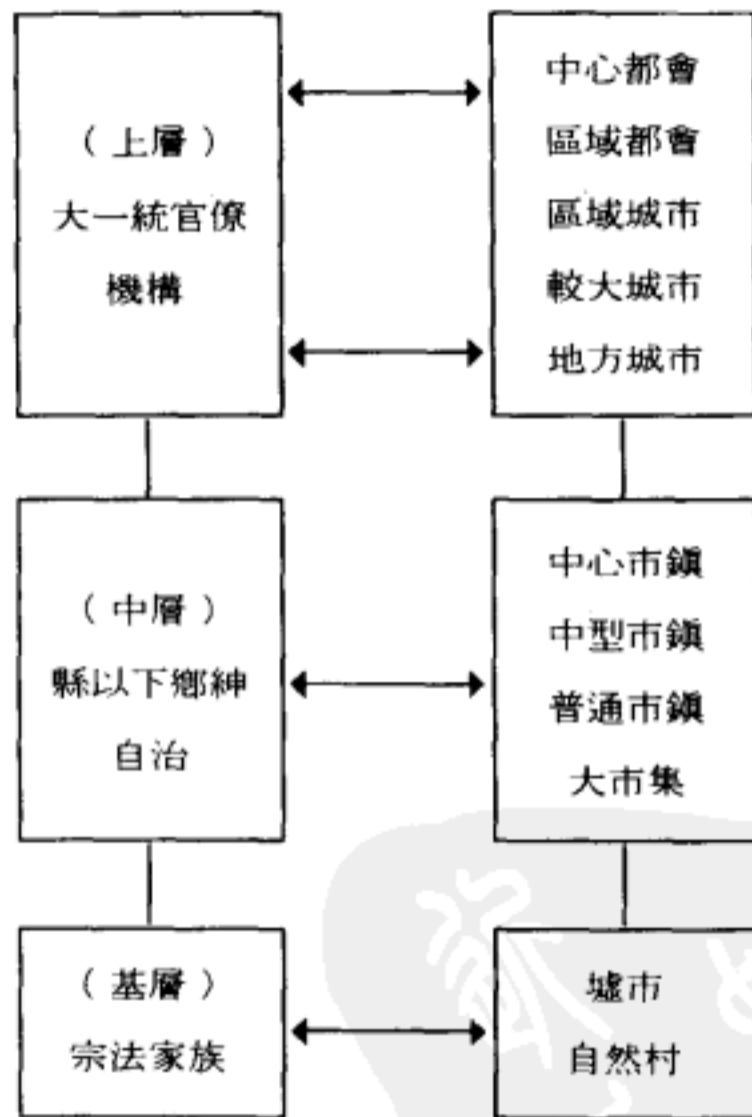


圖1.6 中國傳統社會城鄉等級和一體化結構三層次的對應關係

在這個圖中，可以看到一體化組織三個層次分別對應着城市、市鎮集市和自然村。一體化結構通過鄉紳和宗法組織把官僚控制延伸到每一個自然村，與它相協調，在經濟網中則可看到一個由城市通過

市鎮到集市自然村組織之連續擴散網絡，它極為形象地表明一體化結構與地主經濟之耦合，實現了一個遼闊農業社會之整合。

註十二 關於中國歷代城市人口佔總人口百分比的討論，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趙岡、陳鍾毅對中國歷史上城市人口作了大量考察，從而得出下表(表1.6)。

朝 代	年 代	城市人口(百萬)	總人口(百萬)	城市人口比例
戰 國	300BC	4.3	30	14.3%
漢	2AD	10.845	59.6	18.2%
唐	745	10.99	52.9	20.8%
北 宋	1077	16.623	82.6	20.1%
南 宋	1193	15.9	71	22.4%
金	1207	8.859	45.8	19.3%
清	1820	24.2	353	6.9%
清	1893	29.8	426	7.0%
近代	1949	57.65	541.6	10.6%
近代	1953	77.257	582.6	13.2%

取自趙岡、陳鍾毅：〈中國歷史上的城市人口〉，《食貨》，卷12，第3、4期(台北，1983)。

表1.6 中國歷代城市人口

從表上可見，城市人口百分比最低在10%以下，而最高在20%以上。趙岡等學者的研究主要是想證明中國城市人口所佔百分比在歷史上不同時期是不同的，它和人均耕地面積有關。而我們認為，不僅城市人口在不同朝代有異，而且在每一個朝代中，不同時期(即初期、中期、滅亡之前)城市人口的比例都是不同的。一般說來，存在着一個基本趨勢，一個盛大王朝初期，由於它是在大動亂後建立起來的，動亂對城市人口的殺傷極為嚴重，這時城市人口很少。

到王朝中期，隨着生產發展，土地兼併程度增加，農村向城市提供商品糧增加，城市人口百分比不斷增高。中國傳統社會中城市人口的比例，除了趙岡等所指出的取決於人均耕地面積外，還和三個因素有關，第一是社會安定，第二是商業的發展，第三個因素是農村土地兼併。因為地主的土地比自耕農的土地提供更多的商品糧。因此，在中國出現人口大爆炸之前，一個盛大王朝末年，城市人口可以大大超出20%以上。但這時，土地兼併極為嚴重，農民大起義風暴已在孕育中，所以高城市人口的狀態是不能維持下去的。從戰國到清朝我們可以看到城市人口百分比隨王朝更替存在着周期性變化。戰國時，城市人口雖高達14.3%，但秦漢之交社會大動亂，使全國人口只剩下1,000萬左右，其中損失最多的當然是城市人口。據史書記載，漢初戶口可得數才什二三，連天子都乘不起四匹馬的馬車，將相只能乘坐牛車。到西漢末年，總人口又達6,000萬，城市人口高達18.2%，但大動亂馬上出現，城市人口又受到極大殺傷。東漢王朝建立，又開始了另一個周期^③。

註十三 必須指出的是，超穩定系統之所以不能同時勝任社會整合和應付外來文明衝擊的雙重任務，這是因為，1840年後它所碰到的外來衝擊是西方工業文明帶來的，而非農業和遊牧文明。如果超穩定系統對外開放，外界只有農業和遊牧文明，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一體化組織方式實現了一個超級農業社會之整合，這種組織方式應付來自於其他農牧業社會的挑戰綽綽有餘。一體化整合方式使中國成為農業社會中不可征服的龐大帝國。從秦漢到清朝兩千多年中，中國曾數次受到北方少數民族的衝擊。西漢初年，匈奴勢力十分強大，控弦之士號稱三十萬，對漢王朝構成巨大威脅。東漢又面對強

^③ 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第6章。

大鮮卑部落軍事聯盟。東突厥曾以數十萬騎圍攻隋煬帝於雁門。唐高祖時，突厥興兵四萬大舉進兵中原，直達渭水橋北。一般說來，當某一個王朝處於鼎盛期，它基本上都有能力抵抗其他農牧業文明之武裝入侵，甚至把中國的疆域和影響不斷向外擴張。即使到了一個王朝的後期，社會一體化組織力被無組織力量吞沒，中國被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所征服，但是征服者只有學習中國傳統社會獨特的組織方式，才能實現這一超級農業社會的整合。於是他們不得不學習儒家文化，採用一體化結構。這方面一個典型例子是元朝。十三世紀初蒙古旋風曾猛烈衝擊歐亞農業文明，唯獨在中國，蒙古人不得不學習中國傳統的統治方式，元朝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一體化結構。正如有些學者所論述的那樣，自蒙古人入主中原統一中國後不久，元朝就不再是蒙古的歷史而成為中國王朝興衰之組成部分。John W. Dardess對此有過專門論述。他認為，自1328年起，元朝皇帝不再是蒙古帝國的大汗，元朝的歷史變成了中國傳統式的歷史。當時無論是社會組織各方面的運作，還是社會問題，均如同中國傳統社會，具有中國的特殊性。特別是元朝的儒化運動，它是超越種族的，從此儒學也成為元朝最高的政治理念^③。我們在《興盛與危機》一書中，對元朝和清朝曾做過一個比較，就建立一體化結構而論，元朝遠不如清朝，這是元朝遠比清朝不穩定的原因。但蒙古入主中原後不得不採用中國一體化組織方式，以及清朝自覺學習一體化組織方式都證明，在傳統農業經濟中，也許只有這種組織方式才能實現一個人口眾多、地區遼闊的社會整合。只有在魏晉南北朝時，漢民族人口在大動亂中大量傷亡，少數民族遷入中原，並在

^③ John W. Dardess: "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Aspec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Late Yuan China", *Studies in Oriental Culture*, No. 9 (Columbia University, August 1971).

人數上超過漢人，佔北方人口的54%以上，一體化結構受到干擾，中國社會才出現了長期分裂割據的局面。但幾百年後，隨着少數民族被同化，社會組織方式仍再次回到一體化這種組織方式中來。

然而，這種曾卓越地克服了農業社會組織困難的組織方式，一旦碰到工業文明挑戰時，就如歌利亞(Goliath)碰到大衛(David)，以往所有的歷史經驗似乎都失了靈。湯因比曾用歌利亞和大衛之間的戰鬥，來比喻古老文明在遇到新興文明挑戰時的行為模式。歌利亞曾是一名百戰百勝的勇士，他全身包裹了沉重的鐵甲，手裏的長槍像一根鐵柱子。他以為碰到的敵人都是和他一樣的鐵甲武士，所以當手裏拿着投石器的大衛走到他身邊時，他一點也沒有放在心上。他從沒想到，以往的全部作戰經驗以及手中的長槍是無法抵擋這位年輕人的攻擊的。

首先，它已不能像對待農牧文明衝擊那樣，抵抗工業文明以大砲和廉價商品為武器的入侵。歌利亞被大衛用投石器打倒在地。但是中國畢竟是世界上唯一實現了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農業社會整合之國家。西方列強雖然屢屢打敗中國，卻不能把中國瓜分，變為以通商口岸城市為中心的殖民地。西方列強對東方的殖民地政策，在亞洲許多地區取得了成功，但在中國卻遭到了挫敗。因此，歌利亞並沒有被大衛殺死，他只是在地上痛苦地掙扎而已。聖經故事並沒有想像過，當歌利亞不可能被大衛殺死時，他會有甚麼表現？其實在邏輯上，可能的結局只有一種，這就是歌利亞去學習大衛的武器。當某一種社會組織方式不是被外來征服者打垮，而只是被挫敗時，它就會動員自身力量向外來文明學習，這是超穩定系統對外開放，遇到工業文明衝擊時出現新的行為模式之內在根據。

第二章 對外開放和洋務運動

歷史學家應該指出每一種勝利的事業都有某種惡的因素，每一種失敗的事業也總有某種善的內核，從而使該時代的偏激得到平息。

——摘自《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演說集》

2.1 對西方衝擊反應的遲鈍

1843年3月間，中國因鴉片戰爭戰敗而賠償英國的第一批銀子運到了倫敦造幣廠大門。一位歷史學家在記述這一事件時說，在場的人為此「發出極熱烈的歡呼」，但他也承認這場以「貨幣為戰利品的對華戰爭，似乎不是這個國家(指英國)應該引以為體面的事」^①。僅這第一批賠款銀子就達426萬兩，佔當時清政府財政總收入的11%^②。中國近代史就這樣開始了——1839年11月中英鴉片戰爭爆發，西方列強用武裝販毒和砲艦打開了中華帝國的大門，從此，中國再也不能抵禦工業文明的入侵，不能自外於世界現代化潮流。

每當人們回顧中國挨打受氣、充滿屈辱的近代史，最令人感慨的就是中國對西方衝擊的麻木不仁。早在1637年，英國就到廣州開展貿易，這與英國在美洲建立新殖民地新英格蘭只相差幾年時間，

①② 彭澤益：〈論鴉片戰爭賠款〉 寧靖編《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續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但中國對西方衝擊作出回應，卻在兩百多年以後。無論是士大夫意識到中國處於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還是從加強海防開始的洋務運動，都是十九世紀後半葉時的事情。兩百年對於中國歷史來說並不長，但就在這一段時間，世界長足進步，英國當年在美洲的殖民地已發展成泱泱大國，新興的美國也開始了對清政府的侵略。中國對外來衝擊的反應如此遲鈍，恰恰也是超穩定系統的特徵。

十七世紀中葉，中國對西方衝擊的遲鈍，這是因為當時清王朝剛剛建立，很快就達到極盛狀態。經濟的繁榮使乾隆對英國特使說出「天朝無所不有」的豪言壯語。清王朝的強大可以做到閉關自守，士大夫也沒有感到新興工業文明的壓力。兩百年後，英國為了打開對中國通商的大門，發動了鴉片戰爭。此時清王朝早已過了鼎盛期，吏治腐敗，社會內部危機重重，外部挑戰一時又被內部危機所掩蓋。湯因比在談到西方工業文明與中國在十七世紀與十九世紀兩次相遇時曾指出，在第一個回合中，西方主要是以奇異宗教出現，船隻和武器與中國相比，並無決定性優勢，結果鎩羽而去。到十九世紀第二次捲土重來時，西方已經過工業革命，中國要抗拒西方入侵，唯有以開放的心靈學習西方科學技術^③。湯因比的觀察無疑是正確的。但他並不了解，當超穩定系統面臨吏治腐敗和日益嚴重內部危機時，它是否能迅速意識到外來挑戰本身就成為一個問題。

以力主禁煙而聞名的湖廣總督林則徐，在尚未被撤職時曾上疏道光皇帝，提議將關稅銀的十分之一用於仿造西洋船砲。他認為「製砲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制夷已可裕如」。道光對這一建議的批示是：「一片胡言」。居於紫禁城深宮高牆之中的道光皇帝對英國位於何方都不知道，後聽說在中國之西，竟問它是否有陸路通

③ 韋政通：《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上) 頁5-6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新疆^④。作為國家棟樑的士大夫也普遍昏聩。即使鴉片戰爭失敗了，朝野的普遍看法也是認為朝廷用人不當，不信任主戰的林則徐，而不是由於中國落後。頭腦清醒的魏源在《海國圖誌》中，痛陳當時瀰漫朝野的兩大弊害：一是「寐」，二是「虛」。他認為只有儒生普遍覺醒，力倡務實作風，才能「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但是，當官僚機構出現系統性腐敗之時，這是不可能的。

即使朝廷重視外來挑戰，企圖作出積極反應，但由於土地兼併、吏治腐敗造成的深重危機，整個社會已處於大動亂的邊緣，政府也沒有可能把足夠的注意力放到對付外來文明的挑戰上[註一]。第二次鴉片戰爭是十分典型的案例。清王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已經吃了大虧，但並沒有記取應有的教訓。從第二次鴉片戰爭兵力分佈來看，清軍在總兵力上佔絕對優勢，卻沒有很好調配。廣州城陷落兩年間，未曾得到一兵相助。當時清政府被內部危機搞得焦頭爛額，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大動亂正在開始，清軍最重要的兵力必須放在鎮壓和預防農民起義上，並沒有把英法聯軍當作最重要的敵人^⑤。要引起超穩定系統對外來挑戰的重視，需要兩個條件，一是西方文明發展到它難以抵擋而不得不重視的地步，另一個條件是社會大動亂有效地清除吏治腐敗和土地兼併等無組織力量。對於超穩定系統而言，只有外來衝擊造成普遍的社會危機才能使社會對外來文明的重視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清初一體化的強大，剛剛興起的工業文明衝擊不足以引起社會危機。鴉片戰爭時西方入侵已勢不

④ 1840年，清廷諭浙東欽差大臣奕經，要他向所俘英國軍人打聽英國「距離內地水程」，「英吉利至回疆有無旱路可通」。這表明，當時清廷根本不知道英國的地理位置。轉引自：章政通：《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上）頁19。

⑤ 茅海建：〈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軍與英法軍兵力考〉《近代史研究》第1期（北京：1985）。

可擋，但是嚴重的內部社會危機又吸引了統治者的注意力。只有在社會大動亂消除無組織力量以後，外來威脅信號才能真正被社會組織者普遍地重視。

歷史的發展正是如此，自1839年以後中國被西方文明用砲艦和商品打開大門從而不得不對外開放，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學習西方軍事科技的洋務運動，中間正橫隔着一次社會大動亂，這就是以太平天國為首的農民大起義。

2.2 太平天國大動亂的歷史功能

我們把以太平天國為首的農民大起義稱為介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大動亂。說它是傳統的，是因為無論從農民起義的原因還是它所導致的後果來看，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均和歷史上農民大起義沒有本質的不同，是超穩定系統第二重調節機制的體現。但是，這次大動亂發生在中國對外開放十年以後，超穩定系統相對孤立的條件已經開始打破，農民大起義也具有對外開放條件下的新特點。洪秀全創拜上帝會，自稱是天父耶和華之子，基督之弟，用「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組織和動員民眾，其意識形態顯然具有濃厚的西化色彩，是中國式的基督教。外國輪船對中國內河航運逐漸控制，造成南方大量從事運輸業的苦力失業，則為農民起義提供了可觀的後備軍。雖然這次農民起義能燃起燎原之勢的基本原因還是土地兼併和官僚腐敗[註二]，但在意識形態和起義軍隊伍組織上已明顯受到外來衝擊的影響。同樣的情況也表現在大動亂的社會調節功能之中。傳統農民起義的後果僅在於有效清除無組織力量，而在對外開放條件下，消除無組織力量除了使傳統一體化結構得到復甦外，還意味着社會內部危機之緩解，外部挑戰不再被內部危機掩蓋，一體

化結構有可能對西方衝擊作出史無前例的回應。

首先，這場農民戰爭以極為殘酷的方式緩解了十九世紀中後期的人口—土地危機。一項新近的研究表明，在1851—1865這十四年間，全國人口由43,000萬驟降為31,800萬，淨減11,200萬，下降了26.05%，平均每年下降21.8‰^⑥。短時期內這麼巨額的人口消耗，有效地遏制了自十八世紀二十年代以來的人口爆炸趨勢，從十九世紀後半期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間，人口總數還沒有恢復到1850年的水平。特別是在太平軍活動中心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省，這些全國最富庶、人口最密集的地區，遭受的破壞也最大。據何炳棣統計，一百年後(即1953年)這些地區人口總數尚比1850年少近2,000萬(見表2.1)，只有江蘇，由於上海作為全國最大都市的興起，其人口數才略高於1850年的水平^⑦。大動亂嚴重打擊了大地主的利益，土地危機也相應得到緩解，到本世紀二十年代，仍有50%的農民自有土地^⑧。據黃宗智(Huang, Philip C.C.)研究，華北農村的商品化和社會分化程度，直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仍然比較低，土地分

年 代 省 份	1850	1953	變化百分比(增減)
江 蘇	44,155,000	47,456,609	7.5
浙 江	30,027,000	22,865,747	-23.8
安 徽	37,611,000	30,343,637	-19.3
江 西	24,515,000	16,772,865	-31.4
合 計	136,308,000	117,138,441	-14.0

取自何炳棣：《1368-1953 中國人口研究》，頁244（上海：古籍，1989）。

表2.1 江蘇、浙江、安徽、江西1850年與1953年人口數

⑥ 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 頁253（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⑦⑧ 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 頁244、2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配形式與十八世紀相似。村落多是以自耕農為主的社群^⑨。地主、自耕農保持一定比例，是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礎。太平天國以後清王朝又延續了半個多世紀，這幾十年中農村土地兼併並不很嚴重。半個世紀農村相對平靜正是以太平天國為首的農民大起義清除經濟結構中無組織力量的結果[註三]。

如果我們回顧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後半個世紀中主要的歷史事件，無論是洋務運動、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庚子事變，還是辛亥革命，重大事件大多出現在社會中上層，它們差不多均和外來衝擊引起的社會危機有關。這表明，太平天國為首的農民大起義之後，外來挑戰導致的社會問題才凸現出來，成為社會變遷之主線。

無組織力量既是大一統帝國內部危機的指標，也是社會組織者腐朽程度和官方意識形態脫離實際之度量。大動亂之前，整個社會籠罩着被龔自珍稱為「朝廷無良臣，世無良將，市無才商，江湖無才偷、才盜」萬馬齊瘠的氣氛，愈來愈趨於繁瑣、脫離實際的考據學派成為儒學的主流，講究務實的經世致用學派不受官方重視。在這種條件下，社會組織者和官方意識形態不可能對外來衝擊作出積極反應。

據劉創楚、楊慶堃的研究，清廷在1796—1911年間共處罰了三萬餘官吏，在受處罰的官員中，京官只佔二成，地方官(省、府、縣)佔八成，晚清政治的「京官無能，地方官貪枉」現象相當普遍^⑩。雖然，太平天國沒有能推翻清王朝，但其以席捲大半個中國之勢摧垮了腐朽的地方政權。動亂以後，清朝的政治腐敗情況也明顯扭轉

^⑨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頁233-234 (北京：中華書局，1986)。

^⑩ 劉創楚、楊慶堃：《中國社會——從不變到鉅變》 頁148-149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



取自《興盛與危機》，頁124。

圖 2.1 十九世紀中國政治腐敗情況變化曲線

(圖2.1)^①。為了鎮壓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清廷不得不起用一批有為的漢族儒臣，並授命他們指揮地方縉紳武裝。隨着軍事指揮權的下放，與戰事密切配合的人事權和財權也不得不下放給地方軍事將領，由他們自招兵勇、自籌軍餉。曾國藩辦團練、組建湘軍，使大批有為務實的儒生進入地方官僚機構或充當幕僚。曾國藩集團先後掌握了浙江、廣西、安徽、江蘇、江西、廣東、陝西、湖北、湖南、雲南等省巡撫之位，「是後四十年間，兩江總督幾乎是非湘系將領或與湘軍有關的人物莫屬」^②。李鴻章的淮軍雖為後起，「而日後對中國的影響遠在湘軍之上」^③。清朝地方基層政府機構在相當大程度上實現了重組。

^① 《興盛與危機》 頁121-124。此圖是根據梁作榮〈晚清之政治腐敗與社會騷亂：一個量化分析〉(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9卷，上冊，1978)論文提供的曲線，簡化後繪出。

^{②③}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冊 頁178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

年 代	滿漢總督比	滿漢巡撫比
1840	1:0.75	1:2.3
1866	1:6.5	1:12

取自楊天宏：〈咸同時期清朝權力結構的變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第4期（1986）。

表2.2 滿漢官員比例變化(1840-1866)

表2.2表明滿族貴族官員和漢族官員的比例在大動亂前後發生了結構性變化，總督和巡撫中漢族官員佔了壓倒多數^⑭。隨着大批有為的儒生進入官僚機構，意識形態也注入了新的血液。新興的儒臣大多注重實際，信奉儒家經世致用學說，幕僚的思想也更為解放，據估計，十八世紀晚期這類由官員私人僱傭的幕僚已達7,500人，十九世紀時人數當更多^⑮。他們是官僚體制外的知識分子，有的甚至沒有功名，他們卻比儒臣更注重實際或有一技之長，在鹽務、漕運、邊疆防務、河道治理和地方吏治方面都有所研究並提出過改革方案。因此，大動亂後，無論是意識形態上務實作風的興起，還是一體化組織成分所呈現的吐故納新，都有助於對外來挑戰作出積極回應[註四]。

1860年5月，太平軍將領李秀成、陳玉成全殲清軍江南大營，並乘戰勝之餘威，於三個月後進攻上海。但這支曾使清軍聞風喪膽的農民起義大軍，終於敵不過槍砲裝備的只有千餘人的英法軍隊。在中國南北戰場上，武器優勢發揮了關鍵性作用。那些受命於危難之際的儒臣，在殘酷的軍事較量中，也由此深切體會到洋槍火砲的

⑭ 楊天宏：〈咸同時期清朝權力結構的變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第4期（成都：1986）。

⑮ 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 頁157-15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威力。當時長江內河中，西方輪船已馳騁往來。史學家常愛提到湘軍將領胡林翼在看到外國輪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後，深受刺激，不禁色變吐血之事^⑯。胡林翼說：「太平軍不足平，不成問題，倒是江面上的輪船，來日大難，不是我們所及料的了。」^⑰胡林翼的警覺心態可算是這批有遠見儒臣的代表。他們已意識到在對外開放條件下，一體化結構的復甦必須同時包含一些新內容，這就是推行國防現代化，以應付西方的衝擊。

2.3 「官辦現代化」的開始及其局限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大動亂初步平息後，社會結構全面復甦，史稱「同治中興」，清王朝也開始了學習西方軍事科技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是超穩定系統在保持傳統一體化結構不變條件下實現（國防）現代化之嘗試。現代化和鞏固傳統一體化結構本質上完全不同，兩者之所以奇妙地結合在一起，這是因為洋務運動本是同治中興的有機組成部分。芮瑪麗(Wright, Mary C)在其研究同治中興的名著中指出，猶如歷代大動亂平息後社會復甦一樣，當時政府的事業主要是政治上整肅吏治、削減皇室和官僚機構開支，經濟上獎勵開荒，意識形態上強化對理學認同，旌表忠臣孝子節婦等等^⑱。同治中興不外是中國超穩定系統大動亂結束後典型的行為方式，即恢復（加強）一體化結構。但是，同治中興是在超穩定系統對外開放條

^⑯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冊 頁184。

^⑰ 曹聚仁：《中國近百年史話》 頁5（創墾出版社，1953）。

^⑱ 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件下展開的。新鞏固之一體化結構必然要擔負起抵抗西方衝擊之任務，不得不包括國防現代化。

這樣，我們也可以理解，國防現代化只有被納入一體化組織之軌道才能進行，洋務機構的設置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1861年清王朝設「總理衙門」主管洋務，當時的「總理衙門」並非今日的國務院，它的全稱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相當於和傳統各部平行的外交部，下設英國股、法國股、俄國股和美國股等。其中海防股統領北洋海防和長江水師，並且兼管機器製造、新式學堂、電線通訊、鐵路礦業等等。今天，人們也許會對由一個外交機構包攬軍事、工礦甚至文教方面的事務感到可笑，但這恰好反映出洋務在同治中興時期的地位：它是被納入一體化結構由政府有組織地推動。在傳統一體化結構中，只可能把與防衛現代化有關的這些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內容，統統歸於對外關係的範疇內[註五]。

回憶圖1.1所示的一體化結構上、中、下三個層次，就能進一步理解洋務運動的展開方式。用一體化結構來推行國防現代化，首當其衝的是由國家官僚機構直接興辦和管理國防軍事工業。在1861-1885的二十五年間，清政府共創辦了三十一家較大型的官辦企業，除了只有一家毛呢廠外，其餘三十家均為製船、造砲、修械等兵工業^{①9}。國防現代化還需大量諸如煉鐵、機器製造、能源交通等和軍火工業配套設施，而國家又無力用官僚機構來包攬一切，這就需要動員整個社會支援配合。在一體化結構中，輕車熟路的社會動員組織方式是利用具有統一儒家信仰的縉紳與官方合作，以延伸放大官僚機構的功能。這一傳統模式在洋務運動中的表現就是——官督商辦(圖2.2)。我們從官辦和官督商辦企業兩種形式興

^{①9} 張玉法：〈清末民初的官辦工業：1860-1916〉《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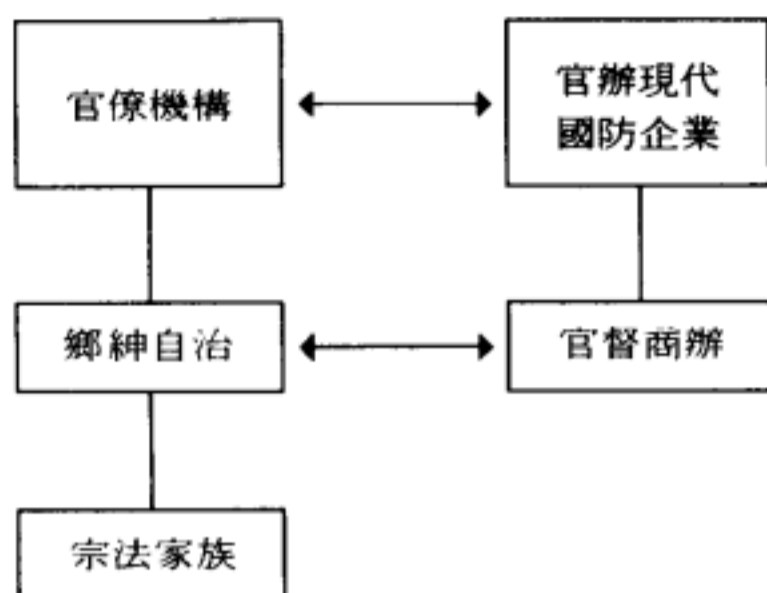


圖2.2 洋務運動展開方式和一體化結構三層次的關係

起的年代前後相連，可以看出洋務運動是如何展開的。

重要的官辦軍事企業大多興辦於1860年代，如上海江南製造局(1865)、南京金陵製造局(1866)和天津機器局(1867)；而官督商辦企業則興起於1870年代，如輪船招商局(1873)和開平礦務局(1878)。據王爾敏研究，官督商辦這種組織方式起源於漕運這類國家所必需、而又要依靠官紳合作才能完成的事業^②[註六]。士紳配合官府管理地方事務、興辦公共工程的官紳合作模式，本是一體化結構中政府管理動員功能深入民間的基礎。清政府用官紳合作推行洋務可謂駕輕就熟。如1870—1878年間蘇州新建的八個工商業公所的領銜人物，均有士紳在內，從附貢生、監生到舉人，累累二十人之多^③[註七]。官督商辦是由政府出部分資本，招紳士(商人)入

② 王爾敏：〈官督商辦觀念之形成及其意義〉《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9編（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③ 唐文權：〈蘇州工商各業公所的興廢〉《歷史研究》第3期（北京：1986）。

股，由國家監督紳士協助官家辦理，把洋務運動由官方推向社會。總之，從1865–1895這三十年間，一體化結構的復甦是在對外開放條件下進行的，這就使得它同時包含着用自身的組織方式來實現國防現代化之嘗試，從此拉開了中國社會大變動的序幕。

2.4 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

人們常把洋務運動看作中國第一次有可能從傳統進入現代之歷史機會。確實，現代化後進國家受到工業文明武裝侵略而被迫實行國防現代化，往往只是這些後進國家社會結構鉅變的第一步。國家興辦軍事工業，訓練新式軍事人才，有時會帶動一個連鎖反應。軍事工業需要以大量民間現代工業為基礎，國家投資軍工業會引發與其配套的整個民間工業化進程之展開。而訓練新式軍事人才則需要西方科技和文化的傳播，於是現代教育趁勢興起，進而導致行政管理和政治制度的配套改革。現代國防本來是生長在現代社會土壤之上的，只有整個社會的現代化才能建立真正與西方匹敵的現代國防。社會學家把經由國防現代化推動社會結構從傳統向現代變遷稱為防衛現代化[註八]。但是，一個社會能否實現這種變遷卻取決於它原有的結構。我們可以把中國的洋務運動和與其同時開始的日本明治維新作一歷史性的比較。日本是防衛現代化成功的典型例子。十九世紀中葉，日本在西方工業文明挑戰下從國防現代化開始，出現了政治制度、經濟結構和文化觀念的一系列變革，明治維新的成功意味着日本通過防衛現代化一躍為世界五強之一。但洋務運動卻不可能達到防衛現代化之目標。

從經濟結構分析，在1863–1894這三十年中，清政府雖投資國防企業、官僚資本達一億元，但官辦工業沒有引發社會的工業化歷

程，民間資本只有600萬元^②。官辦的國防工業沒有相應的交通、能源、採礦、煉冶等基礎，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根本不能發揮作用。分析一下當時的官僚企業結構就一目了然，其中直接的軍工生產佔71%，交通採礦冶煉加起來才佔22%^③。官府興辦的工業像個頭重腳輕的倒立三角形[註九]。戴逸對洋務運動中工業化規模的微小做過很形象的說明。他說，到1894年中日戰爭爆發時為止，新式軍工交通的近代化企業投資額不過等於1894年一年中外貿易入超赤字的2/3，等於大半個頤和園的修建維護費，等於清政府每年財政收入的一成，等於後來甲午賠款的一成^④！

對比中國和日本社會結構之差異，可以說明為甚麼洋務運動沒有引發經濟結構中現代工業之成長。明治維新的成功是由於國家能夠做到源源不斷地把農業生產剩餘轉化為工業投資。1873年7月明治政府頒佈了有關「地租改革」的佈告和條例，既穩定了政府的財政來源，也為利用國家權力將地稅收入直接轉化為國家資本提供了保證。1873至1881年，日本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地租改革，正是在這一時期，地租收入佔政府財政收入比例最高，日本「官辦企業」得到極大發展^⑤。國家大約從農業收入中得到總產量的一半左右作為稅收^⑥[註十]。在政府把農業生產剩餘轉化為工業投資的同時，城市化的武士、商人紛紛經營投資近代企業，一個由官方推動、民間響

②③ 黃如桐：〈試論洋務派企業的性質和作用〉《中國社會經濟史論叢》（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④ 戴逸：〈洋務歷史試論〉 阮芳紀等編：《洋務運動史論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⑤ 米慶余：《明治維新——日本資本主義的起步與形成》 頁104-105（北京：求實出版社，1988）。

⑥ 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應之工業化運動蓬勃展開[註十一]。而這個過程對於中國由一體化推動的洋務事業來說，實為不可能。

據王業鍵分析，清朝時中國並不特別貧困，但清政府即使在最繁榮的年代，全部政府財政收入都沒有超過全國穀物產值的5.6%^⑲，清末全部賦稅大約只佔國民總產值的2.4%^⑳。清廷沒有像日本那樣用農業產出積累作為新式工業的資金，有一個社會結構性的原因，這就是中國農業生產積累大多都用於供養一體化結構裏中、下兩個組織層次，國家無法獲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據張仲禮估計，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地主鄉紳階級個人年收入總額達67,500萬兩^㉑，這個數目是1885年清廷總收入7,708萬兩的8.8倍，是1911年國家總收入30,191萬兩的2.2倍^㉒。表面上擁有無限權力的大一統國家只是巨大的一體化結構冰山浮在水面的一小部分，它所能直接動員之經濟資源遠不足以提供工業化的全部投資。清廷辦洋務的主要財源是海關稅收和釐金^㉓，這是門戶開放後政府在供養官僚機構外還能有所剩餘的收入[註十二]。但隨着一系列屈辱條約的簽定，特別是甲午戰敗，關稅全部用來作賠款和抵押還不夠，政府便再也無從籌措興辦現代企業的經費了^㉔[註十三]。

⑲⑳ 轉引自吉爾伯特·羅茲曼(Gilbert Rozman)主編：《中國的現代化》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 頁98、96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

㉑ 德·希·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 宋海文等譯 頁231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

㉒ 魏光奇：〈清代後期中央集權財政體制的瓦解〉《近代史研究》 第1期 (北京：1986)。

㉓ 劉翠溶：〈關稅與清季自強新政〉《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下冊 頁1025中的註58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㉔ 陳詩啟：〈清末稅務處的設立和海關隸屬關係的改變〉《歷史研究》 第3期 (北京：1987)。

任何社會的工業化都主要靠民間資本推動，政府只能起帶頭作用。在中國，政府無錢投資新式工業，照理說佔有絕大多數農業收入的地主縉紳是有投資能力的。我們知道，洋務運動中建立了動員民間資源機制，這就是官督商辦。為甚麼官督商辦和紳士自辦的工業在洋務運動中沒有加速成長，成為現代工業基礎呢？關鍵正在於：傳統一體化組織方式中官紳合作是為了建立農村社會秩序，而興辦洋務和現代工業是在城市裏的新型事業，兩者在方向上背道而馳[註十四]。同治中興時，官紳合作之重點依然是恢復地主宗法組織的鄉自治，整個紳士階層關注的重心是鄉村重建。當大多數紳士居住在農村、只關心農村事務時，一體化結構的鄉村組織(動員)中心，決定了如圖2.2所示的洋務運動展開機制不能把工業化運動深入民間。

在一體化結構中，官督商辦充其量只是官方與少數有功名的紳商合作^③，一般商人並無政治地位，和官方聯繫也少，他們是被排斥在一體化結構之外。官督商辦事業既然屬於一體化組織，它不僅沒有成為政府動員商人之機制，反而是一個壟斷和壓制商人投資近代工業之手段。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李鴻章辦上海織布局。當時每年洋貨進口達8,000萬兩銀子，其中洋布就佔30%。因織布利益豐厚，李鴻章用官督商辦發展織布業。上海織布局一開始就宣佈壟斷，「只准華商附股搭內，不准另行設局」，它有十年專利權。但就像所有官辦事業那樣，上海織布局效率極低、速度特慢，早在1875年就動議設廠，到1882年才成立，1890年勉強募足資金和設備，剛投產就負債百萬兩銀子。在這長達十五年的時間裏又不准別的商人插手織布業，官督商辦表面上是動員民間投資，實際卻是延誤了民營工

^③ 朱英：〈清末商會「官督商辦」的性質與特點〉《歷史研究》第6期（北京：1987）。

業的發展[註十五]。

而且，在一體化結構中，意識形態認同是中、下層能和上層官僚機構合作之保證。洋務運動是被納入儒家經世致用學說才得以展開的。正如張灝所說，儒家「經世學說」雖然主張人們關心和積極改造現世社會，但對個人而言，「經世致用」的一切政治行動都要受儒家道德規範的約束；對群體來說，「經世致用」必須服從儒家意識形態勾劃的理想社會秩序^④[註十六]。對「經世致用」的理解一定會出現「屁股決定腦袋」的現象[註十七]。那些主管對外事務、切身體會到西方衝擊的官僚，可以把「經世致用」理解為「審時度勢」的國防現代化，連奕訢都說過「治國之道在乎自強」。但對於那些屁股坐在國內事務上人數更多的官僚和紳士，他們尚感受不到西方軍事和科技的壓力，經世致用就只是強化傳統一體化結構，不能注重那些有可能和傳統的國策有衝突之洋務。洋務只是少數人的事業。

中國第一次現代化嘗試的這種組織方式早已註定了它所能展開的極限。既然洋務只是作為同治中興過程中一體化結構全面復甦的一部分，它就不可能帶動整個傳統社會向現代之轉化。當洋務運動的展開不可避免地和一體化組織發生矛盾時，它也就走到了盡頭。防衛現代化只要觸及一體化結構組織方式，就會被阻礙，不得不中斷。它表明，一個民族的現代化道路和它傳統社會結構存在着內在聯繫。超穩定系統不可能像日本那樣，通過國防現代化把社會轉型從器物推向制度、文化層面，全面模仿西方現代化社會結構。它只能遵循着自己固有的邏輯，這就是防衛現代化失敗，並帶來社會組織者意識形態認同的破壞。

^④ 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頁23-24（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

2.5 甲午之戰：中國大驚醒

1885年11月，清廷向德國訂造的鐵甲砲船「定遠」、「鎮遠」、「濟遠」開到大沽港。這一消息傳到日本，曾一度引起驚慌。日本人擔心中國以這樣的速度現代化，幾年後日本將難以抵擋。然而，伊藤博文卻料定中國的洋務運動會失敗。他認為，中國眼下看來似乎大有作為，但不出幾年就會因循苟安，再次陷於沉睡，他為日本制定了十年打敗中國的雄心勃勃的計劃。主持中國洋務事業的李鴻章也意識到，中日遲早要在現代化上進行較量。他在1885年預測說，日本富強，尚須十年左右，目前可望無事^⑤。果然，約十年以後，爆發了甲午中日戰爭。這場戰爭是對中國三十年洋務運動和日本防衛現代化的總評判，其後果不難預見，防衛現代化成功之日本打敗了現代國防沒有生根之大清帝國。中國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似乎歷史的發展被伊藤博文所言中，但他關於中國沉睡的預言卻大錯特錯。防衛現代化的失敗在中國造成一個史無前例的現象，這就是儒家意識形態認同的破壞，大多數儒生縉紳開始「大覺醒」。中國真正處於一種「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之中了。

在一般歷史學教科書中，都把1840年鴉片戰爭描述為中國社會（觀念）大變局之開始，實際上這一說法是不嚴謹的。中日戰爭爆發前，雖然中國對外開放已經半個世紀，但儒家意識形態尚未受到懷疑，推行洋務的士大夫普遍心態是後來張之洞所概括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用西學的「器」來補充和強化中國的道。大多數儒生和縉紳，更是沉醉在維護傳統社會秩序和恢復道統之中。在當時的主要思想家陳澧、朱次琦、俞樾、黃以周的著作中看不到西學的影響。

^⑤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冊 頁256。

子，正如張灝所說，那時候社會思潮的主流「不是對西學的拒斥，而是一種普遍的漠視」^②。

1894年甲午戰敗是一個分水嶺，「仁政」所代表的社會秩序的觀念受到衝擊。從此中國思潮洶湧，出現了從來沒有過的出國留學熱潮。數以千計的讀書人東渡日本，去那裏學習法律、軍事和政治。在甲午戰爭中，中日是敵對國家，中國戰敗本應激發起士人抗拒日本、仇恨日本的民族情緒，但實際上卻出現了一個去敵國留學、向敵人學習的高潮。這說明儒生的反省精神壓倒了民族情緒，這種反省正好是儒家理想社會模式的破產帶來的[註十八]。據說，甲午一戰敗，袁昶曾十分惋惜地對黃遵憲說：「如果你的書早一點讓大家看到，價值可抵得二萬萬兩銀子。」原來，在甲午前十年，黃遵憲就寫了《日本國誌》，大談日本如何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但書出後卻乏人問津。而二萬萬銀子為甲午戰敗後《馬關條約》規定中國的賠償。這種歷史感慨十分形象地表明：甲午戰敗導致儒士放棄中國社會制度最優的信念，轉而認為日本制度優於中國。在這種歷史性轉變中，從未動搖過的對儒家意識形態的認同，首次出現了裂縫。

在世界近現代史上，因防衛現代化失敗而被肢解的東方帝國不乏其例，但防衛現代化的失敗導致意識形態認同破壞，卻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和西方地理上最為接近的奧托曼帝國最早受到西方衝擊，舍林三世(Selim III, 1789-1807)推行了持續十五年的國防現代化^③。然而，奧托曼帝國的防衛現代化和中國的洋務運動一樣，並沒有推動社會結構由傳統向現代轉化。在一個多世紀中，這個版圖

② 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晚清思想》頁23-24。

③ 陳方正：〈毀滅與新生I——奧圖曼帝國的現代化歷程〉《二十一世紀》總第7期（香港：1991）。

相當於中國明朝的大帝國分崩離析，今日土耳其的領土還不到往日奧托曼帝國疆域的五分之一。即使奧托曼帝國因防衛現代化失敗而陷於被肢解的命運，原有社會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伊斯蘭教教義——並沒有因此被破壞。為甚麼中國防衛現代化失敗會導致意識形態認同被破壞呢？原因正在於中國社會組織的特殊方式——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的一體化。

在沒有實行一體化結構的帝國中，社會組織行動的失敗並不立即和意識形態發生關係。而在一體化結構中，各個層次組織基礎和互相協調均基於意識形態，非宗教性的意識形態不可能不對社會有組織活動的失敗負責。中國一開始是用一體化結構來推動防衛現代化的，這本身就是一把極鋒利的雙刃劍，當防衛現代化失敗時，這一後果立即作為劍的另一面對準一體化結構的思想基礎——儒家意識形態。

正如我們在上一節所論，洋務運動作為同治中興的一部分，在其展開過程中，正是一體化結構所要求的意識形態認同阻礙了國防現代化所帶動的社會變遷連鎖。每當洋務派官僚上書中央請求撥款興辦近代企業時，都會有一大批正直的儒臣站出來反對，認為這樣做會加重人民負擔，違背了儒家輕徭薄賦的「仁政」原則；每當務實派人物感到國家缺乏精通西學的管理人才而要求強化這方面人員的培養和選拔時，也總是立即有人指出，這和理想社會的政治組織原則相衝突。在洋務運動中，如何使懂西學的人才進入官辦的現代企業體制內，發揮管理功能，一直是洋務派官員頗為頭痛的事。丁日昌曾提出六條意見，由李鴻章加以補充，形成一個尚能通融的方案。如設立洋學局「培養科技人才」，使之「與正途出身無異」。但是，它違背了一體化結構需要選拔具有統一意識形態儒生為官這一基本原則，這一方案一出籠，馬上遭到朝野士大夫狂風暴雨般的反對。丁日昌被罵為「丁鬼奴」。李鴻章見此路不通，就聯合有勢力的

奕訢、文祥奏議，在總理衙門同文館裏設天文算學，選拔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員來學習。這種「先紅後專」的選拔已經考慮到意識形態認同大原則，但仍然遭到反對。一體化組織原則不僅要求以意識形態作為選官標準，而且官員在實際政治運作中還要不斷強化意識形態認同。讓有功名的官員學習西方自然科學和管理，誰能保證不會破壞和污染他們的信仰呢？儒臣以西學知識會動搖忠君觀念為理由，認為它「上虧國體、下失民心」，沒有一個正途出身的人來報考，應試者多為老年或失業人士。同文館勉強錄取了三十名學員，到畢業時僅剩五名。洋務知識分子為改變受人鄙視的孤立地位，往往謀求科學進身。當時以學外文及西學為主的上海廣方言館和廣州同文館的學生，常因習中學而導致西學荒疏，連一些受過西學訓練的學者嚴復、馬建忠等，也曾下功夫於八股制藝，多次參加科舉考試，以博取為士人承認的資格。總之，在種種事業中恰恰是儒家意識形態認同，使得防衛現代化所需的配套變革不可能涉及政治制度。

意識形態一直充當着批判、阻止洋務運動進一步展開的角色，那麼它也不得不承擔洋務運動失敗帶來的後果。中國出現了意識形態認同與防衛現代化之間的互相否定，意識形態認同中斷妨礙了防衛現代化，防衛現代化的失敗又反過來破壞意識形態認同。儒家所推崇的理想社會模式並非來自神喻和宗教教義，這一點極為重要。如果理想社會模式來自於神喻和宗教教義，那麼除非把信仰者肉體消滅，否則，任何外來的失敗都不會動搖其信仰。而儒家理想社會模式卻是對歷代太平盛世社會狀態之經驗總結。儒生既然囿於這一模式帶來安定、繁榮的盛世的歷史經驗而信仰它，那麼，這種信仰也就可能為某種重大歷史事件所震撼，甚至被否定。甲午中日戰爭極富有對意識形態檢驗的象徵性含義，全國朝野都一清二楚：中國和日本差不多同時開始防衛現代化，有近乎相同的起點[註十九]，

不同的是中國堅持只在器物層面向西方學習，堅守儒家理想社會模式，認為中國社會政治制度高於西方；而日本卻進行了整體制度改革。日本打敗中國除了宣佈儒家意識形態所推崇的理想社會並非最優之外，簡直無法作其他解釋。因此，甲午戰爭後，絕大多數儒臣都對儒家意識形態所崇尚的社會制度發生了懷疑。

士大夫對儒家仁政信念動搖的最好例子莫過於清議派的變化。清議派由那些正直清廉、思想正統但又對西方所知甚少的儒生組成，他們以敢於批評腐敗和種種不合原則現象而著稱。他們的最激烈批判對象，一個是洋務，另一個是腐敗，其理由均是出於對仁政之捍衛。早在1851年，那個曾經寫了《瀛環志略》，屬於最早睜開眼睛看西方世界的徐繼畲就是被清議派扣了崇洋媚外的帽子罷了官。同治中興時，一體化加強，清議派力量大增，洋務派官僚似乎沒有一人能逃過他們的批評，紛紛中箭落馬。但是甲午戰敗後，這一強大的清議派隊伍土崩瓦解，相當一部分人對西學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他們對政治改革變得熱心起來，不僅研究西方議會制度，而且還具體設計如何將其引進中國。據石約翰 (John E. Schrecker) 等人的研究，1898年激進的改革派領袖(包括康有為在內)都和清議派有密切的淵源^③。只有意識形態認同的破壞才會出現清議派的瓦解和轉型。

2.6 意識形態危機的類型和階段

我們把一體化結構各層次組織者的意識形態認同破壞稱為意識形態認同危機[註二十]。儒家意識形態是一個整體性思想體系，它

^③ 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 頁32。

包括以家庭倫理為中心、以忠孝仁義為基礎的價值觀，大一統仁政理想的社會觀和「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哲學觀三個子系統（圖2.3）。意識形態認同破壞可以只限於三個子系統中的一個或兩個，也可以波及三個子系統。前一種情況我們稱其為意識形態局部認同危機，後一種則是全面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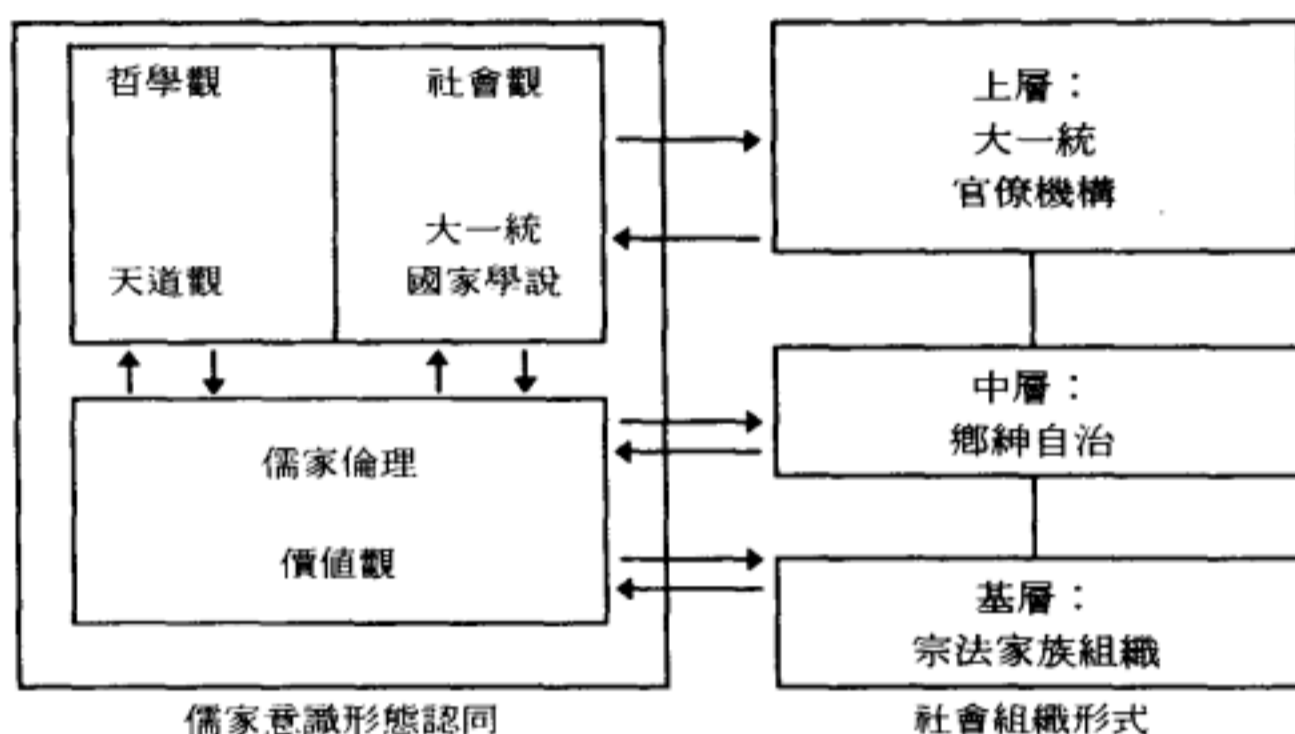


圖2.3 傳統一體化結構三層次的意識形態基礎

超穩定系統何時出現意識形態局部認同危機，局部認同危機會不會擴大成全面認同危機？表面上看，社會普遍觀念的變遷很難嚴格把握。但是根據2.5節分析，洋務運動失敗導致意識形態認同破壞是因意識形態必須為社會危機負責而造成。那麼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的規模和性質也就可以意識形態內容和社會組織關係來判定。從整體上看，一體化組織上、中、下三個層次的理論基礎和合法性均來源於儒家意識形態，但是只要我們對儒家意識形態的內容進行細緻一點的分析，就可以看到，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對一體化三個組

織層次的功能貢獻是有所不同的，因而受社會危機衝擊之程度和先後也各不相同。縉紳鄉自治和宗法家族的權威合法性的支援意識主要是儒家倫理。一體化結構的上層——大一統官僚機構的支援意識，大部分均由儒家學說之社會觀和哲學觀提供。如「大一統」、「仁政」本身屬於儒學的社會觀；而「祖宗之法不可變」則來自於「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天道。「天道」是哲學觀。換言之，儒家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中，哲學觀和社會觀是上層組織之基石；而中、下層次主要支柱是價值觀(圖2.3)。防衛現代化作為一種主要由一體化結構上層組織(國家官僚機構)推行的事業，它的失敗所導致的對儒家意識形態的衝擊一開始就只是局部性的。它只涉及一體化上層組織的支援意識。即甲午戰敗所引發的認同危機首先發生於社會觀和哲學觀中，儒家的家庭倫理和價值系統受到衝擊較少，一體化結構承受的是局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只有一體化上層組織解體後，其中下層組織對社會危機負責時，才會衝擊相應的意識形態內容，導致意識形態全面認同危機。

事實正是如此，1895年甲午戰敗後出現思想觀念大變革，史稱戊戌思潮。戊戌思潮最基本的特徵是：儒家的社會觀和哲學觀暴風驟雨般的變遷，而家庭倫理卻觸動很少。眾所周知，甲午後短短幾年內，中國思想界發生了兩件轟動大江南北、掀開社會大變革思想風暴的事情。一是正途出身的康有為發表《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他用儒生們熟悉的傳統考據方法來論證孔子就是一個制度改革家，祖宗之法並非不可變；而儒生們當時奉為神聖不可變更的儒家經典不過是經漢儒篡改過的偽經！偽經不可信，聖人乃制度創新者，儒生們還憑甚麼來維護祖宗之禮法？另一件事是嚴復譯《天演論》，將進化觀引進中國。這竊來之普羅米修斯火種，一點即着，從此，社會達爾文主義風靡中國，成為中國社會大變革的哲學基礎。

無論是康有為的變法思想，還是嚴復譯著帶來的新觀念，均主要局限在社會觀和哲學觀方面。康有為雖然把漢以後的經書和現行制度批判得體無完膚，但他仍把孔子奉為改革正宗，肯定了儒學的基本價值，他所做的只是重新從孔子奠定之儒家價值觀中推出新的社會觀和哲學觀。嚴復三本翻譯名著分別對準了儒家意識形態哲學觀和社會觀的核心。《天演論》用「進化」代替「天不變，道亦不變」之宇宙觀；而《原富》一書則把孔子的「長國家而務財者，必是小人矣」這一道理翻轉過來，從此「求富」變為聖人之道；《群學肆言》則打破了以中國為天下中心的觀念，認為必須建立新的社會和世界秩序。梁啟超把嚴復引進的以進化論為核心的新觀念稱為中國思想界的霸王。實際上，這一思想霸王之所以統治中國三十年之久，是因為只要人們沒有從根本上觸動儒家倫理價值，進化論代表着當時最解放的思想。只有到新文化運動時，一體化上層組織解體，紳士對社會危機負責時；反對儒家倫理的全面的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發生，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地位才被更激進的觀念所取代。

總之，我們從分析意識形態和一體化三個層次之間的關係中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只要大一統國家官僚機構尚未解體，在外來衝擊下帶來的種種挫折和危機就均由一體化上層組織承擔責任，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很難擴充到價值觀層面。那麼這是不是說，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可以被控制，使它不波及價值系統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國一體化結構實現了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的強耦合，任何意識形態危機都會轉化為政治行動，而政治改革的後果卻是摧毀大一統王權，使一體化中下層組織為社會危機負責。也就是說政治結構的改變反過來影響意識形態。兩者形成一個互相加劇的正反饋，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就如岩石中的裂縫，會在外力下不斷擴大延伸，難以控制，以致最後從哲學觀、社會觀蔓延到價值觀，出現全面的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當康有為在廣州講學時，理學大師朱一新似乎就感到不

妙，他說：「夫人心何厭之有？六經更二千年，忽以古文為不足信，更歷千百年，又何能必今文之可信耶？竊恐詆訐古人不已，進而疑經；疑經不已，進而疑聖；至於疑聖，則其效可睹矣！」^③事實上，朱一新所擔憂的過程，正是在1895到1915這二十年間通過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互動而展開的。

2.7 從戊戌變法到義和團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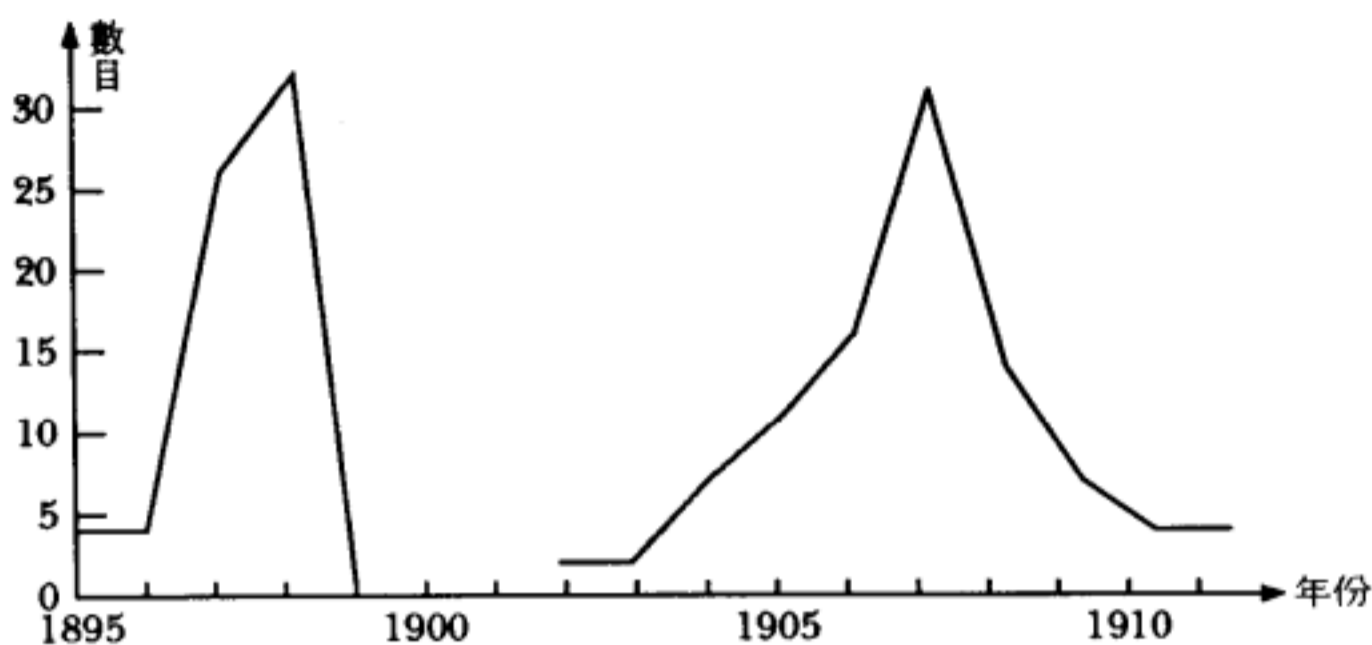
為了形象地把握1895年後意識形態危機和政治改革的互動，我們試圖用一個象徵指標來代表某一時期意識形態認同破壞的情況，以使整個變化過程可以用曲線表示。我們認為，可以用士大夫為了改革所組織的社團來反映意識形態危機在社會上的公開呈現。社團的宗旨大體可以反映士大夫對傳統意識形態哪一部分產生懷疑，社團數目則可以衡量這種破壞的普遍程度。

我們根據王爾敏的研究^④，將1895到1911年各類新學會的數目做出如圖2.4所示的統計曲線。這條曲線有兩個十分突出的高峰，可以分別代表局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的兩次大爆發。而在這兩個高峰出現之前，存在着兩次重大政治事變——戊戌政變和義和團運動。分析這兩次政治事變和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的關係，恰好表明存在着我們所說的互相加劇之正反饋。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高峰。它出現在1895年甲午戰敗後，在1897-1898年達到頂點。這正是我們前面一再講過的甲午戰敗使中

^③ 曹聚仁：《中國近百年史話》 頁21。

^④ 王爾敏：〈清季學會匯表〉《大陸雜誌》 24卷2期 頁14-20，26卷3期 頁16-23（台北：1962）。



據王爾敏：〈清季學會彙表〉提供數據繪製，《大陸雜誌》，卷24，第2、3期（台北，1962）。

圖2.4 清末學會數目的變化曲線

國士大夫普遍驚醒，出現對儒家意識形態社會觀和哲學觀的懷疑。王爾敏將各種學會分成七種類型。他發現在1895–1898年時，佔壓倒優勢的是「重振士氣以保國」的自強類型，這些學會並無確定的政治改革主張。這表明：認同危機剛爆發時，人們只是對原有意識形態有懷疑，並不一定鮮明地支持與原來意識形態主張相左的政見。這時，認同危機不算強烈。有一項對戊戌時期中央官員思想傾向的研究，可進一步證明這一點。當時光緒帝下令重印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令各衙門閱後批註加簽，這可以看作對官僚士大夫的一次思想測驗。有人對372位包括大學士、內閣學士及其他中央級官員所加簽註進行研究分析，發現絕大多數人是「唱和派」，對少數激進派所主張的變法內容既不擁護，也不反對，仍隨聲唱和^④。即便

^④ 李侃、龔書鐸：〈戊戌變法時期對〈校邠廬抗議〉的一次評論〉《文物》226號（北京：1978）。

如此，意識形態認同危機也已在政治層面有了反應，它推動光緒皇帝實行政治改革，史稱戊戌變法。但我們知道，在一體化結構中，某種意識形態內容的變化，如果得不到大多數士大夫支持，它是不可能轉化為政治現實的。因此，改革即使得到皇帝支持，也不會成功。結果戊戌維新只搞了一百天就宣告失敗。

關於甲午戰敗後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如何推動戊戌變法，歷史學界有很多研究。但對戊戌變法的失敗如何反過來加劇擴大社會組織者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社會上注意甚少。事實上，戊戌變法的失敗恰好是幾年後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更大範圍湧現的前提。它是通過變法失敗後的倒退以及義和團運動這一邏輯鏈實現的。李劍農、汪榮祖均對戊戌變法失敗原因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他們認為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是康有為的思想過於標新立異，從而引起大批士大夫的反感和反對，於變法的政治活動實害多而利少^④。實際上這正表明，第一次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出現時，由於廣大士大夫僅僅對傳統社會觀和哲學觀處於懷疑之中，還難以接受任何一種新的社會觀，政治改革難以推行。廣大士人處於懷疑迷惘狀態，使得戊戌變法失敗後意識形態頑固派的意見能佔上鋒。頑固派認為中國的失敗不是傳統社會組織方式不好，而是洋務派的改革動搖了一體化結構，造成媚外怕死，不敢和洋人決一死戰[註二十一]。甲午戰敗後，堅持這種解釋之意識形態強硬派最團結，行動最少猶豫。結果他們輕易地戰勝激進改良派，用強制性行政干預的辦法，來維繫對儒家國家學說的認同。光緒皇帝被軟禁，激進改革派遭到清算。戊戌政變後一個短時間內這種反動竟如此之徹底，甚至連以前他們尚能容忍的

^④ 李劍農：《戊戌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頁19（北京：中華書局，1965）；汪榮祖：〈論戊戌變法失敗的思想因素〉《近代史研究》第3期（北京：1982）。

洋務派也遭否定。郎中左紹佐甚至要求把最早推動洋務事業但早已去世的郭嵩燾戮屍以謝天下。他們鼓動慈禧太后發動群眾和洋人一戰。正是在這種極端仇視開放和改革的氣氛中，爆發了義和團運動[註二十二]。

在此，我們不想去分析義和團反洋教運動爆發的原因。只想指出，清廷利用義和團運動來反洋人，是和意識形態強硬派佔上風、全盤否定洋務和變法密切相關的。它導致的後果則是局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更強烈地呈現，因為退回到祖宗之法不可變的立場，並不能改變門戶開放之下中國落後挨打的現實。在1900年庚子事變中，意識形態強硬派的倒行逆施，立即被無情的現實所粉碎。當時，面對八國聯軍的咄咄攻勢，意識形態強硬派和義和團在某些方面是相當一致的，他們相信衛道的神聖感可以使血肉之軀能夠抵擋、甚至打敗敵人的槍砲。郭廷以先生十分形象地描繪了清廷用「人民戰爭」反洋人的結果：「義和團事變，無洋不反，凡外皆讎，以中國(實際上是以華北、東北、甚至是以京津一隅)，致成一個小型的「世界大戰」，結果京師再陷，朝廷狼狽出亡，……賠償鉅款，京津一帶駐兵，創痛之劇，遠過於英法聯軍、甲午之役，而一般知識觀念的開通前進，亦非彼時可比」^④。

在廣大儒臣心目中，庚子事變是比甲午戰敗更大的對儒家社會觀和哲學觀的否定，它立即引發了更大的局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圖2.4表明，第二個高峰由1901年開始，1907年達到頂點。王爾敏對這一時期佔主導地位的學會宗旨進行了分析，認為它們已不是第一個高峰所代表的無確定政見之「自強」，而大多有明確的政治主張。佔壓倒多數的學會宗旨是研究立憲和推動地方自治。我們可以

^④ 郭廷以：〈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中國現代化的歷程》頁171-172（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

看到，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再次浮現，雖仍局限在哲學觀和社會觀方面，但它已經由懷疑變為要求哲學觀和社會觀內容的變革。戊戌時只被少數激進派認同之政治主張一下子為廣大士大夫所接受[註二十三]，立憲成為學會組織者的共識。這種意識形態之改變立即成為改革政治制度的強大動力。這次政治改革挾不可阻擋之勢，促使清廷於1903年設商部，1905年廢科舉，1906年宣佈立憲[註二十四]，接着各省縣紛紛成立諮議局。

分析兩次意識形態局部認同危機和兩次政治改革的關係，可以清楚看到意識形態變化和政治改革的互動中，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是意識形態變遷推動的政治制度改革具有不可抗拒性。戊戌變法時意識形態變遷尚不夠有力，不足以使廣大儒臣贊同制度改革。但頑固派抵抗改革的結果卻引發了更大的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從而為今後的政治改革掃除了障礙。這一過程表明，意識形態變遷到相當程度就會導致政治改革。第二，政治制度變遷又會進一步引發更大的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圖2.4只描繪到1911年時的情況，如果把時間軸再延伸，就可以看到政治制度變遷再次反作用於意識形態。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標誌着一體化結構上層組織的瓦解，1916年軍閥割據局面的形成，則意味着中層組織——縉紳自治重新整合社會結構之失敗，它立即導致意識形態認同危機進入價值觀層面，從而爆發了新文化運動，儒家倫理被新知識分子徹底批判。

總之，可以用超穩定系統在開放條件下的行為模式，來把握自鴉片戰爭到戊戌變法的歷史過程。中國超穩定結構實為農業文明之列維坦，一體化組織三層次恰似巨人的軀體，而意識形態就像巨人的思想。當意識形態不變時，巨人對外界衝擊的反應麻木不仁，或頑固抗拒自身組織的變革，防衛現代化的失敗不可避免。這時超穩定結構特有的對外來衝擊的反應方式就會表現出來：防衛現代化的失敗會引發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意味着巨人的驚

醒，從此，一體化內部產生了推動持續不斷的變革的動力。它必然導致傳統一體化結構的解體，而一體化結構的解體又會促成意識形態的更替。這一過程可以說是一發而不可收。以下，我們將在三、四兩章分別討論中國傳統一體化結構的解體和社會危機為何會引起意識形態的更替。



第二章 註 解

註一 王爾敏曾考察過，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有多少人曾有過類似於林則徐那樣「船堅砲利」的想法，他發現當時大約共有66人對國防上學習西方有所關切，他們的身分不是高級官員就是著名紳士，即使道光皇帝後來也並非如一開始那樣對「船堅砲利」絕對排斥，但是這種意見在太平天國大起義前並不能引起朝廷普遍重視^④。

註二 近現代史學者多從外國資本主義侵入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來探討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的原因。把中國社會在受到西方衝擊從而對外開放條件下的農民大起義和傳統農民起義區別開來是正確的，但是當時中國剛開放不久，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基本上仍是傳統的。一體化調節在兩百年中釋放出的無組織力量——吏治腐敗和農村土地—人口危機仍是大動亂的主要原因。關於無組織力量與這次大動亂關係的分析，可參見《興盛與危機》一書的4.6節。

註三 關於太平天國為首的農民大起義如何解決十九世紀中葉的土地危機，為中國基層社會相對安定半個世紀奠定基礎，有關的綜合性宏觀研究還不夠。但大多數近代經濟史家公認，本世紀二十年代之之前，中國農村土地兼併並不嚴重。當然也有例外，如河北望都縣赤灰村，1905年全村共200多戶，無地戶佔50%。該縣北高嶺等五村共440多戶，佔地十畝以下者361戶，佔總戶數80%以上^⑤。這些

^④ 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頁6-7（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

^⑤ 陸保善等：〈望都縣鄉土圖說〉(1905) 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 頁195, 196（北京：三聯書店，1957）。

例外差不多都可歸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清末農民大起義沒有掃蕩到的地區，土地兼併是長期積累下來的。如京畿地區一直是清末農民大起義沒有波及的地帶。另一種可能是，大動盪雖打擊了土地兼併，但在鎮壓農民大起義中迅速興起一個新興的大地主階層，如湘淮軍的將領大多是中國近代新出現的大土地佔有者。一般說來，新興大地主的土地兼併發展到嚴重程度，需要一段時間，因此只有在動亂過後幾十年，土地兼併才會比較嚴重，這些地區性土地集中大多出現在二十世紀初以後。例如江蘇昆山縣1905年佃農佔57.4%，1914年增加到71.7%。安徽宿縣1905年佃農和半佃農只佔40.5%，1914年增加到57.5%^{④⑥}。關於二十世紀初土地兼併加劇的論述詳見本書6.1節。

註四 不少學者都注意到了推行洋務運動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農民大起義打擊了貪官污吏，一大批相對清廉務實的儒臣進入官僚機構。劉廣京不久前就討論過類似命題，即為甚麼自強運動要到鴉片戰爭後二十年左右才開始？他指出：沒有太平天國，就沒有自強運動。如果兩江總督還是何桂清等人，直隸總督還是恆福等人，就很難有新的海防政策，更談不上去學習西洋技術和科學了^{④⑦}。

註五 孟思明(S.M. Meng)對總理衙門的結構和功能的考察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證據。在受到西方衝擊對外開放之前，超穩定系統沒

④⑥ 喬啟明：〈江蘇昆山、南通、安徽宿縣農佃制度之比較以及改良農佃問題之建議〉 嚴中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 頁276（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

④⑦ 劉廣京：〈關於晚清自強運動的幾點意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第4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有專門的主管外交事務的機構，外交由禮部和理藩院處理。對外開放後，駐使一來，不得不設立相當於外交部的總理衙門，1901年又改名為外務部。據考察，十九世紀末，主管洋務的總理衙門效能不過如一個秘書處，其機構設置及內容和各部重疊，主管的事務遠沒達到專業化，工作效率取決於主辦大臣個人聲望^④。

註六 官督商辦這種洋務運動向民間滲透方式的起源可為我們提供一個證明：它只是利用了傳統一體化結構中上層組織和中下層組織之關係，把由官方興辦的現代化事業推向民間。官督商辦起源於漕運事業絕不是偶然的，在這一類事業中最早發生了必須靠一體化上層和中層組織協調才能應付的新社會問題。清初，京城每年通過運河運輸徵集來的漕糧大約有400萬噸左右。道光年間(1825年前後)因運河河道不暢而實行海運，運輸工具也由傳統人力挽曳的民船改為依靠風力的沙船(大型遠航帆船)。如此龐大的運輸事務，只能通過官紳合作辦理。超穩定系統受西方衝擊對外開放後，外輪闖入，沙船業受到排擠而一蹶不振，它立即影響漕糧運輸。在漕運問題上急需尋找解決辦法。當時，一個顯而易見的選擇是由國家購置輪船來進行運輸，但經費浩大，光靠官僚機構無法勝任漕運現代化。這時只能去發明官紳合作推行現代化事業的新形態。據考察，由官督商辦辦理輪船招商局的整個構思皆因官方力量不足而萌發。總理衙門想用傳統官紳合作的擴大來解決漕運，即「僱用商船，酬給水腳銀兩」，由上海熟悉航務的紳士主其事。一個由華商購造洋船、變法自強以解決航運問題的方案漸漸成熟。由於國家經費不足、財政支絀而衍生出養船問題，最好的辦法是「招商」，1872年李鴻章終於

^④ S.M. Meng: *The Tsungli Yamen: Its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提出官督商辦^④。這裏可以看出，官督商辦出現在如下兩個條件首先集中的地方，第一，它必須是只能由官紳合作才能辦成之事業。第二，它又是最先感受到西方衝擊的行業。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漕運的水腳收入一直是輪船招商局的大頭，1873-1874年，漕運水腳佔總水腳收入的35%，1876年後，仍有百分之十幾。當時，中國輪船運費為每石六錢，較外國輪船高出一倍。1875年美商旗昌輪船公司表示願意僅收運費每石一錢，與招商局競爭。清政府如允許旗昌承運，總經費可省下三十萬兩。但清政府為了落實「招商」，不為所動。從中可見官督商辦事業中，傳統官紳合作並不僅僅在於經濟上的互利，還在於意識形態認同^⑤。

註七 公所與官督商辦一樣，是官紳合作推行現代化事業的另一種形態。其內部運作之關鍵，仍在於官方和紳士的互相默契與合作。諸如稅收等事務，往往是通過公所貫徹實施，官府起督察作用，與傳統官紳合作在鄉間徵收農業稅模式一致。

註八 十八、十九兩個世紀中，我們至少可以舉出四個由於國防現代化需要而推動社會由傳統向現代演進的例子，其中成功的兩例即是普魯士和日本。普魯士比日本早半個世紀，自1793年後即受法國大革命衝擊，開始推行防衛現代化歷程，其典型事件為1806年普魯士被法國大敗，費思德里希·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在國難當前時奮起改革。1806-1808年由施泰因(Friedrich K.F. von

④ 蘇梅芳：〈李鴻章與「官督商辦」〉《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以下簡稱《成大歷史學報》）第16號（高雄：1990）。

⑤ 黎志剛：〈輪船招商局國有問題：1878-188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近史所集刊》）17期（台北：1988）。

Stein) 實行政治經濟現代化措施，1810年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推行教育全面現代化計劃，1811-1812年哈登堡(Karl A. von Hardenberg)進一步實施政治經濟改革，與此同時，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的軍事改革也頗見成效。其後果是現代德國之興起^①。失敗的也有兩例，這就是奧托曼帝國和中國。

註九 洋務運動(從1863-1894年間)興辦的企業種類和資本如表2.3所示。我們可以發現，軍事工業佔70%以上。其實，洋務運動中投資規模僅次於軍事工業的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也是基於國防軍事上的需要^②。例如修建鐵路，就是為了軍隊和物資能在短時間內集中，因此，洋務運動中佔投資額84%的企業直接和國防有關。相反，作為國防工業的基礎工業卻很薄弱。現代化的企業體系顯然是頭重腳輕，缺乏基礎。

種類	企業數目	資本額(銀元)	百分比
軍事工業	19	69,943,461	71.4%
交通運輸業	7	12,508,702	12.8%
採煤工業	7	2,716,228	2.8%
金屬採掘和冶煉	9	6,637,250	6.7%
紡織工業	5	6,103,803	6.2%
合計	47	97,909,444	100%

取自黃如桐：〈試論洋務派企業的性質和作用〉，《中國社會經濟史論叢》(山西：人民，1982)。

表2.3 洋務企業的種類及資本

① 郭少棠：《德國現代化新論》頁52-56 (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

② 全漢昇：〈甲午戰爭以前的中國工業化運動〉《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9編 (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註十 關於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家究竟掌握了多少農業收入，目前存在着幾種說法，但學術界公認，日本明治維新的一個重大收穫就是國家農業稅收的驟增。1873年日本進行一次重要的賦稅改革，建立了一個不隨收成多少而波動的統一稅率制度，即將原幕府和藩政權按慣例徵收的稅收變成新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的統一貨幣稅，它是地價的3%，而地價定為平均年產量的8.5倍。根據這種算法，日本農業產出中至少有25-30%轉化為國家稅收。明治政府初建時，新田賦佔政府歲入的94%。十九世紀末，工商業有了很大發展，但田賦仍佔歲入的50%以上^③。可見，國家可以直接從農業生產中抽取高稅收並將其轉化為現代化的各項事業之經費，是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條件之一。中國大陸1949年後也建立國家從農業積累中獲得人力物力主要來源之機制，農業稅率和日本明治時代相差不多，但對於傳統一體化結構來說，這是不可能做到的。

註十一 明治維新時期，國家能大規模地支配農業產出，是近代日本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學術界對於這一點並無爭議。但國家直接將農業收入投資現代工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則意見分歧。學術界佔主流觀點認為，國家直接投資起了重要作用。但有些學者不同意這一說法，他們認為，1868至1881年間，明治政府從當時農業稅收中抽出3,400多萬日元轉化為工業投資，這僅佔這一時期正常稅收的5.5%，只是政府經費的13%，為陸海軍總經費的1/3多。而且1878年首次公開發行政府公債，為新工業籌措資金^④。這派意見更強調政府投資和推動是通過社會力量發生作用的。這兩種意見雖不

③④ 費維愷(Feuerwerker Albert):《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頁59-60、54-55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

同，但均認為日本工業化過程中由國家作為中樞，在它的推動下民間引起了工業化熱潮。在中國就不存在這種轉化鏈。

註十二 有人曾對1895年前洋務運動中七個最大的國防現代化企業的經費來源進行了統計，表2.4就顯示了總投資42,805,295兩白銀中有85.8%來自於關稅。王爾敏先生也曾指出，自強運動期間，總理衙門經費中，戶部每年只撥給700餘兩。可見這些來自中央政府直接撥款只是名義上的，實際上毫無意義。經費主要來源靠海關稅收，如每年提撥三成船鈔，數目可達五、六萬兩至八、九萬兩，包括同文館等費用均出自此項^⑤。

企業名稱	經費 總額(兩)	海關 關稅	地方 撥款	軍費	捐罰款	戶部 撥款
蘇州洋砲局	110,567			100%		
江南製造總局	15,970,736	94.11%	0.48%	2.66%	0.25%	2.50%
金陵製造局	2,776,895	70.94%		29.06%		
福州船政局	12,530,000	98.00%	2.00%			
山東機器局	890,800		100%			
天津機器局	7,586,707	98.50%	0.40%			1.10%
湖北槍砲局	2,960,000		44.93%		35.51%	19.56%
合計	42,805,795	85.82%	5.98%	3.11%	2.56%	2.52%

取自前引黃如桐

表2.4 七個最大洋務企業的經費來源

^⑤ 《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下冊 頁1116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註十三 甲午戰敗後，中國除了用關稅收入支付賠款外，還被迫簽訂三次大借款(俄法借款和兩次英德借款)，大多以海關洋稅為抵押，使海關稅收源源運入英、德、法、俄四國。緊接着又是45,000萬兩數額龐大的庚子賠款，不僅把海關洋稅抵押淨盡，而且連通商口岸五十里以內的常關稅也充當了抵押品。洋務運動的第二大經費來源——釐金本來就不穩定，常受貿易之旺衰及政令之變換因素影響而盈縮，隨着清王朝的衰落亦日益枯竭^⑤。

我們可以用甲午戰爭前後清朝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之用途來證明這一點。表2.5、表2.6分別為甲午戰爭前和甲午戰爭後各省派定的解款額。我們看到甲午前地方政府能從海關與地方商業稅收中拿出防衛現代化之經費。甲午戰爭後，防衛現代化失敗，清廷在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中把海關關稅用作賠款之用。這時關稅收

款目	各省攤額(萬兩)	各關攤額(萬兩)
京餉	638	162
固本京餉	66	—
內務府經費	15	45
東北邊防經費	154	46
籌備餉需	114	86
內務府常年經費	30	20
合計	1017	359

取自彭雨新：〈清末中央與各省財政關係〉，《中國近代史論叢》，2輯，5冊（台北：正中，1963）。

表2.5 甲午戰爭之前各省及各關派定解款額

^⑤ 莊吉發：〈同光年間的地方財政與自強經費的來源〉《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款 目	各省攤額(萬兩)	各關攤額(萬兩)
攤還滙豐銀款	84.20	50.00
攤還滙豐鎊款	195.80	66.50
攤還克薩鎊款	74.30	5.00
攤還瑞記借款	42.00	25.00
攤還俄法借款	365.25	256.25
攤還英德借款	467.75	368.75
攤還英德續借款	500.00	—
攤還庚子賠款	1880.00	—
練兵經費	966.00	—
海軍經費	451.50	—
崇陵工程經費	80.00	100.00
合 計	5098.00	871.50

取自前引彭雨新

表2.6 甲午戰爭以後各省及各關派定解款額

入雖增加了一倍，但還不夠支付借款和賠款的利息。甲午以前，各省攤額為1,000餘萬兩，甲午以後至宣統年間新添5,000餘萬兩，連同以前派額共為6,000餘萬兩，為甲午前六倍。這一切均表明用一體化結構來推行防衛現代化一定會觸發下列惡性循環：一體化結構對防衛現代化的限制——防衛現代化失敗——向西方列強賠款——防衛現代化經費來源之短缺——進一步失敗和喪權辱國。

註十四 這方面一個有說服力的案例是1883年上海出現的嚴重金融風潮。在這次風潮中上海七十八家錢莊大多倒閉，只剩下十家繼續營業。官督商辦及其他華商企業股票大跌。主辦輪船招商局的商人徐潤破產，唐廷樞也損失慘重。這次金融風潮自錢荒引發。據一些

學者考察，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商人對工、礦、「交運」等企業做了力所不能及的過分投資，抽走了商業流通中本來已捉襟見肘的銀根，結果導致金融危機^⑤。如果從社會經濟動員模式來分析，其原因更為清楚。官紳合作模式中，紳大多是地主，其經濟實力主要在鄉村，紳士雄厚的資金實力也不在大城市。這樣在紳士城市化之前，用官紳合作搞現代企業，不能動員紳士掌握的大部分經濟資源。其推行的一個結果就是資金不足，僅憑商人投資，極容易造成金融危機。我們如果把1883年的金融風潮和甲午以後廣大紳士投資現代企業的熱潮作一對比，就可以發現，甲午以後伴隨紳士城市化，廣大農村資金流向大城市。而現代企業迅速成長的過程中，也再沒有出現類似的金融危機。

註十五 不少學者都談到過，商人對官督商辦的態度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猶豫觀望，入股者不多。第二階段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入股較為踴躍。第三階段則因深受官督之苦，屢遭盤剝，商股噴有煩言，遂對官督商辦深惡痛絕。在傳統意識形態以及相應一體化控制未解構之前，官僚機構和商界的關係受傳統一體化組織抑商所限，是不可能把官紳合作管理農村模式運用到政府和商人關係之中的，因此，商人對官督商辦態度的上述三部曲不可避免。這裏一個不可解決的問題是企業所有權。企業的官督（一體化控制）會不斷產生把民間企業納入官辦的軌道而損害商股的權利，而商人終因所有權得不到保證而對官督商辦失望。一個典型例子是輪船招商局，它自建立後即不斷有收回國有的動議，曾有過兩次國有化的嘗試，都因國家缺乏資金而失敗。其後果是使商

⑤ 杜恂誠：〈從1883年上海金融風潮看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歷史研究》第6期（北京：1987）。

人信心受到打擊^⑤。當時商人寧可把資金投入外國在華興辦的企業，因為在洋人的企業中所有權是有保障的。據統計十九世紀末外商在華企業中，華商附股資金達1,600萬兩之巨，達外商總投資之40%以上^⑥。只有一體化解構過程中出現紳士城市化潮流，官督商辦才能普遍在城市推開，轉化為一個類似於官僚資本主義(即官僚個人資本與國家資本混合)的經濟形態，詳見本書3.5節。

註十六 余英時曾從儒學內外兩個方向發展來說明「經世致用」的興起。他認為儒學發展的內在要求是「道問學」，而「經世致用」則因儒學受到外來刺激而產生。劉廣京根據對《經世文編》研究得到一個有趣的結論，即一切「經世」活動均以政府作為權威之源泉，政府之外的「濟民」、「正俗」活動不屬於經世之學。換言之，「經世致用」之實行是相當官僚化的，處處以一體化官僚機構活動作為自己的主體。這些分析都證明「經世致用」是官方意識形態——儒學在對外開放條件下的一種新形式，其各種延伸均不能脫離官方正統意識形態的軌道。韋政通考察了《經世文編》的社會影響，發現它是在洋務運動中才受到重視，甲午後更為發達。從1826到1913年，以「經世」為名同類的文編有十八種，而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只印了一種，到八十年代印了三種，九十年代為五種，以後逐步增多。它表明，經世致用確實是在洋務運動中興起的^⑦。

⑤ 黎志剛：〈輪船招商局國有問題：1878-1881〉《近史所集刊》17期 台北：1988）。

⑥ Yen-ping Hao(郝延平)：《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⑦ 韋政通：《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上) 頁36、37、71-72。

註十七 有人曾對洋務運動中，士大夫對自強運動應如何進行的態度進行了分類研究，發現人們共有三大類方案。第一類主張應以傳統的內治為本，認為安內即可攘外，當務之急是內治。第二類意見是自強應以內治為本，洋務為末，但迫於當時時勢，認為重點應在辦洋務。第三類意見也是以內治為本，洋務為末，但理論根據與第一類不同。作者考察了持這三類不同觀點知識分子的類型，發現存在某種類似於「屁股決定腦袋」的規律，即知識分子對改革持哪一種意識形態化的意見，完全取決於他們所處的地位。那些身處京城但為改革的局外者或在京外很少與西洋接觸者，都持第一類觀點。主張第二類方案的人，則是身處京內局中或京外局中者，如總理衙門的官員和沿海各省督撫，他們為國家安全不得不講洋務^①。這一案例分析表明，如何在意識形態上解釋洋務，向西方學習能在多大程度上納入儒學經世致用的範圍，取決於士大夫在實際工作環境中是否受到西方壓力。這樣就造成了一個用傳統一體化結構推行現代化不可避免的悖論：當傳統意識形態和一體化結構還未解構之時，大多數士大夫都不會受到西方文明的壓力，這樣意識形態保守派必定佔了士大夫之多數。

註十八 中國人留學日本狂潮自甲午戰敗始，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發展而不斷高漲。由於當時留日學生既有官派，也有自費，加上流動性又大，因此難以對留日學生的人數作出準確的統計。一般認為，1896-1911年留日學生總人數在兩萬人以上。其年代分佈大致為，1900年以前的四、五年間，只有70-80人；1901-1903年間，可信的留日人數由200-300向500-600人、再向1,300-1,400人遞增。但

^① 石錦：〈清末自強觀的內容、分野及其演變（1840-1895）〉《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自強運動》（台灣：食貨出版社，1972）。

到1905-1906年間，有據可查的數字達到8,000人以上，還有人認為1906年的最高人數達到12,000人^②。可見它在第一次認同危機時出現，在第二次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時達到高潮。

註十九 不少學者都談到了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洋務運動是在差不多的時間、相差不大的國際條件下開始的。兩國的開放(與西方通商)均屬被動，國門都在砲艦威脅下打開，中國與日本都曾被迫與西方簽訂不平等條約，現代化均從器物層面開始^③。以機器進口為例，1889-1893年日本的機器、工具和車輛進口總值約為6,000,000日圓。而在這五年中，中國機器進口價值達3,181,000兩，當時一兩銀相當二日圓，那麼與日本進口值大致相當^④。甚至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國防現代化程度，兩國也相差不遠。據康念德(Thomas L. Kennedy)研究，1874年日本軍事工業水平與中國相當，若就艦隻數目和噸位而言，中國的海軍實力還勝過日本。日本軍事工業建立之初，和中國一樣管理支出很大，但是和洋務運動不同的是，日本新興工業生產力提高很快^⑤。可以想見，這種對比對當時中國士大夫意識形態之衝擊是何等強烈。

註二十 認同危機這一概念，白魯恂(Lucian Pye)經常運用，但並

② 劉望齡：〈1896年-1906年間中國留日學生人數補正〉《辛亥革命論文集》頁333（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林啟彥譯 頁451（北京：三聯書店，1983）。

③ 李恩涵：〈清季同光自強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比較〉《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自強運動》。

④ 費維愷：《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頁73。

⑤ Thomas L. Kennedy: *The Arms of Kiangnan: Modernization in the Chinese Ordnance Industry 1860-1895*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8).

沒有用它來特指意識形態。他認為東方現代化後進國家在西方衝擊下，人們的自我形象遭到侵蝕。而認同(identity)本是指一個人對自己性格、目標和存在根源之確認，它有助於保持人內心的平衡。因此用認同危機來表示文化失範和困惑是頗形象的。但是白魯恂發現，中國社會在受到西方衝擊時，中國人的認同感反而加強，而認同危機只發生在居住於通商口岸的少數人。因此，我們提出的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是和白魯恂的認同危機屬不同類型之概念，它們分別對應不同層面文化結構之混亂。

註二十一 戊戌政變以後一個短時間內，全國上下、朝廷內外充斥着一片反洋人且決心和西方一戰的強硬氣氛。舉一個例子，清朝本有一不成文的法，規定凡國家遭遇重大事故，必須召集親王大臣，六部九卿，舉行御前會議。像召義和團進京向洋人開戰這樣的大事，清廷連續舉行過四次御前會議，參加而見於上諭者多達七十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那麼多大臣幾乎眾口一辭，主張向西方宣戰。倘有異議，即以漢奸通敵罪名相加。據說，載漪氣焰最盛之時，曾帶人入宮想弒殺光緒皇帝，被太后阻止。正是在這種強硬氣氛中，才可能出現庚子事變。

註二十二 考察中國近現代史上反洋教(洋人)的群眾運動，可以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它們差不多均集中在1895-1900年間。在此之前和之後均不激烈。如四川教民之衝突自1860年後就開始出現，但高峰卻在1898年，此後不再有重大教案發生，四川人民反教情緒大為低落^⑥。又例如山東省，反洋教也集中在1895-1900年間，義和

^⑥ 呂實強：〈晚清時期基督教在四川省的傳教活動及川人的反應，1860-1911〉《台師大歷史學報》第4期（台北：1976）。

團平息後，山東地區很少再有反教事件發生^⑥。1900年出現的義和團運動絕不是一個偶然現象。它出現的原因是社會結構性的，也就是和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直接相關。毫無疑問，在基督教傳播過程中，教民、洋人和中國當地居民的對立是難以避免的，但是這種文化對抗會不會成為義和團式的排外運動，則取決於社會的組織者，即士大夫和農村廣大紳士的態度。四川和山東案例研究表明，反洋教群眾運動興起，後面多半有官員支持並有地方紳士為後盾，他們成為群眾運動的組織者和推波助瀾者。因此，我們可以說，反洋教群眾運動與士大夫和紳士對第一次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的反應有關，它出現在1895-1900年這段時間內決不是偶然的。這段時間正好是第一次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爆發，導致政治改革失敗、意識形態強硬派興起之際。這種強硬愚昧思潮具有普遍性，它的後果就是引發全國性反洋人群眾運動。1900年後，第二次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爆發，意識形態發生極大的改變，民族主義有了新的表現形態，反洋教運動也就衰落了。

註二十三 庚子事變帶來局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的第二次爆發，常被學術界忽略。事實上，相當多的士大夫在庚子事變後，思想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變化，其政治改革方案比戊戌維新時的康有為還要激進。我們可以舉出不少例子。例如在戊戌政變時以保守聞名、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在庚子事變後曾致電劉坤一等八人，主張「西法最善者，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法也」，提出一種紳民選各州縣長官的官員民選制度。1901年為張之洞思想最激

⑥ 張玉法：〈清季山東地區的中外交涉〉《近史所集刊》第9期（台北：1980）。

進的時期，和前幾年相比，簡直判若兩人^⑥。于式枚十分生動地形容過那段時間的普遍氣氛。他說：「光緒初年，故侍郎郭嵩燾嘗言西法，人所駭怪，知為中國所固有則無可驚疑。今則不然，告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漢唐宋明賢君哲相之治，則皆以為不足法，或竟不知有其人。近日南中刊佈立憲頌詞，至有四千年史掃空之語。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倫華盛頓所創造，盧梭邊沁孟德斯鳩之論說，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諸人訪求而後得者，則心悅誠服，以為當行。前後二十餘年，風氣之殊如此。」^⑦這段報告維妙維肖地刻劃出當時士大夫心目中理想社會模式的變化：由中國古代變為西方的憲政。

註二十四 一部分學者認為，清廷1906年以後宣佈的立憲改革是迫於廣大士紳壓力的假立憲。事實上，一種制度普遍的變遷很難從動機上去考察而認為它是真的還是假的。一位學者研究指出，清廷的立憲之所以長期被認為不是出於真心，這是因為清廷立憲的目標模式和廣大士紳的想法不同。清廷的理想社會模式為增加國家力量，和強化中央權威，紳士和地方的立憲目標為擴大政治參與和地方權力。這種差異表現在二者企圖引進不同國家模式之上，如士紳大多主張採用英美政治制度^⑧。它表明，意識形態社會觀的變化必然引發一體化結構政治制度的變化，不同的模式表示不同的改革方向，兩個目標的衝突也是一體化結構從內部出現斷裂的原因，詳細分析參見本書3.6節。

^⑥ 蘇雲峰：〈張之洞的中國官僚系統民主化構思——對張之洞的再認識〉《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8期（台北：1989）。

^⑦ 〈出使德國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奏考察憲政謹擬辦法宗旨摺〉《政治官報》第37號 頁9-10（1907年10月26日）。

^⑧ 劉紀曜：〈清季的政治權威危機與憲政意理的形成〉《台師大歷史學報》第6期（台北：1978）。

第三章 一體化結構解體的邏輯

凡重要的事情，
從前都被沒有發現它的人講過。
——艾爾弗雷德·諾思·懷特里德

3.1 王權衰落與地方主義

也許沒有其他近代史事件像1898年的戊戌變法那樣給人造成如此錯誤的印象了。我們常常會聽到一種歷史感慨：如果慈禧太后不是那麼保守和腐敗，戊戌變法能夠成功的話，中國也許不會有這麼多苦難，它會和日本經歷明治維新一樣迅速實現現代化。實際上，這種議論是不了解1903年以後清王朝的變化。自1901年局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加劇後，清廷所實行的改革比戊戌變法時的方案要大膽激進得多。雖然慈禧太后並沒有撤消1900年以十萬兩銀子捉拿康有為、梁啟超等流亡知識分子的通緝令，光緒皇帝仍然被軟禁，但是本世紀初年開始的新政卻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政治改革。它帶來的結果是眾所周知的，這就是大一統王權被推翻。

本章，我們繼續證明超穩定系統在受到西方文明衝擊後基本的行為模式，即防衛現代化失敗導致意識形態局部認同危機後，不管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如何推動政治結構變遷，它的結局只能是一體化上層組織的解體。我們企圖展示一體化組織解體的邏輯：即使1898年戊戌變法成功，也無法改變超穩定系統在對外開放條件下的行為模式，充其量，它只是把1905年以後中國社會的變遷提前六年而

已。社會仍遵循着一體化解體和意識形態爆發全面危機的軌道走下去。

為甚麼全面改革會導致官僚組織解體呢？意識形態的變異雖然可以轉化為一體化推行改革的動力，但它的直接後果卻是削弱了大一統官僚機構的組織基礎。一體化結構是建立在意識形態認同之上的，認同危機帶來的社會觀內容的改變立即導致其上層組織凝聚力減弱。首先是地方主義的膨脹。本來，儒臣對大一統之認同是各級地方政府服從中央之機制，現在大一統國家學說被憲政和地方分權取代。地方主義找到合法性根據，地方政府可以明目張膽地與中央對抗。

晚清地方主義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1900年庚子事變時的「東南互保」。我們在2.7節已分析過，戊戌變法失敗後，義和團反洋教運動是儒臣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大爆發的導因。這在儒臣對中央和地方關係上表現的最為急切。當時，八國聯軍攻勢兇猛，而慈禧太后草率對外宣戰，她相信中央致各省督撫「保守疆土，接濟京師，聯合一氣，共挽危機」的通諭，可以調動地方勤王之旅。但是，兩江總督劉坤一收到勤王救駕命令後，卻先去和盛宣懷及居住在南通的狀元張謇商量。張謇認為保國必先保東南，即保家鄉^①，劉坤一大為贊同。接到盛宣懷電報後，張之洞、劉坤一決定東南互保。這種做法立即得到十三個省的響應。劉坤一（兩江總督）、張之洞（湖廣總督）、李鴻章（兩廣總督）不但不揮師北上護駕，反而協商與各國簽訂「兩不相擾」的互不侵犯條約^②。這種在國防軍事行動上抗拒中央指令，在外交主權上擅自做主的非分之舉，在傳統政治體制中是不可思議的。用胡春惠的話來講，「這些省份儼然已非清帝國轄下省

① 左舜生：《中國現代名人軼事》 頁63（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

②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 頁20-21（台北：正中書局，1983）。

份，而是各自獨立的列邦。」^③在儒家國家學說中，保國與維護大一統在意識形態上是劃等號的，當中央皇權受到威脅，發兵勤王、保衛中央就是保國。儒家社會觀受到衝擊，儒臣所認同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就處於混亂狀態。張謇和劉坤一的思想反映了意識形態認同危機使他們做出和歷代儒將忠君勤王完全不同的舉動。

張謇認為愛國應先愛其家鄉，家鄉不能自保時就不能發兵勤王。當時這樣的思想十分普遍。1902年歐榘甲在〈新廣東〉一文中就這樣論證：「愛國者，不如愛其所生省份之親，人情所趨，未可如何也。」^④楊守仁1903年在日本印行的《新湖南》中，更是慷慨陳詞：「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鐵血相見，不懣不竦，此吾湖南人對於湖南之公責也，抑亦吾湖南人對於漢種之公責也。」^⑤從愛鄉推及愛省，然後才是愛國的思想方式，正是大一統國家學說認同被破壞、儒生從儒家親情出發來理解新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之表現，它無疑是地方將領在中央危難時發動各省自保的基礎。因此，意識形態的認同危機，使地方主義成為清末普遍潮流。正如胡春惠所說：「『省』已成為牢不可破之地域意識。」^⑥當時梁啟超大力鼓吹湖南自立，認為在大清帝國無法抗拒列強瓜分中國條件下，「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後中國有一線之生路」。孫中山認為中國面積相當於有眾多國家的歐洲，各省也應有獨立的自主權。所有這一切都證明意識形態認同危機雖推動清廷新政，但兩千多年來牢不可破的大一統信念卻在瓦解之中了。

③ 胡春惠：〈辛亥革命與地方勢力〉《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下冊 頁1330-1332（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81）。

④ 歐榘甲：〈新廣東〉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頁2（台北：經世書局，1981）。

⑤ 楊守仁：〈新湖南〉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

⑥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頁39。

一體化上層組織是以皇權為核心的大一統中央政府。意識形態認同破壞在打擊大一統中央政府的同時，也削弱了皇權的合法性，中國出現日益嚴重的權威危機。王亞南在對中國官僚政治的研究中指出：封建社會皇權有三大支柱，第一個是萬古不變之天道（它基於哲學觀）；第二個是大一統思想（它是社會觀）；第三個是儒家綱常教義（它來自把國家看作家庭同構的意識，即儒家倫理的延伸）^⑦。哲學觀和社會觀發生認同危機，皇權意識形態支柱由三條減為一條，權威合法性基礎大大減弱。即使儒家倫理繼續成為皇權合法性的基礎，但滿清是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它能否代表儒家倫理綱常所說的道統是可以發生爭議的。自1901年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摧毀皇權在社會觀和哲學觀上的合法性支柱後，認為滿清無權代表中國道統的觀念便抬頭了。很多知識分子已經不再相信盛行一時的「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保國必先保大清」的說教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應運而生。1905年8月，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明確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不承認清朝在道統上的合法性。當時梁啟超辦的《新民叢報》和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展開大論戰，爭論的實質正是清朝在道統上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問題。梁啟超持立憲派主張，認為中國的危機在於社會制度，而不在於滿清統治，因此主張進行政治、經濟制度的全面變革，而不提倡推翻滿清朝廷的革命。《民報》的汪精衛、朱執信認為：自滿清入關後，中國已亡，清王朝不具有道統上的合法性，而且滿清為貴族政府，滿人沒有立憲能力^⑧，中國要推行社會改革，就必先進行

⑦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頁7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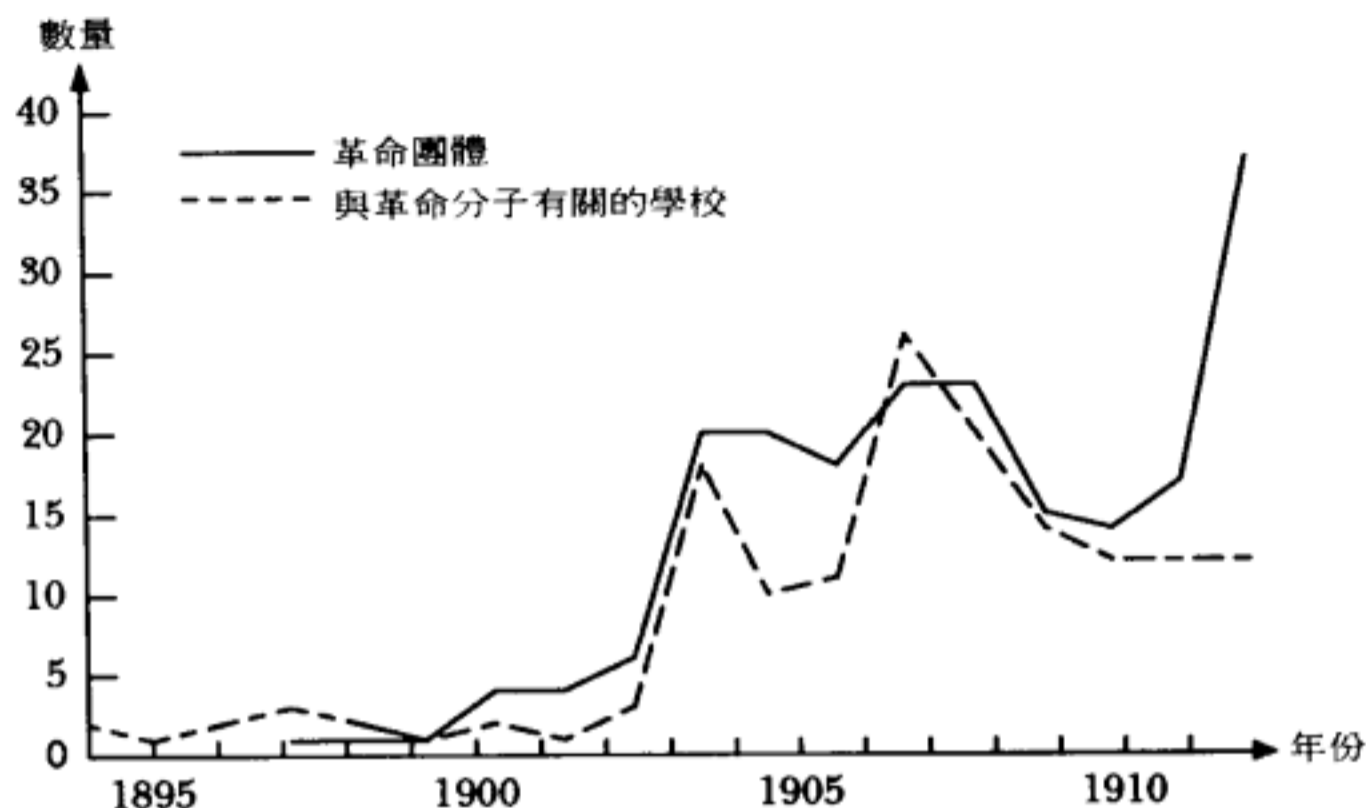
⑧ 朱滋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民報」個案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50（以下簡稱近史所專刊） 頁76-78（台北：1985）。

種族革命。1902年4月26日，為紀念南明永曆帝覆亡242周年，著名知識分子章太炎、秦力山等人發起大型紀念會，在日本留學生中引起巨大震動^⑨。鄒容更明確指出「欲禦外侮，先清內患」，以極大的熱忱寫了《革命軍》，呼喚推翻滿清的天翻地覆的大革命。陳天華則斥清政府為「洋人的朝廷」，並以自殺來抗議清廷賣國。

我們可以看到1901年後有一種有趣的文化現象：宣傳西方政治哲學、文化學說的名著，如盧梭的《民約論》、赫胥黎的《天演論》，居然與鼓吹反清復明和抵抗外族的民族英雄史可法、鄭成功、文天祥、岳飛的書刊同時風行。它十分形象地反映了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是如何消解皇權三個基礎的。西方學說可以作為中國正統意識形態的社會觀和哲學觀受動搖後的替代品，並進一步消解皇權的兩根柱石。而當儒家倫理綱常仍作為皇權的第三根支柱時，能動搖它的只能是排滿種族主義和傳統漢民族正統觀念。將排滿種族主義與西學結合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雖然宣傳排滿復明、以漢民族為道統和推崇新的西學如此不協調，但它們卻能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擴大而興起，與西學互相激盪，成為衝擊滿清王朝統治合法性之潮流。我們可以用革命社團發展為指標，來刻劃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如何動搖以皇權為核心的一體化上層組織。從圖3.1可見，革命社團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出現而產生，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發展中不斷高漲，它如同越來越多的小地震，震撼着一體化上層組織的大廈^⑩。

⑨ 〈章太炎與支那亡國紀念會〉《革命逸史》初集 頁57（商務印書館，1945）。

⑩ 此圖是根據李炳南著《辛亥革命起因之分析》（碩士論文，正中書局1987年）頁144中的表4-1提供的數據繪製。而這張表格，又是李炳南根據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近史所專刊32，1975）一書的統計而做出的。



據李炳南：《辛亥革命起因之分析》提供數據繪製，頁144，表4-1
（台北：正中，1987）。

圖3.1 晚清革命社團(1894-1911)

3.2 清末新政：舊體制的自我摧毀

僅僅用意識形態局部認同危機動搖了一體化上層組織之基礎，並不足以證明王權必然被推翻。因為，局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僅波及哲學觀和社會觀，尚未觸動意識形態的核心——儒家倫理，綱常名教仍作為皇權基礎，一體化上層組織雖被削弱，但還沒有到非推翻不可的地步。排滿革命派只是少數，社會組織者的絕大多數是立憲派。立憲派多達數十萬人，他們要求清王朝雷厲風行地推行新政，承認清廷道統的合法性。一體化的解體，主要是因為學習西方社會政治經濟模式被納入官方指導改革的藍圖，造成了一體化結構的第一重調節機制的破壞。本來，清政府對社會的調節方向是由歷

代太平盛世經驗概括而來的「仁政」模式所規定，而現在新的社會政治經濟模式進入官方意識形態，一體化調節方向不再服從「仁政」，而由向西方學習的目標所決定，調節方向來了個一百八十度轉向，這才是加速一體化組織自身解體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們去分析1905年前後清廷實行新政的各方面內容，確實可以看到，在經濟、意識形態和政治每一個領域中，它和傳統「仁政」方向恰好相反。「仁政」對經濟結構調節是重農抑商，這不僅是控制商品經濟發展、防止土地兼併之措施，還使社會組織者——儒生——盡量少受商業污染，而他們的社會生活主要領域在農村，則是一體化上層組織和中下層組織能有效接口的保證。現在，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傳統耕讀社會，不再是意識形態所主張的理想模式，中國必須學習西方發展工商業，重農抑商一下子轉變為鼓勵新式工商業。1903年4月，清廷派載振、袁世凱、伍廷芳制定商律，俟商律編成即設商部。各大中城市紛紛成立商團、商會。1903年底，商部奏准頒行《獎勵華商公司章程》。清末的重商主義在中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從它對商人的獎勵政策就可見一斑。重商主義運動在1906年10月達到高潮。清廷商部（一個月後改名為農工商部）頒佈了勳商章程，依據投資現代新型工業的數額大小，分別封授不同等級勳號和官階品銜。凡投資2,000萬元以上者，不但可以被封為一等子爵，還可以當農工商部的頭等顧問，並賞以一品頂戴及雙龍金牌。投資在80萬以上、30萬以上、10萬以上者，分別授於三品、四品、五品銜[註一]。當年曾國藩以平定太平天國之功，只不過封了個一等侯；李鴻章辦了半輩子洋務，僅僅是一等伯^①。可見，傳統的以官抑商，一下子轉變為以官位等級獎勵商人投資了。

^① 陳李順妍：〈晚清的重商主義運動〉《近史所集刊》第3期 上冊（台北：1972）。

這與歷史上封建王朝末期盛行的賣官鬻爵根本不同。賣官鬻爵是商人把錢給國家以交換官位，以解決國家財政危機，而清末新政商人的投資仍屬於他們私人，它是一種鼓勵商業資金向新型產業轉化的重商主義政策。

一體化調節方向之轉向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表現就是興辦新學堂。眾所周知，「仁政」在思想意識上的表現除了表彰孝子、節婦外，主要是重視以儒學為內容的傳統教育和對社會的教化。據張玉法統計，十九世紀末以前山東省各縣的私塾達數千家。農村歷來是培養中國知識分子的基地，現在必須在城裏辦新式學堂。據說，戊戌變法時光緒皇帝提出改寺觀為新學堂，結果連北京菜市口賣菜的老頭都破口大罵：「自古的寺觀如何能改為學校」？其實，改寺觀為學校大約是康有為等知識分子煞費苦心想出來的。熟悉十三經、背誦孔孟聖人之言的儒家文化教育是可以通過私塾來實現的，但教授科學、經濟等分科甚細的專業知識則必須把學生集中到新學堂去。學堂一般只能設在城裏，利用寺觀或其他公共場所[註二]。二十世紀初清廷新政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興辦新學堂。清廷規定每個省府一定要有中等程度的新學堂，凡縣城必設初等程度學校。在傳統體制中，也存在為儒生進一步深造而設立的書院及其他教學機構，但它們的數量不多，只是分散於廣大農村儒學教育之點綴，整個意識形態教化、精英分子培養都以農村為中心。現在一切都倒了過來，新式教育變為以城市為中心[註三]。

政府調節方向逆轉最重要的表現，就是1905年正式廢科舉。本來科舉制是以儒家意識形態為標準選拔社會精英的制度化保證，它是維繫一體化組織以鄉村動員(組織)為中心的重要制度。當儒家文化教育基地以農村為中心，知識分子由私塾、家庭教育培養時，以鄉試作為考試基本單位的科舉制是完全與這種教育制度配套的。意識形態的哲學觀、社會觀發生了改變，西方科學知識、社會政經制

度成為培養精英的重要內容，知識分子是由城裏新學堂培養的，清廷雖然堅持選拔具有統一意識形態知識分子為官員這一原則，但是以會試、鄉試為制度、以八股為內容之科舉制明顯地不能與此配套，也不再適用。科舉制的廢除勢在必行。

分析廢科舉的過程，可以看到意識形態內容和選拔意識形態精英的方式存在着密切的對應[註四]。早在1822年，龔自珍就撰文攻擊科舉制是「萬喙相因」的鸚鵡學語式的教育，使天下讀書人「心術壞而義理錮」^⑫。鴉片戰爭後，王韜、郭嵩燾等有識之士提倡西學，但對科舉制不可能有絲毫觸動。王德昭指出：「大抵初期的主張改革者所著意的不在制度本身，而在考試的內容。」^⑬只要一體化組織存在着鄉村組織中心，科舉制就不可能改。就連李鴻章這樣舉足輕重的大官想對科舉制做點滴改良都行不通。當意識形態發生變化、知識分子由城市新學堂培養時，為了建立以新學堂培養人才為國家官吏的制度，廢科舉的改革就勢不可擋。1903年清廷頒佈了張之洞擬定的《鼓勵遊學畢業生章程》，將中西混雜的近代教育制度中的學生、留學生等與科舉制下的功名一一做出對應。如在外國讀到博士學位的可得到翰林階，大學學士與翰林相當，大專文憑相當於進士，高中畢業相當於舉人，普通中學畢業相當於拔貢……。到1905年9月2日，「清廷接受袁世凱等人的籲請，諭令立即停罷科舉。此一立停科舉之詔，……最後結束了中國縣長的科舉取士的傳統」^⑭[註五]。

我們看到，在一體化組織方式中，意識形態是政治結構設計的藍圖。一旦出現意識形態認同危機，西方哲學和社會制度模式進入原有意識形態的社會觀和哲學觀，它會導致一體化結構調節方向的巨大變化，產生一系列不可估計的社會影響。

^{⑫⑬⑭} 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 頁168、174-175、245。

3.3 紳士城市化和新知識分子

本來，一體化調節是保證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互相耦合，而反向調節卻是破壞原有系統的耦合，我們可以把清末新政所實行的這一系列反向調節稱為結構性「自殺」。人們一定會很奇怪，為何清政府會愚蠢到這種地步，意識不到這是「自殺」呢？實際上，一開始新政不會直接破壞一體化結構各組織層次中的每一層，只是摧毀三個組織層次之間的關係，其後果很難被改革政策的制訂者和推行者預先意識到。

讓我們再來看看圖1.1所示的一體化組織三層次。對於上層官僚機構，實行新政並不會直接把它摧垮。新學堂培養的知識分子仍要學習儒家經典，選拔官員的新標準同樣要求他們對儒家倫理的忠誠。但是這一政策對於中層組織卻有不同的含義。科舉制和重農抑商造成知識分子以農村社會生活為中心：耕讀在農村，關心的事務也是農村。現在相反的調節政策使士紳不得不把城市作為生活場所。讀書做官要進新學堂，辦工商企業必須進城。社會出現史無前例的紳士城市化浪潮[註六]。紳士階層生活場所從農村轉向城市，使一體化結構的基層和上層關係出現了根本改變。

首先它使一體化三層次組織之間的關係脫節。本來紳士大多身兼三重身分：地主、讀書人和宗族族長，他們一搬到城裏，宗族組織就失去和官僚機構銜接的中介，他們對農村社會基層組織的管理功能也開始慢慢消失。紳士在城裏活動使鄉紳自治空虛，也使傳統的租佃土地收租方式隨之發生改變。第二，城市本來只是官僚機構所在地，現在它同時成為紳士主要社會活動場所。紳士掌握着農業收入之大部分，這部分經濟收入也便跟着投入商業和工業，促使城市迅速增長，擺脫傳統郡縣城市模式，向現代新型城市轉化。與此同時，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上層和中層組織的對抗也就開始了。

在官於朝、紳於鄉的傳統結構中，官僚機構的權力行使範圍和紳權行使範圍是井水不犯河水，兩者互相需要，因此可以合作。紳士進城，紳權也進入城市，同一個地域存在着兩種權力。紳士把鄉自治那一套搬到城裏，它立即和大一統官僚機構權力發生衝突，官紳合作轉化為官紳對抗。反向調節所造成的後果並不是直接破壞一體化結構三個層次本身，而是先改變三者的關係。關係改變的核心是紳士城市化，它對整個一體化結構內部造成極大衝擊。

不少歷史學家都注意到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中國紳士城市化的潮流。美國漢學家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湖北、湖南鄉紳作了詳細考察，他發現甲午戰爭以前，鄉紳關注的中心是鄉村社會秩序、教育和各種鄉間事務；甲午後，鄉紳紛紛遷居城市，在城鎮辦新學、新工商業等。他認為，這是因為「帝國主義的威脅多半出現於城市中心，所以人們必須在那裏對付它」^⑮。費正清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也注意到，鄉紳城市化是一個全國性潮流，其原因是「由於最活躍的分子進城去求學或發財」^⑯。雖然，很多歷史學家談過紳士城市化，但它對中國社會結構的整體衝擊仍未被史學界充分認識。特別是很多學者沒有看到，鄉紳城市化主要是一體化結構實行反向調節所帶來的結果。它是一體化解體的中心環節，導致傳統紳士被新知識分子取代，牽動了一系列一體化解構之鏈鎖。

這一分析可由中國城市知識分子增長曲線證實。從圖3.2、3.3可見，在1905年以前，在城裏新學堂受教育的人數不足30萬，1902

⑮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楊慎之譯 頁80 (北京:中華書局,1980)。

⑯ 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 頁6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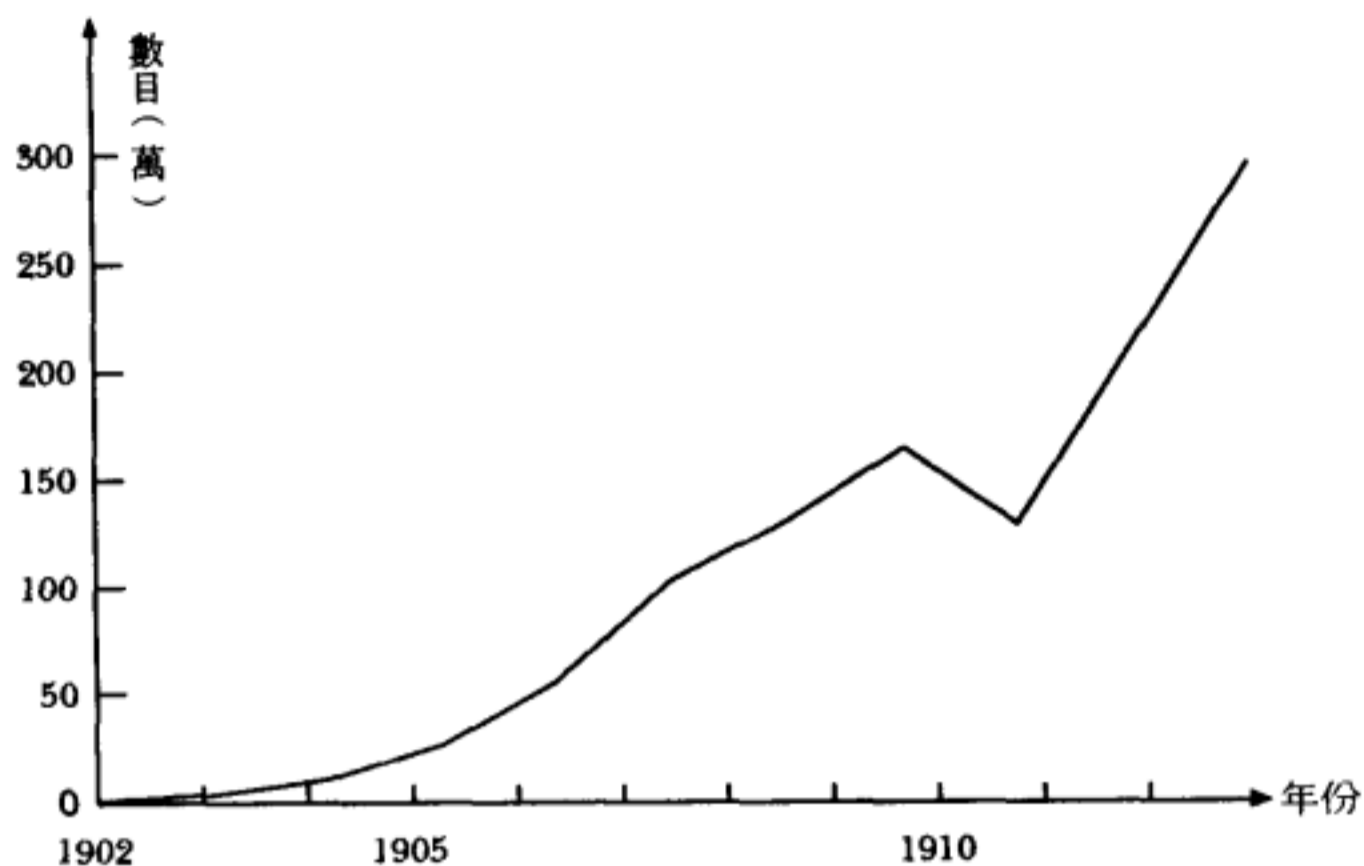


據王笛：〈清末新政與近代學堂的興起〉提供數據繪製，《近代史研究》，第3期（北京，1987）。

圖3.2 清末城市新學堂的數量增長

年前則更少^①。社會精英分子培養仍在鄉間進行。鄉紳城市化有兩個指標，一個是把孩子送到城裏讀書，另一個是關心城裏事務並且搬到城裏居住。1902年城市新學堂學生數的稀少反映了紳士城市化才剛剛開始，圖3.3表明自1905年後，新學堂學生數量如爆炸般增長。清末，有功名的士紳總數為144萬。新政才辦幾年，到1909年，新知識分子已超過傳統士紳的總數。1912年新學堂在校人數達300

^① 王笛：〈清末新政與近代學堂的興起〉《近代史研究》第3期（北京：1987）；〈清末近代學堂和學生數量〉《史學月刊》第2期（開封：1986）。



據王笛：〈清末近代學堂和學生數量〉提供數據繪製，《史學月刊》，第2期（開封，1986）。

圖3.3 清末城市新知識分子數量增長

萬，已是傳統士紳總數的兩倍。新學堂學生人數超過士紳人數，意味着中國社會精英階層分佈重心的歷史性改變。它註定了紳士鄉村自治的沒落，在精英城市化的潮流下，鄉間剩下的已是沒有培養接班人能力的、人數不斷下降的遺老們。

一體化反向調節猶如一把利劍，一下子把一體化結構攔腰砍斷[註七]。雖然上層和中下層仍然具有活力，並轟轟烈烈地推行改革，但它造成三個巨大的衝擊波，其中兩個是長期性的，二十年後才導致社會基層組織和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一個後果是短期的，它立即帶來大一統王權和官僚機構的解體。

3.4 長期趨勢：宗法家族的解體

我們先來討論長期變化。紳士城市化導致的第一個後果，就是地方紳士鄉自治的衰落和宗法家族作為農村基層組織的逐步瓦解。紳士城市化開始是紳權能力的膨脹，但時間一長，紳士住在城裏必然導致紳權在農村基層的空虛。鄉紳原本主要負責縣以下鄉村自治和宗族管理事務，搬到城裏固然有利於他們投入現代經濟和國家地方政體改革，一時他們變成了千手觀音，着手城市事務時並不放棄農村。但是，隨着時間流逝，他們的後代不再回到鄉村，鄉村的各種事務都因他們本人衰老或無暇顧及而慢慢荒廢。張謇的政治生涯是一個典型案例。他是南通人，中了狀元，在新政中扮演重要角色，無論他多麼忙碌，對家鄉事務卻從不忽視。本世紀初南通縣在全國頗具盛名，無人不曉。但隨着張謇退出歷史舞台，他的各種鄉鎮事業後繼乏人。到本世紀二十年代，南通已默默無聞，張謇興辦的各類地方鄉村改革也多埋沒在歷史的荒草之中。紳士城市化不僅是鄉村自治之衰落，還意味着一體化上層組織和基層宗法組織的斷裂。從此，宗法家族不再作為貫徹上層組織之延伸而存在。原先，宗族領袖大多身兼地方精英、退休官員三重角色。隨着地主遷居城市，他們在大眾面前擁有的道德和社會權威，以及作為表率和人望的作用，無疑受到損害^⑬。宗族變得群龍無首，大家族經濟共同體開始瓦解。當然宗族勢力並不馬上消失，但宗法家庭開始走上漫長的自然解體之路。

中國封建社會大家族解構始於意識形態認同破壞，並隨紳士城市化而加快。這種觀點有無根據呢？張玉法曾系統考察了山東省1860-1916年的社會演變。以寧海州為例，十九世紀下半葉，該州

^⑬ 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 頁634。

共有43,661戶，基本上被三十二個大族統治。每個大族有宗祠，並設有分族，由分族長統領。張玉法是用農村家庭人口不斷變小來說明半個世紀以來宗族逐漸瓦解的趨勢。到民國初年，山東省農村家庭平均人口已降到四人^①。黃宗智利用滿鐵調查材料，發現華北地區農村到本世紀二、三十年代，「極少是地緣界線與血緣界線一致的宗族共同體」^②。宗族已不再承擔中國基層政權的功能。

另一項時間跨度較長、較量化的研究，是梁作繁從考察清代後期政府旌表政策入手，依據所發生的騷亂等社會現象，來進一步分析士紳與政府的關係^③。他利用大量統計作出表3.1和表3.2。如果不考慮1850-1875年間全國性大動亂，而將1796-1849年的情況定為指數100，那麼，1876-1911年，反家庭主義的騷亂指數便是169，可見宗法家族制受到了比以前更大的衝擊。表3.2則很突出地反映

類別 \ 時間	1796-1849	1850-1875	1876-1911
全騷亂	100	866	173
反政府騷亂	100	1359	207
反家族主義騷亂	100	995	169

取自梁作繁：〈就結構功能理論來看清代後期政府的旌表政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卷10(上)，表1。

表3.1 1796-1911年中國社會騷亂程度

- ① 張玉法：《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近史所專刊43頁83-84（台北：1982）。
- ②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頁244。
- ③ 梁作繁：〈就結構功能理論來看清代後期政府的旌表政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卷10上冊 頁204，頁205（1979）。表3.1是根據論文表一簡化，表3.2根據表二簡化。

時間 群體	非官式貢獻之類別	1796-1849	1850-1875	1876-1911
紳士	護衛政府	-0.85	+0.26	-0.64
	護衛家族主義	+1.00	+0.81	-0.43
滿人	護衛政府	0	0	0
	護衛家族主義	0	0	0

取自前引梁作繁, 表2。

表3.2 1796-1911年紳士及滿人對社會秩序的非官式貢獻

出紳士態度的變化。如果將紳士在1796-1849年護衛家族主義的指數定為+1.00, 那麼1875年之前, 士紳對家族貢獻為0.81, 這時宗族仍得到鞏固。但到1876-1911年, 這個指數則急速蛻變為-0.43。這非常突出地說明了紳士對護衛家族的非官式貢獻, 已由正面的維護, 變為起破壞瓦解作用了。

農村政治制度的改變必然同時伴隨着經濟結構之變遷。鄉紳的鄉自治, 通過嚴密的宗法家族作為控制農民之基層組織, 是和傳統的地主—自耕農經濟聯繫在一起的。鄉紳地主作為鄉間事務的管理者, 是有文化的精英, 雖說以「耕讀」為榮, 但他們自己往往不直接管理農業生產, 土地大多是出租給佃戶。強大的家族宗法控制, 往往限制了無地農民去當長工。族田等經濟資源一直有利於無地農民轉化為佃農。在一體化中下層組織未解構時, 地主經濟一直被束縛在自耕農轉化為佃農軌道上。文人地主進了城, 只通過二地主或租局收租, 無地農民當長工就不再受到宗族組織的限制。一種新型的經營地主和富農經濟也就出現了。經營地主和鄉紳地主最大的差別是, 前者大多無文化, 和官方沒有很深的關係, 佔地在100-200畝左右, 他們親自安排勞動, 管理僱農生產。有的是由自耕農發家致富而成, 有的乾脆轉租城市化紳士的土地來經營, 成為二地主。他

們是趁着由紳士城市化造成的農村空虛而興起。一體化中下層組織的解構直接促使地主經濟慢慢變型[註八]。

以往學者們一談起紳士城市化對農村的影響，總是會談到農村家庭和私塾教育的退化：農民識字率反而比傳統社會更低了[註九]，有文化有教養的精英階層退出，無文化的小地主佔領鄉間，鄉村成了一個被精英遺棄、管理日益混亂的地區。但他們一直忽略了一個極為重要的事實，這就是經營地主比鄉紳地主能提供更多的商品糧。如果將甲午以後興起的經營地主所能提供商品糧的比率與傳統租佃地主進行比較，可以看到，前者佔全部糧食的十分之三，而後者佔十分之七^②。同樣土地所能提供的商品糧數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且，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還出現了一些經營大土地的墾殖公司。它們是在清朝政府開放禁墾區、放墾官荒以後，一些官僚、地主、資本家包攬官荒所建立起來的。1902年以前建立了四家，至1912年，全國已創辦171家。這些墾荒公司許多採用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③。自耕農本有自給自足傾向，在地主經濟結構中向城市提供商品糧的主要靠地主一佃農成分。地主經濟所提供商品糧比率太低也就限制了中國封建社會城市成長的規模。現在，紳士城市化促使一種能生產更多商品糧的經營地主和資本主義式的大土地經營者興起，地主經濟的變型恰恰是中國近代城市能不斷壯大並脫離傳統軌道的一個結構性條件。表3.3為中國近現代糧食商品率，1840年，地主經濟標準形態中，商品糧只是總產量之10%。1895年後，我們看到商品率的逐步提高，這與地主經濟變型、經營

② 景甦、羅崙：《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 頁145（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

③ 史全生主編：《中華民國經濟史》 頁44（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

時 間	糧食的商品率
1840	10 %
1894	16 %
1919	22 %
1936	30 %

據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述略〉提供數據製表，〈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頁125（上海：復旦，1984）。

表3.3 中國近現代糧食商品率(1840-1936)

地主富農興起直接有關。因此，紳士城市化另一個長遠後果就是它促使中國近代城市的發展。

3.5 城市興起與紳商資本主義

紳士城市化不僅是精英階層由農村、小縣城流向省城和通商口岸，它還是一個紳士擁有的資金向城裏聚集、轉化為工業商業投資的過程，這無疑造就了城市和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巨大推動力。在洋務運動中，清廷提倡官督商辦搞工業化三十年，鄉間的紳士響應者寥寥無幾。一旦出現紳士城市化，官督商辦便雷厲風行地推開了，中國出現了一個紳商辦公司、搞投資的熱潮。一開始他們與地方政府合作，遵循官督商辦模式，後來乾脆由有功名的紳士自辦，紛紛把屬於國家的官僚資本轉變為紳士（及官僚）私人的資本。清廷推行新政後十年間是紳士私人資本發展極迅速的時期，紳士投資企業總額很快超過了洋務運動三十年國家投資量。林增平統計了這段時間新設的資本在一萬元以上的工礦業，得到表3.4。從中可見，

類 別	廠礦數	資本額(千元)	佔總資本的 %
商 辦	463	90,792	76.3
官辦和官督商辦	86	29,496	23.7
合 計	549	120,288	100.0

取自林增平：〈論民族資產階級上層與清末立憲派〉，〈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人民，1982）。

表3.4 1895-1913年近現代企業的構成

商辦所佔份額已高達76.3%。在洋務運動時期，官辦是現代企業主導的組織方式，1872-1894年間有資本額可查的七十二家近代企業，官辦和官督商辦佔到總資本額的77.6%，商辦只佔22.4%。清廷推行新政後，兩種類別的企業的資本額的比例，恰好互相對換了位置。這表明：隨着紳士在農村擁有的資本深入城市，以及城市化紳士把官僚資本變為官僚紳士的私人資本，現代企業組織方式迅速轉化為商辦佔主導地位[註十]。

一些學者認為私人企業佔主導地位意味着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從此興起，民間資本超過官僚資本。實際上，這一概括並不十分準確，當時興起的工業既然主要由城市化紳士所掌握，它只能處於官僚資本與民間資本的中間階段。陳錦江(Chan, Wellington K.K.)的研究指出，清末最後十年中，私人企業的創辦者大多是地方有功名的紳士，很多是現任或退休官員，並非真正的商人和民間實業家^②。汪熙統計了清末十大行業中300個創辦者的出身，發現在1913年以前創辦的企業中，創辦者差不多半數是官僚地主(紳士)；只有到1913年以後，即一體化結構解體以後，真正的商人才在創辦

^② Chan, Wellington K.K.: *Merchants, 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者中佔明顯的比例^⑤[註十一]。因此我們可以把1895至1911年由紳士城市化而締造的近代經濟形態稱為官紳資本主義[註十二]。

大量原來分佈在農村的社會精英和資本突然流向城市，無疑會使大城市迅速擴張。紳士城市化帶動的工業化和城市發展機制，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國近代城市頗為奇特的發展趨向。照理說，自超穩定系統對外開放，特別是洋務運動開始後，對外貿易的發展會導致通商口岸不斷擴張，但是事實並非如此。1895年前對外開放只是促使通商口岸周圍小市鎮數目的增多，通商口岸本身變化較小。上海是個典型的例子。表3.5為上海縣歷代人口統計資料，一直到1881年，上海也不過只有五十多萬人，比1810年增加有限^⑥。但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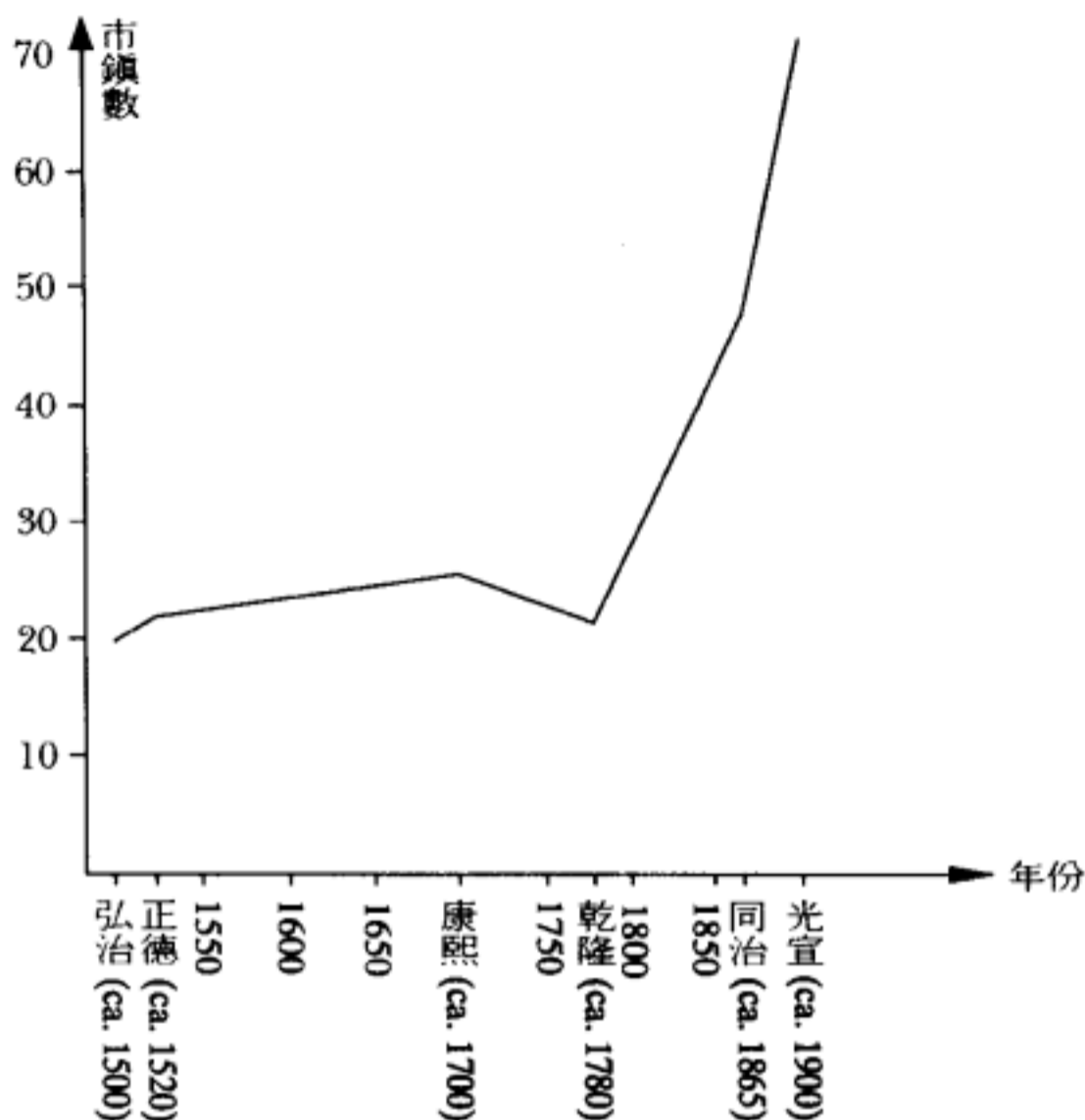
年 代	人 口 數
1810	527,472
1813	582,442
1816	529,249
1852	544,413
1864	544,357
1865	543,110
1881	545,036
1908	1,264,643
1909	1,290,984

取自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頁10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7）。

表3.5 十九世紀上海縣人口變動

⑤ 汪熙：〈關於買辦和買辦制度〉《近代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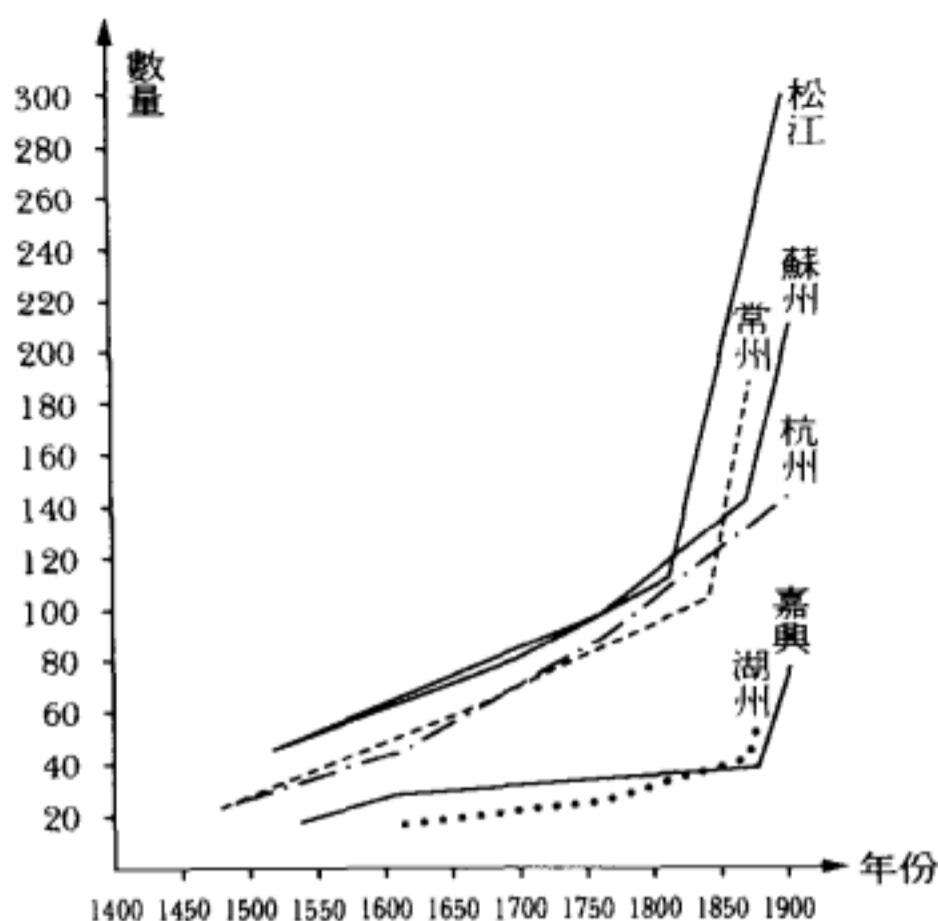
⑥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頁100。



取自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頁9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7）。

圖3.4 明清兩代上海縣市鎮增長

海縣的市鎮數目自1865年後卻急驟增加(圖3.4)。圖3.5表明，湖州、嘉興、常州、蘇州等地也是如此。(除松江市鎮數量發展較早外，其餘各地市鎮的大量增加均為十九世紀下半葉後的事。)而通商口岸本身的大發展則是在1895年後突然出現的。從1895至1920年的二十五年中，上海人口急速增長，從五十萬迅速發展到約三百萬，上海不僅成為國內的商業、工業和金融中心，還是中國和西方世界來



取自前引劉石吉，頁156。

圖3.5 明清時代江南市鎮數量變動

往接觸的匯集點^⑳。考察天津、武漢等通商口岸發展的模式，可以發現存在着類似規律[註十三]。確實，「十九世紀最後幾年和二十世紀最初幾年，是中國主要城市迅速發展成長的時期，城市人口（特別是在主要通商口岸）以3.5–9.8%的年增長率增長，它大大超過0.4–0.5%的人口每年平均增長率。」^㉑為甚麼通商口岸要到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頭幾年才開始大擴張，而在這之前對外開放帶來的只是通商口岸周圍的傳統市鎮之增加？表面上通商口岸的成長只取決

^⑳ 帕克斯.M.小科布爾(Parks M. Coble, JR.):《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 1927–1937》 蔡靜儀譯 頁1–9 (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7)。

^㉑ 周錫瑞:《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 頁144。

於對外開放和外國資本侵入程度，但在超穩定系統中，它的發展速度和一體化結構是否開始解體直接相關。當一體化結構穩固時，它難以自由發展。1895年，中國對外開放已半個多世紀，外國在中國的投資還只有2,791萬元，佔洋務運動中中國自己投資的四分之一弱^⑳。那時，清廷在城市和通商口岸有種種規定，如不准外國人在那裏開廠設公司。通商口岸均處於一體化結構的控制之下。

墨菲(Rhoads Murphey)早就注意到西方列強在中國設置通商口岸和其他東方殖民地的不同。他發現，十七、十八世紀西方殖民者在選擇通商口岸時，有意避開了殖民地國家原有的城市和商業中心，往往是建立新城市，並在新城市發展出一整套資本主義制度。這種政治、文化、經濟上新形態的通商口岸城市，基本上與傳統母體脫離並對立，如印度和東南亞的城市果阿、巴達維亞、馬德拉斯、加拉、孟買、加爾各答、檳榔嶼、新加坡等都屬於這一類型。但中國是個例外。中國的通商口岸都設在原有的商業貿易中心附近，並沒有形成一種新型的異質文化和制度(租界除外)。為甚麼同樣的西方殖民者(有時甚至是同一家公司)在中國採取完全不同的做法呢？墨菲認為，這是因為中國封建社會早在西方勢力侵入之前，就已經具有相當發達的商品經濟。用作者的話來說，當時中國在政治和軍事上雖然比西方弱小，但在經濟抵抗力上仍然相當強大。中國商人很會做生意，而且有相當成熟和發達的商業流通系統和制度，西方商人如果另建新城市，就難以與中國商人競爭^㉑。

通商口岸只能利用原來的商業網、原有的城市，這就使得它處於一體化結構控制之下，其成長速度取決於一體化結構的調節控制

⑳ 黃如桐：〈試論洋務派企業的性質和作用〉《中國社會經濟史論叢》第二輯。

㉑ 墨菲(Rhoads Murphey)：〈通商口岸與中國現代化：走錯了哪一步？〉《中國現代化歷程》(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

能力的強弱。在清末推行新政前，一體化尚未解體，通商口岸發展受到抑制，對外開放只是促進中國地主經濟結構中商業和市鎮發展的因素。也即在意識形態認同破壞前，通商口岸主要是促進了原有商業網的發展，其結果是通商口岸周圍的市鎮急速增加。只有在出現反向調節、一體化上層組織解體過程中，不僅有利於外資大量湧入，而且紳士資金也大量流入通商口岸，這才出現通商口岸城市快速成長時期。在清廷推行新政以後十年左右，通商口岸城市超過了傳統郡縣城市，成為中國最發達的地區[註十四]。

在一體化結構中，郡縣城市本來是一體化官僚機構控制的樞紐，是行政和商業中心。現在新興大城市性質開始改變了，它成為新知識分子、企業家薈萃之地，是中國政治文化中最多元化的地區。紳士代表地方利益，和官方的對抗形成權力制衡，而官方勢力達不到的外國租界則成為革命團體和非法民間刊物的保護傘。新學堂本為政府所倡辦，但學者聚集在那裏讀禁書，搞學運，組織革命社團。城市在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地成為顛覆中央政府的基地。

3.6 辛亥革命：紳權與王權的對抗

紳士城市化帶來的兩個長期效應，並非當時就顯示出來。我們之所以勾出其主線，是便於讀者理解一體化解構造成中國二十世紀頭二十多年社會變遷的背景，和超穩定系統在對外開放條件下的進一步行為模式。現在我們要回到本章的中心，討論紳士城市化如何在短時間內表現出最強大的衝擊力，這就是紳權進城後和官僚機構相對抗，它成為推翻清王朝、瓦解一體化上層組織最重要的社會勢力。今天人們一提起推翻清王朝，就會想起孫中山一次又一次鏗而不捨的武裝起義。人們常常會感到奇怪，為甚麼孫中山多次組織嚴

密的舉事全部失敗，被清廷輕而易舉地鎮壓，但和同盟會中央領導組織關係不甚密切的武昌革命卻推翻了清王朝？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革命團體的增加和對新軍滲透是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是，這個因素並不一定是關鍵性的。圖3.1表明，1908–1910年革命團體組織數反而比1907年有所下降。實際上，清王朝瓦解的一個重大原因是1909年在全國各地成立諮議局。

表面上看，各省地區的諮議局是清廷新政中摹仿西方政治制度成立的地方議會組織，但很大程度上它卻是城市化紳士把原來鄉自治那一套傳統帶到城裏。按照諮議局章程規定，凡屬本省籍貫、二十五歲以上的男子，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即有選舉權：（一）在本省地方辦學務及其他公益事務滿三年以上並卓有成績者；（二）在國內外中等以上學堂畢業並獲文憑者；（三）有舉貢生員以上之出身者；（四）曾任實缺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參革者；（五）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營業資本、或不動產者（非本省籍貫，寄居滿十年以上，如有一萬元以上的營業資本或不動產者亦得有選舉權）。這些條件固然使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與資產者得以參政，但更主要的還是為那些擁有功名的紳士大開方便之門。據張朋園對全國二十一省的1643名議員身分的統計，得到表3.6，從中可以發現，約80%的議員具有傳統功名，其中進士佔4.35%，舉人21.27%，貢生28.73%，生員34.78%。當時全國紳士總數為145萬人^①，正好與有資格參加選舉的登記選民167萬人大致相近^②。而選民佔總人口的比例僅為0.42%，與歷史上紳士佔總人口比例十分相近。清廷決定諮議局議員名額時，也是以科舉取進學額的5%為標準。選舉過程

① 張朋園：〈民主政治的嘗試——清季諮議局議員的選舉及其出身之分析〉《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自強運動》（台北：食貨出版社，1972）。

② 耿雲志：〈清末資產階級立憲派與諮議局〉《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

省份 功名	奉 天	吉 林	黑 龍 江	直 隸	江 蘇	安 徽	浙 江	福 建	湖 北	山 東	河 南	陝 西	四 川	廣 東	貴 州	共 計	%
進士	3	0	0	5	8	2	4	4	8	5	9	3	2	3	0	56	4.35
舉人	7	2	0	34	30	14	22	24	15	20	26	11	32	25	12	274	21.27
貢生	22	9	1	33	41	32	40	19	41	20	19	24	25	29	15	370	28.73
生員	12	8	10	69	38	25	36	28	28	52	38	20	55	18	11	448	34.78
其他	9	11	19	14	9	10	9	3	5	6	4	8	12	20	1	140	10.87
合計	53	30	30	155	126	83	111	78	97	103	96	66	126	95	39	1288	100

取自張朋園：〈立憲派的階級背景〉，《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武漢，1991）。

表3.6 十五省諮議局議員的功名背景

與公民投票不同，更像傳統的推舉。很多地方是指導投票，「名為民選，實自官派」^③。由此可見，充當清末立憲運動的發起者、參與者大多為紳士。正如李國祁所評價的那樣，這種現象本質上是中國傳統社會紳權之擴張^④。諮議局實際上是城市化紳士建立的組織，他們企圖把原來在縣以下鄉村的官紳合作自治的模式搬到城裏，建立自己的政治共同體[註十五]。

要知道，在一體化結構中的上、中、下三個層次組織中，上層官僚機構一般不代表地方利益，皇帝對縣官有任免調動權，縣官的高度流動和不在原籍做官的迴避制度，是防止官僚機構變為地方利益代表的措施。而一體化中層鄉紳自治從來都是代表地方利益，並與中央國家利益盡可能協調的。在紳士城市化之前，即使地方利益和中央利益發生衝突，紳士自治只能代表縣以下地區，組織程度也

③ 張朋園：〈民主政治的嘗試——清季諮議局議員的選舉及其出身之分析〉《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自強運動》。

④ 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台地區》近史所專刊44 頁606（台北：1982）。

不高，地方利益不可能和中央利益直接對抗。紳士城市化則把紳權擴展到府城和省城，在各地建立的各級諮議局，馬上使得有一個機構來代表各地地方利益了。有些學者把諮議局看作地方利益的具體化^⑤。其實稱其為地方利益的組織化和擴大化也許更為妥切。它立即帶來兩個後果：首先是原來潛伏在民間沒有組織的地方利益和中央政府之矛盾轉化為一種體制內的對抗——諮議局和政府機構衝突；第二，一旦中央政策損害了一省或數省紳士的利益，諮議局就會帶動社會掀起反中央政府的群眾運動；它和革命黨配合，摧垮本來已十分脆弱的中央政府。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並很快得到各省響應，正是紳士城市化後，地方勢力合法化並在體制內和中央王權衝突的符合邏輯的展開。

諮議局一成立，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經常和政府意見不一致。諮議局是由傳統官紳合作模式改進而來，官紳合作基礎是意識形態認同，意識形態認同遭到破壞，諮議局只有在地方利益與一體化官僚機構所代表的中央一致時，才會與各級政府機構合作。耿雲志考察了山東省諮議局第一屆常會後議案的執行情況。在被調查的六項議案中，只有維持銀號錢業案執行得較好，其餘議案執行情況都很差^⑥。很明顯，執行較好的議案正因為是維護了地方紳士的利益。在大多數場合，地方紳士和中央政府利益並不能一致，衝突越來越厲害。

1910年，浙江省鐵路總理湯壽潛因維護地方利益被清廷下令革職。浙江省諮議局便以「停議待旨」的方式上書中央，與中央抗爭。理由是，「事關本省權利存廢事件，應在諮議局權限之內」。這種由

^⑤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和聯省自治》 頁11。

^⑥ 耿雲志：〈論諮議局的性質與作用〉《近代史研究》 第2期（北京：1982）。

諮議局出面為地方利益向中央抗爭的局面，是中國歷史上極為罕見的。諮議局與清政府不合作甚而抗爭分權的行動，刺激了清廷在立憲改制名義下加強中央集權。1910年11月各省督撫與諮議局聯合籲請中央盡速頒佈憲法，組織內閣。1911年5月，清廷匆忙推出滿漢四（另有一蒙古人）的「親貴內閣」，6月諮議局聯合會便呈請另組內閣；7月，更指責皇族內閣不符合君主立憲公例。中央與地方的矛盾白熱化了。正好在這種關頭，中央政府將原來決定官督商辦修建鐵路事業的權力收回，改作國家辦理，它一下子觸動了全國紳士的經濟利益，辛亥革命爆發了！

只要我們去追溯1911年武昌起義整個過程之因果鏈，就可以發現它起源於5月的鐵路風潮。其原因是紳權與中央政府因經濟利益衝突出現了全國性對抗。在推行新政中，清廷要修建鐵路，而國家又無經費，不得不允許紳商投資商辦。1904年四川總督錫良奏請清廷批准紳商自行籌資修建自成都到宜昌的鐵路。但1911年清廷決定向英法德美四國借款來辦川粵漢鐵路，把原來批准由四川商辦的鐵路，收歸由國家興辦。消息傳到四川，頓時群情激憤，全省紳士大嘩。像修建鐵路這樣大的事業本非個別紳士所能投資，因此四川官督商辦建鐵路，已由紳士按佔田多少強迫認購鐵路租股，即凡有一畝田能收租的人全是股東^{③⑦}。鐵路國有化一下子造成四川全省紳士和中央對抗。省商會聯名公開發佈通電，宣稱清廷如不廢除借款合同，路事風潮「萬無有或息之一日」^{③⑧}。

據親自經歷這一事件的周善培回憶，鐵路公司召開會議商量對策時，到會的有千餘人，人們流着眼淚說「鐵路完了，四川也亡

③⑦ 周善培：《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頁10（重慶：重慶人民出版社，1957）。

③⑧ 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辛亥革命前後——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頁13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了」，連維持會場秩序的警察也丟了警棍，伏在桌子上大哭不止^③。各地紛紛成立保路同志會，四川地方政府準備服從中央決定，但紳士一致認為「本省權利興廢事件要交諮議局通過」，沒有諮議局認可，四川鐵路收歸國有便不合法。一時間，四川紳士派代表到北京，跪在地安門外要求和攝政王對話。中央政府拒絕對話，將代表解回原籍，四川紳士商人以罷市抗議，引發了轟轟烈烈的保路群眾運動，家家戶戶供光緒皇帝牌位。四川紳民準備宣佈獨立。中央政府極其驚慌，派端方帶湖北駐軍入川鎮壓，造成武漢空虛。結果出現連鎖反應：農曆八月十九日武昌新軍起義，九月初一日，湖南、陝西獨立，初二日，九江獨立；初四日，廣州將軍鳳山被刺；初八日，山西獨立；初九日，雲南獨立，初十日，江西獨立……。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其關鍵不僅在於革命黨人奮不顧身地武裝起義，更重要的是它引起各地地方政府的連鎖響應，否則單單一個城市或省份少數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以及少數新軍反中央，是很容易被鎮壓下去的。我們如果不囿於具體事件細節而宏觀分析清王朝被推翻機制，就可以看到革命黨起義只起到點火作用，而使火勢蔓延最後成燎原之勢的則在於城市化紳士領導和推動的城市群眾運動[註十六]。當時除少數省出現軍事衝突外，大多數省均「和平獨立」，脫離中央政府控制。在最早宣佈獨立的十二個省中有十個省的諮議局都擔當了發動、組織者的角色^④。因此，辛亥革命的本質是城市化的紳士與革命黨人聯合摧垮王權，也是一次地方分權運動[註十七]。

從1900年庚子事變後清王朝不得不實行新政開始，到1911年清

③ 周善培：《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

④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近史所專刊32 頁454-458（台北：1975）。

王朝滅亡，整個社會結構演變雖然複雜，但我們卻可以看到一條主線，這就是歷史變遷遵循着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和經濟政治改革在互動中破壞一體化結構之邏輯。由意識形態認同危機而觸發的政治經濟改革，雖然促使了經濟的現代化、大城市的興起、自由資本主義的出現，但就社會整合而言，只能帶來一體化上層組織的解體，它使得社會整合危機在社會初步顯現，並反過來再次推動意識形態變遷，促使全面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爆發。這正是從辛亥革命通向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道路。



第三章 註 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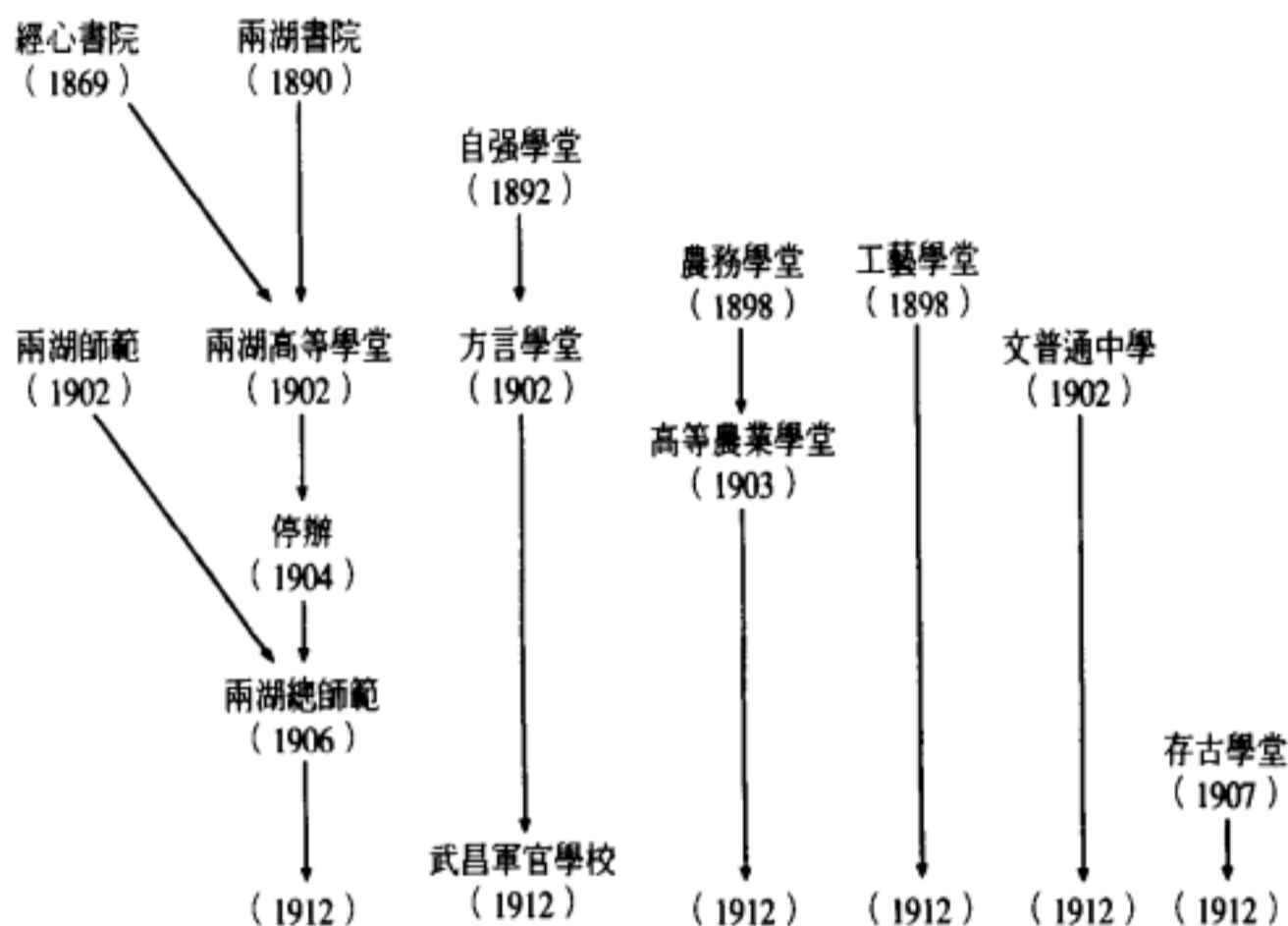
註一 1907年底農工商部又修訂頒佈《獎給商勳章程》，降低了原訂條件，如獲農工商部頭等顧問官加頭品頂戴銜，所需要的投資額由原來的2,000萬元降為800萬元。可見清廷對發展工商的重視。

註二 非常有趣的是，新政時，一個推行新式教育的實際措施正是改「寺觀」為學校，它恰恰是戊戌變法提出過的方案。例如江蘇省平均有41.6%新學堂佔用寺廟，有的省甚至100%佔用寺觀作校址。這一政策的推行在某些地方甚至引起鬧事風潮^①。

註三 國家興辦新式教育的一個重要方法是把傳統書院改為新學堂，並不斷擴大學生人數。這種轉化差不多普及於全國各州縣。圖3.6以武昌文學堂創設為例，表明傳統書院如何轉型為新學堂，最後擴大成為清末民初普及全國的新式學校的過程。1903年，武昌約有中等以上文學堂學生1,500餘人，武學堂學生500餘人，到1907年，中等以上文學堂增至4,000—5,000人，武學堂增至約1,700餘人^②。至於在沒有書院的地區（縣城或縣以下的鎮和部分鄉村），清廷採用的辦法是推行私塾改革，將其合併為新式學校。不少學者對這一過程進行了詳細考察。如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楊士驥以山東省官立公立學堂甚少，議行強迫教育法，飭各州縣速立初級小學堂

① 王樹槐：〈清末江蘇地方自治風潮〉《近史所集刊》第6期（台北：1977）。

② 蘇雲峰：〈清季武昌學界的革命運動〉《近史所集刊》第4期（台北：1973）。



取自蘇雲峰：〈清季武昌學界的革命運動〉，《近史所集刊》，第4期（1973）。

圖3.6 武昌文學堂之創設及演變

三十所，如有因循，即予參辦。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提學使朱益藩通飭各州縣設勸學所，由勸學所派員詳細調查各私塾地址及塾師姓名，用行政命令改良教法，或令合二、三塾為一塾，或合四、五塾為一塾，教授科目悉遵奏定學堂章程，並延聘曾習師範之人，按日分赴各私塾演說新教育法^④。

新近的研究結果還表明，1904年以前，官辦學堂佔絕對優勢。但自1905年開始，公私立學堂一躍而上，特別是公立學堂，一般佔

^④ 張玉法：〈清末民初山東的教育變革〉《台師大歷史學報》第5期（台北：1977）。

總數的三分之二。個別地方私立學堂還取得優勢。1909年京師督局所屬官、公、私立學堂就分別為43、46、183所，相應百分比為15%、15%和70%。表3.7就顯示出新式教育的結構發生重大改變。而學堂數量直線上升，也使學生群體急劇擴大。1905年以前，學生增長率雖高，但基數較小，最多不過258,873人(不含軍事、教會學堂，下同)。此後兩年，學生人數成倍遞增，達到1,024,988人，1908至1909年，在高基數上，仍以每年淨增30萬人的速度擴大，達1,638,884人。到1912年，躍昇為2,933,387人。除官方正式統計數外，還有(一)未經申報立案的公私立學堂；(二)軍事學堂，據法國和美國軍事情報部門報告，1908年中國陸軍學堂共有學生10,000人，到1911年10月，各類軍事學堂約70所；(三)教會學堂，辛亥前，教會在華學校共3,145所，學生102,583人。1912年，僅新教學

年份	類別 總 堂 數	學 堂 分 類					
		官		公		私	
		堂數	%	堂數	%	堂數	%
1904	4,222	3,605	85	393	9	224	6
1905	8,277	2,710	33	4,829	58	678	9
1906	19,830	5,224	26	12,310	62	2,296	12
1907	35,913	11,546	32	20,321	56	4,046	12
1908	43,088	12,883	29	25,688	59	4,512	12
1909	52,348	14,301	27	32,254	61	5,793	12

取自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頁157（台北：稻禾，1991）。

表3.7 新式教育結構的改變(1904-1909)

生即達138,937人。天主教和東正教估計有5至10萬學生；(四)日本、德國在東北、山東、福建、江寧等地開辦的非教會學校，僅南滿一地，就有日本所辦學堂28所，學生5,551人。總計辛亥時國內學生數在300萬人左右，幾乎是1905年的十二倍^④。

註四 意識形態內容與選拔意識形態精英方式的一一對應表現在兩個方面，當意識形態內容不變時，選拔方式也不可能變化。當意識形態內容發生變化，如果選拔方式仍不變時，就會影響新知識分子的培養。對於第一個方面人們討論得較多，第二個方面卻注意甚少。不少學者都談到過改變科舉制的各種嘗試。例如康熙二年曾取消八股文，不久即告恢復。雍正時亦有廢八股之議，乾隆九年兵部右侍郎認為時文「不適於用」，必須改革。十九世紀中葉後，批評更多。同治九年英桂、沈葆楨請增算學科，光緒元年李鴻章請增洋務科，這些努力均未成功^⑤。這證明在一體化結構中，如果培養知識分子是以農村為基地，意識形態內容是傳統儒學，那麼在意識形態不變的條件下，改變與其適應的選拔意識形態精英的制度是不可能的。而一旦傳統意識形態出現變異，科舉制立即變得與之不再相應，它不利於教授新學的新學堂的成長。1900年以後，新學堂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但科舉制廢除以前，立即出現新學堂經費不足的問題，以致於1905年袁世凱、張之洞、趙爾巽等眾多督撫將軍在上奏中說：「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學堂絕無大興之望。」^⑥科舉廢止後，興辦新學堂的運動得到廣大縉紳推動，經費

^④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 頁156-158（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

^⑤ Wolfgang Franke: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⑥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五) 頁5390（北京：中華書局，1958）。

問題就迎刃而解。這裏我們看到，兩個互相耦合的子系統必須同步改變才能共同發展。

事實上，選拔精英的制度變遷與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發展是亦步亦趨的。早在1901年，局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加劇時，科舉制的基礎已動搖了。1901年8月，清廷頒發諭旨，強調科舉制「流弊日深，士子但視為弋取科名之具」，規定從次年起加試策論，所有考試「均不准用八股程式」。1903年認同危機已十分劇烈，科舉制實際上已經在逐步廢止之中。1903年底，張百熙、榮慶、張之洞提出一個一步步廢除之方案，奏請將科舉取中額，逐年遞減三分之一，歷三年全部減盡，「俾全國臣民確見裁減科舉，歸重學堂辦法，咸曉然於朝廷意向所在。」^{④7}1905年9月，清廷正式頒發諭旨，規定自1906年開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④8}

註五 在近現代史研究中，常常從教育現代化角度來探討新學堂的興起和廢除科舉。但「教育現代化」很難解釋當時在教育制度改革中出現的奇特現象，例如女子學堂發展過程。1901年，清廷大力推行新式學堂，改省書院為學校，在省城設大學堂，但當時所有「教育現代化」的措施，均不涉及婦女上學受教育問題。清廷《奏定學堂章程》中只將女子教育包括在家庭教育中，它在新式教育體系中沒有正式的位置。事實上，清末女子教育的改革基本上都是沿着如何實現新式家庭教育展開的，即女學是培養兒子的附屬品。幼兒教育需要家庭有文化，如母親識字，則可由母親進行教育，母親不識字，必須請保姆教，於是先有訓練保姆之學校，如敬節堂、蒙養院之

④7 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 頁62（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④8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五） 頁5392。

類，它是師範學校的先聲。1905年才有女學出現，但被嚴格限制在師範教育之內。1907年的《女子師範學堂章程》也是從幼兒教育出發來論述女學的功能。因此「女學」最高只到初級師範教育，其數目只是男性小學生的六十分之一^④。顯然「教育現代化」這種觀點不足以解釋為何「女學」發展是以幼兒教育為中心的。但把興辦新學堂看作意識形態改變所導致的培養意識形態精英制度之變異，則馬上可以理解，在意識形態精英培養功能中，「女學」只是和幼兒教育發生關係，它只能順應改善「幼兒教育」這一環節而發展起來。

註六 地主紳士遷居城鎮在中國歷史上早已有之。在受到西方衝擊前，每一個盛大王朝的中後期，城市人口增加，商業病態繁榮，這時往往有相當多的地主縉紳遷居城市。清代也不例外。據十九世紀初期《蘇州府誌》統計，江南地區大約有為數一半的地主住在縣城，三分之一以上居於城鎮集市。每個盛大王朝因商品經濟發展而導致地主向城鎮聚集的現象，和我們所說的紳士城市化是不同的。傳統社會搬遷到城鎮的地主雖身在城市，但他們關注的社會事務卻在鄉村，城市不過是其享樂的地方。而縣城以下的地方集市和小鎮則是鄉自治之中心。因此傳統社會中紳士即使住在城市，其社會組織功能之發揮主要還是在鄉村。隨着舊王朝被農民大起義推翻，新王朝建立，地主向城市集中過程也就中斷，每當大動亂結束，地主鄉紳立即着手進行鄉村社會重建，這時他們中大多數是居住在農村的。石錦根據光緒《桐鄉縣誌》中297個舉人的傳記材料，考察明清五百多年間桐鄉縣鄉居舉人與鎮居舉人比例變化，證明了我們的觀點。明初，鄉居佔83%，鎮居只有10%；到明末（1644年），鄉居為

^④ 廖秀真：〈清末女學在學制上的演進及女子小學教育的發展（1897-1911）〉《台成大歷史學報》第10號（高雄：1983）。

70%，鎮居為28%^⑤。清朝也是如此，十九世紀初太平天國大動亂前，雖然有相當多的地主居住在城鎮，但經過農民大起義後，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地主士紳大批遷回鄉村，重建縣以下鄉自治和鞏固宗法家族。因此1895年以後的縉紳城市化導致鎮居紳士比例急驟增加。關於1895年後城市化紳士所佔比例的具體數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就以石錦的統計為例，1889年，鄉居的只佔1%，鎮居達88%。1895年以後，比例一定更高，而且很多紳士的活動範圍已不再是縣以下的市鎮，而是向對外開放地區和大城市集中，它產生了和傳統社會地主居住在城鎮迥然相反的後果。

註七 不僅從政治結構上可以證明紳士城市化會導致傳統社會上層與下層的斷裂，而且在地主經濟結構中，也可證明會形成相應斷裂。我們曾指出一體化結構與地主經濟是良好耦合的。施堅雅根據農業經濟商品集散和交換的需要，就把中國傳統城鎮的分佈歸納為由八個城市級組成、自中心都會通過城市、市鎮和集市向廣大農村連續擴散的六角形網絡。在這網絡中，與一體化上層組織相應的是「中心都會」、「區域都會」……及「地方城市」這些網絡中的紐結，與中層相應的是縣以下的中心市鎮、中型市鎮、普通市鎮和大市集等系統，和基層組織相應的是自然村。根據這種耦合關係(圖3.7)，紳士城市化時，圖3.7的左邊政治結構由於中層的上移導致上層和下層的斷裂，與此同時右邊結構也出現類似變化。本來紳士集中在中心市鎮以下，它們是把自然村和城市聯繫起來的通道。當紳士城市化時，意味着原來分佈於中心市鎮以下的大量資金流入大城市，這樣在經濟網中，把城市和鄉村聯繫起來的地帶就會發生結構性變

⑤ 轉引自賀羅夫：《晚清士紳與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兼與日本幕末、明治士族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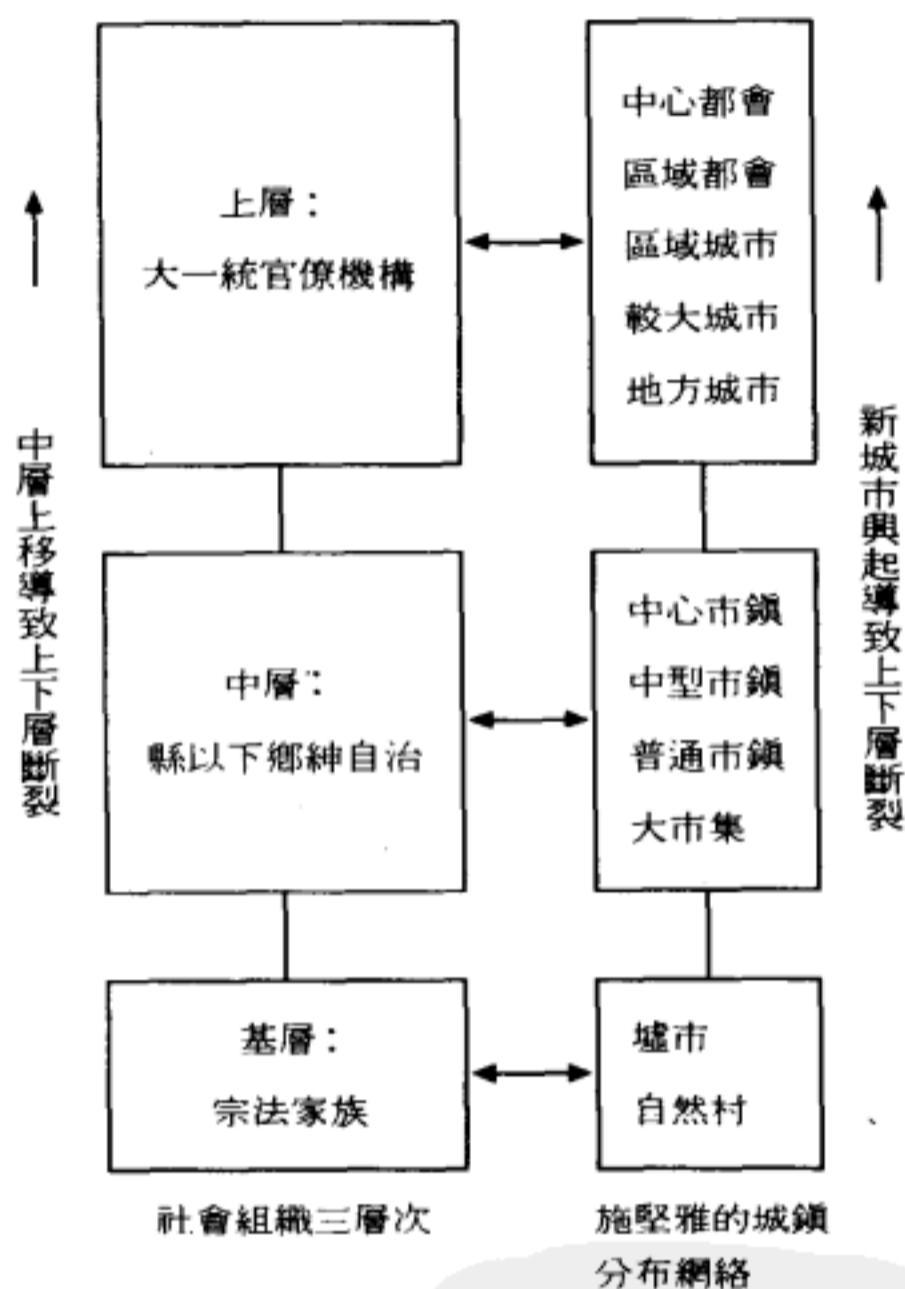


圖3.7 社會整合的斷裂

異。在通商口岸及對外開放交通樞紐的附近，大城市以下的中心市鎮可以因城市發展帶動而高度發達，但對於那些遠離通商口岸和對外開放交通樞紐的傳統腹地，則意味着傳統市鎮的衰落，中國城鄉結構出現了斷裂：一部分變成較現代化地區，傳統腹地反而出現商品經濟之衰落。

註八 這裏討論的經營地主，狹義指立足於農村專門經營農業者，

廣義可以包括本住城裏但因商業和外貿需要而設立經濟作物農場的土地經營者。關於經營地主的產生，學術界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它出現得很早，十九世紀已有經營地主廣泛活動的記錄。有些學者認為它產生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根據我們的理論分析，經營地主作為農業經濟成分需要兩個條件，第一，農村中出現大量遊離勞動力，以致於合理地利用僱傭勞力耕種比出租土地獲利更多。第二，農村中產生相當多農業勞力僱主。第一個條件大約在十八世紀以後就已具備。中國人口的大膨脹使得農村產生嚴重的人口—土地危機，耕地不足，勞力嚴重過剩，以至於僱工工資一降再降，但此時農村中租佃地主仍佔絕對優勢，經營地主極少。因為經營農業的形成需要地主管理土地和生產組織方式的改變，這在一體化組織呈現動搖和解構之前是不可能的。以山東為例，甲午以前就已有經營地主活動的記載，但數目不多，目前所知的明顯證據，大多是1895年以後的。如據1897年前42縣197個村的統計調查，經營地主只佔地主中36.8%（實際上比例遠比它低），出租地主佔63.2%^⑤。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紳士城市化，宗法家族解體，經營地主才日益增多。詳細分析可參見本書8.2節。

註九 1880年代清代識字率男人為30—45%，女人為2—10%，平均識字率在20%左右，這一比例不亞於英國和日本現代化以前的識字率^⑥。中國傳統社會之所以達到這樣高的識字率，和一體化中下層組織深入農村有關。農村是知識分子的培養基地，私塾教育的廣泛存在，政府辦的義學普及全國，以及紳士主動拿錢辦教育，都有助

⑤ 景甦、羅崙：《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附表。

⑥ Evelyn Sakakida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於產生高識字率。實際上，由於廣大縉紳秀才生活在農村，在清代一千個學童可得七個老師，比西方三個老師教一千人充足。但隨着城市成為培養知識分子的基地，對廣大農村的識字普及自有影響，從1895年後到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期間，全國的平均識字率一直在下降。至於二十世紀中國識字率究竟是多少，一直缺乏統計，但從小學生數目中可以做一估計。表3.8為1907-1933年小學生數目。張朋園根據這個數目計算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識字率，其中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數佔總人口的17%，他認為由於統計不全和私塾仍產生10%的識字率，1930年代中國識字率應達30%^⑤。但私塾仍產生10%以上的識字率，這個數字是極富爭議性的。如果嚴格以小學生數統計識字率，從1907-1933年，中國識字率肯定比傳統社會20%來得低。至於當時私塾還產生多少功能，直接取決於農村中傳統社會結構的破壞程度，這樣看來，在傳統一體化結構已完全毀壞之民國初年，社會識字率極有可能已比傳統社會大大降低，難怪梁

年 代	小學生數
1907	918,586
1908	1,192,921
1909	1,598,639
1920	5,722,213
1933	6,396,854

取自張朋園：〈勞著「清代教育及大眾識字能力」〉，《近史所集刊》，第9期（台北，1980）。

表3.8 1907-1933年小學生人數

⑤ 張朋園：〈勞著「清代教育及大眾識字能力」〉《近史所集刊》第9期（台北：1980）。

啟超在1915年批評新政時說，二十年來辦現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識字。

如果把識字視為一體化結構在社會普及文化教育上的能力，那麼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實行三民主義和政治結構一體化後，新一體化結構(國民黨模式)才達到了與傳統社會差不多的文化教育普及能力。而在這以前，新式教育普及可能低於傳統一體化結構的文化教育普及程度，這裏我們看到了中國社會整合和文化教育(意識形態)普及的內在聯繫。有關這方面進一步的分析可見本書7.3節。

註十 這方面一個頗有說服力的證據是張玉法對民營工業的量化分析。他統計了1,148家工廠，發現自1848-1916年民營新式工業創辦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自1848年至1894年，共創辦了151家，平均每年3.1家。第二期自1895年至1904年，共創辦了122家，平均每年12.3家。第三期自1905-1916年，共有875家，平均每年72.8家^④。從這一統計可見，1895年後民營工業創辦數開始增多，但民營工業大發展則是清廷推行新政以後才出現的。

註十一 汪熙的統計表如表3.9所示，新式企業創辦人中，來自官僚地主者佔了46.7%，買辦佔了18.3%，商人為33%。官僚地主(紳士)比買辦和商人都高。1912年以後，新式企業開辦者中真正商人的比例迅速上升。蘇雲峰曾對民初337名著名商人的出身、職業和其他方面作了統計，得出表3.10、3.11和表3.12。從中顯示這時企業創辦人家庭為官僚地主的只佔7.2%，商人出身的明顯佔主導地位。這些企業家大多已不再具有清末企業家身兼官紳的雙重身分，

^④ 張玉法：《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1860-1916)》 頁208-210 (台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1992)。

業別	時期	家數	創辦 人數	官僚地主		買辦		商人		其他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棉紡工業	1872-1894	5	14	11	78.6	1	7.1	2	14.3	—	—
	1895-1913	20	27	15	55.6	9	33.3	3	11.1	—	—
	1914-1922	36	59	17	28.8	1	1.7	35	59.3	6	10.2
	合計	61	100	43	43.0	11	11.0	40	40.0	6	6.0
麪粉工業	1895-1913	30	30	11	36.7	10	33.3	9	30.0	—	—
	1914-1922	43	43	8	18.6	6	14.0	29	67.4	—	—
	合計	73	73	19	26.0	16	21.9	38	52.1	—	—
毛紡工業	1872-1894	1	1	1	100.0	—	—	—	—	—	—
	1895-1913	5	7	4	57.1	3	42.9	—	—	—	—
	合計	6	8	5	62.5	3	37.5	—	—	—	—
繅絲工業	1872-1894	3	4	2	50.0	2	50.0	—	—	—	—
	1895-1913	9	9	5	55.6	2	22.2	2	22.2	—	—
	合計	12	13	7	54.6	4	30.8	2	14.6	—	—
水電工業	1872-1894	2	3	1	33.4	1	33.3	1	33.3	—	—
	1895-1913	16	19	9	47.4	5	26.3	5	26.3	—	—
	合計	18	22	10	45.6	6	27.2	6	27.2	—	—
水泥工業	1895-1913	3	3	3	100.0	—	—	—	—	—	—
榨油工業	1895-1913	9	10	5	50.0	4	40.0	1	10.0	—	—
捲烟工業	1895-1913	4	4	3	75.0	1	25.0	—	—	—	—
航運業	1872-1894	3	4	1	25.0	3	75.0	—	—	—	—
	1895-1913	9	11	8	72.7	1	9.2	2	18.1	—	—
	1914-1922	8	9	2	22.2	3	33.3	4	44.5	—	—
	合計	20	24	11	45.9	7	29.1	6	25.0	—	—
煤礦工業	1872-1894	10	13	11	84.6	2	15.4	—	—	—	—
	1895-1913	28	30	23	76.6	1	3.4	6	20.0	—	—
	合計	38	43	34	79.5	3	6.5	6	14.0	—	—
總計		244	300	140	46.7	55	18.3	99	33.0	6	2.0

取自汪熙：〈關於買辦與買辦制度〉，《近代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0）。

表3.9 十個行業創辦人的出身(1872-1913)

職 別	人 數	%
商 人	84	22.3
官 紳 地 主	27	7.2
清 貧 工 農	42	11.1
未 詳	224	59.4
合 計	377	100.00

取自蘇雲峰：〈民初之商人，1912-1928〉，《近史所集刊》，第11期（台北，1982）。

表3.10 民初商人之父輩職業統計

初 職 別	人 數	%	
公司董事	10	2.7	76.3
公司司理、副理、經理	107	28.4	
公司職員、店員	84	22.3	
小商店店主	73	19.4	
買辦	9	2.4	
鹽商、木材商、股東	4	1.1	16.7
官吏、議員、幕府	37	9.8	
教員(包括教授)	17	4.5	
工程師、技師、律師	6	1.6	
主筆、記者	3	0.8	7.0
學徒、工人	25	6.6	
幫會首領	2	0.4	
合 計	377	100.0	

取自前引蘇雲峰

表3.11 民初著名商人之初職

教育程度	國內	國外	合計	%
傳統功名	24		24	6.4
大學	38	88	126	33.4
中學	27	16	43	11.4
小學以下	74		74	19.6
未詳	110		110	29.2
合計	273	104	377	100.0
%	72	28		

取自前引蘇雲峰

表3.12 民初著名商人之教育程度

表3.11統計指出這些企業家最初職業76.3%是公司董事、經理和商人，只有9.8%才是官吏、議員和幕府。其受教育程度也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有傳統功名的只佔6.4%，受新式教育和未受教育的比例大增。這一切都表明，在創辦新式企業中縉紳地主明顯讓位於純粹商人階級。

註十二 一些學者認為，官僚、地主紳士投資創辦現代工商企業以後，其社會身分已轉為資本家。我們認為，這些人的身分究竟是甚麼，是需要用歷史事實來說明的。清末城市化紳士投資興辦企業，他們的主要社會角色仍是傳統官僚和紳士，或鄉間的地主及地方宗族領袖，而企業家只是業餘的職業。最多只能說他們具有雙重社會身分。於是，這一個新興階層的行為規範、所擔負的社會功能與純粹商業資本家有着明顯區別。他們能進入官場，甚至左右國家資本和政策，因此我們把以這批人為主所興辦的現代企業稱為官紳資本

主義。它是介於傳統一體化結構興辦的國家資本主義與單純來自民間的私人資本之間的一種形態。

人們常把資本主義分成資本屬於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和資本屬於私人的自由資本主義兩種形態。我們認為還存在着國家資本主義與私人資本主義之間的形態。在這種形態中，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之間沒有明顯界線，官僚憑借自己對國家企業之管理權化公為私。這種形態在兩種社會條件下會出現：一種是傳統國家解體，國家資本不得不向民間資本轉化之際；另一個條件是國家組織力量重新興起，國家資本再次湧現，官僚憑藉手中的政治行政權力進行資金積累。官紳資本主義是在第一種條件下出現的。有人曾以周學熙集團為案例分析了清末國家資本是如何轉化為私人資本的，並將其稱為由官僚資本 (bureaucratic capital) 變成官僚的資本 (capital of bureaucrats)^⑤。顯然周學熙集團的資本正具有我們所講的所有權在轉化中的雙重性，它屬於官紳資本主義。而1928年國民黨統一中國後，中國的國家資本再次出現。與此同時，還出現了官僚掌握企業、銀行股份的現象。於是在他們身上，同時具有國家資本之支配權和私人資本，國家和私人的界線再次含混不清。我們稱之為官僚資本主義。它和官紳資本主義類似，差別僅在於官僚資本主義隨新一體化結構建立而興起，而官紳資本主義隨傳統一體化解構而出現。詳細分析見本書第七章和第十章。

註十三 各種統計數據表明，1895-1911這十幾年，是通商口岸城市急驟膨脹的時期。例如寧波是最早的通商口岸，但到1855年時人口數僅為21.4萬餘人，1895年前人口增長率並不突出。然而到1912

^⑤ 李林：〈從周學熙集團看官僚資本的轉化〉《二十一世紀》總第3期（香港：1991）。

年，人口一下子激增至65萬餘人，若以1855年為基數，平均每年增加3.56%。又例如杭州市，1884年人口數為25.3萬餘人，1911年增加至68萬餘人，年增長率達6.22%^{⑤⑥}。王笛考察另一通商口岸重慶，也說明存在着我們提出的發展趨勢。嘉慶末年間重慶市人口約5.3萬，道光末約14.3萬，咸豐末約15.7萬，同治末為21.5萬。光緒中期也只有23-28萬。也就是說，在1895以前，增長速度仍屬平緩，但到清末，重慶市人口急增至35萬^{⑤⑦}。表3.13為漢口自1772至1917年的人口增長，從中可以看出，1800至1850年漢口人口增長

年 代	人口數	年增長率	備 註
1772	99,381		為漢口鎮四坊二里人口
1800's	129,183	9.41%	同 上
1850's	99,380	-5.23%	同 上
1888	180,900	15.89%	漢口市區人口
1906	520,000	60.42%	同上，時全廳人口為 87 萬，漢口市佔 59.77%
1911	590,000	25.58%	漢口市區人口
1917	703,308	29.71%	同上，時全縣人口為 1,034,895 人，漢口市佔 67.96%，其中男性佔 65%，女性佔 35%

取自李國祁：〈由上海、漢口與青島三都市的形成與發展論近代我國通商口岸的都市化作用〉，《台師大歷史學報》，第10期（1982）。

表3.13 漢口市1772-1917年的人口增長

- ⑤⑥ 李國祁：〈清末民初閩浙地區人口流動與都市化的演進(1866-1916)〉《台師大歷史學報》第5期 頁496-497（台北：1977）。
- ⑤⑦ 王笛：〈清代重慶城市人口與社會組織〉 隗瀛濤主編：《重慶城市研究》頁322（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

率為負5.23‰，1850年到1888年間增長率為15.89‰，而1888年至1906年高達60.42‰，城市人口大膨脹也出現在1895-1911年這段時間中。

從包德威(David D. Buck)所考察的濟南的發展中，也可以發現有類似趨勢。1837年濟南只有人口12.8萬人，二十世紀最初幾年，人口急增至25萬人。自1919年以後，人口年增長率為3%，1924年人口為30萬，到1933年達42.7萬。濟南雖然是一個非通商口岸的內陸城市，但山東紳商在1923年青島回歸之前，大多在濟南投資。特別是1912年津浦鐵路通車，濟南因位於津浦與膠濟鐵路的交匯點，更成為山東的商業中心^⑤。我們認為，紳士城市化使得中國城市發展呈一放射性鏈鎖，最早成長的是直接和對外開放有關係的通商口岸，接着是那些位於對外開放交通要道上的城市，然後才是那些傳統政治文化之中心。它們是隨着一體化上層組織解構而擴張的。

註十四 我們必須把通商口岸和近代大城市之成長和普遍城市化趨勢區別開來。大多數學者用城市化速度來衡量現代化，但紳士城市化促使的通商口岸擴張，並不等於全社會範圍內的城市化速度增長。因為通商口岸興起，必定同時是它附近不甚有利於開放的傳統郡縣城市的衰落。湖南長沙的崛起和湘潭的衰落就是明顯例子。湘潭是湖南的傳統城市，明末就有小南京之稱，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人口達100萬，但由於不是通商口岸，很快就因處於交通幹線上的長沙、漢口和株州之興起而衰落。1916年，湘潭市人口下降到5萬，到1936年才恢復到10萬。長沙於1860年代內河航權未開之前遠不如

^⑤ David D. Buck: *Urban Change in China: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Shantung 1890-1949*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湘潭。1895年後開始成長，民國初年達18萬人，到三十年代，人口達38萬，成為全省最大的都市之一^⑤。據施堅雅的研究，中國傳統社會大多數郡縣城市本來既是農業經濟中商品集散地，又是社會管理網的中樞，現代通商口岸因西方衝擊下對外開放和社會發展而引起，它不可能擔負這兩重功能。通商口岸急速發展就意味着傳統城鎮六角型分佈結構的破壞，從中央政府所在地(京城)到一個個鄉村不再是處於由八個城市等級和集市組成的連續擴散網絡。它造成近現代史上城鄉對立的基本格局。而且，它也帶來這段時間中國都市化程度的極大不平衡。通商口岸較集中地區，都市化程度高，而廣大內地，都市化程度很低。如辛亥時期，江浙地區都市化程度高達13%，而全國的都市人口只佔6%。

註十五 清末二十一省的諮議局議員總數1,643人。張朋園的統計包括了十五省議員1,288人，佔總數三分之二，抽樣的誤差似已可忽略，應可清晰地反映議員的傳統教育背景。但新近賀躍夫的研究表明，實際情形遠超過90%的比例。因為議員登記冊並不能完全反映議員的出身背景。各省諮議局議員名冊，固然以正途功名登記入冊者為多，但以官職銜或辦地方公益資格註冊者，其實亦可能有正途功名，或有由捐納而來的監生或官銜等身分。如廣東諮議局的94名議員全部來自士紳階層，其中，有舉貢生員及進士等正途科舉功名者85人(進士3人，舉人26人，貢生32人，生員24人)，官職銜者9人。廣西諮議局的64名議員，62人有科舉功名(進士3人，舉人13人，貢生15人，生員31人)，另外2人，一為清末大官僚唐景崧子之子，得父蔭而為蔭生，並有陸軍部主事的官銜；一為土官之後，襲世職，援例亦為蔭生。因此，賀躍夫推斷，清末各省諮議局議員幾

⑤ 張朋園：〈近代湖南的人口與都市發展〉《台師大歷史學報》第5期（台北：1977）。

乎全部來自紳士群體^{⑥⑦}。

在討論諮議局性質時，以往學術界都強調它借鑒參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議會制度。而這裏則提供了考察這一問題的新角度。在傳統一體化結構中，官紳合作，紳士鄉自治的基礎是紳士具有和官僚機構一致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說，意識形態認同使得官僚機構可將其組織力延伸到機構外。新政期間，官方意識形態發生變異，在儒學的基本構架中，吸收了西方政治制度。這時，諮議局作為城市化紳士的組織，它借鑒參照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可以從意識形態變異來說明，而它和官僚機構的關係仍基於意識形態認同；因此我們可以把諮議局看作原來官紳合作模式在意識形態認同變異下的組織形態。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是紳權能夠擴張的原因，而紳權向城市擴張之程度也和諮議局中城市化紳士所佔比例有關。

賀躍夫有關諮議局議員居住地的研究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證明。他統計了廣東與廣西兩省議員的居住地，發現廣東諮議局議員住在鄉間的只佔17%，絕大多數住在城里，住在廣州的高達30%。廣西是落後省份，紳士城市化不如廣東明顯，議員人數較少，但居住在縣城以上的議員也佔了33%^{⑥⑧}。這一統計不僅表明，諮議局實際上是城市化紳士的組織，它是傳統紳士鄉自治在新形勢下的變種，還指出了可以用城居議員比例來說明諮議局對傳統官紳合作模式之偏離程度。

註十六 大陸學術界在討論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時，高度強調革命黨人在推翻清王朝中的作用，而很少肯定立憲派(城市化紳士)的功績。這種觀點無法解釋清廷為何不是滅亡於革命黨竭盡全部力量多次發動的武裝起義上，也難以說明如此眾多省份的獨立，係由非革

⑥⑦ 賀躍夫：《晚清士紳與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兼與日本幕末、明治士族比較》 頁128-129、131。

命黨人掌握的諮議局所推動和組織的。路康樂 (Edward J.M. Rhoads) 曾對這一點作了系統的考察，他指出，1905-1908年是革命黨最活躍的時期，其間革命黨起義達七次之多。大多以知識分子領導，以綠林及會黨作為武力。他認為，起義未推翻清王朝乃因為沒有出現革命形勢，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超級大國，革命形勢遠比革命黨的起義重要^{⑥2}。路康樂沒有進一步分析革命形勢和社會結構變遷的關係。我們提出的一體化組織中中層組織和上層組織之對抗就是對這個問題的進一步解答。一些歷史學家鑒於清王朝最後被地方勢力推翻和陷於軍閥割據局面這一事實，認為清王朝的解體原因是清末地方政府日益權重，獨立性愈來愈大。實際上，地方分權是很難通過大一統王權對地方官控制的減弱來達到的。劉廣京曾對咸同之後清王朝各省督撫是否失去控制、中央是否聽其「專權」或「自治」進行了考察。他認為，同光自強之際，清廷在某種程度上給各省督撫一定的自主權，如1866年5月前各關所入除四成用作英法聯軍賠款外，允許各省留各關所得之六成作為勇營之軍費，且甲午戰爭前十四省之機器局的總辦委員亦由督撫任命。但是，各自的主要財政活動仍在中央控制之下，特別是中央對各省督撫有着絕對的任免權^{⑥3}。他還系統考察了自1860-1900年督撫之任期。大多數督撫任期只有一至三年，任期在十二至十五年的只佔極小比例。在任期只有一至三年的條件下，督撫要搞獨立王國、培植私人勢力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清王朝滅亡之前，各省行政長官的任免權仍一直在中央控制之下，地方分權則主要表現為紳權的擴張以及它日益和王權的對抗。

^{⑥2} Edward J. M. Rhoa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 Tung 1895-191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⑥3} 劉廣京：〈晚清督撫權力問題商榷〉《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6編（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

第四章 社會整合危機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從未有一個時期的社會制度有如民國初年那樣接近民主的理想，但是它卻是一體化結構在解體過程中的幻象。

4.1 共和國幻象

魯迅在《阿Q正傳》中對辛亥革命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寫：阿Q聽說城裏革命了，跑到尼姑庵，小尼姑生氣地告訴他，別人早來革過了。原來假洋鬼子和趙太爺一早到廟裏把「吾皇萬萬歲」的龍牌砸掉，就宣稱革命成功。魯迅確實十分傳神地抓住了辛亥革命所引起的社會結構變化。假洋鬼子是城市化紳士的代表，趙太爺是本鄉的地方知識精英和宗族領袖。他們聯合起來推翻王權，意味着一體化結構中層向上衝擊，掀掉了壓在他們上面的一體化上層組織。而假洋鬼子和趙太爺卻不准阿Q革命。既然辛亥革命只是一體化上層組織之解體，那麼愈是社會基層變化就愈小。在某些省城，還看得見革命黨和滿清政府之軍事衝突，相形之下，革命對縣城的影響就比省城小得多了。辛亥革命中縣級政權的轉移，有革命黨佔城及會黨、新軍和民眾起事等五種類型，但絕大多數為當地士紳宣佈和平光復。而且，不論是哪一種方式取得政權，最後都是地方名流紳士

左右政權^①[註一]。至於鄉間，只是皇帝的龍牌被摘下來而已，農村社會秩序並沒有變化。

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王朝是用這種奇特的方式推翻的。只有超穩定系統在西方衝擊下對外開放，意識形態局部認同危機推動政治結構變化，才會導致上層先於中層解體這一特殊現象[註二]。它立即帶來一個歷史性的後果：原來一直處於大一統官僚機構掩蓋之下，但又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強大最活躍的組織力量直接暴露出來。城市化的縉紳和知識精英在社會眾目睽睽之下擔負起重組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對付西方文明咄咄逼人的衝擊之任務[註三]。

眾所周知，在辛亥革命後、新文化運動前短短的幾年中，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學習西方民主制度的嘗試，然而長期以來國共兩黨的官方歷史對此所談甚少。而對於超穩定系統近現代史觀，這次嘗試的分析卻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是由城市化紳士和知識分子所推動，想用民主政治來代替解體的一體化上層組織。如果它獲得成功，社會整合危機就得到克服，意識形態全面認同危機就不會爆發，中國也就不會有新文化運動了。我們提出超穩定系統在對外開放條件下的變遷模式，蘊含着防衛現代化失敗、意識形態局部認同危機、一體化上層組織解體、意識形態全面認同危機……這樣的展開鏈條。在這一邏輯中，一體化上層組織解體之所以會引發意識形態更替運動，其前提正是民國初年民主嘗試是不可能成功的。

從表面上看來，辛亥革命一舉摧垮了兩千餘年的帝制，中國到了一個歷史性轉折關頭。當時，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似乎都存在建立類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歷史機會。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城市和自由經濟一直保持着生氣勃勃的勢頭。諮議局一成

① 李喜所：〈武昌起義後的農村變動〉《歷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2）。

立，就成為地方政權的基礎，它是中國士大夫摹仿西方政治結構的產物。在社會思潮上，民主共和與憲政已獲得社會普遍認同，中華民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民國初年，中國也曾認真地、系統地模仿西方現代政治結構，除了國民黨和進步黨兩大政黨外，還有幾百個小黨；曾兩次召開國會，四次制訂憲法。多黨制、議會、憲政這些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新鮮的政治事物，遍及首都和各省。中國人也從來沒有像當時那麼虛心地向西方學習，並且滿懷希望。張朋園說得好：「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政體，接着有國民與進步兩大政黨的出現。自外觀上看，似乎這是一個好的徵兆，即使美國革命之後也沒有這種迹象。袁世凱裝得很雍容，頗有以華盛頓自任的味道。孫中山和梁任公，是當時最具世界知識的兩黨領袖，恐怕杰弗遜和漢彌登都無法望其項背。」^②

但是，歷史再一次在中國人面前顯示了其詭譎和多變。袁世凱的雍容裝扮不多久就弄權獨裁，干預制憲，迫害國民黨人並下令解散國會。袁世凱稱帝失敗身亡之後，黨派對立紛爭不已，張勳趁機率辦子兵進京，脅迫黎元洪再次解散國會，並宣佈清王朝復辟。張勳復辟鬧劇像過眼煙雲很快散去，但國會從此分為勢不兩立的南北兩家，明爭暗鬥。時間一天天過去，中國的政治格局離民主憲政卻愈來愈遠。全國政治秩序日益混亂，軍人干政一天比一天嚴重。國民制憲運動的爆發，顯示了人們對憲政和社會穩定的真切期待。而各省在感到國家統一憲政無望時，就興起爭取聯省自治的浪潮。但是，二十年代初聯省自治運動只是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最後吶喊。隨着民國初年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的破壞，中國陷入了軍閥混戰的分裂局面。民主共和國已成為一個過時的幻夢，新的政治力量耀武

^②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42（台北：食貨出版有限公司，1978）。

揚威地佔據了政治舞台中心。白魯恂用「共和幻象」(phantom republic)來比喻中國這一段時期，是再生動不過的了。辛亥革命成功後所顯示出來的希望和機會，都如海市蜃樓般地消失了。

為甚麼民國初年熱鬧非凡的民主憲政只不過是曇花一現？而中國又一次失去了政治民主化的機會呢？如果僅僅從建立民主制度的社會要素是否完備來分析，就會陷於無法理解之迷霧中，而一旦從一體化結構三個層次整體地看，則會豁然開朗。民初民主政治的嘗試是以城市化紳士和軍人為主體，它企圖在一體化中下層基礎上建立類似西方民主制的上層組織。而民主共和體制和未曾解構的一體化中下層組織無論如何是整合不起來的。一體化中下層組織會分泌出排斥民主憲政的抗體，使移植西方政治器官注定失敗。超穩定系統會進入其行為模式的下一個階段，這就是社會整合失敗反過來進一步瓦解已經裸露出來的倫理價值體系，中國出現意識形態更替運動。

4.2 民主政治為甚麼失敗？

建立穩定而統一的政府，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統治權威來源。所謂權威來源，就是社會成員服從甚麼，以及為何他們要服從統治的問題。如果我們把上層國家組織比作大廈，權威來源就是大廈的地基。在傳統一體化結構中，這一地基就是人們對儒家意識形態的認同。現在，皇帝被推翻了，大一統官僚機構解體了，而原來作為皇權和中央統一政府權威來源的意識形態處於局部認同危機之中。雖然大多數社會精英(城市化紳士、各級議會成員、開明的新軍軍官等等)都贊同引進西方民主憲政，他們似乎可以達成新的共識，但是贊同一種政治模式，並不等於人們服從新體制的權威。中

國精英階級大多數不知道，西方現代民主政體的權威結構和中國傳統結構完全不同。在民主制度中，人們有言論、宗教信仰自由，價值是多元的。民主社會並不要求先有統一意識形態然後才有秩序，人們的政見、追求可以完全對立，但仍服從某種權威。民主制度雖也建立在人們對自由、民主的認同之上，但這種信念不是一個獨斷的整體性思想體系。民主制度權威來源不是我們在1.3節所定義的意識形態。追溯民主政治中「服從」的理由就可以發現，憲法或不成文的憲政傳統是政治統治權威和法律合法性的來源，人遵守憲法和法律，服從統治，是依靠超越特定宗教或意識形態的理性精神。這與傳統社會中人出於對上帝的敬畏或認同於某種意識形態而服從政治統治和法律，是大不相同的。韋伯(Max Weber)把現代社會的建立看作理性化過程，在西方各國，政治理性化最早出現在英國，它是一個隨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而導致的政治現代化潮流。理性化的表現是，維繫社會秩序的基本規範(如選舉和立法程序)和人們的宗教信仰、意識形態原則相剝離，具有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尊重並遵守共同規範，這可稱之為規範認同。

形象地講，民主政體的權威基礎是透過意見紛爭、是非判斷、宗教對立和價值多元的沙灘，將政治制度合法性基礎直接建立在理性和秩序之岩石上。一個意識形態不能統一的社會中要有秩序，必須讓人遵守超越意識形態的規則，而修改這些規則(如果它們不合理)必須建立修改規則的規則。程序合法必須優先！而民初的城市化紳士是不可能理解這一點的。雖然不少新型知識分子從西方、日本留學歸來，知曉建立民主共和政體之關鍵在哪裏，但是由於從事上層政治組織建構的社會成員大多來自於紳士，他們對統治權威和合法性的認識，除了對西方政治有些皮毛的了解外，主要還是立足於儒家意識形態尚未解構之部分。主導他們思想和行為的文化觀念，與實現民主政治所要求的超越意識形態的政治理性精神，存在

着結構性矛盾[註四]。民主制度一旦沒有權威，就會在意見紛爭中一天天混亂。如果我們去看民初民主嘗試的過程，會發現規範認同障礙幾乎貫穿在一切重大政治事件中。

1912年6月中旬，成立僅幾個月的北京臨時政府，發生了唐紹儀內閣垮台的政治危機。當時，袁世凱要委任直隸都督王芝祥赴南京遣散軍隊，而內閣總理唐紹儀反對並拒絕在委任狀上簽字。袁世凱一意孤行，竟把沒有總理副署的委任狀交給王芝祥，破壞了「臨時約法」規定的責任內閣制度。唐紹儀憤而以辭去總理之職表示抗議，導致第一屆內閣垮台。這一事件頗為形象地反映具有憲法性質的《臨時約法》從一開始就缺乏約束政治行為的權威力量[註五]。分析一下當時對唐內閣垮台事件的輿論便很能說明問題。那些反對同盟會的議員和報紙，由於早就對唐紹儀不滿，對其出走便冷嘲熱諷；而支持同盟會的派別，則將注意力集中在王芝祥是否能勝任上。本來，這一事件的本質是袁世凱在程序上違憲，而人們卻對「程序違憲」熟視無睹。各黨派和知識分子最關心的是任命王芝祥和唐內閣垮台事件的實際意義，而漠視程序合法的優先性[註六]。李劍農曾十分感慨地評論這件事：「此種問題，莫說在英法，就是在天皇大權的日本，假使天皇發下一道沒有首相副署的勅任令來，日本的議會和新聞界，要發生一種甚麼喧囂的狀況？是不是「違憲」，「違憲」的聲浪，要震動全國？」③[註七]

民初民主嘗試最後以宋教仁被刺宣告結束。這件事把當時人們缺乏「規範認同」表現得淋瀝盡至。宋教仁是當時最熟悉民主制度並全力為之奮鬥的政治家，他力爭以內閣制限制總統權力，並使國民黨獲得國會中大多數選票。他的政治活動直接對袁世凱專權構成威

③ 李劍農：《戊戌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頁163（北京：中華書局，1980）。

脅，結果被袁世凱爪牙暗殺。國民黨感到約法不能約束袁世凱，便舉兵討袁，從而爆發二次革命。但由於組織不得力，內部意見不一致，又得不到社會響應，「二次革命」被袁世凱輕而易舉鎮壓下去。袁世凱乾脆宣佈國民黨非法，民主憲政連形式也維持不下去了。在宋教仁被刺案中，各派政治力量的表現形形色色，但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對規範認同麻木不仁。袁世凱搞暗殺，明目張膽違反國法，是最大的規範破壞者。當時各種革命和進步勢力，以至全社會都沒有意識到超越黨派政見維護憲法權威是當務之急。當袁世凱是暗殺宋教仁的幕後指使者的證據得到確實時，國民黨內部分為兩派，只有少數人主張用合法手段彈劾袁世凱，大多數人則主張武力討袁，國民黨本身先對約法喪失信心。二次革命爆發後，照理說，這是挽救民主憲政之大事，然而卻得不到廣大紳商的支持，他們認為社會安定最重要[註八]。這些在辛亥革命時以反清共和為政治旗幟之社會精英幾乎全都支持袁世凱，就連梁啟超這樣卓具遠見之政治家也都沒有超越政見的維護規範和程序的意識，他領導的進步黨主張「主權在國家」而和國民黨的「主權在民」的政見針鋒相對。政見不同，在民主制度中本來是很正常的，但是，這卻使得進步黨處處反對國民黨。兩黨議員在議會中，「一言不合，即大起衝突」，由「口舌之爭而至奮臂格鬥」，更有國民黨議員陳策、呂復用銅墨盒拋擲副議長陳國祥(進步黨)④。宋教仁被刺時，進步黨不僅沒有支持國民黨捍衛約法，反而站在袁世凱一邊。追隨梁任公多年的張君勱事後曾萬分感慨，他說，「民國政治，設若中山與任公攜手，必然有所不同。」⑤

陳志讓在討論民初人們為何不遵守法規時指出，在西方，合法不合法是政治運作的首要前提，而在中國人們卻把事情背後的道

④⑤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 頁43-48、51。

義，看得比合法程序更重要。他說，當時一派政治力量反對另一派，貫用的口號是藐視法規的「有道伐無道」^⑥。這裏，「有道」或「無道」的根據，正是意識形態的合理性標準。問題在於，清王朝滅亡以後，原有意識形態中，作為政治權威來源的「天道」和「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國家學說已經失去約束力，對甚麼是「有道」，社會上已沒有共識。於是，每一派政治力量都可以把自己的政見視為「有道」，視別派為「無道」。各派都堅持「有道伐無道」，就會打混戰，誰也不服誰。張勳正是基於意識形態理由，打出以綱常名教為精神憲法，以禮義廉恥收決潰之人心的旗號，公然帶着辮子兵進京宣佈復辟的。

孫中山本人雖意識到維護約法權威的重要，並以「護法」為口號和一些軍閥展開長期鬥爭，但是，在漠視規範認同的政治現實中，孫中山又不得不依靠最不遵守約法的軍隊。這些軍人胡作非為，「他們把在廣州召開的舊國會趕到昆明重慶，他們威脅議員，打毀報館，不給國會議員薪水」^⑦。翻開民國初年的政治史，政治家破壞法規的事例比比皆是，而社會輿論關注的只是政治家的行為和品質，並將之視為事件是非的價值判定。這樣，政治秩序自然隨着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的擴大而愈來愈混亂[註九]。

4.3 行政現代化的困難

建立國家政治實體，除了統治權威外，還必須有一個運作有效率的行政系統。它們的職能是維繫社會治安，徵收賦稅，管理各項

⑥⑦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 頁106、110（香港：三聯書店，1979）。（以下簡稱《軍紳政權》）

社會公共事務。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摹仿西方文官制度，進行行政改革，企圖建立一個管理公共事務的全國性行政機構。然而結果卻是社會管理、財政稅收四分五裂，社會日益陷於混亂之中。我們很難把失敗的原因歸咎為當時社會精英學習西方不夠真誠。據學者考察，如果僅看條文，而不看實施，北洋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工商業法規在中國現代史上是最接近西方現代政治的。這一嘗試為何失敗得如此慘呢？關鍵在於：要建立現代行政系統，首先要保證行政獨立於政治權力之外，這又和中國傳統一體化結構格格不入。

一般說來，行政管理隸屬於權力，是統治者(皇帝、官僚或政黨)的辦事機構，無論西方還是中國都是如此。歷史上每當社會出現權力轉移(由一個階級轉到另一個階級，一個政黨取代另一個政黨，或某一集團轉移到另一集團)，管理系統總是瓦解，社會秩序因而動盪。民主社會存在着大眾參政，經常出現由選舉結果導致權力轉移。那麼，如何使社會管理不因權力轉移而陷於混亂呢？在現代社會組織方式中，保證這一點的是行政獨立。首先把政治分為政務和事務兩部分。政黨、議會等權力系統不干預作為行政功能之事務官運作，即行政管理有相對獨立性。要做到行政獨立，除了不受政黨干預外，還要防止行政系統和經濟及其他社會集團發生利益關聯，如規定事務官不能從政、從商，建立不以意識形態而以專業知識和行政能力為標準的選拔考核制度。這樣，當社會發生政治和經濟劇變時，行政管理尚能保持社會的基本秩序和穩定。

英美等國家均先後在十九世紀時實現行政獨立。1805年，英國苦於執政黨更迭和內閣變動引起的行政管理混亂，財政部首先設置常務次官(事務官)，以後文官普遍實現了政務官和事務官的區分。美國在十九世紀時也同樣碰到政府官員受政黨鬥爭的影響，很不利於社會的有效管理。1877年，海斯(Rutherford Birchard Hayes)總統發佈命令，禁止聯邦官員在政治組織中擔任職務。1883年，美國

實行文官制度改革，規定文官不能參加政治活動。從此，一個工具性的超越政治、經濟利益衝突的行政管理系統開始出現。

然而，民初城市化的紳士卻很難做到這一點。傳統社會上層組織——官僚機構只到縣一級，深入基層的行政管理靠官紳合作。在一體化組織中、下兩個層次中，行政本來是紳士讓自己信任的人員來辦理「私人」事務這麼一種性質的運作，要讓行政事務及人員脫離紳士的領導與干預，是不可思議的[註十]。辛亥革命是擴大的紳權部分取代了官僚機構，在原有官僚組織中，要把管理從政治權力中獨立出來已經很難，現在紳士階層的政治、經濟活動和管理的關係更為具體和密切。從結構上看，獨立的行政機構不可能從制度化的紳權中轉化出來。辛亥後，一體化上層解體，但中下層仍是社會佔主導地位的組織方式。北洋政府種種行政現代化嘗試最多只到縣級政府為止，至於縣以下鄉村，原是紳士管理的領地。任何政府行政部門無法繞過紳權把鄉長、保長、甲長和族長納入自己的管理體制中。這裏我們看到，一個現代化的行政組織是不可能安裝在一體化中、下兩個組織層面之上的。

以民初稅收機構為例，可以看出獨立的行政管理體制和原社會中下層組織的對立。清朝管理稅收和財政的機構稱為度支部，設在正陽門附近的戶部街，下設田賦、漕倉、稅課、筦權、通阜、庫藏、廉俸、軍餉、制用、會計十司。民國一建立，把度支部改為財政部，在機構設置和預算方面，全面引進西方制度，後又搬到西長安街新建的洋樓裏去辦公。但機構現代化了，財政部的收入卻大大減少。1912年6月，財政部提出在各省設立國稅司（後改稱國稅廳），「從北方入手，先行整理北方稅務……以後漸行推及於南省」，企圖建立全國性稅收系統，將財權收歸中央^⑩。但這一方案得不到貫

^⑩ 〈財政部官制修正案〉《政府公報》（1912年6月26日）。

徹，中央財政收入一天比一天減少[註十一]，「惟以輸入外債，以救急需」^⑨。財政部部長也走馬燈般地替換。十五年間，財政總長更迭三十三次，任滿一年以上的只有三個人，最短命的財政總長羅文幹、王正廷僅當了十幾天和二十幾天^⑩。不斷替換人選無濟於事，最終整個政府財政收入完全崩潰，不得不靠借外債度日。

為甚麼政府的財政收入會枯竭呢？原來，在一體化結構中，度支部也好，地方政府機構的稅收系統也好，都只不過是輸送錢糧的大動脈，它們能夠工作僅僅是因為有一體化中下層次的毛細血管存在。縣以下廣大紳士和官方合作，他們和宗族組織一致協助國家徵集田賦，這是基層行政之基礎。辛亥革命後，皇權瓦解，城市化的紳士仍然通過自己在農村的勢力增收田賦，加強對農民的剝奪，但這些資源不再輸送給國家，它們或變為個人財富，或名義上屬於地方政府工業投資，實際上則是紳商的私人資本。下面的毛細血管起不到原有供給國家徵集稅收之功能，那無論怎樣改革縣以上各級官僚系統也是無濟於事的。民初不僅中央財政收入不斷減少，各省政府財政也在減少。以經濟富裕的廣東省為例，1912年收入為38,139,000元，到1924年收入降到最低點，只有9,746,000元，它僅佔元年的1/4^⑪。正如張一凡所指出，原來屬於國家的「中央稅收多數為地方當局截留扣用，拒解國庫」，或「名義上雖有解繳國庫」，實際上「亦不過敷衍若干」^⑫。江蘇都督程德全公開宣稱：「如地稅

⑨ 〈參議院第五次會議速記錄〉《政府公報》（1912年5月16日）。

⑩ 賈士毅：《民國初年的幾任財政總長》頁3（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

⑪ 熊理編：《廣東省地方財政》，轉引自李國祁：〈宋子文對廣東財政的革新（1924-1926）〉《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下冊 頁498（台北：中央研究院，1986）。

⑫ 張一凡：〈民元來我國之地方財政〉周開慶主編：《民國經濟史》頁177（台灣：華文書局，1967）。

之屬於直接者，應歸地方收入。」^⑬而地方政府各種應得之收入又被紳士和制度化紳權所掌握，一級扣一級，到了中央錢糧已所剩無幾[註十二]。1922年以後，中央已無法從稅收機構得到各地資源，曹錕為藉承認各省自治以推行其爭取軍閥支持的政策，乾脆承認土地稅為地方稅^⑭，中央政府放棄了對農業稅的控制。

辛亥革命後，一體化上層組織解體，獨立行政系統又建立不起來，原來依附於一體化官僚機構的行政管理系統紛紛瓦解。除稅收外，維繫社會治安的警察系統是另一個例子。在清末新政時，政府學習日本行政現代化，首先改進地方治安系統。1905年9月清廷創巡警部，1907年在全國各地設巡警道、巡警局。但是由於中國縣以下地方管理歷來由鄉紳承擔，建立警察制度也逃不過一體化中下兩個層次的加入。據王家儉對中國警察制度的考察研究，各省在新政中建立的警察制度，無論是經費籌措，還是具體管理，均要依靠紳士^⑮。從清末新政開始，各地設勸學所、巡警局、公款局，「大抵皆由地方紳士主持，成為具有半官方地位的自治機關」[註十三]。到辛亥革命，一體化上層組織解體，統一的警察組織也不復存在了。雖然各省、縣政府仍設有警察局，但職業性警察學校大多停辦，警察至多只在城裏發揮維持治安的功能，屬於地方軍閥管轄。至於鄉村，警察變作紳士手中的工具，他們無異於傳統維持鄉間治安的民團。其他行政皆不能逃脫碎裂之命運。公共事業從此乏人間津，司法幾乎成為紳士權力的一部分。

民初只有兩個全國性管理系統例外，這兩個系統本來就是由外

^⑬ 《程雪樓先生書牘》上卷 頁44。

^⑭ 陳志讓：〈現代中國尋求政治模式的歷史背景〉 姜義華等編：《港台及海外學者論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頁423（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

^⑮ 王家儉：《清末民初我國警察現代化的歷程》 頁23（台北：商務印務館，1984）。

國人建立並管理的，它們從一開始就與中國的一體化結構無關，既不屬於官僚系統，也與官紳合作不沾邊——這就是海關和郵政系統。不屬於一體化結構之海關和郵政系統能有效率運作，從反面證明了一體化中下兩個層次和現代行政機構是互不相容的。

4.4 洪憲帝制流產和軍閥失控

民國初年政治現代化失敗的象徵性事件是1916年袁世凱的稱帝活動。這一事件意味着建立民主制度無希望後，不得不退回到原有上層組織形態中去——恢復大一統王權。如果我們撇開對袁世凱稱帝事件的道德和是非判斷，而僅對社會結構作靜態分析，就可以發現在一體化結構中下層組織基礎上要建立與其整合之上層組織，除復辟帝制外幾乎沒有其他辦法。中國人只能接受來自意識形態之權威，當時儒家倫理認同尚沒有破壞，廣大城市化紳士接受來自它的權威，而從儒家倫常中能推出的是君主制。正如周錫瑞所說，民初，廣大紳士實際上是支持君主立憲的。鼓吹帝制的理論家楊度似乎已經發現這一點，他在〈君憲救國論〉中就指出：「共和決不能立憲，惟君主始能立憲，與其行共和而專制，不若立憲而君主。」楊度想用君主立憲，來維護憲法的權威。袁世凱在執政的四年中，也充分感到來自地方行政解體的壓力，國家稅收一天不如一天；而執掌財政的梁士詒、周自齊則從另一方面論證，認為只有重啟帝制，利用人們熟知的權威形式，才有可能恢復清朝的徵稅標準^⑩。種種迹象表明，當時上層統治者已感到：為了建立與一體化中下層整合之

^⑩ 歐內斯特·楊(Earnest P. Young):〈現代的保守主義者——洪憲帝制〉李字悌譯，傅樂詩(Charlotte Furth)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頁247 (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1980)。

國家組織，只有恢復帝制。

表面上看來，恢復以王權為中心的一體化上層組織似乎是可能的。清王朝君主立憲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是少數民族政權，廣大紳士精英不承認它代表儒家意識形態的道統。那麼只要換一個漢人皇帝，應該就能得到儒家倫理的支持，重新獲得權威。也許這正是袁世凱稱帝時的如意算盤。但是袁世凱沒有料到，一體化上層組織在意識形態認同遭到破壞之後是不可能重建的。中國道德政治猶如洪水，它既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太平盛世之際，它確實是皇權合法性來源，但民初如果執政者企圖再次利用它，反而會使已經掌握權力的統治者完全喪失其道義上的合法性。在封建社會改朝換代之際，新的君主往往先在「天命」上獲得合法性後，才慢慢獲得道統上的合法性。起初，儒臣服從他是因為視他為「真龍天子」。到新王朝建立後，作為君主的皇帝才日益得到儒家倫常強大的支持[註十四]。「天命」必須來自意識形態的「社會觀」和「哲學觀」這兩個子系統，而民初意識形態的哲學觀和社會觀已出現認同危機，它不再支持傳統的「天命」和「大一統」，不可能再為皇帝提供權威。袁世凱的稱帝反而使他和傳統道統對立起來。在擁護民主共和的人看來，袁稱帝是倒行逆施；而在廣大紳士心目中，這是大逆不道的篡位。「帝制自為」一下子改變了大多數國人心目中袁世凱的道德形象，使他從民初的「華盛頓」變為「竊國大盜」。正如陳志讓所指出的，當時社會上大多數人反袁並不是捍衛民主共和，而是由於他公然把國家作為一姓之私，人們多出於對儒家道德政治原則之捍衛。袁世凱不但沒有得到儒家倫理支持，反而因和儒家倫理抵觸喪失了原有的權威和合法性。從此，北洋軍閥失控，中國形成軍閥割據的局面。

八十年代末，中國有幾個提倡「新權威主義」的學者，鑒於東亞和拉丁美洲某幾個國家在軍事獨裁政權下推行現代化，認為如果民初袁世凱不稱帝，他的軍事獨裁就能夠穩定存在，也許中國的現代

化步伐會比較快。這種見解似乎十分有理。民初，在一體化中下層組織基礎上雖建立不起民主共和的上層體制，但袁世凱至少維持了一個軍人政府，畢竟可以為社會帶來秩序。實際上，這也是一種錯覺，無論袁世凱是否稱帝，他的倒台都是歷史的必然。在一體化中下層組織基礎上，同樣也不能建立一個穩定而又統一的軍人政府。一體化結構一旦出現意識形態認同破壞，就失去了控制軍人的力量。軍人鬧獨立性是遲早會出現的。

政治權威來自於意識形態認同，它本身就包括意識形態認同是控制軍隊的機制。歷史上，中央政權對軍隊的調遣，依靠的是軍事將領對儒家國家學說的臣服，中國歷史上很少出現武裝力量失控。唐代藩鎮割據只是軍隊失控極為罕見的例子，即使在這個例外的分析中，造成節度使武裝割據的原因之一，也只是中央政府無法在這些地區任命儒臣儒將，導致意識形態對軍人控制之失靈。歷史證明，那些以儒臣儒將為節度使的藩鎮基本上聽命於中央，並在扼制藩鎮叛亂中發揮了作用。晚清鎮壓全國性農民大起義的湘軍、淮軍統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均為儒臣，他們對儒家國家學說的自覺維護，使他們即使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也不會違抗中央搞地方割據。曾國藩在湘軍攻克太平天國首府天京後的第八天，就自行解散十二萬湘軍。一旦出現了意識形態認同危機，一體化結構控制軍隊的力量也就消失了。因此，民初要使軍隊服從國家，不發生軍閥割據，只能去建立控制軍隊的現代機制，這就是軍隊國家化。所謂軍隊國家化，是指軍人服從來自憲法的權威，自覺地意識到軍隊只是國家的工具，不受政黨或政治勢力支配。只有在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或其他必要情況下，才依據憲法規定的程序，動用軍事武裝力量。軍隊國家化是規範認同在軍事組織中的確立，它要求軍事組織能與政治勢力和派別鬥爭相分離，只是執行憲法賦予它的功能。民初規範認同障礙又使得軍隊無法國家化，軍隊失控也就成為一個不

可抗拒的自然趨勢[註十五]。

實際上，即使袁世凱不死，軍閥割據也遲早要發生。袁世凱一掌權，就感到軍隊有失控的危險。為強化中央集權，他就摹仿歷代皇帝，削弱因建功而坐大的北洋系將領們的勢力。1914年公佈的省、道官制和裁撤各省都督，都旨在完成中央集權^①。這些做法和歷代開國皇帝為維護中央皇權而削藩的情況差不多。但是，在帝制時代，皇帝這樣做有儒家國家學說作為合法性依據，因而可以名正言順地號令天下。辛亥革命時，中國最有軍事實力的是袁世凱的北洋系，袁本人不但沒有忠君，反而和革命黨講好讓他當臨時大總統的條件，再以武力逼清帝退位。這表明他已經破壞帝制時代的意識形態認同。現在，他又要學皇帝加強中央集權削奪北洋系軍閥的實力，顯然已沒有合法性依據。手握重兵的段祺瑞、馮國璋再也不可能聽命於袁世凱。北洋將領對袁世凱削藩之不滿早就在醞釀之中了。他們拒絕服從袁世凱的命令，終於在袁稱帝之際來了個總爆發。1915年10月以後，因袁世凱公開大搞「洪憲」復辟而引發倒袁運動時，馮國璋也學1911年袁世凱「患腳疾」那樣，小病大養，拒不對反袁的護國軍出兵。1916年4月26日，馮國璋對已宣佈廢除洪憲帝制的袁世凱的總統之職也發出異議^②。郭廷以一針見血地概括了袁世凱的命運：洪憲帝制時，袁世凱只是嘗到了四年半以前他給清廷的苦果^③。無論是當年袁世凱不服從清廷，還是此時軍閥們不聽命於袁世凱，都是軍隊獨立性一天天呈增長趨勢之表現。

由於控制軍隊的機制從來是軍事將領的意識形態認同，將軍們只能靠道義作為凝聚下級軍官的號召，隨着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加

^①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 頁155-156。

^② 陳志讓：《亂世奸雄袁世凱》 頁212-218（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③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 頁444。

劇，軍隊會分裂成不同的部分。四分五裂的軍隊各自都以意識形態殘破不全之道義作為自己的旗幟。袁世凱、段祺瑞在北洋軍中以儒家道德為準，提出「忠國、愛民、親上、死長」；吳佩孚則發明「新君臣觀」和「泛忠孝論」作為團結將士的精神力量。奉系張作霖除了提倡義氣外，也貫徹「儒化」政策；閻錫山則搞中西合璧的「幾希哲學」和「橫豎政治」。馮玉祥把自己的軍隊稱為「基督軍」；唐生智則利用佛教作為軍隊的精神支柱^②。他們誰也不服從誰[註十六]。隨着統一行政之解體，經濟資源掌握在大大小小紳士手中，國家沒有足夠財政收入來養軍。從1912到1922年，全國兵變次數達179次，其中大多為軍隊缺餉所致^③。軍隊既然不能從行政部門取得必要的供給，軍閥為了自己的實力又在不斷擴充兵力，就勢必會借武力直接「取財於民」，「就地取財」。一旦軍閥們貪婪的目光直接轉向社會，他們就會和地方豪強紳士相結合，仰仗紳權地方勢力作為自己的經濟供給系統。當一體化結構失去上層組織時，其中下層組織也是不能長期保持穩定的。它會迅速向軍人與紳士結合形態轉化，形成大大小小軍閥割據。清王朝滅亡五年後，美麗的共和幻象慢慢消失，一個改革者從未想到的怪物——軍紳政權出現在人們面前[註十七]。

4.5 軍紳合流與農村的破壞

據說，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帶領軍閥部隊佔領杭州時，恰逢

② 張鳴：〈中國近代軍閥政治性格的分野——軍閥團體維繫意識各論〉《走向未來》雜誌 第3卷第4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③ 〈民國以來179次之兵變〉《東方雜誌》第20卷1號（1923年1月）。

西湖邊雷峰塔倒塌。當時社會上流言四起，謂大難將至。因為老百姓相信，原雷峰塔下鎮壓着不少妖怪，現在它們一下子全跑了出來，百姓要遭殃了。一體化結構上層解體後中下兩個層次向軍紳政權轉化，就如雷峰塔倒塌，把各式各樣妖魔鬼怪釋放出來。本來紳權受到大一統王權的控制，無論是國家輕徭薄賦政策之限制，還是「仁政」之觀念，都使紳士在剝奪農民方面不敢索取無度。辛亥革命後，紳士和地方政府合一，立即放開手腳對農民剝削。以前增稅還以辦新興工業和其他現代化事業作為名義，到了軍紳政權時，傳統文人紳士政治地位被軍閥取代，軍人和鄉村地主惡霸勾結，明目張膽地增加稅種，預徵田賦，發行公債，甚至開白條徵收。隨着爭權和爭地盤的白熱化，軍閥的行為更像中國歷史上的豪強勢力。他們招兵買馬，搶佔地盤，並拚命聚斂財富。皖系軍閥倪嗣沖1920年5月病重時，準備將2,800萬元分給子侄妻妾。曹錕1924年倒台時，不包括土地，曹氏五兄弟財產即達6,000萬元。王占元督鄂六年，聚財3,000萬；陳光遠督贛五年，財產由90萬元增至1,500萬元^②。這些大大小小的軍閥，口頭上講道義，實際上恃武力揚威，明火執杖地大肆搜括民脂民膏。

本來，清王朝覆滅並沒有給基層帶來多大動盪，而軍紳政權、軍閥混戰立即成為破壞社會秩序之主要因素[註十八]。直皖戰爭、粵桂戰爭、兩次直奉戰爭、江浙戰爭、奉浙戰爭一個接着一個；每年平均差不多有八個省遭受戰火洗劫^③。省內地方性軍閥混戰，規模雖不及大軍閥的省際戰爭，但是打打停停，曠日持久，頻度極

^② 魏明：〈論北洋軍閥官僚的私人資本主義活動〉《近代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5）。

^③ 王全營等：《中國現代農民運動史》頁8-9（河南：中原農民出版社，1989）。

年 份	(A)內戰動員指數 (1917=100)	(B)受自然災害省次 (以一省一次為單位)	A×B激盪指數 1922=100
1917	100	8	33
1918	181	12	89
1920	218	7	62
1922	409	6	100
1924	818	13	433
1926	1,090	12	533
1928	2,000	18	1,467

取自蘇雲峰：〈民初之農村社會〉，《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1912-1917）論文集》，頁646（台北：近史所，1984）。

表4.1 內戰與自然災害互相激盪指數(1917-1928)

高。如四川省境內大戰小仗超過400起^{②④}。從表4.1半定量統計，我們可以看到，1917到1928年間，內戰動員指數擴大了20倍，加上自然災害因素，社會激盪指數增加了44倍，動亂程度呈指數增長趨勢^⑤。

軍紳政權是軍閥和地方豪強的相互勾結，打仗以爭奪土地為目標，而爭奪土地則是為養兵^⑥，破壞對象主要是農村社會。加在農民頭上的田賦地租成倍增長，預徵稅可徵到幾十年以後，苛捐雜稅名目繁多，農民常常不得不舉債應付。高利貸盤剝日益興旺，月息

②④ 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 頁246。

⑤ 蘇雲峰：〈民初之農村社會〉《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1912-1917）論文集》 頁64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84）。

⑥ 陳志讓：《軍紳政權》 頁34。

高達四、五分，甚而八、九分，其結果必然是自耕農紛紛破產[註十九]。

當時報載「小康自給人家，逐漸變成赤貧；衣食不能自給，流而為匪的良民，以極大的速度增加」^②。破產農民大量為匪、成為軍閥擴軍的兵源，而軍隊擴充造成軍費激增，又刺激加緊對農民的搜刮，這樣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據統計，河南省二十年代初農業人口中居然有十分之一是土匪。戰亂對農村的騷擾，也打擊着農村原有的地主紳士的生活，或迫使他們招兵買馬，淪為小軍閥，擁民團橫行鄉里；或迫使他們攜資流入城市。據河南警方統計，1922年秋至1923年春短短半年內，各縣富翁流入省城開封者約為兩萬人^③。辛亥時期還相對比較平靜的農村社會雪崩似地瓦解了[註二十]。

軍紳政權帶來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掌權者思想觀念的倒退。我們知道，自1905年前後的新政以來，意識形態中的哲學觀和社會觀吸收了大量西化內容，這是推行新政和紳士城市化的思想基礎。城市化紳士中有部分是留學生，相當多人雖沒有出國留學，但他們畢業於新學堂，接受了很多西方觀念，因此，辦新政的城市化紳士的意識形態為儒家倫理與西學的混合物。但軍閥大多受教育不多，他們只懂儒家倫理，文明開化程度要小得多。當城市化紳士扮演社會生活中的主要角色時，意識形態相對開放，而一旦文人縉紳讓位於軍紳政權的武裝豪強，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便出現了向傳統的大倒退[註二十一]。

在1911到1928年有傳可考的1,300名左右旅長以上的軍官中，

② 《民國日報》(漢口) 1927年3月19日 轉引自王全營等：《中國現代農民運動史》 頁11。

③ 王全營等：《中國現代農民運動史》 頁15。

只有30%受過教育，其中20名擁有傳統功名，117名是清末派往日本的留學生，29名畢業於天津武備學堂，61名出身於保定軍校。而70%則是文盲或半文盲，他們要依靠幕僚來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們所賞識的幕僚，大多是仇視現代思想的文人^②。他們一旦佔城掌權，在文化和現代化上立即倒行逆施。「孫傳芳不許婦女着旗袍，直隸督軍褚玉璞不許婦女剪頭髮，李宗仁在廣西禁止穿西服，……袁世凱恢復祭天大典，湖南督軍張敬堯到處建寺廟，北京政府的總統選舉、工程開工等日期都由算命的先生來決定」^③。吳佩孚在大軍閥中算是頗通文墨，但也只是一個秀才，沒有受過新式教育。他看見外國人說外語，居然說，讓全世界都說中文不是省了很多麻煩嗎？對西方了解遠不如洋務運動時的官僚。狗肉將軍張宗昌一個大字不識，當了山東督辦，立即把當時六大專門學校合併為國立山東大學，要找一個全省識字最多的人當校長。他手下那班文人一致推薦前清狀元王壽彭。王壽彭提出的條件是，不坐汽車，上下班坐轎子，並在省府設大成至聖文宣王孔子牌位，在孔子神位香案下受職，並兼教育廳長。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讀經規定為各學校主要科目。當有人提出科學不能缺少時，他卻說「那些洋鬼子玩意兒，不要管他」。由此可見軍閥及其手下文人對西學的無知和敵視。正是這位張宗昌，雖對西方東西一無所知，但卻十分推崇儒家倫理，以「孝」治軍。

從這些諷刺性的軍閥軼事中可以看到一個極明顯的事實，由傳統的官紳合作實行農村社會的管理，到現在變為軍紳政權後，給中國帶來了自洋務運動以來從未碰到過的嚴峻局面。自太平天國農民

^② 陳志讓：〈現代中國尋求政治模式的歷史背景〉 姜義華等編：《港台與海外學者論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頁418-419。

^③ 張玉法：《中國現代政治史論》 頁161（台北：東華書局，1988）。

大起義平息後，中國的社會危機主要是由外部西方文明的侵入引起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以及清末新政，均為對西方挑戰的積極反應。現在，外部危機不但沒有解決，內部卻出現了嚴重的社會秩序混亂。危機的罪魁禍首就是軍紳政權，而他們合法性之意識形態基礎就是儒家倫理。軍紳政權不僅利用儒家意識形態的價值核心作為自己討伐異己的道義根據，而且更趨向於復舊倒退。於是一個全社會性的拋棄軍紳政權、批判其意識形態的運動便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甲午戰爭和庚子事變後，人們曾拋棄傳統哲學觀和社會觀那樣。

民初中國第一次政治民主化嘗試的失敗，已經預示着愈來愈強的社會整合危機的出現。而擴大了的紳權必須為社會危機負責。1915年，梁啟超鮮明地表達了整個社會對戊戌以來社會變革後果的不滿情緒，他說：「二十年來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學新政，其結果乃至為社會所厭倦所疾惡：言練兵耶？而盜賊日益滋，秩序日益憂；言理財耶？而帑藏日益空，破產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馴至全國人不復識字；言實業耶？而馴至全國人不復得食，其他百端，則皆若是。」^①自1895-1915這二十年來推動社會變革的主要是紳士階層，梁啟超所表達的社會性的不滿情緒，表明歷史對他們來了一個全盤否定。它猶如隱隱的雷聲宣告儒家意識形態之認同危機即將全面爆發。正在這一年，陳獨秀辦起《青年》雜誌，後又改作《新青年》，新文化運動開始了。中國進入了意識形態更替時期。

^① 梁啟超：〈大中華發刊詞〉《大中華》第1卷第1期（1915）。

第四章 註 解

註一 從辛亥革命前後知縣的人選研究中可以看出在革命中縣級政權過渡實際上是一個平穩連續的過程。以湖南十四個縣當權官員身分統計為例，1900-1911年光復前共有九十四任知縣，其中進士佔17%，舉人26%，生員34%，其餘23%，有傳統功名的佔77%。1911-1913年新政權共有六十四位知事，除11%的暫時留任者有功名外，其餘進士、舉人各佔3%，生員佔17%，有功名的佔34%，無功名的佔66%^②。實際上，1905年後，新學堂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開始進入官僚系統，他們逐步取代有傳統功名的士大夫。辛亥革命後，這個過程只是加快而已，當時仍有34%有傳統功名的人當縣官，表明縣級政府仍掌握在城市化紳士手中，革命中政權的變化只是城市化紳權推翻王權。

註二 傳統封建王朝大多被農民大起義推翻，其解體過程是自下而上，而不是像清朝那樣自上而下。農民大起義首先打擊惡霸地主，然後才是攻縣城、省會，直搗京城的中央政府。兩種解體方式造成的後果是不同的。農民大起義自下而上推翻舊王朝，農村中的紳權首先受到衝擊，這種解體方式對土地兼併等無組織力量清除較徹底。而清朝滅亡只是一體化上層組織解體，它不可能起到打擊土地兼併的功能。何況王權解體同時卻是紳權擴張，紳士根本不會去理會農村的土地兼併問題。以往學術界在討論辛亥革命沒有深入農村

^② 楊鵬程：〈試析辛亥革命時的譚延闓政權〉《近代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5）。

基層時，多從革命黨人主觀忽視土地與農民這一角度來討論。實際上，辛亥革命不僅沒有消除農村土地兼併，反而因紳權擴張而加劇了農村的土地危機，這可以由社會結構變化來說明。進一步分析見本書4.5節和6.1節。

註三 大陸學術界相當多人把民初引進西方民主制度實現社會整合的努力歸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嘗試，實際上當時真正的民族資產階級剛剛在興起之中，他們基本上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一個典型例子是1912年臨時參議院公佈的選舉法，其中第四條對選民資格作了如下規定：(1)年納直接稅2元以上者，(2)有值500元以上不動產者，(3)有小學校以上畢業學歷者。根據這個標準，很多純粹的商人和新興資本家是沒有選舉權的。直接稅是指傳統的地丁漕糧，釐金不在其列。商人和資本家當然很容易有500元以上的資產，但只有房產還不行，土地等才算不動產。很多資本家用的廠房和土地是租來的，而且他們往往沒有學歷。根據選舉法，一個富有的農民可以有選舉權，而很多新興實業家卻沒有資格^③。因此，選舉法一公佈，就遭到商人普遍反對。後來袁世凱政府想用變通辦法把其他稅也算作直接稅，但遭到臨時參議院的否決。

其實，選舉法本身就是城市化紳士階級制定並代表他們參政主張的。當時登記的選民有4,000萬以上，佔全國人口十分之一，其中佔主導地位的正是各級紳士。民初由城市化紳士(擴張了的紳權)來實現社會整合還表現在各級地方政府的組成之中。不僅地方政府大多在城市化士紳手中，就連第一屆國會成員組織中，亦可以看出

^③ 徐宗勉：〈關於資產階級從擁袁走向反袁的歷史考察〉《社會科學研究》第5期（成都：1986）。

成分	人數	百分比
民族資產階級	12	2.6%
職業革命家	28	6.2%
政黨領袖	17	3.7%
自由職業知識分子	157 教師 100 人，校長 52 人，記者、 律師 22 人，學生 33 人	30%
新政府官員	73	16%
原清政府官員	86	18.9%
紳士	65	14.3%

取自張亦工：〈第一屆國會的建立及階級結構〉，《歷史研究》，第6期（北京，1984）。

表4.2 第一屆國會議員的構成

紳士和新式學堂畢業的知識分子是議會政治最主要的參與者。如表4.2所示，在455名第一屆國會議員（佔議員總數之53%）中真正資本家只佔了2.6%，屬於新舊士紳（包括新舊政府官員）則佔49.2%，新學堂畢業的知識分子佔了30%。從中可見民初是由城市化縉紳和知識精英聯合起來實行社會整合的。

註四 這方面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民初制定的《約法》內容本身的局限。民初各省憲法有下列幾個共同缺陷：首先沒有明確地表現主權在民的政治原理，沒有對憲法的最高尊嚴和權威性作明文肯定，而這兩點恰恰是法、美兩國十九世紀以前憲法不可缺少的內容。第二，對政府權力制衡設計不夠周到，如行政首長無類似於解散議會或否決議案的合法權力，議會只有彈劾政務員的權力而不能及於都督。第三，憲法沒有注意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如鄂、贛、蘇、浙

四省的臨時約法均保留了政府剝奪人民自由權的條文^④。民初憲法是城市化紳士和新學堂培養的知識分子以西方為樣板制定的，從這三個缺陷可以明顯看出規範認同與當時人們原有文化觀念的衝突。肯定憲法之最高權威就是肯定規範認同，只有這樣，憲法之正當才不需要意識形態或其它權威來源的支持。而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法的根據是天道，它必須由意識形態推出，因此，規範、程序本身從來即被認為是工具性的，不會具有最高權威。其實，在文字上肯定憲法最高權威並不一定等於人們普遍服從這一權威，但連文字上都不肯定，顯示當時人仍習慣從意識形態獲得政治權威，而看不到西方憲政的文化基礎。此外，憲法不僅是法律之依據，其主要目的是規定如何分配、限制政府之權力，因此憲法中規定政府各部門權力制衡是極重要的內容。它的前提是將政治和個人道德分開，預設掌權者在道德上不一定可靠，是可能濫用權力的，而這一點對於以儒家倫理作為政治行為規範的紳士是不可能了解的。中國存在着強大的泛道德主義傳統，大家普遍把政治看作道德之延長，而政治家必須用道德規範來約束，他們應是道德上的完人，中國政治理念上很少論及掌權者在道德上不可靠時應如何辦。因此，對權力制衡的漠視同樣是傳統文化與規範認同不一致的表現。至於憲法中對人基本權利和自由之維護，可以保證憲法提出的內容不會僵化，可以隨大多數人的意願變化而修改，這些均為規範認同的具體表現。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法和百姓的關係主要是基於道德教化，在這種觀念中，人的基本權利要靠立法系統來確定是不可能被理解的。結果憲法在政治運作中只能成為獨裁者壓迫人民之工具，正如陳獨秀所批評的：「舊人罵約法，是罵它束縛政府太過；新人罵約法，是罵它

^④ 李鐸、林啟彥：〈辛亥革命時期的共和憲法〉《近代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2）。

束縛人民太過。但照事實上看起來，違法的違法，貪贓的貪贓，做皇帝的做皇帝，復辟的復辟，解散國會的解散國會。約法不曾把它們束縛得住，倒是人民底出版集會自由，都被約法束縛得十分可憐。」^⑤

註五 分析唐紹儀內閣垮台過程，處處可以看到憲法缺乏約束政治家行為的權威力量。內閣成立後，袁世凱只是將其視為傳統的幕僚機構，根本不重視憲法規定的各種程序和權限，於是立即和內閣政府發生尖銳衝突。導致內閣垮台的最初導火線是向六國銀行團商洽借款，銀行團提出監督中國財政和軍事開支作為借款條件，全國輿論一致反對。在輿論壓力下，唐紹儀拒絕六國銀行團的要求，袁世凱大為光火，改派財政總長熊希齡與銀行團交涉。同盟會閩員提出辭職以示抗議，唐也表示「公等辭職後，我亦得借此以辭」^⑥。接着又發生責任內閣與袁世凱因人事任命的激烈衝突，最後唐紹儀辭職，內閣倒台。在這一系列過程中，都看得到法定程序和權限對政治家毫無約束力，不僅對於袁世凱如此，對其他官員和民眾也是如此。張玉法在討論民初人們對國會為何會迅速由神聖轉為厭棄的原因時指出，「傳統中國政治行政權獨大，今欲以立法權限制行政權，一般國民固難理解，行政部門尤直接受其害，故不惜破壞國會，以達到破壞制憲之目的」。結果就如梁啟超所說「憲法草案之不為政府所容」^⑦。

⑤ 陳獨秀：〈約法的罪惡〉《獨秀文存》頁578（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⑥ 《民立報》（1912年7月27日）。

⑦ 張玉法：〈民初對制憲問題的爭論〉《近史所集刊》第12期（台北：1983）。

註六 同盟會成員的態度就很典型，他們多是從內閣的組織形式來論述唐內閣垮台的原因。6月20日，張耀曾等四人代表同盟會見袁世凱，認為唐內閣係各黨派混合內閣，「因黨派混雜，意見不一致」，「此後欲圖政治之進行，非採完全政黨內閣不可」^{③⑧}。他們也漠視程序違憲，以為只要同盟會有力量在議會中取得多數席位，組織一個完全的「同盟會內閣」就能解決問題。

註七 這方面，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確實和中國構成明顯對比。1891年日本曾發生俄國皇太子被國粹主義者警察所刺傷的事件。當時日本政府曾擔心此事被人找到借口，主張對犯人的懲處運用侵犯皇室的法律而處以極刑。但是大審院院長島惟謙並未屈服於這種政治壓力，而是採取了維護憲法規定的司法權獨立的原則。日本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規範認同雖不如西方，但比中國仍進了一步。

註八 分析當時的輿論，可以明顯看到紳商的態度。他們把主張討袁的國民黨人稱作「謀為不軌者」，要求「一律嚴拿，盡法懲治」^{③⑨}。大多數紳商在行動上也秉承袁氏旨意，「斷絕一切與叛黨之經濟關係」，積極幫助速平禍亂^{④⑩}。事後，袁世凱親自通令嘉獎各省商會、商團幫助鎮壓二次革命，稱「各商界燭其奸邪，絕其資助，遂使逆謀無由大逞，亂事得以速平，曲突徙薪，功匪鮮淺」^{④⑪}。

註九 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曾提出一個公式來描述傳統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發生政治紊亂的原因，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不穩

③⑧ 〈大總統與同盟會代表之談話〉《政府公報》(1912年6月22日)。

③⑨ 《申報》(1913年6月5日)。

④⑩ 《申報》(1913年8月3日)。

④⑪ 《袁大總統書牘匯編》卷2 頁70 (上海：廣益書局，1914)。

定程度和人們的政治參與成正比，和政治制度化程度成反比^{④②}，即有如下公式：

$$\text{政治不穩定} = \frac{\text{參政程度}}{\text{政治制度化程度}}$$

事實上，任何集體活動是否有秩序都可以用類似的公式來表示，集體活動之混亂與參加人數成正比，和規則完善程度（包括人們是否遵守規則）成反比，正如一場體育競賽，當參加的人很多、大多數人又不遵守遊戲規則時，運動場上必定亂成一團。我們發現，只要將這個公式分子分母意義作適當擴充，就可以用來說明民初一體化上層組織解體後，擴張了的紳權和新知識分子若不能實現社會整合，政治秩序必然會日益混亂。

我們先來看看清王朝滅亡以前的情況。公式的分子可以用一體化結構上層和中層人數來估計。大一統官僚體制內官僚約十五萬，中層的士紳共一百五十萬，因此參政者大約一百六十萬。公式的分母部分為中國傳統政治運作規則，它們都基於意識形態認同，在傳統社會中當意識形態認同良好時，一體化結構中上層政治運作是穩定而有秩序的。到民國初年，公式的分子和分母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政治參與者除了傳統士紳外，還包括了廣大新學堂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正如我們在3.3節所指出的那樣，新學堂培養出的城市知識分子很快就在數量上超過傳統縉紳。到1917年，受過新式教育的人數達一千萬之眾^{④③}，他們都是潛在的政治參與者。也就是說，

④② 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張岱雲等譯 頁60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9)。

④③ 周策縱:〈五四運動的背景和歷史意義〉鍾玲譯 周策縱等:《五四與中國》頁31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980)。

民初社會政治參與量擴大了近十倍。而分母則因意識形態認同破壞而大大變小了。我們可以想見，當分子擴大，分母大大變小，政治運作紊亂程度必定日益增大。在這裏，分母變小是關鍵性的。本來，在傳統社會政治現代化過程中，政治參與擴大是必然的，但隨着參與擴大，須同時實現政治運作制度化，以保持政治秩序穩定。在民初的民主嘗試中，人們確實想建立各種規則，實行政府運作制度化。有人曾對《東方雜誌》1915年開設的「法令」欄公佈的法規進行統計，發現到1921年此欄結束止，民初公佈的法律、條文、規則無論從內容上還是數量上都是清末預備立憲所不可比擬的，但這些法規大多不起作用，於是人們再也沒有興趣制定它。從表4.3可見法規數是一個遞減序列。它表明，在中國傳統社會一體化結構解構過程中，一方面出現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妨礙規範認同確立，另一方面卻使政治參與量擴大十倍，這時政治紊亂不可避免。

年 份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合計
公佈法令、 條例之數目	150	55	34	51	39	40	22	391

據王躍：〈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社會意識變遷的趨勢〉提供數據製表，《近代史研究》，第3期（北京，1987）。

表4.3 1915-1921年公佈的法令、條例數目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解釋為何辛亥革命後，省議會政治比清末諮議局秩序更差^④。而到北京政府時期，由於意識形態認同進

^④ 王樹槐：〈清末民初江蘇省諮議局與省議會〉《台師大歷史學報》第6期（台北：1978）。

一步破壞，政治更是亂作一團。從1912年至1928年北京政府共建立59屆內閣，平均每一內閣任期僅100天。59任國務總理中，任期在一個月以下者14任，一至三月者24任，三至六月者11任，六至九月者5任，九至十二月者2任，十二月至十五年者1任，十五至十八月者2任。外交總長有42任，內務總長39任，財政總長49任，陸軍總長33任，海軍總長25任，司法總長39任，教育總長43任，農商總長40任，交通總長43任^{④5}。

註十 清末財務機構混亂而沒有系統，以致同一性質的稅捐，往往設不同機構徵收。如兩江總督衙門經費16.6萬餘兩，總督兼通商大臣及鹽政、養廉公費約19萬兩，它們來源於八個解款機構，其中重複解款者有四個，且有重複三次者，共計十六次解款。稅務機關組織混亂使得它的收入常常極不穩定，如淮安關正稅，1907年為4.6萬餘兩，1908年為10萬兩，1909年為21.2萬餘兩^{④6}。在稅源變化不大的情況下，稅收差異竟是如此之大。黃仁宇也批評過中國傳統稅收機構之混亂和非專業化，他甚至認為，中國沒有建立一個可以進行數量管理之財政機構是它遲遲不能現代化之主要原因。為甚麼一體化結構中不能建立一個高効、統一、深入農村的全國性稅收系統呢？這和它通過官紳合作深入農村有極大關係，正因為大量稅收和公共事業只能通過官紳合作完成，全靠官方是無能力把一項事業在廣大農業社會推開的。而紳士承辦的私人性質使得任何公共事業的實施，不可能建立高度專業化之機構。像田賦這些重要稅收，官僚機構尚可設專門部門管理，對其他新稅，只是因事而設項目，交給紳士或商人去做，這就造成統一行政的困難。

④5 張玉法：《中國現代政治史論》頁106。

④6 王樹槐：〈清末民初江蘇省的財政〉《近史所集刊》第11期（台北：1982）。

註十一 陳志讓曾論述過民初財政困難：「革命之後，縣款不解於省、省款不解於中央」，如1913年各省承擔解給中央的款項應是3,250萬元，實解不過560萬元。但根據財政部報告，自民國元年到二年十二月，各省實解才260萬元。袁世凱強化中央集權後，財政收入一度稍有好轉，1916年各省上繳中央稅款達2,000多萬元，是民國初年中央政府收入最好的年度^{④7}。但隨着袁世凱稱帝失敗，中央權威一落千丈，政府財政收入也日益枯竭。張玉法曾詳細列舉過各項收入不斷減少的情形。北京中央政府的收入原來主要有三類；其一為田賦，它們大部落於地方軍人之手。其二是關稅，自1854年後關稅掌握在外國人手裏，多用以抵借外債，剩下來的有限。1912-1927年間，北京政府僅得關稅餘13,000萬餘兩，不過總額的18%。其三是鹽稅，自1913年善後大借款簽訂以後也由外國人掌握，作為外債抵押，部分收入歸地方。1918至1928年的鹽稅餘額除1923年不詳外，其餘各年共達64,000餘萬元，中央政府所得只有32,000餘萬元，其餘均歸地方所得^{④8}。

註十二 表4.4為1918年至1923年中國鹽稅餘額及它為地方政府和軍閥所截留的數目，從這個數目可以明顯看到，截留數額愈來愈多，到1926年已達74%。

註十三 引進西方警察制度，本是清末紳士城市化帶來的一個結果。在中國傳統社會，農村治安大多由保甲制及紳士辦團練來維持，也就是說，地方治安本是一體化中層組織之功能。中國紳士城市化潮流興起，一體化結構中層組織功能衰退。1902年以後，地方

④7 陳志讓：《軍紳政權》 頁21。

④8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 頁204-205（台北：東華書局）。

年 代	全部鹽餘(千元)	截留數(千元)
1918	71,671	15,000
1919	75,183	26,000
1920	64,020	24,000
1921	70,474	18,000
1922	78,862	31,000
1923	89,800	30,200
1926	64,287	47,672
1927	—	52,557

取自陳志讓：〈現代中國尋求政治模式的歷史背景〉，《港台及海外學者論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頁422（重慶，1988）。

表4.4 1918-1923年中國鹽稅餘額及截留數

的保甲團練制度已經破壞，新政開始後大力引進西方警察制度。辦警務的經費大多靠紳士自籌，由城市化紳士負責實施。因此清末警察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紳士城市化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說，警察制度的命運始終是和城市化紳士聯繫在一起的，隨紳士城市化興起而興起，又以城市化紳士退出歷史舞台而衰落。由於城市化紳士不可能實現社會整合，全國性統一警察網也得不到建立。民國初年，社會重軍不重警，警務由清末「要政」降為一般行政。袁世凱為了使警權控制集於中央，下令各省警察學校停辦。打擊地方紳士的行動也立即損害了警務，隨着軍紳政權的出現，城市化紳士讓位於軍

閩，全國警務開始急驟衰落^④。

註十四 根據圖2.3所示，在一體化結構中，王權的直接支援意識來自天命和大一統思想，中下層組織的直接支援意識才是儒家倫理。只有在大一統王權確立相當長時間後，王權才能慢慢獲得儒家倫理支持，我們在3.1節指出，清王朝的王權有「天道觀」、「大一統思想」和「綱常教義」三大支柱，實際上「綱常教義」這一來自於儒家倫理之支持，是清王朝建立相當長時間後才出現的，只有等人們已臣服某一統治權威以後，國家才被看作家庭關係的放大。這一過程對袁世凱稱帝來說實不可能做到，因為在哲學觀(天道)和社會觀(大一統思想)已經出現認同危機的條件下，王權不存在其直接的意識形態基礎，這時要建立皇帝的權威是不可能的。袁世凱稱帝的失敗進一步表明，在一體化結構中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和一體化組織三個層次之間微妙的對應關係。

註十五 將亨廷頓用於描述政治紊亂原因之公式(註九)稍加改造，來研究軍隊失控的條件，即得出：

$$\text{軍閥割據的可能性} = \frac{\text{軍人數目}}{\text{對軍隊的控制能力}}$$

在傳統一體化結構中，軍隊數目並不多，對軍隊控制要依靠儒將意識形態認同，這時出現軍隊不聽命於王權，鬧獨立的可能性很小。在清王朝滅亡之前，全國新軍總數只有241,000人，其中北洋系約

^④ 王家儉：〈清末民初我國警察制度現代化的歷程(1901-1916)〉《台師大歷史學報》第10期（台北：1982）。

為145,000人，佔60.2%，非北洋系為96,000人，佔39.8%^⑩。而隨着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擴展，軍隊不再效忠於王權，我們看北洋系和非北洋系已出現分裂，這是辛亥革命的社會條件。但軍隊還未達分崩離析的程度。民初，意識形態認同危機進一步加劇，對軍隊控制力的繼續減弱，而軍隊卻在不斷擴充，軍閥割據局面迅速形成。就在各省宣佈獨立之際，地方軍隊大擴充，以蘇、皖、贛、閩、湘、鄂六省計，原有的新軍由55,640人猛增到36萬餘人，全國軍隊達90多個師，110萬人^⑪。1918年，軍隊擴充到130萬，到三十年代達200萬^⑫。在中國追求現代化過程中，要取得民族獨立，軍隊的擴充本是必不可少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在傳統控制軍隊的機制——意識形態認同迅速失靈的條件下，要防止軍閥割據唯一的辦法是讓軍隊服從憲法，使軍人不問政治，成為國家的工具。控制武力的辦法由傳統變為現代形態。但是民初規範認同的障礙使得憲法並無權威，袁世凱稱帝失敗後，意識形態認同凝聚力消失，北洋系內部分崩離析，軍隊迅速失控。軍閥割據出現和民初民主憲政導致政治紊亂的本質，均是傳統一體化解構後社會不能轉向現代整合方式之表現。只有等新文化運動以後，中國出現了一種新意識形態，才再次恢復對軍隊的控制能力。黨軍正是建立在新意識形態認同機制之上的，軍閥割據雖得以克服，但這時軍隊又成為新一體化結構的重要部分，進一步論述見本書第六章。

註十六 非常有趣的是，中國軍隊傳統上服從意識形態的號召力，

⑩ 劉鳳翰：〈論新軍與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

⑪ 汪朝光：〈論民初裁兵問題及其與資產階級的關係〉《近代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6）。

⑫ 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頁364。

在意識形態認同解體之後，我們仍可以發現，不同軍閥隊伍中治軍思想影響力的大小和軍閥勢力存在着一種微妙的對應關係。我們將各種思想在當時的影響力分為A、B、C、D等不同等級，可以得到表4.5，它基本上就是軍閥勢力大小的順序等級。

類 型	傳統型 (儒家意識形態)	尚義型	嫁接型	宗教型		迷信型
				基督教	佛教	
代表人物	袁世凱 段祺瑞 吳佩孚	張作霖	閻錫山	馮玉祥	唐生智	劉 湘 孫殿英
組織原則	新君臣觀 泛忠孝論 儒家氣節	結盟意識 義 氣 儒家政策	中西結合的 「橫豎政治」 「好人主義」	基督教 仁愛、 勇敢、 互濟原則	三身真義	「孔孟道」 「廟會道」
所佔等級	A	B	B	C	C	D

據張鳴：〈中國近代軍閥政治性格的分野——軍閥團體維繫意識各論〉提供材料製表，《走向未來》，卷3，第4期（四川：人民，1988）。

表4.5 民初軍閥的意識形態類型

註十七 軍紳政權這一名稱是陳志讓提出的。他把1860-1895年這段時間稱為紳軍政權，把1912-1937年的政治結構稱為軍紳政權^⑤。我們雖沿用軍紳政權的說法，但含義和陳志讓所說的不同。顧名思義，軍紳政治和紳軍政權都是從紳士和軍人結合方式來定義政權性質。在鎮壓太平軍過程中興起的湘軍、淮軍都是紳士武裝，或許這是把1860年以後的政治結構稱為紳軍政權的原因。但我們不同意這種分法。我們認為如果用一體化組織三個層次的形變來分析這一問

^⑤ 陳志讓：《軍紳政權》 頁166。

題，可以澄清很多含混的概念。鎮壓太平軍的武裝雖由紳士領導，但它本屬於傳統一體化結構，因此把晚清政治結構稱為紳軍政權並不合適。軍紳政權的核心是軍人和紳士結合，它只出現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辛亥革命後，一體化結構上層組織解體，最初城市化紳士是政治主角，政治結構仍不是軍紳政權。只有城市化紳士(文化程度較高，也接受了相當多的西方影響)被軍人取代，軍閥和鄉間地主結合，才出現了軍紳政權。軍紳政權是軍人和紳士的結合並主導的政治結構。「紳」有兩重含義，一是指他們在鄉間有勢力，是地主和地方領袖，另一個含義是他們有相當文化素養，大多有傳統功名。如果嚴格套用紳士定義，中國從未有過軍人與紳士之結合。但如果我們把「紳士」的含義稍加擴大，把在鄉間有影響有勢力的地主、領袖都包括進去，那麼可以說，其上層文化程度較高，1895年後接受新式教育的較多；中下層文化程度偏低，接受西化影響和接受新式教育較少。當一體化上層沒有瓦解或剛瓦解，政治結構是官紳結合或以城市化紳士為領導。只有當城市化紳士退出歷史舞台，軍人才與下層紳士(地主)結合，1916—1928年這段時間中國可以說存在過某種軍紳政權。1928年中國社會重新整合，其政治形態也不是軍紳政權。

註十八 我們把社會整合定義為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子系統進行良好耦合。中國傳統社會中，這三個子系統是互相耦合的(圖1.2)。傳統一體化解構，正是這三個子系統耦合的解體。我們在第二、第三章討論的意識形態認同危機與政治改革之互動，正是分析意識形態結構與政治結構耦合是怎樣解體的。紳士城市化、通商口岸成長，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則是經濟結構和政治、意識形態耦合之解體，它標誌着國家對現代企業干預之放鬆。本章討論的規範認同障礙、行政現代化困難和軍隊國家化失敗則是指在舊整合方式解體

時，一種將政治、文化、經濟三個子系統重新整合起來的新結構不能建立，社會秩序必定隨着傳統一體化結構解體日益混亂。到三個子系統耦合完全破壞時，社會危機就會由一系列惡性循環引起：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引發的政治混亂，政治上的脫序伴隨着日益擴大之社會經濟危機，三個子系統的混亂在互動中加劇，這正是1916年後中國的狀況。不少學者在分析軍閥時代社會危機的起因時，都發現了這種互動式的惡性循環。軍閥勢力的擴張會要求地方政府拿出更多的錢來養兵，結果省庫入不敷出，不得不預徵田賦、增加捐稅和濫發公債，加上紳士地主殘酷剝削，引起農民破產。農業無可挽救的衰落了。它反過來使財政收入減少，又不得不加重對農民之剝奪，結果出現農村經濟雪崩一般的瓦解^{⑤4}。薛立敦(Sheridan)和齊錫生則指出，軍閥數目與農民破產之間也存在一個惡性循環。農民破產為軍閥提供了大量兵源，而軍閥混戰則引起農民破產，結果造成更多的軍閥。他們以此來解釋為何北方軍閥多於南方^{⑤5}。總之，一旦社會結構三個子系統耦合完全被破壞，就具有三個子系統互相加劇社會脫序之性質，它表明這個社會再也不能照原來的樣子存在下去了。

註十九 經過十九世紀中葉以太平天國為代表的農民大起義，中國農村土地問題本已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決。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提出平均地權，主張耕者有其田，但革命黨中很多人不以為然，認為

⑤4 唐蘇妍：〈1920至1926年湖南農業經濟狀況與農民運動的興起〉《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4期（長沙：1986）。

⑤5 J.E.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p. 1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Hsi-sheng 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pp. 82-83, p. 9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應改作「平均人權」。這反映了排滿反清的紳土地主的立場，同時也表明當時農村土地兼併並不嚴重。一體化上層解體，中下層組織轉化為軍紳政權後，歷來土地兼併中的罪魁禍首——官僚地主，則以手裏拿着槍杆子的軍閥面貌出現，而社會上沒有其他力量遏制他們對農民的掠奪。他們迅速取代了原來農村中佔主導地位的縉紳地主，成為最大的兼併者。表4.6為部分軍閥所掠奪的土地，佔地數千畝已是小數，有的甚至佔全省土地的三分之一。表4.7為四川山麓地主的統計，其中軍閥地主在短短的幾年中已佔田數的80%以上。江蘇、安徽經過太平天國大起義掃蕩後，土地問題解決得相當

軍閥名	擁有土地(或資財)	所在省區	備註
李厚基	200頃	福建	曾在福建任鎮守使、督軍、省長等職
張敬堯	700-800 頃	安徽	皖系軍閥，曾任湖南督軍
倪嗣沖	700-800 頃	安徽	皖系軍閥，曾任安徽督軍
袁世凱	約 400 頃	河南	北洋軍閥始祖
趙恒惕	100 頃以上	湖南	湖南軍閥，曾任湘軍總司令
陸榮廷	全省的三分之一	廣西	桂系軍閥，曾任廣西督軍
譚浩明	全省的三分之一	廣西	桂系軍閥，曾任廣西督軍
張作霖	350頃	東北	奉天督軍
閻錫山	(有資財6,000,000元以上)	山西	山西督軍
吳俊陞	土地極多	黑龍江	黑龍江督軍
曹錕	土地極多	直隸	直系軍閥，曾任薊榆鎮守使

取自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179-180（台北：東華）。

表4.6 部分軍閥佔有土地資財

地 區	地 主	地主總戶數%	佔田數%
川北區	新地主(豪劣、團閥、高利貸地主)	73	87
	舊小地主	26	3
川東區	新地主(軍閥佔多數)	46	88
	舊地主	51.2	10
川南區	新地主(豪劣) 舊小地主 存在於邊遠區	42.6	86.8

取自陳志讓：《軍紳政權》，頁137。

表4.7 四川山麓地帶地主分佈情形

地區	江 蘇				安 徽			
	昆 山	南 通		奉 賢	宿 縣		來 安	
地租形態	折 租	錢 租	折 租	分 租	錢 租	錢 租	分 租	錢 租
年份	折 租	錢 租	折 租	分 租	錢 租	錢 租	分 租	錢 租
190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14	157	207	155	155	145	81	158	150
1924	296	316	272	272	261	153	246	250

取自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2輯，頁329（北京：三聯，1957）。

表4.8 昆山等地地租增長指數(1905-1924)

好，十九世紀下半葉，荒地很多，農民負擔較輕，經濟恢復很快。但從表4.8可見，1914年後的十年中，農民地租普遍增加了一倍。軍紳政權在十年中積累之無組織力量相當於一體化結構在上百年才能造成之後果。總之，新文化運動後期，中國農村再次出現了類似

歷史上王朝末期那種農民陷於赤貧境地的局面。到1927年，無地農民達55%，再加上佔地極少不足以維生的貧農，共有75%的農民瀕於貧困死亡線上(表4.9)^{⑤⑥}。農業生產急速萎縮。據統計，全國小麥產量1918年為43,140餘萬石，到1923年降到27,360萬石^{⑤⑦}。到二十年代中期，中國有史以來首次成為主要的糧食進口國，被某些外國人稱為「飢餓之邦」了^{⑤⑧}。

農民分類	人數(百萬)	佔總人口%	佔全國耕地%
佃農	136	55	0
雇農	30		
無業遊民	20		
貧農	66	20	6
中農	36	11	13
富農	27	8	19
中小地主	13.5	4	19
大地主	7.5	2	43
合計	336	100	100

取自王全營等：《中國現代農民運動史》，頁25（河南：中原農民，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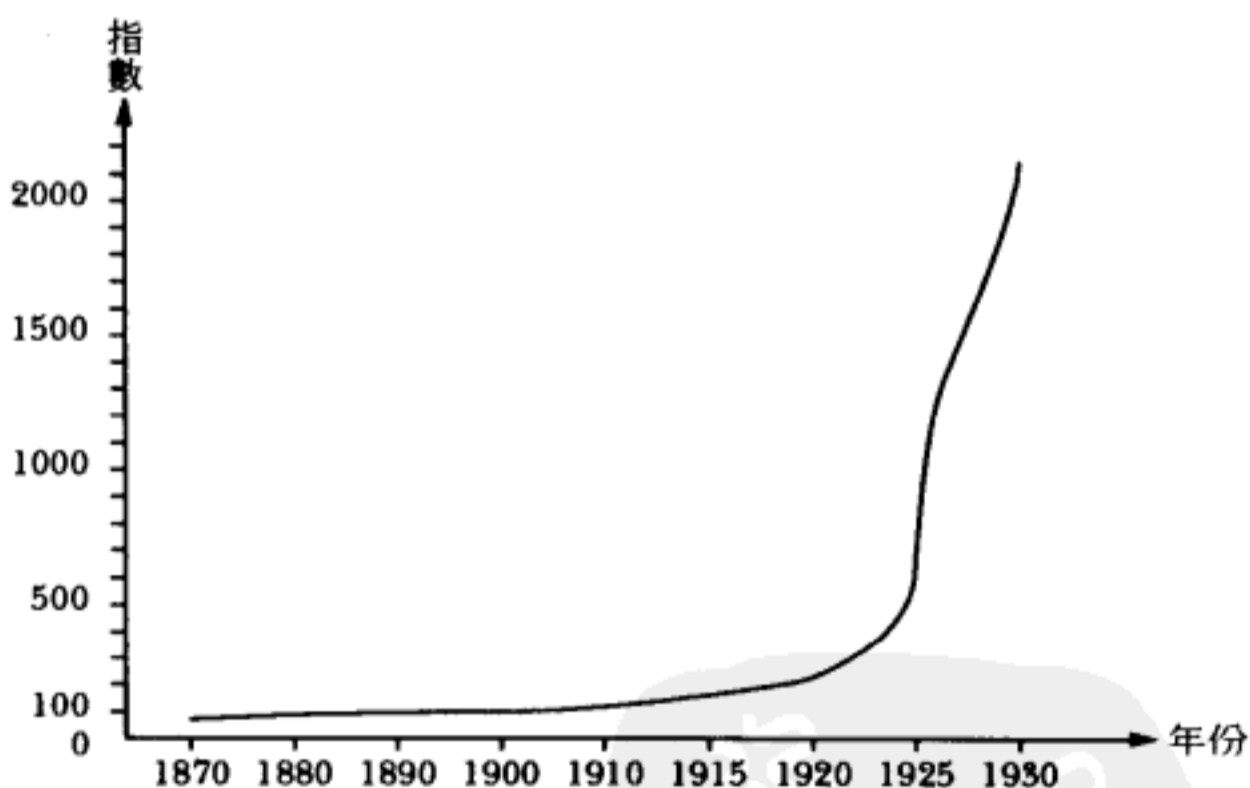
表4.9 1927年的中國農村階級結構及土地佔有狀況

註二十 一項有關中國農民生活的長程研究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證據。有人探討了自同治九年(1870年)到民國十三年(1924年)四川省物價、田租、銀價的變動，發現自同治九年(1870年)至民國四年

⑤⑥ 王全營等：《中國現代農民運動史》 頁25，15。

⑤⑧ 古爾伯特·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 頁417。

(1915年)，田租變化不大，銀價也沒有大幅度漲落，米價很穩定。例如自1835到1910年，七十五年間各物價之總平均上漲為122.5%，僅一倍多一點。但民國四年(1915年)後它開始呈指數增長(圖4.1)。在軍紳政權出現前，近代四川省農民生活多半安定、自足而且自得其樂。洪憲帝制失敗後，中央政府衰落，戰爭頻繁，軍閥大量擴軍，橫徵暴斂。物價、田租、銀價大幅度上升，農村社會迅速解體^{⑤9}。



取自呂實強：〈近代四川的農民生活〉，《近史所集刊》，第7期（1978）。

圖4.1 中國近代物價增長曲線圖(以四川為例)

註二十一 據賀躍夫估計，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尤其是廢科舉之後，士紳群體中約有五分之一左右的人，也就是三十萬人通過各種

^{⑤9} 呂實強：〈近代四川的農民生活〉《近史所集刊》第7期（台北：1978）。

途徑，受到程度不等的近代教育。如清末廣東士紳總數為十一萬人，其中受過近代教育的有25,000餘人，佔廣東總士紳數的22.8%，湖北士紳中接受過近代教育的佔26%^⑩。因此我們可以說，士紳階層中有五分之一具有較高的文化或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他們當然大多是城市化紳士。隨着城市化紳士退出政治舞台，也就是這五分之一的人從紳士階層的領導地位中被排擠出來。而軍紳政權的出現，則是軍人和紳士中落後部分的結合，紳士階層的意識形態一定會出現大倒退。

^⑩ 賀躍夫：《晚清士紳與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兼與日本幕末、明治士族比較》 頁67-68。

第五章 意識形態更替機制

最能激勵人的發現莫過於去發現觀念的來源
——艾克頓

5.1 新文化運動的三個前提

1915年以後，中國出現了一股很奇怪的潮流，那些熱衷於政治的領袖人物紛紛放下原有工作，專心去從事文化的思考。職業革命家孫中山閉門讀書寫作，重新思索中國的改革方案。在反對袁世凱稱帝鬥爭中起了關鍵作用的梁啟超拋開政治生涯，再次出國考察，聲稱不再從政，投入辦報紙、組織研究社團、進行文化論戰等種種事業。甚至連一些佔據政治舞台的軍閥也迫於潮流，裝模作樣地研究起憲法來。至於廣大新知識分子，則普遍厭惡政治。當時成立的許多社團都有反對與政黨接近、甚至不談政治的規定。人們以「不黨」、不涉及「政界」為榮，開始對中國文化進行全面反思。史學家把1915年後出現的思想觀念的大變革稱為新文化運動。根據超穩定系統對外開放條件下的演變邏輯，它乃是全面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大爆發的徵象！

我們在第二章已闡明，1895年由洋務運動失敗引起局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1900年庚子事變加劇局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的結果是推動了清王朝新政。第三章說明清王朝政治改革的結果卻是加速一體化上層組織的解體，以致於清王朝自身的覆滅。第四章着重描述辛亥後出現的日益嚴重的社會整合危機，又成為引發意識形態變遷的巨大動力，中國遂出現全面意識形態認同危機。

我們把全面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和局部認同危機進行比較，發現它們有着不同的性質。首先，其猛烈程度遠大於局部認同危機。如果把陳獨秀1915年辦《青年》雜誌作為新文化運動之開始，把1924年國民黨改組、社會再次出現參政熱潮而文化熱冷卻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結束，那麼這一時期約為十年[註一]。在2.7節，我們曾用知識分子及士大夫創辦學會的數目來度量認同危機之強度，如果仍沿用這個指標，我們看到在這一時期中，知識分子團體呈指數增長，報刊言論如火山爆發[註二]。全面認同危機的最大特點是它導致了局部認同危機不可能有的後果，這就是意識形態整體性的更替。《新青年》雜誌內容演變可以明顯分為兩個階段，1919年五四運動前，它以批判儒家倫理的反傳統為主，執行拋棄舊意識形態的功能；1919年後它迅速演變為一個宣揚新意識形態——馬列主義的刊物[註三]。

在新文化運動中，新知識分子拋棄儒家意識形態、接受新意識形態，是不爭的事實。但為甚麼恰恰是在這一時期實現意識形態更替？已有的解釋並不令人滿意。在大陸歷史教科書中，新文化運動被定為中國現代史的開端，而洋務運動、戊戌維新、晚清新政甚至辛亥革命則屬於近代史，在近代和現代史之間有一條斷代鴻溝，這些大的歷史事件間的內在聯繫往往被忽略。以往歷史學家大多僅從文化思想角度來研究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的全盤反傳統、對新意識形態趨之若鶩，他們多將其歸之於外來影響，或從文化心理找原因。事實上，新文化運動發軔於甲午戰敗後二十年、清廷全面改革後十年，這都不是偶然的。應該說，二十年恰是歷史變遷中可以顯示出那些長程動力的時間尺度。用超穩定系統史觀來看，新文化運動的意識形態更替只不過是甲午後開始的局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不斷加劇的後果，是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二十年互動過程的最後階段。

意識形態更替包括拋棄舊意識形態、接受新意識形態兩個環節。我們可以從一體化結構中意識形態與社會組織三層次的耦合關係(圖2.3)，來分析意識形態更替的條件。意識形態更替的第一個前提是爆發意識形態全面認同危機，社會批判意識指向儒家倫理。它只有在大一統王權解體、紳士要為嚴重的社會整合危機負責時才會出現。第二，正因為在一體化結構中，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和社會組織三個層次存在着耦合，即意識形態內容和三層次組織者所擔當的角色有着一種對應關係。拋棄某部分意識形態內容等於否定對應層次角色的合法性。儒家意識形態的哲學觀和社會觀是王權和一體化上層組織——官僚機構的合法性基礎。對於廣大儒生縉紳來說，拋棄它們比較容易。因為在一百五十萬紳士中，進入官僚機構的畢竟只佔百分之幾，而且，清王朝是少數民族政權，士大夫反清的民族主義有助於他們和王權劃清界線。而拋棄儒家倫理，無疑等於否定儒生紳士充當社會領袖菁英之合法性。因此，只要意識形態的反思者仍處於一體化結構內，並擔當着中下層組織領導者之角色，靠他們拋棄作為自己合法性基礎的意識形態內容幾乎是不可能的。全面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引發拋棄儒家倫理的意識形態更替，還必須有賴於出現不屬於傳統紳士的新知識分子群體。第三，由於意識形態是整體性思想體系，意識形態更替，就意味着社會思想在社會觀、價值觀、哲學觀三方面同時出現整體性變化。

新文化運動前，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變化不是整體性的。甲午戰敗後，進化論被引進哲學觀；1901年左右，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模式、地方主義進入社會觀。整個意識形態構架雖仍是傳統的，但隨着哲學觀和社會觀不斷增加新內容，已破壞了舊意識形態的整體性。新文化運動中，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的變化結果又恢復了整體性。新知識分子高舉「打倒孔家店」大旗，一下子改變了意識形態之核心——倫理價值系統。人們拋棄儒家倫理、認同科學與民主這

些新價值之時，社會觀和哲學觀也同時發生鉅變。進化論不再時興，知識分子普遍認同唯物主義哲學，稱霸二、三十年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被經濟決定論和唯物史觀取代。在社會觀方面，西方資本主義、地方主義不再有天經地義的合法性。不論新知識分子分多少派，大家差不多都贊成社會主義為最終理想。可以明顯看到，新文化運動中伴隨價值觀改變的同時，出現了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的全面質變。兩種整體性的新思想體系——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正是新文化運動的產兒。新意識形態取代舊意識形態要求三個子系統保持相互協調的一致性，必須以知識分子實現倫理中心主義的突破為前提。

所謂倫理中心主義，是指把倫理道德看作高於知識價值之心態。中國自孔子開始，一直主張倫理道德的價值優先，知識系統也是適應儒家倫理的。在倫理中心主義心態下，意識形態信仰者可以把主要源於知識系統的哲學觀、社會觀與價值觀劃開，即使意識形態在知識系統方面出現混亂，也不會構成對倫理價值系統的損害。在受到西方衝擊以前，作為一個整體性思想體系的儒家學說，其哲學觀、社會觀和價值觀是相互和諧的。但是當外來衝擊導致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時，倫理中心主義便構成了一個強大的保護帶，使得局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只停留在哲學觀和社會觀兩個子系統之中，難以波及倫理價值系統[註四]。如果不破除倫理中心主義，那麼拋棄儒家倫理、用新意識形態取而代之也是不可能的。

綜上所述，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發展到拋棄舊意識形態，應滿足三個條件。第一，一體化上層組織王權官僚體系解體後，中下層組織核心的紳士階層成為社會整合危機責任之承擔者，社會批判意識才能夠觸及其意識形態基礎；第二，意識形態的反思者已不再屬於傳統一體化結構，他們已擺脫一體化組織中各種角色；第三，意識形態反思者實現了倫理中心主義突破。這三個條件經過近二十年的

醞釀，以社會政治經濟結構鉅變為基礎，它們恰好在1915年前後成熟，形成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的內在動力。

在前幾章概述意識形態與社會組織互動中，我們已談到這些促成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動因。本章中，為了理解意識形態更替，特別是為甚麼知識分子在拋棄舊意識形態之後會接受馬列主義和三民主義，我們就必須從分析促成新文化運動的三個前提開始。

5.2 批判紳權

眾所周知，反對儒家倫理的導火線是1916年8月國會對尊孔的討論。1913年袁世凱把尊孔和進行跪拜禮的條文寫進《天壇憲法草案》。袁世凱倒台後，議員們對應否取消這些條文進行了辯論。康有為在報上發表了〈致總統總理書〉，聲言尊孔尚且不足，應該進一步「以孔子為大教，編入憲法」，否則就是自甘為生番野人^①。同年11月，參眾兩院中一百多名議員組成國教維持會，全國紳士也掀起國教請願運動，一時尊孔聲勢轟轟烈烈。這種現象表明，辛亥革命導致王權崩潰後，紳士成為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他們不但無力解決王權崩潰後的社會危機，很多人還是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支持者，並且念念不忘儒家倫理，想用它作為建立政治組織和實行社會整合的理論依據。正在這一關頭，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了針鋒相對的〈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再論孔教問題〉等一系列文章，掀開了新文化運動反對「為吾國倫理政治之根本」的孔教之序幕^②。新文化運動興起的過程

① 康有為：〈康南海致北京政府書〉《時報》（1916年9月20日）。

② 陳獨秀：〈憲法與孔教〉《陳獨秀文章選編》上 頁144（北京：三聯書店，1984）。

顯示了它的實質是批判紳權的文化基礎。

批判紳權的意識形態基礎發生在王權瓦解之後，特別是在城市化紳士建立憲政失敗、傳統紳士不得不為日益嚴重的社會整合危機負責時。這一現象反映出中國普遍的社會批判意識的指向，並不是完全基於文化觀念本身的理路和社會功能，而主要取決於這些文化觀念符號(合法性來源)所代表的社會階層的狀況。當社會對該階層普遍反感時，才會掃蕩其意識形態基礎。甲午戰敗後，大一統王權和中央政府成為批評對象，它們要為防衛現代化失敗負責。因此，這時出現的局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主要表現在拋棄儒家的大一統學說和萬古不變的天道。只有在王權垮台之後，才輪到紳權要為社會危機負責，社會批判意識才指向紳權，反傳統的鋒芒才最後觸及紳權的意識形態基礎——儒家倫理。從意識形態局部認同危機到一體化王權、官僚體系解體，差不多用了整整十五年，因此批判紳權比反對王權也差不多晚了十五年。分析新文化運動時期知識分子思想變化的脈絡，可以明顯看到這一點。

新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錢玄同曾說：「自洪憲紀元，始如一個響霹靂震醒迷夢，始知國粹之萬不可保存。」^③李大釗也說過類似的話：「我總覺得中國聖人與皇帝有些關係。洪憲皇帝出現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聖人與辯子大帥同時來京，就發生皇帝回任的事。」^④今天，我們如果從字面上理解錢玄同和李大釗反傳統之理由，會覺得十分奇怪。本來，意識形態是一個整體性思想體系，儒家倫理和皇帝制度間的內在聯繫，應該是知識分子人盡皆知的事，為甚麼這麼簡單的事實，要到1915年以後才被社會普遍意識到，並有「始如一個響霹靂震醒迷夢」之感？

^③ 錢玄同：〈保護眼珠與換回人眼〉《新青年》第5卷第6號（1918年）。

^④ 李大釗：〈聖人與皇帝〉《李大釗文集》下 頁9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這正好表明拋棄意識形態的某一部分內容，決不能由意識形態內容本身來定，而取決於人們是否反對相應的一體化組織。辛亥革命時，反對的是王權，當時被批判的也只是王權直接根植的意識形態基礎。王權是靠革命黨和紳士的聯合推翻的。儒家倫理則是紳權的合法性基礎。紳權在反王權時，只可能直接攻擊作為王權合法基礎的儒學哲學觀和社會觀，但不會觸及自身意識形態基礎（雖然它和王權也有關係）。由於擴張中的紳權和不斷衰落的王權的衝突，使得意識形態上不同內容本來十分明顯的邏輯關聯被表面的衝突所掩蓋，這時，新知識分子也很容易忽略支持紳權和支持王權的文化基礎的內在聯繫。只有在王權解體之後，軍紳政權帶來的災難才使人省悟〔註五〕。大家意識到：中國的政治不良是「當局不良」，但不良當局並非上帝派來荼毒中國的魔鬼，他們也是中國人。為甚麼中國的掌權者可以放縱專恣，法律有名無實，而外國的當權者卻不得受法律的約束？於是，很多人把問題進一步歸結於當權者的文化和國民性上^⑤，並進一步把落後的國民性歸為儒家的家庭倫理。吳虞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家族制度與專制政治，遂膠固而不可以分析」，「家庭之專制既解，君主之壓力亦散」^⑥。這裏，批判鋒芒直指縉紳階級統治合法性之意識形態基礎。

5.3 走出傳統角色的新知識分子群體

在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領袖痛擊康有為和孔教請願運動時，我

⑤ 李良玉：《動盪時代的知識分子》頁158（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⑥ 吳虞：〈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新青年》第2卷第6號（1917年）。

們可以明顯看到兩個陣線、兩種社會角色完全不同的營壘。一方是國會議員、地方領袖，另一方是新知識分子。兩軍對壘的局面揭示了新文化運動的第二個前提：新知識分子群體業已興起並向傳統紳士爭奪文化領導權。新知識分子與傳統紳士的角色衝突，在〈狂人日記〉裏表達得最形象：一個家族兄弟兩人，哥哥是族長，舊文人；弟弟是接受城市教育的新知識分子，回到鄉間家庭去，但再也不能回到傳統角色中去了。他處處懷疑別人要吃他，晚上睡不着，反覆思考別人要吃他的理由，就把古書拿出來讀，終於在「仁義道德」字後發現滿篇都寫着——「吃人」。魯迅寫的是一個精神病患者的感覺，這種感覺卻一下子獲得普遍共鳴，這是因為新知識分子發現自己和誕生他們的那個社會系統格格不入，被它敵視，有被吞沒之危險。我們必須注意另一個事實，新文化運動正好是在清王朝廢科舉十年以後出現的，十年恰好是辦新式教育培養一代新知識分子所必需的時間，它使得新知識分子不僅在絕對數量上超過了傳統紳士，而且他們的社會角色和行為模式也有別於傳統紳士。

1909年新學堂的學生數已達一百六十四萬，超過了傳統紳士的總數。從表5.1可以看到，辛亥革命後，新學堂的學生數更以驚人速度增長^⑦。而1912-1916年間，傳統紳士的人數只減不增，到1915年前後，新舊紳士只剩下七、八十萬人^⑧。傳統紳士人數雖少，但仍佔據着中國政治、思想舞台的中心位置。他們的社會角色仍是國家機器中的官僚，農村中的地方領袖，宗法家長制中的族長、家長；也是新政的推行者和受益者，是紳商、商會會長和省（縣）諮議局議員。新知識分子基本上不能獲得這些身分。他們受教

⑦ 〈第一回中國年鑒〉 頁1863-1864，轉引自李良玉：《動盪時代的知識分子》 頁132。

⑧ 蘇雲峰：〈民初之知識分子(1912-1928)〉《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研討會》下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台北：1982）。

育成長所在地是城鎮，畢業後的活動中心也在城鎮，很難再返回農村，去繼承父輩的土地和作為地方領袖、宗法家長的社會地位。但在城市，他們又很難進入政治、經濟的中心位置。民初，政府機構的位置，早已被留用人員和新學堂早期畢業生、留學生佔滿。

當時，新知識分子中的最上層——留學生，尚還能在政府機構中謀取一官半職。據對1916年1,655名回國留學生職業的調查，在政界的有1,024人，在學界有132人，報界16人，軍界56人，而在家賦閒的也達399人^⑨。留學生尚且大量失業，一般新知識分子就業之難，可想而知。大量的新知識分子從事甚麼職業呢？從表5.1中可見，新學校教職員的人數由1912年的二十餘萬增加到1916年的三十餘萬。新學堂是吸納畢業生的最大就業部門，它也更多地培養出新的畢業生。新知識分子大多從事教師和各種自由職業如報刊編輯、記者，或賦閒在家撰稿翻譯賣文為生。他們已不屬於傳統一體

年 份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學校數	87,272	108,448	122,286	129,739	121,119
學生數	2,933,387	3,643,206	4,075,338	4,294,251	3,974,454
畢業學生數	173,207	232,221	257,889	335,372	334,519
教員數	129,297	164,607	189,853	198,976	182,583
職員數	89,929	22,174	122,116	130,799	129,221
年收入(元)	29,647,098	34,170,082	37,824,104	35,653,156	34,988,539
年支出(元)	29,667,803	35,151,361	39,092,045	37,406,212	35,588,298
資產(元)	84,041,199	98,087,158	102,680,195	128,824,807	102,179,878

取自李良玉：《動盪時代的知識分子》，頁132（浙江：人民，1990）。

表5.1 1912-1916年全國各類學校統計

⑨ 〈青年會與留學生之關係〉《東方雜誌》第14卷第9號（1917年9月）。

化結構，不再願意生活在大家庭中，根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選取配偶，對鄉村生活不再有老一代那種感情。他們猶如〈狂人日記〉中的主人翁，與傳統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因此，一旦新知識分子作為獨立群體興起，就立即把這種反抗指向儒家倫理，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者。

新知識分子成為不同於傳統紳士的新社會階層，兩者互相對立，爭奪文化思想領導權，這一點對我們理解新文化運動十分重要。一方面兩個營壘的對立，更反襯出舊意識形態的過時，使得新思想勢如破竹地傳播，另一方面兩營壘文化符號的鮮明對照也使文化反思流於簡單化、符號化。這就使得文化反思容易僅停留在意識形態的內容層面，而忽略了對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一體化這種組織方式的反思。正因為缺乏這種深層次的反思，新知識分子在拋棄舊意識形態時就會渴望尋找新意識形態。

總之，1915年後，紳權擴張而又不能克服社會整合危機，當時已存在着一個在社會角色上完全不同於紳士的新知識分子階層，這兩個因素疊加在一起，才構成拋棄儒家倫理的社會條件。陳萬雄的研究為這個觀點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他不同意史學界將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劃為兩個世代^⑩。他認為，「在辛亥革命勃興的同時，則出現了反傳統的思潮，而且正達到全盤地反省和檢討傳統文化的程度」；如蔡元培早在1904年就有好幾篇文章批判孔學和儒教；陳獨秀1903年反傳統的論調也異常激烈；吳虞「在清末已有激烈非儒文字」^⑪。在新知識分子階層出現以前，就已經有激烈的

^⑩ 陳萬雄：〈革命家和啟蒙者的雙重身分——五四時期的安徽知識分子〉《二十一世紀》總第5期（香港：1991）。

^⑪ 陳萬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源流〉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等編：《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上 頁189-19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

反傳統思想和言論出現於報刊，但為甚麼新文化運動沒有在那時出現呢？可見，拋棄儒家意識形態價值系統的時機，並不取決於少數前衛人物的意識，而有待於社會結構性條件的成熟。

5.4 突破倫理中心主義

以上講的兩個前提只是拋棄舊意識形態的條件，意識形態更替還包括接受新意識形態。它要求新知識分子突破倫理中心主義。因為在倫理中心主義心態中，倫理既然先於知識，那麼一種倫理制度無論導致甚麼樣的失敗，都不足以使人拋棄它。它阻礙新的社會觀、哲學觀與價值系統整合起來成為整體性思想體系。梁鉅川於1918年10月新文化運動中自殺殉清，充分體現了倫理中心主義對傳統知識分子的禁錮。他雖為滿清官員，卻支持辛亥革命，反對張勳復辟和現實政治的黑暗，表明他在倫理中心主義前提下，尚可以接受社會觀和哲學觀的變革。但新文化運動衝擊到儒家倫理時，梁鉅川就寧可以死殉道，他在臨死前留下的〈敬告世人書〉中說：「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⑫，因此他的死可以說是殉「幼年所學」。

這種「幼年所學」就是文化養成。傳統文人一生下來就被束縛於家庭倫常的等級秩序中，從他幼年開始在家或在私塾學習識字起，儒家經典便是主要學習內容。因此，在一個人形成其價值觀的青少年時期，傳統的教育和家庭生活環境，已將其塑造為倫理道德優先的價值取向了，以後一輩子就基本定型。而一旦教育方式和內容發

^⑫ 梁濟：〈敬告世人書〉 梁煥鼎編：《桂林梁(濟)先生遺書》 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34輯 頁82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生巨大改變，就為突破倫理中心主義準備了歷史條件。

我們在3.2節講過，早在二十世紀初年，就已開始了新式學堂取代舊式私塾和書院的過程。清廷1905年廢科舉，1906年宣佈預備立憲時也進一步申言建立新教育體系。因此，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前後十年間(1890-1909年)接受教育的青少年，所學內容已是新舊參半了。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事物，對青少年價值觀的形成，產生着極大影響[註六]。

胡適在自傳中講的一件事就相當典型。十五歲那年(1906年)他在上海澄衷學堂讀書，「正讀英文的《格致讀本》(*The Science Readers*)，懂得了一點點最淺近的科學知識」，他使用這點知識做了一次批駁孟子性善說的公開演講。他寫道：「孟子曾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不善，水無有不下。我說：孟子不懂得科學」，「不知道水有保持水平的道理，又不知道地心吸力的道理」，「水無上無下，只保持他的水平，卻又可上可下，正像人性本無善無惡，卻又可善可惡」。這個演說「很受同學的歡迎，我也很得意」^⑬。可見，當時學校中像胡適那樣十五、六歲的青少年，在知識與道德關係上已採取了知識優先的立場，並力圖用知識來檢討儒家倫理。這個例子生動地顯示出，當儒家經典在教育中一旦失去其一家獨霸的中心位置，並有西學知識同時教授時，西學新知識的生氣勃勃和儒家說教的暮氣沉沉便形成鮮明的對照，使儒學處於守勢。在這種新舊內容參半的教學中，知識優先的價值取向已使受教育者潛移默化。

比胡適大十餘歲的陳獨秀，雖然從小受傳統教育，並以第一名考取秀才，但在他二十歲左右時，已受到一些鼓吹新思想的報刊如

^⑬ 胡適：〈四十自述〉《胡適作品集》第1集 頁59-60（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

《時務報》的影響，他說這是他「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之最大動機」^⑭。他還到新式學堂（杭州求是書院）讀書，並四次東渡日本廣泛接受各種新知識。二十世紀初，他就有激烈的反傳統言論。新文化運動前一年，他在剖析中國人「愛國」的價值觀時，已經採取了明顯的知識優先的立場。他認為：「愛國心，情之屬也；自覺心，智之屬也」，「過昵感情，侈言愛國，而其智識首不足理解國家為何物者，其愛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由斯以譚，愛國心雖為立國之要素，而用適其度，智識尚焉」^⑮。這裏，他把對國家的認識（知識）看作決定道德感情的前提。他所說的「自覺心」、「覺悟」，都是以「智」（知識）為中心來審視道德是否合理的新精神[註七]。魯迅畢業於南京礦路學堂，又留日學醫。他一邊吃辣椒，一邊看《天演論》的故事，常為人所津津樂道。一般說來，陳獨秀（生於1879年）和魯迅（生於1881年）那一代人，以及比他們年輕十歲左右的胡適（生於1891年），其青少年的學習和讀書所受環境（包括他們所讀的書刊）的影響，已使他們之中相當一部分能夠突破倫理中心主義的束縛。

比上述人物更年輕的一批人，即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或以後出生的，他們自幼所受的教育就以新學為主了。到新文化運動興起時，他們正值青少年，就讀於大學、中學，往往被稱為「五四青年」。倫理中心主義的突破在他們身上已是勢不可擋的普遍潮流。李歐梵曾經很生動地為這一代人做過一個集體素描：「他（或她）生於上世紀末或本世紀初的南方某省（譬如浙江、湖南），幼年受過私塾教育，一知半解地唸過四書五經。少年時候，新式學堂在省城成立了，於是他（她）奮而離鄉背井，甚至不顧父母之命所訂下的舊式未婚妻（夫），到省城去受新式教育。在這些新式中學裏，他（她）開

^⑭ 陳獨秀：《實庵自傳》頁43（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

^⑮ 陳獨秀：〈愛國心與自覺心〉《陳獨秀文章選編》上 頁68。

始唸英文、學幾何、算數、礦冶，但課餘卻看嚴譯的《天演論》，林譯《茶花女》和梁啟超的《新民叢報》，未幾國民革命，他(她)也在私生活上「革命」起來，剪了辮子鬧學潮，寫情書，她的第一個戀愛對象往往是中學時代新派的國文教師。《新青年》發行後，當然大家人手一冊，「五四運動」一起，全國響應。」^{①⑥}

蘇雲峰曾對民初知識分子進行了年齡代際考察。他把知識分子按出生年代分為表5.2所示的五組：每組人物由於處於相同歷史時期，因而有相似的機會經歷生命史上有重要意義的事件。他考查了廢科舉的1905年，五四運動的1919年，北伐時期的1927年三個年代中五組人物的情況^{①⑦}。從這項研究中我們得到一個有趣的發現：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和擁護者均居於三、四兩組之中，即他們在1905年廢科舉時的年齡處於童年少年(6-15歲)和青年(16-25歲)時期：

組別	出生年代	1905年時歲數	1919年時歲數	1927年時歲數
1	1860	36-45	50-59	58-67
2	1870	26-35	40-49	48-57
3	1880	16-25	30-39	38-47
4	1890	6-15	20-29	28-37
5	1900	0-5	10-19	18-27

取自蘇雲峰：〈民初之知識分子(1912-1928)〉，《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研討會》(下)。(台北：三民主義研究所)。

表5.2 民初知識分子的年齡結構

- ^{①⑥} 李歐梵：〈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 周策縱等：《五四與中國》 頁296-297。
- ^{①⑦} 蘇雲峰：〈民初之知識分子(1912-1928)〉 《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研討會》下。

五四運動時則正當青年成熟期(20-39歲)。而積極投入北伐的知識分子年齡則更小。

由此可見，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恰恰是1905年廢科舉後尚處青少年時期的一代知識分子成長為社會中最活躍的一代人所帶來的結果。這一代人的受教育環境和社會環境，使他們不可能再進入傳統士大夫的社會角色，他們也突破了傳統的倫理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而當時四十歲以上的人則基本保持了倫理中心主義心態，四十歲成了是否突破倫理中心主義的某種天然分界線。無怪乎錢玄同曾說過一句相當過激的話：「人到四十就該死，不死也該槍斃。」^⑩[註八]正是這四十歲以下的新知識分子群體，成為拋棄舊意識形態、尋找新意識形態的主力軍。

5.5 「整體性反傳統主義」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新文化運動的爆發恰好是三種歷史演變的綜合：辛亥後紳權擴張及社會整合之失敗，遊離於傳統社會結構之外的新知識分子階層出現，以及他們特殊的成長經歷使得突破倫理中心主義成為可能。既然這三個前提是新文化運動產生的原因，那麼它們也就內在地制約了這場運動的本質是一場棄舊圖新的意識形態更替運動。因為這三個前提只造成新知識分子反對儒家意識形態的具體內容，而並沒有使他們意識到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一體化這種社會組織方式也應該拋棄。正是中國傳統社會組織方式這種深層結構尚在制約新知識分子的思想，使得他們在拋棄

^⑩ 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 吳奔星編著：《錢玄同研究》 頁183（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舊意識形態時，急於尋找整合社會的新意識形態。它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拋棄舊意識形態時採取一種不觸動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一體化組織方式的「整體性反傳統主義」；另一方面拋棄舊意識形態的逆反心理左右了人們對新意識形態的選擇和締造。

中國新知識分子的「整體性反傳統主義」是由林毓生提出來的^①，它可以歸納為如下三個特徵。第一，新知識分子反傳統時很難把他們憎惡的政治規範和傳統文化內容加以區別。例如反對儒家倫理制度應該指向宗法家族制度，而不是否定家庭關係。但五四青年很少對兩者作明確區分。當時就有青年寫信給父親說：「從某月某日起，我不再認你為我父親。我們都是朋友，互相平等」，有的青年乾脆不用原名，自稱為「你我他」。像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師復那樣宣佈取消姓氏的人，並不罕見^②。本來姓氏、父子關係與家庭倫理和宗法組織這樣的基層結構是不同的東西，但反傳統知識分子並沒有將兩者區別開來。

第二，五四知識分子雖然也承認傳統中有好的東西，但卻不加分析就認為它們非中國文化所特有。林毓生通過對陳獨秀、胡適和魯迅的案例研究，指出這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在反孔教時並不排除在普遍意義上承認孔教中有積極價值。不過，他們未加研究就認為「這些價值是世界所有文化都具有的，人類普遍的理想」，因此不能從這些角度來捍衛中國傳統^③。既然這樣，傳統是可以整體性符號般拋棄的。而這種自以為可以將舊意識形態符號般的整體性拋棄，缺乏對傳統文化深層結構分析的後果，只能觸及傳統文化的一些具

^① 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增訂再版本）穆善培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以下簡稱《中國意識的危機》）

^② 周策縱：〈新文化運動的擴展〉《五四與中國》頁160。

^③ 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頁130。

體內容，而傳統文化思維模式卻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

第三個特點，是人們普遍認為，只要拋棄舊倫理，建立新倫理文化，就能克服中國社會的弊病。林毓生將這種把文化倫理價值看作高於社會、政治、經濟的心態稱為「藉思想文化以解決社會根本問題」的思想方式^②[註九]。

整體性反傳統主義的這三個特點，恰好可以從規定新文化運動的三個前提得到說明。前面我們已闡明，新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並沒有觸及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一體化的組織方式。在一體化結構中，儒家倫理是鄉紳自治、家族統治(即紳權)的權威合法性來源，文化符號與政治規範本來就是混為一體的。新知識分子不能把紳士階層的社會規範與傳統文化內容加以區別，在他們反對紳士所代表的封建家族統治時，就連同其文化符號也拋棄了。這表明在新知識分子心目中文化符號與政治規範也是一致的。那麼在他們追求新觀念時，也不可能把新文化與作為政治權力基礎的意識形態相區別。相反，他們是主動將新文化轉化為新意識形態的。

至於新知識分子認為傳統可以整體性符號般的拋棄，則與他們突破了倫理中心主義有關。在倫理中心主義被破除、新知識分子普遍追求整體性思想體系的條件下，人們自然反過來把新知識當作倫理之基礎，在這種思想模式中，一方面可以推出必須拋棄與新知識不適應之舊倫理，另一方面又要承認許多知識是人類所共有的，因此，中國傳統中應該繼承的那些部分，在新知識分子看來顯然屬於人類共同的價值，沒有必要釐清之，它們並不會因為對傳統的批判而被拋棄。這種不加分析的心態，使新知識分子保留了傳統思維模式。正是這種思維模式在把新觀念整合成新意識形態上，起了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② 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 頁45-51。

「藉思想文化以解決社會根本問題」的思想方式則表明，在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一體化的傳統組織方式影響下，新知識分子僅僅意識到傳統意識形態不能解決社會危機，因此渴望變更其內容，追求用新意識形態整合社會。

整體反傳統主義這種批判傳統的方式，意味着新文化運動不可能衝破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一體化的牢籠。這樣，對舊意識形態批判越有力，用新意識形態取而代之的渴望就越強烈。那麼，甚麼樣的新意識形態會取而代之呢？在傳統深層結構（觀念整合機制）尚未破壞的情況下，最容易被人們接受的是深層結構不變、但表面上卻和舊意識形態內容相反的的思想體系。拋棄儒家文化的內在動力，會把新知識分子的追求吸進一種逆反心理的引力場，這種逆反心理將左右未來意識形態的面貌。

5.6 在「科學」、「民主」、「白話文」運動背後

在討論新知識分子會接受甚麼樣的意識形態之前，我們先考察一下他們在拋棄儒家倫理後會接受甚麼樣的新價值。通常，受批判的舊價值和被接受的新價值之間，不一定有邏輯關聯。但是，在新文化運動中卻有這樣一種機制：新知識分子對傳統紳士文化和角色之反叛，以及突破倫理中心主義之過程，導致強烈社會逆反心理。人們在認定傳統文化要對中國的貧窮落後負責，從而全面否定它的同時，也邏輯地肯定與其相反的價值。這種機制可稱為價值逆反。價值逆反有助於理解為甚麼科學、民主、白話文會迅速興起，並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

倫理中心主義的儒家文化，一直把倫理道德視為優於知識，因而對知識的尊重和純粹求知熱情在中國文化中一直受壓抑，基於知

識論的大膽懷疑和批判倫理的超越意識也難以發展。現在，新知識分子實現了倫理中心主義的突破，根據價值逆反邏輯，從倫理優先轉化為知識優先，中國文化因而被推到一個新起點上：科學的價值被凸現出來，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第一面旗幟。在倫理中心主義沒有突破之前，洋務派知識分子重視科學，那不過是「制器之理」。甲午戰後，科學在哲學觀中獲得自己的地位，它最多也只是社會進化的「道」。而到五四時代，由於倫理中心主義突破帶來的價值逆反的推動，科學獲得至高無尚的地位，成為「建立人生觀的基礎」。

那麼，對傳統倫理秩序的逆反，又會指向哪些新價值呢？首先，儒家倫理規定了紳士的社會身分是倫常關係中的尊者長輩，是家長、族長，是地方組織的天然領袖，處於支配、教育他人的尊崇等級。對這種尊卑關係的逆反，自然意味着應消除等級尊卑的約束，它恰好指向「平等」！雖然，儒家文化不像其他許多文化那樣以血統、種族、出身等先天的因素來規定人的尊卑等級，但在實際生活中，人一生下來就處於不平等的倫常關係中，於是，兒子服從父親，妻子服從丈夫，臣子服從君王，成為天經地義。對這種尊卑分明的倫常等級秩序的反叛，意味着將人從倫理關係所規定的等級結構中解放出來。陳獨秀就十分明確地揭示綱常名教的對立面是平等，他說：「三綱之根本義，階級制度是也。所謂名教，所謂禮教，皆以擁護此別尊卑、明貴賤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為大原，與階級制度極端相反。」^②於是，對「平等」價值的追求在文化變遷的背景上凸現出來，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口號。

傳統紳士身分認同的另一個標誌是，他們都是文化精英分子。

^② 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1916年2月15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上 頁105、108。

文化精英身分的獲得，不是靠倫常關係，而是靠從小飽讀詩書，靠道德修養而得來。雖然儒家宣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實際上卻要通過科舉制度來確定紳士階層的文化精英身分，也只有君子才能達到高尚的道德境界。這是儒家倫理中心主義中的精英主義特點。紳士階層則代表文化知識和道德風範高水準的精英團體，這種身分使他們擁有政治參與的特權。只有他們能入朝做官，或充當地方自治的管理者。對紳士精英身分的反叛，就意味着平民主義的伸張，它推崇與精英的政治特權相對立的大眾參與。由此，對「平等」、「平民主義」和「大眾參予」價值的追求綜合在一起，形成了新文化運動中另一面旗幟：「民主」。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何當時在中國出現的「民主」與西方民主政治中的民主觀念有極大差別。在中國，「民主」是反對專制（即主張大眾參予）、爭取人權（即追求平等）的工具：反對父母包辦婚姻、主張男女平等都可以被視為「民主」；更多的人則視「民主」為「人民當家做主」。因此，五四時期的「民主」，其實是一種「唯民主義」^④。

傳統紳士階層文化認同的第三個標誌——也是最符號化的標誌——是文言文。文言文不僅是儒家經典的符號，也是紳士身分和生活方式的象徵。因此，對傳統紳士文化的叛逆，最終一定會拋棄這種符號。既然新文化運動的本質是新知識分子拋棄舊意識形態，並且確立自己文化領導地位的運動，那麼就一定要尋找一種既能代表自己，又與傳統文人不同的文化符號。這種符號最恰當的自然就是白話文[註十]。

白話文的興起是與對科學、民主和反對精英主義等多重價值的

④ 郭穎頤：〈塞先生、德先生的轉形〉《二十一世紀》總第4期（香港：1991）。

追求密切相關的。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吹響了文學革命的號角。他提出文學革命有兩個十分鮮明的出發點，一個是科學進步觀，他指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因而建立起「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②⑤}。另一個出發點是與「為少數文人之私產」的精英主義相決裂，他指出維護文言的做法，無非是想「將社會分成兩個等級：一邊，是『我們』這些紳士；另一邊，就是『他們』那些普通百姓」^{②⑥}。主張廢除漢字的錢玄同，更把白話文當作剷除文化暴政的工具。他認為，為了使中國變為二十世紀的文明之國，「先決條件就是毀滅作為儒家道德和道教迷信之根源的古代文言」^{②⑦}。而陳獨秀則乾脆把白話文視為「反對一切不平等的階級特權」的「文學的德莫克拉西」^{②⑧}。

在提倡白話文之前，《新青年》的銷量僅一千多本，「文學革命」大旗一舉，雜誌發行量猛增十倍，達一萬餘，新文化運動由此推向高潮，震動全國知識界。

必須指出，科學、民主被推崇和白話文的流行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巨大進步。因為它們本身並不是獨斷性的意識形態，而是一個社會走向現代必不可少的文化建設。推動它們迅速普及的價值逆反機制也功不可沒。一個相對封閉的文化系統對外開放出現思想大解放時，價值逆反邏輯往往發揮了棄舊圖新的巨大威力。因為它訴諸於人們很容易理解的方式，使民族文化中長期被忽略和壓抑的文化要素受到重視，外來文化受到熱烈歡迎，新文化的創造獲得了豐富資

②⑤ 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胡適文存》第1集卷1（台北：遠東圖書，1953）。

②⑥ 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胡適文存》第2集。

②⑦ 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魯奇譯 頁88-90（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

②⑧ 陳獨秀：〈我們為甚麼要做白話文〉《陳獨秀文章選編》上 頁493。

源。直到今天，科學、民主依然是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價值。但價值逆反的邏輯使人們很容易採取中西對立的看問題方式，從而對西方文化和科學、民主的價值沒有真正理解。陳獨秀說，中西文化的「根本性質極端相反」^②，說相反尚嫌不足，還要加上「極端」二字；汪叔潛更將新舊的含義直接指稱為：「所謂新者無他，即外來之西洋文化也。所謂舊者無他，即中國固有之文化也。」^③對科學、民主的理解，也有這種簡單化傾向，人們反對中國傳統文化，就把與其相反的新價值自然而然地投射到對科學、民主的理解中。這就使得真正的科學精神和民主意識至今在中國尚未形成和普及。

由價值逆反機制推動的新文化創造一定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舊意識形態尚未拋棄之時，價值逆反邏輯使各種新觀念得到普及，在破除舊觀念上大顯神威，產生了轟轟烈烈的啟蒙。當舊意識形態被拋棄後，價值逆反所造成的對新觀念新價值的誤解便日益明顯，它們被融入新意識形態，而思想解放和啟蒙運動也隨之中斷了。

5.7 啟蒙的異化

不少學者都把新文化運動分為兩個階段。從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到1919年五四運動為第一階段。這一階段的特色在於激烈地批判傳統和以開放的胸襟推動啟蒙。1919年以後，雲集北京大學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開始嚴重分裂，《新青年》變為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刊

② 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1916年2月15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上 頁108。

③ 汪叔潛：〈新舊問題〉《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

物。思想文化理論界論戰頻頻，社會上學生運動、工人運動風起雲湧，知識分子由文化反思轉向認同新意識形態。新文化運動的後一階段，是啟蒙中斷、締造新意識形態的時期。

為甚麼這樣轟轟烈烈的啟蒙運動在短短數年內就會中斷？這是學術界至今仍在研究的熱門話題。事實上，導致中國啟蒙運動的批判意識既然是寄生在拋棄舊意識形態之上的，那麼，它也勢必隨着拋棄過程之完成而終結[註十一]。如果想要跳出意識形態牢籠，就必須首先實現由價值一元論的心態向多元合理之轉化。也就是說，當人們從沉醉於一種價值中驚醒並掙脫出來時，只有建立起超越具體價值之上的理性批判意識，才能免於進入另一種一元論的價值獨斷系統。而這種超越性理性批判意識的建立，則不可能由情感式的價值逆反來實現[註十二]。

康德把啟蒙定義為人有勇氣在一切生活領域中運用理性。理性是一種大無畏的懷疑和批判精神，它應超越特定價值判斷。新文化運動的前期，道德倫理——這一兩千餘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批判精神的盲區——第一次全面暴露於批判精神之下，這是一種何等激動人心的解放和進步！但是，正因為在對儒家倫理批判意識的背後缺乏真正的超越性理性精神，其動力只不過是突破倫理中心主義的價值逆反，這種批判和懷疑便不能超越反對儒家倫理而獨立存在，相反卻產生了新的盲區，新知識分子不能把這種批判精神投射到與舊價值相反的新價值上。儘管作為新文化運動旗手的陳獨秀和胡適都認識到中國處於一個「重新評估一切價值」的時代，但在實際上，這種重新評估並不包括當時人們普遍認同的新價值。粉碎舊偶像時的逆反心理，很容易把對科學的追求轉變為對外來新知識的迷信，轉變為新的價值獨斷論，這實際上是違背科學精神的。同樣，對家長制專制主義的叛逆，是對平等和個性解放的熱烈追求，由此帶動了史無前例的人的解放和個人感情的解放。但是，對平等的追求並

不能形成有關個人權利和自由的理念^①。對傳統士大夫道德和文化精英主義的反叛，就自然會導向普羅大眾主義、民粹主義。個人從倫常關係中解放出來，很快又消失在群體中。紳士偶像粉碎了，大眾又成為新偶像被樹立起來。在價值逆反的潮流中，感情的洪流最後自然會擺脫理性的駕馭。正如梁實秋在1926年描繪個性解放時說的那樣：「情感就如同鐵籠裏猛虎一般，不但把禮教的桎梏重重的打破，把監視情感的理性也撲倒了。」^②中國出現了價值逆反與傳統相結合，這就為認同新意識形態奠定了基礎。

5.8 逆反價值與傳統結合

《鏡花緣》中有一個「君子國」的故事。那裏人人道德高尚，在價值追求上與現實世界相反。如市場交易時，賣方拚命壓價，而買主卻怕對方吃虧而拚命抬價。在酒店裏，越酸的酒被認為越好，結果人人吃醋。作家在描寫君子國時，只能把幾種價值來個顛倒，至於大量日常生活細節仍需依靠常識，結果這個君子國仍像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人人頭戴儒巾的王國，只是人和酒一樣有點離奇和酸溜溜而已！這個故事形象地表明，未曾意識到的傳統和部分逆反價值的結合，會產生出類似傳統結構的怪異結果。五四時期，儒家意識的具體內容被拋棄，但傳統思維方式並沒有改變，於是一個儒家文化深層結構和逆反價值相結合的過程出現了[註十三]。中國形成了

① 甘陽：〈自由的理念：「五四」傳統之闕失面〉 林毓生等：《五四：多元的反思》 頁68（香港：三聯書店，1989）。

② 梁實秋：〈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梁實秋自選集》 頁13（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

唯物論科學主義、社會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等主流思潮，它們成為新知識分子認同的哲學觀、社會觀和價值觀。

本來，儒家意識形態的哲學觀是建立在直觀理性之上的。所謂直觀理性，是指中國文化中認為常識天然合理，不需要懷疑，並用它來推導各種高層次哲學觀念的思想方式。新文化運動以後科學獲得了不可批評的地位，當時的科學知識迅速取代直觀理性中常識的位置，造成科學知識與科學精神相脫離，從而一個以科學常識來建構新哲學觀和人生觀之過程就勢不可擋地展開。這裏我們看到，價值逆反和直觀理性這種傳統結構相結合，產生了中國獨特的唯物論科學主義思潮，它促使人們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③ [註十四]。五四運動前，儒家文化的哲學觀已在西潮衝擊下千瘡百孔，知識分子哲學觀已出現了多元開放的局面。現在，唯物主義迅速壓倒其他流派，甚至連稱霸三十年之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都無法和它爭雄而迅速衰落。中國文化界又出現了一個建立在新常識之上的哲學觀——辯證唯物主義。

意識形態的社會觀是關於合理的政治經濟模式的思想。中國文化中，一直存在着由道德價值向政治、經濟領域投射，以證明某一種社會制度合理與否的深層結構。當道德的內容是「仁」和「家庭倫理」時，代表這種道德價值的政治制度是「禮治」，經濟制度是「仁政」，分配原則是根據每個人的倫常等級以決定其經濟地位的「等級均衡制」^④。而現在價值逆反邏輯使得「平等」成為道德內容，這種新道德迅速和傳統的道德決定政治、道德決定經濟的深層結構結合，產生了新的社會觀，這就是以經濟平等為核心的形形色色社會

^③ 劉青峰：〈二十世紀中國科學主義的兩次興起〉《二十一世紀》總第4期（香港：1991）。

^④ 張鴻翼：《儒家經濟倫理》頁113（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主義思潮[註十五]。陳獨秀在論證社會主義為何合理時，曾畫過一張圖，他把社會主義定義為經濟的德謨克拉西，它又是來自於反對一切不平等的階級特權^⑤。這裏，逆反價值和傳統結構互相整合之過程十分明顯。在新文化運動前，中國知識分子曾努力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思想雖已介紹到中國，但沒有太大影響。新文化運動後期，隨着「平等」成為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評價標準，社會主義思潮便來勢洶湧。用戴季陶的話講，它「是一個時代精神」^⑥，《東方雜誌》則稱，「社會主義在今日的中國，彷彿有「雄雞一鳴天下曉」的情景。」^⑦

儒家文化的價值系統也有自己的深層結構，它是一種以道德為終極關懷的理想主義。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以家庭為本位，強調個人道德修養，追求成仁成聖。一旦儒家道德具體內容被拋棄，反精英主義的逆反價值和道德理想主義結合，就產生了五四新知識分子特有的價值觀——一種群體的道德理想主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雖早就有着人人道德高尚的烏托邦社會的構想——大同社會，但它從未成為儒生之終極關懷。當群體的道德理想主義代替個體和家庭道德理想主義時，五四青年的終極關懷也愈來愈具有了集體主義性質^⑧。他們組織新村，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小型烏托邦社會試驗，甚至很多人把獻身於烏托邦社會當作自己的人生目標和最高理想[註十六]。

^⑤ 陳獨秀：〈我們為甚麼要做白話文〉《陳獨秀文章選編》上 頁493。

^⑥ 季陶：〈世界的時代精神與民族的適應〉《星期評論》第17號（1919年9月28日）。

^⑦ 潘公展：〈近代社會主義及其批評〉《東方雜誌》第18卷第4號（1921年5月）。

^⑧ 金觀濤：〈中國文化的烏托邦精神〉《二十一世紀》總第2期（香港：1990）。

5.9 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

中國有種臉譜玩具，其正面是一種形象，將其倒轉時，又會看到與正面形象相反的另一種形象。逆反價值與傳統結合選擇新意識形態，很像把傳統意識形態的面具倒轉。我們可以根據新文化運動後期人們普遍認同的社會觀、哲學觀和價值觀來判斷當時最具吸引力的新意識形態是甚麼。

隨着愈來愈多新知識分子把烏托邦主義作為理想價值，把社會主義作為合理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中國出現了現代化學習榜樣的轉變。在新文化運動早期，中國現代化的榜樣一直是西方，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被視為實現了「科學」和「民主」這些新價值的典範。但是當巴黎和會拒絕中國合理要求，西方列強用中國利益作了一筆可恥交易之後，陳獨秀憤怒地說「啊，現在還是強盜世界」^③。新知識分子從此不再把西方國家看作「國民公產」，也認定中國不應再走歐美、日本這條錯路。其實，像巴黎和會這種無視中國利益的事，西方列強以前不知做了多少，但在1919年以前，這都不妨礙中國知識分子把西方作為自己的現代化榜樣，為何獨獨1919年的巴黎和會引發了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態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轉變？這其實是烏托邦價值對學習榜樣的選擇作用的體現：當知識分子普遍嚮往烏托邦時，巴黎和會粉碎了西方在道德上的先進形象，西方作為烏托邦的對象幻滅了。同時，十月革命的成功則為中國展現了一個來自西方、卻又批判資本主義、超越西方現實社會制度的新模式，這就導致了烏托邦寄托對象的轉變[註十七]。當時中國盛行的唯物論的科學主義與辯證唯物論和唯物史觀一拍即合，社會主義和烏托邦理想疊加起來，正好是一種超越現有西方制度的以共產主義為最高綱

^③ 陳獨秀：〈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1919年5月18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上 頁402。

領、以取消私有制為現實目標的理想和社會觀。我們可以想像，當知識分子正處於一種尋找徹底解決中國社會危機之意識形態飢餓中，一旦發現有一種外來學說居然天衣無縫地迎合了他們在哲學觀、社會觀和價值觀三方面的追求，那將是一種怎樣的狂喜啊。於是，1919年後，馬列主義以一種雷霆萬鈞的力量傳入中國，迅速征服了那些思想和情緒激進又渴望着新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

同樣，三民主義在中國的演變，也是順應這幾種思想潮流的。早在1905年孫中山已在《民報》上提出三民主義這一名稱。但它成為具備社會觀、哲學觀和價值觀的意識形態，則是在新文化運動後期吸收了社會主義、科學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的結果。三民主義的社會觀在經濟方面是民生主義，它是新文化運動中社會主義與烏托邦主義結合的產兒。王爾敏就把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稱為融合了中國的大同理想和西方社會制度的一種創造^④。由於五四時期社會主義名目繁多，孫中山盡可能豐富地將其都包括進去，有時把民生主義等同於共產主義，有時則傾向於基爾特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從而使它成為三民主義中最令人爭議之部分。三民主義社會觀在政治方面是民權主義，它基本上包含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大眾參政」和「民治主義」這些新價值。

三民主義的哲學觀比較含混，特別是三十年代後經歷了結構性的改變。這就使得人們不容易看到五四以後成熟的三民主義哲學觀，原是基於科學主義之上的[註十八]。三民主義理論家戴季陶、胡漢民是在中國最早提倡歷史唯物論和經濟決定論的。在黃埔軍校的政治訓練班中，他們都以唯物史觀講解三民主義^⑤。甚至1928年

④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 頁18-19（台灣：華世出版社，1976）。

⑤ 陳能治：〈黃埔建校初期中共分子的滲透活動〉《黃埔建校六十周年論文集》上 頁176（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4）。

中國知識分子就社會發展史進行大論戰時，馬克思主義者和三民主義者雙方都是基於經濟決定論來討論問題的，分歧僅在於對中國社會的性質與發展階段認識不一致^④。國共合作破裂後，國民黨進行清共，為了在意識形態上劃清三民主義與馬列主義的界線，三民主義理論家才逐步拋棄唯物史觀，但仍在科學主義的其他流派中尋找自己的根據。三民主義在新文化運動後期才最後成熟，並獲得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認同。這表明，逆反價值一旦納入傳統深層結構，它也可以自行拼合成某種新意識形態[註十九]。

新文化運動是近代中國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它衝破了禁錮中國人思想兩千年之久的意識形態牢籠。但由於沒有樹立超越價值判斷的真正科學精神，一旦中國人認為找到了能根本解決中國各種問題的新意識形態，新文化運動也就走到了盡頭。二十年代以後，中國思想界百花齊放的時代過去了，只有馬列主義和三民主義兩種意識形態沉重地掛在枝頭……[註二十]

偉大的思想運動雖然消逝，但對於超穩定系統來說，完成意識形態更替卻意味着一個全新階段的到來。在此之前西方的衝擊雖使社會生活不斷進步和多元，但社會整合只能在解體之中，而現在它又可以整合起來以抗拒西方衝擊了。中國開始了兩種新意識形態稱霸並重新和政治經濟耦合，以整合日益脫序社會的新時代。

④ 郭穎頤(D.W.Y. Kwok):《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 雷頤譯 頁136-140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

第五章 註 解

註一 學術界一般把1915年陳獨秀辦《青年》雜誌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開始，對於其下限，則有不同看法。周策縱認為，就社會思潮轉變和學生活動激烈程度而言，它主要集中於1917-1921這五年，但作為新文化運動，最低限度可擴充到1915-1924這十年。他把1924年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下限，理由是這一年開始國共正式合作，黨派活動與知識分子活動性質已完全不同^{④③}。我們採用周策縱的分期法，把1915-1924這十年稱為意識形態更替時期。這十年可以分成兩段，1915-1919這五年為前期，其中心是拋棄和批判舊意識形態，1919-1924這五年為接受新意識形態。1924年後意識形態政黨已代替知識分子成為社會活動的主角，文化熱冷卻，政治參與高漲，新意識形態開始實現社會整合。近年來，學術界已經開始注意到1915-1924這十年期間，不僅文化思潮，甚至是政黨、社會團體的行為方式都和其他時期明顯不同，於是有人從革命黨的組織變遷或思潮變化，把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界定為1914到1924年^{④④}。

註二 這十年間，成立的學會超過400個。1919-1920年間各學校學生出版的大小刊物，總共達1,000種以上，廣泛流行的至少有400種^{④⑤}。從這個對比中可以看出，全面意識形態認同危機遠比局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更為猛烈。

④③ 周策縱：〈以五四超越五四〉《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2期（台北：1991）。

④④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近史所專刊57 頁8（台北：1989）。

④⑤ 郭正昭：〈王光祈與少年中國學會（1918-1936）〉《近史所集刊》第2期（台北：1971）。

註三 美國學者蘇利文(L. Sullivan)和索羅門(R.H. Solomen)運用統計分析發現，《新青年》雜誌的文章明顯可以劃分為完全不同的兩個時期，1919年前，它的主要內容是以「科學」、「民主」為旗幟反對儒家倫理，其文章內容均以歐美思想文化為主導。1919年後，文章轉變成宣傳馬列主義為主。陳國祥的研究也得到類似結論：1919年前，新知識分子是把西方社會和文化作為「科學」與「民主」的典範與中國文化相對立，批判儒家倫理是其主導內容^{④⑥}。1919年後，內容的性質和範圍出現了突變。

註四 倫理中心主義是我們在《興盛與危機》一書中提出來的，但儒家文化主張道德追求在價值上優先於知識，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不少學者都作過論述。它包括如下兩個方面，一是在整個意識形態中，求知不知道德修養在價值上重要，屬於知識系統的內容遠不如屬於倫理道德系統內容發達；二是即使在人的道德追求過程中，也更強調意志的純化，而不是強調對道德之知識即了解「道德的行為」是甚麼。勞思光先生對中西道德學說進行了比較後指出，「道德哲學在西方的主流，大抵以建立道德理論為主……可以說全部研究工作都屬於對道德的知識。至於意志的轉化或純化問題，在西方世界大致都交給宗教了。至於東方情況就大不相同。尤其就中國儒學而論，講到『成德之學』，意志的鍛煉與純化正是這種『學』的主要部分」^{④⑦}。正因為儒學在結構上是把道德價值看作高於知識的倫理中心主義，因而使得社會和自然知識即使有很大變化，也不會衝擊儒學核心價值。如漢代儒學(特別是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的哲學觀和

④⑥ 陳國祥：《新青年與現代中國》 頁2-3 (台北：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

④⑦ 勞思光：〈從「普遍性」與「具體性」探究儒家道德哲學之要旨〉《儒家倫理研討會論文集》 頁19 (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1987)。

宋明理學是大不一樣的，但倫理中心主義構成一個使其價值核心不受衝擊的巨大保護帶。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近代，康有為的倫理中心主義是極為明顯的，據梁啟超記載，康有為主持萬木草堂，教育內容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④⑧}。章太炎、譚嗣同、嚴復、梁啟超也與之類似，他們所認同的社會觀和哲學觀大不相同，價值系統中西化程度也不一樣，但仍保持着倫理中心主義的情結。

註五 新文化運動反對儒家倫理是發生在袁世凱稱帝失敗之後，很多研究者認為，正因為袁世凱稱帝、祭天等活動的理論根據是儒家倫理，才導致人們對孔教普遍反感。然而近年來，一些學者研究指出，這種直接的邏輯關係並不存在。當時帝制運動的理論根據主要不是基於儒家學說，而是從民主的失敗和社會需求出發的。恢復帝制的理由主要有下面三條：1.君主立憲較民主共和更適合於中國國情，2.袁世凱對國家有重大貢獻，3.國體決定於民意。這三條中沒有一條與儒家倫理直接有關。而且袁世凱雖尊孔，但並不完全支持孔教運動，孔教會的成員也不支持他的帝制運動^{④⑨}。因此，把反儒歸結為由批判袁世凱稱帝的理論依據而引發的說法不能成立。

那麼袁世凱稱帝失敗後為甚麼會產生批判儒家倫理的新文化運動呢？實際上這一過程是通過一體化結構中合法性根據之追溯而實現的。袁世凱稱帝沒有直接訴諸於儒家倫理，相反在反對洪憲帝制運動中，很多人從儒家倫理出發來反袁，指責他為竊國大盜。但是這一切並不能改變一個事實，當時政治舞台的主角——新舊紳士社會地位合法性來源均是儒家倫理。因此，新知識分子反對新舊士

④⑧ 梁啟超：〈康南海先生傳〉《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④⑨ 黃克武：〈民國初年孔教問題之爭論(1912-1917)〉《台師大歷史學報》第12期（台北：1984）。

紳的行為，一定要把儒家倫理作為批判對象。批孔之理由出於2.6節指出的社會危機破壞意識形態認同之邏輯：反對一體化某一組織層次必須批判相應意識形態內容。袁世凱稱帝和批判儒家倫理之內在關聯只在於，它作為一個象徵性事件，啟發新知識分子去發現儒家意識形態中倫理和帝制的聯繫。雖然這種聯繫本來就存在於儒家意識形態的整體性關聯之中，但在紳權與王權的衝突時，這種原來意識形態之間的關聯被社會忽略。這樣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何新文化運動出現在袁世凱稱帝失敗之後，而不是在帝制運動中間，帝制復辟和儒家倫理之關聯只是事後反思才能發現的結果。

註六 這方面一個有說服力的證據是：分析《新青年》雜誌主要撰稿人，可以發現，他們大多在20歲以前就接受了新式教育。這表明，20歲以前接受西學，有助於倫理中心主義的突破。表5.3為《新青年》作者群接受西學的年齡。

姓名	就讀學校	年代
陳獨秀(1879-1942)	南京新式書院「求是學堂」	1898年(19歲)
高一涵(1885-1968)	日本明治大學	1913年(28歲)
易白沙(1886-1921)	主持永綏師範學校	1902年(16歲)
劉叔雅(1889-1958)	安徽公學	1906年(17歲)
高語罕(1888-1948)	日本早稻田大學	1906年(18歲)
潘贊化(1885-1959)	日本振武學校	1902年(17歲)
謝無量(1884-1964)	上海南洋公學	1901年(17歲)
李大釗(1889-1927)	永平府中學	1905年(16歲)
胡適(1889-1962)	上海梅溪學堂	1902年(13歲)
劉半農(1889-1934)	常州府中學	1906年(17歲)

楊昌濟(1871-1920)	長沙城南書院	1890年(19歲)
馬君武(1881-1940)	上海震旦學校	1900年(19歲)
蘇曼殊(1884-1918)	日本橫濱大同學校	1898年(14歲)
吳 虞(1872-1949)	日本法政大學	1905年(33歲)
光 昇(1876-1963)	南京江南高等學堂	1904年(28歲)
吳稚暉(1865-1961)	南菁書院	1890年(25歲)
章士釗(1881-1973)	武昌西湖書院	1901年(20歲)
錢玄同(1886-1943)	上海南洋公學	1905年(19歲)
蔡元培(1868-1941)	紹興中西學堂監督	1898年(30歲)
周作人(1885-1967)	南京江南水師學堂	1901年(17歲)
沈尹默(1882-1964)	留學日本	1905年(23歲)
沈兼士(1887-1947)	日本東京物理學校	1905年(18歲)
陳大齊(1887-1983)	上海廣方言館	1900年(13歲)
魯 迅(1881-1936)	江南陸軍學堂附設礦務鐵路學堂	1899年(18歲)
王星拱(1888-1949)	安徽高等學堂	1902年(14歲)

據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提供材料製表，頁1-20（香港：三聯，1992）。

表5.3 《新青年》作者群接受西學的情況

註七 陳獨秀一生都是一個激烈的民族主義者，但是據陳萬雄對陳獨秀成長經歷的研究，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他一生中民族主義思想最為收斂的時期^⑤。我們認為這是因為陳獨秀在這段時間雖實現了倫理中心主義突破，但還沒有接受新意識形態，因而以科學知識考察一切的心態使得他的民族主義情緒大為減弱。

^⑤ 陳萬雄：《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

註八 在新文化運動中，40歲這個分界確是區別新舊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個關鍵性指標，它反映在社會組織的各個層面。例如我們可以看出一下當時當權的內閣成員的情況。由於政局動盪，北京政府先後更換了二十四屆內閣，一般說來在動盪年代，老人淘汰比較快，在京城內閣更是如此，因此在掌權的知識分子中，內閣還是相對年輕的，但他們仍是40歲以上的人。張玉法對153個閣員進行統計，發現其平均年齡為46.7歲。除不詳的17人外，其餘新學堂畢業的佔57.5%，但仍有31.4%是接受傳統教育的^⑤。顯然這群40歲以上的新舊紳士正是新知識分子群體反對的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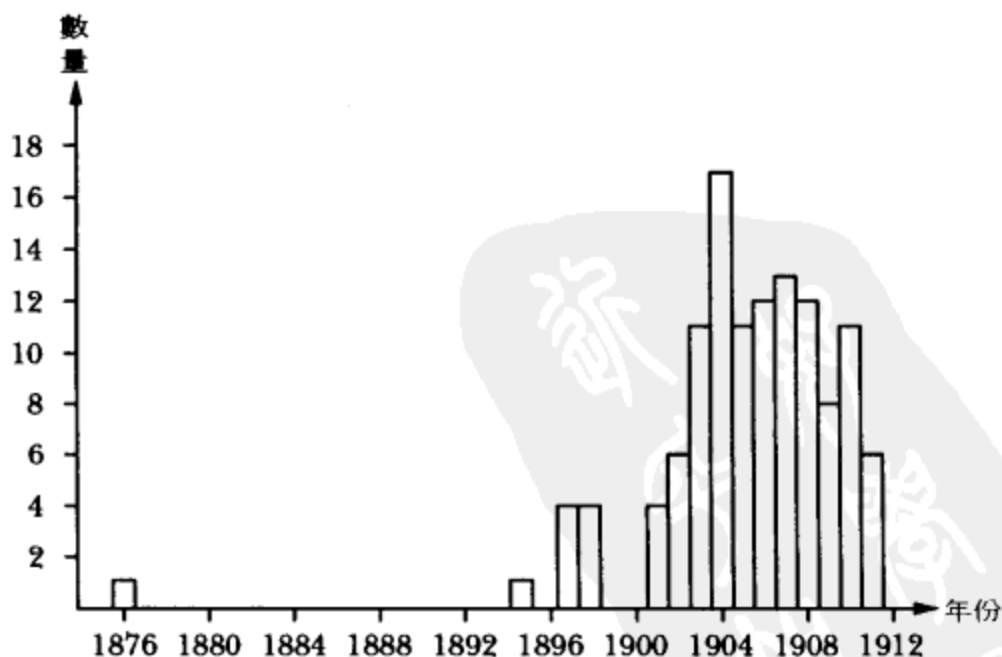
註九 最近，有人對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中提出的中國知識分子具有「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的思想模式提出質疑，認為這是混淆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所言」與「所為」。例如1906年胡適在上海公學讀書時，就創辦了《競業旬報》，把它看作「向大眾灌輸新思想」的陣地。而且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多主張「有機式地吸收現代文明精華」，決不只局限於「思想文化」。他們還批評林毓生沒有闡明「全盤反傳統主義」和「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的思想模式的因果聯繫^⑥。上述批評中存在着對林毓生觀點的誤解。而誤解之所以產生，一個原因是「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提法不夠清晰。把林毓生所概括出來的「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的模式改稱為「建構意識形態心態」，也許更為確切，它和整體反傳統主義的關係就一目了然。整體反傳統主義只是拋棄舊意識形態，只要存在着意識形態決定一切的心態，舊的拋棄後，立即會出現對建構新意識形態的嚮往。這種把尋找新意識形態作為解決

^⑤ 張玉法：《中國現代政治史論》 頁106-107。

^⑥ 胡偉希、高瑞泉、張利民：《十字街頭與塔》 頁3、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社會根本問題的傾向，當然只在意識形態更替時期才表現得最明顯，在這一時期以前，洋務派更重視器物層面現代化以救國，戊戌時期知識分子對制度變革曾表示更大的關切。只有到意識形態更替時期，思想文化(其實是意識形態)高於制度和器物層面的重要性才被普遍意識到。而且意識形態更換是從拋棄舊意識形態價值觀引發的，文化道德就被五四知識分子格外看重。

註十 白話文運動發展和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存在着密切的相關性。從圖5.1可以明顯看到，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之前，中國出現過一個白話文辦報刊之高峰，它是自1895年開始的，到1904年後達到頂峰。這恰恰是第一次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出現的時



據前引陳萬雄提供材料製圖，頁134-153。

圖5.1 晚清白話文報刊數量之增長

期。創辦白話文報刊之發展高峰與意識形態認同危機高峰不謀而合，充分反映出文言文是傳統意識形態的整體性象徵符號，白話文的興旺程度取決於社會對傳統意識形態文化符號懷疑與反叛程度。

註十一 舒衡哲(Vera Schwarcz)和李澤厚曾都從啟蒙與救亡的角度，來討論中國現代思想史上啟蒙中斷的問題。李澤厚明確提出現實緊迫的救亡需要，中斷了本應長期持續才能有真正成果的啟蒙過程^⑤。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後來又是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這些接連不斷的救亡的燃眉之急，要求把一盤散沙的社會組織起來，因而集體主義便代替了個人主義，專制強權最後淹沒了知識分子對人權和自由的追求。如果我們看新文化運動以後的中國現代史，這種說法似乎是不錯的。但是，這種解釋最大的困難是：從鴉片戰爭以來就一直存在着亡國危險，「救亡」是一百年來中國命運的主題，不能僅僅把這個現象用於1915年前後的中國社會。在二十世紀，對軍紳政權的不滿和批判，以及對社會整合危機之焦慮，正是新文化運動之推動力，亦即五四知識分子反傳統、提倡啟蒙本身正是出於救亡的需要。救亡壓倒啟蒙說不得不面臨一個二律背反：「救亡」既然導致早期的「啟蒙」，為何又會在新文化運動的後期中斷「啟蒙」？事實上，自1840年以後，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就始終存在着「救亡」意識，而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以致於辛亥共和革命，都是因「救亡」而做出的反應。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的救亡危機並不見得比其他歷史時期更為迫切。為何獨獨在這時救亡壓到啟蒙？這一說法的毛病在於，它忽略了在「救亡」的背景

^⑤ 微拉·施瓦支(Vera Schwarcz):《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李國英等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走向未來》第1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下，思想文化的變遷還有自身的內在演變機制和路向，「救亡」是通過對舊意識形態的拋棄而和「啟蒙」聯繫在一起的。

其實在任何一種帶普遍性的社會運動或潮流中，「救亡」都是最具動員力量的，它確實可以推動某些觀念興起，使某些價值具有壓倒性優勢。但是，僅僅有「救亡」的動員力量，不一定導致價值獨斷。正如辛亥革命期間，反清排滿、共和也是出於「救亡意識」，但民初時並沒有因之而出現某種價值獨斷。在五四前後，救亡之所以先推動啟蒙，接着又中斷啟蒙，是因為當時「救亡」這種社會動員力量和意識形態更替機制的相結合。為「救亡」而推動人們拋棄舊意識形態時，導致了普遍的啟蒙。新價值在價值逆反中出現，「救亡意識」就會以它勢不可擋的動員力量，將這些新價值形成新的意識形態。中國將開始各種主義（意識形態）爭雄並力圖取得一家獨霸地位的新時期。

註十二 張灝最近指出，新文化運動具有一種過去常被忽略的兩歧性。這裏所謂的兩歧性是指五四思想中的一些對立發展的趨勢，在每一種思潮和文化方向背後，幾乎都能發現與其矛盾的歧義潛流。例如五四的理性主義和啟蒙精神，是人所共知的，但同時知識分子的浪漫主義激情並不亞於理性意識，甚至充滿了非理性因素。五四知識分子具有大無畏的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但同時卻深懷極強的「新宗教」感，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人道主義都是他們信仰的新形態。五四知識青年力倡並實踐個性之大解放，但很快又陷於對「群體」和「社會不朽」的新崇拜，集體主義迅速取代了個人主義。五四知識分子高揚超越國家和民族界限的人類博愛和世界主義，但民族主義又是潛藏在深層的最廣泛最容易激發的情意結^⑤。這種兩歧

^⑤ 張灝：〈形象與實質——再認五四思想〉《自由民主的思想與文化》（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

性恰恰是價值逆反邏輯所具有的特點。拋棄舊意識形態、舊價值，造成了個性解放、批判、理性的一極，與此同時又迅速陷於對某些和舊價值相反的新價值的崇拜、獻身，它造成了與批判啟蒙相歧義的另一極。在價值逆反的前期，以拋棄舊價值為主時啟蒙和批判佔主流，一旦拋棄過程表面上差不多時，認同並日益禁錮於新的逆反價值就成為主流。思潮的兩歧之消長，正好刻劃了中國近現代意識形態的更替。

註十三 意識形態是一個整體性的知識體系和價值系統，形成新意識形態必須把西方傳入的新知識和新文化運動中創造的新價值進行整合，組成有結構的整體。但是人們用甚麼方法(原則)對新知識、新觀念進行加工、排列以構造整體性系統呢？我們發現，人們雖拋棄了舊意識形態內容，但仍習慣於舊意識形態那種整理知識和價值系統的方式，它下意識地支配了大多數新知識分子接受外來意識形態(或自己塑造意識形態)之過程，這就是我們所說文化深層結構和逆反價值結合之準確含義。

註十四 在中國文化深層結構中，一直存在着一種「以常識為基礎進行直觀外推」的思想方法，它在對知識系統加工形成整體結構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我們甚至可以說，儒家意識形態在某種程度上是建立在「常識合理和外推」基礎之上的。如孔子以人對父母的天然感情作為「孝道」的基礎，以人對兄弟姐妹感情深於其他人來證明「愛有差等」原則之合理；理學中以父子關係不會隨世事改變來證明儒家綱常是萬古不變的天道。傳統哲學觀的基本概念「陰」和「陽」也來自於日常生活中的常識。在這種推理方式中，常識(人之常情)首先被認為是天然合理的，是不能懷疑、不必深究的東西，然後用它們來類比、外推產生高層觀念。我們在有關論文中將其稱為「常識理

性」或「直觀理性」，並指出它一直是建構儒家意識形態的巨大力量。在中國歷史上，每當儒家意識形態面臨挑戰進行重構時，這種建構機制總是特別活躍^⑤。在新文化運動中，儒家意識形態全面解構，這種深層在建構意識形態機制也被高度激活，它和新文化運動中湧現的新價值——科學相融合，導致了中國特有的科學主義思潮，成為知識分子整理知識系統公認的標準。正是它使中國新知識分子接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自從洋務運動中西方科技知識系統傳入中國，知識分子一直是把科學知識當作擴大的新常識來接受的。但是當儒家意識形態尚未解構時，常識理性建構意識形態功能尚不明顯，人們並沒有把科學主義看做整理思想、建構意識形態之原則。科學知識的價值僅在技術上有用，它是低於意識形態「道」的「器」。甲午戰敗，儒家意識形態哲學觀和社會觀解構，直觀理性在這兩個領域中重建新意識形態的傾向開始顯現。進化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風行表明科學主義在中國的初步興起，但是由於儒家意識形態還未徹底解體，科學主義尚未被認為是選擇締造意識形態的基本方法。只是到了新文化運動期間，隨着儒家意識形態被拋棄，直觀理性這種傳統的建構意識形態力量才在每個領域中表現出來，科學的社會功能迅速由器上升為道、再演變為「人生觀的基礎」。「是否科學？」不僅成為人們的口頭禪，而且還是人們鑒別觀念和理論體系是否合理的公認標準。科學家熱衷於建立一種「在科學常識」之上的新人生觀，歷史學家也必須用科學來證明某一種社會模式是否合理。正如郭穎頤(D.W.Y. Kwok)所說：「二十年代末及三、四十年代知識分子的活動，……關於歷史、社會及西化模式的爭論……在根本上都是用科學術語展

^⑤ 金觀濤：〈中國文化的理性精神及其缺陷〉 劉青峰編：《歷史的反響》（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0）。

開的。」^{⑤⑥}

這裏必須強調的是，中國的科學主義是對科學的推崇和傳統常識理性相融合之結果，這就使它不同於西方一般意義上的科學主義。它表現出對唯物主義哲學觀特殊的親和力。首先，「科學」被等同於常識的位置，常識在直觀理性中是天然合理不用深究的。這便使得中國的科學主義一開始就把科學看成是不能批評的東西，而且常識理性更多地把科學視為當時的科學知識(新常識)，而不是科學方法。十九世紀末人們認為一切科學知識基本上是物質的知識，它們綜合起來構成一物質的世界觀。在意識形態尋找者看來，物質的宇宙觀直接指向物質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哲學，認同科學就簡化為認同唯物主義，於是在中國的科學主義者中唯物主義者逐步成為多數^{⑤⑦}。

本世紀二十年代後我們確實看到一個唯物論科學主義壓倒經驗論科學主義的過程。中國的經驗論科學主義者有胡適、丁文江和部分科學家，他們的文化傾向是實用主義和自由主義。唯物論科學主義則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幾乎包含了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在新文化運動前期，這兩派一起反傳統。但到新文化運動後期，兩派開始分裂。1923年的科學與人生觀大論戰中，唯物論派支持馬列主義革命人生觀，經驗論派支持自由主義立場，這時已經出現了唯物論派壓倒經驗論派的趨勢。1923年後，經驗論科學主義開始衰落，它的傳播一直只限於極少數知識分子和科學家中。而唯物論科學主義卻聲勢浩大，到1928年中國社會性質大論戰時，唯物論派已成為主流，幾乎所有派別都用歷史唯物論來討論中國社會問題。

^{⑤⑥} 郭穎頤：《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頁13。

^{⑤⑦} 劉青峰：〈二十世紀中國科學主義的兩次興起〉《二十一世紀》總第4期（香港：1991）。

中國新知識分子是通過唯物論來接受唯物史觀的，這就使得他們在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社會時，總是下意識地用物質因素來取代經濟因素。例如李大釗的〈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是最早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論文，其中所講的決定道德生活的因素，只是一般的物質存在，而非新生產方式等純經濟動力^⑤。陳獨秀和其他早期馬列主義者對歷史唯物論的詮釋差不多也總限於「物質層面」。中國從未出現過像俄國普列漢諾夫那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把「物質決定意識」和「經濟決定政治」明確地區分開來，也沒有類似於《論一元歷史觀的發展》那樣的經濟決定論著作。中國最早用歷史唯物論解釋中國歷史的著作是1929年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在此之前，無論是李大釗還是陳獨秀，都否認歷史發展有普遍模式，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也是高度民族主義的。李大釗只把中國社會描繪為「農業經濟組織」，而沒有接受經濟決定論的歷史發展五階段論^⑥。

通過唯物論科學主義認同辯證唯物主義，進而再接受歷史唯物主義，這是一條十分間接的理論思路，它造成中國早期馬列主義者大多只在理論思辯層面認同經濟決定論，而在心態上仍抱有從文化和政治上改造中國的立場。從陳獨秀、李大釗到毛澤東都高度肯定人在改造社會方面超越經濟條件之能動性，他們不用費太大困難，就擺脫了那些強調只有通過經濟發展才能改造社會的社會主義學說（如基爾特社會主義、社會改良主義和唯生產力論），迅速地接受了列寧主義。

註十五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直觀理性只是加工整理知識觀念的架

^⑤ 李大釗：〈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新潮》2卷2號（1919年12月）。

^⑥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譯組譯 頁186-187（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構，建構意識形態還需要一種整合價值系統的模式，這就是由道德價值外推決定其他價值的深層結構。在新文化運動後期，正是它對人們信奉的新價值如「平等」、「民治主義」、「大眾參政」進行塑造，形成了一種反對私有產權，否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經濟倫理，這是新知識分子認同新意識形態社會觀的第二個基礎。

為了說明這種價值外推機制是如何形成社會主義經濟倫理的，我們有必要先以少許篇幅討論一下它在傳統社會中怎樣規定儒家經濟倫理。儒家意識形態把道德等同於倫理，政治制度合理性的最後根據就是倫理，它正是道德價值決定政治制度價值之表現。照理說根據道德價值決定其他價值之模式，經濟制度之價值也應來自道德價值之投射。但是儒家意識形態的道德倫理系統是一種主張成仁成聖的道德理想主義，它是不言「利」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而經濟行為的價值標準恰恰是處理「利」的原則，它既不能從倫理道德價值中直接推出，唯一的辦法只有間接導出。儒家意識形態利用任何經濟制度必須和它維繫的政治制度相適應的關係，讓經濟倫理由道德價值二次投射結構確定。所謂二次投射是指先將道德價值投射到政治(社會)制度上，再由政治(社會)制度的價值來推導出與其相適應的經濟制度(行為)。

用這種二次投射結構可以解釋儒家經濟倫理為何具有一些表面上互相矛盾的內容，如它一方面主張「均田」、「平均」，但又維護私有制等級；一方面重農抑商，但同時又主張藏富於民。這裏，關鍵在於倫常關係成為政治組織原則，於是在經濟分配上，儒家主張以倫常尊卑等級來規定經濟地位高低。荀子說：「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願慤之民完衣食。」^⑩只有當人們在倫常關係中處於同一等級時，才主張「平均」和「均田」。張鴻翼將其稱為一種

^⑩ 《荀子·正論》。

經濟上的等級均衡制^①。由於經濟行為價值由道德價值二次投射結構規定，經濟行為只能通過適應政治制度來達到道德價值，這就造成儒家經濟倫理的最基本原則：超越名分的僭越被認為是最不道德的。競爭和商業也不被提倡，因為它們都有可能導致經濟地位嚴重偏離倫常等級秩序。但是儒家主張用家族倫理關係作為社會基層政治制度，沒有家族財產就不能維繫這種政治結構。為了維繫紳士在社會基層的組織功能，儒家經濟倫理不僅不否認私有制，而且還包含藏富於民、不與民爭利等內容。

顯而易見，這種經濟倫理既不是資本主義的，也不傾向於社會主義。現在我們設想，當社會出現儒家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在這種深層結構制約下，經濟倫理會出現甚麼變化？當道德倫理價值沒有被拋棄，改變的僅僅是社會觀時，由於倫常關係仍是社會劃分等級的根據，在經濟上、地位上，人們也必須根據尊卑保持分配不平等，這樣它有效地遏制平均主義和經濟平等成為分配原則，紳士仍作為社會基層組織者，經濟上私有產權和家族財產仍是合理的，經濟倫理中僅有國家級的經濟組織方式和分配原則隨着意識形態社會觀變化而作出調整，如放棄重農抑商等。這一階段，由二次投射結構決定的經濟倫理是明顯親和於資本主義的。當意識形態進一步解構，到儒家倫理被拋棄時，一些相反的價值——「平等」、「大眾參政」、「民治主義」作為傳統道德倫常價值之取代物，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首先，那些作為分配不平均和私有產權合理的根據都因其倫理根據之破壞而煙消雲散了。根據經濟倫理由道德價值二次投射生成的原則，平等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制度合理性標準，當然包括了經濟地位人人平等。這樣整個經濟倫理就出現了一百八十度轉變，從資本主義變為社會主義。

^① 張鴻翼：《儒家經濟倫理》頁113。

從1895到1920這二十五年間，我們確實看到社會經濟倫理先由傳統變為類似資本主義形態，再由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早在戊戌變法時期，西方各種社會主義理論都傳到中國，但在1915年前整個社會的經濟價值取向仍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在中國沒有甚麼太大影響。1911年12月孫中山和江亢虎就社會主義交換意見時，就講到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雖已多年，但「國人知其名者已甚少，解其意者尤稀」^②。用江亢虎本人的話講就是「究竟能夠了解社會主義的有幾人」？^③歷史學家公認，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普遍思潮的出現是在新文化運動後期，1919年五四運動是社會主義壓倒資本主義的轉折點。它表明，社會主義價值取向的普遍勃興和新知識分子拋棄儒家倫理是一個同步發生的過程。

是否有進一步的證據說明社會主義經濟倫理恰好是傳統的價值整合機制對取代儒家道德之新價值如「平等」、「大眾參與」加工的結果呢？我們只要詳細分析當時的推崇者如何看待社會主義經濟原則，就會發現，無論是哪一派社會主義者，首先都是把社會主義看作一種「道德」的制度來接受的，他們是根據道德價值來證明社會主義是合理的。馮自由把社會主義心腸等同於大慈大悲心腸，社會主義手段是救苦救難的手段，他說，社會主義就是：「要爭世界上萬般的事事物物，不平的使之平，不公的使之公的意思」^④。胡漢民在〈孟子與社會主義〉一文中把社會主義經濟原則上推到孟子時代，

② 孫中山：〈鼓吹社會主義普及全國人心目中〉（民前一年12月30日與社會黨本部長江亢虎之談話）《國父全集》第2冊 頁794（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3）。

③ 江亢虎：〈社會主義之今昔〉《江亢虎演講錄》 頁49。

④ 馮自由：〈中國社會主義之過去及將來〉《社會主義與中國》 頁1（香港：社會主義研究會，1920）。

認為孟子主張井田制就是充滿社會主義價值的^⑤。在這些議論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社會主義經濟原則背後的道德根源。

只要我們分析一下二十年代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就可以看到論戰三方的社會主義經濟原則都由道德價值的二次投射結構所規定。論戰由張東蓀發表「混樸的社會主義」觀點引起。社會改良主義者張東蓀和梁啟超鑒於當時中國沒有可能建立強有力的大一統政府，認為要實行社會主義價值原則只有先讓紳士資本家發展資本主義，然後通過教育和分配改良貫徹社會主義^⑥。在他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原則中，改良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原則明顯地從他們認為中國當時應建立的政治制度導出，經濟倫理只是道德價值的二次投射。馬列主義者認為中國應建立的政治模式和他們完全相反，是一個俄國式的國家專政機器，其經濟倫理也就成了國家計劃經濟。無政府主義主張取消一切政府和國家，人憑着自由的結合組織社會，在這種社會組織模式中，與其相適應的經濟倫理就是共產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

有人曾對新文化運動提出過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當科學和民主作為一種啟蒙價值出現時，中國為何沒有興起推崇市場和商品經濟的潮流？問題的癥結正在於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啟蒙是拋棄儒家意識形態之結果，它使得「平等」、「大眾參政」等與倫常等級制相反的價值佔據原來儒家倫理在道德結構中的位置，它們在經濟倫理上的表現就是社會主義。這樣，道德決定經濟倫理之模式規定了一旦人們放棄儒家的倫理，出現的只能是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科學

^⑤ 胡漢民：〈孟子與社會主義〉《建設》第1卷第1期（1919年8月10日）。

^⑥ 蔡國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頁168-171（台北：商務印書館，1988）。

和民主不能與商品經濟共存，這正是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內在限制。

註十六 只要分析深層結構與逆反價值結合，同樣能說明會產生甚麼樣的新價值系統與終極關懷。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系統中，道德理想主義是一種深層結構，當道德被等同於倫理時，道德理想主義和儒家倫理內容結合，就構成了傳統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在這種價值觀中，本來就存在一種可能，這就是去追求一個人人道德高尚的理想社會，也就是說個人的道德理想是可以投射到社會群體上，產生類似於人人道德完美的社會等烏托邦理念。確實在儒家傳統中，一直包含類似的理想，孔子所說的「大同」、孟子提倡的「井田」、《呂氏春秋》中所說的「公平社會」、陸賈的「聖德」、張載所嚮往的「均平」社會中都存在道德高尚烏托邦的影子。但是在儒家倫理沒有被拋棄之前，道德理想主義主要落實在倫理關係中，烏托邦不能成為終極關懷。儒生追求理想的倫理首先體現在一種典範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關係中，理想社會是一個實現了「三綱、五常」禮治和「仁政」的社會，而且儒家倫理極強調道德追求中的精英主義。道德理想主義被引向精英個人修身、維繫家庭和社會禮治方向。一旦儒家倫理被拋棄，新知識分子實現精英主義之逆反，那麼逆反價值和道德理想主義結合，立即就會產生新知識分子的價值觀——追求一個人人道德高尚的理想社會。群體道德理想主義和烏托邦主義成為普遍的價值取向^{⑥7}。

註十七 中國知識分子接受馬列主義的過程表明，它正是逆反價值

⑥7 金觀濤：〈中國文化的烏托邦精神〉《二十一世紀》總第2期（香港：1990）。

和深層結構對西方形形色色學說進行選擇的結果。馬列主義雖是外來的，但親和於它的勢力卻都是中國文化變構中的產物。在中國知識分子尋找意識形態過程中，我們明顯可以發現烏托邦價值不斷改變其寄托對象，最後才落實到馬列主義之中。新文化運動初期，烏托邦因儒家倫理解體而被迫遊離出來，它只能寄托在那些新價值符號上。如與儒家倫理相反的價值符號「民主」、「個性解放」、「崇尚獨立自由的新國民性」等等，知識分子普遍認為，只要人人具備了這些新國民性，中國就能建立一個完美的理想社會。

張灝曾指出，正因為五四知識分子是把烏托邦式的期望寄托在民主制度之上的，這就和西方構成重大差別。在西方，「民主」並不是一種理想的國民性和人格之反映。與其相反，民主制度倒是更多地基於對人性中黑暗面的理解。由於人是自私的、會濫用權力的，因此必須設立一種預防權力集中的制衡機制。民主並非理想制度，在某種意義上倒可以說它是防止政治變成最壞制度的方法。張灝把西方民主政治中對人性的理解稱為幽暗意識^⑥。而五四新知識分子對「民主」的看法非但沒有一點幽暗意識的影子，相反倒充滿着烏托邦式浪漫的情懷。李大釗把這種制度下(西方文明)的人看作是「積極的、獨立的、創造的、進步的、理智的、科學的」^⑦。陳獨秀也認為「個人之人格高，斯國家之人格亦高；個人之權鞏固，斯國家之權亦鞏固」。甚至乾脆地把西方各國之繁榮富強看作落實了民主這種新倫理、新國民性之結果^⑧。總之，正因為五四知識分子把實

⑥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 頁3-33、145-149（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

⑦ 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李大釗文集》上 頁557-558。

⑧ 陳獨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1卷5號(1916)；陳獨秀：〈舊思想與國體問題〉《新青年》3卷3號(1917)。

現烏托邦式的社會理想寄托在「民主」制度和「個性解放」等新國民性上，而又進一步把西方社會當作這種國民性和新倫理落實的結果，因而他們心目中的西方社會政治是具有烏托邦式新道德的。於是當巴黎和會結果傳來，想像與現實之間巨大的落差一下子帶來了對西方社會的幻滅。既然西方不再是烏托邦社會的代表，在濃厚的烏托邦心態下，知識分子一定要把社會觀中的烏托邦精神寄托到新對象上。

1919年巴黎和會後，知識分子對西方的崇拜已經幻滅，但在一個短時間中，馬列主義尚不太普及，還不能成為烏托邦主義普遍寄托的新對象。於是中國出現了一個奇特的新現象，這就是無政府主義再度繁榮，各種新村和烏托邦式小社會實驗盛行一時。當時無政府主義和新村主義者追求的理想，正好是一個非西方資本主義式的道德高尚社會，它是烏托邦精神在找到馬列主義前的代替物。1919年8月少年中國學會討論中國前途時，左舜生提出要組織「一種學術、事業、生活的共同集合體」，以克服人們由於愚昧、生活艱難和缺少修養帶來的道德墮落^①。王光祁讀了左舜生的文章後激動不已，他說：「知道你要創造一個嶄新的生活出來，我歡喜得連吃飯都忘了。」他提出一個新村式的烏托邦小社會的具體藍圖，並認為「我們純潔的青年與純潔農夫打成一氣，要想改造中國是很容易的」^②。接着周作人把日本的「新村」實驗介紹到中國，中國知識分子把類似的社會藍圖修改成為在城市實行的「工讀互助團」。它獲得了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恽代英等人的積極支持。「工讀互助團」是一個小型共產主義社會，規定參與者每天工作四小時，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它被知識分子視為「新社會的

^① 〈小組的提倡〉《少年中國》1卷2期(1919)。

^② 若愚：〈與左舜生書〉《少年中國》1卷2期(1919)。

胎兒，是實行我們理想的第一步」^⑬。當時，毛澤東想在岳麓山設工讀同志會，從事「半耕半讀」。惲代英和林育南一起設計「以農業為本，兼種果木、兼營畜牧」並「廢止金錢」的新生活^⑭。由道德高尚新人組成的小社會試驗可說是風靡一時。

烏托邦主義最大的特點是，當它還有新的對象可以寄托時，其實踐之失敗並不導致烏托邦本身的消失，只是改變寄托對象。新村式的共產主義實踐很快因不切實際而破產，但當時馬列主義正在迅速普及；大多數參加者把失敗的原因歸為外部環境的壓迫，也就是改造社會規模太小，而不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原則的虛妄。馬列主義終於成為烏托邦精神可以長期寄托的下一個對象，相當多的無政府主義者也就變成了共產黨人。

註十八 三十年代三民主義的科學主義性質，是一個學術界長期忽略的問題，直到近年來，才有人重新發現這一點。鄧元忠指出，三十年代「以黨治國」本質上仍是科學主義。三民主義理論家戴季陶一再強調西方文明是以科學為基礎的。胡漢民在1928年發表的〈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中指出，三民主義是「進化的重心」，「科學是超越一切的方法」，三民主義信徒，如果不承認這一點，「那根本上就是三民主義的叛道者」。他還指出，「世界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都只是非科學的哲理……」。蔣介石1939年在中央訓練團的演講中也一再強調要「認識時代」，並論述「何謂科學的群眾時代」。他把中國傳統也掛上科學主義的牌子，認為「本來現在所謂科學，就是我們中國以前所謂格致之學，……可見中國早在二三千年前就有科學

⑬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走向未來》雜誌 第1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⑭ 彭明：《五四運動史》 頁510（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了」，中國現代的衰弱不振，是由於現在中國人不能夠發揚與運用這自古即有的科學精神方法。因此號召把「科學」落實到修身的人生理想上^⑮。

註十九 我們把意識形態分成價值觀、哲學觀和社會觀三個子系統，三民主義的成熟正是這三個子系統自行拼合成新意識形態的結果。民生主義、民權主義是三民主義的社會觀，科學主義為三民主義的哲學觀，三民主義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則可以說是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也是在新文化運動中最後成熟的。

通常民族主義的形態取決於人們對民族認同的方式。當人們分別把血緣(人種)、文化價值、共同生活的歷史和領土當作民族符號時，就出現了種族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和地域政治權利民族主義(近代民族主義)等不同形態。而中國文化中民族認同方式深受儒家意識形態的影響。余英時曾指出，和古代西方相比，中國人對「非我族類」的看法是頗為罕見的，中國和非中國的重點不在種族、血統，而在文化和道德。「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已肯定了『諸夏用夷禮則夷之，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的大原則」^⑯。當意識形態把道德理想作為終極關懷時，就把道德水平看作高於其他一切價值，這就使中國人比其他民族更早地做到了對血統、語言和某一種特定文化價值之超越，而達到某種世界主義的境界。同時儒家意識形態又把儒家倫理和道德理想等同起來，這樣就把中國與非中國的區別歸為是否信奉儒家意識形態。我們知道，自董仲舒開始，儒家文化已發展出一些原則，把華夷之辨放到倫常關係之中，而不是看血統、

^⑮ 鄧元忠：〈科學主義在中國(民國20年—26年)〉《台師大歷史學報》第10期(台北：1989)。

^⑯ 余英時：〈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0)。

人種、語言以致於其他文化價值。極端地說，一個外國人如果信奉儒家倫理，士大夫會將其視為同類，而一個中國人如果背叛儒家倫理，則被視為禽獸。

簡而言之，中國文化的民族認同中包含着兩極，高度的道德理想主義和道德價值一元論組成了世界主義這一極；但同時道德又被等同於儒家倫理，它使得中國文化、制度和人倫等級被看作遠高於世界各國，是全人類第一的，因而又組成了中國人用儒家意識形態認同代替民族認同的另一級。這種兩極統一的民族認同方式導致了中國士大夫獨有的民族主義心態：首先任何僅僅是人種上的、語言文字上的、文化習俗上的特徵不能作為民族認同之最後根據，它認為有一種世界性統一的道——道德價值——凌駕於一切文化價值之上。而中國的倫常和文化正是這種最高道德價值之體現。因此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其他民族則按照其道德教化程度分成夷和藩，處於天朝帝國——中華的周圍。費正清稱其為華夏中心主義。這種獨特的民族主義帶來一個重大結果，這就是它向西方近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轉化時，必然同時出現世界主義傾向。

所謂近代民族主義是指民族認同符號從傳統的人種、語言、特定的文化價值中遊離出來，僅以領土完整、主權行使作為其象徵。這樣，捍衛領土主權的完整不需要排外和反對外來文化。顯而易見，對於華夏中心主義，只有當人們的意識形態認同解體，在文化價值等方面出現了多元開放心態，儒家倫理不再是民族認同符號時，民族主義情緒才會從文化上遊離出來，寄托到主權和領土意識之中。然而，根據華夏中心主義的結構，儒家意識形態被拋棄並不會改變人們潛在的世界道德價值之一元論心態。既然儒家倫理已不再成為世界上最高價值之體現，道德價值一元論還必須尋找一種新對象來作為自己的寄托，它可以是未來的社會，也可以是西方，這時知識分子中必然出現一種強烈的世界主義傾向。也就是說，中國

傳統華夏中心主義在解體中會出現一種內在的分裂，一極是世界主義，另一極是近代民族主義。因此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興起之過程的同時也是世界主義的顯現過程。

1895年甲午戰敗前，自強運動中士大夫的民族主義仍屬於華夏中心主義，西方近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是1895年以後才開始一步步出現和加強的^{①⑦}。儒家意識形態的解構，是華夏中心主義轉化為近代民族主義之前提。梁啟超民族主義思想的演變也證明了這一點，1898年前他的民族主義思想仍在華夏中心主義和排滿種族主義之間徘徊。1903年他放棄傳統社會觀後才成為具有近代民族主義的國家主義者^{①⑧}。儒家的解構一方面使民族認同符號同意識形態開始剝離，同時又使世界主義價值寄托到變法理想上，使世界主義初步顯現。汪榮祖曾指出晚清變法思想有雙重目標，中國富強與世界大同，他們相信「列國必將合為一和樂融洽之大同世界」^{①⑨}。「大同」作為一個世界性的烏托邦，其中蘊含着烏托邦主義和世界主義兩種成分。人們對大同社會的嚮往表明隨着儒家意識形態之解構而導致世界主義初步興起。但是在新文化運動之前，知識分子對儒家倫理認同尚未破壞，仍把儒家倫理和文化作為民族認同符號，這時近代意義下的民族主義尚未佔據主導地位，大多數知識分子仍是信奉國粹的文化民族主義者。只有到五四時代，中國知識分子才普遍具備近代民族主義心態。

眾所周知，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捍衛中國主權而不排

^{①⑦} 李國祁：〈中國近代民族思想〉 李國祁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

^{①⑧} 楊肅獻：〈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 李國祁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

^{①⑨} 汪榮祖：〈晚清變法思想析論〉《晚清變法思想論叢》 頁25-26（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外的群眾運動，它證明，只有等新文化運動中儒家倫理認同破壞，近代民族主義才得以成熟。而在這時我們也才看到了世界主義的勃興。五四同樣是一個知識分子普遍贊同世界主義的時代，當時孫中山就談到過新知識分子世界主義心態泛濫。他說：「近來講新文化的學生，也提倡世界主義，以為民族主義不合世界潮流。」^⑩這裏我們看到，傳統的華夏中心主義解構後變成兩種成分：近代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前者進入三民主義，成為三民主義的價值觀，後者進入馬列主義。

十分有趣的是，如果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同被吸收於一種強勢意識形態，就極易轉化為新的華夏中心主義，它正好刻劃了中國共產黨民族主義形態之變遷。根據華夏中心主義的結構，只有當中國的社會文化價值不再被認為是世界最高道德價值之體現時，它才表現出世界主義。知識分子一旦對西方和外國失望，世界最高價值不再落實到外國已有的社會模式而轉向未來時，情況就出現奇妙的變化。既然當前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並非合理，它應推翻重新安排，那麼落後的中國可以通過對這種未來新社會之追求再次成為世界中心，這時世界主義就轉化為一種新華夏中心主義。中國共產黨人接受馬列主義後，他們的世界主義就很快轉化為新華夏中心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新形態。十月革命剛開始，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炮聲並沒有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注意，只有當中國的世界主義者不再把西方社會當作人類價值之體現後，對俄國革命的興趣才大大增加。李大釗最初介紹俄國革命時就指出，馬克思主義可以使最落後的民族轉化為最先進的民族，這裏世界主義中已夾雜着新華夏中心主義的成分。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人在信仰馬克思主義後，即迅速地從世界主義心態轉化為新華夏中心主義——最傳統的民族主義。三

^⑩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三講〉《國父全集》第1冊 頁33。

四十年代後毛澤東思想的形成，五六十年代中蘇決裂，文革時毛澤東思想成為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中國則重新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這正是一條新華夏中心主義不斷強化的道路^①。

註二十 研究近現代的學者公認，中國近代百家爭鳴的多元化社會思潮大多產生於1895年甲午戰敗之後，在新文化運動前期發展到高潮，又隨着新意識形態文化霸權的形成而衰落。我們可以證明，多元化思潮的興衰是意識形態更替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只要把握意識形態更替過程的全貌，就能理解會出現哪些思潮，它們又是如何消失的。

我們可以把本章剖析的意識形態更替過程高度簡化為圖5.2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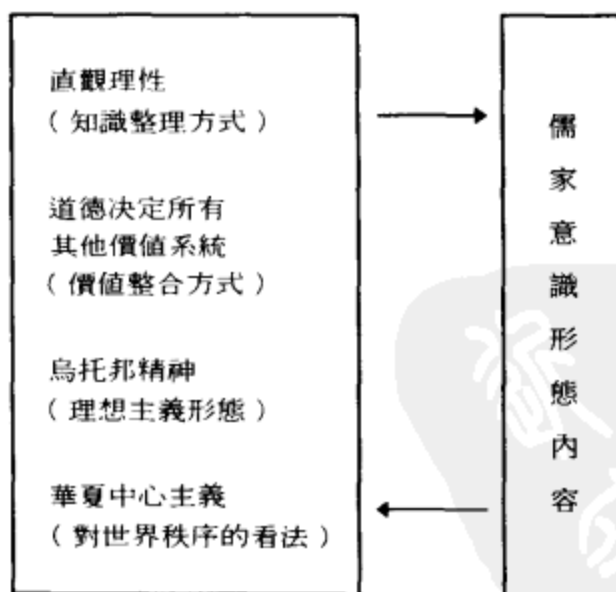


圖5.2 儒家意識形態及其深層結構

① 金觀濤：〈百年來中國民族主義結構的演變〉；劉青峰：〈文化革命中的新華夏中心主義〉《二十一世紀》總第15期（香港：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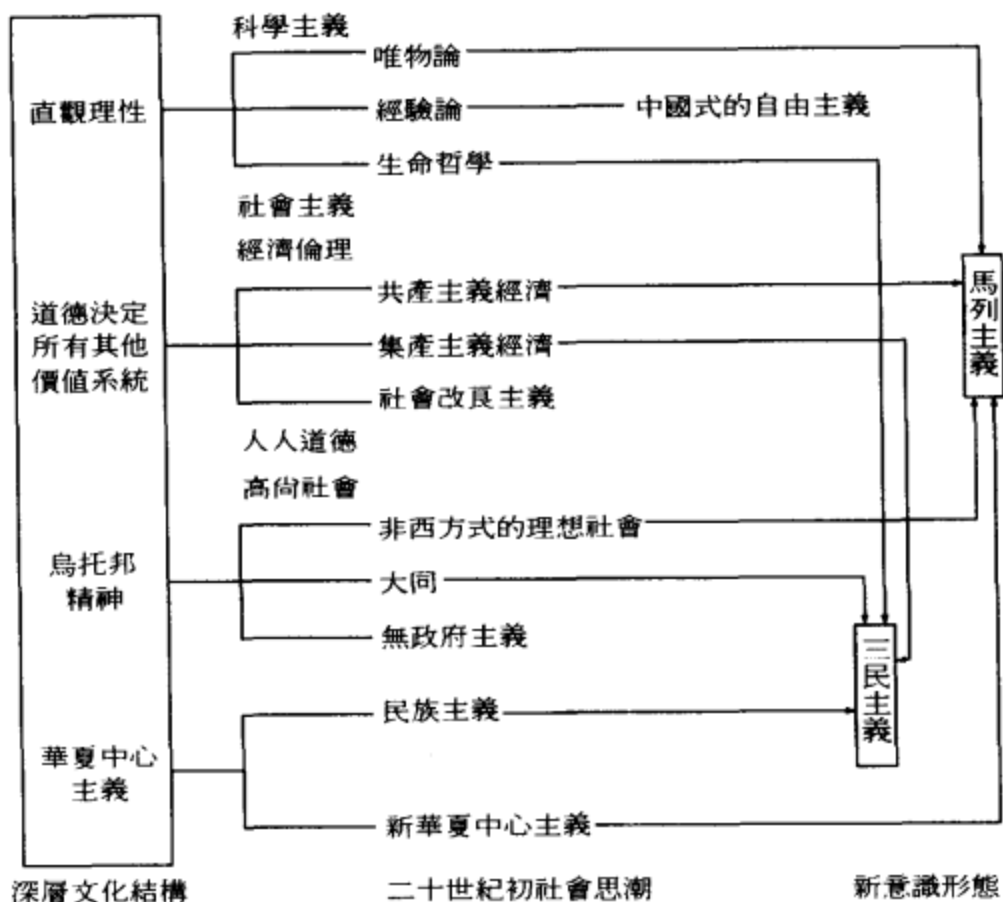


圖5.3 二十世紀初社會思潮變遷

圖5.3。圖5.2是1895年前的狀態。當時儒家意識形態佔主導地位，它和中國文化深層結構互相耦合。這時，外來衝擊只是導致儒學經世致用學派的繁榮。在正統意識形態統制下思想多元無從談起。而在舊意識形態認同破壞時，多元化思潮便開始出現。所謂意識形態更替，是指儒家意識形態內容從深層結構中剝離下來，文化深層結構尋找和塑造新意識形態之過程。隨着儒家意識形態被拋棄而產生的逆反心理會將逆反價值注入傳統文化深層結構。實際上，多元化思潮大多是逆反價值和傳統文化結構結合的產物。圖5.3表明，拋

棄儒家意識形態後產生的逆反價值如何與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結合，主導着新思潮的性質和路向。如對「科學」之注重和直觀理性結合，會產生不同的科學主義思潮；平等這種新價值和道德決定了其他價值系統的深層結構之結合，主導着三種不同類型的社會主義思潮等等。圖5.3企圖標出當時中國多元化思潮的主要成分，並指出，它們均和中國文化深層結構有關。多元化思潮在儒家意識形態完全被拋棄、新意識形態尚未產生時發展到高潮。隨着圖5.3中多元化思潮整合成兩種新意識形態，那些不能吸收進新意識形態的成分，在新意識形態文化霸權壓迫下，自然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它必然衰落。這裏我們看到，中國近代多元化思潮之興衰本是意識形態更替過程中必經的中間環節。



第六章 中國社會的重建

人有意識地為自己活着，但他卻是一個
完成人類歷史普遍目的無意識的工具。

——托爾斯泰

6.1 開放條件下的社會整合

1918年，正當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展開之際，孫中山已經五十三歲，他發表了舉世矚目的《孫文學說》。今天如果我們去翻閱這位革命家在中國社會危機深重的時刻提出的綱領，就會大吃一驚。全書立論極為奇特，它居然是以討論認識論為中心的。孫中山力圖證明，「中國近兩千多年，文明不進步的原因，便是在學術的思想不正當」^①，他特別非難「知非艱」、「行之惟艱」的哲學傳統，認為這是近代改造社會不成功的關鍵，並大聲疾呼將「知易行難」改為「知難行易」。在今天看來，孫中山的思想方法怪誕而不好理解，很少有一個現實的政治家會把社會危機歸結為認識論失誤。其實，孫中山想講的並不是哲學意義上的認識論，而是意識形態與社會組織的關係。

在中國傳統社會，儒家意識形態認同從未被破壞過，現實社會被要求當作意識形態所規定的理想社會之投射，即「仁政」的實現。中國傳統儒生對「仁政」的內容一清二楚，社會改造之困難從不在於對理想社會的認識和統一思想，而在於如何做才能落實「仁政」。在

^① 孫中山：〈知難行易〉（演講）《國父全集》第2冊 頁469。

意識形態和社會整合(建立一體化結構)關係上,從來是「知易」,「行難」。超穩定系統對外開放,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爆發,情況就倒了過來。革命黨一次又一次推動政治體制變化,其行動似乎輕而易舉,但意識形態認同破壞卻使社會面臨日益嚴重的整合危機。孫中山在幾十年實踐中終於發現,中國只要意識形態不統一,真正改造社會是不可能的。他大力提倡「知難行易」正是深感統一革命黨思想之困難。《孫文學說》的發表恰好在新意識形態產生前夕。1919年以後,隨着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日益成為社會思想的主流,孫中山所講的「統一思想之困難」立即迎刃而解。

半個多世紀來中國人社會行動上本存在着一個巨大疑難。中國要強大,必須學習西方,但是西方這個先生卻又在不斷侵略向他學習的學生。學習西方與反對西方列強的思想同時存在,長期來構成了社會動員上的悖論。新意識形態出現後,人們對現代化中社會危機的根源大徹大悟。在社會主義學說看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並非最優,中國應在現代化同時去追求一種超越西方之制度。反帝成為新意識形態進行社會動員的第一面旗幟。意識形態作為一個整體性思想體系,在推出「反帝」的理論根據的同時,立即證明人們反感的軍紳政權的不合理。在社會主義和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藍圖中,再也沒有這些地主鄉紳道德精英之位置,落後的家族制度以及鄉紳控制地方政權被稱為「封建」,它們阻礙中國強大。從此,反對軍紳政權再也不需要以軟弱無力的「護法」為根據。

國民黨提出打倒軍閥的理由主要有三條:軍閥不顧國家利益勾結帝國主義;不顧民眾利益,破壞民生剝削人民以自肥;不服從國家領導,不知主義和黨^②。勾結帝國主義是違背民族主義,不顧民

^② 陳訓正:〈民國十三年之北伐及總理北上〉 羅家倫編:《革命文獻》第10輯 (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3)。

眾利益是破壞民生主義，而不知國家擁兵自重則是反對民權主義。換言之，軍紳政權之所以不合法，就是因為它違背了新的「天道」——三民主義。意識形態再次成為改造社會的巨大動員力量。

在中國，新的天道一旦產生，最先接受新意識形態之階層立即從社會中凸現出來。新文化運動後期，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從未有過的歷史現象，這就是學生一時間突然成為改造中國的主力軍。在此以前，中國雖也出現過學潮，但學生運動再活躍，也只是革命黨起事和紳商地方獨立之配角，從未達到全國性規模。1919年以後，青年學生宣揚新意識形態最為得力。他們的思想比較統一，具有其他階層所缺乏的組織力與動員力。學生運動洶湧澎湃，社會影響遠遠超過革命黨。據周策縱估計，1922年重大學潮達125次。常道直估計也有106次^③。學潮一爆發就具有全國性。五四運動就很典型。5月北京學生發動，6月上海響應，並迅速波及全國各地。學生四處串連，極具動員力，他們推動商人罷市，工人罷工，一下子形成全國性政治運動。這種社會動員力確實是新文化運動之前不能想像的，當時有人將1919-1920年稱為「學生運動(的)中國」^④。學生給人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致1919年10月張煊給漳州的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的信中這樣寫道：「觀於北京大學數月來之舉動，我西南數十萬之雄兵所不能為者，而彼能為之。」^⑤學生比兵還厲害，被冠於「丘九」的稱號。1919年6月16日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各省學生組織有方，使戴季陶大為佩服^⑥。李劍農更是表示，「我敢大膽的說一句——此時候已經有了長久歷史的國民黨的組織和黨員間的聯絡指揮，恐怕還不如這個新成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組織的完密，運用的

③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頁402。

④ 仲九：〈學生運動的過去和將來〉《星期評論》46號（1920年4月18日）。

⑤⑥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頁414。

活潑靈敏」^⑦。

學生運動造成對舊社會巨大的衝擊，這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利用學生來實現社會整合呢？一體化結構的組織原則是使認同統一意識形態的階層成為社會組織者。表面上看，五四運動以後，在社會整合上，出現了和傳統一體化結構同構的局面：中國傳統社會實現社會整合，是靠儒生階層的意識形態認同以及他們成為社會各層次之組織者，現在，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代替了儒家，而新知識分子（以學生為主）又是新意識形態的信服者，他們似乎可以代替傳統儒生的位置，並通過意識形態認同，完成社會三個層次的整合。但是，超穩定系統對外開放後，讓知識分子來實現新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一體化則是不可能的。

首先，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已不可能像傳統知識分子那樣，達到對某一種意識形態信仰的統一。傳統知識分子信仰儒家，這是因為他們從小讀書受教育，這不單是一個認字學知識的過程，也是學習怎樣做人，通過道德修煉成為君子的過程。當超穩定系統處於與世隔絕狀態時，可以做到培養知識分子和保持知識分子意識形態認同的天然合一，意識形態一致是不成問題的。而在對外開放條件下，培養新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意識形態認同出現結構性的分裂。雖然新意識形態是由新知識分子所引進、推崇和宣傳的，但新式學校的功能是傳授知識，而不像傳統教育那樣以對意識形態的教育和灌輸為目標[註一]。開放條件下形形色色外來思想的傳入，多種意識形態互相競爭，人們有着選擇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新知識分子雖仍是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之傳承者，但作為一個階層，則已做不到認同某種統一的意識形態。

⑦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下冊 頁606-607（台北：商務印書館，1974）。

新文化運動後期，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學生階層意識形態不統一，他們因信服不同的「主義」分裂為形形色色的流派。馬列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改良主義者、國家主義者開始了日益激烈的爭論。少年中國學會剛成立之時，大家以宣傳新文化為己任，但到新意識形態成熟壯大之時，內部就出現嚴重分裂。馬克思主義者鄧中夏和以後成為青年黨創始人的左舜生在分道揚鑣之時，握手道：「我們以後戰場上見吧」。

第二，即使學生階層可以達到對一種主義的認同，但學生的角色不能使他們轉化為社會各層次的組織者。隨着學生運動取得愈來愈大的社會影響，立即出現了學生社會角色的混亂。青年學生不得不在「讀書與救國」、「求學與辦事」之間抉擇。那些主張以救國為主的學生，要求學生自治和取消考試制度，社會上對學生的本份是甚麼議論紛紛。本來，學生因求學進新學堂，最早接受新文化和新意識形態，如果由他們用新意識形態去實現社會整合，他們就必須先轉化為軍人、政治家、官員，這就等於否定了學生身分。因此，在用新意識形態完成社會整合過程中，知識分子階層已不可能再像傳統儒生那樣，整體地作為社會組織者[註二]。

第三，用意識形態整合社會，還必須使人民服從它的權威。這一點在傳統社會不成問題。儒家意識形態以家庭倫理為本位，把國家看作家庭之擴大，每個人自小生長在服從儒家倫理家長制的家庭中，接受忠孝為核心之綱常教義；而真龍天子以「天命」、「道統」作為自己合法性根據，就獲得社會基層百姓之認同。傳統的家庭功能和教化使得民眾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正統意識形態是一致的。用新意識形態整合社會時，這一把民眾意識形態與中上層統治者意識形態天然聯繫之紐帶已不復存在了。雖然，新意識形態主張反帝反封建，和農民、工人、城市貧民利益一致，但要人民接受新意識形態，還必須有一個向基層宣傳、滲透並與群眾革命結合之過程。

總之，超穩定系統在對外開放條件下實現社會整合，僅僅依靠知識分子創造或接受某種具有強大動員力的新意識形態是遠遠不夠的，它必須去克服上述三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困難。即需要找到一種組織方式，以保證開放條件下人們對統一意識形態之認同，與此同時能順利將其成員源源不斷地轉化為社會各層次組織者。為了讓人民接受統治權威，這一組織還要能推動新意識形態自上而下的傳播，引導基層群眾觀念大變革，使他們放棄傳統意識形態轉向接受新意識形態權威。二十年代，新意識形態實現社會整合之潮流不可阻擋，有如洪水衝開閘門那樣掃除發展中的障礙。新的組織方式終於被找到了，這就是建立列寧主義政黨。

6.2 列寧式政黨的功能

影響中國現代發展的最重大的事件，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1924年中國國民黨的改組。今天，人們在討論中國社會這一巨大轉折時，都承認這是十月革命後「以俄為師」的結果。二十年代初的蘇聯，內戰剛平，經濟政治實力遠不能和西方相比，然而蘇聯對中國的影響卻壓倒西方，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這是因為十月革命正巧發生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它在兩個環節上迎合了當時超穩定系統對外開放條件下變遷的歷史需要。第一個環節我們已在上一章討論過，這就是它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新文化運動後期知識分子信仰新意識形態提供了外來資源。沒有十月革命，新意識形態取代舊意識形態也許不會如此迅速。第二個環節是蘇聯列寧主義式政黨組織模式的引進，它解決了在對外開放條件下達到新意識形態認同的困難，這就是如何在一個思想已日趨多元化的新時代中保持某一個團體對新意識形態的信仰。

1921年深秋，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不久，組織部長張國燾就踏上了去莫斯科取經的遙遠歷程。1923年，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Michael Borodin)抵達廣州，向孫中山全面傳授蘇聯組黨和發動群眾革命的經驗。孫中山正苦於國民黨日益渙散，一聽大為折服。他把鮑羅廷比作曾對美國建國有着重大貢獻的法國將軍拉斐德(La Fayette)，並讓他立即着手指導國民黨改組。1924年，正值改組後的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際，傳來了列寧去世的消息，孫中山決定休會三日以表哀悼，並號召全黨以俄為師，把國民黨改造得如同列寧的黨那樣穩固堅強^⑧。這種使中國共產黨興起，使孫中山大為折服的組織方式究竟是甚麼呢？我們將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結構和西方議會政黨做一個比較，就會發現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結構有一種特殊的功能，它可以在一個多元開放環境中牢牢維繫黨員的意識形態認同。

列寧主義政黨在組織結構上和西方議會政黨的基本差別在於：它有着籠罩每一個黨員的基層組織。改組後的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基層組織雖有嚴密程度之分，但基本形態類似，共產黨稱為「支部」，國民黨叫「區分部」。它們以黨員工作、生活居住地來劃分，構成一個能經常活動的團體。每個黨員必須是某個基層組織之成員，甚至連黨的領袖也不能例外。列寧主義政黨不是由獨立的個人組成，它是以「支部」、「區分部」為基本細胞。一般政黨則沒有這種基本細胞，黨僅由上層機構和黨員組成。國民黨改組前，也沒有基層細胞，國民黨改組時高度強調建立區分部之重要，它指出，「若沒有區分部，上級機關等於無領土無人民的國家」，「區分部」的責任是

^⑧ 陳旭麓主編：《五四後三十年》頁72-7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使國民黨得盡力於民間」^⑨。

為甚麼列寧式的政黨必須以「支部」、「區分部」為細胞呢？原因正在於它是開放條件下達到意識形態認同必不可少的組織形態。在社會變革劇烈、思潮變化不定的時代，要保持某一組織成員對哲學觀、價值觀、社會理想達到整體認同，要比僅僅達成政見一致困難得多。由十幾人或數十人組成的基層組織就成為達到和保持意識形態認同不可缺少的結構。有了這種組織形式，黨員能夠而且必須經常活動，開會、共同行動、溝通思想、相互了解（包括相互監視），每個人都能參與到他人的思想和價值追求中去。這種聯繫方便、成員固定的基層組織活動，把意識形態所規定的價值落實於每天的實踐。它對於維繫黨員意識形態認同十分重要，所以每個黨員必須屬於某個支部或區分部[註三]。吸收新黨員的過程，更是典型地反映了這種結構之功能。西方議會政黨對黨員的要求只是擁護黨的政治主張，入黨很簡單，只須經介紹和完成登記手續。意識形態認同團體接受新成員，則要求人們認同意識形態，黨如何才能知道參加者已接受黨的意識形態呢？唯一可靠的辦法是通過基層組織的認真考察。因此列寧主義政黨吸收黨員，毫無例外必須通過基層支部，而不能由中央直接吸收。只有這些基層細胞才有可能掌握、了解新成員的情況，才能用意識形態標準衡量他是否合格。意識形態越強有力，對基層組織要求也越嚴。馬列主義是比三民主義更強大的意識形態，共產黨支部的組織性和重要性也大大強於國民黨的區分部。共產黨吸收新黨員除了必須經過支部審查外，還要有相當一段時間的候補期，以考察參加者是否符合意識形態標準[註四]。

我們把列寧主義政黨稱為意識形態認同團體，而西方議會政黨

⑨ 〈國民黨過程中兩要點〉《民國日報》（上海：1924年元旦增刊，「中國國民黨改組號」二）。

只是政見認同團體[註五]。超穩定系統實現意識形態更替前，中國社會處於意識形態認同危機中，眾多的政治團體只能基於政見認同，其組織系統必然隨政見重疊而交叉，隨政見變遷而解體。據張玉法統計，民國初年中國共有312個政治黨會。它們都是政見認同團體，其中具有健全或具體政綱的只有35個。而這35個黨，平均2.8個黨共用一種主張^⑩。政見雷同造成政見認同團體的組織互相交叉，十分混亂。上層人物常常同時屬於不同政黨。如伍廷芳、黃興各有十一個黨籍，黎元洪有九個黨籍，唐紹儀、王寵惠、于右任等均屬於七個黨^⑪。這些政見認同團體經常隨着政見的變化而分裂。同盟會以推翻清王朝為統一政綱，清王朝滅亡，同盟會立即瓦解。討逆軍以反對袁世凱稱帝為目標，袁世凱一死，就馬上出現內訌。章太炎把民國初年政黨和革命黨團體隨政治目標實現而解體，稱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認為這是政黨必然面臨的命運。而孫中山對此極為不滿，他屢屢奮起，想把國民黨變成一個組織嚴密但又有群眾性的大黨。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在日本將國民黨改為中華革命黨，為了強化組織性，要求黨員把一切獻給黨的事業，與黨共生死，並按指模宣誓服從領袖。這種做法立即引起國民黨人的不滿。孫中山的親密戰友黃興、李烈鈞、柏文蔚、譚人鳳、陳炯明、張繼等人，雖與孫中山政治主張一致，但都不同意按手印宣誓這種類似加入黑社會的做法，結果連胡漢民、廖仲愷都「結廬讀書，隱居郊垌」，對此事具見猶疑，朱執信到1915年才正式入盟，黃興則流亡美國。由於很多人均持異議，甚至別立門戶，各行其事^⑫，這就使得中華革命黨的規模縮小，遠不能和原先國民黨相比。

^{⑩⑪} 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近史所專刊49 頁36-38（台北：1985）。

^⑫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頁14。

孫中山不知道，政見認同團體是不可能既緊密又有群眾性的，一旦它組織緊密，就如同一個幫會，立即失去群眾性；如果強調黨的群眾規模，就只能用黨的政見作為內聚力，組織必然鬆散。隨着政治目標實現，政見的吸引力消失，黨也消亡。1923年國民黨改組前夕，雖已是一個擁有二十三萬黨員的群眾性大黨，但是，它仍如一般政見認同團體，組織極為鬆散，黨組織並不了解何人入黨，何人退黨^⑬。孫中山為黨組織鬆垮而煩惱，認為這是國民黨的衰落，但又苦於想不出解決辦法。正是在這一關頭，列寧主義政黨組織模式傳入，孫中山茅塞頓開，立即着手把國民黨改造為一個意識形態認同團體[註六]。

意識形態認同團體以新意識形態認同為凝聚力，並設有支部、區分部這種保持黨員意識形態一致的基本細胞，它立即呈現出和政見認同團體不同的組織效果。1924年國民黨改組時，對黨員又提出了類似於加入中華革命黨的要求，黨員必須服從黨的領袖和紀律，甚至黨員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均不得自由支配，應把一切獻給黨^⑭。黨員入黨也有類似於按指模的宣誓儀式。由於這時國民黨已有了新意識形態，參加者接受比政見一致更具有整體性的新意識形態，放棄個人自由只是認同黨的意識形態的體現。結果非但沒有出現中華革命黨成立時的大分裂，反而出現國民黨的大發展[註七]。

保持政治團體意識形態認同的新組織方式一旦在中國出現，它就立即成為經歷過新文化洗禮的青年學生嚮往的目標。1923年全國學生聯合會、基督教全國青年聯合大會，紛紛移師到革命黨根據地廣州召開^⑮，充分顯示了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對青年知識分子的吸引

^⑬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 頁536。

^⑭ 王功安、毛磊：《國共兩黨關係史》 頁67（武漢：武漢出版社，1988）。

^⑮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 頁483。

力。學生既然以救國為己任，而學生組織本身已不足以適應這一功能時，很多學生毅然放棄學業，中國出現了學生向意識形態政黨黨員角色轉化之潮流。單單五四時代的核心人物進入國民革命陣營的就有300—400人之多^⑩。共產黨最早的組織核心，也幾乎全由五四知識分子組成[註八]。國民黨元老鄒魯說過，大量學生因信仰三民主義而投身於國民革命，國民黨出現吸收青年入黨高潮^⑪。當時在國民黨黨員中，僅青年學生就佔10.5%，知識分子佔一半以上^⑫。接受新意識形態的學生終於找到一種參與社會改造的組織方式。

在加入國共兩黨的五四知識分子中，以中學生為最多。據統計，1922年全國學潮，有67%發生在中學，大專和小學分別為23%和10%^⑬。中學生不僅比五四運動發動者——大學生人數為多，而且更具意識形態化參政熱情，隨着他們的加入，國民黨和共產黨獲得大量生力軍，迅速崛起，成為政治舞台主導力量。1924年，國民黨剛剛改組時只有175,875人，高級黨部18處^⑭，到1926年，短短兩年國民黨黨員就增至544,656人，縣市黨部401處^⑮。共產黨黨員也迅猛增長，「四大」以前還不足一千人；「五大」時則已增加到將近六萬人。短短兩年時間，人數增加了六十倍^⑯。兩黨的發展猶如超新星爆發，使政治舞台上其他力量黯然失色。比較一下孫中山和梁啟超在新文化運動後的社會影響，就可以看到這一趨勢。孫中山於1925年逝世，而梁啟超死於1929年。在他們生前，梁啟超較之孫

^⑩ 孫德中：〈五四與新文化運動〉《文星》第10卷1期（台北：1962）。

^⑪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鄒魯全集》（三）頁303—304（台北：三民書局，1976）。

^⑫ 楊幼炯：《中國政黨史》頁194（台北：商務印書館，1969）。

^⑬ 蘇雲峰：〈民初之知識分子(1912—1928)〉，《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研討會》下。

^{⑭⑮} 楊幼炯：《中國政黨史》頁193。

^⑯ 王功安、毛磊：《國共兩黨關係史》頁181。

中山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影響力，梁啟超領導的進步黨和國民黨的規模也差不多。在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運動中，進步黨的作用比國民黨更大。但是梁啟超的死意味着他政治影響力的終結，組織結構類似於西方議會政黨的進步黨和研究系也在新文化運動後期土崩瓦解。而孫中山的死卻是他成為中華民國國父的開始，他是國民黨崇拜的「聖王」。這一切十分形象地表明，列寧式革命黨如何壓倒其他政黨，成為超穩定系統對外開放條件下的社會組織者[註九]。

6.3 黨軍和北伐

希臘神話中有一個故事，太陽神的兒子法厄同(Phaëton)希望父親滿足他一生最大的願望——駕駛太陽車。太陽神無可奈何地答應了，但暴戾的太陽車卻不肯服從一個毛孩子的駕馭，結果是法厄同全身燒焦成為一顆隕石從天下掉下來。在人類發明的政治機器中，最暴戾難以駕馭的歷來都是軍隊。自一體化解構以來，中國的軍隊完全失控，想駕馭軍隊的各種政治力量無一不碰得頭破血流。在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軍人目空一切，根本不把新誕生的「主義」放在眼裏，軍閥中幾乎沒有人意識到一種重新駕馭軍隊的巨大力量正在被製造出來，這就是列寧主義政黨。

傳統一體化結構是靠軍事將領的意識形態認同來控制軍隊的。列寧主義政黨既然達到政治團體內部對新意識形態認同，那麼類似於傳統一體化結構用儒將治軍的機制馬上復活了。這就是讓意識形態政黨控制軍隊，或者說使軍隊也具有意識形態認同團體類似的性質。國民黨稱之為黨軍，共產黨則將這一原則叫做「黨指揮槍」。由於以黨控軍、以黨建軍是中國現代史上的新事物，在討論黨軍結構時，以前的研究者很少注意到它和中國傳統一體化結構控制軍隊機

制的類似性，人們僅僅把黨軍看作是以黨組織控制(建立)軍隊。其實「黨軍」的重要性並不在於讓軍隊屬於政黨，如果政黨不是意識形態認同團體，黨是不可能指揮軍隊、防止軍事割據的。國民黨改組前試圖建立黨軍的歷史就證明了這一點。

眾所周知，建立由革命政黨控制的武力，一直是孫中山的理想，民國初年，他就有建立黨軍的想法。他曾在日本東京建立「浩然廬」，作為培養黨人的軍事學校^{②③}。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時，終於第一次有可能建立黨的武裝力量。通過國民黨人胡漢民、汪精衛的斡旋，他委屈求全，終於從廣東督軍陳炳焜那裏爭取到省長公署的20營警衛軍，約5,000人。孫中山將這支部隊交給老黨人、他的部下陳炯明統領。他積極向華僑募款，並迫使桂系將部分關稅、鹽稅撥給陳炯明使用^{②④}。除了經濟保障外，他還將重要軍事人才如鄧鏗、許崇智、蔣介石等都集中到這支部隊中來，並批准全體官兵宣誓入黨^{②⑤}。孫中山為建立黨軍，可謂煞費苦心。

但是，國民黨當時還是政見認同團體，而非意識形態政黨，以黨建軍的後果和孫中山意願相反。陳炯明雖為國民黨黨員，但他的政見一旦與孫中山分歧，軍隊也就和孫中山分道揚鑣。聯省自治運動興起後，積極支持、參與聯省自治的陳炯明便反對孫中山的北伐計劃。1922年，陳炯明公然炮轟總統府，把孫中山趕出廣州。而合力將陳炯明軍驅出廣州的滇桂聯軍更是跋扈，不聽號令，分割地盤，霸佔稅收^{②⑥}，同樣無視革命政權之存在，實際上無異於「有一

②③ 李雲漢：〈中華革命黨的組黨過程及其組織精神〉《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冊2 頁285-286 (台北：，1985)。

②④ 段雲章等：《陳炯明的一生》 頁125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②⑤ 郭翹然、李浩之：〈粵軍史實紀要〉 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粵軍史實紀要》 頁9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

②⑥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 頁455。

分錢，打一分戰」的一般軍閥。孫中山曾痛心疾首地對為首的楊希閔、劉震寰說：「你們都戴我的帽子，來蹂躪我的家鄉。」^②

孫中山苦心經營黨軍不成，反受其害，證明了靠某種政治主張（政見）組織起來的政黨是沒有能力控制軍隊的。西方議會式政黨同樣也從沒有控制軍隊的能力。在西方現代國家政體中，軍隊服從憲法權威。而在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中，軍隊只會服從意識形態權威，因此「黨軍」之本質並不在於以黨組織建軍、控軍，而在於讓軍隊服從黨的意識形態。

軍隊作為一個具有高度組織性的武裝團體，如何才能處於新意識形態控制之下呢？當新意識形態具有強大的凝聚力，並形成了具有緊密細胞之黨組織，只要讓這樣的基本細胞深入軍隊基層，使廣大士兵、軍官都臣服於新意識形態的權威，就實現了對軍隊的控制。共產黨軍隊的政治委員制度就是一個例子。各級政委就是黨的意識形態代表，政委制強調把「支部建在連上」，黨員成為士兵之表率。在支部之上有總支、黨委，黨代表、政治委員主要做思想工作，在特殊情況下可以代替軍事長官指揮。除了政治委員制度外，另一個可行的辦法是系統地把認同新意識形態的五四青年轉化為軍官，即讓軍官培養過程與認同黨的意識形態教育合一。這就是意識形態化軍校和軍官團制度。國民黨作為弱勢意識形態認同團體，主要用第二種方法建立黨軍。

大家都知道，國民黨黨軍起源於黃埔軍校，黃埔軍校正是一個意識形態化的軍官培養機構。1924年6月16日孫中山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上，就以「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為題訓話，強調軍隊必須服從黨的意識形態。新文化運動後期，培養大批認同新意識形態的軍官有一個捷徑，這就是吸引那些有政治熱情，傾向於接受新

^②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頁455。

意識形態的青年為軍校學生。黃埔軍校成立之際，正是新意識形態成熟，廣大五四青年因信仰三民主義紛紛從政投軍之時。在青年知識分子參政投軍的熱潮中，黃埔軍校作為實現黨軍的基地，可以說辦得恰逢其時。羅家倫以切身體驗說，他認識的很多黃埔軍校同學，均因中學時受新文化運動影響而參軍^②。據統計，黃埔軍校前三期2,259名學生，來自全國二十二個省，他們至少是高小及中學文化程度，還有些是大專畢業、甚至留學生^③。為了打破軍閥部隊那種同鄉地域為主的組合方式，孫中山特別將黃埔軍校的名額，根據各省情況分配到各省。黃埔軍校培養受三民主義控制的青年軍官的進程極為迅速。黃埔軍校成立的第一年，仍不得不任用在保定軍校或日本軍校畢業的黨員做教官和骨幹，但到1925年黃埔開始有畢業生，其中不少人被任命為該校教官^④。同年4月，具有意識形態認同之青年軍官已經相當多，國民黨遂以軍校中設置黨代表的教導團為基礎，正式宣佈建立黨軍^⑤。在大革命期間，黃埔軍校共培養了4,981名畢業生^⑥，他們是黨軍的中堅力量。

黃埔軍校的功能在於把認同新意識形態的五四青年學生轉變為軍官，因此當時人們也把黨軍稱為學生軍。一開始軍閥根本沒把這些無作戰經驗、裝備簡陋的學生軍放在眼裏。滇軍范石生曾當面奚落蔣介石：「你在黃埔辦甚麼鳥學校，你那幾根『吹火筒』，我只派

② 陳春生：《新文化的旗手——羅家倫傳》頁43（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

③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頁476。

④ 龔樂群編著：《黃埔簡史》（台北：正中書局，1976）。我們根據頁57-89附錄〈黃埔創立時期人物志〉（錢大均著）統計得到這一結論。

⑤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頁476。

⑥ 段雲章、邱捷：《孫中山與中國近代軍閥》頁522（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一營人就可完全繳你的械」^{③③}。但意識形態認同使得黨軍具有崇高的獻身精神和嚴密的組織性，並立即在軍事較量中顯示出巨大威力。1924年12月東征中，3,000人的學生軍擊敗擁兵萬餘的洪兆麟主力，把陳炯明趕出廣東。次年6月滇軍、桂軍發動武裝叛亂，又是黃埔軍回師，打得叛軍落花流水，繳械投降^{③④}。在黃埔軍校建立之前，國民黨連廣東一省都無法統一，黃埔軍校建立後不但迅速統一廣東全省，而且開始北伐。北伐很像童話中矮子和巨人之戰，當時國民革命軍僅有八個軍，不到10萬人^{③⑤}。而它要打倒的對手——軍閥卻都是龐然大物。直系的吳佩孚有25萬軍隊，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的兵力不下20萬，另外奉系張作霖、褚玉璞、張宗昌等的兵力，合計約50萬人^{③⑥}。國民革命軍以10萬人主動出擊擁兵百萬的軍閥，各個擊破，以少勝多，大顯軍威。北伐開始兩個月後就攻克武昌，消滅吳佩孚主力，戰場重心轉至江西。1926年11月8日北伐軍攻破南昌城，孫傳芳主力大部被消滅。1927年3月23日，北伐軍又擊敗十幾萬直魯聯軍，進入南京，南部中國基本統一。

6.4 工農大革命：新意識形態的傳播

列寧主義政黨除了保持政治團體對新意識形態認同，把黨員幹部轉化為官僚、軍人外，它還具備第三種功能，這就是通過組織群眾運動，使廣大人民在革命運動中臣服於新意識形態權威。

1926年正當北伐軍順利進軍之時，中國大地也被突然興起的工

^{③③}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頁68（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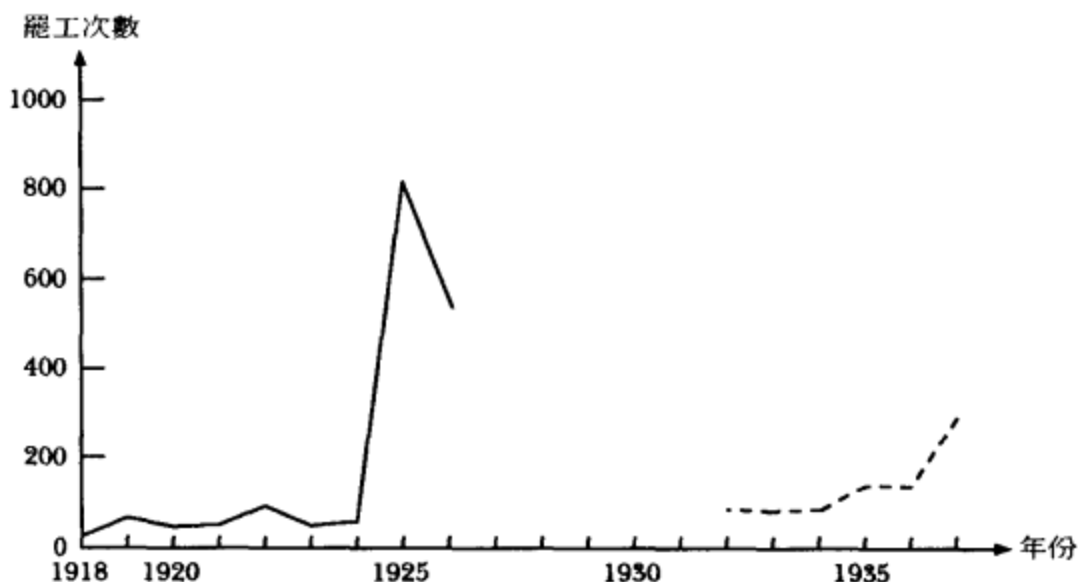
^{③④} 陳旭麓主編：《五四後三十年》頁106-108。

^{③⑤⑥}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220、222-223。

農大革命所震撼。自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後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從未有過如此規模的社會基層大暴動，西方列強被這種全國性反帝怒潮驚呆了。經歷過多次重大歷史事件的周恩來，曾深有體會地說：「當時是群眾革命運動的高潮，是歷史上空前的，就是在抗戰期間也沒有過。」^⑩傳統社會中，中國基層社會群眾大革命的規模，取決於一體化結構中無組織力量的大小。我們在4.5節中曾論述過：民初一體化中下層組織轉化為軍紳政權，無組織力量迅速增長。軍閥地主貪得無厭，兼併土地，豪強惡霸橫行鄉里，社會秩序大破壞，這一切無疑是中國出現大動亂之基本前提。但是1925年後出現的群眾大革命，以「反帝」、「反封建」為目標，已不同於傳統農民起義，而是以新意識形態作為自己的動員口號[註十]。大革命爆發除了因為無組織力量導致民不聊生的局面，還需要新意識形態深入群眾。而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在短短幾年中能走出書齋，指導革命，成為動員群眾運動之力量，這恰恰也是意識形態認同團體的功能。

大革命的引發以城市工運為序幕。當時工人自發罷工的規模均不太大，而且時起時落，凡形成規模的罷工都和國共兩黨的組織有關。由於國共兩黨均有「支部」和「區分部」這樣的基層細胞，就極易深入基層群眾，讓新意識形態口號為群眾接受。「支部」作為一個宣傳意識形態、接納基層人員參加的新組織，立即激發新意識形態傳播與群眾運動之間互相促進的正反饋。黨支部成員是工運積極分子的主心骨，在組織罷工運動時，發展大批積極分子入黨，黨的基層組織由此而大發展。圖6.1描繪出中國1918-1937年工人罷工次數（缺1927-1931年數據）。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到，1924年兩種新意識形態成熟後，特別是國共兩黨發展到一定規模，有組織的城市工

^⑩ 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 頁16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據下列兩文提供數據繪製：陳明錄：〈民國初年勞工運動的再評估〉，《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下) (台北：近史所，1984)；賴澤涵：〈戰前我國的勞工運動〉，《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討論會論文集》(上) (台北：近史所，1989)。

圖 6.1 中國工運趨勢(1918-1937)

運也迅速達到空前水平[註十一]。

國共兩黨早期均以新知識分子為組織核心，其活動範圍也主要在城市，革命之組織動員也從城市開始。大革命第一階段以城市為中心。新意識形態向農村的滲透還需要一個過程，農村發展大量基層和外圍組織，要掌握地區政權或新意識形態被當地政府承認合法之後才有可能。農村雖早已成為可以燃燒起農民起義熊熊烈火之乾柴，但大規模農民運動興起要比工運晚。1925年，國共兩黨攜手合作，在廣州建立革命政府。當時共產黨主要側重於工運組織，而國民黨基於三民主義中耕者有其田的學說，對農運表示極大熱忱，國民黨辦起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農民運動幹部，派黨員下鄉組織農會。它導致全國農運在1926年出現。

農民運動發展的地帶和程度直接取決於國共兩黨最早獲得承認和具有政治勢力的範圍。表6.1統計了1926和1927年中國農會會員的人數^③。1926年廣東、河南兩省農會會員人數居全國之首，均達數十萬人。農運規模反映了當時國共兩黨在各省影響力的大小和被政權承認的程度。農運規模最大、發軔最早的廣東省，是國民政府所在地，也是國共兩黨的根據地。廣東海陸豐地區，是共產黨員彭湃活動的地方。河南農運發達也和國民革命軍的勢力範圍有關。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推翻北京政權的政變，聯合胡景翼、孫岳把所屬部隊改為國民軍聯軍。胡景翼所率領的國民二軍驅走軍閥趙倜，進入河南，直到1926年3月吳佩孚重佔河南之前，河南省一直聽命於廣州革命政府，是國共兩黨在北方最有勢力的省份。

從表6.1中1927年農會會員人數看，廣東、河南兩省農會會員人數大體維持在1926年水平。但湖北、湖南農會會員卻急速膨脹百倍以上，人數均達百萬級，成為全國第一、第二位。顯然，農運規模和高潮的地點轉移，均和國共兩黨北伐路線及影響範圍直接相連。1926年10月國民革命軍佔領武漢後，同年12月建立了武漢國民政府，從此兩湖成為全國革命的中心地帶。湖北農會會員由一年前的4,000餘人，迅速達到250萬。湖南農會會員也由不足4萬猛增至450餘萬。

大革命運動在配合北伐軍打倒軍紳政權的同時，也迅速建立了新意識形態的統治權威。毛澤東寫於1927年初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指出，農民運動幹了十四件大事，其內容包括打擊農村基層社會中的紳權和確立新意識形態權威兩個方面。農民造反，在政

③ 表6.1是根據王全營等著：《中國現代農民運動史》頁123「全國農民協會統計表」和頁176「1927年全國農民協會會員統計」兩表所提供的數據，簡化合併而成。

省名	類別	已否成立 省農民協會	農會會員人數 (1926.6)	農會會員人數 (1927.6)
	數目			
廣 東		已成立	647,766	700,000
廣 西		已成立	8,144	8,144
河 南		已成立	270,000	245,500
四 川			6,683	33,200
湖 南		已成立	38,150	4,517,140
湖 北		已成立	4,120	2,502,600
山 東			284	284
直 隸			1,342	360
江 西		已成立	1,153	382,617
熱 河			2,200	5,423
察 哈 爾			600	600
陝 西			1,000	705,160
總 數			981,442	9,101,028

據王全營等：《中國現代農民運動史》提供數據製表，頁123、頁176（河南：中原農民，1989）。

表6.1 農民協會會員統計(1926年6月與1927年6月)

治上、經濟上打擊地主，解除地主武裝，對控制在土豪劣紳手中的基層政權組織——都團(區鄉)也予以掃蕩，部分縣政權受到極大衝擊。政權機構以外的維持地方自治的那些權力，如紳權、宗族族權和神權也威風掃地。農運中，新意識形態如何擴張，〈報告〉中有生動的描寫。過去農村是土豪劣紳的天下，「如今是委員的世界呀，你看，屙屎都碰了委員」，「城裏、鄉裏、工會、農會、國民黨、共

產黨無一不有執行委員，確實是委員世界」^③。孫中山遺囑中的「自由」、「平等」、「三民主義」，農民日常都說，甚至路上碰見不肯讓路的地主，農民都會憤然喝道：「土豪劣紳！曉得三民主義麼？」^④三民主義還成為農民反對警察欺壓的武器。小孩唱的歌也是「打倒列強……」。

可見，大革命高潮中的農民運動，不僅是對農村基層社會和政權組織的沉重打擊，而且當農民接受了新意識形態的宣傳以後，他們心目中政權和社會秩序合法性的標準，就無形中完成了由傳統向新意識形態的轉化[註十二]。上面引述的在城鄉無處不是國民黨、共產黨的「委員世界」，反映了隨着組織工運、農運的需要，國共兩黨的基層組織及活動也來了個大發展。這個發展，反過來又增加了對基層百姓的影響力，即進一步推動群眾革命運動。這些基層組織的骨幹及培養的活動分子，不僅是組織工運、農運，支持北伐的中堅力量，也在逐步造就未來的基層社會的管理者。

6.5 國共合作破裂的原因

在武俠小說或傳奇故事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情節，一本具有巨大威力的劍譜因某種事變而失散，它的各個部分散存於不同地方，為了讓它重新發揮昔日之魔力，故事中的英雄不惜千辛萬苦去尋找劍譜的各個部分，將其拼合起來。在中國社會結構中，這一威力無窮的劍譜就是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一體化這種社會整合方式，而使劍譜失散的變故就是超穩定系統受西方衝擊後的對外開放。在

^{③④}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卷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

對外開放條件下，知識分子階層已不能整體達到意識形態認同，成為社會各層次政治結構的組織者。民眾認同的意識形態再也不能自然地與社會組織者一致。要讓社會整合機制再次起作用，就應如拼合劍譜一樣去創造實現新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一體化之各個環節。我們在前面已分析過列寧主義政黨（包括國共兩黨）的三大功能：保持黨員的意識形態認同；將黨員轉化為軍人和各級幹部；組織群眾運動在基層確立新意識形態權威。這三項功能恰好是實現中國重新整合的必要條件。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自此中國社會迅速由分裂走向統一[註十三]。新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通過列寧主義政黨實現了一體化。我們可以稱其為新一體化結構。

將新一體化結構與傳統一體化結構作一比較，可以發現它在實現社會內部整合時具有更大的抵抗外來衝擊之能力。在意識形態子系統中，國共兩黨均提出反帝反封建的目標，並用黨軍、黨國、黨天下來實現社會上、中、下三個層次的控制，通過群眾革命來動員基層力量，從而具有比傳統一體化結構更大的社會動員能力。1927年2月19日、20日英國政府迫於北伐軍和群眾反帝運動的聲勢，只能在向中國交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的協約上簽字。這是超穩定系統對外開放以來，中國在捍衛主權方面取得的巨大勝利。那麼，這是不是意味着1927年中國就可以建立強大而穩定的新結構呢？事實並非如此。當時佔主導地位的國民黨還不是一個嚴密的列寧主義式政黨[註十四]，當革命運動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基層群眾就和國民黨大多數黨員的利益發生尖銳衝突，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不得不進行修改，實現社會整合必須的三種功能也相應急驟減弱。共產黨雖具備列寧主義政黨用於整合社會的全部功能，但它不佔主導地位，力量尚不能和國民黨相比。北伐勝利之際，在中國社會似乎有希望實現整合時，國共兩黨開始分裂對抗，中國出現了國共兩黨的兩種意識形態、兩種整合模式的競爭。

在國共合作的早期，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標掩蓋了兩黨的意識形態分歧。五四青年在接受新意識形態時，常常對這兩種主義不作明確區分。兩種新意識形態在建立政黨時，都以俄為師，在組織方式上均摹仿列寧主義政黨結構，並由蘇聯與共產國際協調兩黨關係。因此，在軍紳政權被推翻之前，這兩個意識形態認同團體攜手合作，共同壯大，甚至弱小的共產黨基本上也是在國民黨內發展起來的。但是，隨着大革命高潮的出現，國共兩黨合作再也不能維持下去了。在涉及到群眾造反和黨員利益問題上，國共兩黨出現了對抗性的衝突。

國民黨改組後，其組織骨幹大部分是五四青年。新知識分子雖不屬於傳統一體化結構，但是，他們卻是紳士城市化的產兒。新知識分子階層和傳統一體化結構的統治階級存在着血緣聯繫。當時上海在學中學生每年需150元，大學生則要500-690元。而工人每年收入不過100多元，僱農則更少，每年為20-80元。在華中平原，擁有30畝土地的地主，方可供應子弟讀初等小學；擁有50畝土地的地主才能供一個子弟讀高小；須有200畝地，才能拿出50元支持子女讀初中。五四青年中那些留學生大多是資本家、政府官員、商人、教職員子弟，而中小學生大多來自於農村中小地主之家^①。打倒軍紳政權雖是新知識分子共同贊許的，但農運、工運的興起，特別是群眾暴動就會損害大多數新知識分子的家庭利益，它當然立即波及到以新知識分子為骨幹的意識形態認同團體。黃埔軍校前四期學生中有91%來自地方各縣^②，他們大多是地主子弟。張國燾就講過，

① 蘇雲峰：〈民初知識分子(1912-1928)〉《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研討會》下。

② Landis, R.B.: *Institutional Trends at the Whampoa Military School: 1924-1926*, Ph.D. Dissertation (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1969).

「所謂國民革命軍，士兵多數是農民，軍官多數是地主」^{④③}。陳獨秀當時也分析指出，國民黨有一半黨員是代表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④④}。當工人不僅反對外國老闆，而且也反對本國資本家；農民把軍閥地主(土豪劣紳)打翻在地後，進一步用暴力橫掃整個地主階級時，廣大國民黨員就紛紛起來譴責農運過火，要求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劃清界線。

共產黨作為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其核心也大多來自於出身地主資本家之新知識分子，他們的家庭利益同樣也受到群眾革命運動的損害。已查明下落的39名早期黨員中，就有14人是自動退黨的，幾佔36%，一些黨員還脫離共產黨轉向國民黨。但總的說來，馬列主義是一種征服力遠大於三民主義之意識形態，共產黨的入黨條件遠比國民黨更注重黨員在信仰上的精英性質，其成員面對工農革命時在心理上有較大承受衝擊之能力，能堅持共產黨的信仰。張國燾就做過這種對比，大革命中李立三的父親被農協當作土豪劣紳殺害，但他卻強忍痛苦，沒有改變對農運的支持。張國燾說，如果類似事件出現在一個國民黨員或北伐軍軍官身上，他與農民協會的仇恨將是不共戴天的^{④⑤}。共產黨十分注重在工人中發展黨員。到1927年共產黨召開五大時，其65,000名黨員中，工人出身的已佔65%^{④⑥}。大革命後期，共產黨實際上已成為一個由少數具有獻身精神的職業革命家(來自知識分子)領導，但組織成員卻以工農群眾或下層窮苦知識分子為主之政黨，其利益導向和工農基本一致。

根據上述分析，國共兩黨實際上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改造社會模

④③ 張國燾：《我的回憶》 頁624（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1973）。

④④ 陳獨秀：〈國民黨是甚麼〉《陳獨秀文章選編》中 頁210。

④⑤ 張國燾：《我的回憶》 頁620。

④⑥ 胡華、林代昭：〈台港和國外中共黨史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 第1期（北京：1982）。

式。國民黨只想利用群眾大革命打倒軍閥，結束割據，但並不希望橫掃地主階級，北伐一勝利，就要求停止革命。共產黨則與群眾運動中工會、農會幹部之利益一致，要徹底消滅資本家和地主。隨着群眾運動的發展，國共兩黨的矛盾也越發尖銳，最後達到勢不兩立的地步。

如果我們宏觀地考察國共關係發展趨勢，就可以發現兩黨對立程度直接和群眾運動規模成正比。1924年國共合作時，群眾大革命基本沒有興起，兩黨合作良好。1925年，群眾革命開始了，國民黨右派率先舉起反共旗幟，在北京召開西山會議。他們開除共產黨員的國民黨籍，解除鮑羅廷的顧問職務^④。戴季陶發表了〈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極力劃清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的界線^⑤。但在1925年，群眾革命規模尚不大，且主要是城市的工運，打擊的是資本家商人，國民黨黨軍骨幹的家庭大多是地主，他們還未被農運觸動。國民黨右派和戴季陶主義並不佔主流，廣大國民黨軍人和左派仍和共產黨合作良好，計劃北伐事業。到了1926年，當農運廣泛興起，並把鬥爭矛頭指向整個地主階級時，國民黨軍人才轉而傾向反共。他們支持蔣介石1927年春發動清黨，鎮壓農民協會和繳工會的槍。即使如此，武漢革命政府的國民黨左派仍和共產黨合作。到1927年，農民造反規模在兩湖地區比1926年擴大了十倍，這時幾乎所有的國民革命軍軍官都反共了。國民黨左派雖和蔣介石矛盾尖銳，仍不得不迫於廣大黨員和軍官的壓力，宣佈「分共」[註十五]，國共合作徹底破裂。中國開始了國共兩黨長期對抗、爭奪天下之局面。

總之，國共兩黨在實現社會整合時，一開始都必須通過發動工

^{④⑤} 蕭效欽主編：《中國國民黨史》 頁146-148（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農革命運動來建立自己的統治權威，新一體化結構建立過程中，在邏輯上就預設了兩種模式[註十六]，一種模式是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利益和基層民眾利益不一致，它不能通過群眾大革命將新意識形態權威深入到基層農村，不能消除農村的無組織力量，從而不能建立穩固的統治。另一種是列寧式政黨和群眾大革命有效結合，成為農民革命的領導者，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建立穩固的一體化結構。後一種模式奪取政權所需時間比第一種模式更長。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後，這兩種整合模式的抗爭也就成為中國現代社會變遷的主線。



第六章 註 解

註一 辛亥革命後，1912年1月1日，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任命蔡元培為第一任教育總長，改學堂為學校，小學廢止讀經。1912年7月召開中華民國第一次全國臨時教育會議，否定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1912年9月公佈《壬子學制》，1913年又將上述學制結合成《壬子癸丑學制》，基本上把新學校功能定位在傳授知識上，而不像傳統教育那樣同時灌輸儒家意識形態。這樣，以傳授知識為本位的新式學校便不能成為培養學生意識形態認同之機構。這是超穩定系統對外開放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對比1949到1979年期間及以後中國學校之功能，也能發現這一點。中國在對外開放之前，學校尚能做到「紅」與「專」教育的統一，保證學生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外開放後，就再也不可能達到這一目標了。

註二 最近，學術界一個頗為熱門的話題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余英時提出，二十世紀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從社會中心位置退到了邊緣，而一些邊緣人物卻佔據了社會舞台之中心^{④9}。毫無疑問，余英時抓住了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重大的歷史現象，但是他沒有提到為甚麼會出現知識分子邊緣化。其實，只要研究意識形態認同與社會組織角色的關係，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就能得到透徹的理解。如果把社會組織者稱為社會的中心，那麼在傳統社會結構中，整個知識分子階層是一體化結構之組織力量，它自然處於社會中心位置。但是在一體化組織方式中，知識分子成為社會組織者的前提是他們

^{④9} 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總第6期（香港：1991）。

能保持意識形態認同。新文化運動以後，新知識分子因做不到這一點，不得不退出中心位置，因此，知識分子邊緣化發生在新文化運動之後，而不是二十世紀初。把知識分子擠出中心位置的，正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仍可以保持意識形態認同之人群。實際上余英時所說的近現代佔據中心位置之邊緣人，均是意識形態政黨的領袖、幹部和黨員。知識分子邊緣化恰恰證明了超穩定系統一個重大特點：只有統一意識形態之社會階層或團體才能成為社會組織者，並且身處社會中心位置。分析新知識分子和意識形態認同團體的關係，可以進一步說明知識分子邊緣化如何發生，哪些知識分子一定會邊緣化，而哪一部分知識分子很容易進入新意識形態認同團體，沒有邊緣化。

註三 莫里斯(Maurice Duverger)通過西方各種政黨組織比較研究後指出，「黨分部制是社會主義者的發現，而黨支部制則是共產主義者的發明」。他認為「黨支部」這種組織方式只有共產主義政黨才能採用，「資產階級政黨是難於運用支部制架構的，它們無法在企業支部的基礎上將商人、工業家、醫生、地主等組合起來」^⑤。莫里斯沒有進一步闡述為何資產階級政黨沒法採用支部作為基本活動細胞，用開放條件下實行意識形態認同的需要來分析，這是很好解釋的。顯然所謂「資產階級政黨」即是議會政黨，它不是達到某種意識形態認同的組織，而只是支持某一種政治主張或因利益結合之團體。而「支部」是為了達到意識形態認同所必須之組織形態，如果黨沒有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支部是不可能(也是沒有必要)設立的。

莫里斯的研究還表明，在議會政黨中，歐洲社會主義者的政黨

⑤ 莫里斯·迪韋爾熱(Maurice Duverger):《政黨概論》雷競璇譯 頁31-32 (香港:青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

比美國資產階級政黨組織要嚴密一些。組織最嚴密的是有強有力基層組織的共產黨和法西斯主義政黨。法西斯主義政黨的基層組織和共產黨稍有不同，它不是支部而是民兵。如德國國家社會黨內，最核心的黨員是突擊隊，它的人數大約是全黨黨員的三分之一，1932年，120萬名黨員中，突擊隊隊員約佔35萬名。這些民兵組織是一個十分嚴密的金字塔結構，初級單位是班(schar)，由四至十二人組成；三至六個班為排(trupp)，四個排為一連(sturm)，二個連為一營(sturmbann)，三個營組成一個團，人數可達一千至三千人。團以上是旅，旅以上為師，每一個師所蘊含的範圍正好是一個地區(德國分為二十一個地區)。民兵組織儼然是一支軍隊^⑤。法西斯主義政黨也是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它也設有和「支部」一樣維繫黨員認同黨的意識形態的基本細胞，他們往往是由最核心最忠誠的黨員組成，民兵也是實行黨的意識形態之先鋒隊。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比共產主義還要軍事化，其基本認同細胞組織結構也更像軍隊。這裏我們看到意識形態認同團體組織方式和意識形態的內容類別存在着內在聯繫。

註四 列寧主義式政黨另一個有別於西方議會政黨的特點是所謂民主集中制。這一制度恰恰也和黨是建立在意識形態認同基礎之上有關。任何一個政黨必須有統一的政見並為政見實現而奮鬥，政見和意識形態不同，它必須隨形勢作經常的調整，意識形態認同團體需要建立從意識形態導出統一政見的機制。這正是列寧主義政黨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因。

我們可以從理論上構想一下，當意識形態認同團體所有成員達到意識形態認同後，如何根據意識形態標準形成大家都接受的統一

^⑤ 莫里斯·迪韋爾熱著：《政黨概論》 頁3-4、35-37。

政見。一種邏輯上合理又可行的方法是，讓每一個黨員自由發表意見(在意識形態認同前提下)，然後用少數服從多數辦法形成統一政見，一旦做出決議，少數具有不同政見的黨員必須放棄(或保留)個人政見，服從黨的政見。這正是列寧主義政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民主」是在意識形態認同前提下參與與發表政見之權利，「集中」則是接受統一政見並放棄個人政見。必須指出，只有意識形態認同團體才能實行「民主集中制」，對於一般政黨，當部分黨員對黨的某一時期路線或政見持不同看法時，政見認同機制馬上破壞，它往往意味着黨的分裂或不同政見者退黨。只有意識形態認同團體才能要求不同意黨的政見的黨員接受並去實行集體決議，因為這些黨員仍認同黨的意識形態，對意識形態之忠誠使他們克制個人意見服從黨的決定。意識形態認同團體中，當意識形態向心力足夠大時，即使出現嚴重的派系或路線鬥爭，也不會出現黨的分裂。

然而讓全國所有黨員一起來討論產生多數政見在技術上無法做到，於是從合法性上講，政見的統一只能從基層組織開始，一級級地逐步統一。一種實際上可行的辦法是：讓每個意識形態認同基本單位派出代表，組成地區性代表大會，決定本地區性具體政見的統一。再由這些地區代表中選出全國代表，召開全國性代表大會，對黨的綱領和某一階段之奮鬥目標進行討論，用少數服從多數的辦法選出執行機構，將決議用文件方式發到各個基本認同單位，要求全體黨員服從。眾所周知，這正是列寧主義政黨中普遍運作的代表大會制度。它是列寧主義政黨的政見和一切制度獲得黨內合法性的決定程序。這裏，我們看到，列寧主義政黨所有特點均可以從意識形態認同的功能和需求來說明。

註五 在政治學中，通常只將政黨分為革命黨與議會(普通)政黨兩大類，但這種分類是很難說明1924年國民黨改組本質的。根據這種

分法，議會(普通)政黨「是在國家權力之下獲得相應的政權，憑藉現行法律規定之選舉方法，以求實現其主張」。而革命政黨則「用其絕對的權力，採取超出於現行法律之革命方法，以求達到革命的目的，實現其主張」。1924年國民黨改組顯然是從議會政黨轉化為革命政黨^⑤。但是這種說法是無法解釋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為何可以做到組織嚴密。革命政黨和組織嚴密以及具有動員力之間沒有本質關聯。國民黨在1924年前，已有近三十年歷史，它也曾經幾次是革命政黨。如同盟會以推翻滿清為綱領，是革命政黨。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也是由議會政黨轉為革命政黨。但這一切並不能改變國民黨那種既鬆散、又缺乏組織性之實質。

根據我們的分類，政黨首先應分為意識形態認同團體與政見認同團體，而它們再可以進一步分為革命黨與議會政黨。如政見認同團體包括兩類，以革命為政見的是革命政黨，以議會選舉為取得政權方法的才是議會政黨。1924年以前國民黨雖幾次由議會政黨向革命政黨轉化，但都是政見認同團體。1924年改組之本質是由政見認同團體轉化為意識形態認同團體。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在執政後也可以放棄革命目標，不再是革命政黨，但仍以意識形態認同作為凝聚力，即意識形態認同團體也是可以分為革命黨和執政黨兩類的。

註六 呂芳上曾指出，孫中山在他一生革命歷程中，曾多次企圖改組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後，中山先生身肩黨的改組重任，希望能重起三次革命，但「因為沒有辦法」，「雖想改組未能成功」。1916年，袁世凱死後，中華革命黨本部遷回上海，孫中山也在尋找組黨的「新方法」^⑥，但也以失敗而告終。只是在孫中山生命最後十幾個

^⑤ 楊幼炯：《中國政黨史》頁6、9。

^⑥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頁513、471。

月中才獲得真正改組國民黨之成功。以此可見，1924年改組成功絕非偶然，它依賴於某種社會結構性條件的成熟，這就是只有傳入了新意識形態和列寧主義政黨的模式，國民黨才可能變成一個意識形態認同團體。

註七 今天學術界一致認為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模式完全來自蘇聯，而對國民黨改組後的組織結構中，蘇聯模式和中國傳統各佔多少比重是有爭論的。國民黨黨史不太強調蘇聯模式影響，而認為國民黨基層組織模式來自同盟會。朱德也講過，國共兩黨都在相當程度上繼承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秘密結社。有人把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方式稱為「黑社會主義」，也是強調它有類似於幫會之處。實際上，過份注重國共兩黨組織模式來自何方，或許並無太大的意義。當黨的組織規模很小時，組織基因是從俄國學來(或通過列寧主義政黨啟發得到)還是來自中國傳統，這本身無關緊要，因為黨組織對社會的影響並不大。當黨成為群眾性組織時，超穩定系統的基本結構決定了只有它變為意識形態認同團體，才能起到社會整合之功能。功能對結構存在着很強的限制。要達到社會整合，保持黨內意識形態認同，只能發展出列寧主義政黨結構。國共兩黨的結構是順應其功能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當然，我們並不是說，向蘇聯學習在國共兩黨建黨過程中不重要，而只是認為，從形態形成機制而言，國共兩黨結構實際上是一個綜合外來影響和傳統之創造過程。我們強調列寧主義政黨模式的引進，只是想說明它在中國意識形態認同團體發展中的示範作用，並不是否定國共兩黨組織形成中吸收了傳統因素和進行了新的創造。

註八 1921年中國共產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指出：「我們黨到現在為止，幾乎完全是由知識分子組成的。」現在有據可考的第一批黨

員44人中，大學教授7人，編輯、翻譯、記者7人，律師1人，國民黨左派1人，中小學教師6人，留學生6人，大學生10人，中學生5人，工人只有1人。平均年齡不到26歲，可以說基本上都是五四青年^④。

註九 無論對外開放還是相對孤立，一體化結構的組織原理均是意識形態認同，只要把社會上認同統一意識形態之人羣(階層)統稱為意識形態認同團體，那麼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在任何條件下均是超穩定系統之組織者。中國傳統社會的組織者——儒生階層——實際上也可以算作儒家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它在社會組織功能上與列寧主義政黨相似。但是將儒生階層與列寧主義政黨都當作意識形態認同團體，雖在定義上無矛盾，但在感覺上卻會有一種荒謬感。中國傳統儒生、儒將忠於皇帝，但卻奉行「君子不黨」的原則。而列寧主義政黨組織極為嚴密，每個黨員必須絕對服從黨的紀律，要求把一切獻給黨，成為黨的巨大組織機器中的螺絲釘，兩者實不可同日而語。這兩種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在組織形態上的巨大差異表明，當意識形態內容不同時，相應認同團體的組織方式也是不同的。

意識形態不同於一般思想體系，認同(信仰)某一種意識形態不僅要求人們在理論上信服，還需要在現實生活中去追求和實現意識形態規定的價值和目標。實現這些價值和目標之方式也就決定了意識形態認同團體的組織形態。儒家意識形態以家庭倫理為本位，把個人道德修養(成聖)作為終極關懷，家族主義和道德個人主義價值取向使得儒生在組織上是鬆散的。儒家把道德落實到家庭倫理之中，那麼「修身」在社會行動方面最直接的對象就是「齊家」。當然，

④ 王來棣：〈關於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幾個問題〉《浙江學刊》第3期（杭州：1981）。

儒生進一步實現道德目標，還須把社會行動超出家庭之外，去「治國、平天下」。但「齊家」作為儒家重要實踐領域再加上他們道德追求上的個體主義性質，使「君子不黨」原則風行，整個意識形態認同團體也就不會有緊密的組織。

與儒家意識形態不同，馬列主義和三民主義均為群體主義意識形態。社會理想高於個人道德完善，「追求民族的最大利益」代替了「成聖」，「共產主義」上昇為意識形態認同團體的終極關懷和目標。那麼當意識形態要求其信仰者去實現新意識形態規定的價值和目標時，就十分強調群體性和組織性。列寧主義乾脆把共產黨定義為「無產階級先鋒隊」，是由特殊材料組成的最具紀律性的組織。把這種理念付之於行動而成立的意識形態認同團體，當然具有極嚴密的組織。實際上，即使在意識形態內容上未曾規定意識形態認同團體組織方式，一種靠群體主義的意識形態形成之認同團體也必定有着比儒家意識形態認同團體更緊密的組織。

把列寧主義政黨的基本細胞——支部和儒家意識形態認同中家庭之功能作一對比是富有啟發性的。儒生作為意識形態認同團體，沒有甚麼團體組織，但它也有保持其認同的基本細胞，這就是家庭。當然家庭並不是為意識形態認同人為創造的組織，儒學是利用家庭擔當基本細胞之功能。馬列主義、三民主義意識形態和儒家不同，其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在形態上和儒生階層差別極大，保持認同的基本細胞「支部」、「區分部」也是人為設計的。在如此巨大的差別中，同作為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卻有着形式的類似——兩者均有達到和維繫意識形態認同之基本細胞。正因為「支部」和「家庭」有着某種形式上的同構性，它使得1949年後中共的基層組織在相當程度上代替了傳統家族的種種職能。這裏我們看到，意識形態認同團體組織形態是由意識形態認同目標所規定的。一旦理解到這一點，我們就能透過錯綜複雜的歷史表象看到列寧主義政黨實現社會整合和

儒生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組織者在結構上的類似性。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耦合，需要意識形態認同團體作為載體，在封閉條件下，儒家意識形態和政治耦合必須靠「君子不黨」的儒生；而在對外開放條件下，集體主義的新意識形態和政治耦合的載體則為有列寧主義式結構的政黨。新文化運動後，國共兩黨引進蘇聯列寧主義政黨組織模式之所以成功，這是因為它們恰恰符合了超穩定系統在對外開放條件下建立一體化結構所必須的新前提而已！

註十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每當農民受到過重的壓迫和剝削時，往往會鋌而走險，參加造反起義。人們在討論基層農民暴動時，一直相當重視經濟和政治因素（如土地兼併、吏治腐敗和國家賦稅勞役過重），實際上農民大起義爆發的條件是由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三個系統綜合決定的。意識形態是一個有關甚麼樣的社會行為是合理的觀念系統，在不同的合理性標準下，相同的政治經濟條件，基層人民暴動傾向是不同的。儒家意識形態中有關均田、政府是否有道、地主紳士行為是否合理等等一系列觀念規定了農民對剝削與壓迫忍耐之限度。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這些合理性標準是不變的，因此農民起義往往由農民政治經濟壓迫加重而引發。超穩定系統實現意識形態更替後，這些標準發生了改變。新意識形態在農村的傳播有一種降低農民起義爆發閾值的作用。共產黨廣東區黨委在〈廣寧農民減租運動之經過〉中就紀錄過一個生動的故事，說明社會主義思潮是如何影響農運的。彭湃在海豐地區號召農民要求地主減租，但年紀老一點的農民對此不贊同，他們說「租田主的田，應當完田主的租，我們提出減租，恐怕不公道吧」。彭湃馬上講述地主不勞而獲，農民終歲勞苦，不得一飽的道理^⑤。1924年《晨光》上一篇介

^⑤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資料》 頁22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紹農運經驗的文章這樣寫道：「農村的純無產階級對田主資本家的敵視，是很深的，不過沒有人來喚醒和挑撥」^{⑤⑥}。因此，大革命的發生同時是一個新意識形態合法性被基層人民接受之過程。

註十一 這方面一個典型例子是1925年的五卅運動。有的學者考察了五卅運動爆發的經過，發現它與新意識形態傳播直接有關。例如顧正紅死於5月15日，但到半個月後才爆發震動全國的五卅慘案，這是因為工人在5月下旬向學生求援^{⑤⑦}。學生和工人運動結合正是新意識形態和人民革命結合，而在工人運動發展過程中，列寧主義政党的作用，尤為重要。顧鴻庭的研究指出，在五卅運動中「正如中國當時的許多群眾運動一樣，工人階級似乎只起到半被動的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幹部團體』」^{⑤⑧}。所謂幹部團體，是國民黨改組後為控制群眾而派遣的「大量群眾運動幹部」。共產黨支部在五卅運動中的擴張顯示出存在列寧主義政党的與群眾運動互相推動的正反饋鏈。法國學者J·吉爾耶馬(Guillermaz Jacques)在《1921年至1949年中共黨史》一書中就考察過這一趨勢。「四大」時中國共產黨黨員只有980人，一年半後迅速發展到了三萬人，這種大飛躍顯然與五卅運動分不開。鄧中夏曾把五卅運動稱為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開端。他說運動使「迄今陌生的『帝國主義』一詞在中國家喻戶曉」^{⑤⑨}。鄧中夏所講的正是群眾通過大革命接受新意識形態的權威。

⑤⑥ 1924年1月30日中國大學校園《晨光》2卷1號。

⑤⑦ 李健民：〈五卅慘案後的反英宣傳〉《近史所集刊》第10期（台北：1981）。

⑤⑧ 顧鴻庭：〈都市群眾運動：上海的五卅運動〉《第十屆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大會論文》（香港：1991）。

⑤⑨ 董進泉等：〈國外對五卅運動的研究〉《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6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自意識形態政黨出現後，新意識形態傳播的重要途徑是靠意識形態政黨領導的群眾運動。李健民曾把五卅運動的宣傳和五四學生運動的宣傳做了一個對比。他發現，五卅運動的宣傳遍及全國，甚至達到世界的主要國家，進入立體宣傳之境界。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鴉片戰爭時，中國幾乎沒有宣傳，甲午戰爭時期，民間視宣傳為政府事業，聲勢也不大。五四運動時，宣傳大為進步，但其活動地區、宣傳內容、聲勢遠不及五卅運動^⑩。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五卅運動還是新意識形態通過列寧主義政黨組織的群眾運動廣泛傳播之開始。

註十二 新意識形態自上而下傳播，成為人民接受新一體化結構統治之根據，它不僅僅是一個人們對統治權威合法性觀念之轉變，還包括新意識形態對「小傳統」之衝擊。在傳統一體化結構中，儒家意識形態是大傳統，而廣大農村中人民所相信的各種觀念大多屬於小傳統。當社會處於整合狀態時，小傳統總是和大傳統互相適應的。超穩定系統實現意識形態更替，用新意識形態整合社會使大傳統變了，那麼只要新意識形態深入基層，立即造成對小傳統之巨大衝擊。人們接受新意識形態權威也是拋棄與其不相合的小傳統之過程。它表現在各個方面，如新意識形態的科學主義與小傳統中人們信仰自然神之間存在着衝突。新文化運動後，新意識形態深入農村最徹底之地區，傳統的各種「自然神」消失也越普遍。張玉法對山東省各州縣自然神壇廟作了統計，明顯可以看到上述變遷。1860年前建立的有140座，建於1860-1916年之間的只有2座，建於1916年後的是零。而在1860年前荒廢的廟只有2座，廢於1860-1916年間的有

^⑩ 李健民：〈五卅慘案後的反英宣傳〉《近史所集刊》第10期（台北：1981）。

3座，而廢於新文化運動以後者達35座^⑥。同樣的情況也適合於佛教和道教。這裏可以看出新意識形態自上而下傳播對基層社會巨大的影響。

註十三 將列寧主義政黨領導北伐推翻軍紳政權與傳統改朝換代作一宏觀對比，即可以看到列寧主義政黨把原來已失靈的整合機制重新併合起來。中國歷史上，每當一體化結構釋放出來的無組織力量造成民不聊生的局面時，立即會激發起穩定系統第二重調節機制：農民大起義和王朝更替。整個社會在極度痛苦中出現大動亂，消除無組織力量，並重新用儒家意識形態來整合社會，產生一個清廉的政府以取代腐朽的舊王朝。傳統的王朝更替機制由農民大起義和儒生重建一體化結構互相結合而成，超穩定系統在工業文明衝擊下對外開放，社會尚沒有實現意識形態更替之前，第二重調節機制就處於失靈狀態。農民起義、貧民暴動只是推翻舊社會腐朽組織之盲目的動力，它不能同社會整合結合起來。甲午以後五四以前，無論基層社會如何動亂，它已經不能起到除舊佈新建立社會秩序的功能。1913年，在國民黨反對袁世凱獨裁而舉行二次革命之際，河南就有一支聲勢頗為浩大的農民起義軍，史稱白朗起義。它曾穿過京漢鐵路，打到安徽境內，攻克唐縣、禹州，一時「聲威大震」。但是當時已走投無路的國民黨寧可孤軍奮戰，也無意與白朗起義軍聯合反袁世凱。陳其美在討袁宣言中，竟把「白狼騷擾河南」作為討袁的理由。這一事例表明，一旦社會上不存在知識分子和農民共同認同之「天道」(意識形態)，知識分子即會視農民起義為流寇，他們不能互相結合以實現社會整合。

^⑥ 張玉法：〈清末民初的山東社會——宗教信仰與人物崇拜的變遷〉《近史所集刊》第7期（台北：1980）。

新意識形態出現後，特別是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具有組織群眾革命之功能，用新意識形態重新整合社會時，就出現了意識形態政黨與農民大起義結合之形勢。這正是北伐能打倒軍紳政權的原因。正如郭廷以所說：「北伐的勝利實賴革命的武力與民眾運動的結合」^②。這裏我們看到，在對外開放條件下，列寧主義政黨是如何把社會整合各個環節結合起來的。

註十四 三民主義理論體系遠沒有馬列主義結構嚴謹，它只能算是弱意識形態。在意識形態認同機制的發揮上，三民主義也不如馬列主義有力，國民黨只能算是一個準列寧主義政黨，它不可能持久地具備列寧主義政黨的所有功能。根據意識形態認同組織力弱的特點，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國民黨的基層組織區分部，不如共產黨的支部嚴密；為何民主集中制功能的發揮，以及以黨內路線鬥爭為標誌的權力之爭，國共兩黨具有不完全相同的形式。表6.2顯示出國共兩黨的差別，它們都和意識形態認同組織力的大小有關。

註十五 山田辰雄曾考察過汪精衛所主持的武漢革命政府的權力基礎。他認為，汪精衛一直靠調和他所依賴的兩支力量之間的衝突來保持其權力，一支是共產黨領導的民眾運動，另一支是唐生智的軍隊。到1927年，民眾運動迅速發展，唐生智的部下與農民協會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武漢派的權力基礎即開始崩潰^③。

註十六 傳統社會出現王朝更替時，由於意識形態不變，不存在一

②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 頁558。

③ 肯尼思·奧林尼克(Olenik John Kenneth)：〈鄧演達與國民黨理論體系中的民眾革命思想〉《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6輯 頁10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意識形態名稱	意識形態認同的組織力	基層組織緊密程度	黨軍形態	黨內路線鬥爭和黨內派系之爭的方式	民主集中制的作用
馬列主義 (結構嚴密、約束力強)	極強	基層組織極嚴密	政治委員制 (支部建在連上)	黨內政見不同時，不易分裂，但出現極為尖銳的內部路線鬥爭。黨內派系不固定。	強(特別是在黨的意識形態領袖去世時，民主集中制起作用。)
三民主義 (結構鬆散)	較弱	不嚴密	意識形態化的軍校制度 (黨部)	黨內政見不同時，明顯形成派系，有時會分裂。派系鬥爭不以路線鬥爭形態出現。	較弱，往往是軍事集團領袖成為黨的領袖。

表6.2 國共兩黨意識形態組織力的差別

個群眾在暴動中接受新意識形態之過程。這時，農民大起義殺傷無組織力量在前，社會結構修復在後。在開放條件下社會整合時，必須讓新意識形態深入群眾，類似於農民大起義的人民大革命是新意識形態動員和意識形態認同團體組織所促成。意識形態認同團體進行社會上層整合先於(或同時於)人民大革命掃蕩無組織力量，兩者順序是不同的。這種順序的差別立即使得受西方文明衝擊後開放條件下社會整合比封閉條件下複雜。傳統的改朝換代過程中，通常不存在消滅無組織力量功能和儒生進行社會整合功能之衝突。農民大起義的目標是「均貧富」和均田。「真龍天子」和儒臣的社會理想是「仁政」，包括重建地主—自耕農經濟，保護縉紳地主鄉自治。它

與農民大起義目標雖不完全一致，但正因為全國性農民大起義在前，這種不一致不會妨礙對無組織力量之清除。當不同儒臣集團起來逐鹿中原、爭奪天下時，舊王朝大多已被推翻，農村中土地兼併者已被掃蕩，出現大量無主荒地，農民的土地問題差不多得到解決。新的儒臣集團重建新王朝，強調保護地主財產，恢復縉紳鄉自治，並不和農民利益構成尖銳衝突。新意識形態進行社會整合，就不那麼簡單了。新意識形態一開始還未為基層百姓接受。意識形態群眾運動是新意識形態深入群眾的結果，這時，就可能出現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利益與群眾革命利益目標不一致。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對待群眾革命的態度是葉公好龍式的，大革命發動前，它積極組織，以確立新意識形態在群眾中的權威，但一旦大革命起來了，又反過來鎮壓革命，以防止自己利益被侵犯。開放條件下社會整合可以分成兩種模式：一種模式是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先發動革命，後又反過來鎮壓革命，這時用下層暴動消除無組織力量的功能不能充分發揮。另一種整合模式是：讓群眾暴動掃蕩無組織力量的功能盡量發揮，並在群眾運動中發展和群眾暴動利益一致的意識形態認同團體，進行社會整合。



第七章 國民黨及其脆弱的統一

歷史學家對社會所能作出的最有益的貢獻，莫過於對一直在迷惑人類的錯誤或惡意的歷史概括進行揭露。

——藍達爾

7.1 三民主義向傳統的回歸

1927年後，國民黨一面清黨反共，鎮壓工人農民運動，另一方面繼續北伐，完成統一大業，表面上看，社會整合進程極為迅速。1928年，蔣介石軍隊破張宗昌軍隊，收復濟南。接着國民革命軍佔領北京，並改名為北平。同年8月8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召開，宣佈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力圖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幾個月後，張學良在東北升起青天白日旗，遵循三民主義，服從南京政府領導。這一切都標誌着國民黨基本完成削平軍閥割據和鎮壓人民革命雙重任務，終於實現社會整合。

分析一下1928年後南京政府建立的社會結構就可以發現，這是和傳統組織方式同構的意識形態與政治一體化系統。在一體化組織方式中，意識形態是權力合法性來源。為了使人民接受統治權威，必須把一黨的意識形態作為整個社會的統治思想。和中國封建社會獨尊儒術一樣，國民黨一掌權，就不准人民懷疑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成為官方意識形態[註一]。既然三民主義作為凌駕於法律、憲法之上的絕對真理，那麼國民黨因手裏掌握着這絕對真理便獲得一黨獨大的特權。〈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方略〉規

定：「中國人民須服從並擁護中國國民黨……始得享受中華民國國民之權利」。這也就意味着「凡不服從或不擁護中國國民黨的中國人，是沒有國民權利的，因此亦無集會結社的自由，當然不能公開組黨。另一方面，凡是享有國民權利的人，即都服從並擁護國民黨……也就不會去另行組黨」①〔註二〕。

1928年9月公佈的〈訓政大綱提案說明書〉宣稱：「本黨始終以政權之保姆自任」，毫不隱諱國民黨對政治權力的全面壟斷。三民主義通過以黨統軍、以黨控政、以黨的意識形態號令天下，建立了大一統官僚政治體制。南京國民政府更不斷將黨的官僚機構逐步發展，令其深入社會組織各個層次，以便更全面更徹底地控制整個社會。

國民黨那麼快就能建立新的一體化結構並不值得奇怪。北伐前它的組織規模就是共產黨的十幾倍，又比共產黨更注重黨軍建設，在掃邊軍紳政權的北伐和大革命潮流中，國民黨始終佔主導地位。但是1928年後，僅僅依靠三民主義和國民黨，是否能夠順利而穩定地實現社會上中下三層次整合呢？我們先來分析社會上層組織。這一層次之整合是要建立一個有效而統一的中央政府，組織基礎是要求政府官員和軍人認同於三民主義。國民黨宣佈反共，鎮壓人民革命，雖然維護了軍官和黨員的利益，保持了反軍閥之統一戰線，但它卻不得不面對清共和鎮壓工農運動所造成的巨大反作用，這就是三民主義對社會動員力的喪失。

新文化運動後，中國新知識分子拋棄舊意識形態，普遍認同民主（大眾參政），科學主義、社會主義、烏托邦主義和民族主義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涵蓋了這些思潮，才具備對

① 趙穗生：〈中國民主悲劇探源〉《知識分子》冬季號 頁10（紐約：1990）。

知識分子的吸引力，並在大革命期間產生極大的社會動員作用。但是，自1927年國民黨清共後，為了使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劃清界線，三民主義的基本結構發生了重大改變。

最先改變的是「民生主義」。本來孫中山把民生主義說成一個大口袋，包括了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學說，甚至把共產主義、大同理想都吸收進去。國民黨清黨後，即對總理遺教進行重新解釋。由於民生主義和馬列主義互相交叉，他們就盡量避開民生主義。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畫了一張表，認為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革命對象、動力均和馬克思主義不同(表7.1)。根據新的解釋，從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雖然可以推出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軍紳政權)的革命目標，但人民造地主資本家的反的階級革命則不合理，這樣三民主義便喪失了新文化運動後最具社會動員力的內容。在黃埔軍校中，清黨前是用唯物史觀講解民生主義，現在改為用生的史觀，這也偏離了當時人們信奉的科學主義之主流，三民主義意識形態說服力大大減弱。

意識形態 內容	孫中山(三民主義)	馬克思(主義)
革命哲學	生的史觀	唯物史觀
革命群眾	全民	無產階級
革命對象	帝國主義 軍閥政客(封建勢力) 土豪劣紳	資產階級
革命性質	國民革命	社會革命
革命手段	(1)民族獨立 (2)民權普遍	(1)階級鬥爭 (2)工農專政

取自胡漢民：〈三民主義的心物觀〉，《胡漢民先生文集》，2冊，頁523（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

表7.1 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相異之處

1929年國民黨實行訓政，三民主義中「民權主義」的魅力也隨之消失。本來，民權主義符合知識分子和民眾要求大眾參政的呼聲，用孫中山的話講，國民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全民政治的民國。但國民黨在1928年以後實行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註三]，這是一種和傳統一體化結構同構的體制[註四]，它本身就破壞了民權主義的理想。

三民主義中唯一還有點號召力的就只剩下「民族主義」了。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是民族獨立，但它和馬列主義的「反帝」口號互相包容。為了把民族主義和馬列主義的反帝口號相區別，國民黨民族主義的立足點也必須修改。在這種情況下，民族主義不得不以中國文化為自己的符號，它開始和儒家倫理相結合，演變成一種新傳統主義，我們稱之為三民主義儒家化。它完全背離新文化運動時期批判傳統的思想主流。早在國共合作期間，戴季陶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中，就已經把孫中山的思想說成是中國正統的繼承：「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來中絕的中國道德文化的復活」。他還把《大學》和《中庸》等儒家經典當作三民主義之基礎。在三民主義儒家化的過程中，戴季陶的解釋迅速為國民黨普遍接受②。

三十年代初，國民黨通過新生活運動，把三民主義儒家化推向高峰。蔣介石把民族主義定義為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民族精神，並把中國民族精神與道德倫理劃了等號。中國的民族道德是「四維八德」，於是又有「四維不彰，國乃滅亡」之說③。蔣介石還說，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就是孫中山所講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② 陸寶千：〈中國國民黨對總理遺教解釋之確定〉《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③ 鄧元忠：〈新生活運動之政治意義闡釋〉《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

八德，按照八德去做，才能實現三民主義^④。於是，新文化運動被否定，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出現了儒家的借屍還魂，整個社會充斥着對新文化運動各項成果的反動。三民主義儒家化使得它又成為一個類似於傳統的倫理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但由於它不強調家庭本位，是一個強調黨的意志的集體主義思想體系，這就導致儒家化三民主義出現了類似於法西斯主義的傾向[註五]。

新一體化結構的組織力和社會動員能力有很大一部分依賴於意識形態。當意識形態具有魅力，為廣大知識分子和民眾接受時，黨成為吸引理想主義者的精英組織。三民主義儒家化使得意識形態認同的組織力迅速減弱，社會動員力喪失大半，知識分子和政府出現了嚴重的離心傾向^⑤。甚至在1927年支持國民黨反共的各式各樣知識分子團體，也都對國民黨的復古和獨裁產生了強烈反感，國民黨黨內的凝聚力因此大大降低。

由於對三民主義理解不同，國民黨分裂成不同的派系。鄧演達不同意共產黨的無產階級革命，但也反對鎮壓農民運動，他提出「中國農民是革命主導力量」，建立起第三黨。汪精衛的反共和以黨治國立場與蔣介石一致，卻不同意蔣介石把三民主義變為復古的封建主義，他以反腐敗為旗號指責三民主義向傳統回歸違反了「十三年改組精神」。國民黨改組派運動風起雲湧，一時對蔣介石的正統地位構成威脅。甚至連胡漢民都不甚同意把「孫中山孔子化」。他認為這是抹煞了孫中山思想體系之「偉大卓絕」，把三民主義馬克思化、釋迦化、術士化、流氓化通通是不可寬恕的錯誤^⑥。蔣介石因

④ 蔣介石：〈軍事教育之要旨〉五 《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2 頁441（台北：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4）。

⑤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 頁573。

⑥ 史全生主編：《中華民國文化史》中 頁451-464（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握有黨軍實權而成為國民黨領袖，但他在黨內的資格和影響力本不如汪精衛和胡漢民。國民黨意識形態凝聚力減弱，黨內爭權奪利的派系鬥爭變得公開化，並難以控制。迫於壓力，蔣介石不得不兩次下野，然後伺機在國民黨因嚴重分裂而陷於危機之時再次復出。蔣、汪、胡三人為代表的三個派系不斷明爭暗鬥，中央政府經常處於分裂狀態，政治結構動盪不穩。

一體化上層組織能否保持穩定，基本前提是軍隊服從中央政府。本來，列寧主義政黨通過黨軍建立了和傳統一體化結構類似的控制軍隊之機制。北伐期間，廣大五四青年入黨投軍，三民主義借新思潮之風在軍內有巨大號召力。國民黨清共後，三民主義魅力消減，它很難像以前那樣源源不斷地把有熱忱之青年轉化為黨軍幹部。在北伐進程中，由於軍閥部隊投誠，出現軍隊大膨脹，以黨控軍的結構也受到干擾。1928年7月隸屬國民革命軍的陸軍，多達220萬眾。在200餘萬軍隊中，只有蔣介石的黃埔系嫡系部隊才是真正的黨軍。他們人數並不很多，如由以黃埔軍校為骨幹的第一軍發展成的第一集團軍，只有50萬人^⑦。新投誠的部隊，很多是集體加入國民黨，有的僅變了名號。原有黃埔軍校畢業生數量遠不足以應付急速擴張的部隊。國民黨軍隊雖然也有基層組織和黨代表制，但其基層組織不嚴密，黨代表在部隊僅有「客卿」地位，一旦打倒軍閥、實現統一，國民革命軍中的派系就出現嚴重分裂傾向。

1928年北京和天津先後被國民革命軍攻克後，蔣介石為了控制軍隊，開始神化孫中山，以強化軍人對中央政府的認同。蔣介石以中央政治會議名義，在北平舉行了一次孫中山祭靈典禮。他特地從南京繞道漢口與桂系李宗仁同行，又到鄭州邀上馮玉祥，閻錫山本來就在北京。蔣、李、馮、閻四巨頭於7月6日齊集北平西山碧雲

^⑦ 劉鳳翰：〈戰前的陸軍整編〉《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

寺，向孫中山靈柩施大禮。但是喪失魅力的三民主義並不足以抑制國民黨軍隊內訌。魯迅當時就作過一首詩，形象地刻劃了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與中央軍的貌合神離：「大家去謁靈，強盜裝正經；默哀三分鐘，各自想拳經」^⑧。果然，謁靈後不久，蔣介石想以「主義」為名進行削藩，觸發了擁有實力的軍事將領反對中央的戰爭。先是1929年的中央軍和桂系之戰，接着是唐生智在河南反蔣，最大的衝突是1930年閻錫山、馮玉祥和蔣介石之間的中原大戰。雙方投入上百萬兵力，戰線綿延數千里，曠時七個月，死傷三十多萬人。最後因張學良支持蔣介石，中央軍取勝。經過兩年的內戰，蔣介石雖壓服桂系、閻錫山、馮玉祥等諸侯，但是仍無法統一國民黨所有的軍隊。一些史學家認為，國民黨南京政府只是名義上統一中國，真正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的只是東南沿海、大城市和中原地區，至於邊遠地點和幅員遼闊的農村，南京國民政府只能挾「主義」以令諸侯，很多地方仍在一些軍閥把持之下。也就是說，國民黨只建立了一個弱中央政府。

7.2 金字塔的倒砌：國民黨政治結構

國民黨整合模式中一體化上層組織鬆散不甚有力，那麼中下層社會整合得又怎樣呢？如果說，三民主義組織力的減弱使上層組織不能緊密整合，那麼鎮壓工農運動則帶來另一個後果，這就是國民黨一直缺乏中下層社會組織者。

南京國民政府是打倒軍紳政權後確立的，為了實現社會中下層整合，它必須用自己的組織實體代替已經崩壞的傳統一體化中下層

^⑧ 陳旭麓主編：《五四後三十年》 頁192。

組織。傳統一體化結構是一個上小下大的金字塔，上層為數萬名官員，中層是由幾百萬縉紳(連同其家族)組成的農村自治網，基層則是把每個人都組織進去的宗法家族。經歷了十九、二十世紀的社會結構鉅變，傳統紳士已退出歷史舞台，中下層社會組織也不能再依靠家庭，而要用中央直統到基層的官僚機構來整合社會各層次。本來傳統一體化結構中，只有上層屬於官僚機構，中下層均為民間社會，現在只能建立一個金字塔式的巨型官僚機構才能代替原有三個層次的組織。一體化組織原則要求官僚來自意識形態認同團體，新一體化結構能否形成如此龐大的組織，則要看意識形態政黨有無足夠的官僚來源。南京國民政府的公務員達七十萬眾[註六]，已是傳統社會官僚數目的十幾倍，但這七十萬人至多只填充了原來一體化結構的上層和中層，而無法進入基層。國民黨的官僚網的末端達到縣以下的區一級，它比傳統一體化結構的末端——縣稍為深入，但仍無法達到鄉和每一個自然村。原因十分簡單，國民黨在基層一直缺少其組織成員。

國民黨要完成對社會基層的統治，有兩個辦法，一個是利用國民黨員為基層幹部，另一個是讓農村青年知識分子接受三民主義培訓轉化為基層幹部，但在國民黨整合模式中，這兩種辦法均難以實行。表7.2為抗戰前國民黨黨員數。100多萬黨員中三分之二為軍人，非軍事人員只有40—60萬，它只是傳統一體化結構中縉紳人數的三分之一，而且這些人大多都在城裏。上海等大城市，平均200個人中有一名國民黨員，而在農村人口佔89%的山東省每5,000人中才有一名黨員^⑨。這種分佈無法為縣以下農村提供足夠的幹部。南京國民政府官僚機構的末梢是縣以下的區政府，國民黨的基層組織是區分部。照理說，區分部應如樹根一樣深入到縣以下的農村，

^⑨ 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 頁396。

時 間	黨員總人數	軍人黨員數	非軍人黨員數
1932	1,132,462	670,622	461,840
1933	1,271,707	784,195	487,512
1934	1,418,259	871,619	546,640
1935	1,611,151	1,015,581	595,570

取自楊幼炯：《中國政黨史》，頁200（台北：商務，1969）。

表7.2 抗戰前國民黨人數

但是，國民黨在農村黨員的稀少，使得區分部在農村中形同虛設，以黨治國在農村根本沒有實行者。

政黨成員的社會分佈，是由它的性質所決定的。國民黨是以資本家、商人、城市知識分子為骨幹，黨員基本來源於城市，也居住在城市。大革命中，新意識形態開始深入農村，引發農民運動，但國民黨鎮壓農民革命，自然不能利用農民作為自己的幹部來源。國民黨組織無法深入鄉村與基層。

建立一體化基層組織的另一個辦法是對青年知識分子進行三民主義培訓，然後派他們去充當區長、鎮長和保甲長。這一計劃能否有效實施呢？且不說三民主義在清黨後喪失了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單單看看二十世紀以後知識分子的城市化趨勢，就使這一計劃難以落實。新文化運動後，中國新式教育發展迅速，但小學基本上都設在鄉鎮以上，而中學則在縣城裏。原來普遍扎根於鄉村的私塾早已退化，甚至消亡了。農村中知識分子（尤其是知識青年）同國民黨員一樣稀少。在國民政府的文官結構中，大學生和留學生多在省城當官，擔任廳長和高級辦事人員，中學文化程度的則集中在市縣一級。在縣以下，幾乎很難找到有文化的人來充當管理人員。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一書中考察了三十年代一個典型的江南鄉村社會，

發現擔任鄉長的是一個前清秀才，他退休後推薦的後繼者也只是一個快絕種的舊學出身的讀書人^⑩。

總之，國民黨清共鎮壓農運雖使它捷足先登，率先實現社會整合，但也同時註定了它不能深入農村基層的命運。本來在大革命中，農民已經組織起來，農會和農民幹部有可能成為農村基層的管理者，現在這一過程中斷。國民黨作為一個在城市中發展起來的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它實現一體化，只能建立一個上大下小的倒砌金字塔式的官僚系統(圖7.1)。立足大城市的中央和省級機構，人員較充足，控制力也強；到縣級，控制力已經減弱，越往鄉村延伸，控制網就越弱[註七]。為了實現對農村的統治，國民黨只有盡可能利用原有的基層組織，如地主在鄉村的統治和宗法家族。但是我們在第三章已指出，自甲午戰爭後，鄉村中宗法組織也漸趨解體，到本世紀三十年代，農村中宗法家族已不能擔當基層組織之功能。這樣，國民黨勢必碰到社會動員上的困難。在對外開放條件下，國家是否具備對農村的動員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把農業收入轉為工業投資以及集中人力物力以對付外來侵略，國家才能有效抵抗工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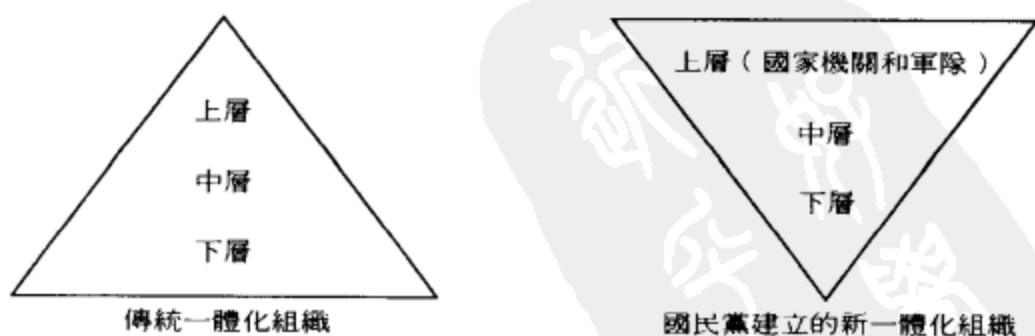


圖7.1 國民黨新一體化結構與傳統結構比較

^⑩ 費孝通：《江村經濟》 頁75-76（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

文明之衝擊。但倒砌金字塔結構的組織不具備動員農村之能力，國民黨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放棄對鄉村的管理，使得地方行政紊亂，各自為政，各種政令均不能下達民眾；另一個選擇則是放棄一體化組織原則，硬性強化對農村的控制，在農村徵兵加稅，而這樣就只能依靠當地的地痞、流氓、惡霸作為辦事員，其結果必然是引發基層無組織力量大膨脹。

7.3 內憂外患下的「黃金十年」

三十年代，中國曾發生過一件轟動全國的詐騙案。山東一位名叫梁作友的人，自稱擁有六、七千萬元的財產，願意捐一半給國家。其中十分之二為「抗日剿匪」之用，十分之二救濟各省災民，其餘用於修鐵路。山東省主席韓復榘急忙上報中央，宋子文獲悉十分高興，接見了這位財神爺，蔣介石隨即也親自接見。後來陳希曾發現這是個大騙局。梁作友見騙術被揭穿，便向南京政府進言道，自己雖不能直接拿出三千萬元，但國家只要依他所說也能得到二億元。這條妙計是「讓全國四萬萬人每個都備樸滿子一隻，每年存五角錢作為愛國捐款，一年就可得二萬萬」^①，把南京政府氣得哭笑不得。這個例子頗為形象地說明了南京國民政府在社會動員上的困境。本來三千萬元對於一個大國並不算一回事，如果國家動員能力深入到農村，四萬萬人每人出一點錢，中央政府就能得到巨大的經濟收入。但是，這對於國民黨卻是十分困難的。

在傳統一體化結構中，縣以下是鄉紳自治和家族組織，它們本身就是農村組織的一部分，依靠農村經濟作為自己生存的基礎。而

^① 陶菊隱：《記者生活三十年》 頁198-202（北京：中華書局，1984）。

官僚機構作為金字塔之頂，並不需要太多資源來供養。現在，國民黨統治結構是一個倒立金字塔，不可能大量吸取廣大農村的人力物力資源，這樣一個政治系統如何存活呢？如果本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仍和傳統社會一樣，是純粹農業型的地主經濟的話，國民黨實現社會中上層的弱整合也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種政治組織實體必須有供養它的經濟基礎。國民政府的建立是因為中國經濟結構在本世紀初至新文化運動期間發生了某種變化。

我們在3.5節討論到二十世紀初開始的通商口岸急驟膨脹，這一趨勢到二十年代仍未停止。五四運動爆發時，北京才有60萬人，不到十年便增至110萬^⑫。上海、天津、廣州、武漢四個主要通商口岸成為中國最發達地區。城市是大軍閥勢力盤踞之中心，秩序相對安定，軍閥和紳士從農村中搜刮來的財富都往這裏集中，或投資於工商，或揮霍享受。新文化運動期間，城市與農村凋敝的情形相反，成為中國資本主義大發展的基地。商人和民族資本家已明顯和新政時期的縉紳劃開了界線，成為中國民辦工業之領頭人。1914—1926年期間，中國十五種主要工業產品的產值由兩億元增至近六億元^⑬，十二年間增長近三倍。軍閥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和管理能力很弱，國家對城市經濟的干預大為減少，官商習氣和官僚組織對經濟發展之束縛在這一階段幾乎消失了，迅速成長起來的現代經濟成分，大多屬民間資產階級的自由經濟[註八]。到三十年代，中國的經濟結構已變成一種地主經濟和自由資本主義的混合形態，城市經濟相當發達，已經可以為供養國民黨官僚結構提供經濟資源。

1927年蔣介石在北伐過程中佔領上海時，上海資本家就拿出

^⑫ 周策縱等著：《五四與中國》 頁30。

^⑬ 張長治：《解放前中國工業的發展：量的分析》 轉引自帕克斯·M·小科布爾：《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 頁193。

300萬元短期貸款，希望蔣介石鎮壓工人運動。接着又拿出700萬元作為第二筆貸款，供國民黨用作北伐軍費^⑭。當時上海是通商口岸中最現代化的地區，佔領上海就意味着控制了全國依附型資本主義經濟之中心，據此，國民黨才具備壓服軍閥、建立統一政府的實力[註九]。

國民黨在城市是有動員能力的，其人力和經濟資源基本上都來源於城市。三十年代，中央政府用於養活龐大官僚機構和軍隊的財政支出，主要靠城市稅收，其中關稅、鹽稅和統稅在政府的歲入中佔有極重的比例，到1936年，三稅就佔到財政總收入的64.6%^⑮。而來自地主經濟之收入，只是弱小地方政府之財源。田賦是省政府的財政來源，縣政府則靠田賦附加養活，政治結構與經濟結構形成如圖7.2所示的關係。它表明，南京國民政府儘管沒法深入鄉村，但可利用在城市的動員能力，去統一貨幣，通過徵收關稅、鹽稅和統稅等來供養自己。城市中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是軟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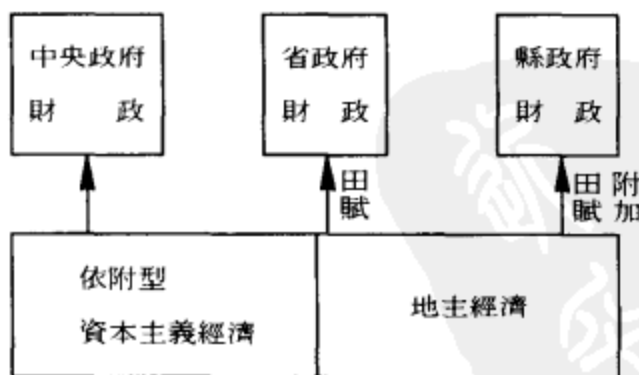


圖7.2 南京國民政府的稅收來源

^⑭ 帕克斯·M·小科布爾：《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頁14-15。

^⑮ 史全生：《中華民國經濟史》頁236。

央政府的基礎[註十]。

總之，國民黨清共後，囿於意識形態的性質，其組織成員和經濟來源主要來自於城市，因此它只能建立一個弱中央政府。但是，無論這種結構多麼軟弱，中國社會畢竟還是擺脫了軍閥混戰之災難，初步實現了國家的統一，社會秩序基本恢復，三十年代中國出現了自1915年以來沒有見過的新氣象。中國在民族獨立自主方面取得一系列成就。1929年，中國與比利時簽約收回天津的租界；1930年，又收回英國在威海衛的租借地(唯劉公島續租十年)和廈門的租界。中國的司法機構也獲得了在上海租界行使職能的權利。南京國民政府在現代史上第一次做到關稅自主。關稅總收入由1913年的1,697萬元，上昇到1929年的27,555萬元和1931年的36,413萬元；在財政總收入中的比重，也由1913年的21%上昇到1929年和1931年的51%^{①⑥}。關稅自主既成為政府穩定財政的重要手段，又可對中國民族工業實行保護。那些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推行的現代化事業，如國防工業、修建鐵路、教育、科學研究等等，也取得軍閥時代不可能有的成就。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因此把1927-1937這十年稱為「黃金十年」^{①⑦}。台灣的一些近代史學者也認為，如果這種局面能保持下去，中國會從此走上現代化經濟起飛的道路。

但是，我們把國民黨弱一體化整合模式放到當時國際國內大環境中去考察，就可以看到它必然會碰到愈來愈嚴峻的內外挑戰。「黃金的十年」充滿了內憂與外患，它是不能持久的。在內部，它雖得到了城市經濟的支持，但中國傳統社會已經解體，城市的發展是和農村社會日趨深重的危機並存的。知識分子的城市化，農村資金流向城市以及經營地主的興起，固然意味着城市大發展以及農村可

^{①⑥} 史全生：《中華民國經濟史》頁234。

^{①⑦}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572。

以向城市提供更多的商品糧，這是三十年代城市經濟繁榮之前提，但農村的人才和財富流向城市也是農村失血虛脫的過程。農村社會失去基層組織者，土地兼併加劇，社會秩序崩壞。國民黨建立的新一體化結構根本不能深入農村，不但「耕者有其田」是一句空話，就連傳統一體化結構勸農、救荒的功能也不具備。軍閥時代農村基層早已殘破不堪，現在城市愈是繁榮，鄉村情況就愈加惡化。農村正在變成叛亂和革命的發源地。

三十年代，蔣介石為了剿共，不得不加緊對農村基層進行控制，廣泛推行保甲制。但是，由於政府不能直接深入廣大鄉村，國民黨只能大量利用農村的地痞流氓和惡霸作為基層管理人員，這些人狐假虎威，作惡鄉里，加劇了農村的危機。黃宗智考察三十年代華北農村時發現，隨着國民黨縣級政權向農村滲透，基層普遍興起一個濫用權力的地方惡霸階層，他稱之為村級惡棍^⑮。法國學者畢仰高(Lucien Bianco)在研究農民抗煙稅的暴動中揭示出，國民黨縣黨部和區長是如何在徵稅過程中依靠這些地方惡霸的，這些惡霸被稱為「土劣派」^⑯，他們甚至逼得地主都無法生活下去了。沈松僑考察了河南地方基層組織後指出，保甲長大多都是地方社會渣滓，而「鄉黨自好者多不肯充，不肖者則因緣為姦，以遂私圖」，保甲長「有不識之無者，有七、八十歲者，有吸食毒品者……其間對於法令規約毫無認識者，蓋居絕大多數」。這些人往往借國家徵稅徵兵之名，魚肉百姓，橫行鄉里，農村基層迅速興起一個依附於國民黨官僚機構的惡霸地主階層。1933年，河南數縣四十四個區長中，擁有一百畝田產以上的佔72.7%。很多區長，到任時只有田地十餘

^⑮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頁298。

^⑯ 畢仰高(Lucien Bianco)：〈安徽宿縣、靈璧縣農民抗煙稅鬥爭(1932)〉張憲文、陳興唐、鄭會欣編：《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

畝，卸任時則增至二、三頃^⑩。1935年對四川十個縣新舊地主的調查表明，新興地主大多是官僚，佔土地90%。而無錫518個村長中的104個經過調查，其中91.3%是地主。1933年無錫六個區的鄉鎮長中，地主佔90%^⑪[註十一]。傳統一體化結構中，農村地主經濟的穩定有賴於中央政府的調節，現在，國民黨政府對農村的滲透調節卻促使其解體。

與內憂同時存在的是外患。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正好趕上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中國處於一個空前嚴峻的國際環境中。蔣介石中央軍剛結束與閻錫山、馮玉祥的中原大戰，就發生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1931年日本出兵侵佔中國東三省，1932年又進攻上海。在所謂「黃金的十年」之中，日本帝國主義全面入侵的陰影正在步步逼近。

那麼，南京國民政府抗擊外來侵略的能力又如何呢？蔣介石依靠黨軍和城市經濟的支持勉強削平群雄，統一了中國，但三民主義動員力的減弱，使得政府權力難以深入基層，在這種情況下對付外國入侵是十分困難的。三十年代中國經濟結構雖是一種資本主義與地主經濟的混合型態，但地主經濟成分仍佔主導地位，當時的中國仍是一個農業國家。1933年的國民總產值中，農業佔65%，工業為10.5%，貿易佔9.4%^⑫。整個國民收入中，現代經濟成分只佔12.6%^⑬。因此，國民黨即使具備了對城市經濟之動員能力，城市經濟本身可提供的資源也十分有限。國民總產值中只有很少部分才

⑩ 沈松僑：〈從自治到保甲：近代河南地方基層政治的演變，1908-1935〉《近史所集刊》第18期（台北：1989）。

⑪ 楊振亞：〈試析國民政府十年內戰時期的土地法〉《南京大學學報》第3期（南京：1984）。

⑫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498。

⑬ 帕克斯·M·小科布爾：《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序言頁5。

能為中央政府所用。如1933年國民政府的全部支出，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2.4%^{②④}，這在現代政府中是極低的水平。由於內戰和剿共所需軍費浩大，南京政府一開始就出現巨大的財政赤字。1929年財政赤字為1億元，1937年增長到2.97億元，為總收入的34%。當城市經濟所提供的關稅、鹽稅及其他稅收不足於應付政府開支時，國家先是向資本家借款，借款愈來愈經常，不得不發行公債和直接向外借款。據統計，從1927-1937年，南京政府發行了數十種公債，金額達二十六億元；公開舉借的外債有十四起，總計達到四億美元左右^{②⑤}。宋子文甚至建立了一個債券市場，讓資本家因持有債券而更依賴於政府。這表明南京政府的經濟、政治實力對於實現內部危機已十分勉強，一旦遇到強大的外來入侵，就立即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

7.4 八年抗戰和過度動員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對駐守北平的二十九軍發動進攻。同年8月13日又以二十萬大軍入侵上海，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這是中國對外開放以來所面臨的一次最嚴峻最大規模的外族入侵，它給中國社會帶來近現代史上從未有過的大破壞。半個世紀積累起來的現代工業大約有一半被摧毀，中國傷亡人口達2,000萬，一億以上人民流離失所，經濟損失達4,880億美元^{②⑥}。抗戰開始之際，日本政府看到國民黨軍隊派系重重，內部動亂不已，以為戰勝中國

②④ 帕克斯·M·小科布爾：《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序言頁7。

②⑤ 史全生：《中華民國經濟史》頁236-237。

②⑥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 頁715。

輕而易舉，便狂妄地宣稱三個月內滅亡中國。但是三十年代的中國已非半個世紀前的滿清帝國，國民政府畢竟有着比傳統一體化結構更大的抵抗外來入侵的能力。中國雖蒙受巨大的損失和苦難，但卻有效地抵抗了日本的侵略。國民黨既然率先實現中國社會整合，它也就擔負起抗戰的主要責任，承受了正面戰場的巨大壓力，成為抗日戰爭的主要組織力量。

在八年抗戰中，國民黨軍隊與日本軍隊先後進行了大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戰鬥達28,931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者達320多萬，空軍消耗戰機2,468架^⑲。中國軍隊一直牽制着日本軍事力量的主力。美國軍事觀察家卡爾遜(Evans Fordyce Carlson)上校在抗戰一開始就對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感到意外，他在評論淞滬之戰中國軍隊的英勇作戰時這樣寫道：日本自1905年日俄戰爭後，被世人視為可怕的軍隊，經中國一打，降到第三等的地位^⑳。國民黨軍隊打死打傷日軍859,600餘人^㉑，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消滅日軍52萬餘人^㉒，共138萬。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中國終於一反近代史上屢戰屢敗挨打受辱的局面，第一次取得抵抗現代化強國入侵的偉大勝利。

但是，三十年代的中國畢竟還是一個現代化後進的農業國，抵抗現代化工業國家的侵略，有賴於全面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而國民黨只能依靠倒砌金字塔式官僚組織來進行動員。抗戰就如一把雙面刃的利劍，當南京政府竭盡自己的組織力和動員力，把經濟上貧

⑲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 頁665。

⑳ 陳旭麓主編：《五四後三十年》 頁332。

㉑ 蔣緯國總編著：《抗日御侮》第10卷 頁45（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

㉒ 李新：〈論抗日戰爭〉《中國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頁4（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

窮、軍事組織上落後的中國人力和物力集中起來，有效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同時，劍的另一面即對準了自己：國民黨因過度動員而出現無組織力量大膨脹。原有結構中隱藏的各種缺陷立即暴露出來，它們不斷惡化，成為致命的病症。

現代化後進的農業國家面臨發達資本主義強國的全面入侵時，無可選擇的戰略是放棄城市和發達地區，立足於農村和廣大後方進行抵抗和反攻。毛澤東稱之為打持久戰，蔣介石將其叫作用空間換取時間。這一過程本身立即對那些建立在城市的組織結構造成極大的破壞。國民黨成員主要分佈在城市，動員系統在城市，經濟支持也是城市。抗戰一開始，隨着撤出沿海大城市，南京國民政府的最主要的經濟來源也隨之阻斷；當它退到農村和不發達地區，企圖動員農村和城市經濟以抗戰時，動員的後果往往是無組織力量進一步吞沒其組織體系。過分動員對組織系統造成極大破壞，它猶如飛蛾撲火，以自己軀體的瓦解為代價來抗拒侵略者的火焰。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短短幾個月中，華北和東南沿海大城市如北平、天津、保定、石家莊、太原、濟南、青島、上海、無錫、南京先後淪陷，國民政府遷往武漢。1938年蚌埠、新鄉、徐州、開封、武漢、廣州又相繼被日軍攻佔。整個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勢力範圍是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北十個省份和廣大農村。而在1937年前，這十個省份有記錄的工廠只有182家，佔全國工廠的4.6%，總資本的2.8%^①。可以說國民政府完全喪失了它原來所依靠的依附型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各種收入隨之大減。1941年當來自城市的關稅、鹽稅和統稅下降到國庫收入的5%以下時，國民黨不得不把稅收來源從城市移向農村，立即宣佈農業稅歸中央政府支配，

^① 黃逸峰等：《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頁47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並對田賦進行徵實^②。隨着國民黨對農村的徵兵加稅，農村無組織力量亦迅速增長。

據一些學者推算，抗戰時，將國民黨徵收田賦徵買徵購等負擔和各種雜派合在一起，至少要佔農民全部收入的60%以上^③，農民負擔普遍比抗戰前增加四倍至二十倍不等^④。而在1935年農村所受到壓力遠沒有這麼大時，全國1,000餘個縣中，農民離村總人數就已在2,000萬以上^⑤。據中央農業實驗站調查，56%的農戶每年必須借貸，48%的農戶要靠借糧才能維持生計^⑥。現在農民承受的壓力增大了十倍，而且國民黨在農村依靠的是一個借徵兵徵糧為名以兼併剝奪農民為實的惡霸地主階級。在保長抓壯丁、攤稅款的過程中農村進一步解體。抗戰勝利前夕，農村中土地兼併已嚴重到引起國民黨上層的注意，國民黨「六大」不得不把土改作為一個重要決議提到議事日程，並在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示意下提出《農地改革方案》。但是基層幹部和保甲長本身就是兼併者，國民黨對於自身的腐敗無能為力，只能眼看着農村成為動亂的溫床[註十二]。

農村過度動員造成土地兼併，城市經濟過度動員的後果則是官僚資本的興起和腐敗。抗戰的前期和中期，國民黨放棄東南沿海和大城市向西南退卻，猶如希臘神話中靠大地作為力量來源的巨人泰

② 陳克儉：〈試論國民黨政府時期工商稅收的特點、性質和作用〉《廈門大學學報》第4期（廈門：1984）。

③ 朱玉湘：〈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的田賦徵買與糧食徵購〉《山東大學學報》第1期（濟南：1963）。

④ 林德金：〈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經濟危機的特點及其根源〉《湘潭大學學報》第2期（湘潭：1985）。

⑤ 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 頁615、882（北京：三聯書店，1957）。

⑥ 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 頁220。

坦被舉了起來，失去了自己力量的源泉。但是和神話中巨人因此被殺不同，國民黨雖然面臨重重困難，但它畢竟是一場全民族與敵人殊死搏鬥中的主要組織者。民族主義產生了巨大的動員力量。在戰略退卻中，人民與政府共甘苦，大量企業家、知識分子跟着中央軍遷移到西南落後地區。本來，中國的現代工業都集中在東南沿海，工業化是以通商口岸為中心展開的，西南和廣大腹地一直是落後地區，三十年代發展水平與本世紀初的水平差不多。隨着沿海資金、企業家、工程師雲集內地，大西南的工業化過程在抗戰中亦蓬勃發展。中國內陸的城市經濟與工業的興起，支持了抗戰，但在國家干預下建立的城市經濟只能是國家資本主義，它已不可能具備三十年代初的自由資本主義活力。中國的城市經濟結構中也出現了無組織力量的巨大增長。

國家資本主義的增長，是和一體化結構對城市經濟干預同步的過程。早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國家對經濟干預即已開始。1932年，蔣介石宣佈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後改名為資源委員會，它以二億七千萬元作為資本，發展中國的燃料、冶金、石油和重工業，作為軍事工業基礎^①。資源委員會立即成為官辦企業的大本營。這表明，新一體化結構一建立，就具備干預城市經濟組織方式之能力，國家資本和國營企業應運而生[註十三]。但是，抗戰前民間資本仍佔優勢。1935年底全國工礦企業資本中，國營企業只佔11%^②。整個城市經濟結構仍可以算作為依附型自由資本主義，具有相當的活力。抗戰前，儘管國民黨用於內戰的軍費浩大，但城市仍很繁榮，物價平穩，人民生活水平不算太差。這一切均和城市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發達有關。1937年國民黨失去大城市後，西南西北企業如雨後

^① 帕克斯·M·小科布爾：《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 頁168。

^② 黃逸峰等：《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 頁412。

春筍般出現，但抗戰時建廠大多需國家支持，國家資本超過民間資本，迅速佔主導地位。1940年，國家資本已佔全國資本總額的50%，1942年又進一步上升到70%以上^③。1945年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接收了大約60億美元的日本在華資產^④。國家資本主義進一步大擴張。據統計，1947年隸屬於國民政府行政院資源委員會所控制的產值十分龐大，它達到電力行業的83.3%，煤炭行業的38.8%，鋼鐵的90%，水泥的51%，石油、鐵礦石、銻、錫、銅等有色金屬礦產品和食糖的95%以上；而國家的紡織建設公司生產的棉紗與棉布，也分別佔全國的36%和70%^⑤。城市經濟儼然呈現出國家資本主義的形態，城市經濟也和農村一樣出現無組織力量大增長。

本來，中國資本主義好不容易擺脫了傳統一體化結構的桎梏，在新文化運動後的十幾年間來了一個大發展，現在，類似於中國歷史上官營手工業、官商，洋務時期官辦企業和官督商辦的經濟成分再次出現了。在國家資本主義中，衙門作風嚴重，當它吸取愈來愈多資源，漸漸成為城市經濟主導成分時，資本主義的活力便消失，經濟發展又陷於停滯[註十四]。在經濟結構中存在着私營和官營兩種成分情況下，很容易成為官僚機構系統腐敗的根源。官營企業中官員可借助手控制物資貨幣的權力謀取私利，變相地把國家資本轉化為官僚私人的財產。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國營企業和官僚私人企業的混合型態，它可以稱為官僚資本主義[註十五]。

用通貨膨脹作為指標，可以看出國民黨抗戰過分動員的危害。

③ 胡德坤：《中日戰爭史(1931-1945)》頁399（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

④ 丁日初：〈關於「官僚資本」與「官僚資產階級」問題〉《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447。

⑤ 陸仰淵、方慶秋主編：《民國社會經濟史》頁766、772（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

本來，擴大發行貨幣是經濟動員的一種手段，當城市經濟繁榮，國家有能力組織生產、集中農產品時，這種手段和組織生產共同使用，才不會導致通貨膨脹。而抗戰必須集中大量人力與物力，城市經濟的生產力已大大減少，政府又不具備動員廣大農村人力和物資的能力，它只能依靠發行貨幣來調動經濟資源，從而造成巨大的通貨膨脹。不可控制的通貨膨脹是過分動員的指標，它使人民生活水平急驟下降，幹部腐敗。但是明明知道其危害，國民黨也只能飲鴆止渴，因為除此手段外，幾乎沒有其他更有效的辦法來籌集軍費。

1939年至1944年的財政赤字最低都在總收入的65%以上，最高達85%，這些赤字均靠印票子解決^④。國民黨十分慶幸它在1935年獲得貨幣發行權。蔣緯國說：「如果全面戰爭爆發而中國停留在銀塊或紙硬幣時期，則戰爭將難以維持半年以上……軍費籌措只有通過通貨膨脹而大量發行紙鈔。」^④只需下面一個例子，就可看出印鈔票機制在抗戰經濟動員中的重要性：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從美國得到的5億美元貸款中，不得不拿出其中5,500萬美元作為在英美印鈔票的印刷費用；1942年7月到1943年2月，運輸法幣竟佔由印度至重慶空運量的9%^④。表7.3為貨幣發行膨脹引起的物價指數增長和購買力指數的銳減。

1945年貨幣發行量是1937年的七百多倍，與此同時是農業的破壞、城市經濟的變質，社會生產的物資大大減少，物價上漲兩千多倍。它表明，抗戰失去城市和過分動員已經從內部摧毀了國民黨三十年代建立的社會結構。

④ 姜鐸：〈略論抗戰時期國民黨經濟的作用〉《江海學刊》第1期（南京：1988）。

④ 蔣緯國：〈中日戰爭之戰略評析〉《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4冊《抗戰建國史》頁10（台北：中央黨史會，1981）。

④ 胡德坤：《中日戰爭史（1931-1945）》頁401。

年 月	發行指數	物價指數	購買力指數	
1937	6	100	98.8	101.21
	12	117	98.3	101.72
1938	6	123	128.2	78.00
	12	164	164.0	60.97
1939	6	215	290.3	47.77
	12	305	355.4	28.13
1940	6	431	596.6	16.75
	12	560	1,267.2	7.85
1941	6	763	1,566.6	6.42
	12	1,076	2,736.6	3.65
1942	6	1,773	4,844.0	2.06
	12	2,422	7,766.5	1.28
1943	6	3,544	13,013.0	0.75
	12	5,357	20,930.0	0.47
1944	6	8,725	42,840.0	0.23
	12	13,464	58,744.0	0.17
1945	6	28,289	213,320.0	0.04
	12	73,845	212,690.0	0.04

取自孫文學等：《中國近代財政史》，頁341（東北財經大學，1990）。

表7.3 抗戰期間的通貨膨脹

7.5 泥足巨人的末路

1945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全國一片歡騰，但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卻憂心忡忡，他對家人說，這並沒有甚麼可慶祝的，更大的苦難就在眼前。陳布雷已敏感意識到，八年抗戰是國

民黨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國民黨在美國幫助下迅速收復淪陷地區，但它已是一個泥足巨人。如果只看這個組織實體的上部，它擁有近430萬軍隊，又有美援和先進的裝備，似乎十分強大，但是支持着這個全付武裝身體的兩條腿卻是泥塑的。一條腿是經濟，農村已經衰敗不堪，國民黨雖再次恢復對大城市和沿海發達地區的控制，但城市經濟結構已經變為以國家和官僚資本為主，成了一隻不會下蛋的母雞。另一條腿是黨政軍組織，它在抗戰後期出現嚴重腐敗。一旦失去民族主義號召力，國民黨就再也沒有抗戰時的組織力和戰鬥力了。

早在抗戰勝利前夕，無組織力量就差不多已經蛀空了國民黨組織，社會處於大崩潰的邊緣。抗戰一結束，當國民黨再次企圖消滅共產黨時，兩條泥足再也不可能支撐巨大的戰爭機器，它迅速被戰爭動員壓垮，整個國統區雪崩般地瓦解，國民黨政權大崩潰不可避免地來臨了。1947年10月，國民政府的黃金、美元儲備只剩下三億美元，預計到1948年底將全部耗罄，此時只得重新啟動印貨幣機制來解決龐大的軍費開支^{④⑤}。當時公庫收入只佔預算的5%，赤字全靠發行貨幣，其中80%是軍費^{④⑥}。抗戰中的通貨膨脹立即變本加厲，物價如天文數字般增長：1947年紙幣發行量達33萬億元，比1936年增加23,500多倍，同期上海物價指數上漲85,000倍。從1948年開始，1月至3月紙幣發行量是每三個月增加一倍，4至5月是每兩個月增加一倍，6月份是一個月增加一倍^{④⑦}。到1949年5月，抗戰前

④⑤ 蘇智良、朱華：〈民國史上最醜惡的一章——金圓券幣制改革與「打虎運動」〉《檔案與歷史》第4期（上海：1986）。

④⑥ 林德金：〈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經濟危機的特點及其根源〉《湘潭大學學報》第2期（湘潭：1985）。

④⑦ 薛暮橋、吳凱泰：〈新中國成立前後穩定物價的鬥爭〉《經濟研究》第2期（北京：1985）。

可以購買兩頭黃牛的100元紙幣只能買到一粒大米的千萬分之2.45。與通貨膨脹並行的是腐敗大行其道。1949年，美國銀行界向國會議員指出，宋子文和孔祥熙兩家在曼哈頓的積蓄高達20億美元。全國風傳中國所有財富都迅速地集中在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少數官僚手中。城市經濟終於徹底解體。國民黨的戰爭機器不僅壓垮了城市，農村也在動員中出現了同樣的結局。1946年國民黨徵兵60萬，1947年又徵兵150萬，所有這些均依靠基層保甲抓捕壯丁。1946年度為了內戰需要，國民黨宣佈對四十個省田賦徵實，加上徵借和地方公糧，農民須上繳的糧食高達11,100萬石，當時就有人驚呼這是史無前例的苛政^④。本來已在解體中的農村，終於因國家和基層惡霸地主的壓迫而雪崩般地瓦解。據不完全統計，各地因飢餓而死者達1,000萬人，1947年飢民增加到1億。僅上海一地，失業者即達200萬。中國社會結構大崩潰開始了。國民黨政權出現了兵敗如山倒的局面。

回顧國民黨從1927年率先實現中國社會整合到1949年失去大陸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這就是在對外開放條件下弱一體化結構不能穩定地實現社會整合。當超穩定系統處於相對孤立狀態時，受到的衝擊至多來自農業文明或遊牧民族，一體化結構的建立，主要取決於內部因素。而在對外開放條件下，用新一體化結構實現社會整合時，還必須去應付外來工業文明的衝擊。這時，社會整合模式能否穩定，同時取決於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當中國遭受嚴重外來入侵威脅之時，外來挑戰構成了一種對新一體化結構組織形態的選擇機制，只有能進行廣泛社會動員，集中中國廣大人力、物力以抵抗外來入侵的結構，才能生存下來，並佔主導地

^④ 林德金：〈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經濟危機的特點及其根源〉《湘潭大學學報》第2期（湘潭：1985）。

位。這種新一體化組織必須具備強勢意識形態，有更堅強和緊密的黨組織，它的組織也不能只集中於在社會上層，還必須深入到農村基層，形成一個基層幹部遠遠大於中層和上層的巨型金字塔系統。在抗日戰爭中日益壯大的中國共產黨，正具有這樣一種組織結構。



第七章 註解

註一 意識形態文化霸權確立最典型的表現是它對教育的干預。在現代社會中(或一體化解構時期),教育大多是不帶意識形態色彩的。1927年前,中國的教育制度是非意識形態化的,學校的任務是傳授知識,而不是意識形態灌輸。1927年國民黨建立新一體化結構,立即對教育制度實行干預。學校除了教學生知識外,還增加了三民主義的課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教育獨立於意識形態只在傳統一體化組織解體(1911年)到新一體化結構建立之前(1927年)這段時間。蔡元培教育主張的興衰是這方面一個象徵性的例子。在新文化運動期間,蔡元培已意識到教育獨立於意識形態的重要。他於1922年發表〈教育獨立議〉,認為只有教育獨立,才有學術自由。他身為國民黨重要幹部,在黨內一直主張教育獨立。在國民黨統一中國前,他就提出大學區制和創設大學院,使中國教育不受意識形態干擾。1926-1929年,大學區制試行,企圖將政黨干涉教育減少到最低限度。但北伐成功後,國民黨中央不再支持蔡元培的試驗。陳果夫堅持黨化教育,蔡元培只得辭職^{④9}。通過這個事例,我們可以看到建立新一體化結構,一定要把黨的意識形態凌駕於教育之上,正如傳統一體化結構中儒家經典是所有知識分子必讀書一樣。

註二 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一體化組織方式中,參政權利和權力來源均出於意識形態。在傳統一體化結構中,整個知識分子階層認同儒家意識形態。他們是官方意識形態認同的精英,這使得士大夫享有百姓沒有的參政特權。在新一體化結構中,只有列寧主義政黨是

^{④9} 陶英惠:〈蔡元培與大學院〉《近史所集刊》第3期(台北:1972)。

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具有意識形態確認的精英性質。它成為列寧主義政黨一黨專政和一黨獨大的理論根據，這裏我們看到，就參政權利而言，新一體化結構和傳統一體化結構是同構的。當意識形態政黨成為政治權力的當然享有者時，即使實行所謂一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實際上也無異於一黨專政。因為只有意識形態才代表真理，是法律和政治統治的權威和合法性來源。因此其他政黨即使被執政黨認為是合法（不反對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它也是沒有權威的，只能依附於意識形態政黨而存在，從它那裏獲得權威和合法性支持，因而也談不上通過競選取而代之。四十年代後期國民黨羽翼下的青年黨、社會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黨派，都難逃離這一普遍模式。

註三 列寧主義政黨執政後，實行的一黨專政除了黨壟斷全部政治權力和資源外，還包括黨的領袖獨裁，各級黨的幹部在自己管理範圍內的專斷。實際上這也是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一體化這種組織方式所規定的。從理論上講，黨的專政是對反對「主義」、不服從「主義」的人和政治團體進行專政（因他們已不屬於「人民」的範圍），但對於服從主義，特別是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內部（也就是說對於「人民內部」）理論上講必須遵循民主集中制。人人有參政與發表政見的權利，政治決定和領導集團必須由代表大會選出。這似乎實現了某種程度的民主。然而新一體化結構實行的後果卻是：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總是流於走過場的形式，也愈來愈不重要；即使在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內部，最後也總是以黨的領袖實行家長制般的獨裁而告終。無論是國民黨或是以後執政的共產黨，領袖都具有帝王般的專制權力，這又是怎麼回事呢？只要權威必須來源於意識形態，那麼一體化結構中帝王般的獨裁就是不能避免的。

表面上看，民主集中制規定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內部享有發表不

同意見之自由和參與執政之權利，使得專政和獨裁似乎只是針對意識形態認同團體之外而言(當意識形態獲得大多數人認同時，人們常說這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但是政治權力來源於意識形態就使得民主集中制程序本身並無牢不可破的權威。某種黨的統一政見、決議雖由民主集中制程序做出，但這種政見合理性和權威性的最後根據並不是黨章規定的程序本身，也不是它代表大多數黨員的意見，而在於它是否具有意識形態所肯定的真理性。但是，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又如何能確認某種政見具有「真理性」呢？顯然當某種政見可以唯一而且顯而易見地是從意識形態導出時，它自然會得到大多數黨員的認同，這時所謂黨的民主討論和投票只是一種走過場的形式。當政見不能由意識形態顯而易見推出時，那些對黨的意識形態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物的意見就會被認為是符合黨的意識形態的。民主和程序會變得愈來愈不重要，最後一定會出現一種局面，即那些新意識形態的創始人，或被公認對新意識形態發展作出重大貢獻者，就成為當然領袖。他的權威和政見會君臨全黨。在他的意見導致黨的重大失敗以致在全黨動搖他的意識形態權威之前，民主程序是無法遏制他的個人獨斷的。而一旦他的政見被實踐證明錯誤(往往是以黨的慘重失敗為代價)，出現的是意識形態權威人物(他代表意識形態中推出另一種政見的方法)的更替，黨只是改變了獨裁者。

新意識形態的倫理中心主義結構(或者是以某種無產階級立場為中心的非理性主義)愈明顯，民主集中制程序也就愈虛假。黨員擁有「民主」權利和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有一個前提，這就是認同黨的意識形態。當意識形態具有倫理中心主義或立場中心主義結構時，立場和倫理道德之純潔是黨員有權發表不同意見之前提。當黨的領袖是倫理道德之完人，或「無產階級利益的代表」時，任何發表不同意見、批評領袖都難以和反對黨的意識形態作出區分。「反黨」、反對「主義」構成一種巨大的道義壓力使大多數黨員懷疑(至少

是不敢講出)自己的真正意見,所謂民主集中制也就變成「政治劇場」式地通過來自領袖權威性指示的虛假程序。

把新一體化政治結構中產生個人獨裁之機制和傳統一體化結構中皇帝擁有無限權力作一個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到,事物的性質與其說取決於它的名稱,還不如說更多地由結構決定。新一體化結構和傳統一體化結構同構的部分(權威來自意識形態、絕對權力來自意識形態不可討論與批評的部分)在政治權力結構中都製造了個人獨裁。就意識形態如何把權威集中在個人身上而言,新一體化結構與傳統一體化結構有所相同。儒家意識形態是通過天命和倫常關係,把權威寄托到皇帝和家長個人身上的。在這種獨裁政治中,老皇帝駕崩,兒子取而代之,新皇帝新家長的權威仍得到倫常關係的支持,獨裁者個人的去世通常不會帶來權威危機和權力真空。但在新一體化結構中,黨的領袖之權威來自於他是意識形態的創始人、重大發展者,或者是中國魂的代表、道德倫理上的完人。他們去世時,意識形態往往不能把權威立即聚集到另一個個人身上,這時會出現權威真空。一般說來,黨內的民主集中制在這種時刻會起到某種作用,這就是所謂集體領導;如起不到作用時,黨會出現某種混亂。但是只要意識形態合法繼承人一旦出現,混亂馬上克服,民主集中制馬上又退回到舞台劇場中去了。無論從孫中山去世到蔣介石地位的確立,還是共產黨領袖更替過程中,都存在着上述現象。

註四 新一體化結構與傳統一體化結構同構的典型表現是官僚機構組織形態的類似,如果把國共兩黨建立的官僚機構、西方現代國家官僚機構以及中國傳統社會官僚機構三者進行比較,可以發現新一體化結構的官僚組織雖說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後建立,但它距離西方現代文官組織甚遠,但和中國傳統官僚系統十分相像。

西方文官系統是近代出現的,社會學家稱其為科層組織。據金

耀基概括，它有如下幾個組織上的特徵：第一，科層組織建立在工具理性之上，每一機構的組織結構都盡量根據其功能需要來設計，整個官僚機構着重專業分工。第二，科層組織中的官員必須具有專業知識和專業精神，他們以某種特定的專業職能部門的專業為終身職業，通過專業的文官考試，整個科層組織是專才型的。第三，科層組織和政治的鬥爭與權力之爭互不相關，他服從所謂技術性的超政治型模。不僅文官組織如此，連同裏面的官員也都不屬於某一黨派，具有「超政治」的職業角色^⑤。這三個基本特點在新一體化結構的官僚組織中都不存在，它具有與韋伯所講現代科層組織不同的特徵。我們可以稱之為非韋伯型官僚機構。

首先，支配國共兩黨官僚組織的都不是工具理性。黨的意識形態作為選官標準和官僚運作最高原則籠罩在專業分工和客觀理性之上，這一點和中國傳統社會官僚組織倒是相近的。

當選拔官員的首要標準是意識形態忠誠，其次才考慮專業時，現代科層組織的專才型結構必然在不同程度上遭到破壞。黨在組織政府時把意識形態內容(忠誠)作為文官考核升遷的第一標準，或者乾脆把不具有專才的黨的幹部派到各個不同專業部門去，採用外行領導內行的辦法。這時，整個官僚機構已不是專才型的，其組織構架是通才型(專業往往只是這些外行在領導中慢慢熟悉的東西和業餘愛好)。在科層組織中，不同專業的官員是不能調來調去的。但新一體化結構的官僚機構中真正的專才處於最下層，是被組織者，而在組織機構中流動成為骨幹的則為專業水平不高的通才或意識形態幹部。

官僚機構的骨架依靠意識形態幹部支撐起來時，行政組織自然

^⑤ 金耀基：〈中共「反科層的組織型模」：歷史的與比較的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2卷 第1期（香港：1977）。

和政黨血肉相聯，它不能與政黨和權力相分離。當執政黨更替時，原有行政系統不能整個地轉過來為新執政黨服務，它往往必須重新組合，甚至是打碎。北伐以後，南京國民政府初建時，還可以大規模接納北洋政府的行政系統，將其整個地納入國民政府結構，以致於有「軍隊北上、政治南下」的說法^⑤。這是因為北洋政府的官僚機構還不是一體化官僚組織，文官沒有甚麼意識形態色彩，可以整個地被國民黨新一體化官僚組織吸收。可是1949年共產黨取代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共產黨在政策上就規定了必須把國民黨全部官僚機構(警察、市政、稅收)打爛，那些和國民黨政治關係密切的官僚不是被開除就是被逮捕。處理事務必不可少的純技術性人員則被集中訓練，進學習班和軍政學校後，再調到新的部門使用^⑥，他們至多只是作為技術性元素重新編織進共產黨意識形態幹部管理系統中。而且，即使是這些純技術性舊職員，後來也還是大多被政治純潔的新幹部取代了。

新一體化官僚機構之所以不具備韋伯科層組織的特點，這是因為它的組織機制是意識形態認同。正如我們第四章指出的，現代科層組織的組織機制是規範認同，它的種種組織特點均可由規範認同推出。現代社會政治結構的權威來自憲法和規範，它必定以服從規範的工具理性為運作原則，其組織結構的設計一定根據職能分工和法律類別來設計，官員的選擇標準是熟悉本專業(法律和有關業務知識)程度之考核。新一體化結構中的官僚機構以意識形態認同為組織力。意識形態愈強有力，官僚機構組織方式就愈偏離工具理性，那些非韋伯型組織特點也就愈明顯。

⑤ 繆全吉：〈抗戰前十年行政系統的變革〉《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頁972。

⑥ 林代昭主編：《中國近現代人事制度》頁525（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89）。

我們若將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官僚組織作一宏觀對比，就能證明這一點。雖然國共兩黨的官僚機構均建立在意識形態認同之上，都屬於非韋伯型官僚機構，但二者偏離現代科層組織的程度是不同的。三民主義意識形態整合力遠比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來得弱，國民黨官僚機構在形式上還或多或少帶有某種現代科層組織之特點。而在共產黨1949年後建立的官僚機構中，意識形態取代工具理性、專才處於意識形態幹部的絕對支配之下等非韋伯型機構特點已發展到極端的程度。國民黨以黨治國的方式是讓行政隸屬於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政治委員會，行政院、省主席和高級政府官員由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任命，各級政府機構處於黨部的監督之下。這裏意識形態凌駕於工具理性之上，專才型文官服從意識形態型黨官已十分明顯。但是由於三民主義是弱意識形態，國民黨政府中仍實現了某種黨政分開。省及省以下政府並不隸屬於相應黨部的領導。地方黨部如想改變當地政府之決定，必須通過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政治會議才能做到。政府雖在黨的控制之中，但每一級機構並不和黨組織融為一體。在共產黨中，意識形態認同組織力遠比國民黨緊密和強大，它對政府的控制能力大到如此地步，以致於每一級政府機構均在相應黨組織領導之下，政府組織和黨組織實際上是融為一體的。意識形態已經徹底取代了工具理性。

共產黨官僚機構中，通才型幹部統治專業文官的程度也遠遠大於國民黨。國民政府的文官來源在理論上必須通過考試，即使是郵政這些遠離政治和權力的純技術性部門也不例外，考試內容除了專業外，也還都把意識形態內容放在首位。三民主義、國民黨一大宣言是必考的。在選拔文官的考試中加進意識形態內容，當然有助於官僚機構的意識形態認同，但考試本身卻使文官成為某種專業人才或技術官僚。因此國民政府省廳級官員中有相當部分是大學生和留學生，縣級官員中很多是來自中等文化程度知識分子。雖然文官考

試制度在三十年代並未很好貫徹，而且在文官選拔條件中都有為黨工作多少年就可以相當於某種學歷的規定，使得大量通才幹部進入文官系統。據統計，國民黨文官政府的七十多萬公務員中，真正考試合格選入的只佔3%^⑤。但是，國民黨官僚機構中專才畢竟還是佔了相當比例。共產黨官僚組織對意識形態認同的要求比國民黨更為嚴格，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之忠誠遠非考試所能鑑別，它只有從意識形態認同團體中進行選拔，因此，共產黨的官僚機構乾脆取消了文官考試。一切幹部的選擇、提拔、考察均由黨組織決定。直到本世紀八十年代，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系統的考試制度仍沒有可能建立，整個官僚機構仍是通才型的。

國共兩黨締造的官僚系統離現代科層組織的結構雖很遙遠，但和中國傳統社會的官僚政治卻很近。支配中國傳統官僚政治的也不是工具理性，而是儒家意識形態認同，因此它成為人類歷史上最龐大、存在時間最長的非韋伯型官僚機構。它不是專才型組織，作為技術人員的吏處於「君子不器」的通才——儒臣領導之下。整個官僚組織與宮廷政治密切相關，正如金耀基所說：「中國傳統的官吏，不論是偉大的卑劣的，無不自覺與不自覺地扮演了西方政治家或政客的角色」^⑥。表7.4列舉了現代科層組織、新一體化結構的官僚組織和中國傳統社會官僚的差別，從中可見，國共兩黨建立的官僚機構只是中國傳統官僚組織的某種現代變種。

註五 蔣介石把「禮、義、廉、恥」的道德實質歸為「犧牲小我、捨己利群、盡忠國家、盡孝民族」，用國家和民族代替了儒家盡忠孝

⑤ 林代昭主編：《中國近現代人事制度》頁225。

⑥ 金耀基：〈中共「反科層的組織型模」：歷史的與比較的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2卷 第1期（香港：1977）。

類型 性質	現代科層組織 (據金耀基概括)	一體化結構中非韋伯型官僚組織	
		新一體化結構	傳統一體化結構
組織原理	規範認同。文官由非政治性專業人員組成，實行專業考試制度選拔官員。	意識形態凌駕於任何規範與工具理性之上，在開放條件下為了保證意識形態認同，官僚機構在黨的控制之下，官僚機構主要成員來自意識形態政黨。	儒家意識形態認同，由於儒家文化的主導地位，只需要實行「舉孝廉」或「科舉制」。
組織結構	組織結構由管理功能需要決定，不同部門存在着明確分工，機構是高度專業化的。官員的職責是由專業分為「科」，不同專業部門和不同層之間不能踰越。「層」的制定亦由管理層次的需要而定，所有文官均為專才。	官僚機構分成二個不同部分，一部分為組織系統，它是建立在意識形態認同而非專業之上的機構，如黨委、黨部和「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海外工作部」，另一部分為專業機構，辦理管理業務，但專業機構和人員在意識形態機構和人員的領導或監督之下。「層」除了科層中為管理需要而設外，還要達到意識形態幹部控制專業人員之目的。官僚機構為通才型。	官僚機構由官和吏兩個不同的「層」組成。官是屬於「君子不器」的通才，他們是全國流動的，用意識形態認同組織起來，吏為辦事人員，不流動，在官的領導之下，官為通才型。
組織運作方式	組織運作照一套抽象規章而行，行政盡可能作為標準化和一致性。普遍性的規範和法律是組織運作原則。	意識形態高於行政規章制度，行政規章經常受意識形態制定的政策而改變。	廣泛運用儒家國家學說，在意識形態指導下靈活地執行法律，做到合情合理。

類型 性質	現代科層組織 (據金耀基概括)	一體化結構中非韋伯型官僚組織	
		新一體化結構	傳統一體化結構
組織 文化	工具理性。組織中的人在執行職務時，應該有一種鐵面無私的「超人情」的精神。不發怒不動情，此所以求取效率和公正。	只有在意識形態認同前提下，服從原則才是正確的，並受到獎勵。當意識形態和工具理性及行政規章衝突時，意識形態可以破壞機構服從之原則。那些服從規章而違背意識形態的官員被認為路綫鬥爭覺悟低。	泛道德主義普遍用意識形態肯定的道德價值來代替職業規範，用個人道德約束來形成規範和「禮」。
人員 升遷 原則	被組織僱用者純靠技術資格，有不受任意解職的保障，其升遷標準依資歷與成就，職員以其工作為終身之職業。	意識形態忠誠和路綫鬥爭覺悟（即在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內意識形態爭論中的立場）在官員升遷時高於技術資格。	道德和對皇帝的忠誠是升遷標準，在宦途中，道德名譽和對皇帝的忠誠比才能與貢獻更重要。

表7.4 一體化結構和現代科層組織官僚形態比較

的對象——「君」和「父親」。這種強調「民族」、「國家」至上的意識形態在某些方面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義的主張一致。三民主義儒家化的後果是變成一個在某些方面類似傳統但又帶法西斯主義傾向的新意識形態。蔣介石曾私下贊同「三民主義法西斯化」，只是在公開提倡時，將其改為「以三民主義為體，法西斯主義為用」^⑤。意識形態內容的變化立即影響意識形態認同團體組織方式。三十年代後，遺老遺少、傳統江湖幫會，甚至那些殘存的留長辮子穿馬褂的紳士

^⑤ 劉健清：〈國民黨法西斯主義的泛起與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建立〉《南開學報》第5期（天津：1983）。

都成為國民黨的發展對象。國民黨基層組織也變得更為鬆散，較大地偏離了列寧主義政黨模式。另一方面，三民主義儒家化更加接近法西斯主義，國民黨內部出現了類似法西斯組織，比如CC和復興社。蔣介石開始了法西斯特務統治。它也是國民黨進行社會動員時無組織力量大增長的原因。

註六 國民黨的官僚機構有多大？這是一個眾說紛紜、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本書採用的數據來自林代昭編的著作^⑥。70多萬人主要是指南京國民政府的公務員。1945年曾對公職人員進行五次檢核，其中甲種公職候選人及格人數為155,727人，乙種公職候選人及格人數為489,066人，兩者相加64萬餘人。在中國傳統一體化結構中，只有官僚拿國家薪俸，因此吃皇糧拿薪俸的人數大致就是官僚機構的人數。而在新一體化結構中，拿國家薪水的統稱為公教人員，其中除了作為官僚的文官外，還包括軍人、技術人員、教師等等。這個數目很大，1941年11月2日延安《解放日報》曾載文估計「當時全國軍警公務員為1,500萬人」，我們認為，其中真正屬公務員（文官）的，即使數目無法準確計算，大約也總在幾十萬左右。我們稱其為70萬只是為了說明，它大約是傳統社會官僚數目的十倍。

註七 三十年代，兩個省份由於其特殊的條件，可以把部分農村知識分子轉化為幹部，其基層社會也組織得較別的省份為好。這兩個省份是山西和廣西。山西省的特殊性在於，它受小學教育的人數是全國最高的。1923年，山西省受過小學教育的人達784,935人，佔總人口10,891,878人的7.2%。而其他省份如山東為2.5%，直隸為

⑥ 林代昭主編：《中國近現代人事制度》 頁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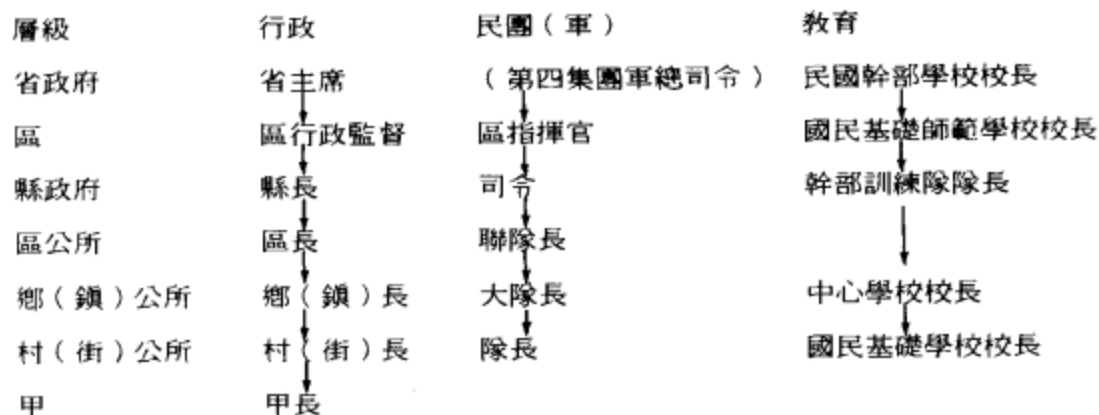
2.4%，陝西為2.3%，東三省為2.2%^{⑤7}。山西小學生比例在相當長時間里比其他各省高幾倍，閻錫山利用山西農村知識分子作為其管理基層的幹部相對容易一些。閻錫山將他們培訓成為區級長官，他們和中國封建社會官僚一樣，遵循不在家鄉工作的迴避制度。雖然幹部仍沒有深入到每一個自然村，但基層幹部相對較多，山西基層社會管理相對好一些，成為模範省。

另一個例子是廣西。從1930年開始，李宗仁等在廣西實行「三位一體」教育管理制度。當時廣西廣泛建立國民基礎學校，國民基礎學校不是一般的小學。普通小學生只是少年兒童，而國民基礎學校的學生包括兒童和成人。全省584,977名小學生中有相當多人可以經過訓練直接轉化為幹部。據統計，廣西當局在三十年代培養了三萬名以上的幹部。1933-1935年間，調訓鎮長萬人左右，其中高、初中畢業生為縣級幹部主要來源。縣以下主要靠國民基礎學校學生。每個村都規定要辦一個國民基礎學校。廣西的三位一體正是一種依靠中小學生建立一體化結構的機制(圖7.3)。民團幹部學校畢業生同時擔任民團隊長、鄉鎮村長，以及國民基礎學校校長和教員^{⑤8}。

山西、廣西兩省雖然是三十年代國民黨政權基層建設搞得最好的省份，但它也沒有可能把官僚機構伸入到農村最基層——自然村。農村中的土地問題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政府對農村的勸農、救荒仍不夠有力，甚至不足以阻止傳統農村的進一步解體。正如Diana Lary所說，廣西「民團」的作用，只是當年憑藉以重建八桂的「基本組織結構」，並無意推翻既成土地所有制，不能削減高利貸，

^{⑤7} 張玉法：《中國現代政治史論》頁164。

^{⑤8} 朱滋源：〈1930年代廣西的動員與重建〉《近史所集刊》第17期 下（台北：1988）。



取自朱滋源：〈1930年代廣西的動員與重建〉，《近史所集刊》，第17期下（台北，1988）。

圖 7.3 廣西省「政—團—教」關係圖（1936年前後）

地方政府在實現三民主義改革方面，僅限於表面文章⁵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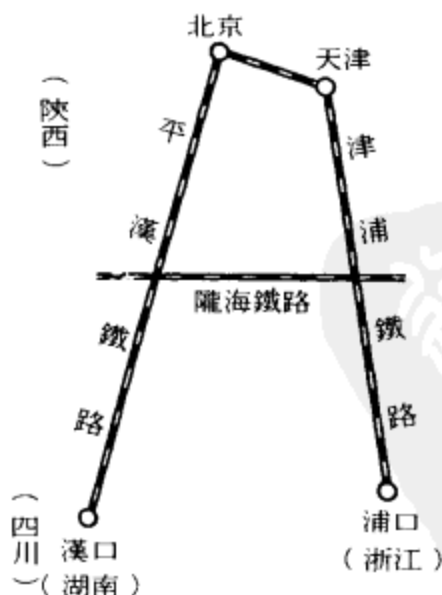
註八 張仲禮曾對「一次大戰時期為中國資本主義黃金時代」這一幾乎被視為定論的觀點提出質疑。他從各種經濟史資料研究中發現，中國民族資本在二十年代有着重大發展，直到三十年代才出現停滯。例如棉紡業1910—1919年建廠為十三家，而1920—1929年則為四十五家。絲織業二十年代增長幾乎與1910—1919年相差不多。卷煙業二十年代中職工人數增長213%之多，橡膠業到二十年代後期才達「全盛時代」。火柴業、機器工業、針織業、水泥業、煤球業都存在類似情況⁶⁰。張仲禮的研究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證據，中國城市

⁵⁹ Dia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⁶⁰ 張仲禮：〈關於中國民族資本在二十年代的發展問題〉《社會科學》第10期（上海：1983）。

經濟在意識形態更替時期(即傳統一體化解構但新一體化結構未建立)，也就是1911-1928年間獲得了長足進展，中國經濟結構就是在這段時間內成長為由地主經濟與依附型資本主義經濟之混合形態。

註九 在軍閥時代的後期，已日益顯示出以通商口岸為基地的城市經濟之重要。哪一個軍閥部隊能更多地獲得城市經濟的支持，它就能壓倒其他軍閥，在割據中佔壓倒群雄的首腦地位。張玉法指出，軍閥爭奪天下大多都是圍繞着津浦、平漢與隴海鐵路組成的A字形地區(圖7.4)展開的。北京軍閥控制這A字形地帶就佔了中心位置。為了鞏固A字形地帶，又必須爭奪陝西、四川、湖南、浙江等省的



取自張玉法：《中國現代政治史論》，
頁152-153（台北：東華，1988）。

圖7.4 軍閥爭天下所圍繞的A字形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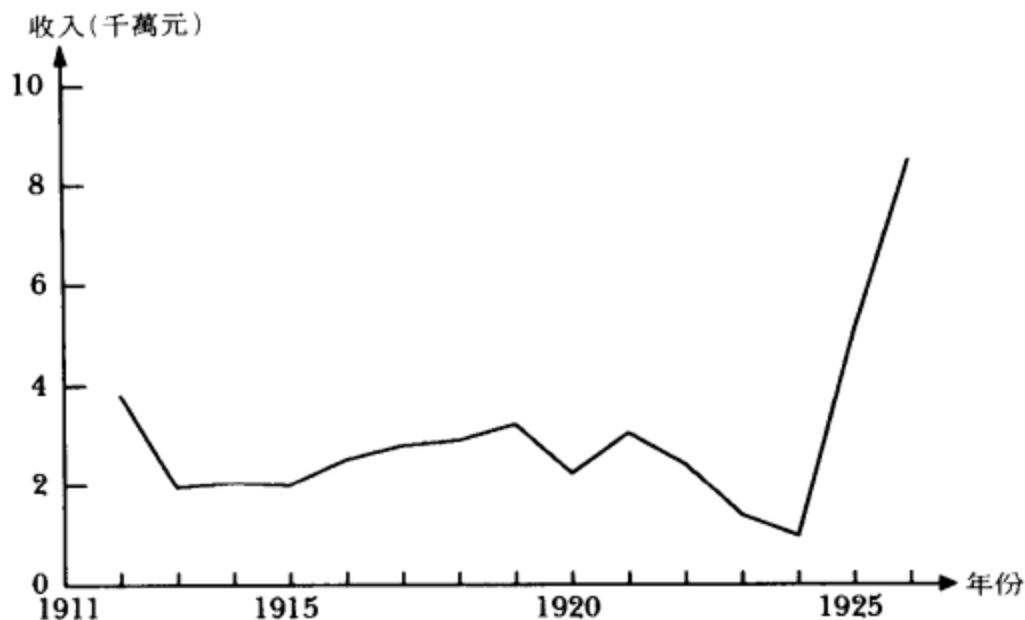
控制權。這些省份常成為中央軍閥與地方軍閥之交戰地帶^①。A字形鐵路恰好是當時中國最大城市之間的主要交通幹線。這裏，已經反映出二十世紀新興通商口岸經濟對統治中國具有愈來愈明顯的重要性。蔣介石佔據中國當時最現代化地區，無疑是國民黨統一中國的基礎。

註十 必須注意，軍閥雖然也在城市裏建立政府，但不能系統動員城市經濟資源。只有建立新一體化結構才能做到了軍閥政府不可能做到的事：如使地方各級財政稅收脫離軍人的控制，軍、政、財三類組織統統在黨的領導之下。我們可以用政府財政收入的變化來說明新一體化結構建立與國家具備動員城市經濟能力之關係。

圖7.5為1911年至1926年廣東省的財政收入曲線圖。從圖可見，自民國元年傳統一體化解構以來，省庫收入一直在下降之中，到1924年下降到最低水平——不及1912年的四分之一。1925年廣州國民政府剛剛成立，國民黨中央就任命宋子文創立並領導中央銀行，通過黨的力量建立銀行信用，掌握了廣東金融。廖仲愷主管財政組織整頓，他依靠黨組織堅決和地方強行截留稅款作鬥爭，建立了統一稅收的財政管理。財政收入立即大幅度增長，1926年達84,822,000元，其中有81,863,000元來自稅收，它幾乎達到民國元年的四倍^②。它證明，1925年後，政治結構已逐步和經濟結構建立互相調節的耦合關係，政治實體已可利用經濟系統的資源支持，軍紳政權中政治結構與經濟結構不能良好耦合的弊病被克服。也正是這一條件保證了國民政府的北伐，能以一省弱小的實力和全國軍閥相

① 張玉法：《中國現代政治史論》頁152-153。

② 李國祁：〈宋子文對廣東財政的革新(1924-1926)〉《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據王正華：《國民政府之建立與初期成就》提供數據繪製，頁197、202
(台北：商務，1986)。

圖7.5 廣東省財政收入的變化(1911-1926)

抗衡，並且取得了勝利。

但是國民黨建立的新一體化結構卻是以城市為基地，它不可能把力量滲透到廣大農村，從農民中獲得稅源。因此，資本家、商人、城市居民成了主要稅源。

表7.5為1925-1926年度廣州國民政府的收入結構。從中可以看到公債收入佔了30%以上，商業稅(釐金，加上鹽稅、印花稅和其他與商業活動有關稅收)為35%以上。公債和商業稅基本上都由城市商人和民族資產階級提供，農業稅只佔3.76%。它表明，為了政治結構能得到經濟結構有效的支持，兩者保持良好耦合，就一定要保護城市商人資產階級的利益不受群眾運動侵犯。正因為如此，國民黨一向主張城市工運應緩慢進行，在大革命期間，中央全會決定應全力推行的只是農民運動。

項 目	全年收入總數 (元)	平均每月收入 (元)	佔整個財政收入 (%)
釐 捐	11,895,000	991,250	14.83
籌餉(賭稅)	11,550,000	962,500	11.40
鹽 稅	8,915,000	742,917	11.12
雜 稅	4,016,000	334,667	5.01
禁煙(鴉片稅)	3,450,000	287,500	4.30
印 花 稅	3,042,000	253,500	3.79
田 賦	3,018,000	251,500	3.76
雜 項	2,773,000	231,083	3.46
煙 酒 稅	2,443,000	203,583	3.05
煤 油	1,798,000	149,833	2.24
稅 外	1,619,000	134,917	2.02
沙田稅收	664,000	55,000	0.83
爆 烈 品	458,000	38,167	0.57
關 稅	275,000	22,917	0.34
公 債	24,283,000	2,023,583	30.28
總 計	80,199,000	6,683,250	100

取自李國祁：〈宋子文對廣東財政的革新（1924-1926）〉，《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下）（台北：近史所，1986）。

表 7.5 1925-1926 年度廣州國民政府的收入

註十一 據王業鍵估計，1934年中國農村，土地兼併已相當嚴重。地主僅佔全體農戶數的3%，卻擁有26%的耕地，富農佔全部戶數的7%，也佔有27%的耕地。中農佔總戶數的22%，佔地25%。而

戶數是68%的貧農，只佔有22%的耕地。當時農村地租大約是農產量的40-50%^⑬。

註十二 我們可以形象地看一下國民黨六大有關土改決議貫徹的結果。根據《農地改革方案》，國民政府通過國家徵購土地的辦法向地主買回土地，以扶植自耕農，但直到1948年，國民政府扶植的自耕農也不過才有30,786戶，農地面積為863,063畝，加上整個抗戰時期扶植的自耕農48,525戶，農地面積1,176,186畝，這個數目是這樣微不足道，它還不如共產黨在一個縣實行土改所取得的成果^⑭。

註十三 1928年新一體化結構剛確立，政府就設立全國建設委員會，控制首都附近幾家發電廠及煤礦，並着手建設淮南煤礦，修築淮南鐵路。1932年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1933年全國經濟委員會實施「經濟統制」，設立棉業、糧食、煤業、蠶絲等統制委員會，並開始建立各省公路。1934年設中國建設銀行，投資川黔鐵路。1936年，實業部聯合南方六省組成中國植物油料廠股份有限公司，壟斷桐油出口。1935年國防設計委員會改名為資源委員會，隸屬軍委會，其干預經濟行政權不斷擴大，成為官辦企業的大本營。抗戰前，它已控制80%以上的鎢、錒的生產和運輸，並擬訂了重工業建設的五年計劃。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到，一體化結構的建立會不可避免地促使官辦企業的發展。一方面一體化結構需要官辦企業，另一方面它又有能力干預經濟，在集中人力物力方面具有優勢，可以在

⑬ 王業鍵：〈近代中國農業的成長及其危機〉《近史所集刊》第7期（台北：1978）。

⑭ 崔紅星：〈簡析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的土地政策〉《史學月刊》第4期（開封：1986）。

經濟結構中締造國家資本與官營工業。這進一步證明新一體化結構與傳統一體化結構同構，差別僅在於在傳統一體化結構中，官辦手工業佔經濟比重很小。而在新一體化結構中，官辦企業有無限膨脹的可能性。

註十四 抗戰時期國營企業比私人企業生產力要低，一個有代表性的數據是官營企業的實際生產能力和它擁有的資本極不相稱。表7.6是1939-1942年大後方主要工礦產品產量。我們可以看到，其中

產品	1939			1940			1941			1942		
	總產量	其中民營 工業產量	%	總產量	其中民營 工業產量	%	總產量	其中民營 工業產量	%	總產量	其中民營 工業產量	%
電力(千度)	91,494	81,885	89.5	111,931	100,814	90.1	123,302	110,156	89.3	136,850	112,834	82.5
煤(千噸)	5,500	5,308	96.5	5,700	5,394	94.6	6,000	5,483	91.4	6,314	5,567	88.2
生鐵(噸)	62,730	62,730	100.0	45,000	42,506	94.5	63,637	59,200	93.0	96,000	82,532	86.0
鋼(噸)	1,200	1,200	100.0	1,500	1,500	100.0	2,011	1,895	94.2	3,000	1,494	49.8
工具機(台)	639	639	100.0	1,024	902	88.1	1,221	1,148	94.0	1,147	1,011	88.1
水泥(桶)	48,794	48,794	100.0	50,479	50,479	100.0	25,429	25,429	100.0	39,843	39,693	99.6
硫酸(噸)	124	124	100.0	428	428	100.0	453	453	100.0	689	666	96.7
鹽酸(噸)	72	72	100.0	151	151	100.0	130	130	100.0	300	300	100.0
碱(噸)	940	940	100.0	1,486	1,486	100.0	2,079	1,960	94.3	2,263	2,112	93.3
酒精(千加侖)	812	532	65.5	4,590	3,921	85.4	5,408	4,110	76.0	7,885	5,489	69.6
機製紙(噸)	526	526	100.0	660	660	100.0	4,200	4,200	100.0	4,250	4,250	100.0
面粉(千袋)	1,926	1,926	100.0	3,239	3,239	100.0	4,510	4,510	100.0	4,880	4,880	100.0
棉紗(千包)	27	27	100.0	30	30	100.0	112	112	100.0	114	114	100.0

取自黃逸峰等：《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頁527（江蘇：古籍，1990）。

表7.6 1939-1942年國民黨統治區重要工礦產品產量

絕大多數產品的80%以上產量居然均由資本遠比國家資本小的私營企業提供。

註十五 在一體化組織中當國家資本與私營資本共存時，就存在着國家官員借手中權力將國家資本轉化為私人資本的可能性。顯然，這種轉化是與官僚機構腐敗聯在一起的。據易勞逸(Lloyd E. Eastman)研究，1932年上海匯豐銀行有21個儲戶擁有至少2,000萬元的存款，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是官吏和官吏的親屬。1931年到1937年監察院處理的案件中涉及到貪污官吏達69,500人，而該院僅收到1,800人的起訴書，在這1800個案件中，只有268人被法院或其他紀律機構判定有罪，268人中有214人根本未受任何懲戒，41人僅受到很輕的處罰，如減少其十分之一的工資等；只有13人是真正被罷了官的^⑤。目前沒有充足的數據表明在三、四十年代，南京國民政府所掌握的國家資本有多少轉化為官員的私人資本。原先有些學者認為國民政府所有國家資本都屬於四大家族私產，這顯然是不正確的。一般說來，抗戰前，國民黨還不太腐敗，化公為私的財產不算多。但到抗戰後期，特別是在抗戰勝利接受日偽資產時，有相當多的國家資本轉化為官僚私人資本，國民黨的腐敗這時已相當嚴重。據統計，四大家族控制的中、中、交、農四大銀行和中央信託局、郵政儲金匯業局(即四行二局)所控制的外匯與黃金，1940年只佔全國總數的1%，1942年增加到16%，到1945年6月竟高達75%^⑥。

^⑤ 易勞逸(Lloyd E. Eastman):《流產的革命: 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 陳謙平、陳紅民等譯 頁28-30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2)。

^⑥ 胡德坤:《中日戰爭史(1931-1945)》 頁399。

第八章 中國共產黨的興起

詩人曾說，寫詩是為了讓歲月顯形。我們所做的理論分析，無非是讓那些導致這個古老偉大民族走向超級官僚社會的組織基因顯現出來。

8.1 共產革命怎樣與中國農村關聯

中國共產黨的不斷壯大並最後取得政權，是人類近現代史上最富傳奇性的故事。早在1928年秋天，毛澤東住在井崗山一座簡陋的八角樓上時，就開始提出共產黨立足的理論根據。當時中國共產黨正值生死存亡之秋。國民黨「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殘酷的大屠殺，使共產黨員損失90%以上，共產黨在城市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它控制的少數軍隊發動了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想重新佔領廣東革命根據地，恢復大革命的大好形勢，但被國民黨優勢兵力擊潰。殘餘部隊和毛澤東領導的農民武裝在井崗山會合。在實現會合之前，毛澤東聯合了當地綠林好漢袁文才和王佐，只有一千多人，幾百條槍，開始了被國民黨視為流寇、實際上卻類似於農民起義軍的生涯^①。當時，中國幾乎沒有人能夠估計到，僅僅過了二十年，共產黨居然會擁有幾百萬軍隊，迅速建立一個龐大的現代政權。就在1928年共產黨處於被消滅邊緣的重重黑暗中，毛澤東卻充滿信

^① 施拉姆(Stuart Schram):〈毛澤東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和這個世界》頁27 (廣州:花城出版社,1989)。

心，他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甚麼能夠存在？〉這篇後來被認為是中國式革命道路起源的文章中，把農民武裝稱為紅色割據。他一眼看出國民黨統治有兩個不可克服的缺陷：一是不能建立鐵板一塊的強大中央政府，二是不能控制廣大農村。共產黨只要深入農村，舉起土地革命大旗，巧妙地利用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革命根據地就可以在國民黨控制力薄弱的地區生存，在派系鬥爭裂縫中壯大。

毛澤東確實獨具慧眼，紅色根據地的出現和發展，恰恰是基於國民黨是弱一體化整合模式。1929年和1930年，國民黨內部嚴重分裂，北伐中收編的軍閥部隊再次和蔣介石爭天下。李宗仁、馮玉祥、唐生智、閻錫山的部隊與蔣介石的中央軍殺得難分難解，天昏地暗。正是利用蔣介石無力分身對付共產黨的機會，紅色根據地在湖南、廣東、江西、湖北農村中大發展。到1930年，全國紅軍已有十萬人，建立大小根據地十五塊。這時蔣介石依靠手中握有黨軍實力壓服了群雄，從內爭中騰出手來，立即對紅色根據地發動進攻。蔣介石共組織了五次圍剿，規模大的是第三次和第五次。在第三次圍剿中蔣介石親臨南昌，調動十三萬軍隊，但因汪精衛、李宗仁等反蔣勢力已聚集於廣州，另立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軍不得不再度回師，把主要精力用於對付內部整合。1933年，蔣介石平息內部紛爭，又動員八十萬兵力，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②。紅軍雖無法正面抵擋國民黨進攻，但卻可以進行戰略大轉移，到更為偏遠地區去開闢新根據地。在第五次圍剿中紅軍損失了90%以上的力量，不得不放棄中央蘇區，開始長征，但仍完成了革命根據地從南方轉移到西北的任務。共產黨曾用「東方不亮西方亮，丟了南方有北方」來概括當時的形勢。而名為統一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其有效控制的

^② 關於國民黨軍隊圍剿紅軍的人數，大陸和台灣的學者有不同的說法，我們這裏採用的是張玉法在《中國現代史》中的數字，見該書頁425—427。

地區只限於東南沿海省份、通商口岸等大城市，對於西北、西南，只能靠收編當地軍閥來維持形式上的統一，控制力其實並不強。以中國之大，在南京政府鞭長莫及的邊遠地帶建立革命根據地，邏輯上總是可能的[註一]。只要國民黨的壓力一減輕，共產黨就會依靠農民革命作為動力，武裝規模亦日益增大。因此，國民黨雖然率先實現統一，卻並不能消滅共產黨，共產黨作為潛在競爭對手一直存在着。

然而，國民黨沒法消滅共產黨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共產黨可以取代國民黨。三十年代的中國存在着多種政治力量。西北、西南還是軍閥的天下，地方政府本來就好像獨立王國。即使在農村中，也不是只有共產黨一種組織。華北農民自己組織的紅槍會就曾發展到數十萬人的規模。國民黨不可能消滅形形色色的反對派，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這些反對力量能取而代之，成為中國社會的整合者。

任何一種反對勢力要取代國民黨，必須要建立比國民黨整合模式更具動員力的社會結構。有人根據國民政府機構的編制，計算了一下它真正深入管理農村一共需要多少幹部，其結論是：全國共需甲長640餘萬人，保長77萬餘人，副保長及保幹事約300餘萬人……總計所需人員約1,118.7萬餘人^③。也就是說用官僚機構來實現社會上、中、下三個層次的整合，總共需要上千萬的幹部。共產黨雖在意識形態上比國民黨強而有力，但要建立一個如此龐大的官僚機構，就要面對國民黨同樣的困難：到哪裏去尋找人數如此眾多的社會組織者？國民黨三十年代統一中國可謂不遺餘力，但到頭來只能建立一個倒金字塔型的一體化結構，這個事實本身已反映出中國社會整合結構性的困難。日益嚴重的城鄉對立的局面意味着農村的脫

^③ 張厚安、白益華主編：《中國農村基層建制的歷史演變》 頁156（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序。表面上看，似乎可以成為社會組織者的階層基本上都跑到城裏去了：新知識分子居住在城裏，資本家、商人、大地主也生活在城裏，以他們為對象所建立的黨派，也只能立足於城市。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雖可以訓練工人作為幹部，但工人也生活在城裏。中國產業工人如同知識分子一樣稀少，即使完全將其轉化為幹部，能否形成一個廣泛深入農村之金字塔組織，也是大可懷疑的。

共產黨要實現廣大農業社會的整合，只有一種選擇，這就是把農民轉化為農業社會的管理者。但是，這又怎麼可能呢？幾千年來，農民只是被組織者，傳統社會是靠地主鄉紳自治和宗法家族來整合農村基層，一旦失去了儒生和宗法家庭，農民似乎是不可能建立基層組織的。眾所周知，傳統社會的農民起義軍很少建立根據地，即使形成某種割據局面，也很難在農村建立穩定的基層政權。太平天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雖然它定都南京，建立了農民政權，但太平軍得不到儒生認同，基層缺乏紳士的支持，這樣，它一直無法確立穩固的農村秩序，軍隊也難以得到可靠的賦稅來源[註二]。可見，在傳統社會中，農民起義軍要得天下，也不能依靠農民建立農村基層組織，只能用儒生恢復一體化結構。

中國傳統小農之所以不具備組織性，是因為他們長期生活在宗族家庭結構中，這種生活方式使他們缺乏獨立參與社會活動的熱忱。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方式無疑和傳統一體化結構以宗法家庭為農村最基層的組織互相維繫。近代傳統一體化的解構，同時也是農村失去組織的過程。三十年代，鄉村無組織狀態帶來的危機已引起社會普遍關注，形成了發軔於民間的鄉村建設運動。平民教育派代表人物晏陽初用「愚」、「窮」、「弱」、「私」四個字來概括農民的「不能團結、不能合作」。鄉村建設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提出的文化失調論也是企圖論證：中國農民一旦失去以家庭倫理為紐帶之組織，就會陷於無組織的混亂狀態。以陶行知為代表的鄉村生活改造派試

圖把鄉村農人分成若干團體，從事軍事、生產、科學、識字、民權、生育六大訓練，以期做到以農人的團體力量保護農人的生命。當時的中國社會確如一棵病樹，作為樹幹之城市還有活力，農村基層組織本是大樹的無數細根，但在傳統一體化解體後，這些細根已處於無可救藥的腐爛狀態。共產黨如果要把紅色割據轉化為中國社會的整合力量，就必須具有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魔力。這就是把農民轉化為基層社會的管理者，以解決傳統一體化解構帶來的農村基層社會整合之難題。

用農民為幹部實現社會整合，有兩個前提，第一，農民必須突破家庭的框架，接受不同於家族的基層組織形態，並具有某種社會管理之參與熱情。只有農民素質發生變化之後，才可能依靠農民幹部來組織鄉村。第二，社會整合必須使上、中、下三個組織層次的管理者均來自於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共產黨管理社會上層和中層可以依靠從知識分子和工人中發展的黨員，為了建立龐大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就必須吸收大量農民入黨。除了農村中出現一個類似於無產階級那樣的階層之外，還需要獻身於共產主義革命的知識分子再次走向農村，使馬列主義變成農民喜聞樂見易於接受的形態，特別是中國共產黨要把在農村建黨作為有意識的行動。這一切都需要一系列經濟、政治和文化變遷。本章將依次討論用農民為幹部實現社會整合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終於取代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正是這些前提被歷史創造、積累和綜合的結果。

8.2 貧農經濟與農村建黨

毛澤東早期在幫助國民黨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的生涯中，已經

覺察到中國農民並不是那麼缺乏對社會管理的參與熱情的。農民中正在產生一種新成分，他們可以成為管理農村的基層幹部。事實上，近一百多年來的歷史變遷，特別是傳統一體化的解構本身就是一種動力，使中國傳統自耕農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有所改變，農村中正在產生一個類似於城市無產階級的階層。這一切都造成傳統小農素質的基本變化，問題在於能否發現和利用這種變化。

最先衝擊傳統小農組織上封閉性的是人口爆炸。在相當長時間中中國傳統社會人口都在一億以下（也有學者指出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億），但在清朝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大增長[註三]。1794年人口達31,300萬，1850年前後進一步上昇為43,000萬。在十九世紀後期和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一直保持在四億水平④。人口爆炸的長期效應是農村勞動力過剩。帕金斯(Dwight H. Perkins)估計，從明初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國人口增加了七至九倍，而耕地面積擴大不到四倍⑤。本來中國人均耕地面積遠比西方少，到十九世紀，人均耕地面積差不多已達到不能再減的極限狀態。清初每人平均約有十畝耕地，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就下降到二畝多⑥[註四]。

勞動力沒有大量剩餘時，農民的社會活動很難越出家庭框架。無論是自耕農還是佃農，均以一家一戶為基本生產單位。農民通過族長、紳士和國家官僚機構打交道，本身很少產生橫向聯繫。社會產生大量剩餘勞動力，就為農民越出家族組織框架提供了條件。顯然，剩餘勞動力的一個重要出路是手工業品生產。隨着農村剩餘人口增多，很多家庭變成半農半工，大量剩餘人口從事副業，農村家

④ 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頁275。

⑤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頁8。

⑥ 蔡少卿：《中國祕密社會》頁5（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庭成為手工業品的主要生產者，甚至導致手工作坊無法和家庭手工業競爭而衰落[註五]。大量農村家庭半農半工，以及農村成為手工業品主要供給者這一事實，使自耕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發生重要變化。他們雖然在農業生產中仍自給自足，但家庭手工業迫使他們和市場發生關係，他們的行為有點像以家庭為單位的工人。施堅雅於1949年在成都東南二十五公里集市高店子所作的調查表明，當地一個小農到五十歲時，在基層集市趕集已達3,000次，他與該共同體每一戶男子平均至少在同一街道上碰面1,000次^⑦。這種狀態自人口大膨脹以來早已經形成，它表明人口壓力迫使農民社會活動越出家庭框架。它們不僅能接受傳統宗法家族作為基層組織，也可能接受以村幹部為管理者的地域性基層組織模式。

人口壓力的第二個結果是自耕農向身兼小農和類似於半無產者的臨時短工雙重角色轉化。農村中有大量剩餘勞動力時，土地兼併就開闢了另一種可能性。過剩勞動力愈多，僱工愈便宜[註六]，當勞動力便宜到一定程度，利用僱傭勞動組織商品糧和經濟作物生產可以比出租土地的收益更多，甚至某些精明的佃戶只要從地主手中轉租大量土地，親自管理僱工耕作，他就能從中獲利。一種基於僱工和半僱工的農業在農村中崛起。

如果僅僅有大量可供僱傭的廉價勞動力，而不存在着勞動力僱主，那麼土地兼併只會造成流民和無業遊民，非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仍不會出現。甲午戰敗之前傳統一體化沒有解構，農村中的縉紳地主頑固地保持着租佃地主之生活方式，人口過剩和土地兼併並沒有把大量農民轉化為出賣勞動力者^⑧。中國廣大農村充斥着無業遊

⑦ G. William Skinner (施堅雅): "Marketing and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4 (November 1964).

⑧ 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 頁268-272。

民，他們成為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的後備軍，也是晚清祕密結社空前發達的原因^⑨。甲午戰敗後，一體化結構逐步解體，紳士城市化使得租佃地主的勢力在農村衰退，而經營地主和富農趁勢興起[註七]。宗族關係的鬆馳使得宗族已不是把有地和無地農民聯繫在一起的經濟實體，它不再對農民外出當長工和短工構成束縛。中國農村生產方式出現了偏離傳統的變化，一種具有租佃地主、二地主、經營地主、富農、僱農、半出賣勞動力的佃農和自耕農多種成分混合之農業經濟結構應運而生。它和傳統地主—自耕農經濟最大的不同是：這種經濟結構比地主—自耕農經濟能提供更多的商品糧，出賣勞動力使自耕農、半佃農轉化為一種和中國傳統社會小農具有不同心態及生活方式的社會階層。僱工在地主家幹活，他們大多沒有家庭，從宗法家族中游離出來。而靠半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半自耕農雖有家庭，但耕作的土地不足維持生活，不得不在白天和農忙時外出找工作做，並不時地變換僱主，晚上或剩餘時間在家耕作。這種生產和生活方式十分類似於城市的無產者。當人均耕地少到自耕農也不足於養家糊口時，半自耕農和佃農急切想恢復到自耕農地位的願望也會受到挫傷，他們生活在沒有出頭機會的貧困中，發家致富或憧憬男耕女織的小康之夢也粉碎了。不斷外出打短工使他們一反傳統農民不善於社會交往的心態，農村中出現了一個生活狀態和生產狀態類似於城市無產者半無產者的階層。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甲午以後中國農業結構的變化。人們常談到1895年後各種類型的經營地主和富農經濟日趨繁榮^⑩。1930年代，

⑨ 蔡少卿：《中國祕密社會》頁4-5。

⑩ 劉克祥：〈試論近代北方地區的分益僱役制〉《中國經濟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7）；景甦、羅崙：《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

河北保定富農佔總農戶的8%，但佔地達27.9%；河南輝縣富農佔人口的8.08%，佔地20.6%；江蘇無錫及廣東全省等南方農村富農較少，分別只佔5.6%與4%，但佔地也達17%和13%^①。據王業鍵估計，1934年富農大約佔全國農戶的7%，但擁有總耕地的27%^②。經營地主不同於傳統的紳土地主，這些人大多沒有文化，在農村只有經濟力量（佔地一、二百畝），而無政治勢力。他們親自經營，僱傭農民耕作土地，和富農一樣不斷促使農村中僱傭勞動力成分增長。本來中國農村中僱農一直較少，但到三十年代僱農已成為農業經濟中不可缺少的成分。

表8.1為各個地區僱農所佔的百分比，他們差不多佔農業人口的10%。況且，僱農只是農村中龐大的僱傭勞動力的冰山一角，大多數臨時僱傭勞動力來自於自耕農和半自耕農。一份調查報告指出，在南方農村中對僱工的需求大多來自富裕中農和富農，他們不

1933年調查地區	調查處數	調查人口	僱農數	佔農業人口百分比
長江流域	112	91,214	8,455	9.27%
珠江流域	50	74,820	6,082	8.13%
黃河流域	192	228,361	25,070	11.41%
總計	354	394,395	40,607	10.29%

取自陳廷煊：〈近代中國農業僱傭關係的封建性〉，《中國經濟史研究》，第3期（北京，1987）。

表8.1 三十年代僱農所佔的比例

- ① 何均：〈舊中國農村中的幾種經濟關係〉《近代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3）。
- ② 王業鍵：〈近代中國農業的成長及其危機〉《近史所集刊》第7期（台北：1978）。

能像經營地主那樣請長工到自己家中，而只有在農忙時僱臨時幫工，中農僱傭的臨時工比富農多，富農用臨時工比地主多^⑬。山東省的大多數短工都是自耕農與半自耕農^⑭。黃宗智曾以河北、山東農村三十年代實例調查為根據，指出當時中國農村實際上已進入一種小農身兼農業工人、自耕農(佃農)和各種傭工多重角色的經濟狀態，他稱之為「貧農經濟」。據他研究，河北和山東總耕地面積約16%是靠僱傭勞動力耕作的，12.5%的農戶家中有人出外當長工，36.2%的農戶有人出外打短工^⑮。他不僅論證了經營地主和僱傭農業勞動相當普遍，還從社會經濟學角度證明這種貧農經濟具有蔓延性，即隨着土地兼併和商品經濟滲透，出現的不是傳統社會之自耕農轉化為佃農和流民，也不是自耕農、佃農完全轉化為僱傭勞動，而是愈來愈多的小農被捲入身兼半自耕農(佃農)和傭工的雙重角色。黃宗智將其稱為「內捲化」，即「貧農被困於同時依賴家庭式農作和傭工來求生，無法擺脫其一，又不得不忍受兩者所賦予的低於維持生活所需的收入。他們的廉價勞動，又轉過來支撐着一個寄生性的地主制，和一個停滯的經營式農業」^⑯[註八]。黃宗智試圖用「內捲化」來證明為何土地兼併和商品經濟發展不能引發中國農業向資本主義過渡。我們則認為，貧農經濟中愈來愈多小農捲入身兼自耕農(半自耕農)和無產者雙重角色無疑提供了一個證據，這就是中國農業結構的變化已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了社會學家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情景」。愈來愈多的自耕農轉化為類似於城市無產者的地位，生活不斷貧困化。只要在理論上把他們等同於城市工人無產階級，共產黨就可以在農村中大發展。

^⑬ 陳荷夫：《土地與農民》 頁23-24（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⑭ 景甦、羅崙：《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 頁127-128。

^{⑮⑯}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頁81、83、210-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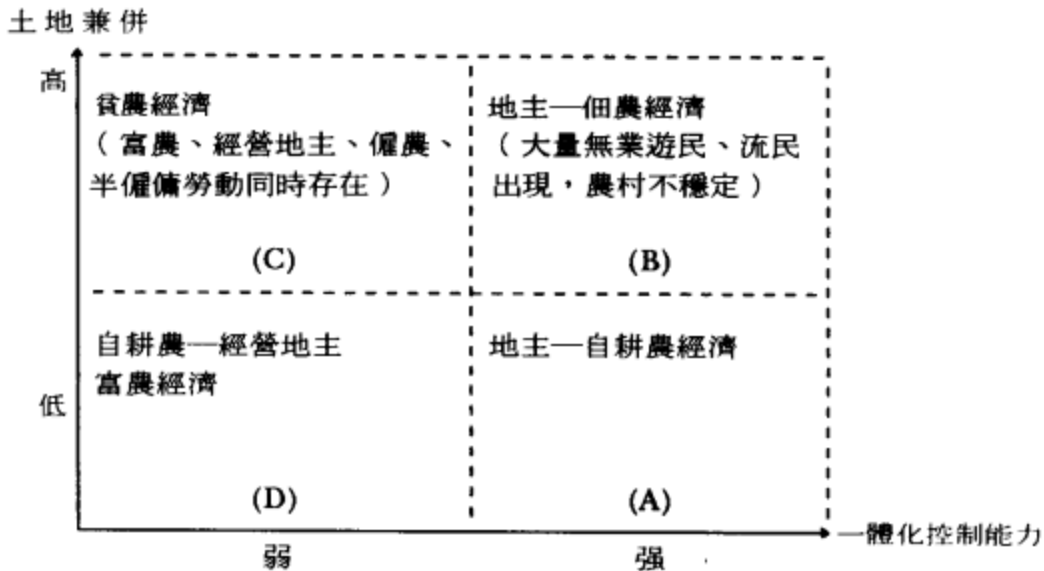


圖8.1 貧農經濟的形成

這種變化可以表示為圖8.1，如果把土地兼併程度簡化為大、小兩個狀態，一體化控制能力也分成強弱兩種狀態，它們的組合就代表了人口壓力下四種農業經濟結構。A是一體化未曾解體，土地兼併程度不高條件下的農業經濟，它相當於十八世紀中葉的典型傳統農業結構：地主—自耕農經濟。B為一體化未曾解體，土地兼併程度高的情況下之結構，它相當於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前夕的農村狀態。由於農村中沒有足夠勞動力僱主，自耕農失去土地後就不能被農村吸收，大量無業遊民出現，農村極不穩定[註九]。D為一體化解體，但是土地兼併程度不高的狀態。這時經營地主出現，租佃地主仍佔主導地位，農村中存在自耕農、經營地主、租佃地主等多種成分，農業提供的商品糧數量增加。而C代表土地兼併嚴重，一體化解體條件下之經濟結構，這就是貧農經濟。1860年到1920年這六十年間，中國農村經濟結構出現了從A到D再到C之轉化[註十]。它是人口壓力條件下土地兼併和一體化解體這些因素綜合

推動的結果。因此，當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共產黨進入農村時，歷史已經為共產黨準備了歷代農民起義軍都未曾碰到過的局面：人口壓力已使農戶可以接受一種不同於宗族的基層組織，而且農民中相當一部分已不是傳統小農，有可能成為社會組織者。共產黨只要認識到這一點，有意識地在這一階層中吸收黨員，一個龐大的以農民為對象的意識形態認同團體就能形成。共產黨也可以實現對一個遼闊農業社會的整合。

8.3 馬列主義儒家化

1930年代中國農村逐步向貧農經濟轉化並不是秘密，鄉村建設派知道，國民黨也知道，但沒有人將其視為一種新組織形成的基礎。就連當時在農村搞武裝鬥爭的共產黨也是這樣。1927年共產黨剛進入農村時，它的指導思想是新文化運動中知識分子認同的馬列主義。馬列主義是適合在城市知識分子和貧困無產階級中傳播的意識形態，無論它的建黨理論，還是奪取政權建立理想社會的模式，都不重視農民和農村。顯然，外來的馬列主義不適合中國貧農和農村知識分子的思想方式，也不能把在農村建黨以奪取政權作為自覺行動。因此，要以貧農為對象建立強大的意識形態認同團體，除了農民變得有點像無產者之外，馬列主義本身也要作重大修改[註十一]。

首先，要把貧農當作建黨的基本磚塊，馬列主義就必須修改無產階級的定義。在馬克思那裏，無產階級的先進性和革命性並不在於他們最窮，甚至也完全不是他們出賣勞動力，而在於他們是最先進生產方式的代表，相反農民卻代表了一種落後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列寧主義又把共產黨定義為無產階級先鋒隊，而無產階級的定

義已從本質上規定黨應以哪些人作為發展對象。根據這一定義，農民必須被改造，他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一樣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1927年前，中國共產黨是按正統馬列主義發展自己組織的。他們主要從事工運，在城市工人中發展黨員。相反，倒是國民黨更重視農民運動。

因此，馬列主義要以貧農為幹部建立龐大基層組織，第一步就是：把農民中具有小農和僱傭勞動力雙重角色的階層從理論上劃為無產、半無產階級。最早認識到這一點的是毛澤東。他在大革命後期的作品〈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避開生產方式是否先進問題，把劃分無產階級和非無產階級的標準落實到是否出賣勞動力這一點上。根據這一標準，僱農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具雙重角色的貧農則為半無產階級^①，不出賣勞動力之自耕農則被當作小資產階級。毛澤東在井崗山時期寫的第一個有關指示黨如何劃分農村階級的文件中，十分強調出賣勞動力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等同性。他認為無地佃農只要不出賣勞動力也不算貧農(半無產階級)^②。

毛澤東把出賣勞動(雙重角色扮演者)看作無產階級區別資產階級的本質界定，是來自對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的實感：自耕農和不出賣勞動之佃農(即使生活十分貧困)仍是傳統小農，具有小農的封閉性狹窄性，他們不關心政治和集體活動，不適合成為農村社會組織者；而那些出賣勞動力之小農無論在心態上與組織性上都和傳統小農不同，他們可以成為共產黨發展的對象。據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何毛澤東對農民持一種奇特的二分法，他把那些有着社會交往的出賣勞動力者(有些是農村中的流氓)，當作「中國革命的

^①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一卷本) 頁6-7。

^② 毛澤東：〈怎樣分析農村階級〉《毛澤東選集》(一卷本) 頁113-115。

主力軍」^{①⑨}，認為他們中間蘊含着一股極大的革命性；而傳統自耕農和佃農，一直是毛澤東尖銳批評的對象，他們是小資產者，渴望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康生活，在革命緊要關頭動搖。毛澤東作出這種區分對共產黨在農村中建立基層政權極為重要，它實際上是指：農民中那些傾向於組織和社會交往的階層是幹部來源[註十二]。

馬列主義另一個必須修改的部分是奪取政權的理論。根據列寧主義和蘇聯經驗，無產階級在全國革命高潮中先佔領城市，奪取政權後再管理農村，它和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正好相反。共產黨要在農村立足，讓農民政權不斷壯大，必須發展貧農入黨，成為基層社會管理者，同時打擊土地兼併，實現均田，只有這樣，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才得以發揮。但是，正統馬克思主義主張農村土地國有化，它和農民起義所要求的均田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中國共產黨如果不在意識形態上確立「均田」和「在農村建立政權」的合理性，即使被迫放棄城市進入農村，也不可能自覺地通過建立農村根據地來達到奪取政權的目的。1931年以前，共產黨雖然在農村廣泛打擊地主，把田地分給農民，但鑒於意識形態教條，農村中實行的仍是土地國有化，農民分得地主土地，只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②⑩}，農民支持共產黨的積極性仍得不到充分發揮[註十三]。當時共產黨雖然實際上已經走上先佔領農村再攻打城市的道路，但黨中央一直設在上海，指揮機構總是力圖立足於大城市，只是在城裏無法生存時才轉移到農村根據地。1931年黨中央被迫撤離上海，轉移

①⑨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606-609。

②⑩ 郭德宏：〈民主革命時期我黨對土地所有權的政策〉《近代史研究》第1期（北京：1983）。

到中央蘇區，但意識形態上仍把城市看得比農村重要。他們急切地等待城市革命高潮出現，只要一出現城市暴動機會，就立即採取行動。顯然，只有把均田和先在農村建立政權這兩個思想正式納入意識形態範疇，共產黨整合農村以奪取天下的過程才能從無意識轉化為有意識的行動。眾所周知，這正是中國式革命道路——以農村包圍城市理論之形成。

目前，中國大陸史學界就「農村包圍城市」理論何時形成有種種不同意見。有人將1930年代毛澤東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當作農村包圍城市理論出現的標誌。有人則將其歸為共產黨領袖集體創造，指出早在1927年12月，李立三寫的〈向中央的報告〉中，已主張把發動暴動的地區轉向農村，提出「農村割據」和「包圍廣州」的戰略思想^①。事實上，關於中國式革命道路，關鍵不在於要不要在農村打遊擊（只要無法在城市立足，就很容易認識到必須先佔領農村），而在於在農村建黨，即把貧農等同於無產階級，主張列寧主義政黨是可以以貧農為基本組織成分，以及在土地革命中用傳統的均田代替土地國有化。這些重要內容和馬列主義的原有理論基礎存在着基本衝突，它要進入共產黨意識形態，必須從基礎上改變馬列主義。周恩來曾講過：「1940年我到共產國際去，共產國際的領導同志都還擔心我們離工人階級太遠了。我說我們在農村裏經過長期鬥爭的鍛煉……完全可以無產階級化，共產國際的一些同志聽了之後大嘩，不以為然。」^②可見，如果馬列主義觀念不發生重大改變，把農民當作無產者，依靠農民建黨是不可思議的。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這一重大變構就是馬列主義的中國化，它的象徵便是毛澤東思想的成熟。

^① 戴緒恭、譚克繩主編：《中國現代史研究概覽》頁203-209（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② 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 頁178-179。

8.4 毛澤東思想與當代「聖王」

在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上，有兩個關鍵時刻，一個是1935年遵義會議，毛澤東獲得共產黨實際上的最高權力；另一個是1942年延安整風，毛澤東思想從此登上意識形態權威寶座。這兩個轉折恰恰和馬列主義實現結構性改變過程相一致。馬列主義作為一種外來意識形態，經典作家早已作了詳細論證，最早接受它、宣傳它的又是新文化運動中生活在城市的新知識分子。因此，它的理論權威不是洋人就是新文化運動領袖或共產國際的代言人。由他們對馬列主義作一種適合中國農民革命需要的結構性改變，幾乎是不可能的。

馬列主義的中國化必須通過一個複雜的過程才能完成。第一步是一連串殘酷的失敗對共產黨早期意識形態權威和共產國際代言人進行淘汰，只有那些了解農村，懂得如何組織農民之領導成員才得以生存，並逐步獲得黨的領導權。但此時他們雖掌握權力，但其政治主張只在經驗上被承認，還不能成為全黨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共產黨聲稱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犯過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第一次是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它要求黨員在「主要省份」實現總暴動。慘重的失敗結束了瞿秋白的意識形態權威的地位。第二次是李立三根據共產國際指導提出城市武裝起義，實現一省、數省勝利，結果李立三隨着城市革命破產結束了在黨內的領導地位。第三次路線錯誤的替罪羊則是共產國際的代言人王明和博古，他們必須為喪失農村革命根據地負責。這三次路線錯誤表明，雖然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已成為農民革命的領導者，但並沒有在意識形態上確認在農村建黨和農村包圍城市的重要性，它導致慘重失敗，甚至把共產黨推到瀕於毀滅的邊緣。最後，長征途中召開遵義會議，毛澤東出來挽救困局。這一過程本身極有象徵性，從中可以明顯看到一種選擇機制：那些根據馬列經典來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家一個個被淘

汰，成為左右傾機會主義者，而熟悉農村、主張用類似農民起義方式搞共產主義革命的領導人則適者生存，並取而代之。

列寧主義政黨的權威來源是意識形態，黨領袖不具備意識形態號召力時，權威的地位是不穩固的。遵義會議中凱豐就批評毛澤東說：「你懂得甚麼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②③}熟悉農村和農民的領袖雖獲得實際領導權，但每當某些精通馬列經典的人物依靠其理論上的說服力或共產國際的支持成為黨的意識形態權威時，其領袖地位馬上就受到挑戰。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憑自己代表正統意識形態的地位影響黨中央，在差不多半年多時間內，在遵義會議憑實力上來的毛澤東立即有失去權力的危險^{②④}。為此，毛澤東曾十分感慨地說過：「不搞一個主義，即使當上了領袖，在其活着時候就有可能被打倒。」^{②⑤}於是，毛澤東在掌握黨的實際權力之後，便開始用政治力量左右意識形態鬥爭，迫使馬列主義改變其結構。在權力干預下，中國農民革命的經驗和傳統文化進一步融入共產黨意識形態，中國共產黨對馬列主義的理解發生了極大的改變。

在討論中國共產黨黨內實際政治鬥爭如何促使意識形態變化之前，先考察一下馬列主義基本結構必須實現哪些轉變才能系統地把農民革命經驗納入意識形態。我們在第五章指出，儘管新知識分子選擇馬列主義是基於逆反價值與傳統深層結構之結合，但馬列主義在中國的立足卻是基於整體反傳統思潮的。因此，將中國農民文化以及農民革命經驗納入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是和五四整體反傳統主義有結構性衝突的。因此當逆反價值仍佔主導地位時，傳統內容

^{②③} 《聶榮臻回憶錄》 頁248（北京：戰士出版社，1983）。

^{②④} 楊中美：《遵義會議與延安整風》 頁88（香港：奔馬出版公司，1989）。

^{②⑤} 《王明回想錄》1973年 頁24-27 轉引自《遵義會議與延安整風》 頁137。

明目張膽地進入意識形態仍是不可能的。當時，基於科學主義和整體反傳統主義，共產黨內知識分子對馬列主義之理解，一直抱着知識主義之心態。即認為馬列主義是一種外來知識真理。黨內意識形態權威首先要有知識，讀過許多馬列著作，才能算精通理論。當革命理論不能從馬列體系中導出，或它本身不具備知識上的系統性和說服力，就不承認它是馬列主義的發展，至多視為某種操作經驗而已。在正統理論家心目中，農民革命的經驗和策略再有效，都只是狹隘經驗論，登不上理論的大雅之堂。因此，馬列主義實現結構性改變必須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放棄知識中心主義」，重新回到類似於傳統意識形態的倫理中心主義；二是改變整體反傳統主義心態，否則農民革命正確的策略、中國傳統文化中用來組織各級政權的泛道德主義等內容，都會視為和馬列主義相對立而不能成為黨的指導思想。例如，1932年臨時中央到達根據地時，許多人在《革命與戰爭》刊物上就批評毛澤東把孫子兵法運用到指導無產階級鬥爭，認為馬列主義和中國傳統不可能結合。他們論證道：「這些不合時代的東西——《孫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讓我們的敵人——蔣介石專有。」^②

其實，到三十年代末，放棄馬列主義的知識中心論和整體反傳統主義的條件差不多已經具備。在長達十幾年的革命戰爭中，特別是在二萬五千里長征中，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立場中心主義漸漸佔了主導地位。五四反傳統的知識分子黨員不是被嚴酷的戰爭淘汰，就是被無情的政治鬥爭所改造，人們原有那種對馬列主義的知識真理中心心態慢慢消失，愈來愈多的黨員認為，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只有具備無產階級立場後才能掌握。隨着黨的幹部中知識分子比

^② 汪澍白：《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基因》頁76-77（香港：商務印書館，1990）。

例日益減少，文化程度不斷下降，輕視經典和書本知識，以及重視經驗、直觀感覺的傾向就愈來愈明顯。農民革命家已可以否定五四的逆反價值，把馬列主義變成一個以道德倫理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從1937年前後毛澤東、劉少奇等在抗大一系列演講和相應的文章中，我們已明顯看到，他們力圖把道德理想主義作為對馬列主義解釋的基礎。劉少奇基於共產黨人的立場中心主義，系統地提出如何才能成為馬列主義者的邏輯。根據他的立場決定論，一個人只有純化無產階級立場，才能理解馬列主義。他巧妙地把無產階級立場和個人道德品質劃了等號。他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中明確指出，共產黨人必須成為馬、恩、列、斯這些偉大革命導師的小學生，學習他們崇高的品質。但經典作家的道德品質是甚麼？這是馬列主義中很少談及、甚至根本不相干的東西，劉少奇就把中國人諳熟的儒家道德修煉引了進來，提出成為合格的共產黨人最重要的條件是去實行道德純化之修身^{②7}。馬列主義由知識中心論再次返回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馬列主義的儒家化^{②8}。

在道德倫理與知識的關係上否定新文化運動成果之同時，書本知識與直觀經驗的關係上也出現了對新文化運動的否定。在科學主義心態中，中國知識分子把當時科學知識等同於直觀理性之常識位置，雖在深層結構上仍是傳統的，但五四知識分子普遍重視書本和西方引進的知識，人們不可能把經驗常識看得比書本上的科學知識更重要。毛澤東在三十年代末一系列哲學著作中開始反對這一新文化運動之成果。在《實踐論》中，他再次把個人的直接經驗看作知識

^{②7}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939年7月）《劉少奇選集》上卷 頁97-16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②8} 金觀濤：〈儒家文化的深層結構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影響〉《新啟蒙》2（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的基礎，視之為鑒別書本真理的唯一標準。在《矛盾論》中，他利用常識和軍事鬥爭的例子，對黑格爾式晦澀的辯證法作出中國古代哲學中類似於「陰」、「陽」那樣的表達，以使得廣大中國人喜聞樂見，容易理解。抽象的西方哲學被說成是「無的放矢」，尊重知識理論被醜化成「言必稱希臘」與幼稚的「本本主義」。

四十年代初，馬列主義實行結構性改造的各種條件都已成熟，1942年中國共產黨開始延安整風[註十四]。毛澤東在政治上打擊從蘇聯回國的國際派的同時，實現了全黨對馬列主義態度之轉化。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著作被列為幹部學習的必讀文獻。從此，儒家倫理、農民文化和各種有關農民革命和建立基層政權之經驗可以毫不困難地溶進中國的馬列主義，而集大成者毛澤東由是而成為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權威。1943年7月王稼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把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稱為毛澤東思想^②。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在建黨原則中提出：「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遵循毛澤東思想的指示去進行工作，乃是每一個黨員的職責。」^③根據共產黨官方的說法，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中國化。而在我們看來，馬列主義中國化實際上是儒家化和農民化，儒家化實現了由知識中心向道德中心之轉化和破除反傳統心態，農民化則是在儒家化的同時，把農民視為無產者，農民戰爭經驗和農民文化系統納入馬列主義。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特別是能夠打動億萬農民心坎的新意識形態終於被創造出來，並開始了自己勢不可擋地整合中國社會之歷程[註十五]。陝北民歌《東方紅》表明，在中國共產黨人和邊區民眾心中，毛澤東已被推上了「人民大救星」的「聖王」地位[註十六]。

^② 陳君聰：《劉少奇的思想理論研究》頁65（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

^③ 劉少奇：〈論黨〉《劉少奇選集》上卷 頁337。

8.5 幹部隊伍大擴張

以農民為幹部整合廣大農村，除了貧農經濟和馬列主義結構發生變化外，還有一個前提：這就是要有一定數量的知識分子入黨。廣大來自貧農的幹部充當基層管理人員(鄉和鄉以下)是毫無問題的，但形成全國性幹部組織，中層以上的官員必須要有點文化。共產黨必須把一批知識分子(不一定要大學生)轉化為黨的中上層幹部，而數目更龐大的農村幹部要深入農村基層，這樣，上中下三層統一的幹部組織才能形成。抗戰和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好促進了這一過程。知識分子本來集中在城市，當城市淪陷，知識分子懷着抗日救國的使命再次離家出走之時，就為知識分子從城市流向農村準備了歷史條件[註十七]。當時有志青年有兩個目標可選擇，一個是退居西南的國民黨統治區，另一個則是意識形態上富有理想主義的共產黨西北邊區。顯而易見，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具備對激進青年的吸引力，正如五四青年投奔黃埔軍校一樣，延安的抗大一下子成為有志青年嚮往的目標。在抗大的早期畢業生中有不少大學生和留學生，中小學程度的則更多。1939年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①。到1940年底，共產黨中層幹部中已有85%是知識分子^②。

56.01.00

四十年代初毛澤東思想的成熟意味着整合農村社會必須的各種條件都匯聚在一起。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儒家化和農民化，它對農民和知識分子都有征服力。貧農通過參加土改變成黨的幹部，而知識分子則因參加抗日接觸到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和儒家道德理想主義的有機結合，對經受過新文化運動洗禮(但

① 毛澤東：〈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毛澤東選集》(一卷本) 頁581。

② 陳雲：〈關於幹部工作的若干問題〉(1940年11月29日)《陳雲文選(1926-1949)》 頁145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深層思維方式尚未脫離傳統的)的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震撼，他們心悅誠服地被改造成為黨的組織骨幹，中國共產黨組織開始了空前擴張。表8.2為1921到1977年共產黨組織和控制人口的變化，它表明四十年代初是一個轉捩點，此後中國共產黨組織一下子超出了在井崗山時期的規模，開始了一個不斷膨脹的歷程。共產黨可以從農

1.年份	2.黨員	3.正規軍 (中共單位)	4.共青團 員	5.共產黨控 制 地區人口	6.中國人 口 (大陸)	5/6 (×100)	2/5 (×100)	2/3 (×100)	黨的規模 (以1950年為 100)
1921	.057	0	—	0	522000	0	—	—	0
1927	58	c.0	50	c.0	537000	0	—	—	1
1930	122	—	75+	—	544000	0	—	—	2
1934	300	350	—	c.90000	552000	2	3.3	86	5
1936	30	50	—	600	553000	0	5.0	60	1
1937	40	92	20	c.2000	553000	0	2.0	43	1
1943	790	465	1193	81000	555000	15	1.0	170	14
1945	1211	880	1500	91000	555000	16	1.3	138	21
1950	5822	5000	3000	547000	556000	98	1.1	116	100
1953	6612	3500	9000	583000	583000	100	1.1	189	114
1957	12720	2500	23000	640000	640000	100	2.0	509	218
1959	13960	2600	25000	669000	669000	100	2.1	537	240
1961	17000	—	—	694000	694000	100	2.4	—	292
1964	19000	2800	22000	+734000	734000	100	2.6	679	326
1973	28000	3200	30000	899000	899000	100	3.1	875	481
1977	35000	3500+	—	966000	966000	100	3.6	—	601

取自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頁353（江蘇：人民，1988）。

表8.2 共產黨組織的增長

（單位：千人）

民中吸收黨員並將他們變為基層幹部，和國民黨相比，就不再發生缺少基層幹部管理農村的問題。相反，由農民協會會員、貧農團積極分子入黨當幹部，再上升為鄉、區一級官員，是一條沒有阻力的坦途，共產黨組織反倒經常為機構膨脹過快、幹部過多（特別是基層脫產幹部）而苦惱。為了避免幹部過多造成農村經濟負擔過重，共產黨差不多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搞一次精兵減政。

第一次精兵減政運動出現在四十年代初，它正是毛澤東思想成熟、知識分子向延安雲集、共產黨組織出現空前大擴張時所採取的必要政策。1937年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時，黨政軍脫產幹部僅14,000人，1938年也只有16,000人，到1939年幹部數目猛增為49,000人。1940年後發展更快，1941年達73,000人。中央曾規定，黨政軍脫產人員不能超過人口總數的3%，但當時實際已達5.4%^③。這樣邊區擴大遠跟不上黨的脫產幹部增長。1941年只有一百五十萬人口的陝甘寧邊區要養十萬左右脫產人員，共產黨不得不宣佈區以下幹部一律不脫產。由此可見，精兵減政的主要目的是減少自農村基層脫產而提拔上來的幹部，使他們重返生產崗位。共產黨自1940年以後，每隔十幾年就要搞一次精兵減政，這正好表明，共產黨有着比傳統一體化組織和國民黨不可能擁有的取之不盡的官僚來源——農民幹部。這個幹部資源是如此豐富，以致於把過多來自基層之幹部送回農村必須成為經常性政策[註十八]。

在中國，一旦農民可以成為一體化結構組織者，缺乏基層幹部、政府管理難以深入廣大農村的困難立即克服，使得擁有近五億人口的農業大國可以有效地組織起來。抗戰勝利以後，在共產黨統治的解放區所採用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一體化方式，已表明它是一種

③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500-501（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可以實現中國社會上、中、下三個層次整合的新模式。這時，由這種新模式取代國民黨弱整合模式的時機成熟了。

8.6 逐鹿中原 城鄉決戰

1946年7月，國民黨和共產黨爭奪天下的全面戰爭拉開序幕之時，蔣介石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他仍以為自己的對手還是三十年代紅色割據的流寇，只不過在抗戰中坐大而已。他不知道，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組織方式都已發生了結構性的改變，它正在把貧農轉化為農業社會管理者，具備了實現社會上、中、下三層次整合之功能，擁有巨大社會動員潛力。而國民黨僅僅只能在城市立足，並且在抗戰勝利之際迅速腐敗不堪。表面上看，它暫時比共產黨強大，但其動員力已施展到極限。四十年代國共之戰是不可避免的，它是新文化運動後出現的兩種新一體化結構之競爭。共產黨組織是一個實現了基層農業社會整合並迅速成長中的巨人，它代表強勢意識形態整合模式。而國民黨是一個搖搖欲墜的倒金字塔，它是弱勢意識形態整合模式。因此，這場競爭實際上是組織得上下有序的農村政權與國民黨動蕩殘破的城市政權之對抗，也可以稱之為城鄉之戰。

一開始共產黨處於守勢。它的軍隊不到國民黨的三分之一，解放區總面積為228.6萬平方公里，人口13,607萬，城市464座，只佔全國總面積的24%，總人口數的30%，城市數的23%^④。共產黨十分明確地意識到，這種力量對比和劣勢是暫時性的，因為國民黨軍隊不能在農村中生根，共產黨只要暫時撤出從日本人手中收復的部分大城市，以整個農村為基地，和國民黨軍隊打運動戰，就能以自

^④ 張廷貴：〈解放戰爭概述〉《黨史資料與研究》第4期（福州：1987）。

己的優勢對付國民黨的劣勢。只要戰爭繼續下去，共產黨就能因保持有生力量而不斷壯大，而國民黨的戰爭動員卻只會帶來自身日益虛弱直至最後瓦解。一年後，這種戰略防衛立即顯示出明顯的效果。在國民黨全面進攻面前，解放區的面積雖下降為220萬平方公里，人口變成13,106萬，城市只有417座。但真正重要的是：國民黨在農村作戰處處被動，熟悉農村的解放軍在運動戰中消滅了國民黨軍隊112萬人，使解放軍和國軍比例變成1:1.9。國民黨政府種種過度動員之迹象已經顯露。毛澤東認為反攻時機已到，決定從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

進攻的方式十分巧妙，它不是去攻打城市和國民黨主力，而仍是基於國民黨不能深入農村的弱點，防禦和進攻之差別僅在於打仗的地區不同。戰略防禦階段的仗多是在解放區打的，現在戰場開闢在國民黨佔領區的廣大農村。其代表性轉機就是劉鄧大軍離開解放區，挺進大別山，解放軍在武漢和南京之間建立新根據地，以國統區農村作為和國軍交火之戰場。與此同時，各個解放區都突破原有邊界，開始對國統區農村大滲透。陳毅的軍隊挺進豫皖區，許世友、譚震林部在山東出擊，佔領大片農村。晉察冀野戰軍使原來分裂的解放區聯成一片。徐向前、滕代遠、薄一波的部隊則在山西佔領了太原等大城市以外的廣大農村……。這種戰術使蔣介石狼狽不堪，而共產黨在所到農村立即開展土改，發展幹部，動員翻身農民參軍，愈戰愈強。國民黨不能消滅共產黨主力，日漸龜縮在大城市。而大城市裏，由於國民黨戰爭動員破壞了社會結構，危機愈來愈嚴重，不可控制的通貨膨脹和官僚腐敗在蔓延，經常發生人民群眾示威遊行，國民黨完全失去民心。戰略進攻一年後，共產黨的解放區發展到235.5萬平方公里，人口16,811萬人，城市579座，軍隊人數和國民黨相差不多，國共武力大決戰的時機到了。

今天，一提起遼瀋、淮海、平津這著名的三大戰役時，大家常

常慨嘆其結果。在中國近代史上，這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內戰，但它結束得很快。半年間國民黨197萬軍隊被殲滅，兵敗如山倒，不到一年國民黨就失去大陸。解放軍軍事指揮官的戰略智慧、戰術之靈活備受讚揚，被描寫得近於神話。實際上，任何大規模的軍事決戰都是一場組織力和社會動員力的比賽。表面上看，大決戰時，國共兵力相當，但從社會組織與動員能力進行比較，誰勝誰負早由一體化結構動員能力決定了。共產黨本是一個具有理想主義獻身精神的意識形態認同團體，現在已具有幾百萬人的規模，且仍隨着土改運動不斷擴張。每當解放軍佔領農村，就立即把它變成自己人力和物力之基地。土地改革不僅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對共產黨的擁護，而且造就無數農村幹部。由於有廣大農民支持，又有龐大的農民幹部把農民組織起來，三大戰役背後實際上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人海動員奇蹟。華北解放區參軍農民近百萬人，東北有160萬，僅1946年7月到1948年9月山東省就動員了580餘萬民工支援前線^⑤。我們可以看到由上千萬農民自願組成的運輸隊、擔架隊，隨着解放軍長途跋涉上萬里，把後方和前線聯接起來。完成這一組織動員工作的正是一個從中央直統到農村基層的巨大幹部網。隨着解放軍佔領愈來愈多的農村，這一巨型幹部網愈大，解放軍就能動員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而國民黨卻正好相反，意識形態吸引力完全喪失，清廉的幹部對國民黨日益失望，軍隊厭戰，徵公糧、抓壯丁引起農村騷亂，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公務員的月薪一個月不到一美元，百姓和士兵都處在飢餓之中。

比較一下國共兩黨發行貨幣的不同結果，可以對兩種一體化結構的社會動員能力的差別形成明確印象。我們在7.5節談及國民黨用印貨幣解決軍費時，討論過國家無法同時在糧食、物資上提供相

^⑤ 陳旭麓主編：《五四後三十年》 頁544。

應的供給，結果是動員過度，引發起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它導致城市經濟的崩潰。1948年共產黨也佔領了很多大城市，開始發行人民幣，由於軍費開支巨大，也使用了印貨幣的動員方式。從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人民幣發行額從185億元提高到30,000億元，增長160倍。一時通貨過多，物資供應不足，城市出現四次物價大波動。如果共產黨沒有動員廣大農村糧食物資的能力，這樣巨大的通貨發行增長也會引起城市經濟結構的瓦解。但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不同，它立即動員了農村的幹部系統，把大批糧食從東北及其他農村地區運到北京、上海、天津，物價上漲不久就得到控制。當時上海工人、公教人員、學生生活已極為貧困，即使基本控制住物價，受薪階層也已在死亡邊緣，稍為有一點糧價波動，都無法負擔。政府對工人、公教人員、學生實行平價糧食配給，每人每月平價供糧30斤。上海一地一個月要供應70萬人^⑤。北京、天津大城市也有類似情況。就拿實行配給管理而言，這樣巨大的社會組織能力，只有一個巨型金字塔式官僚機構才能做到。共產黨取代蔣家王朝，是符合邏輯的結果。

1949年，蔣介石放棄大陸，退守台灣，中國出現共產黨巨人統治大陸和國民黨小朝廷偏安台灣的局面。這裏我們確實可以看到某種歷史的意志。1949年恰好是五四運動三十周年。五四以後中國出現馬列主義強勢意識形態與三民主義弱勢意識形態，兩種意識形態都企圖建立一體化結構以實現社會整合。一開始馬列主義進行社會整合的條件尚未成熟，國民黨率先實現社會整合。就在國民黨統治中國的二十多年中，馬列主義變構為毛澤東思想，共產黨成為一個農民成分佔絕大多數的黨，找到了建立新一體化結構之方式。這

^⑤ 薛暮橋、吳凱泰：〈新中國成立前後穩定物價的鬥爭〉《經濟研究》第2期（北京：1985）。

時，國共兩黨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和範圍大小也發生了顛倒。歷史似乎恢復了平衡：強一體化結構佔據了主導地位，弱一體化結構佔次要位置。但是兩種一體化結構競爭之歷史並沒有終結，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大崩潰也極大地消除了組織系統內的無組織力量，軍隊幹部的腐敗有了明顯好轉，蔣介石第一次真正控制住了國民黨。上百萬的軍政人員集中台灣一地，原先幹部缺乏，不能深入基層之弱點自然克服。國民黨也開始了不同於大陸時期的發展歷程，整個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第八章 註 解

註一 紅軍在長征中之所以能順利擺脫國民黨中央軍的追殺，在北方建立新根據地，一個重要前提是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和中央政府之間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蔣介石為了削平軍閥，實現統一，竭盡各種辦法來打擊國民黨地方實力派。蔣介石在追擊紅軍之際，就想乘勢結束廣東、廣西、雲南、四川等省地方實力派的半割據狀態。早在三十年代初，國民黨地方實力派中很多人就已意識到他們保持自身權力一定程度上有賴於紅軍的存在。1934年，廣東地方實力派陳濟棠為了保存實力，不願與紅軍打得兩敗俱傷，使蔣介石坐收漁人之利，曾主動電約中共舉行秘密談判。所簽協議，有助於紅軍長征時順利從南線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包圍。桂系因看出蔣介石想讓紅軍來削弱他們的實力，與紅軍作戰時，一直採取避開正面、驅逐為上之方針，這也是紅軍主力得以輕而易舉地越過湘桂邊境直趨貴州的原因^①。

紅軍壯大的正確戰略包括兩項基本原則，一是充分利用蔣介石和地方實力派的矛盾，即南京國民政府不具備對全國之控制能力。二是國民黨不能深入農村。在中國共產黨黨史官方解釋中，曾將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歸為犯了兩個方面的錯誤。第一個是左傾機會主義者排斥毛澤東的正確軍事路線，放棄遊擊戰，和國民黨軍隊打起「拒敵於國門之外」的陣地戰，他們認為正確的戰略應是保存有生力量 and 國民黨周旋，甚至到另外地方開闢新革命根據地。實際上，這正是訴諸於國民黨軍隊不能長期深入廣大農村的第一個弱點。中

^① 顧關林：〈簡述地方實力派與中共的早期關係〉《中共黨史研究》第1期（北京：1988）。

共承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犯的第二個錯誤是沒有利用當時十九路軍在福建反蔣的形勢，以致於蔣介石消滅十九路軍在福建建立的人民政府後再回過來對付中央蘇區，「左傾機會主義者」把十九路軍看作與蔣介石一樣，是革命的對象。這裏講的恰好是沒有利用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矛盾。這兩個基本原則後被吸收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註二 太平天國是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典型的農民政權。它的意識形態不同於儒家，在建立政權時，明顯地排斥縣以下傳統的儒生和縉紳鄉自治，太平天國依靠的是一種類似於軍隊編制的鄉官制度。這些作為鄉官的基層管理者，大多來自於舊胥吏、無賴、土棍，役隸^{②⑧}。太平天國一開始在農村不是實行傳統的「均田」，而是貫徹「天朝田畝制度」，規定「天下農民米穀、高賈資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這是一種小農平均主義式的公有制。《天朝田畝制度》因和小農傳統不合，再加上鄉官腐敗，根本無法貫徹，後只能派石達開去解決這個問題，採用傳統分田地，農民「照舊交糧納稅」的老辦法^{②⑨}。但是由於太平軍意識形態——中國式基督教和儒生信仰的衝突，在太平天國統治地區，農村基層政權一直得不到儒生階層的支持，太平軍的徵糧收稅一直是大問題。這一現象突出地反映在太平軍佔領區的租賦政策上。本來清代蘇浙地區地租、田賦、佃農所得的比例大約是3:2:5。在太平天國佔領區，基層縉紳地主利益得不到保護，地租、田賦、佃農所獲之比變為0.5:2:7.5。表面上

②⑧ 張厚安、白益華：《中國農村基層建制的歷史演變》 頁88-8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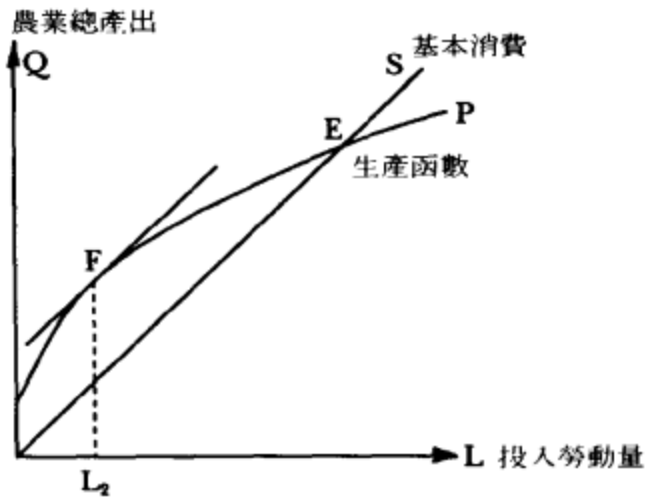
②⑨ 王宏志：〈農民戰爭和封建主義〉《中國農民戰爭史論集》第3輯 頁231-232（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農民和政府得利，但其結果卻是田賦根本徵收不上來。太平軍不得不靠「打先鋒」、「徵派苛捐雜稅」甚至搶劫過活，糧餉危機日益嚴重^④。

註三 用人口爆炸來說明中國農村生產方式以及農民素質的變化，似乎是把社會結構變遷追溯到與社會制度文化無關的因素中去。事實上，對於超穩定系統，人口和社會組織方式存在着密切的聯繫。中國傳統社會人口多於歐洲可以用社會結構來說明，人口爆炸也是由於社會結構出現某種變化。這樣人口大增長反作用於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是超穩定系統內在邏輯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傳統社會單位土地面積所供養之人口遠遠大於歐洲和其他農業社會，可以用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和文化結構來說明。為了理解超穩定系統社會結構和人口膨脹機制的關係，我們先來分析趙岡(Kang Chao)提出的模型。

圖8.2的橫坐標為土地總面積為固定不變時投入農業生產之勞動力數量，縱坐標為農業總產出。圖中直線為維持這些勞動力生命必須之口糧，圖中曲線是生產函數，揭示投入勞動量和產出之函數關係。當技術不變時，根據邊際生產率遞減原則，曲線是凸的。曲線上F點斜率正好和直線相同，它表明這是勞動力的增長導致產量增加(邊際生產率)正好等於勞動力的糧食消耗。在F點的左邊，增加勞動力導致糧食生產量之增加大於勞動力的糧食消耗。顯而易見，當所有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或領主手中時，農業人口不會超過F點相應的L值(記為 L_2)。原因很簡單，地主(或領主)僱用勞動力或用農奴生產，必須有利可圖。當農業人口接近 L_2 點時，增加勞動力

^④ 楊天宏：〈太平天國的租賦關係〉《歷史研究》第5期（北京：1987）。



取自Kang Chao: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p. 7.

圖8.2 中國傳統社會農業勞動力投入及產出

所得到的收益剛好能養活這些增加的勞動人口，而地主(領主)無利可圖。這時，他們不會再僱用這些勞動力投入土地耕作。趙岡指出，在工業革命前歐洲社會一直存在着一個有力的傳統：當一個人不具有可靠收入時是不能結婚成家的。確實，在領主制經濟結構中，當農業生產人口接近 L_2 點時，增加之農業人口無以為生，這就成為一個強有力的遏制人口增加之機制。

而中國傳統經濟結構和歐洲以及其他農業社會不同，存在着大量自耕農。自耕農擁有土地，一家一戶地從事耕作，領主經濟中遏制農業人口不超過 L_2 點的機制不再存在。中國的自耕農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也是農民的價值觀念。這樣中國農業人口可以超過F點，一直增長。在達到E點之前，雖然這時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已經很低，勞動力增加導致糧食生產之增長本身已不足以養活增加的人口，但家庭組織內部擁有的餘糧卻可以容納愈來愈多的人口。因此，以家庭為組織單位的自耕

農經濟構成中國社會人口不斷增長之持久動力^④。

趙岡的模型表明，中國傳統社會的自耕農經濟和儒家文化會導致它擁有較多的農業人口。但這個模型不能說明為何清朝會出現人口大爆炸。實際上，社會結構由經濟、政治、文化三個子系統耦合而成。我們只要把圖8.2所示的模型細化，綜合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結構三個子系統，並把無組織力量增長的因素也考慮進去，就可以解釋中國為何在清朝以後會出現人口大膨脹。中國農業人口雖然存在着超過F點不斷增長之動力，但它通常受到兩個因素的遏制。第一個因素是土地兼併。和西歐以及其他傳統農業社會類似，當自耕農日益失去土地變為佃農和為地主耕種之田客、僱農之際，中國農村也就開始喪失容納過剩農業人口之能力。地主擁有土地能容納多少農業勞動無疑也受邊際生產率的限制。當所有土地均集中在地主手中時，農業勞動力也不會超過 L_2 值。因此，當人口超過F點後，如果所有土地均由自耕農掌握，那麼人口會不斷增長，但是隨着土地兼併的加劇，人口增長的勢頭也會受到遏制。

第二個控制人口加速發展之剎車閘是國家徵收的人頭稅和勞役。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每個人必須向國家繳口賦，壯丁要服勞役。在國家強大的控制下，人頭稅和勞役同農民維持生存的口糧一樣，限制着人口增長。在圖8.2中，E點代表着農業人口增長之最後極限，因為在E點右邊，糧食總產出不足以維持農業人口的生存，故農業人口不可能超過E點。實際上在超穩定結構中，當一個自耕農家庭無法交人頭稅和服勞役時，自耕農會轉化為流民，它往往也失去容納剩餘人口之能力。因而類似於E點這樣的人口增長之上限

④ Kang Chao: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An Economic Analysis*, pp. 6-30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1986).

是由維生口糧加人頭稅和勞役共同決定的。我們可以把圖8.2加以推廣，得到圖8.3。其中直線OS為農民維持生存所需的口糧和人口之間的關係，而OK為加上人頭稅和勞役後代表農民實際維持生存之直線。OK和生產曲線 P_1 ，它相應的 L_1 是超穩定系統實際可容納人口之上限。在明中葉之前，中國封建王朝一直向農戶徵收很高的人頭稅，因此，中國傳統社會的農業人口一直沒有超過 P_1 所規定的 L_1 值。但是自清朝以後，上述兩個遏制人口增長之因素都先後消失了，中國人口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大膨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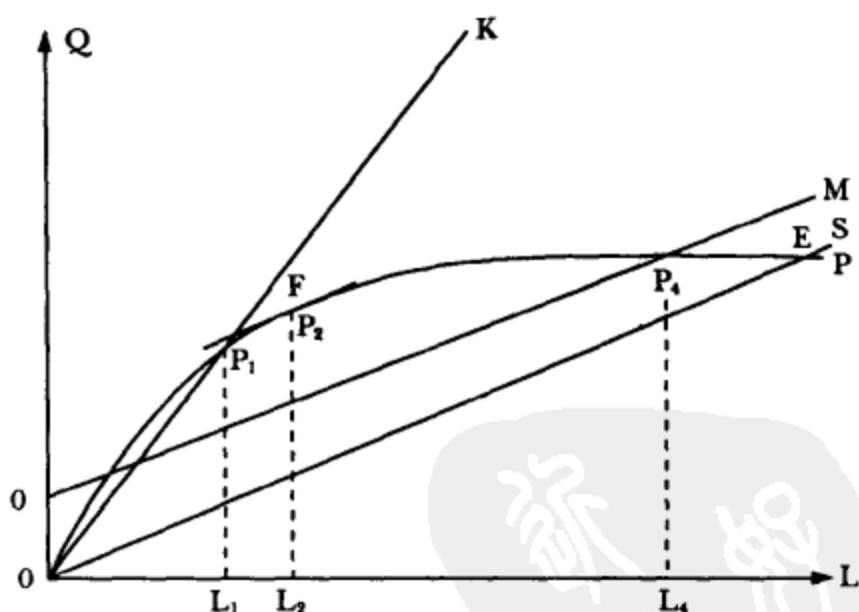


圖8.3 清以後中國人口爆炸原因

明末清初中國曾出現賦稅制度的大改革，它使得控制人口增長的第一個因素先被取消。在明末一條鞭法中，已經把人頭稅和田賦統一起來。清初實行「攤丁入畝」，則進一步貫徹這一精神，把人頭稅和勞役折合成錢兩放到田賦徵收之中。這樣決定超穩定系統人口

總上限的不再是OK和生產曲線之交點 P_1 ，而是O'M直線和生產曲線交點 P_4 。O'M和OS平行，它由農業人口維生必須的口糧直線加上一個和人口無關的田賦值所決定。當田賦不甚高的條件下， P_4 相應之L值 L_4 遠遠大於 P_1 相應的 L_1 。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在清朝中國會出現人口大膨脹，這是因為政府不再徵收人頭稅，勞役等也由固定不變的田賦徵收取代，控制人口增長的第二個閘突然消失，它使得農業人口增長可以較快地超過F點。

為了便於理解，我們把人頭稅和勞役折合成田賦以前的農民負擔，與清朝實行攤丁入畝後農民負擔作一個形象性比較。一般說來，在歷史上每一個盛大王朝建立之初，農民的負擔都不重。如西漢初年，每畝田賦按十五稅一計算只有6.6升，而人頭稅折合糧食只有2.4升，到文帝時，折合糧食也只有8升，農民負擔很輕。明朝建立之初，田賦負擔約為產量的3.45%，賦役負擔比田賦多，但也只有6%^④。在各個王朝發展過程中，田賦徵收大多是前後不變的，人頭稅則是人口的函數，至於國家的勞役往往隨着人口增加而大增。一般說來，到一個王朝後期，農民負擔的勞役和人頭稅不斷加大，田賦以外的各種附加剝奪隨着吏治腐敗變得愈來愈重。這種農民負擔結構使得農民實際負擔是隨人口增加而急增之函數。它們和生產函數之交點 P_1 相應L值較少，即農業社會可容納人口上限不太高。而清初實行攤丁入畝，人頭稅、勞役統統根據清初人口數固定，攤入田賦中，它們只佔農業產出的5%。就清初農民負擔絕對數而言，它雖和歷史上其他盛大王朝建立之初相差不大，但攤丁入畝改變了稅收結構。毫無疑問，田賦不變之傳統大大限制了貪官污吏借徵收人頭稅和勞役過程中向農民之剝奪，即從此政府稅入變得

④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中國農民負擔史》編輯委員會編著：《中國農民負擔史》第一卷 頁65、654（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

和人口無關。O'M直線和生產曲線交點的L值遠遠大於 L_1 。它表明，農業社會可容納人口數大大增加。表8.3表示實行灘丁入畝後，清朝人口迅速增長，達到四億左右。

年 度	公 元	人 口 數	人 口 增 殖 指 數	人 口 增 殖 指 數
順治十八年	1661	21,068,609	100	—
康熙二十四年	1685	23,411,448	111	100
雍正二年	1724	25,284,818	120	108
乾隆十八年	1753	102,750,000	488	439
乾隆三十一年	1766	208,095,796	988	889

取自《中國農民負擔史》卷1，頁757（北京：中國財政經濟，1991）。

表8.3 順、康、雍、乾四朝人口統計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直到本世紀五十年代之前，控制農業人口增長的第一個閘仍然在起作用。當「土地兼併」日益嚴重時，農業人口由自耕農數目變少而失去增長之推動力。土地兼併愈嚴重，農業經濟可容納之總人口愈接近F點，F點雖大於 L_1 ，但遠離O'M和生產函數交點 P_4 。我們認為，從清後期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一百多年間中國人口一直保持在四億上下，土地兼併對農村造成的破壞是遏制人口的重要因素。本世紀五十年代，共產黨統治大陸，在農村先實行土改，建立一個沒有地主的純自耕農農業經濟，接着又搞農業合作化，徹底消除了土地兼併這一傳統的人口控制閘。與此同時，中國農村基層組織得以確立，社會相當安定。從此中國農村人口開始進一步膨脹，迅速突破一百年來沒有越過的五億關口，增加到十一億，至今仍未達到平衡狀態。當然，五十年代後中國人口爆炸的原因，還必須考慮到生產函數改變、農村死亡率降低等諸因

素。但是，就小農經濟和人口之關係而言，五十年代後人民公社生產隊按人口分口糧無疑是傳統家族支持過剩人口機制之變種。

註四 據王業鍵估計，中國自十五世紀後人均耕地面積一直在下降(表8.4)，到1930年代達到十分嚴重的地步。

年 代	耕地(百萬畝)	人口(百萬人)	每人平均耕地(畝/人)
1400	600	80-100	6.0-7.5
1600	1000+	200	5.0
1930	1800	500	3.6

取自王業鍵：〈戰後研究明清時代人口與耕地之檢討〉，《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台北，1989)。

表8.4 人均耕地面積的下降(1400-1930)

趙岡對人均耕地面積的估計比王業鍵還要少(表8.5)，他認為1848年，人均耕地已降到2.70畝。

李國祁以浙江和福建兩省為例說明清末民初中國人均土地差不多已到不能減少的極限。這兩省經過太平天國大起義，人口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有所減少，但到二十世紀初，浙江人均耕地只有1.94畝，福建只有0.85畝^④。沈松僑指出，河南省的人均耕地，自1893年到1935年，仍處於不斷減少之中(表8.6)。

註五 當農村家庭中擁有大量過剩勞力時，農民製造的手工業產品將排斥傳統社會的手工業工場和作坊，使得農村家庭手工業成為中

④ 李國祁：〈清季的栽培經濟作物與改善農村經濟減輕人口壓力〉《台師大學報》第12期 頁144 (台北：1984)。

年 代	耕地(百萬畝)	年 代	人口(百萬人)	每人平均耕地(畝/人)
2	571	2	59	9.67
105	535	105	53	10.09
146	507	146	47	10.78
976	255	961	32	7.96
1072	666	1109	121	5.50
1393	522	1391	60	8.70
1581	793	1592	200	3.96
1662	570	1657	72	7.92
1784	886	1776	268	3.30
1812	943	1800	295	3.19
1887	1,154	1848	426	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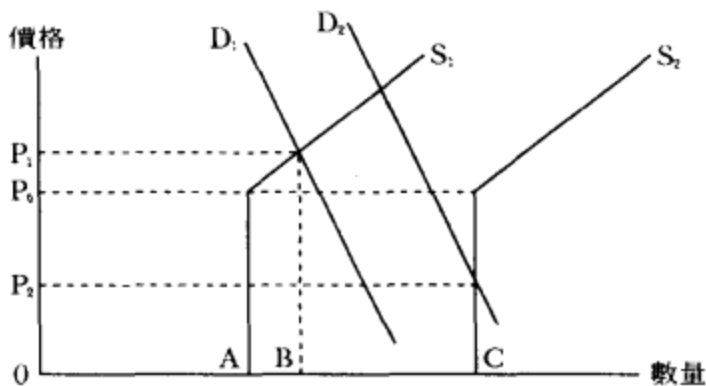
取自 Kang Chao: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p. 89, Table 5.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表8.5 人均耕地面積(公元2-1887)

年 代	耕地面積 (市畝)	變動指數 (1873=100)	平均每人耕地面積 (市畝)
1873(同治12年)	98,244,000	100	4.1
1893(光緒19年)	97,262,000	99.0	4.4
1913(民國2年)	114,945,000	117	4.03
1931(民國20年)	108,786,871	110.7	3.31
1932(民國21年)	112,981,000	115	3.62
1935(民國24年)	107,882,347	109.8	3.15

取自沈松儒：〈經濟作物與近代河南農村經濟：1906-1937〉，《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台北：近史所，1989)。

表8.6 近代河南耕地面積與平均每人耕地面積估計(1873-1935)



取自趙岡、陳鍾毅：《中國經濟制度史論》，頁13-14
（台北：聯經，1986）。

圖8.4 手工作坊為何不能同農村家庭手工業競爭

國手工業產品的主要供給者。趙岡曾用如下模型來說明這種機制。圖8.4的 S_1 曲線代表手工作坊產品價格和生產數量之間的函數關係。 P_0 為手工作坊所能接受的最低產品價格，在 P_0 以下，手工工場將無利可圖。 D_1 為這一產品數量的社會需求和價格之關係。當 D_1 和 S_1 有交點時，表明社會手工業品由工場作坊提供。 D_1 和 S_1 的交點規定了產品價格和生產量（供給等於需求），如 P_1 為手工業品的價格， B 為生產數量。農村中擁有大量剩餘勞動力時，這些剩餘勞力本由農村家庭餘糧養活，他們從事手工業商品製造時，只要有收入改善生計就會生產，並不要價格高於 P_0 。它們能生產多少產品和產品價格無關，即彈性為零。這時這一商品價格和供給數量曲線變為 S_2-C 。它由兩段組成，一條是和 S_1 相似的曲線 S_2 ，另一條垂直線 C 。垂直線表明農村家庭剩餘勞動提供的產品數量和價格無關，即在價格 P_0 以下，商品全由農村家庭提供。只有價格到 P_0 以上，手工作坊才有利可圖。 S_2 表示價格大於 P_0 時有手工作坊存在時商品供給曲線。我們來看看這種條件下供求曲線之交點。人口的增加會促使社會對手工業商品需求之增加。需求曲線由 D_1 變為 D_2 ， D_2 和 S_2-C 的

交點在 S_2-C 的垂直線上。它表明，全部手工業產品均由農村剩餘勞動力提供，手工工場由於商品太廉價無利可圖而關閉^{④④}。經濟史學者公認，農村家庭手工業對手工作坊的排斥在中國近代史上是愈演愈烈的。它帶來一個重要後果是自耕農和半自耕農素質的變化，使他們習慣於亦農亦商或半農半商。傳統小農由於自給自足的封閉性在相當程度上遭到破除。

註六 趙岡利用清代刑部檔案中各地農業僱工的現金工資，配合同時期的人口數字作了統計。他指出，在耕地與農耕技術幾乎不變的條件下，人口的繼續不斷增加會導致僱農實際工資下降^{④⑤}。據景甦、羅崙對清末山東某些地區僱工工資的調查推算，1908年，長工的年薪只合高粱324斤，短工的日工資只合1.92斤。這一工資已降到維持生存必不可少的口糧水平線之下^{④⑥}。

註七 史學界有一個公認的觀點，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經營地主是難以和租佃地主競爭的，因此中國農村中佔統治地位的是租佃地主^{④⑦}。整個清代可以看作是經營地主沒落和租佃制日漸盛行的時代^{④⑧}。但是，我們認為在傳統社會這個觀點是對的，但不適用於

④④ 趙岡、陳鍾毅著：《中國經濟制度史論》 頁13-14（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④⑤ Kang Chao(趙岡)：“The Trend of Real Wages of Farm Workers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中央研究院經濟所主辦：「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台北：1989）。

④⑥ 景甦、羅崙：《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 頁63。

④⑦ Kang Chao: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An Economic Analysis*, pp.132-160.

④⑧ 趙岡：《中國土地制度史》 頁294-306（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趙岡、陳鍾毅著：《中國經濟制度史論》 頁162-164。

近現代中國社會。

我們先來分析為何經營地主會讓位於租佃地主之理由。在人口壓力下的農業經濟可用圖8.2所示的模型表示。當可耕地總數固定，農業人口超過 L_2 值時，農業生產的邊際生產率已低於維持增加勞動力之口糧。而經營地主僱傭長工生產，至少要維持這些工人的生存。也就是說，僱工的工資是不能低於圖8.2所示生產曲線中F點的斜率。這樣當人口密度極大時，僱工變得不如租佃土地合算^④。趙岡曾指出「僱工的工食費是地主自營農場成本中最重要的一項。有人比較沈氏《農書》中所說的每名長工工食費用與抗戰前普通長工工資飯食費用一樣高。也就是說，到了明末經營地主的生產成本已達到無法降低的程度」。這時，地主把土地出租給家中有剩餘勞動力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就合算得多，農民必須上交之田租率可達總收成的一半以上，他們耕作地主土地上得到之收益雖不能養活投入土地之勞動力，但這部分勞動力本是自耕農半自耕農家中剩餘之勞動，租種地主土地仍有助於改善家庭生計。這樣，「在人口不斷增殖，人口密度不斷上昇的狀況下，地主自己經營農場的相對利得漸漸不如出租土地所得為多，後者便逐漸取代前者」^⑤。我們認為上述分析成立必須有兩個前提。

第一，經營地主的生產函數和半自耕農相同，如果經營地主生產率比一般農戶高，即使經營地主支付較高的工資，總收益仍可能比租佃地主大。第二，傳統農村中自耕農半自耕農擁有的剩餘勞動力除租種地主土地外，不可能有其他出路。我們可以想像如果農民中形成打短工的習慣，這些剩餘勞動力出去打短工，仍可以接受低

^④ Kang Chao: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An Economic Analysis*, p. 139.

^⑤ 趙岡、陳鍾毅著：《中國經濟制度史論》 頁130-131。

於維生口糧之工資，短工足夠多同樣可以維持經營地主之生產。事實上，那些家中仍擁有小塊耕地之農民，即使去地主家當傭工(但仍回家吃飯)，同樣是可以接受低於口糧之工資的。維持他們生存仍要靠家庭擁有小塊耕地，但低於口糧之工資也有助於改善家庭生計。這時經營地主必須讓位於租佃地主的條件不再成立。生產函數和農村剩餘勞動力利用方式無疑取決於社會結構，1895年以前，趙岡對農村中經營地主衰落原因分析基本可以成立，清朝實際上是租佃地主佔主導地位的；但是1895年後，支持趙岡提出的機制的上述兩個前提均不再適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中國農村的經營地主和富農經濟有一個重新興起之過程。

1895年後，城市人口增加，社會對商品糧需求日益增大，而清末經營地主大多是順應着社會對商品糧之需求和經濟作物生產而發展起來的。他們大多來自農民而非傳統紳士。由於經營地主和富農親自參加農業生產管理、組織，並擁有比一般農戶更多的資金，更好的工具，使得經營地主的生產函數和傳統半自耕農不同，據景甦、羅崙考察，經營地主土地的平均產量遠高於一般自耕農佃農(表8.7)。黃宗智根據「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研究人員在華北平原

時間	類別	麥子	高粱	穀子	苞米	備註
光緒30年 (1904年) 左右	太和堂 單位面 積產量	124-165	250-350	300-400	250-320	均係 旱田
光緒30年 (1904年) 左右	當地一 般農戶 單位面 積產量	70-120	110-250	125-250	110-250	均係 旱田

取自景甦、羅崙：《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頁138 (山東：人民，1959)。

表8.7 太和堂(經營地主)與當地一般農戶單位面積產量比較(1904)

(單位：市斤/市畝)

33個自然村的調查資料對經營地主的生產率進行了考察。他發現，雖然經營地主的畝產量並不一定高於一般農戶，但是經營地主所使用的單位勞動力的生產率遠遠高於一般農戶。當經營地主的畝產量和一般農戶相差不大時，經營地主在土地上投入的勞動力遠遠少於一般農戶。黃宗智還進一步發現，經營地主這種生產優勢主要來自於地主親自參加農業生產管理，在親自經營中，他可以做到讓單位勞動力發揮最大生產能力。正因為地主親自管理是生產力高的原因，故經營地主經營的土地不能超出地主一個人能管理的規模。當土地一旦超過200畝，經營地主不能親自管理時，生產力優勢也就會喪失^⑤。因此，我們可以說，近代經營地主由於親自參加管理，使得生產能力高於一般農戶，即使他們按僱農生存必須之口糧支付工資，所得仍高於一般租佃地主。這是近代經營地主有別於傳統社會而能興起的第一個原因。

我們可以通過一個實例來分析上述機制。清代孔府放棄經營土地而轉向出租是學者們在討論傳統社會經營地主衰落時常舉的例子。孔府的齊王莊、南池莊在順治年間同時並行三種經營，一是官種（即地主經營），二為分成租，三為定額租。畝產以官種為最高，大約是分成租土地的一倍。但是官種生產成本太高，如齊王莊順治十一年（1654年）官種所獲糧食112.8石，扣除傭工伙食25.11石，牛、騾的豆類飼料37.64石，加上搭建牛棚的開支，剩餘不及一半。這樣官種不如分成租有利，順治十二年（1655年），齊王莊和南池莊將官種改為土地出租^⑥。這裏起關鍵作用的是官種所付出的管理費用。由於官種的畝產幾乎是分成租的一倍，即使官種要付出的成本

^⑤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頁142-181。

^⑥ 賴惠敏：〈清代山東孔府莊田的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 頁144-145（台北：1989）。

(僱工工資和其他費用)佔總收入的一大半，剩餘仍比分成租要多。但在傳統社會對於大多數縉紳地主來說，他們是讀書人，是知識精英和地方領袖，生產管理不是他們所長，也不是他們主要的興趣所在。他們必須請人來管理經營，將管理費用加到成本上去，經營土地收益就比出租收益來得低。如果地主親自參加經營，立即就顯示出經營地主對租佃地主之優勢。黃宗智曾指出，他所了解的近代經營地主所親自經營的土地，大多都不超過200畝。當地主擁有土地超過200畝時，常保留200畝上下作為自己經營土地，其餘出租，這正說明經營地主的生產優勢在於地主親自經營。黃宗智指出，華北經營地主之收益明顯高於租佃土地的收入^⑤。正因為近代經營地主這一特點，它在農業經濟中不能完全壓倒租佃地主，只能在農業生產中佔一定的比例。

至於自耕農半自耕農家庭剩餘勞動力是否可以轉化為僱傭勞動力，這無疑取決於農業的商品化程度和農村基層組織之變化。各種資料表明，近代以後，農村中使用最多的僱傭勞動力不是長工而是短工。短工主要不是靠工資為生，他們的工資往往在生存必須口糧數之下。農村短工大多來自自耕農和半自耕農，他們耕種的一小塊土地是能夠接受如此低水平工資的原因。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傳統社會中，租佃制之所以盛行，並成為地主制的主要形態，這不僅僅是人口壓力和經濟本身原因所造成，而且還是政治、經濟、文化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近現代隨着傳統社會結構的解體，經營地主和富農則又可以興起，成為農業經濟中一種重要的成分。

註八 農業的內捲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是人類學者 Clifford Geertz提出的。他把其稱為在人口壓力下，小農不得不在狹小的耕

⑤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頁180-181。

地上投入過多的勞動力，以致勞動力集約化的程度達到邊際報酬不斷遞減的程度^{⑤④}。Mark Elvin將類似的概念用於中國傳統社會^{⑤⑤}。但是無論Geertz還是Elvin的解釋，內捲都只是一個描寫人口壓力導致土地邊際生產率不斷減少概念。黃宗智進一步將這一概念深化，提出「內捲」在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上的含義。「內捲」過程之所以可能，主要是因為在人口壓力下擁有少量耕地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可以接受比純粹僱傭勞動更低的工資，從而具有更大的競爭能力。

註九 我們可以用人口壓力下的農業經濟模型來證明，在租佃制條件下出現土地兼併，失去土地的農民大多不能轉化為佃農，他們因不能被農業吸入而轉化為流民，成為社會動盪的根源。假定原來農業人口處於圖8.3 L_5 值，所有農業人口均是自耕農，發生土地兼併；總人口 L_4 中有 ΔL ($\Delta L = L_5 - L_3$) 變為無地農民，我們來分析一下 ΔL 能否轉化為佃農？由於 L_3 仍處於F點右邊， L_3 點的邊際生產率仍低於單位勞動力必須的口糧數，它意味着農業經濟結構中尚存在大量過剩勞動力，地主將土地租給有剩餘勞動力的自耕農更為合算。也就是說，地主如果把土地租給佃農，純佃農是不能接受無法養活勞動人口之苛刻地租的。但家庭有剩餘勞力之自耕農卻可接受這麼苛刻的條件。因此，被兼併的土地大多租給原來有小塊土地之自耕農，使他們變成半自耕農，失去土地的農民無法被農業經濟吸收。如果城市經濟無法接受這些剩餘勞動力，他們只能遷移到偏遠地區或成為流民。

⑤④ 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⑤⑤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近代史研究者承認，清朝的流民狂潮出現在1755年後，它正值清王朝由盛轉衰，土地兼併猛烈發展之際。當時出現了人口由密集的中原地帶向台灣、廣西、四川、貴州、雲南大遷移。例如台灣的人口，康熙以前不足十萬，康熙初年增至二十萬，乾隆中期達百萬，嘉慶二十年已達二百萬。與此同時，秘密結社大發展。據統計，中國秘密結社的名目，多至三四百種，其大部分均是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後出現的^{⑤⑥}。

註十 農業結構沿D—A—B—C鏈轉化的同時意味着總產值的降低。在當技術和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農業產量主要取決於農民對土地精耕細作的程度。當人口壓力很大時，自耕農已在單位土地上投入了最大的勞動量，因此自耕農經濟的總產量是最高的。在佃農經濟和貧農經濟中，農民勞動積極性都不如自耕農經濟，因此當自耕農經濟向佃農、貧農經濟轉化時雖提高了糧食的商品率，但總產量卻可以是遞減的。表8.8是1821—1911年的收成，從中可以看到農業產出在不斷減少。表中數字包括直隸、河南、山西、陝西、安徽、江蘇、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十省資料，唯夏季收成中無浙江資料。

註十一 Fernando Galbiati對大革命期間海陸豐農民運動的研究表明，單單運用列寧式的組織技巧，來煽動被動的農民，並不能把由菁英主宰的革命團體轉化為以群眾為基礎的地方運動。他發現這種轉化，是一種複雜的相互順應及理念調適的結果^{⑤⑦}。這種「理念調

^{⑤⑥} 蔡少卿：《中國秘密社會》頁6—7。

^{⑤⑦} Fernando Galbiati: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年 代	夏季收成(%)	秋季收成(%)	平均數(%)	指 數
1821-1830	71.0	74.0	72.5	100
1831-1840	66.8	66.6	66.7	92
1841-1850	66.7	66.0	66.4	92
1851-1860	63.0	63.5	63.3	87
1861-1870	58.5	60.0	59.3	82
1871-1880	57.5	58.8	58.2	80
1881-1890	58.8	57.0	57.9	80
1891-1900	57.5	55.0	56.8	78
1901-1911	57.5	55.0	56.8	78

取自李國祁：〈濟季的栽培經濟作物與改善農村經濟減輕人口壓力〉，《台師大歷史學報》，第12期（1984）。

表8.8 1821-1911年的糧食收成

適」其實可以用更精確的概念來把握，首先是小農半無產階級化使得他們有別於傳統農民，另一方面就是馬列主義要調整到適合他們的口味和心理結構。

西方社會科學家在討論列寧主義政黨在亞洲擴張和共產國際策劃輸出革命時，對生活在不同傳統下的東方各國農民本身的差異是不夠重視的。例如中國共產黨和印度共產黨，兩者皆由共產國際策劃，都屬於布爾什維克革命，甚至印度共產黨也爭論過應該採取城市革命還是由農村革命包圍城市這樣的路線問題，華仿過中共在延安時期聯合資本家和地主對抗。但兩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出現了完全不同的結局⁵⁹。因此，中國共產黨農民政權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取

⁵⁹ Manoranjan Mohanty: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Indian Communist Movement*.

決於中國傳統，而不能用統一的共產國際輸出革命來解釋。傳統起的作用則表現在農民是否可能成為基層社會管理者以及新意識形態在他們中間傳播需要做甚麼樣的改造之上。

註十二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農村，就組織性而言，實際上存在着三種不同成分。一種是傳統式的小農（以比較富有的具有自耕農心態的中農為代表），另一種是無業流民，第三種是類似於無產者的貧下中農，只有他們具有小農和勞動力出賣者的雙重角色。適合於共產黨作為基層幹部的，只是第三種農民。J. Perry通過對淮北的安徽及江蘇兩省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農民組織的研究，發現除共產黨農村政權外，還有兩種形態。一種是保甲和團練，他稱為保護性組織，另一種是掠奪性的，包括走私集團、從事搶劫的黑社會等。在1937-1945年間，這兩種組織對中共的農村革命阻擾高於助益^⑤。這正好表明，團練保甲這類農民組織的成員主要依靠傳統小農，而掠奪性農民組織的成員基本上來源於流民，不同類型的農民適應於不同組織的方式。因此，共產黨要建立農村政權，必須對農村中幾種組織因素作出明確區分，把新意識形態直接對準適合於它傳播的那些成分——具有傳統小農和僱傭勞動雙重角色之貧農。

註十三 在井崗山時期，紅色政權實行的土地政策是「土地國有化」。一切土地歸蘇維埃，農民只有使用權。根據《井崗山土地法》，沒收的不單單是地主土地，富農中農的土地所有權也受到損害。這種政策對農村生產力造成很大破壞。毛澤東在1934年所寫的〈我們

^⑤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的經濟政策》中自己承認，紅色區域在建立的頭一二年，農業生產往往是下降的^⑩。毛澤東早在1931年〈給江西蘇維埃政府的信〉中就對這種政策提出疑問，但是毛澤東的觀點被認為「實際上以中農為中心」，甚至是「富農路線」^⑪。一直到1934年，毛澤東的觀點仍受到中央批判。中共土地政策的改變是在抗日戰爭時期，首先，它同毛澤東再次掌握領導權有關，它是熟悉農村的領袖取代第三國際和忠於馬列經典領導人的結果。另一方面，全面抗戰爆發後，國共再次合作，共產黨的土地政策，不得不接受三民主義而有所改變。因此，自遵義會議後，我們可以看到共產黨的土地政策日益現實。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頒發〈黨中央關於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193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發佈〈中央關於土地政策的指示〉，規定「富農的土地及其多餘的生產工具均不沒收」，「對於大農業主（主要的不依靠地租剝削而依靠大量僱農經營土地或畜牧的業主）的土地，因其生產方式帶有進步的色彩，應按照對待富農的政策辦理」^⑫。

註十四 延安整風在中共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是近現代史家公認的。最近，陳永發通過對這一過程之細緻分析指出，延安整風以前中共並無有效的方法來整頓幹部思想，使其和中央高度一致。延安整風使中共找到統一黨員思想之手段。正是在延安整風後，黨員的小我活動空間愈益縮小，甚至到了不存在的地步。延安整風中毛澤東清理幹部隊伍和斯大林整肅不同，是用教育改造來代替開除黨籍、遠

⑩ 《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117。

⑪ 〈中央為土地問題致中央蘇區中央局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集 頁507、511（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⑫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集 頁57-58。

捕和死刑，形成中共特有的整風運動模式^③。我們認為，延安整風之所以能達到這一功能，關鍵在於馬列主義的儒家化，這種新的意識形態成熟可以使中國共產黨有效地統一思想，保持高度的一致，而用某種具有中國特色新意識形態統一黨員思想之過程，最好是用整風的方法。延安整風有兩部分內容，一是樹立毛澤東思想的權威，它屬於指導黨的意識形態的改變。另一部分為整頓和清理幹部隊伍，它是用毛澤東思想來考察幹部過去和現在的言行，強化他們對毛澤東思想之認同。這兩環互相連接，缺一不可。實際上，當黨的意識形態發生重大改變，黨的領導人企圖用改變了的意識形態重新建黨之時，一定會出現類似於延安整風這樣的運動。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第二次大變化是在文革期間，毛澤東思想變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了讓毛澤東思想統一全黨，中共再次發動對幹部的整肅。我們在文革中看到和延安整風類似的局面，一面是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另一方面是大整特整幹部和知識分子，文革只是規模比延安整風更大。很多幹部都在文革一開始就感覺到文革整幹方式和延安整風的類似性，它表明，用意識形態統一政黨之過程有着自己內在的展開邏輯。

註十五 用某種意識形態來整合社會，必須做到大傳統和小傳統的互相適應與銜接。在中國傳統社會，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學只是大傳統，它和農民文化(小傳統)是互相滲透、互相連接的。正因為這樣，官方意識形態可以廣泛深入基層，在農村中發揮作用。用新意識形態來實現社會整合，同樣必須做到大傳統與小傳統之適應與吻合。馬列主義儒家化正好有這個功能。馬列主義吸取儒家文化結構，不僅有利於農民文化進入意識形態中，而且可以使作為官方意

^③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 近史所專刊60 頁145-146 (台北：1990)。

識形態的毛澤東思想和基層農民幹部中各種小傳統思想合拍，從而產生巨大的動員力量。

註十六 馬列主義儒家化和毛澤東成為聖王之間還存在着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這就是重寫黨史。馬列主義儒家化只是意識形態結構的轉換，聖王則要求某一個或幾個黨的領袖一開始就是這些正確原則的體現和代表。馬列主義只有儒家化和農民化才能指導中國革命，這是中共在長期摸索中慢慢明白的，而毛澤東等人並非一開始就有這樣的主張，或雖提出類似建議但也並不是對自己的理論有那麼大的信心。毛澤東成為聖王的前提除了他的理論被全黨接受外，還必須重寫黨史，把毛澤東描寫成一開始就是正確理論的代表，黨史是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鬥爭的歷史。塞奇(Anthony James Saich)曾指出，正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黨史被改寫。毛澤東在新的黨史中被置於中國共產黨革命運動之中心，從而獲得了至高無上的領導地位^④。

註十七 自1895年出現紳士城市化潮流後，近現代史上只有兩次知識分子從城市流向農村的潮流。一次是五四運動後至大革命期間，五四青年下鄉搞農運，參加革命運動。第二次就是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當時青年是否下農村，成為是否革命的標準。毛澤東曾在1939年五四二十周年寫過一篇著名文章〈青年運動的方向〉，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一個區分青年知識分子是否革命的標準，這就是看他願不願意和工農相結合^⑤。他認為中國青年知識分子起過

^④ 塞奇(Tony Saich):〈正確的黨史從哪裏來?〉《二十一世紀》總第12期(香港:1992)。

^⑤ 毛澤東:〈青年運動的方向〉《毛澤東選集》(一卷本) 頁525-533。

兩個作用，一個是五四時期的先鋒作用，首先接受馬列主義，另一個是當時所起的橋樑作用，即把馬列主義傳播到工農群眾中並和工農革命相結合。今天我們可以依據中國社會整合的結構性分析對毛澤東的這些觀點進行解讀。第一個先鋒作用不用多講，它是五四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更替過程中的功能。為甚麼毛澤東在三十年代末要大講青年知識分子的「橋樑作用」，並把他們是否願意到農村和農民結合作為革命的標準呢？這無疑反映了一個基本事實，本來青年知識分子大多都生活在城市，工作活動範圍也在城市。1939年全面抗戰已經開始，沿海大城市大多淪陷，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從沿海城市流向內地和農村抗日根據地的新潮流出現了。毛澤東寫這一文章無疑對準了這一形勢。他希望大量青年知識分子進入農村，和貧農幹部結合，把農村革命組織起來。

事實上，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青年知識分子流入農村根據地，確實達到了毛澤東想取得的成果。1943年的陝甘寧邊區，上級領導幹部70%以上是青年知識分子，縣級幹部40%具有初中或小學畢業程度，而區、鄉級幹部中則90%是土地革命中湧現出來的農民積極分子^{⑥⑦}。

註十八 一些學者認為，精兵減政還有一種促使較有文化的幹部向下流動，使基層更有活力之功能，它有利於擴大基層幹部的政治參與。顯而易見，精兵減政是一種幹部向下流動之機制，在這種上下流動中，「群眾運動中具有自發性的基層幹部聯繫了中共中央及地方群眾……成為中共在內戰期間改變傳統中國農村面貌的動力來源」^⑧。

^{⑥⑦} 天兒慧：《中國革命和基層幹部——內戰期的政治動態》（東京：研文出版，1984）。

第九章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

新民主主義最大的特點就在於它的結構是不穩定的。新中國四十年的歷史證明，它猶如夾在彈簧中的彈子，向左偏移就會發展成文化大革命，向右偏移則趨向自由化，導致意識形態的解魅。

9.1 超級官僚社會的確立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一片萬歲聲中登上天安門城樓，據說，這位身經百戰鋼鐵般的領袖曾扭過頭，不讓人們看到他那奪眶而出的眼淚。他一定反反覆覆思索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中國四千年歷史中的含義。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這一歷史意義十分清楚：中華民族擺脫了1840年來屈辱挨打的局面，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57.04.01 經過一百多年的奮鬥，中國終於找到一種既能實現遼闊農業社會整合，又能抗拒西方列強外來衝擊的社會結構。但是，當時很少有人想到，它是以中國變成超級官僚社會為代價的。我們把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國民黨建立的社會結構以及共產黨整合模式作一歷史性比較，就可以發現，意識形態與政治一體化組織方式沒有改變，但官僚機構卻一個比一個龐大。傳統社會中，國家正式編制的官僚組織末梢是縣一級，縣以下一體化組織形態是鄉紳自治與宗法組織，它們是民間社會(圖9.1A)。在這種組織方式中，一體化結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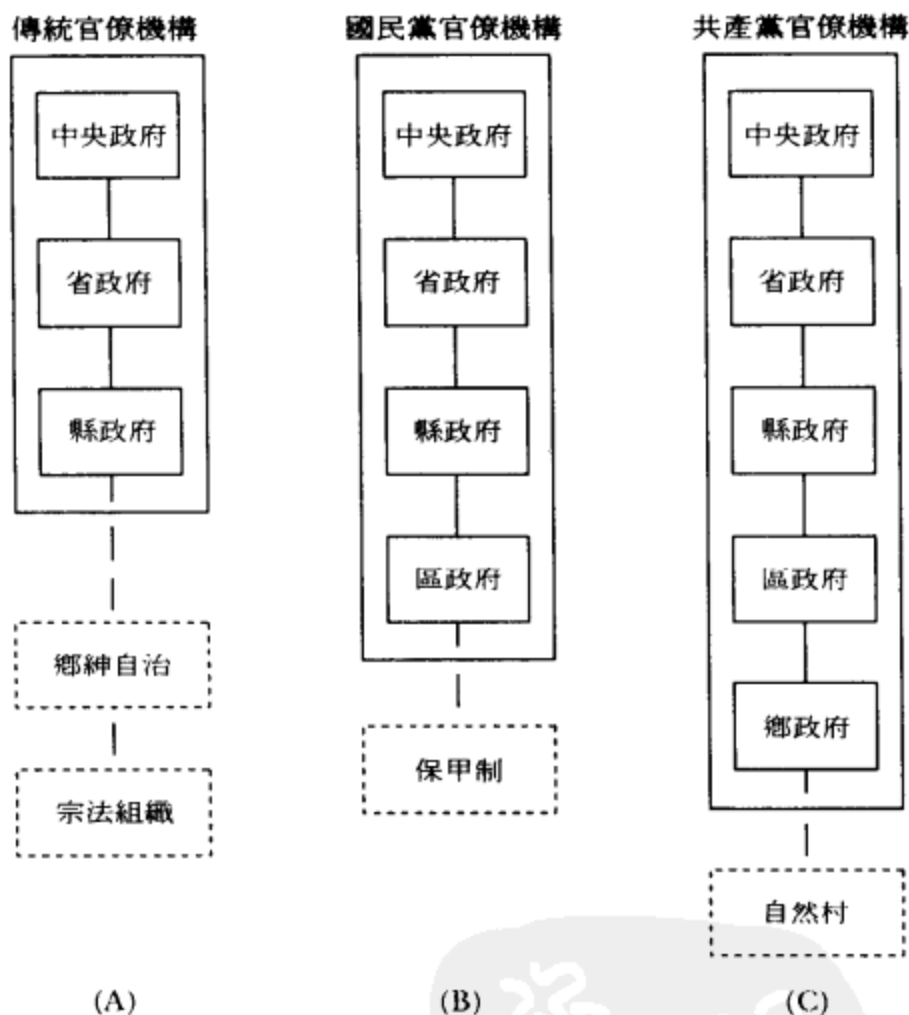


圖9.1 官僚機構的大擴張

體是鄉紳自治和宗法組織，重心是農村，它能實現農業社會內部整合，但並不具備動員農村人力物力以實現工業化和抗拒西方衝擊的能力。當儒生鄉紳走向城市從事現代化以求抵抗外來衝擊之際，就出現了一體化的解構。國民黨企圖用官僚組織來代替傳統一體化結構的三個層次，但在農村缺乏幹部，官僚機構只比傳統結構深入一

個數量級：由縣到區(圖9.1B)。它雖然實現了社會組織由農村中心向城市中心的轉化，但仍然未具備對農村的廣泛動員力，由於整體動員力量已比傳統結構大，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第一次有效地抵抗了強大的外來入侵。在共產黨組織系統中，有近於無限的幹部來源，官僚機構可以涵蓋從中央到基層的一切層次，它輕而易舉地把國家官僚控制由區再向下延伸一個數量級，到達鄉政府，而且還有着進一步擴大的可能，以致每一個自然村都在政府控制之下(只是由於經濟上的考慮，鄉以下的村幹部不屬於國家正式官員編制)(圖9.1C)。共產黨的官僚機構比國民黨大十倍，比傳統一體化結構大一百倍。傳統社會官僚人數大約是數萬人(不算吏員)，國民黨官員有七十萬人，而共產黨的官員則高達幾百萬人的數量級。1953年，拿國家薪水的全國幹部總數已達390萬。1957年，共產黨員人數達1,272萬人，到八十年代初中國擁有四千萬黨員、二千五百萬國家幹部，這是歷史上聞所未聞的官僚機構龐然大物。隨着國家官僚網達到社會底層，近代以來不斷萎縮中的民間社會終於消失，五十年代中國社會組織達到徹底的官僚化。

當每一個村莊、每一條街道，甚至每一個人都在無所不包的官僚組織控制之下時，就意味着國家掌握了空前未有的動員與控制力量。特別是官僚相對清廉，意識形態尚有魅力之際，近代史上常被喻為一盤散沙的中國出現了組織革命，六億人組織成空前的列維坦。五十年代初，共產黨就利用這巨大的調節能力解決了歷史上從未解決的問題：黑社會絕迹，一夜之間關閉了妓院，政府用糧食徵購和配給戰勝了十幾年來一直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並在一次大規模的現代化戰爭中，挫折了西方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在五十年代初朝鮮戰爭中，中國人民志願軍雖然軍事裝備處於劣勢，而且完全缺乏空中作戰能力，卻能殲敵70餘萬，其中美軍28.5萬，擊毀敵機一萬多架，毀傷坦克2,000多輛，敵方戰費消耗為200億美元以

上^①，令自本世紀初以來對外戰爭無往不勝的美國第一次受到抑制。超穩定系統1840年因無法對抗西方工業文明衝擊被迫對外開放，五十年代初朝鮮戰爭的勝利卻標誌着對西方開放的結束，它反映出超穩定系統在對外開放條件下結構變遷的邏輯：新一體化結構順應着抗拒西方工業文明衝擊的歷史需要成長，而既可實現內部整合，又能抗拒西方列強的新一體化結構，只能是一個超級官僚社會。

9.2 利用農業積累實現工業化

中國共產黨建立一個能夠深入農村之龐大官僚機構，無疑有利於動員農村人力和物力，將農業積累轉化為工業投資。傳統社會工業化的資金大多都來自於農業積累。因此，由一個超級官僚機構來完成中國社會之整合，對於工業化也許是一種合符邏輯的選擇。我們只要把三十年代南京國民政府致力於工業化與五十年代共產黨工業化運動作一比較，就能看到這一點。

三十年代，中國社會經濟積累率極低。1931至1936年六年中，只有兩年具有正投資，其餘四年投資額均是負數。兩年正投資中，最高的也只有可支配國民收入的6%^②。南京國民政府拿不出現代

① 關於美軍傷亡人數，中國和美國估計數目並不一致，本文採用的是中國公佈的數目。詳細數據可參見朱建華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頁64（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而美國認為，美軍在韓戰中死亡24,000人，失蹤9,000人，被俘2,675人，受傷10萬人。軍費為200億美元。參見Wayne Andrews ed., *Concis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er's Son's, 1962)。

② 汪海波：〈略論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資本積累和消費在量的方面的若干特徵〉《江西社會科學》第4期（南昌：1983）。

化投資，主要是無法動員農村資源。國民政府經濟發展中拖後腿最大的是農業。1932至1936年五年間，中國農業增長每年不及1%，1936年二十二個省的總生產與1932年完全相同；1932年到1936年的平均數，比1932年還要低^③。而且，整個三十年代農業生產量較之二十年代呈下降趨勢：小麥的平均年產量由49,286萬擔下降到44,464萬擔，大米的平均年產量由119,630萬擔下降到98,430萬擔，玉米、高粱等雜糧由86,031萬擔下降到76,564萬擔^④。農業生產停滯和衰退的關鍵在於地主經濟。地主佔據農業產值之大頭，使國家拿不到足夠的農業稅收，農民也生活在極度貧苦之中。國民政府既做不到耕者有其田，也不能阻止農村解體。1949年後，共產黨迅速在農村實現了土地改革，大約有100萬到200萬地主被處死^⑤，地主階級被消滅，中國的農村出現了一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無地主之自耕農經濟。農業經濟結構的變化使國家稅收大幅度上升。

根據1953年1月全國財經會議規定，老解放區的農業稅定在20%左右（華北為18.66%，東北為19.66%，山東為21%），新解放區定為15%。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稅收，在傳統一體化結構和國民黨整合模式中，農村經濟中一直是地主與自耕農兩種經濟成分並存。當農民耕地不足，或地主把田賦轉加到佃農身上時，高達20%的田賦是農村無法承受的，因為除了田賦，佃農還必須向地主交納佔總收成50%以上的田租。現在農民只要拿出20%收成交給國家，其餘自得，生活自然得到極大改善，勞動積極性也增高。國家

③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572。

④ 許道夫：《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頁33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⑤ 費正清、麥克法夸爾(J.K. Fairbank & R. Macfarguhar)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王健朗等譯 頁9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既得到了較大的稅收，農民也實現了休養生息，農村社會生產迅速恢復。共產黨統治大陸的頭幾年(1949-1952年)，農業總產值持續增長(表9.1)，並很快超過了三十年代農村尚未破壞時達到的最高水平(表9.2)。從1949-1953年的短短幾年間，糧食生產增加47.4%，

時 間	農業總產值 (億元)
1949	326
1950	384
1951	420
1952	484

取自董志凱：〈土地改革與我國社會生產〉，《中國經濟史研究》，第3期(北京，1987)。

表9.1 1949-1952年的農業總產值

1949年前主要農產品 最高年產量		1952年農產品產量 (以49年前最高年為100)
糧食(萬噸) 1936年	15,000	109.3
棉花(萬噸) 1936年	84.9	153.6
大牲畜年底 頭數(萬頭) 1935年	7,151	106.9
豬(萬頭) 1934	7,853	114.3

取自前引董志凱

表9.2 1952年農產品的產量

棉花增產164.6%，這在世界農業發展史上是少見的^⑥。

在農業穩定發展的同時，農業積累開始迅速轉化為工業投資。三十年代國民黨中央政府拿不到多少農業稅，田賦只是省政府的收入。而在共產黨整合模式中，所有田賦和農業收入幾乎都可達到中央政府，省一級財政只是5%的農業稅附加和3%的總預備費，縣和鄉則無權支配稅收^⑦。因此，農業積累轉化為工業投資的過程，在國家干預下得以迅速進行。共產黨五十年代城市經濟結構和國民黨後期一樣，是一種國家資本佔主導地位的市場經濟，但共產黨的官僚機構卻遠比四十年代末的國民黨清廉，國營企業效率較國民黨的要高。中國的工業化獲得了史無前例的良好發展條件，工業生產開始大幅度增長。1950年工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36.4%，1951年又增長了38.2%，1952年的增長率是32.2%，1953年為30.3%，到1954年工業生產已完全恢復到破壞前的水平，而且增長速度仍很快，年均增長率達16.3%^⑧。

共產黨政治結構雖然和國民黨類似，是一黨獨大和一黨專政，但意識形態比國民黨更有魅力。當時指導社會改造的政策比較實際，是和孫中山三民主義無太大差異的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強調無產階級領導，但對資產階級卻抱着團結改造的態度，並沒有提出對資產階級思想及各個領域進行專政，一時意識形態仍處於相對開明和寬鬆的狀態。總之，五十年代初中國發展的形勢遠勝過國民黨時代的「黃金十年」。這一切表明，雖然中國已變成一個超級官僚

⑥ 董志凱：〈土地改革與我國的社會生產〉《中國經濟史研究》第3期（北京：1987）。

⑦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 頁481（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⑧ 馬齊彬、陳文斌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頁26、43、57、72、88（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社會，但民間社會萎縮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以及強大意識形態對人的壓迫一時還沒有表現出來，而中國人在近代史上追求的兩個目標「富」和「強」，也似乎可以用這種組織方式實現。五十年代初中國出現的那種百廢待興、欣欣向榮的局面是這樣動人，以致今天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中國只要順着新民主主義道路走下去，即使發展不到今日日本之洋洋大觀，至少也會如台灣那樣繁榮。正如一首家喻戶曉的歌所唱：「我們偉大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但是，歷史發展的詭秘在於，當巨大的改造社會力量被釋放出來，它就如自然界的洪水、風暴和地震一樣，人們不可能把它作用的範圍限制在預想目的之中。那種使中國可以去實現「富」、「強」的組織力量立即造成了對社會結構的全面衝擊。它們來得那麼猛，那麼出人意料，就在應付這些衝擊的過程中，社會組織構架和發展方向也隨之發生了重大改變。新民主主義如過眼煙雲，迅速被放棄。中國滑入對現代化會造成巨大障礙的計劃經濟結構，並重新出現新一輪意識形態變遷與社會組織急速變構的動盪。

9.3 商品糧短缺和「統購統銷」

中國共產黨五十年代初改造社會最大的成就是實現耕者有其田。消滅地主階級使國家能將農業積累轉化為現代化投資，但它卻造成了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後果，這就是農村向城市提供商品糧機制的破壞。

在地主經濟結構中，佃農、半自耕農生活極端貧困，終年耕作不得溫飽，他們不能出賣商品糧。自耕農雖有小部分餘糧，但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卻使他們很少把餘糧轉化為商品糧，因此，地主經濟結構中向城市提供商品糧主要是靠地主。在中國封建

社會裏，每個王朝後期都會出現城市病態繁榮，城市人口急增，這和農村中土地兼併，地主能提供愈來愈多的商品糧有關[註一]。1895年後傳統一體化解構，經營地主和富農興起，他們和租佃地主一起成為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城市商品糧最大的提供者^⑨。經營地主以生產商品糧為目的，僱工又便宜，因此在單位土地上他們所能提供的商品糧遠比租佃地主高。根據對兩種商品糧生產方式的實地調查，可得如下公式：假定穀物產量為10，租佃地主出售的穀物量為：

$$10(\text{總穀物量}) - 2(\text{地主家庭消費量}) - 5(\text{佃戶保留穀物量}) = 3$$

而經營地主出售的穀物量為：

$$10(\text{總穀物量}) - 2(\text{地主家庭消費量}) - 1(\text{僱工食用量}) = 7$$

也就是說，經營地主出售穀物量比租佃地主高一倍多^⑩。表9.3為山東某經營地主的案例，在全年糧食總收入(1480-1850百市斤)中高達20%的是向市場提供的商品糧(1002-1380百市斤)。雖然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農村出現大破壞，但富農、經營地主日益興起，地主經濟向城市提供商品糧的機制仍在運作。我們在3.4節討論過，1840-1936年中國農業糧食商品率逐步從10%提高到30%[註二]。它是近現代通商口岸和資本主義成長的條件。1949年後，經營地主和租佃地主被消滅，富農經濟也受到限制和打擊，城市商品糧供給立即呈短缺狀態。

根據土地改革的實施方案，全國農村土改分三批進行，第一批

⑨ 楊君實：《現代化與中國共產主義》 頁57-58（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

⑩ 景甦、羅嵩：《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 頁145。

全年收入	麥子	高粱	穀子	苞米	其他 (豆類、芝麻等)	共計
	260-345	360-480	330-360	500-630	28-42	1,480-1,850
全年分配 (百市斤)	食用糧食					商品糧食
	家內人口	長短工	商店員工	其他		
	172.8	172.8	60.48	72	1,002-1,380	
備註	按四十八人每人每月食用三十斤計算	按長工十四人、短工(計日)約三千六百個，每人每月食用六十斤計算	按十四人每人每月食用三十六斤計算	包括流動人口及牲畜消費等	此項糧食在集市變賣後，用於支付僱工工資，購置土地，修建庭院，備置衣物，或直接轉為商業和高利貸資本	

取自景魁、羅崙：《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頁57（山東：人民，1959）。

表9.3 太和堂全年糧食收入和分配

是1950年冬至1951年春在1.2億多的農業人口地區進行。第二批是1951年冬至1952年春實施，涉及1.1億農業人口。第三批則在1952年冬至1953年春實施。1953年春天，土改已全部完成，而糧食供給短缺則出現於1953年秋季。當時國家需要商品糧700億斤，而田賦（農業稅）收入只有275億斤，兩者相差431億斤^①。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是土地改革必然帶來的後果。經過全國土地改革，3億無地少地的農民獲得了7億畝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

^① 馬齊彬、陳文斌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 頁70。

納的大約700億斤糧食的苛重地租^⑫。本來，這700億斤作為地租的糧食大部分可以轉化為向城市提供的商品糧，供求保持着平衡，但現在這些糧食卻大多為自耕農自己消費或存在家中。據統計，1949年農村人均糧食消費370斤，1952年增加到440斤，每個農村人口多耗糧食70斤^⑬。雖然國家全力向農民收購餘糧，但差額仍達87-117億斤^⑭。一時市面上糧食大幅度漲價，人心浮動。由於這次商品糧短缺是因農業結構變化以至破壞商品糧供給機制引起，除非中國農村在短期內迅速分化，由自耕農經濟轉化為專業化生產的資本主義結構，否則商品糧短缺將會長期存在，而且將隨着現代化和城市人口增長日趨嚴重。共產黨靠農村土地革命起家，當然不允許農業演變到資本主義或重新回到兩極分化的經營地主、富農經濟中。這樣，只能去建立新的糧食供給機制來解決商品糧的短缺，這就是利用一體化調節強迫農民把餘糧拿出來[註三]。

早在1950、1951和1952三年中，隨着土改展開，農民就愈來愈多地把糧食留在家中自己消費，農村向城市提供的糧食不斷減少。當時政府已經採用臨時性農村糧食徵購來應付糧價上漲^⑮。1953年則不得不把臨時徵購作為一種永久性機制固定下來。陳雲曾十分形象地講過1953年秋商品糧危機中，國家處於「剝奪農民」和「城市糧食供給短缺」兩者必居其一的選擇關頭。他說：全國有26萬個鄉，100萬個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擔以至暴動的事都可能發生。農

⑫ 朱建華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 頁69；馬齊彬、陳文斌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 頁18。

⑬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 頁257。

⑭ 朱建華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 頁118。

⑮ 薛暮橋、吳凱泰：〈新中國成立前後穩定物價的鬥爭〉《經濟研究》 第2期（北京：1985）；費正清等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 頁172。

民的糧食不能自由支配了，雖然我們出錢，但他們不能待價而沽，很可能會影響生產情緒。「我現在是挑着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後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採取徵購的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擇一個，都是危險家伙」^⑯。據說，陳雲曾反覆考慮，提出八種方案；最後不得不下定決心，兩害相權取其輕，選擇了對農民實行糧食徵購、對城鎮居民實行糧食配售（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辦法，這就是所謂「統購統銷」。他們認為，這種辦法和城市缺糧相比，危險性可能少一點^⑰，並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新制度下商品糧短缺問題。

統購統銷的商品糧供給機制包含「統購」和「統銷」兩個環節，兩者均需強大的直統到基層的一體化官僚組織。表面上看，統購僅僅是國家壟斷糧食收購，不允許商人插手。實際上在自耕農傾向於自給自足不願把糧食拿出來賣的條件下，僅僅靠壟斷糧食收購市場是遠遠不夠的[註四]，況且國家不能做到不斷提高糧食收購價以刺激農民賣糧，這時「統購」實際上是依靠幹部系統去貫徹，「強制性」地讓農民把餘糧用低價賣給國家。「統銷」則意味着建立一個巨大的糧食定量配給系統，它需要嚴密的戶口制度[註五]。因此，統購統銷的實行均需建立從中央直統農村和城市基層的幹部組織為保證。我們可以看到統購統銷機制代替傳統商品糧供給機制與共產黨強化城市和農村基層組織是密切相關的同步過程。1953年土改的全部完成本意味着農村各級幹部權威之確立，1954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第四次會議，通過了《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和《公安派出所組織條例》。這些都標誌着農村和城市基層組織建設已經完成。1954年（實行統購統銷後的第一年），

^⑯ 陳雲：〈實行糧食統購統銷〉《陳雲文選（1949-1956）》頁207。

^⑰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 頁265。

糧食生產雖增加很少，但糧食收購卻完成了計劃的110%，總產量3390億斤中有30.5%即1036億斤成為向城市提供的商品糧^⑩。一種依靠農村幹部強迫農民賣糧，再通過行政系統對城市居民實行糧食定量配給之機制有效地確立起來了。中國農業結構中糧食的商品率再次恢復到1936年水平(表9.4)，城市經濟才有了發展基礎。但是現在商品糧供給機制已不再是市場，而是依靠強化一體化調節。

時 間	糧食的商品率
1840	10%
1895	16%
1920	22%
1936	30%
1957	24.6%
1959	39.7%
1978	20.3%

取自穆光宗：〈中國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及評價〉，《中國人口科學》，第5期（1989）。

表9.4 1840-1978年中國糧食的商品率

9.4 城鄉隔離和農業合作化

統購統銷本來是一體化結構對商品糧危機衝擊的回應，但它本身立即產生了新的和更大的衝擊波。1953年9月18日，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裏空氣緊張，梁漱溟和毛澤東發生了公開頂撞。梁漱溟極像傳統儒臣，提醒共產黨在發展經濟中要注意農民利益。而毛澤東這

^⑩ 馬齊彬、陳文斌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 頁87、88。

位本來氣度非凡的聖王卻出人意料地過敏，認為梁漱溟的進言是反對總路線。今天人們在討論這場現代儒臣和現代聖王爭論的緣由之時，很少注意到當時的社會背景，即社會結構暗中正在發生的改變。1953年秋是商品糧危機之際，統購統銷政策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或許梁漱溟本人都沒有意識到，即將實行的統購統銷將對農民造成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剝奪，而毛澤東是知道共產黨農業稅收和歷代仁政的重大差別的。因此，他反駁梁漱溟道，你講的只是對農民實行小仁政，而共產黨正在實行的是大仁政[註六]。可悲的是，當時無論是統購統銷政策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沒有能看出這種史無前例的超級「大仁政」將對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結構產生一系列破壞性衝擊。

它的第一個後果是城鄉隔離。在中國歷史上，城市和鄉村人口從來都是互相流動的，人民在身分上從沒有出現過城市和鄉村這樣的差別，唯有參加科舉考試時，對有市籍的商人存在限制。現在城市人民是吃商品糧的，商品糧由國家配給，其數量不能自由增加。這樣，城鄉人口自由流動立即被破壞了，中國變成一個準身分制社會。

如果說，城鄉隔離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一下子還看不出來，那麼統購統銷對農業結構另一個衝擊則是立即表現出來的，這就是它促使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我們必須指出，一體化結構對農業經濟控制的強化帶來的後果必定是農業集體化，不管當時政策的制訂者是否意識到這一點。「統購統銷」既然是商品糧供給的新機制，那麼隨着經濟的發展，城市和現代化工業的增長，它所擔當的抽取農民餘糧之功能也隨之強化，與此同時，農村基層一體化組織必須加強。基層農村管理之要求會迫使農業生產組織方式的變化。我們在前面講過，在共產黨幹部體制中，國家編制內官僚機構只達到鄉一級，鄉以下的自然村是依靠不算正式編制但認同官方意識形態之農

村幹部來進行管理。他們不拿工資，作為貧農團和農協負責人，在土改中分得一份土地，耕作是他們的主要職業，幫助國家管理農村只是兼職。當國家管理農民榨取農業所得的工作變得日益重要時，無論對國家還是對這些幹部來說，鬆散的自耕農經濟都已不再適宜。國家需要強化農村基層組織，讓幹部組織農民，以便農民做出更多的貢獻。而幹部的積極性來自意識形態認同，這樣強化農村幹部對農民之管理一定會導致左的意識形態在基層盛行[註七]。對基層農民幹部來說，如果自己把主要精力和熱忱放在耕作土地、發家致富之上，就和國家對他們的管理要求背道而馳，他們自然會提出自己的口糧由其他農民提供，才有時間管理公眾事務，他們成為專門的管理者[註八]。這種利益追求會促使村幹部自發地衝擊自耕農經濟，搞他們領導下的集體經營。因此，來自基層幹部的打破自耕農經濟之衝動隨着統購統銷的實行，變得一天比一天強烈。在某種程度上，合作化、集體化實際上是農村管理體制改變帶來的對自耕農經濟不可避免之衝擊。薄一波在回憶錄裏曾指出，「合作化後，國家不再跟農戶發生直接的糧食關係，國家在農村統購統銷的戶頭，就由原來的一億幾千萬戶簡化成了幾十萬個合作社。這對加快糧食收購進度，簡化購銷手段，推行合同預購等都帶來了便利」^①。這說明，除了幹部利益，即使為了克服農村統購統銷帶來的管理困難，合作化都勢在必行[註九]。事實正是如此，1953年後農村幹部中形成了一股熱衷於農業集體化的自發趨勢。

今天，研究者常常忽略，隨着統購統銷的推行，中國農村在土改後再次重新劃分成分。這一共產黨加緊對基層控制的措施意義重大，土改後有些貧農上升為新中農，共產黨再次申明在農村中依靠貧下中農，這無疑給廣大貧農幹部以一種巨大的示範，告訴他們分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 頁276-277。

到土地後，當自耕農不是一個有前途的出路；為了保持他們在農村中掌權的幹部身分，唯一可選擇的就是搞農業集體化。於是，來自基層的合作化衝動便不可阻擋[註十]。1953年3月，中共中央不得不對農村基層幹部在集體化上的冒進傾向作第一次剎車，中央在〈關於縮減農業增產和互助合作發展的五年計劃數字給各大區的指示〉中，嚴令禁止打擊單幹農民、強迫編組、侵犯農民私有財產等行為。毛澤東在同年6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也指出，農業走向社會主義需要十五年。但來自基層的衝動是這樣有力，到10月中共中央不得不再次批轉華北局〈關於糾正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中急躁冒進傾向後的情況及當前工作任務〉的報告，對基層的合作化衝動第二次剎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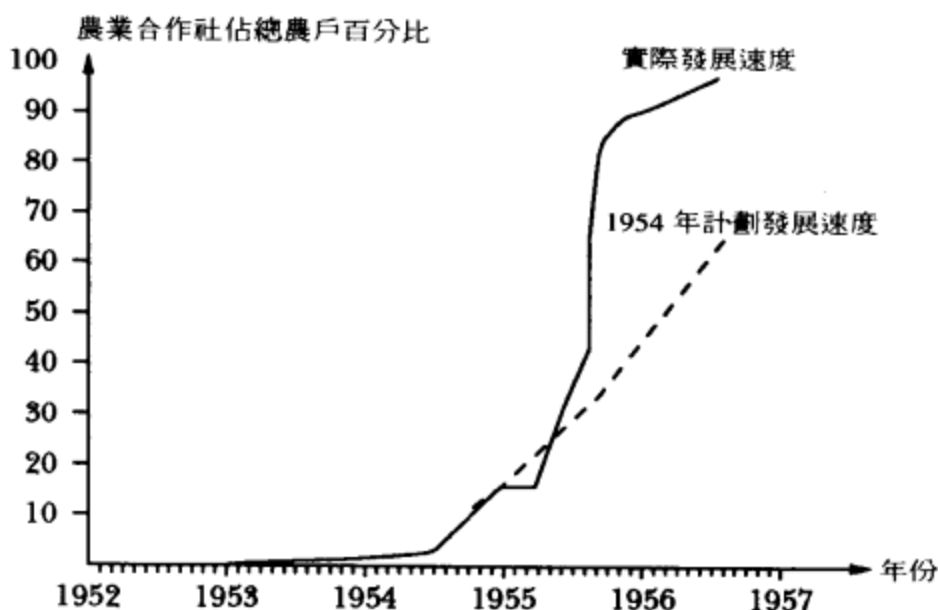
然而，1954年11月為了貫徹統購統銷政策，中共緊急召開農村的基層組織工作會議，會上確立了農村支部的總綱，提出一切工作都是為了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不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作為新民主主義的單幹和作為社會主義的加強幹部對農民之控制之間存在着天然的對立。為了解決統購統銷中的各種問題，完善基層控制實施，農民必須組織起來，農村幹部反對單幹主張搞合作化，已成為一個勢不可擋的潮流。1953年10月，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為了控制合作化發展，規定1954年秋以前合作社發展到3.2萬多個，要到1957年才能達到70萬個。但是這種限制根本沒有作用，到1954年3月，全國建立合作社已達7萬多個，到1954年底合作社數已達60萬。發展勢頭是這樣猛烈，以致1955年1月負責農村工作的鄧子恢不得不給中央打報告希望中央制定章程，使下面的幹部不致亂立法，中央得以控制合作化進程。1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第三次對合作化大剎車。同年3月，鑒於1954年基層合作化造成了生產的破壞，大量作為生產資料的牛、羊上市，毛澤東認為生產關係發展過快，生產力會起來暴

動，他根據各地農業合作化發展的不同情況，提出「停、縮、發」三字方針^②。即使如此，基層的合作化運動仍如一輛剎車閘不靈的汽車，高速向前推進。

1955年秋天，毛澤東終於發現了這種來自農村基層的自發合作化熱忱，他認定中國貧農中有巨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並批評中央委員會充當合作化運動剎車閘是一種右傾。毛澤東將其比作小腳女人，並繞開政治局直接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作出合作化運動的動員。短短半年時間，90%以上的農戶加入合作社，整個農村實現了從自耕農經濟向集體經濟之飛躍。今天人們每當談起1955年下半年的合作化運動高潮，都將其歸為毛澤東判斷的失誤和黨的左傾，實際上當時左和右的路線之爭並不是要不要農業集體化，而只是合作化速度應多快。即使是根據被毛澤東批判的右傾路線，中國農業也遲早要走上合作化道路，無非是晚幾年而已。圖9.2中的虛線是1954年黨中央計劃的合作化發展速度，從中可見毛澤東的動員只是取消了原來起剎車作用的黨的控制，加速了合作化進程。1953年實行統購統銷後，一體化控制結構相匹配之農業經濟，已不是土改後的自耕農經濟，而是由村幹部管理和經營之集體經濟，中國的農業結構遲早會取消私有制，演變到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那樣的結構中去[註十一]。

從土地改革到商品糧危機，接着是糧食的統購統銷，最後是合作化，我們可以看到一體化結構對農業經濟衝擊展開的邏輯：所有的社會問題均通過強化一體化官僚系統的控制來解決，最後中國農業經濟被改造成與新一體化巨型官僚機構相適應的形態。顯然同樣的過程也適合於工業。正當農業結構發生變化的同時，城市經濟也

^② 馬齊彬、陳文斌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 頁61、65、69、84、70、74、89、90、93。



據費正清等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表1提供數據繪製，頁119-120（上海：人民，1990）。

圖9.2 合作化的發展速度(1953-1957)

在新一體化衝擊下出現了形變，這就是市場的消失與計劃經濟的膨脹。

9.5 市場的萎縮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省會保定召開公審大會，宣判兩名共產黨高級幹部劉青山和張子善的死刑。槍斃腐化幹部的一聲槍響，意味着新一體化結構對城市經濟大規模衝擊之開始。這兩個犯人被殺的理由是貪污腐敗，他們用所謂「機關生產」和手中權利聚集了一

百七十一億元(舊幣)財富^①。本來，貪污和腐敗是任何一個社會都有的現象，特別是官辦企業和私人企業共存時，經濟發展一個不可避免的代價便是官僚機構的腐敗。幹部接受私人企業的賄賂把國家利益轉讓給私人，民間企業和官僚都從中得到好處。國民黨四十年代的腐敗正是這一規律的表現，新民主主義城市經濟既然是一種結構上類似的國家資本佔主導地位的市場經濟，它也同樣難逃這一法則的支配。五十年代初，隨着經濟大幅度恢復，幹部的貪污腐化開始顯現，資本家賄賂幹部以圖牟利日益嚴重。然而，問題之實質在於用甚麼方式來防止和打擊腐敗。新一體化結構的組織基礎是意識形態認同，清除腐敗必須強化意識形態對社會的控制，共產黨既然掌握了巨大的社會動員力量，那麼一個自然的反應就是利用意識形態化的群眾運動來清除腐敗。新中國開始了「三反五反」運動，它立即對正在運行中的雙軌制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952年初，中央明令嚴禁利用國家機關辦公司工廠的所謂「機關生產」，並在全國幹部中開展所謂「三反」。「三反」的內容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打擊矛頭直指官僚機構的腐敗部分。據1952年6月華北、華東、東北、西南、西北地區報告，在清理的3,122,437名幹部中39%有貪污行為，結果有23萬人受行政處分，2%的幹部受刑事處分。到1953年6月有32萬名黨員被清除出黨^②。由於雙軌制經濟體制中的貪污腐敗的重要原因是私人企業向幹部行賄，反腐敗的運動必定是由內外兩個方面組成。三反只是一體化官僚機構內部清理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利用一體化組織力量，對私人企業的腐敗源進行打擊，這就是所謂「五反」。「五反」包括「反對行

① 魯兵、石玉新、武永召編著：《新中國反腐敗第一大案》（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

② 馬齊彬、陳文斌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 頁46、51、43。

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它是對雙軌制條件下私營企業的全面整肅。據「五反」運動結果報道，資本家中守法戶只佔10-15%，半守法半違法戶佔25-30%，嚴重違法戶約佔4%，完全違法戶佔1%^②。也就是說資本家中25-30%受到嚴重打擊，大多數私營企業(85%-90%)都受到「五反」運動的衝擊。

「三反五反」運動既然是一體化結構利用自身的調節能力來解決新民主主義城市經濟運行中的腐敗現象，那麼它必然會帶來兩個後果，一個是幹部結構大調整，如淘汰國民黨時期留用人員、吸收運動中積極分子(工人和青年學生)入黨。另一個結果就是強化一體化結構對私人經濟的控制。在相當一部分私人企業中，因資本家把偷稅漏稅部分退賠給國家而使得國家在這些企業中獲得股份，它們成為「公私合營」企業[註十二]。國家在「五反」運動中發動私人企業的職工對老闆進行揭發，把控制網延伸到每一個民間企業內部，以致使得這些企業只在資本和生產資料所有權上屬於資方，而實際上則與共產黨控制的國營企業沒有太大差別[註十三]。一體化結構防止私人企業偷稅、行賄、非法獲得暴利的另一種控制方法就是把私人企業的原料和產品的供銷均納入國家系統，他們從國家批發原料，產品納入國家包銷，這樣其外部經濟活動也整個納入了一體化控制的範圍，處於國家監督之下。1950年，這些由國家供給原料包銷其產品的企業(它們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只佔私營企業總產值的29%，到1951年佔43%，通過1952年「五反」運動迅速地增加到56%，公私合營企業已達997家，產值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5%^④[註十四]。

本來，在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中，產品和原材料的供和銷都

② 廖蓋隆主編：《新中國編年史》 頁43（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④ 朱建華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 頁84。

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的。現在一體化官僚機構的管理滲透到市場中來，一半以上的產品和原料的供銷已通過這個管理系統。它立即帶來一個人們沒有想到的後果，市場開始萎縮了！1953年秋，糧食和油料、棉花的統購統銷無疑給本來已經在衰退中的市場以致命的一擊。因為統購統銷，大約佔農村徵收和收購總額的42%的糧食、油料和棉花基本上脫離了自由市場。國營和合作商業所掌握的農副產品商品量從57%迅速上升到70%。而中國私營工業中大約有2/3是輕紡工業，它們受統購統銷的影響更大^⑤。統購統銷全面實行後，市場開始消失了，私人企業活動的內部和外部均變得和官辦企業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差別。表9.5為1950至1954年私營商業和國營商業的比重變化，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1950年98%的商業為私營時，市場相當活躍。到1952年，私營和國營各佔一半，市場仍然存在，但

時 間	私營商業所佔百分比	國營和合作社商業所佔百分比
1950	98%的商業為私營 70%的批發業為私營 85%的零售業為私營	23.2%批發業為國營 14.9%零售業為國營
1952	57.2%零售業為私營	50%零售與批發總額為國營
1953		69%的批發業為國營
1954	25.6%零售業為私營	83.8%批發業為國營 國營與合作商業在批發業中佔89%

據下列兩書提供數據製表：朱建華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頁49、82（黑龍江：人民，1989）；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頁57、78、79、88（北京：中共黨史資料，1989）。

表9.5 五十年代初市場的萎縮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 頁413、415。

到1953年底，統購統銷開始，國營商業已在批發業中佔69%，市場出現萎縮。1954年，批發行業中國營已佔了90%，私商在零售業中只佔25.6%，雙軌制經濟中市場已經先消失了。所有私營經濟均處於一體化結構的嚴格控制之下[註十五]。

這時，即使新民主主義學說仍承認私人資本，但在現實生活中，私營工商業的存在已變得極不合理和毫無必要。雙軌制經濟在運行中的另一個特點是私營企業效率比國營高。僅1953年上半年全國私營工業盈餘達9.1億元，比1952年增加147%，全國私營商業盈餘達6.8億元，比1952年增加97%^⑤。私營資本主義發展比國營社會主義企業快，這對於新民主主義國家學說來講是不能容許的，因為它表明在經濟發展中社會主義成分非但沒有增加反而在向資本主義轉化。這種衝突在1953年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後表現得更為尖銳。統購統銷是國家利用工農業價格的剪刀差剝奪農業以促進工業積累，現在相當多的一部分剪刀差利潤流到私人資本家手中，資本家不勞而獲地與國家爭利分肥。1953年6月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1952年公佈的《新稅法》，認為應對私營企業徵收比國營企業更高的稅收，將兩者一視同仁是鼓勵資本主義^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喪鐘敲響了。

和農村中自下而上掀起農業集體化高潮類似，1953年統購統銷後，城市中私營工商業變得極不穩定，一個自下而上的全國性公私合營運動一觸即發。公私合營是一個由私營企業中職工和有關基層管理幹部推動、資本家並不反對的運動。雖然資本家失去了企業的所有權，但也為撤掉日益難以承受之重擔而鬆一口氣。1954年，在

^⑤ 朱建華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 頁113。

^⑥ 費正清等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 頁98；馬齊彬、陳文斌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 頁59。

市場急驟萎縮的情況下，私營經濟的日子已經不好過了。1955年，很多私營企業得不到國家足夠的原料，有的處於關門倒閉的邊緣[註十六]。1956年1月，當全國出現公私合營高潮時，私營企業主差不多都舉雙手歡迎。我們可以理解，為何1956年初，全國性的企業和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會如此順利，它幾乎是在一夜之內取得成功的[註十七]。總之，當一體化結構對城市經濟調節的後果使得國家控制不斷加強、並把私營企業納入到國家控制網中去時，在企業內部它的表現是管理的官僚化，在外部則導致市場的萎縮。最後的結果一定是新民主主義結構中最有活力的私營經濟和通過市場調節之部分的消失，雙軌制工業結構變為國營的計劃經濟。中國跑步進入了社會主義。

9.6 政治經濟一體化：放棄新民主主義

1956年中國突然宣佈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來得實在太快了，它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幾年以前甚至新中國的設計師毛澤東、劉少奇等共產黨領袖都還認為，中國要推行新民主主義十五年。全黨都為中國以這樣少的代價如此迅速進入社會主義而歡欣鼓舞。從我們的理論看來，中國放棄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是新一體化結構和經濟系統耦合不可避免的結果。所謂耦合，就是新意識形態、政治、經濟三個子系統處於互相維繫、互相調節的狀態。一體化本意是指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耦合，當它形成具有巨型金字塔式的組織後，就必須和經濟結構耦合。耦合包括它從經濟結構中吸取資源，以及對經濟結構出現的問題進行調節。我們看到，耦合的後果恰恰是產生社會主義經濟結構。

今天，在討論中國共產黨為何那麼快放棄新民主主義目標時，

大家都十分強調毛澤東的「左」，認為他沒有建立新民主主義制度的誠意。事實上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在運行中所出現的問題，只能依靠一體化國家官僚機構的控制和調節來解決。而調節的方向則取決於意識形態社會觀的藍圖，不破壞意識形態認同的調節結果只能是放棄新民主主義。就以商品糧和腐敗為例，當時商品糧危機有兩種辦法可解決：發展資本主義經營農業或用統購統銷徵購。由於新民主主義強調最終要發展到社會主義中去，它雖然可以容忍資本主義在現階段存在，卻不能鼓勵資本主義和私有制的發展超過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意識形態合法性前提下，只能選擇統購統銷。同樣當工業經濟中私營資本發展超過國營企業，或私人資本成為官僚機構腐敗源時，國家只能採取限制私人資本發展和強化行政控制。因此，新民主主義結構一個必然趨勢就是一體化結構和意識形態對各個領域的控制不斷加強。國家控制強大到一定程度會造成整個經濟結構的突變，也就是說，新民主主義的自耕農農業結構和雙軌制工業結構均是不穩定的，它只能轉化到與強大意識形態指導下國家控制相適應的新形態中去。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五十年代社會主義全面取代資本主義亦即放棄新民主主義是不可避免的結果，與新一體化結構相適應的只能是社會主義結構。社會結構的穩定必須依賴於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的互相調節。放棄新民主主義只是三個子系統互相調節的後果，如果人為地禁止這種轉變也就是不讓社會結構三個子系統固有的調節方式發揮作用，那麼結局將是共產黨更不願意看到的，這就是意識形態被市場和自由化衝擊，一體化結構被削弱，甚至面臨瓦解。而任何一個社會結構尚存在調節能力時，絕不會以放棄自己的生存作為發展代價。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放棄新民主主義並不僅僅是當時共產黨中央在意識形態上的「左傾」，而是某種歷史意志所決定的。

56.01.01
1956年1月1日，官方宣佈從這一天開始報紙從傳統的豎排變為橫排。這一事件富有象徵性，它意味着共產黨建立了一種來自於傳統但表面上又和傳統有很大不同的社會結構。它的意識形態為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的毛澤東思想，政治結構是一個從中央直統到縣以下每一個村（城市每一個居民區）的龐大官僚機構，而經濟結構則是和這種意識形態與政治控制相適應的計劃型工業和合作化農業。它是一個對個人控制遠比傳統一體化結構和國民黨整合模式更為緊密的烏籠社會。

在傳統一體化結構和國民黨整合模式中，縣或區以下的基層是官僚機構難以深入的地方，那裏尚存在民間社會的自治組織，共產黨模式則用官僚控制一統到底。在傳統一體化和國民黨建立的社會結構中，加強控制大多限於意識形態和政治兩個子系統，經濟結構中私營企業和農業的存在使人民尚可佔有一定的公共空間。在市場和私營經濟被一體化官營系統取代之後，由經濟自由所提供的一切公共空間和人的選擇自由都消失了。計劃經濟把各種商店（甚至連夫妻合開的飲食店）統統納入公私合營的範圍，所有物資均由國家分配。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談到國家成為唯一僱主時說過，從此以後不勞動者不得食這一古老原則將被「不服從者不得食」的新原則取代^②。由於中國共產黨擁有比蘇聯更為巨大的幹部管理網，國家對個人自由之取消、控制之緊密比蘇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糧食統購統銷制度中，吃商品糧的人口是不能隨便增加的，它立即成為共產黨社會控制之重要法寶。當國家掌握了每一個城市居民的口糧分配時，無疑它又掌握了一種在法律以外懲罰不服從者的手段——取消他的吃商品糧資格、下放去當農民。因分配口糧強化的戶口制使中國人民失去了選擇居住地的自由。

^② Leon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p. 76 (New York: New York Press, 1937).

在傳統一體化結構中，承擔社會福利、控制人行為、監督人言論的是宗法家庭。宗族組織雖然嚴密，但它畢竟仍屬於非官僚組織之民間社會。現在基層單位、居民區承擔了社會福利個人保險的功能，每個人的思想、言論也處在單位居民區的控制之下，單位領導變成了家長。控制人思想言論行為之牢籠更為堅固，自由也更稀少。毛澤東曾十分自豪地認為，這種制度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空前地組織起來，國家可以把政治動員達到每一個個人，從而具備了史無前例的力量。但是不知他有沒有意識到，這種制度卻是一個古今中外聞所未聞的駭人鐵籠！



第九章 註 解

註一 我們可以用一個數學模型來說明土地兼併和非農業人口的內在聯繫。圖9.3的橫坐標為人口(勞動力), 縱坐標為糧食總產量。曲線OP為總耕地面積固定不變條件下投入土地勞動力(L)和糧食總產出(Q)之間的函數關係。直線OS為維持農業勞動力生存必須的糧食量。顯然, 當農業人口處於 L_1 點時, CD代表養活農業人口後可剩餘的糧食量。但是這部分糧食是否轉化為商品糧, 用來養活非農業人口, 則取決於經濟結構。假定農業經濟為純自耕農經濟, 所有土地均由自耕農耕種, 自耕農有着強烈的自給自足傾向, 那麼CD部分大多作為家庭富裕糧食, 不一定拿到市場上出售。我們在第八章[註三]中已指出, 它是促使中國傳統社會人口持續增長之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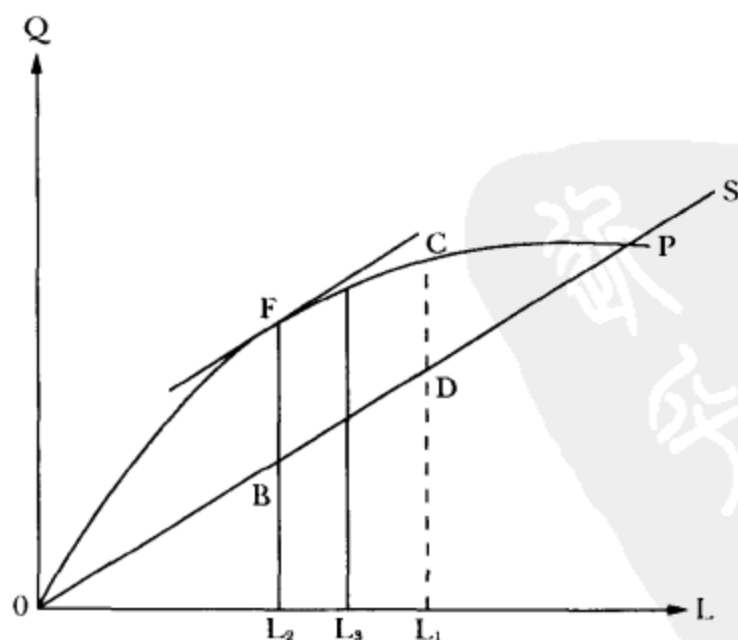


圖9.3 傳統社會決定非農業人口的機制

當農業經濟結構為地主經濟時，CD中就有相當部分轉化為商品糧，總數為 L_1 的農業人口中亦有部分轉化為非農業人口。

為了簡化起見，我們先考慮一種極端情況：所有土地均集中在地主手裏，這時只有增加勞動力投入後所增加的糧食超過勞動人口本身需要的口糧時，地主才有利可圖，這部分勞力才會被運用到農業勞動之中。這樣，當所有土地均由地主掌握時，一旦 L 超過某一個臨界點 L_2 ，它就不能被農業吸收。 L_2 的位置由如下方程確定：

$$\frac{\partial Q}{\partial L} = \frac{\partial P(L)}{\partial L} = K \text{ (K為OS直線的斜率，即為養活單位勞動力必須之口糧)}$$

$L_1 - L_2$ 就成為非農業人口，FB為農業剩餘。當 $K(L_1 - L_2) < FB$ 時， $L_1 - L_2$ 就有可能轉化為穩定的非農業人口。顯然，在具有人口壓力的地主經濟中，土地兼併越嚴重，實際可吸收的農業人口 L_3 越是接近 L_2 點。另一方面， $Q = P(L)$ 函數性質決定了 L_3 越靠近 L_2 點，由 P 減去農村自用口糧的剩餘越大，也就是說，農業經濟提供的商品糧數目越多。這樣，我們就近似地證明，在人口壓力下，土地兼併越是嚴重，城市人口才越能獲得較多的商品糧，這時將出現城市的病態繁榮。

註二 關於三十和四十年代中國農業糧食商品率到底有多大，學術界是有爭議的。卜凱(J.L. Buck)認為1929-1933年中國二十二省的糧食總產量有15%在市場上出售^②。據國民政府糧食部1943年的資料，1931-1937年間後方各省(包括川、滇、貴、湘、桂、粵、閩、浙、贛、鄂、豫、陝、甘、寧、青等十五省)所產稻麥，可供市場

② 薛光前編著：《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 頁224 (台北：商務印書館，1978)。

銷售的餘糧，佔總產量的14.5%；由於抗戰的影響，後方各省所產稻麥可供市場銷售的餘糧已降為12.3%^⑩。這一統計似乎沒有考慮到政府的糧食徵收。有的學者則認為，二十世紀後，農村經濟的商品率，各地一般不低於40%。在專門化種植區內，可達60-70%^⑪。如據安徽、河北、河南、山西、浙江、福建、江蘇七省調查，1921-1925年主要農產品的商品率如表9.6所示，小麥和水稻商品率幾乎達40%以上。本文則採用吳承明的算法^⑫，它似乎處於估計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間。

農產品種類	出售率 %	農產品種類	出售率 %
小 麥	52.5	豌 豆	46.0
稻	38.4	黑 豆	22.4
高 粱	21.9	芝 麻	78.6
穀 子	26.6	油菜子	99.1
大 麥	63.7	山 薯	31.1
玉蜀黍	26.4	棉 花	30.8
糯 稻	95.4	大 麻	64.3
大 豆	44.0	蔬 菜	73.7
綠 豆	51.7		

取自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2輯，頁230（北京：三聯，1957）。

表9.6 安徽等七省十七處各種農產品的出售率(1921-1925)

⑩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民政府糧食部檔案》(八三)183。

⑪ 馬扎亞爾：《中國經濟大綱》頁25-26（神州國光社，1933）。

⑫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述略》《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

註三 如果不建立商品糧供給新機制，只有讓自耕農經濟轉化到富農、地主經濟結構中去，農業才可提供足夠的商品糧。其實五十年代初，隨着城市糧食需求一天天高漲，自耕農經濟已經出現向富農地主經濟結構轉化的跡象。土地買賣、出租，僱工和農民轉化為小商人的趨勢已經出現。例如河南省太康縣1953年全縣買賣土地者達5,803戶，計14,694畝。囤糧者達1,176戶，僱工者有856戶，出租土地者為2,262戶^③。1954年《人民日報》指出，少數富裕農民積存了一些糧食和其它副業收入後，逐漸開始了傳統的囤糧、僱工、放高利貸和兼營商業等活動。廣西省容縣專區一個縣內，有91個座商是由農民改業的。江蘇省一個民兵隊長訂了個一百字的「五年計劃」，打算三年作富農，五年當地主。另一個村幹部的「五年計劃」是：先囤糧放債，再蓋房買田，由貧農變成富農^④。

顯而易見，農業經濟再次向富農地主經濟轉化不符合新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綱領。共產黨根據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認為地主剝削不合法而消滅地主，在農村推行均田而分田後不到三年，村幹部首先轉化為富農地主，無疑會導致共產黨喪失統治農村之合法性。因此實行統購統銷必定是以打擊農村資本主義勢力為旗號的。也就是說經濟運作中的問題導致「左」的意識形態在全黨出現。

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統購統銷在共產黨內幾乎沒有引起任何爭論，甚至當時連最不左傾的共產黨幹部都同意這一政策（一般說來，某種重大決策推行前，都會在共產黨高層中引起不同意見之爭議，而統購統銷卻是大家眾口一詞贊同的）。從目前的文獻看來，至多只是極少數省級幹部對此提過不同意見，但很快就糾正了

③ 方天白：〈農村市場的變化〉《人民日報》1955年2月8日。

④ 〈糧食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是總路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民日報》社論 1954年3月1日。

認識。例如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長薛迅，是我們所知因統購統銷問題被批評處分之最高級幹部。但是她的意見並不是反對統購統銷，只是希望國家徵購不要太多，至多只統購農民70%的餘糧，讓農民生活可以好一點。即使如此，1955年她還是因此而受到處分，並真誠地認為自己意見錯了^⑤。

統購統銷不能完全遏制自耕農經濟向富農、地主經濟轉化之趨勢，意識形態上的左傾不會隨實行統購而停止。就以上面講過的太康縣為例，1954年統購統銷後，土地買賣減為959戶，買賣土地為2,714畝；囤糧戶減少到48戶，僱工者減為570戶，出租土地的降到1,965戶^⑥。從這一變化趨勢看，統購統銷只是有力地遏制了囤糧和土地買賣，至於土地出租和僱工發展趨勢則仍然存在。只有實現農村合作化，這些向富農地主經濟轉化之所有跡象才會最後消除。

註四 中國的自耕農是否傾向於自給自足，學術界是有爭議的。例如趙岡認為中國農業經濟自漢朝以來就是市場經濟^⑦。如果自耕農是市場經濟的一部分，那麼他們生產的糧食除自己消費以外，餘糧必須全部拿到市場上出售。從五十年代的農村調查看來，自耕農對自己餘糧的處理辦法，大多是「為買而賣」的，即需要用錢時才賣糧。顯然，這不是市場經濟。我們有兩個重要證據可以表明自耕農對把餘糧拿到市場上出售是不熱衷的，它有強烈的自給自足傾向。這時，只能用行政手段才能強迫農民賣餘糧。

一個證據是1953年前農村供銷合作社的職能和經銷情況。供銷

^⑤ 顧卓新等：〈女中英杰——憶薛迅同志〉《黨史博采》第3期（石家莊：1992）。

^⑥ 方天白：〈農村市場的變化〉《人民日報》1955年2月8日。

^⑦ Kang Chao: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An Economic Analysis*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1986).

合作社是國家深入農村之商業網點，其目的是對農產品進行收購並賣給農民生產資料和其他商品。政府曾規定，農民參加供銷合作社可以在買賣價格上得到優惠。他們把餘糧賣給供銷合作社，不但價格較高，還可以用低於市場的牌價買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從1950年到1953年，供銷合作社的社員發展極快，從兩千萬增加到一億六千多萬人。其中90%以上是農民，供銷社的零售額和收購額也都增加了十倍以上^{③⑧}。1952年有2,500多個基層供銷社與九萬多個互助組訂了買賣合同，其中最大宗的物資是糧食^{③⑨}。雖然有那麼多農戶納入了國家控制的供銷網，但國家仍不可能從農民手中收購到足夠的餘糧，只得在1953年秋天後開始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實行統購統銷後，供銷社以優惠價格賣給農民生產資料和商品以促使農民賣糧的功能已不需要，故1955年年初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發出指示，要求各地合作社在2月15日以前把零售價格調整到國營牌價同一水平，取消了供銷合作社社員的優惠價格^{④①}。如果自耕農沒有自給自足傾向，國家通過供銷合作社完全可以將餘糧收上來，不會出現商品糧危機，當然也就沒有必要搞統購統銷。

第二個證據是國家於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後的一年中，中國農村市場迅速擴大，甚至比原來更加活躍。如果中國農村本來是市場經濟，根據邏輯，國家對糧食進行統購統銷是使最大宗商品退出自由市場，從而導致市場的衰落，正如統購統銷對城市市場的衝擊那樣。然而實際出現的卻是全國三萬六千個集鎮中農村市場的繁榮。

③⑧ 〈供銷合作社必須貫徹為農業生產服務的方針〉《新華月報》第11號 頁163（北京：1954）。

③⑨ 中共中央華北局農村工作部：〈積極穩步地推廣結合合同是促進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有力措施之一〉《人民日報》1954年6月28日。

④① 〈供銷合作社應該調整零售價格〉《人民日報》社論 1955年2月6日。

據統計，1955年農民貿易佔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20%以上^①。商業部1954年在江蘇、山東、雲南、四川、廣東、西康等十二個省進行調查，發現農村購買力的增長速度遠大於城市^②。僅以江蘇一省為例，據江蘇省財政經濟委員會統計，在統購統銷前，1953年第四季度農村貨幣回籠佔城鄉貨幣投放總額之38.52%。實行統購統銷後第一年(1954年)農村貨幣回籠將達到全省城鄉貨幣投放總額的60.21%^③。甚至連陝西這樣本來商業不甚繁榮的省份也出現了類似情況^④。由於農村市場迅速繁榮，它使得供銷合作社的職能也發生變化。本來農村供銷合作社直接面向農戶，不搞批發業務。隨着農村市場的興起，小商販開始向合作社批發商品，供銷合作社不得不搞批發業務。據對全國80%的基層供銷社的統計，1955年1月批發佔營業額的5.2%，2月份升至7.1%，3月份繼續上升，達8.5%^⑤。這個局面一直維持到1956年實現農業合作化之前。顯然只有原來自耕農經濟傾向於自給自足條件下，統購統銷才會出現促進農村市場繁榮的這一奇特結果。因為統購統銷強迫自耕農賣餘糧，農民自給自足被行政力量打破，農民手中擁有的貨幣量增加，農村市場自然也就被激活。

註五 糧食統購統銷自1953年秋收後開始醞釀，其實施過程長達兩年多，到1956年全國農村合作化後，它在實施過程中碰到的各種問

① 閻頤行：〈中國農村的農民貿易〉天津《大公報》1955年6月3日。

② 〈全國農民購買力增長情況〉《新華月報》第3號 頁139（北京：1955）。

③ 方天白：〈農村市場的變化〉《人民日報》1955年2月8日。

④ 西北區供銷合作社辦事處：〈陝西農村需求變化情況調查〉《人民日報》1955年2月28日。

⑤ 〈對農村私商的批發業務必須加強〉《人民日報》社論 1955年5月22日。

題才最後克服。在統購統銷實施過程中，我們看到一個普遍趨勢，這就是統購統銷帶來的各種問題迫使農村和城市基層組織不斷完善。一開始，糧油統購統銷只是一種強迫農民賣餘糧並由國家壟斷糧食買賣的制度。就糧食和某些農產品專賣而言，國民黨在抗戰時期也實施過，並非共產黨1949年後之獨創。照理說，它只意味着國家對糧食貿易之壟斷，並不一定需要強大的基層組織。但是，國家糧食專賣制度會出現很多問題，它一定要演變成糧食的定量配給制。不僅強迫自耕農賣餘糧需要強化基層組織，就是向農民賣糧也需要建立強有力的基層組織。1954年後國家如何克服統購統銷帶來的問題向我們顯示了基層組織強化之過程。

據《人民日報》社論估計，實行統購統銷後，國家每年向農民徵收的農業稅和統購糧食大約只佔糧食總產量1/3弱，但其中有1/2要再次返銷到農村，供應農民中缺糧戶，平均每個農民每年可以有糧食500多斤^{④⑥}。按這一估計，當時吃商品糧的大約有兩億人，其中農民和城市居民各佔一半^{④⑦}。如果國家僅僅實行對糧食銷售之壟斷，而不是定量供應，那麼農村中缺糧戶只要增加買糧數量，城市商品糧供給就會再次出現危機。事實即是如此，統購統銷剛開始實行，就立即出現了這類問題。

1955年農村缺糧戶大肆向國家買糧，使糧食統銷出現了極大的混亂。據統計，由於自然災害和其他人為因素，在一些省份需國家供應糧食的人口達總農業人口的70-80%，有的甚至達96%以上^{④⑧}。例如熱河省青龍縣的糧食統銷面達到農村人口的79%。江蘇省某些縣供應的糧食，按全縣人口平均計算，曾經達到每人每日一斤五兩

④⑥ 〈整頓農村糧食統銷工作的教訓〉《人民日報》社論 1955年6月26日。

④⑦ 〈糧食統購統銷對農民的好處〉《人民日報》社論 1954年11月17日。

④⑧ 〈抓緊時機整頓農村糧食統銷工作〉《人民日報》社論 1955年5月10日。

到一斤六兩。如何在農村實現糧食供給之管理，已成為當時燃眉之急的社會問題^④。解決的辦法只有實行定量配給。1955年8月25日，周恩來發佈〈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的命令，宣佈實行「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三定是一種糧食強行收購和定量配給制度，它能否實行，取決於農村基層組織的效率^⑤。我們可以把農村糧食定量配給和城市居民糧食定量配給作一個比較。在城市，雖一度出現居民搶購糧食，但由於1954年實行了居民區建設和強化戶口制，城市糧食配給供應完全依靠居民區來執行^⑥，結果糧食配給工作十分有效。如武漢市，三天完成登記人口、換發新購糧證的大量繁瑣事務^⑦。在農村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建立把每一個農戶都組織進去的有效基層組織。而合作化運動在1955年底的全面展開，為最後解決農村統購統銷管理中的困難提供了條件。

註六 表面上看，1953年秋梁漱溟和毛澤東的爭論與「統購統銷」無關，雙方都是由於神經過敏而使爭論不斷升級。但是共產黨公開批梁漱溟卻是和實施統購統銷需要不斷強化農村基層組織直接相關的。全國性批判梁漱溟的高潮出現在1955年，那正是統購統銷碰到各種問題之時。我們可以分析兩篇批判梁漱溟的著名文章，一篇的作者是馮友蘭，批判的是梁漱溟「村治」理論。馮友蘭抓住梁漱溟的

④ 〈立即依靠群眾，整頓農村糧食統銷工作〉《人民日報》社論 1955年4月24日。

⑤ 〈糧食「三定」到戶的工作必須徹底做好〉《人民日報》社論 1955年9月27日。

⑥ 〈糧食部負責人就糧食統銷問題發表的談話〔摘要〕〉新華社 1955年4月30日訊。

⑦ 劉文：〈武漢市是怎樣整頓糧食統銷工作的〉《人民日報》1955年6月29日。

每當談起中國的再次落後，有人或許會感慨世事反覆無常，國際競爭方式的改變似乎在和中國開玩笑，但是問題的本質仍在於超穩定系統適應衝擊的模式。一體化組織方式在相對與世隔絕的條件下建立，它本來只是一種維持社會基本形態不變的機制，當遇到不斷進步的西方現代文明的挑戰時，只能用意識形態更替來追求現代化目標。但是，這種更替意識形態方式建立的新一體化結構仍然是僵化的，不能適應快速進步的世界。這裏我們看到的，是一種保持社會穩定(但因此也停滯)整合機制與現代社會不斷進步之衝突。

我們可以用兩個示意圖來表示一體化組織方式和現代社會之間的差別。圖10.1以現代經濟發展為縱坐標，社會整合程度為橫坐標。直線AB表示經濟持續增長不影響社會整合，這是現代社會中經濟發展和社會整合之間的理想關係。這樣的社會結構可以適應不斷進步的潮流。圖10.2是中國近代超穩定系統中經濟增長之過程。超穩定系統用意識形態更替來適應不斷進步的環境，這就使得超穩定系統的經濟現代化一定是一條如abcdefg所示的反S型曲線。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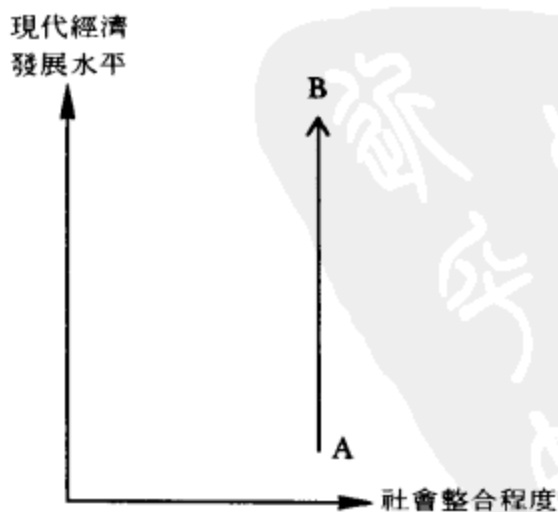


圖 10.1 經濟現代化與社會整合不互相矛盾

時中央強調，上面派下去的工作隊必須依靠農村黨支部，不能取而代之^{⑤⑥}。

基層組織之強化主要依靠農村當地黨支部的擴張。據統計，全國有80%以上的農村黨員參加了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⑤⑦}。我們可以用大寨鄉作案例。大寨鄉所屬的十個自然村中，有五個很早辦了社，常年駐着五個縣區專職幹部。但這五個合作社人數並不多，只有252戶農戶。統購統銷後，全鄉十個村都辦了農業合作社，入社的有771戶，佔總農戶的96%，但駐鄉工作人員卻減少到一個。合作社基本上是依靠農村原有的村幹部辦起來的，全鄉四十八個黨員，十三個總支委員成為合作社的領導骨幹^{⑤⑧}。

農村基層組織骨幹雖然幾乎全部來自鄉村，以不拿工資的農民幹部為主，但上級黨組織和工作隊也十分重要，它起到在農村中發現積極分子，把他們從農民轉化為黨員，成為合作社幹部的作用。否則原有的基層黨支部組織人數仍太少，不足以把五億農民組織起來。從貧苦農民中培養積極分子，將他們轉變為農村支部成員和社幹部，是縣委、鄉黨委和工作隊的主要任務。例如湖北鄂城縣訓練的1,029個合作社工作人員中，有326個是準備當社長的，其中247個本是貧農，57個新下中農，14個老下中農。副社長中264個是貧農，培養的325個會計中，185個是貧農。而滄水縣委還對原來有的1,363個黨員進行排隊，對96個不積極者進行批評，認為原來584個農村支部委員中，有28個不積極，這是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已上升

⑤⑥ 張一樵、高華：〈農村工作隊必須依靠黨的支部進行工作〉《人民日報》1955年8月24日。

⑤⑦ 〈在建社整社工作中經常整頓黨的農村支部〉《人民日報》社論 1955年10月30日。

⑤⑧ 〈適應新情況改進黨支部的領導——榆社大寨鄉黨支部領導合作化鄉生產的經驗〉《人民日報》1955年8月29日。

到新上中農，或者本來就是老上中農⁵⁹。工作隊進村，對黨員進行左中右排隊，甚至重新劃分成分，這一切立即導致左的意識在農村盛行。

註八 今天，學術界在討論合作化動力時，不太重視農村幹部通過合作化成為管理者可以從中獲利之經濟動機。其實只要去看看當時的各種材料就可以發現，合作社幹部脫產，從管理中獲得對農村的支配權和各種報酬是合作化運動中的普遍趨勢，它無疑是合作化潛在的經濟動力。

合作社成立之初，社幹部立即出現倚仗職權謀取私利的傾向。搞得冠冕堂皇轟轟烈烈的是講排場。很多地方認為，「既然成立了全鄉的高級社，就得有個開黨團員大會的地方」，計劃修禮堂⁶⁰。有的主張一下子廢棄舊式農具，使用全新式農具，甚至不願意接受社員原有的驢，主張外賣換回大驢大馬⁶¹。很多人以「家大業大，多花幾個錢不算甚麼」，「大社就得講大方，不然就不像個社會主義的樣子」⁶²為名，公開從社中牟取私利，如備用公款。還發生幹部利用權勢，逼死人的事件⁶³。合作社建起來後，合作社脫產半脫產幹部如何拿報酬、算工分立即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當時普遍存在的問題是把幹部的報酬定得過高，農民意見很大。例如一種反映是「他們坐在屋裏，張張咀，動動筆，工作一天，怎麼也不頂咱們一

⁵⁹ 王任重：〈湖北省三個縣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調查〉《人民日報》1955年10月14日。

⁶⁰ 李吉平：〈健全財務管理制度，實現勤儉辦社〉《人民日報》1956年4月15日。

⁶¹ 王國藩：〈繼續堅持勤儉辦社〉《人民日報》1956年4月6日。

⁶² 〈永遠要勤儉〉《人民日報》社論 1956年4月6日。

⁶³ 〈江蘇省展開民主辦社的大討論〉《人民日報》1956年8月18日。

個勞動日」。而國家一面反對農村幹部把脫產管理報酬定得過高，一面批評農民，認為他們這種意見是輕視腦力勞動^{⑥4}。當時，人們曾考慮過多種辦法來計算合作社脫產幹部應得多少報酬才算合理^{⑥5}，但是幾乎很難找到一種既能鼓勵農村幹部的積極性又不讓他們過多剝奪農民的方案。

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計算，看看農村脫產幹部的收入大約是一般農民的多少倍？我們可以從某些例子中估計一下農村脫產幹部的比例。如新鄉專區共有七十八萬三千戶，在1955年12月中旬到1956年1月上旬，七十八萬戶（佔總農戶的99.5%）參加了1,539個高級合作社。據統計，當時共鍛煉培養了幹部五萬七千餘人，其中有縣、區幹部兩千餘人，鄉村主要幹部和合作社社長、隊長等五萬五千人。每一個高級社具有辦社經驗的幹部四十人左右^{⑥6}。根據這一數據可以算出農村基層幹部和總農戶的比例，它等於55,000/783,000，近似於一百戶農民擁有七個幹部。我們發現這個數據大致適用於所有鄉村。當幹部和農戶比例超過十分之一時，農民負擔過重，它受到中央批評。例如河北南和縣郝橋鄉農業合作社，有社員1,830戶，但幹部高達206人，幹部和戶數比為206/1,830，每一百戶中有幹部十一人。《人民日報》認為這個生產合作社脫產幹部過多^{⑥7}。那麼生產隊幹部佔據了多少農業收入呢？據某些農業社調查

⑥4 常青：〈合理規定農業合作社工作人員的報酬〉《人民日報》1956年5月26日。

⑥5 金明橋：〈農業社幹部的補貼怎樣計算才合理〉《人民日報》1956年8月15日。

⑥6 耿起昌：〈新鄉專區是怎樣實現完全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的〉《學習》1956年4月號。

⑥7 常青：〈合理規定農業合作社工作人員的報酬〉《人民日報》1956年5月26日。

表明，社內管理人員的勞動日開支佔全社總勞動日數的4.5%。扣除拿國家工資的鄉幹部，完全由農民直接供養的社幹部收入佔全社總勞動日的4%^{⑥⑧}。如果每戶平均按五人計算，那末佔農業社7/500的社幹部大約拿走了農民收入的4/100，幹部個人收入是農民按人口平均收入的2.8倍。撇開管理權對社幹部的好處，就拿合法補貼工分收入而言，幹部都強於農村壯勞力。這對農村幹部是有吸引力的。

註九 我們在[註五]中已經討論過，貫徹統購統銷必須不斷強化基層組織。事實上，統購統銷中出現的各種管理問題是到合作化後才真正解決的。1956年《人民日報》承認，自1955年下半年出現合作化高潮後，糧食統購統銷各方面措施貫徹順利，糧食統購統銷出現的問題迅速減少，全國糧食供應出現根本上的好轉^{⑥⑨}。到1956年10月2日，國家才最後明確統購統銷以農業合作社為基本單位^{⑦⑩}，統購統銷各項措施變得配套和定型。這一切都揭示出統購統銷帶來的管理需求和合作化的內在聯繫。

另一個證據是合作社一開始就表現出嚴重的政社不分之傾向，它幾乎全部地承擔了政府在農村管理的職能。政府把一切工作都推到合作社幹部身上去做，一切開支也要合作社包下來。本來徵兵、徵糧、社會救濟、小學教育、修路、戶口管理、婚姻登記應是鄉政府的工作，但合作社一成立，所有這些職能就都通過合作社貫徹了。理論上講合作社只是生產單位，但它一誕生就是一種政社不分

⑥⑧ 中共湖南省委農村工作部工作組：〈新化縣燎原農業生產合作社事務管理情況的調查研究〉《人民日報》1956年5月28日。

⑥⑨ 〈正確認識我國糧食情況的好轉〉《人民日報》社論 1956年10月14日。

⑦⑩ 〈國務院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糧食統購統銷的規定〉《人民日報》1956年10月7日。

的一體化管理系統。政社不分竟是如此嚴重，以致於鄧子恢在1956年6月19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總結合作化運動時，把政社分工作為今後辦合作社的重要任務^①。實際上，雖然上面一再強調政社分開，但它從未真正做到過，因為鄉政府只能通過合作社才能貫徹十分繁瑣的農村管理事務。到後來的人民公社制度中，生產隊（合作社在人民公社組織中的名稱）是人民公社法定基層組織，政社分工連名義上的區別都不存在了。合作社具有政府管理職能本身就證明它是順應國家管理需要而發展起來的。

註十 由於毛澤東的號召，全國在1955年下半年出現合作化高潮，這很容易造成一種錯覺，認為合作化是一項自上而下發動的運動。實際上，合作化動力相當大的一部分來自農村幹部。我們可以分析當時各地的案例來證明這一點。例如河南省信陽專區1955年春辦了3,711個合作社，其中由上級幹部辦的有1,577個，鄉支部辦的1,573個，群眾自辦的561個^②。山西省1955年夏天，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佔總戶數的41%，它們不是由少數幹部「包辦」發展起來的，而是由黨的13,600多個鄉支部發揮了創造性的結果^③。種種例子表明，在毛澤東發出合作化號召之前所創辦的合作社中，由鄉村幹部和群眾辦的合作社是多數。

而且，黨組織一般對鄉村支部和群眾自發辦合作社採取一種觀望和勸阻的態度，劉瀾濤在一篇文章中披露了幹部的勸阻如何同鄉

① 鄧子恢：〈一年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情況和今後工作〉《新華半月刊》14號 頁61（北京：1956）。

② 〈農村黨組織的工作要以合作化為中心〉《人民日報》社論 1955年11月9日。

③ 〈依靠黨的農村支部，辦好農業生產合作社〉《人民日報》社論 1955年11月2日。

村黨支部及群眾自發辦社發生衝突的情形。他這樣寫道：「有些地方的農民這樣說：『我們組織合作社是搞生產，和剝削作鬥爭，不是和共產黨作鬥爭，為甚麼你們要干涉？』他們又說：『領導上不批准辦社，我們就辦自立社，不讓叫合作社，我們就叫合作組，反正搞社會主義不犯法。』山東省膠縣為了收縮和停辦合作社，縣政府出了佈告；貧農們說：『劉縣長出佈告垮社，下次選舉的時候，高低也不能再選舉他。』榮城縣有一個叫新生合作社的被『動員』解散了，但是幹部一走，這個社又立即恢復起來，並改名為復興合作社。據福建省的一個材料，那裏1954年秋天以來全省有2,200多個自發社，其中三百多個被『說服』轉了組，三百多個因為無人領導垮了台，但還是有1,600多個用各種各樣方式堅持下來了……農業的合作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這個規律是不能違反的，違反了就要使我們的領導處於十分尷尬的地位」^④。這裏，劉瀾濤明確地把自下而上的農村自發合作化稱為不可抗拒的規律，除了他的意識形態價值判斷外，無疑也是感到了來自社會基層的自發趨勢。這可以證明毛澤東的號召只是起到取消剎車閘的作用。

註十一 根據農業集體化的計劃，集體化存在着不同階段，最低級階段稱為「互助組」，接着是「初級社」，然後才是具備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農業合作化被認為是從互助組變為初級社，最後合併為高級社的過程。我們認為，這種概念化的理解是很有問題的。互助組和合作社（低級社和高級社）在組織形態和形成機制上有着質的不同，雖然互助組也是在共產黨鼓勵下形成的，但它基本上是適應於中國農村存在着大量剩餘勞動力這一國情。當時國家強調的互助

^④ 劉瀾濤：〈正確地執行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人民日報》1955年11月20日。

組，大多是鼓勵富裕農戶(有較多的生產資料)和貧困戶(但勞動力多)互助。這樣既可以使富裕農戶的生產資料得到運用，又為貧困農戶中的大量剩餘勞動力找到出路。所以當時《人民日報》一再強調互助組不僅要幹部領導，更重要的是團結富裕中農，因此它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富裕農戶和勞動力剩餘農戶之間互利的經濟組織。而合作社則不同，它是一種由幹部進行行政管理的集體經營。

表面上看，初級社和高級社不同，前者土地私有，具有資本主義性質；後者才真正是集體經濟。實際上，初級社和高級社的基本差別僅在於一點：這就是農民擁有的土地是否參加年終分紅。初級社規定，擁有較多土地的農民可以比土地少的農民得到較多的報酬。高級社取消土地分紅，所有農民一概按勞動獲得工分。在幹部領導的集體農業中，初級社組織是不穩定的。幹部大多是貧農，積極分子也是貧農，他們往往不主張土地參加分紅。而且土地參加分紅和農民多勞多得的思想也有矛盾。因此，初級社極易轉化為高級社。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兩個結論，一個是互助組在組織性質上不同於合作社，即大多數合作社不是由互助組轉化而來的，而是由農村幹部另行組織起來的。第二個結論為初級社極易轉化為高級社。我們發現這兩個結論和中國合作化過程相吻合。表9.7為1950至1955年農業生產合作社和互助組之發展趨勢。從中可以看到1954-1955年，互助組始終佔總農戶的50%以上，而合作社卻有了迅速發展。除了少數互助組因幹部專辦合作社垮了台外(從表中可以看到1954年互助組佔總農戶的比率是58.4%，到1955年降為50.7%)，互助組的發展基本上和合作社不相關。表9.8為1950至1955年合作社發展數的統計。我們可以看到1955年初級社仍佔絕大多數，但在年內隨着合作化運動的推進，高級社佔了絕大多數，佔總農戶的61.9%。

	絕 對 數					參加互助合作組織的農戶佔總農戶的%				
	1950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0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全國總農戶	105,536	113,683	116,325	117,331	119,20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參加互助合作組織的農戶合計	11,313	45,423	45,912	70,775	77,310	10.7	40.0	39.5	60.3	64.9
農業生產合作社	219(戶)	59	275	2,297	16,921	...	0.1	0.2	2.0	14.2
高級社	32(戶)	1.8	2.1	12	40
初級社	187(戶)	57	273	2,285	16,881	...	0.1	0.2	1.0	14.2
農業生產互助組	11,313	45,364	45,637	68,478	60,389	10.7	39.9	39.3	58.4	50.7
常年性互助組	...	11,448	13,329	30,713	32,843	—	10.1	11.5	26.2	27.6
季節性互助組	...	33,916	32,308	37,765	27,546	—	29.8	27.8	32.2	23.1

取自〈國民經濟統計提要〉，《新華半月刊》，第17號，頁44（北京，1956）。

表9.7 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的發展(1950-1955) (單位：千戶)

	1950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農業生產合作社	19	3,644	15,068	114,366	633,742
高級社	1	10	15	201	529
初級社	18	3,634	15,053	114,165	633,213
註：截至1956年5月底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發展到1,003,657個，入社農戶已達110,134,226戶，佔全部農戶的91.2%，其中高級社302,756個，入社農戶74,720,054戶，佔全部農戶的61.9%。					

取自前引文，頁45。

表9.8 農業生產合作社數量變化(1950-1955) (單位：個)

註十 表面上看，公私合營企業中存在着公股和私人股份，只有公股佔一半以上，國家才能對企業行使決定權。但是國家通過「五反

運動」確立了黨和工人群眾幹部的權威後，只要企業中有公股（並不一定佔相當比例），國家幹部（公股代表）就已對企業具有決定性的支配權。當時《人民日報》曾嚴厲批評了有些幹部的傳統保守思想，即認為「公股比重至少要佔一半才能居領導地位」，「企業中公股比重愈大領導地位愈鞏固」，而再三強調幹部的領導權^⑮。

註十三 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的行為模式是不同的。私營企業的目標受市場支配，力求利潤最大，國營企業的目標是完成國家計劃。表面上看，公私合營企業的行為模式應處於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之間，實際上它卻基本上等同於國營企業。因為在公私合營企業中，如果國家幹部根據市場模式來管理和處理與資方的關係，會被指責為右傾和失去立場。1955年《人民日報》曾點名批判這些按市場規律行事之公私合營企業的幹部，上海民用藥廠就是一個著名例子。該廠1950年已經公私合營，1952年國家派代表擔任這個藥廠的總經理。這個廠的幹部是比較傾向於市場規律的。由於資本家股份佔62%以上，幹部認為應按資本家管理方式來經營。他們認為，如果工廠有發展，裏面也有國家利益，「公私合營企業的利益，就是國家利益」。但這些幹部被指責為嚴重右傾和「放棄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當時批判這個公私合營企業的理由，主要基於兩個方面，一個是資本家所得大於國家所得。1950—1954年，紅利達120,460元，資本家得到84,590元，公股只分得35,870元。另一點為幹部主張「經營合法就行」的思想^⑯。在這種指責中，公私合營企業即使公股佔少數，它的行為也像國營企業。

^⑮ 〈認真辦好公私合營企業〉《人民日報》社論 1955年5月25日。

^⑯ 王惠平：〈一個損公利私的「公私合營」企業〉《人民日報》1955年10月28日。

註十四 根據國家統計局1956年公佈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到由國家加工、訂貨、包銷、收購的產品佔私營工業總產值比重不斷增長(表9.9)。1952年五反運動後它佔50%以上，統購統銷後它進一步佔80%以上。

時 間	1949	1952	1953	1954	1955
百分比	12%	56%	62%	79%	82%

據國家統計局：〈幾年來私營工業生產的巨大變化〉提供數據製表，《人民日報》，1956.3.21。

表9.9 國家加工、訂貨、包銷、收購的產品佔私營工業總產值的比重 (1949-1955)

註十五 自由市場消失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1956年全國進入社會主義之前，自由市場萎縮的表現主要是生產資料供給和工業品的銷售脫離市場，我們可以稱之為生產資料市場消失。到公私合營後，自由市場進一步萎縮，衝擊波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包括飲食行業和農村商業網點。

我們可以舉出不少例子來證明這一點。上海市原有私營批發商五萬七千多人，到1954年國家幾乎壟斷整個批發業務，但國營批發商工作人員只有八千人^①，市場顯著縮小。同樣的情況出現在北京和其他城市，例如北京東曉市市場的衰落就是典型的例子。北京東曉市市場本是一個手工業的集散地，共有三千戶攤商，手工業戶二千戶，1953年平均每日交易額達六萬三千多元，在旺季商販們甚至用飛機運輸。1953年後，私營批發衰落。統購統銷後，1955年整個產銷關係網遭到破壞。市場衰落到這種程度，連附近的飯攤和看自

^① 〈國營商業批發工作的新任務〉《人民日報》社論 1955年6月7日。

行車的人都無生意可做⁷⁸。

市場消失不僅表現在國家控制的商業機構效率低，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甚至在從事商業的人員變化上，也可以看到商業網點和從事商業人員的減少。1950年私營商業有402萬戶，從業人員達662萬人，到1955年減少到277.2萬戶，從業人員只有364.2萬人。雖然國營商業機構從1950年末的5.2萬個發展到51.5萬個，從業人員從38.2萬人增至249萬人，但公私商業機構總數仍減少了80萬個，從業人員減少了90萬人⁷⁹。

1955年底1956年初開始全面公私合營後，市場進一步萎縮，它構成了對中國城鄉居民生活的巨大衝擊。本來小商店約佔城市商店總戶數的70%以上，營業額約佔全部商業營業額的1/3到1/2⁸⁰。但到1956年公私合營運動開始以來，約有28%左右的小商販發生嚴重困難，他們不能像過去那樣獲得貨源⁸¹。

由於全國國營和公私合營商店56%的機構和60.5%的人員均集中在城市，因此自由市場之萎縮對農村的衝擊比城市更早也更大。1955年後一度出現農民買不到想買的東西。國營的供銷合作社缺乏市場需求信號，農村出現了嚴重的供銷不對路。農民需要的東西沒有或很少，不需要的卻來了一大堆，而且上級幹部強迫農業生產合作社購買他們並不需要的東西。如安徽郎溪縣幸福農業生產合作社就被迫賒購糖果4,800多斤，折合稻穀七萬多斤。供銷社還強迫農

⁷⁸ 賈貴發：〈讓北京東曉市市場更加活躍起來〉《人民日報》1956年4月6日。

⁷⁹ 《統計工作通訊》資料室：〈我國商業網的發展和1955年的基本情況〉《統計工作通訊》第18期（北京：1956）。

⁸⁰ 〈慎重地改造城市小商店〉《人民日報》社論 1956年4月25日。

⁸¹ 〈幫助小商販克服困難〉《人民日報》社論 1956年7月21日。

民購買臘肉、自行車、收音機等^②。隨着自由市場進一步衰落，城市的供求平衡也不再依靠市場調節，而靠國營商業，立即出現了市場供求平衡的破壞。我們發現，幾乎可以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商品供應典型性案例的北京市大白菜供應問題恰恰發生在1956年，它和市場消失密切關聯。本來通過自由市場，從蔬菜生產到消費，只有一道環節，兩裝一卸，從農田收菜到居民買到菜只要一天左右。1956年由國營機構來做，從蔬菜採摘到供應到市民手中一般要經過三道環節、裝卸三次，過手五次到六次。在不積壓的情況下，需要二三天時間，1956年後北京蔬菜供應不僅質量下降，價格反而貴了^③。

註十六 在實行公私合營前一年，全國幾乎所有私營企業都出現了嚴重的供銷危機，它表現為產品積壓，國家供給原料不足，或供銷不對路，出現很大混亂。我們發現，這正是市場調節功能消失帶來的結果。由於市場萎縮，不再起到供銷調節分配功能，而國家的包銷、定購又不甚靈活，私營企業在市場信號和動力消失條件下只有兩個選擇，一是破產，二是納入計劃軌道，否則將對整個經濟產生某種破壞作用。我們可以引用當時一篇分析上海市私營企業的文章來說明這一點。這篇文章說，公私合營前一年，上海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很多先進的生產設備不能利用，如毛紡業中，全新的現代化機器閒置，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讓一些設備陳舊殘缺不全的小廠開工。本來，資本家總是拼命追逐利潤的，但那個時期，資本家行為模式完全變了，大多數資本家似乎失去了追逐利潤擴大生產的興趣。「有些資本主義企業生產組織差不多已到癱瘓的地步。更多的資本主義企業，事實上早已不是依靠資本家」。另一些資本家，由

② 〈不准強迫推銷商品〉《人民日報》社論 1956年7月17日。

③ 宋光燾：〈怎樣改進蔬菜供應工作〉《人民日報》1956年7月30日。

於在市場中得不到利益，就傾向於在國家加工訂貨中摻假，偷工減料，虛報成本，他們認為，儘管生產不好，反正國家會來維持。文章作者認為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已嚴重不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目前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差不多失去推進生產的能力了」^④。事實上，這篇文章所講的正好是市場調節信號消失後，私營企業行為發生的改變。由於沒有市場需求信息，私營工業產品出現積壓。但這些企業的原料又是由國家統一供應的，國家怎麼知道哪些企業設備先進、哪些企業設備落後呢？結果先進的企業原料不夠，落後的企業倒有原料。在市場消失條件下，企業不能從市場中獲得利潤，國家包銷、定購立即成為獲利來源了。偷工減料摻假反而會盛行。在這種情況下，取消私營企業是大勢所趨。

時間	1949	1952	1954	1955
百分比	63%	39%	25%	16%

據前引國家統計局提供數據製表。

表9.10 私營工業總產值佔全部工業總產值的百分比(1949-1955)

時間	1949	1952	1953	1954	1955
總產值增長指數 (以1949年為100)	100	623	917	2,317	3,265
佔工業總產值的百分比	2%	5%	6%	12%	16%

據前引國家統計局提供數據製表。

表9.11 公私合營企業之增長(1949-1955)

④ 何均：〈論全業合營——從上海私營工業的七個行業的情況看實行全業合營的作用〉《學習》3月號（北京：1956）。

註十七 表9.10為1949年到1955年私營工業總產值佔全部工業總產值的百分比。表9.11則是公私合營企業佔工業總產值的百分比。從這兩個表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到1955年，私營工業佔工業總產值百分比仍和公私合營企業一樣多。而到1956年初，幾乎所有的企業都公私合營了。因此我們可以說，社會主義改造幾乎是一種突變。



第十章 大歷史觀

我寫下即將滅亡的悲劇，暴露它的缺陷
與德性，它沉重的悲哀和渾渾沌沌的驕傲，
以及為重新締造一個世界、一種新人類而感
到的沮喪。——這便是我們過去的歷史。

——羅曼·羅蘭

10.1 解除魔咒

現在，我們可以從歷史細節中擺脫出來，站在高山之巔，對1840–1956這百餘年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作總結了。1840年以前，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是儒家意識形態與社會(政治)組織一體化，與它耦合的經濟結構是地主經濟形態。1956年中國再次完成了意識形態、政治和經濟三個子系統的整合，社會組織方式是毛澤東思想與政治結構一體化，和它耦合的經濟系統是計劃經濟(農業集體化)。一百多年來，中國大陸近現代社會演變的主線就是傳統社會結構在對外開放條件下向這種新社會結構轉化。

儘管社會結構轉化的細節錯綜複雜，但它仍可被視為超穩定系統受到外來衝擊時的行為模式。在西方工業文明興起前，中國超穩定社會結構已存在了兩千多年，歷史上也多次受到外來文明的衝擊。如果我們把以往的衝擊與近代的行為作一跨時代的比較，就可以發現行為模式的類似性。眾所周知，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北方游牧民族大舉入侵和佛教的傳入，中國一體化組織方式受到極大的干

擾，一度失去整合統一的能力。神州大地出現了三百年左右的分裂割據局面。直到民族融合大體完成，儒學消化了外來文明後再次復興，中國才又按着傳統的一體化社會整合方式，建立了強大興盛的隋唐帝國。數百年間中國的社會變遷經歷了一體化組織解體、儒家意識形態衰落然後又復興、重建一體化中央王權這樣三個階段。我們在本書中論述了中國自1840年以來的社會變遷，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也是由「傳統一體化解體、意識形態更替、新一體化建立」這三部曲組成。古代和近代社會變遷的三部曲雖具體內容完全不同，但存在着深層結構的類似：這就是超穩定系統是通過調整意識形態來適應外部世界的變化的。我們可以用生物適應環境來作比方。生物體為了適應生存環境變化的衝擊，必須改變自身形態，而生物體形態的改變則有賴於基因的變化。意識形態對超穩定系統，正如基因對生物體形態那樣起決定性作用。我們再三論述過，在一體化組織方式中，意識形態不僅是社會組織的藍圖，而且是現實政治和社會組織的基礎。正因為它類似於生物體基因，於是像生物體基因變異而改變性狀以適應環境那樣，超穩定系統必須通過修改意識形態來適應外來衝擊。

比較魏晉南北朝和十九世紀兩次大衝擊，我們可以看到，第一次經歷了約三百年的轉變，其結果只是導致儒家意識形態自身的改進和自我完善；而第二次衝擊在短短百餘年間則促使意識形態整體性更替，社會結構也發生了兩千年所未有的鉅變。這些行為模式的差別也許正好表明近代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所造成衝擊性質的不同。中國超穩定結構作為農業文明最高成就的創造者，受到同等發達或更低形態文明的衝擊時，原則上並不要改變社會結構，充其量只要對意識形態加以改善。魏晉時期如果僅僅有遊牧民族入侵，是不致於出現三百年分裂局面的。當時對一體化結構最主要的干擾，是佛教傳入後和中國內部的玄學相互激盪，動搖了儒家意識形態的

正統地位，造成一體化組織方式的破壞。只要儒家學說吸收了外來文化，自我完善，內部產生抗干擾機制，就能重建一體化。魏晉南北朝後期，儒學慢慢排除了玄學和佛教的干擾並吸收了其營養，重新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中國歷史也就進入了輝煌的隋唐盛世。宋以後，一體化結構進一步完善，儒學也發展到宋明理學新階段，雖然在此後也不斷受到四周少數民族的衝擊，但它已具有很強的抗干擾能力，甚至在漢人喪失政權的情況下，也都再沒有出現全面解體和長期分裂的局面。

西方工業文明是一種嶄新的文明，其經濟生產能力、軍事科技和政治組織結合在一起所具有的巨大擴張性，對中國構成了史無前例的挑戰。衝擊是全面的、殘酷的，超出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應付能力的極限。為了繼續生存發展，中國社會結構的三個子系統都必須出現巨大改變。由於受到一體化組織方式的制約，改變社會的三個子系統必須以意識形態的更替為前提，所以應付西方衝擊時，像魏晉南北朝時期那樣，保持儒家意識形態主體並同化外來文化的辦法再也行不通了。晚清中國社會在西方衝擊下的不斷解體，直到新文化運動時期實現意識形態更替，中國才能有效地回應西方。如本書第五章所論，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意識形態更替，一方面是拋棄儒家意識形態，另一方面也是西方思想和中國深層文化結構相結合締造新意識形態的過程。接着，中國社會形態也就按照新意識形態設計的藍圖而發生鉅變。新一體化結構有比傳統一體化結構龐大數十倍的官僚機構，因而也具備了史無前例的社會動員能力。這就有效地保證了中國在對外開放條件下的民族獨立，並開始了初步工業化的歷程。

如果用單線進化論來看近代中國社會一系列的變化，那麼每一階段的人都認為自己比前一階段的人更先進。因此，迄今為止每一代人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解釋，都建立在對前人的否定之上。五四青

年指責推動清末新政的紳士是封建遺老；自由主義者批評五四運動引入新意識形態為誤入歧途；三民主義者認為新文化運動破壞和中斷了中國傳統，視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共產國際和蘇聯陰謀的工具；共產黨也痛斥國民黨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走狗。現在是解除這一系列歷史性指責的魔咒的時候了：其實，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每一個環節都是超穩定系統在西方工業文明衝擊下的必經階段。晚清的洋務運動、變法改革以及辛亥革命，為儒家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解體作了準備；新文化運動時期，新知識分子因此得以完成意識形態的更替；此後，國共兩黨分別努力實踐各自的意識形態綱領，整合社會、推進經濟現代化。在上述變化鏈中，離開前一個環節，就無法實現下一個環節。只有把所有變遷作為整體理解時每一個階段的歷史意義才能正確定位。既然超穩定結構是中國歷史上形成的特有的組織方式，那麼它成為中國在近代演變的基礎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對清王朝的現代化嘗試，辛亥革命、五四青年的激進主義，以及國共兩黨的社會整合，都應該承認它們有不可取代的歷史地位與意義。我們相信，將來回顧這一百多年的歷史，它絕非一連串的失敗，過去的世紀頗為壯麗地體現出中華文明頑強的生命力和偉大的創造能力。

10.2 一體化結構的束縛

毛澤東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比喻為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兩座大山，用愚公移山來形容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革命。但是愚公移山的故事沒有設想搬掉門口的兩座大山後會發生甚麼新情況。超穩定系統是用更替意識形態來適應開放環境的，它帶來的後果卻可以在理論上預見，這就是用新意識形態塑造之社會結構會日趨僵化，隨

着時光流逝，類似於近代史上出現過的落後局面將會再次出現。原因十分清楚，在對外開放條件下，超穩定系統不得不面臨不斷變化的環境。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子系統在一百年後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際競爭規則和對中國的衝擊方式也改變了形態。而超穩定系統今天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本是適應十九世紀衝擊而建立，它無法適應這些新的變遷。

十九世紀國際競爭對政治結構的要求是增強政府動員能力，而二十世紀後半葉民主和人權成為關鍵性指標。十九世紀經濟實力的較量表現為國家的工業化程度，而今天則更多地強調人民的生活水平。經濟先進意味着國民收入持續不斷的高速增長。過去，是意識形態稱霸的時代，現在則面臨了一個意識形態被多元文化消解的時期。顯而易見，超穩定系統為適應十九世紀西方衝擊而建立的社會結構再也不能應付今天的世界潮流。一體化結構組織方式要求政治統治權威由意識形態提供，為了維持統治是不能允許多元化思潮對正統意識形態衝擊的。新一體化結構的領導核心是列寧主義式政黨，黨國、黨軍、黨天下自然和民主政治不相容。同樣，在經濟發展和一體化結構之間也存在着衝突[註一]。我們在分析洋務運動時曾指出，一體化組織方式使得現代化只能被限制在器物 and 外交層面。甲午以後各種改革都突破了傳統一體化的限制，現代經濟因素增長很快，但卻引起了傳統社會結構的解體。在共產黨建立的新一體化結構中，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中國共產黨在五十年代固然有能力把農業積累轉化為工業投資，但計劃經濟很快就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文革後，中國宣佈改革開放，引進市場機制，但如同甲午以後自由經濟快速發展引起傳統一體化解構一樣，中國目前又面臨統治的權威危機、地方主義的興起、農村基層組織的日益混亂[註二]。過去數十年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社會整合正在解體之中[註三]。

每當談起中國的再次落後，有人或許會感慨世事反覆無常，國際競爭方式的改變似乎在和中國開玩笑，但是問題的本質仍在於超穩定系統適應衝擊的模式。一體化組織方式在相對與世隔絕的條件下建立，它本來只是一種維持社會基本形態不變的機制，當遇到不斷進步的西方現代文明的挑戰時，只能用意識形態更替來追求現代化目標。但是，這種更替意識形態方式建立的新一體化結構仍然是僵化的，不能適應快速進步的世界。這裏我們看到的，是一種保持社會穩定(但因此也停滯)整合機制與現代社會不斷進步之衝突。

我們可以用兩個示意圖來表示一體化組織方式和現代社會之間的差別。圖10.1以現代經濟發展為縱坐標，社會整合程度為橫坐標。直線AB表示經濟持續增長不影響社會整合，這是現代社會中經濟發展和社會整合之間的理想關係。這樣的社會結構可以適應不斷進步的潮流。圖10.2是中國近代超穩定系統中經濟增長之過程。超穩定系統用意識形態更替來適應不斷進步的環境，這就使得超穩定系統的經濟現代化一定是一條如abcdefg所示的反S型曲線。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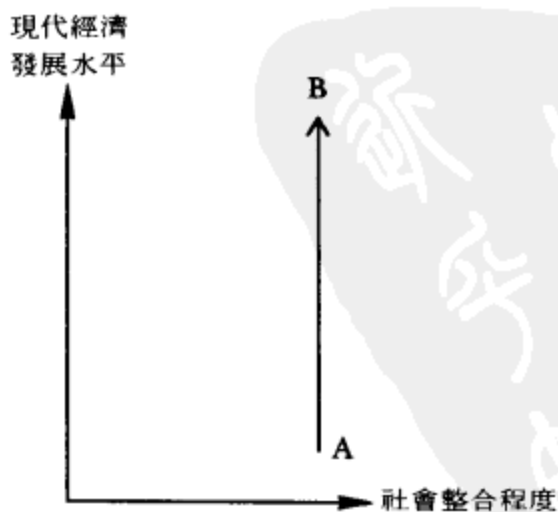


圖 10.1 經濟現代化與社會整合不互相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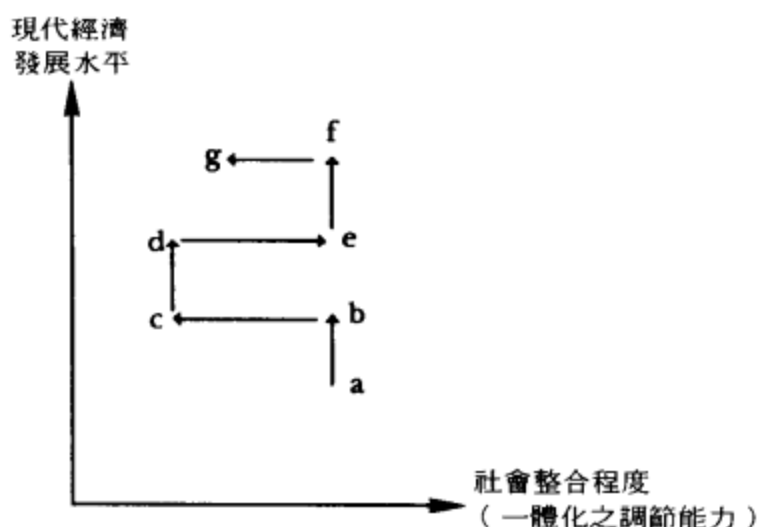


圖10.2 經濟現代化與社會整合互相排斥

中，ab線段代表傳統一體化結構所能容納的經濟增長的極限；bc表示越出傳統一體化結構局限時，社會整合程度的急驟破壞；cd是在沒有一體化束縛情況下經濟增長的程度，但它很快又被社會整合危機所中斷；de代表意識形態更替後新一體化結構建立，社會整合恢復到高水平，它是對十九世紀以來西方衝擊的成功回應，但新一體化結構對經濟發展仍有相當大的限制；ef線表明用計劃經濟推行工業化，發展到一定水平後，經濟陷於停滯，由此世界現代經濟卻在不斷增長，中國再次顯得落後。要重新推動經濟現代化，後果是如fg所示（而這正是目前在發生的），政治結構受到巨大衝擊，新一體化結構必須再次解構才能適應經濟成長。

10.3 超穩定系統應付外來衝擊的模型

表面上看，圖10.2只是一個形象化不甚嚴格的示意圖。但是，

超穩定系統社會整合程度是可以用一體化結構調節能力來代替的。這一特點可以使我們把圖10.2變成一個描述超穩定系統應付各個時期(古代和十九世紀以及二十世紀)外來文明之衝擊統一模型，只要把圖10.2具體化，賦予縱坐標和橫坐標不同的值，那麼中國社會在受衝擊時所經歷的社會結構變遷各個階段就能用圖10.2中軌迹來表示。我們得到一種大歷史觀。

我們把代表一體化調節能力的橫坐標 X 分為弱(X_1)、中(X_2)、強(X_3)三個等級，用 Y_1 、 Y_2 、 Y_3 、 Y_4 表示經濟結構中現代化程度為無、低、中、較高等四種水平，那麼， X 和 Y 可以有12種不同的組合($3 \times 4 = 12$)，我們得到圖10.3。每一種組合為一個格子，圖10.3中有12個格，每一格中社會結構三個子系統狀態均可通過分析一體化調節能力大小和現代經濟成分多少這兩個指標而推出[註四]。超穩定系統在外來衝擊的條件下社會結構三個子系統的變化均可以表示在格子上。

現在我們根據圖10.2中曲線 $abcdefg$ 的順序考察圖10.3中的格子，它們是3、4、5、6、7、8、9等格子。我們發現這7個格子恰好代表了本書所討論的中國近現代史中社會結構依次經歷之狀態。

第三格代表了中國封建社會對外開放前的社會結構。第四格是洋務運動時期的社會結構。第五格則刻劃了1895–1911年社會政治經濟狀態。第六格為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第七格則為北伐前的社會階段。第八格代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第九格為共產黨在大陸建立的社會結構。從代表傳統社會結構的第三格變到代表社會主義社會的第九格，中間經過六次大飛躍，正好對應着中國近現代史上六次社會內部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它們分別是：洋務運動(從第三格躍到第四格)、甲午戰敗後清廷推行現代化改革(從第四格躍到第五格)、辛亥革命(從第五格躍到第六格)、新文化運動(從第六格上升到第七格)，北伐與國民黨統一中國(從第七格躍到第八格)、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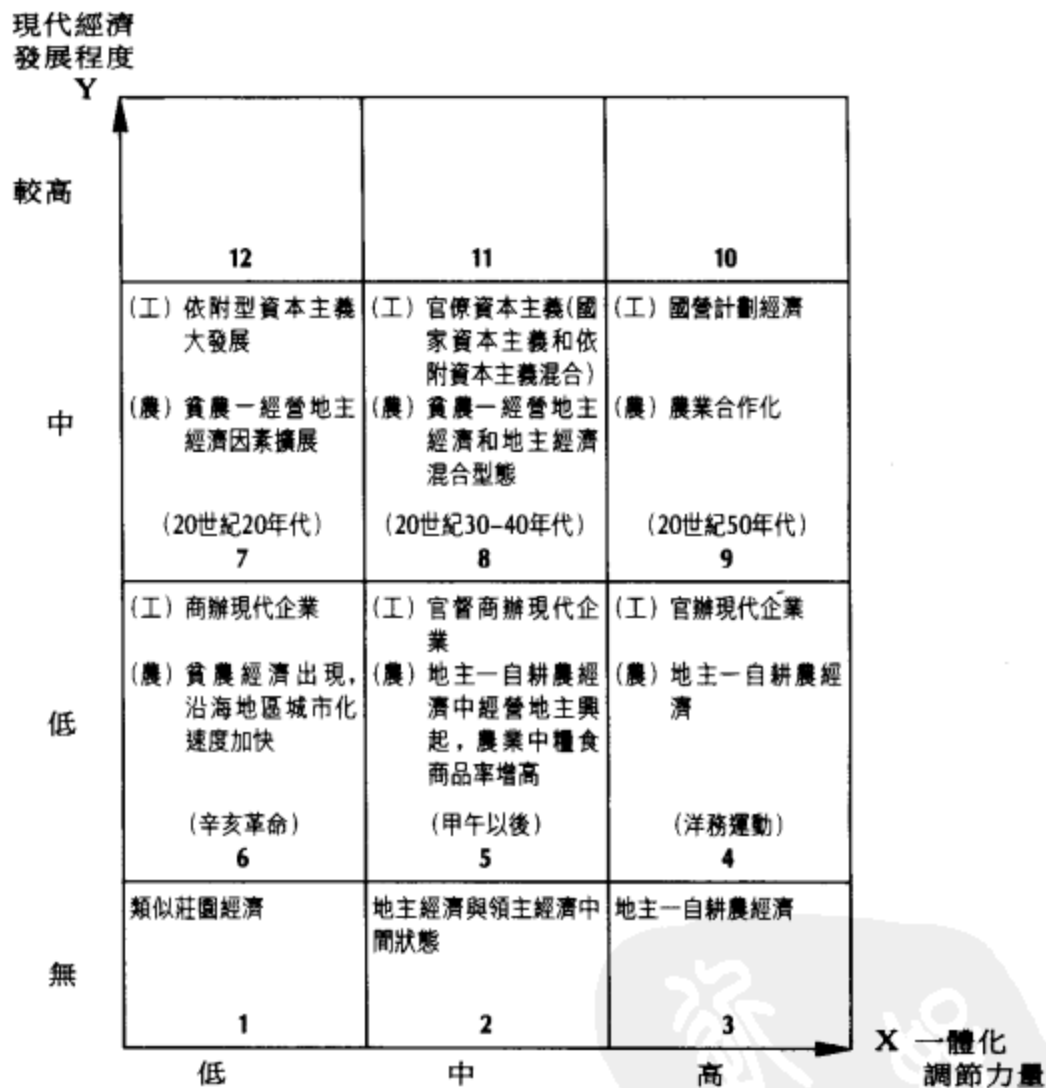


圖10.3 超穩定系統應付外來衝擊的模型

放戰爭(從第八格躍到第九格)。只要對這六次重大歷史事變的條件進行研究就可以發現, 它們均為前一格社會結構所決定, 大歷史事變又把社會結構推向下一格[註五]。

根據圖10.2反S曲線, 1949年中國社會進入第九格後, 應由第

九格上升到第十格(線段cf)，即一體化結構不變，僅僅是Y值飛躍一格。到第十格後，又應該進入第十一格(線段fg)。它基本上符合從1956至1989年這30多年的宏觀變遷。

1956年後國家既然在組織結構上具備了徹底剝奪農民，把農業剩餘系統轉化為工業投資的能力，那麼只要這種轉化在進行，中國經濟中工業成分就能迅速成長。雖然中國共產黨1958年想用「大躍進」一下子提高現代經濟水平這一幻想破滅了，但在五六十年代，中國經濟中工業比重的確出現了某種躍進，1966年工農業總產值是1949年的5.4倍，從 Y_3 變為 Y_4 。因此，自六十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結構進入第十格[註六]。

讓我們把社會結構從第九格進入第十格和1840年後中國社會結構從第三格躍入第四格進行比較，兩者儘管存在着極大的差別，但有一點卻是類似的，這就是社會結構向上躍進一格後，它不能繼續往上走，也不能一直停留在這個狀態，它必然會演化到一體化調節力減弱的第十一格中去。正如1840年後社會由第三格進入第四格後不能停留在第四格，要轉移到第五格一樣。原因相當清楚：在保持一體化整合方式不變的條件下，現代經濟的發展有一個極限；而在今天的世界範圍競爭之情形下，中國不可能再永遠封閉。一體化結構在閉關鎖國條件下發展經濟，社會主義和現代市場經濟誰勝誰敗的問題，遲早會在社會和科學發展水平比較上顯示出來。新一體化結構在發展經濟競爭中的失敗也會導致意識形態認同危機。

1966年中國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它從內外兩個方面大大加快了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的到來。在十年文革期間，中國經濟發展開始放慢，1967、1968年甚至出現倒退，1976年國民總產值僅為1966年的1.8倍。而正是在這十年中，東亞出現了經濟起飛的奇跡。中國和西方、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的差距再次拉開。社會主義可以超過資本主義的神話被現實粉碎。新意識形態如同儒家意識形態一樣，是

一個獨斷的遲早僵化的思想體系，它終有一天會成為思想文化和創造力的束縛。因此，新一體化結構這種社會組織方式已內在規定了它在和西方競爭中會碰到傳統一體化結構一樣的命運：中國再次落後了！落後的現實如同洋務運動失敗一樣反衝回來，成為破壞新一體化結構意識形態認同的巨大動力。中國共產黨人在文化革命帶來的巨大災難面前，認識到必須向西方學習。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如同1895年公車上書事件一樣，是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爆發的象徵。它立即改變了新一體化結構，使得由強勢意識形態控制的 X_3 狀態變為弱勢意識形態控制的 X_2 狀態。因此，文化革命的結束使中國社會由第十格進入第十一格，正如1895年後從第四格進入第五格一樣。

1978年12月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社會結構從第十格進入第十一格的標誌。這時社會結構又出現了類似於第五格、第八格的種種特點。首先，中國出現了第二次對外開放。在圖10.3的模型中，與 X_2 相對應的格子，由於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初步顯現，社會均處於開放狀態。1840年中國對外開放並非出於中國自願，1895年前大多數士大夫的心靈也並非真正向西方文明開放。只有1895年受甲午戰敗衝擊爆發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大多數士大夫才意識到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出現向西方文明學習的潮流，一批批留學生出國，這才是真正的開放。1979年後，中國同樣形成了留學和引進之狂潮，對外開放成為不可抗拒之潮流。第五格和第八格中，由於一體化結構對經濟干預減弱，現代經濟成分中並存着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城市經濟呈官督商辦或官僚資本主義，農業則為傳統的地主—自耕農經濟。第十一格也出現了類似特點：經濟由單一的計劃變成了雙軌制，鄉鎮集體所有制、私營和新型的官督商辦企業迅猛發展，在短短的十年中產值就佔工業總產值的一半。農業經濟也擺脫了新一體化結構的強控制，由合作化後共產黨幹部控制下的

集體所有制向個體農業經營轉化。政治結構也和第五格、第八格有某種類似，出現了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和政治改革的互動。有人把1989年六四事件比作1898年的戊戌政變，它們都由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引發，而政治改革失敗導致更大的認同危機，中央政府威信喪失，地方主義開始滋生。直到現在，中國社會三個子系統仍處於第十一格之中。很多人甚至相信，我們的時代在某種程度上正在重複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那種歷程。新一體化結構遲早會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擴展下瓦解，那時，中國將再次出於類似於第六格那樣的多黨制和民主憲政嘗試，並碰到日益嚴重的社會整合危機。

研究中國社會1956年以後的變遷已超出本書的內容，未來中國的發展到底會怎麼樣，更不是歷史學家所能回答的問題。我們之所以劃出1956年到今天社會結構變遷極粗略的線條，決不是說這段時間的變遷已經研究清楚，而只是想表明，在千變萬化氣象萬千之社會事件背後，確有某種整體的演化模式存在着。一個好的理論模型，如果它真的可以勾劃出大歷史觀，那麼圖10.3中剩下的第一、第二兩個格子所代表的變遷一定不會沒有意義。十分有趣的是，它們恰恰代表了超穩定系統在近代以前受到外來文化衝擊時的行為，這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結構變遷。我們必須注意，對於第一第二這兩格，現代經濟水平始終停留在近乎「無」的 Y_1 上下，這意味着外來衝擊僅僅是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一體化結構的組織基礎是意識形態認同，當它受到外來文化衝擊時，如果意識形態認同發生障礙，傳統一體化結構就會解體，社會結構也將經歷由 X_3 向 X_2 和 X_1 退化之歷程。另一方面，傳統意識形態在外來衝擊下喪失主導地位的狀態並不會長期繼續下去，隨着外來文化被中國文化同化，儒家意識形態再次恢復正統地位，一體化得以重建。這時，社會再從第一格變到第三格。這樣，超穩定系統在近現代之前受衝擊的行為可表示為：社會結構由第三格退到第一格，再由第一格回到第三

格。即 Y_1 不變， X 出現周期變化[註七]。顯然，它正好刻劃了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帝國這一漫長時期社會結構的變遷歷程。

近現代中國受到西方衝擊和魏晉南北朝時期受外來文明衝擊結構上的最大不同是：近代衝擊不僅是對原有社會結構形態之干擾，它還伴隨着現代化要求，用圖表示就是 Y 值的增大。事實上，我們只要將 Y 值從 Y_1 增加到 Y_2 、 Y_3 和 Y_4 ，加上對應的 X 值的周期變化，恰恰是一個倒走的S型曲線[註八]。超穩定系統在魏晉南北朝時受外來衝擊的行為模式和近代西方工業文明衝擊下的行為模式居然可以用統一模型把握，這是令人震驚的。它意味着超穩定系統假說可以把中國古代史觀與近現代史統一起來。

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在他的自傳中，談到他為何探索生物進化規律時曾這樣寫道：「我觀察這偉大的世界，尤其是人類的特質，我不能贊成，武斷地認為世界只是由無目的的力量在支配着的想法。這個世界不論是善是惡，必然有一個無所不在、巨細靡遺、瀰於宇宙的定則存在。」大歷史觀的探索使我們對達爾文的話深有同感。雖然當前史學界的時尚是把人類社會發展看作偶然的，社會變遷也不會有固定的模式，但是，我們真切地感到，支配着中國歷史演化的宏觀模式是存在的。

但是，我們在主張過去歷史發展遵循某種模式的同時，卻不同意歷史決定論或宿命論。因為過去的模式未必在未來一定有效。對於歷史進程，從來都不存在不可更改的宿命。過去的模式本是歷史的斯芬克斯施加的魔咒，它向每一代走到它面前的人，提出同樣的自身之謎。只有歷史的盲目性未被認識時，斯芬克斯的魔咒才能生效。大約半個世紀前，英國歷史學家卡爾(Edward Hallet Carr)在撰寫《新社會》(*The New Society*)時指出，歷史演變的模式和自然科學中的規律是不同的。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沒有過去意識，不會從過去行為中吸取經驗，所以同一齣戲劇會重演。而推動着歷史演變的

人類則不同，他們是可以在歷史中學習的。過去演變的模式在未來如果仍然發揮效能，它的前提是人們歷史記憶之短暫，即歷史規律是建立在群體行為的無意識之上的。意識形態魔咒是中國文化和文明幾千年來最大的無意識。一旦中華民族在痛苦的歷史經驗中認識到現代社會再不能依靠意識形態認同來建構之時，這種歷史意識本身可以使人們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是的，如果一百多年來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的歷程進入了中國人理性之視野，那麼一切會如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在〈我願意生活於其中的社會〉一文中所說：「我們的後代回顧我們時，將會視為黑暗時代之最後一瞬。」



第十章 註解

註一 一體化組織方式和經濟持續增長之矛盾首先表現在現代化目標和意識形態關係上。用一體化組織來推行經濟現代化，有一個前提，這就是經濟發展綱領必須被納入官方意識形態之中。一旦意識形態不能包含進一步的現代化目標，現代化就會被排除出去。洋務運動時期，官方意識形態是儒學的經世致用，它自然不能包含更多現代化內容。洋務運動時期意識形態對現代化的排斥很多人都知曉，十分有趣的是，五十年代後期，我們又看到這一歷史規律的新版本，即新意識形態和現代化目標的互斥。意識形態作為一個整體性思想體系，它的內容必須隨着政治和經濟結構的變動而進行調整。這就潛含着一種可能性，在某種條件下，經濟現代化會因意識形態發展而被遺忘。1956年中國放棄了新民主主義後，曾出現過這種局面。原來，經濟現代化是通過新民主主義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義在政治上強調共產黨的領導，經濟上推行孫中山的「節制資本」和「耕者有其田」^①。然而1955年的農業合作化浪潮和「公私合營」卻促使現實經濟結構超越意識形態框架，新民主主義綱領因不符合現實而過時。意識形態不得不重新確定有關經濟現代化之綱領。經濟現代化是否能再次納入意識形態，則取決於當時政治經濟的宏觀條件。

在1956年以後的若干時間裏，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中應採用甚麼樣的模式來實現經濟現代化，一直是一個懸而未決的難題。毛澤東在合作化運動中發現農村基層幹部用「人海戰術」辦農業和種試

①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一卷本）。

驗田的熱忱，認為它可以帶來工業生產的大躍進。劉少奇、周恩來和主管經濟的務實派則更多地傾向於蘇聯工業化經驗。但是它們均不可能進入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最先受挫折的是毛澤東發展經濟的方案。1958年的大躍進是這種經濟發展方案之實施。大煉鋼鐵和群眾運動辦農業很快被證明是烏托邦式的空想。1960年大躍進帶來的嚴重破壞開始顯現。農村因共產風餓死兩千萬人，工業經濟也達到崩潰的邊緣。1961年的國民總產值繼續下降38.2%，農民生活非但不如合作化之前，很多地區比1949年前更為困難。在無情的失敗面前，毛澤東只得擱置他那十幾年超英趕美的經濟烏托邦，再次提倡調查研究，自己帶頭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並承認中國共產黨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有着很大的盲目性，在經濟領域中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存在^②。

那麼劉少奇等務實派的經濟建設方案能否成為黨的指導思想呢？大躍進失敗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務實派主張採取比較現實的辦法來發展經濟。在農業上，他們看到自耕農的生產積極性高於人民公社中的農民，因而主張解散公共食堂，甚至退回到合作化以前的階段，在農村提倡「三自一包」以恢復農村的生產力。在工業上，他們傾向於全面吸收蘇聯搞計劃經濟的經驗，推行廠長責任制，重視專家和規章制度。其典型例子是蘇聯一個大鋼廠的管理辦法被稱為馬鋼憲法，並用它來取代毛澤東用群眾運動發展經濟的鞍鋼憲法。但是，意識形態是一個整體性的思想體系，某些新的內容能否成為其有機組成部分，不僅要看它在實施中是否有效，還取決於它和意識形態其餘部分的關係。

只要共產主義仍是意識形態所追求的理想社會，「三自一包」作

^② 馬齊彬、陳文斌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頁177、187。

為退回到新民主主義階段的農村建設綱領，是不可能成為已宣佈進入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指導思想的。在工業發展方面，蘇聯計劃經濟的經驗要成為黨的意識形態，首先要確定蘇聯在意識形態中的位置。只有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當然領袖，中國共產黨才能認同蘇聯的今天是中國的明天，這也必然帶來中國共產黨對蘇聯的依附地位。民族獨立和蘇聯模式在意識形態上是有矛盾的。早在1957年1月，毛澤東已不能忍受蘇聯「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的態度。1960年蘇聯撤走全部在中國的專家，停止對中國的經濟援助項目，中蘇關係惡化。中蘇的矛盾本屬於民族利益之衝突，但是在意識形態與政治一體化的組織方式中，它必須給予一種意識形態意義的解釋。在這種關頭，中國共產黨沒有選擇餘地，為了捍衛意識形態認同，他們只能認為中國堅持了馬列主義的正統，蘇聯則犯了修正主義錯誤。這就使得用蘇聯模式來實現經濟現代化也不能進入意識形態。

於是，自新民主主義被放棄後，經濟現代化在一段時間內不能在黨的意識形態中找到位置。正是在中共對採用甚麼樣的經濟現代化綱領徘徊不決的三年困難時期中，中蘇意識形態論戰不斷升級，成為毛澤東思想發展的巨大推動力。全黨潛移默化地接受了毛澤東反修防修的理論，經濟現代化也就隨着毛澤東思想之發展被中國共產黨遺忘了。1960年4月，《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文章，正式提出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的問題。毛澤東認為蘇聯主要領導人已是「半修正主義」^③。1961年10月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二大，中蘇分歧公開化。1962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拉開了意識形態大論戰的序幕。差

^③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359-360（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不多與此同時，毛澤東把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和國際上的修正主義劃了等號，提出黨內有人搞修正主義。從1963年到1964年間，中共中央連續發表九篇重頭文章，全面闡述了中蘇分歧的來由。它們在全黨全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被人們稱為「九評」。根據九評的邏輯，中蘇爭執的原因是蘇聯共產黨被野心家篡奪了領導權，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立即把它運用到黨內鬥爭中，指出如果不抓階級鬥爭，反修防修，中國也會出現全國性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文化大革命已獲得意識形態的合法性。

一旦中蘇爭論中毛澤東思想的新發展被全黨公認，成為馬列主義的新發展，那麼用它來指導國內實踐也勢不可擋。毛澤東思想在放棄新民主主義後迅速地演變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經濟現代化也被反修防修所壓倒。這證明一體化結構中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結構的互動有着自己不可抗拒的內在規律。當黨的意識形態隨着新的國際國內局勢而作整體性調整時，經濟現代化很容易被意識形態認為會導致「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它因和挽救亡黨亡國反修需要衝突，故而從社會行動綱領中被排除出去。

註二 一體化結構和經濟現代化矛盾的另一個方面是，一旦經濟越出一體化組織方式所容許的限制，經濟進一步發展會對社會整合造成巨大衝擊。十年改革期間，共產黨的政治文化結構也就顯示出和傳統一體化結構在洋務運動中類似的兩難：當力圖鞏固一體化，保持社會整合時，經濟改革就難以推動；一旦把經濟改革放在第一位，新一體化結構就會受到愈來愈大的衝擊，社會整合趨向解體。

無論是農村分田到戶的責任制還是發展市場經濟，就立即會在意識形態上碰到「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黨內改革派高舉「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旗，用單幹和市場經濟的實效來反駁意

識形態保守派時，他們也許沒有想到，這樣做的另一個後果是黨內出現日益嚴重的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意識形態本是保持幹部廉潔抗拒腐敗的精神力量，是共產黨的合法性來源，也是中央政府壓服諸侯的權威基礎。日益擴大的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意味着意識形態在一體化組織中調節功能的喪失，它立即帶來黨組織渙散、中央政府權威危機和地方主義等問題。

在一體化組織方式中，只能用意識形態教育和控制來對付腐敗，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的擴張使得共產黨失去了以前有效對付經濟犯罪和腐敗的武器。商品經濟愈是發展，貪污腐敗愈是難以控制。於是，我們看到在改革開放中幹部迅速腐敗，雙軌制經濟中以權謀私貪污成風。早在1982年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出〈關於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全國立案審查的經濟犯罪共有164,000多件，依法判刑的近3萬人，追繳贓款贓物32,000多萬元^④。

另一個趨勢是共產黨統治權威的削弱。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意識到否定文革和對外開放會導致自由化的泛濫，因而提出「四個堅持」，即在推行經濟現代化的同時盡量維護意識形態認同。但是對外開放和經濟改革對意識形態統治權威的衝擊不是「四個堅持」所能阻擋的，意識形態的統治權威在日益浩大的思想解放思潮中受到普遍懷疑。無論是1983年10月的清除精神污染還是1986年鄧小平再次提出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都未能阻止知識分子要求擴大政治參與、反對僵化意識形態的潮流。終於在1986年12月爆發的第一次學生上街遊行要求民主自由的運動，導致黨的總書記胡耀邦下台。1989年再次掀起要求「民主」和「反官倒」的盛大遊行示威，中國出現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地方主義愈演愈烈，1989年後，地方分權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潮流。

^④ 馬齊彬、陳文斌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 頁490。

經濟現代化對一體化結構消解的典型例子是農村基層組織之變遷。1979年1月安徽省鳳陽縣梨園公社十八個農民首先搞起了責任承包制。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擴大，分田到戶、單幹亦日益普遍，我們立即看到中國農村基層組織的紊亂。原來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小隊是政府機構向農村的延伸，搞了責任制後，農民又以一家一戶方式生產，原有的生產與行政合一組織再也不適用了。自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力圖實現黨政分家，重建基層組織，到1985年，全國56,000多個人民公社變成了92,000個鄉鎮政府，在生產大隊的基礎上則建立了82萬個村民委員會。但新建的基層組織軟弱無力，有的形同虛設。198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關於加強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工作的通知〉承認，很多鄉政府還沒有起到一級政權的作用^⑤。農村中共產黨國家勢力衰退，家族組織重新興起，處於一種變構中的混亂狀態。

農村基層組織之解體意味着對農民控制之放鬆，中國農村中本來就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控制鬆動立即導致大量剩餘勞動力流入城市，他們或作為盲流到城市工作，或成為新興鄉鎮企業的後備軍。自八十年代初，中國再次掀起和近代史上紳士城市化類似的農村人口、資金流向城市之大潮。所不同的是，上一次進城搞現代化的是地主紳士，這一次利用農村剩餘勞力和資金搞現代化的卻是鄉鎮企業。據統計，1980年大陸市鎮人口佔總人口的19.39%，到1988年上升為49.78%，平均每年增長13.9%^⑥。1981年社隊企業的總收入只有670.36億元，僅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0.8%^⑦。到1990

⑤ 馬齊彬、陳文斌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頁534，546。

⑥ 王嗣均：〈80年代中國人口城鎮化概觀〉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編：《中國人口年鑑(1990年)》頁121（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1）。

⑦ 馬齊彬、陳文斌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頁494。

年，鄉鎮企業的產值已佔國家工業總產值的一半左右，它們成為中國現代經濟結構中最活躍的部分——開拓國內外市場，擠垮國營企業，取代沒有活力的計劃經濟。鄉鎮企業依靠自己的經濟實力重建鄉村自治，甚至給經濟日益窘迫的縣幹部發工資、獎金，把國家基層幹部作為自己的代言人，它正在對地方官僚機構造成巨大的衝擊。至今為止，它所造成廣泛的社會影響仍不可估計，但有一點卻十分清楚，正如歷史上紳士城市化造成傳統一體化解構一樣，新一體化結構龐大的官僚控制之巨壩已經千瘡百孔，它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正在解體。在某種意義上講中國今天正在重蹈1905年前後清廷新政的覆轍：如果不引進新的整合機制，全面推動現代化的過程終將破壞社會原有的整合。

註三 或許有人會提出台灣經濟起飛的經驗作為一體化結構與經濟現代化衝突的反例。必須指出的是，我們在此講的國民黨一體化整合模式，是指三十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建立的社會結構。很多人把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國社會結構和1949年後國民黨在台灣建立的政治文化結構等同起來，實際上兩者是有很大差別的，南京國民政府的一體化控制網不能達到社會基層，我們在第七章曾論述過它和經濟現代化目標之間的矛盾。一方面它不能有效利用農業積累促進工業增長，另一方面國家對經濟之干預導致國家資本主義興起，自由資本主義衰落。如果以1928年註冊的民間資本為100，到1930年它已降到38.1，1932年只有12.4^⑧。國家資本主義和一體化結構結合，使腐敗和官僚資本主義愈演愈烈，它不利於經濟進一步發展。而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後，組織結構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首先它將

⑧ 汪敬虞著：《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國民族工業》，轉引自中國人民大學編：《中國近代經濟史》下冊 頁35（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原先統治全國的黨政機構集中到只佔全國總面積0.37%的一省，將政府控制網達到基層社會，並成功地實行了土地改革，地主將土地讓出來，從政府債券中獲得補償，並把這部分金錢投資於工業，也就是說實現了將農業積累轉化為工業投資的機制^⑨。因此，台灣經驗只是證明，弱一體化整合對經濟現代化阻礙也較少，但一般弱一體化結構不能實現社會整合，而1949年後國民黨政府只是一個特殊條件下的例子，這樣，台灣經驗在此不對我們的觀點構成矛盾。而且，即使在今天台灣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我們仍看到弱一體化組織方式和政治現代化進一步發展之緊張。

註四 我們認為，每一格中社會結構三個子系統狀態均可從理論上推出，這是因為社會結構三個子系統處於互相調節的耦合狀態，當一體化調節力變化時，相應的經濟結構形態是不同的。例如第三格坐標為 X_3Y_1 ， X_3 表示一體化控制力強， Y_1 則意味着經濟系統中不具備現代成分的狀態。它代表中國封建社會開放前標準的結構，意識形態是儒家正統，政治結構為大一統帝國，農業經濟在一體化調節下呈地主經濟。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典型狀態，代表着1840年前的社會結構。

第四格的坐標為 X_3Y_2 。 X_3 意味着傳統一體化結構未破壞， Y_2 表示現代經濟因素已出現，但不高，它呈甚麼形態，取決於一體化調節能力。在一體化結構干預控制能力很強的條件下，現代企業只能是國家官辦的。因此第四格的經濟結構為地主經濟加上少量國家官辦現代企業。這一格對應着1860年代以後的洋務運動時期。

⑨ Ambrose Y.C. King: "A Non-Paradigmatic Search for Democracy in a Post-Confucian Culture, The Case of Taiwan, R.O.C.",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ynne Rienka Publishers, Inc.).

第五格的坐標是 X_2 和 Y_2 。它表示一體化調節力減弱與現代經濟成分興起共存。由於一體化控制力較弱，經濟結構中現代經濟成分受國家官僚控制的鉗制也就相應減少，現代經濟組織方式處於一體化控制下的官辦和沒有一體化控制時的民辦之間，這就是所謂官督商辦，國家資本與民間資本並存。而地主經濟也因一體化調節力衰落而變化，但現代經濟成分的湧現則意味着農業經濟與世界開放性市場連接，其後果是地主經濟中開始出現經營地主—富農等成分。這一格大致對應着甲午以後十幾年的社會狀態。

第六格一體化調節力消失。它意味着儒家意識形態解構，大一統王權瓦解，國家呈分裂割據局面。經濟結構中的現代成分完全擺脫國家官僚控制，呈自由資本主義形態。農業經濟中經營地主和富農大發展，相當多自耕農佃農成為半無產階級化的傭工（身兼小農和農業工人雙重身分）。顯然，這就是辛亥革命後中國的社會結構。

第七格的政治結構基本上和第六格類似，不同的只是 Y 值比中間三格大，這意味着現代經濟水平比中間三格提高一個數量。它代表了在一體化控制消失條件下，經濟結構中自由資本主義大增長。

第八格為在現代經濟成分較高條件下，一體化調節力開始恢復，這時出現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除了比第五格發達外，其組織形態類似於國家官僚資本與民間資本並存，我們可稱之官僚資本主義。

第九格表示一體化調節能力進一步增長，它只有等某一種強勢意識形態佔主導地位後才有可能。這時，國家資本壓倒私人資本，農業也在一體化強控制之下。經濟結構再次轉化為強一體化控制下的形態，如計劃經濟和合作化的農業。

註五 社會結構變遷是由外部衝擊和內部三個子系統內容所決定，因此，社會結構變遷的方向完全由上一格決定的具體含義是：我們

可以根據某一格社會結構的X值和Y值以及外來衝擊而判斷它下一步是Y變化還是X變化。我們來看具體例子：

1840年，中國剛對外開放時，社會結構處於第三格，它的坐標為 X_3Y_1 。由於對外開放，一體化結構必須學習西方科技與國防以對抗外來衝擊，它導致Y值的變化，這就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經濟結構中現代成分出現，Y由 Y_1 上升為 Y_2 ，它把中國社會結構推向第四格，其坐標為 X_3Y_2 。 X_3 意味着一體化對經濟干預力增強，中國在這一方格中停留了近三十年。正如第二章所講的，1860-1890這三十年間，各式新式企業投資中，官辦國家資本達一億元，外資僅2,791萬元，民間資本更少，只有600萬元，官辦企業佔絕對優勢。它表明在第四格中，其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與第三格沒有本質不同，只是一體化結構控制力加強；現代經濟被完全納入到一體化組織形態之中。

洋務運動雖增長了經濟結構中現代化成分，但卻不能達到防衛現代化的目標，社會結構不可能向Y值迅速增加方向演化，這時，下一步變遷只能主要是X值變化。1895年甲午戰爭宣告中國的洋務運動失敗，它導致儒家意識形態出現認同危機，一體化調節力減弱，由 X_3 減為 X_2 ，社會結構進入第五格(X_2Y_2)之中。從1895到1911年，中國社會基本上都處於這一格子所限定的形態之中。中國近代史上的官督商辦企業雖在洋務時期就已出現，但真正興旺發達卻是1895年以後到1911年這十五年。當時，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導致中國出現紳士城市化潮流，大量縉紳把自己來自於土地和經商的收入投資興辦現代化企業。一時社會現代經濟成分中，官督商辦和有功名的紳商私人辦的企業佔了主導地位。隨着紳士城市化，地主經濟中興起經營地主—富農經濟新成分。經濟結構呈地主經濟和官僚(縉紳)資本主義形態。在政治結構方面，由於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引發意識形態變遷與政治改革互動，其後果只能是X值進一步變

小。當時社會改革思潮激盪，政治危機多次湧現。中國經歷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和1906年的預備立憲，終於在意識形態危機與政治結構互動中，爆發辛亥革命。一體化結構上層組織——以王權為中心的大一統官僚機構解體，一體化調節力由 X_2 減少至 X_1 ，社會狀態進入第六格即 X_1Y_2 狀態。

在第六格(X_1Y_2)與第七格(X_1Y_3)之間不易找到如同前面那樣以X狀態變化的重大事件作為分界線，但大致說來，第六格代表從1911到1929這18年的前半段，第七格代表後半段。在第六格中，由於一體化上層組織解構，城市化紳士成為政治舞台的主角。社會組織者的一部分想引進西方民主制，但民主憲政和一體化結構尚未解構的部分(中、下層組織)嚴重不適應，中國第一次多黨制與民主嘗試不可能成功。社會組織者中保守部分想恢復帝制，但在意識形態出現認同危機條件下，一體化上層組織無法重建，袁世凱稱帝失敗。解構了的一體化組織轉化為軍紳政權，中國出現軍閥割據。由於紳士代替王權和官僚成為政治舞台之主角，他們無可逃避地必須為日益嚴重的社會整合危機負責，社會批判意識開始觸及紳權的意識形態基礎——儒家倫理。拋棄舊意識形態的新文化運動已在孕育中了。在這一階段，X值已降至最小，不能再變化，而Y值因解除一體化控制出現較大變化。也就是說，在經濟方面，由於一體化結構對現代經濟成分的限制和調節消失，自由資本主義開始無束縛地成長。自1912至1919年的八年中，新增資本達1.4億元^⑩，它比1870至1911這四十年中民族資本總額1.3億元還要多。也就是說1919年後， Y_2 增加到 Y_3 ，社會由第六格進入第七格狀態。

第七格的經濟結構是瓦解中的傳統地主經濟與依附型資本主義

^⑩ 張仲禮：〈關於中國民族資本在二十年代的發展問題〉《社會科學》第10期（上海：1983）。

相結合的混合形態。由於不存在一體化調節，農村中傳統的縉紳地主和租佃地主勢力減弱，利用農村中僱傭勞動力專門從事商品糧生產的經營地主和富農普遍興起，並在農業經濟中佔不可缺少的地位。農業生產的商品糧比率也由傳統地主經濟的10%提高到22%。同樣的農業可以養活更多的城市人口。與此同時，中國大城市在一體化解構中也擺脫了傳統郡縣城市模式，主要通商口岸城市人口以3.5-9.8%的年增長率成長。這種經濟結構不可避免引起新興通商口岸城市和廣大鄉村日益嚴重的對立。紳士城市化和新興知識分子的興起，意味着中國傳統社會組織者(士大夫)從鄉村向城市的轉移。事實上，傳統社會組織者離開農村在第五格時已經開始，到了第七格階段，這一轉移過程差不多已經完成，其結果是傳統鄉村基層組織普遍瓦解。加上政治上軍閥混戰，軍紳政權搜括無度，農民所受的壓迫迅速加重。因此到第七格階段後期，整個農村社會已孕育着類似農民大起義那樣的社會動盪。城市雖然繁榮，但由於一體化調節力之喪失，中國對外來文明衝擊的抵抗力降到最低點。關稅不能自主，西方列強和日本資本大肆進入，城市人民反帝情緒日益高漲。在意識形態方面，新知識分子從批判儒家倫理開始引發了新文化運動，中國實現了意識形態更替。兩種新意識形態——馬列主義和三民主義代替儒家成為新的天道，征服了大多數新知識分子。於是在第七格的後期，新意識形態迅速傳播，通過列寧主義式政黨和政治結構耦合，並在人民反帝反軍紳政權的推動下，新意識形態再次和政治一體化，實現社會整合。中國出現了新一體化結構， X_1 變為 X_2 ，社會進入第八格即 X_2Y_3 狀態。

第八格從1929年國民黨通過北伐削平軍紳政權重新統一中國開始算起，到1949年國民黨退出大陸結束，歷時二十年。國民黨雖然率先實現社會整合，但同馬列主義相比，三民主義是弱勢意識形態。信仰三民主義的大多是資本家、地主、城市知識分子及他們的

子弟，也就是說國民黨只能利用主要居住在城市的階級成分組成意識形態政黨。它無力把自己的黨組織深入到農村，因此國民黨整合模式中一體化調節力不高，只能停留在 X_2 狀態。由於一體化控制力不強，中國只在名義上實現了統一，使國民政府統治鞏固的地區只限於通商口岸和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政治上不能做到鐵板一塊，共產黨和軍閥勢力仍在邊遠地區存在着。然而，即使如此，一體化調節還是立即對經濟結構發生影響，中國自由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過去了，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迅速增長。新興經濟成分日益納入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軌道。根據三民主義意識形態，新一體化結構應該對地主經濟進行干預，實行耕者有其田。但是由於國民黨不能深入鄉村，根本無力實現土地改革，因此只能讓農業經濟結構停留在第七格自然形成的結構之中，它是一個日趨瓦解的地主經濟，土地兼併日趨嚴重，貧農在農村中佔據愈來愈大的比重，相當多的自耕農在人口壓力和土地兼併壓力下轉化為出賣勞動力的半無產者。正是在這一階段，中國遇到了近現代史上最嚴重的外國入侵，新建立的一體化結構不得不肩負起抵抗外來入侵的重擔。1937年爆發了全面抗日戰爭，它嚴重地削弱了國民黨建立的新一體化結構。因為國民黨黨員基本分佈於城市，經濟和政治統治基礎也是建立在沿海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和通商口岸，而在抗戰開始後的幾個月，敵強我弱的局面決定了國民黨喪失其立足之地，不得不退到大西南，依靠廣大農村和日本侵略者展開持久戰。國民黨不具備深入農村進行動員的組織力，但抗戰又迫使其對農村擴大動員，只能依靠農村的惡霸地主、保甲長、地痞流氓作為基層力量。本來已經奄奄一息的農村在戰爭動員與惡霸地主壓力下土崩瓦解，廣大農民到了走投無路被迫造反的邊緣。殘存的城市也在戰爭負擔下不斷萎縮。通貨膨脹消滅了中產階級，民間企業紛紛破產，而且國民黨官僚機構在抗戰中腐敗不堪。

那些促使國民黨整合模式衰落的所有因素都反過來有利於共產黨的壯大。馬列主義本是比三民主義動員力更強大的意識形態，它在農村崩潰條件下，迅速和農民革命結合。在吸收了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與農民文化結合的過程中，馬列主義轉變為毛澤東思想，它特別容易被農村中本已大量存在的身兼半無產者和傳統小農雙重角色的貧農接受，於是共產黨在農村建立了新一體化結構。由於廣大貧農中存在着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建黨必須的幹部來源，所以共產黨建立的新一體化結構具有龐大的幹部隊伍，可以深入到每一個自然村，對廣大農村的人力和物力進行集中動員。終於共產黨用組織得井然有序的農村戰勝了不斷衰敗的城市，取代了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中國社會結構主導形態由第八格進入第九格。

1949年到1957年，中國大陸社會結構處於第九格(X_3Y_3)。由於新一體化結構有着巨大的調節力，中國共產黨就如一個新王朝建立，真正達到了傳統一體化解構以來未曾達到過的政治統一。國家既然具備了集中廣大農村社會人力物力的動員能力，它就有可能真正抵禦外來文明的衝擊和入侵。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第一次挫折西方最強大的國家——美國。中國大陸形成了以中央直統到基層的巨大官僚機構。一個根據意識形態為藍圖，由官僚機構實施的對經濟和社會之改造開始了。首先根據反封建的目標，消滅地主，農業經濟變成一種沒有地主—富農的純自耕農結構。這種結構和傳統地主—自耕農經濟最大的不同是，它不具備向現代城市提供大量商品糧的能力。為了解決商品糧危機，國家不得不用一體化管理力量建立一種迫使自耕農賣糧，由國家供給城市商品糧的制度：這就是所謂實行糧、油、棉的統購統銷。市場機制在統購統銷制度下破壞了。工業經濟中民族工業急驟萎縮，國家資本主義轉化為和強大一體化調節相適應的計劃經濟。自耕農經濟在統購統銷條件下也是不穩定的，它迅速向由廣大農村基層幹部控制下的集體所有制農業轉

化。這裏我們看到，隨着新一體化結構調節力的增大，它對經濟干預必然增強，經濟結構只有演化到和一體化調節力相適應的形態，社會結構三個子系統的耦合才是穩定的。在傳統一體化結構中，官僚機構只到縣一級，縣以下一體化組織是由鄉紳自治和宗法家族組成的民間社會。與這種一體化結構相適應的工業只是私營手工業、商業，農業是地主—自耕農經濟。當國家官僚機構代替傳統一體化結構縣以下組織時，農業經濟形態也就出現了向幹部支配下的集體所有制的轉化，而工業經濟中官營則擴充到一切行業，計劃經濟和農業集體化是隨着國家官僚網控制擴大而出現的。只要分析每一格社會結構三個子系統的狀態，我們就能判斷它有可能轉向哪一格。這六個階段前一個社會結構狀態內在地規定了下一個階段的特點，中國社會在每一格停留幾十年到十幾年後轉入下一格。

註六 從1949年到1968年，中國經濟成長如表10.1所示，它顯示了Y值的增長情況。

註七 有關這方面的詳細論述可見《興盛與危機》一書的第七章，我們認為秦漢帝國和隋唐帝國的結構基本相同，是第三格的形態。第一格則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超穩定系統的亞穩定結構，其意識形態子系統中佛教和玄學佔主導地位，政治上大一統分裂，經濟結構則是一種類似於歐洲和日本的領主經濟。第二格則是過渡狀態。它分別相當於東晉後期和南北朝後期的社會結構。

註八 主張唯物史觀的哲學家經常喜歡用恩格斯的「合力」比喻來描繪歷史進程，即當不同階級(人群)有着不同方向的追求目標時，歷史前進實際方向是沿不同推動力的「合力」方向前進的。在唯物史觀中「合力」從未有過嚴格明確的定義，而在我們的大歷史觀模型中，

時 間	國民總產值(億元)	時 間	國民總產值(億元)
1949	466	1959	1,959
1950	575	1960	2,094
1951	684	1961	1,424.3
1952	810	1962	1,280.2
1953	960	1963	1,402
1954	1,035.4	1964	1,648
1955	1,103.7	1965	1,983.9
1956	1,286	1966	2,534
1957	1,388	1967	2,104.5
1958	1,640	1968	2,015.3

據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提供數據製表（北京：中共黨史資料，1989）。

表10.1 中國經濟的成長(1949-1968)

幾種長期變遷的趨勢確可以綜合起來，以合成一種更為複雜的趨勢。現代經濟成分之增長和一體化結構周期性變遷之結合就是一個例子。我們認為，歷史演變之幾種長期趨勢之綜合，是通過社會結構三個子系統之間的互動實現的。[註五]就是對社會結構三個子系統互動如何與外來衝擊長期影響的綜合之描述。

附錄一 圖表目錄

圖1.1	中國傳統社會組織的三個層次	31
圖1.2	中國傳統社會結構	35
圖1.3	1860至1940年國內市場的變化	44
圖1.4	家族組織與社會結構的同構	54
圖1.5a	中國城鎮市集等級分佈理想模型	62
圖1.5b	城鎮等級模型舉例之一：1893年長江上游區域	63
圖1.5c	城鎮等級模型舉例之二：1893年長江上游區域 的一小塊	64
圖1.5d	城鎮等級模型舉例之三：1893年長江上游區域 更小的一小塊	65
圖1.6	中國傳統社會城鄉等級和一體化結構三層次 的對應關係	66
圖2.1	十九世紀中國政治腐敗情況變化曲線	77
圖2.2	洋務運動展開方式和一體化結構三層次的關係	81
圖2.3	傳統一體化結構三層次的意識形態基礎	92
圖2.4	清末學會數目的變化曲線	96
圖3.1	晚清革命社團(1894-1911)	122
圖3.2	清末城市新學堂的數量增長	128
圖3.3	清末城市新知識分子數量增長	129
圖3.4	明清兩代上海縣市鎮增長	137
圖3.5	明清時代江南市鎮數量變動	138
圖3.6	武昌文學堂之創設及演變	148
圖3.7	社會整合的斷裂	154
圖4.1	中國近代物價增長曲線圖(以四川為例)	208

圖5.1	晚清白話文報刊數量之增長	246
圖5.2	儒家意識形態及其深層結構	265
圖5.3	二十世紀初社會思潮變遷	266
圖6.1	中國工運趨勢(1918-1937)	286
圖7.1	國民黨新一體化結構與傳統結構比較	320
圖7.2	南京國民政府的稅收來源	323
圖7.3	廣西省「政一團一教」關係圖(1936年前後)	350
圖7.4	軍閥爭天下所圍繞的A字形地區	351
圖7.5	廣東省財政收入的變化(1911-1926)	353
圖8.1	貧農經濟的形成	369
圖8.2	中國傳統社會農業勞動力投入及產出	390
圖8.3	清以後中國人口爆炸原因	392
圖8.4	手工作坊為何不能同農村家庭手工業競爭	397
圖9.1	官僚機構的大擴張	412
圖9.2	合作化的發展速度(1953-1957)	428
圖9.3	傳統社會決定非農業人口的機制	437
圖10.1	經濟現代化與社會整合不互相矛盾	466
圖10.2	經濟現代化與社會整合互相排斥	467
圖10.3	超穩定系統應付外來衝擊的模型	469
表1.1	幾個主要朝代官僚數量	48
表1.2	湖南省知縣治績	52
表1.3	紳士的各項社會活動參與	53
表1.4	紳士各類收入來源歲收入總額估計	60
表1.5	各級中心在行政等級和經濟等級中的分佈(1893年) ...	65
表1.6	中國歷代城市人口	67

表2.1	江蘇、浙江、安徽、江西1850年與1953年人口數	75
表2.2	滿漢官員比例變化(1840-1866)	78
表2.3	洋務企業的種類及資本	105
表2.4	七個最大洋務企業的經費來源	107
表2.5	甲午戰爭之前各省及各關派定解款額	108
表2.6	甲午戰爭以後各省及各關派定解款額	109
表3.1	1796-1911年中國社會騷亂程度	131
表3.2	1796-1911年紳士及滿人對社會秩序的非官式貢獻	132
表3.3	中國近現代糧食商品率(1840-1936)	134
表3.4	1895-1913年近現代企業的構成	135
表3.5	十九世紀上海縣人口變動	136
表3.6	十五省諮議局議員的功名背景	142
表3.7	新式教育結構的改變(1904-1909)	149
表3.8	1907-1933年小學生人數	156
表3.9	十個行業創辦人的出身(1872-1913)	158
表3.10	民初商人之父輩職業統計	159
表3.11	民初著名商人之初職	159
表3.12	民初著名商人之教育程度	160
表3.13	漢口市1772-1917年的人口增長	162
表4.1	內戰與自然災害互相激盪指數(1917-1928)	185
表4.2	第一屆國會議員的構成	191
表4.3	1915-1921年公佈的法令、條例數目	196
表4.4	1918-1923年中國鹽稅餘額及截留數	199
表4.5	民初軍閥的意識形態類型	202
表4.6	部分軍閥佔有土地資財	205
表4.7	四川山麓地帶地主分佈情形	206
表4.8	昆山等地地租增長指數(1905-1924)	206

表4.9	1927年的中國農村階級結構及土地佔有狀況	207
表5.1	1912-1916年全國各類學校統計	219
表5.2	民初知識分子的年齡結構	224
表5.3	《新青年》作者群接受西學的情況	243-244
表6.1	農民協會會員統計(1926年6月與1927年6月)	288
表6.2	國共兩黨意識形態組織力的差別	308
表7.1	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相異之處	313
表7.2	抗戰前國民黨人數	319
表7.3	抗戰期間的通貨膨脹	334
表7.4	一體化結構和現代科層組織官僚形態比較	346-347
表7.5	1925-1926年度廣州國民政府的收入	354
表7.6	1939-1942年國民黨統治區重要工礦產品產量	356
表8.1	三十年代僱農所佔的比例	367
表8.2	共產黨組織的增長	380
表8.3	順、康、雍、乾四朝人口統計	394
表8.4	人均耕地面積的下降(1400-1930)	395
表8.5	人均耕地面積(公元2-1887)	396
表8.6	近代河南耕地面積與平均每人耕地面積估計 (1873-1935)	396
表8.7	太和堂(經營地主)與當地一般農戶單位面積 產量比較(1904)	400
表8.8	1821-1911年的糧食收成	405
表9.1	1949-1952年的農業總產值	416
表9.2	1952年農產品的產量	416
表9.3	太和堂全年糧食收入和分配	420
表9.4	1840-1978年中國糧食的商品率	423
表9.5	五十年代初市場的萎縮	431

表9.6	安徽等七省十七處各種農產品的出售率 (1921-1925)	439
表9.7	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的發展(1950-1955)	454
表9.8	農業生產合作社數量變化(1950-1955)	454
表9.9	國家加工、訂貨、包銷、收購的產品佔私營工業 總產值的比重(1949-1955)	456
表9.10	私營工業總產值佔全部工業總產值的百分比 (1949-1955)	459
表9.11	公私合營企業之增長(1949-1955)	459
表10.1	中國經濟的成長(1949-1968)	490



附錄二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一 論文、著作

丁日初：〈關於「官僚資本」與「官僚資產階級」問題〉 張憲文、陳興唐、鄭會欣編：《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

千家駒：〈批判梁漱溟堅持中國落後反對工業化的謬論〉《人民日報》1955年8月10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1988）。

中共中央華北局農村工作部：〈積極穩步地推廣結合合同是促進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有力措施之一〉《人民日報》1954年6月28日。

中共湖南省委農村工作部工作組：〈新化縣燎原農業生產合作社事務管理情況的調查研究〉《人民日報》1956年5月28日。

中國人民大學編：《中國近代經濟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中國農民負擔史》編輯委員會編著：《中國農民負擔史》第一卷（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

- 方天白：〈農村市場的變化〉《人民日報》1955年2月8日。
-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片山崗：〈明清時代的王朝統治與民間社會——關於兩者接點的戶之問題〉《廣州研究》第6期（廣州：1986）。
- 王 笛：〈清末近代學堂和學生數量〉《史學月刊》第2期（開封：1986）。
- 王 笛：〈清末新政與近代學堂的興起〉《近代史研究》第3期（北京：1987）。
- 王 笛：〈清代重慶城市人口與社會組織〉 隗瀛濤主編：《重慶城市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
- 王 躍：〈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社會意識形態的趨勢〉《近代史研究》第3期（北京：1987）。
- 王正華：《國民政府之建立與初期成就》（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
- 王功安、毛 磊：《國共兩黨關係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88）。
- 王任重：〈湖北省三個縣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調查〉《人民日報》1955年10月14日。
- 王全營等：《中國現代農民運動史》（鄭州：中原農民出版社，1989）。
- 王宏志：〈農民戰爭和封建主義〉《中國農民戰爭史論集》第3輯（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 王來棣：〈關於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幾個問題〉《浙江學刊》第3期（杭州：1981）。
- 王家儉：〈清末民初我國警察制度現代化的歷程（1901-1916）〉《國

- 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0期（台北：1982）。
- 王家儉：《清末民初我國警察現代化的歷程》（台北：商務印務館，1984）。
- 王國藩：〈繼續堅持勤儉辦社〉《人民日報》1956年4月6日。
- 王惠平：〈一個損公利私的「公私合營」企業〉《人民日報》1955年10月28日。
- 王嗣均：〈80年代中國人口城鎮化概觀〉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編：《中國人口年鑑（1990年）》（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1）。
- 王業鍵：〈近代中國農業的成長及其危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台北：1978）。
- 王業鍵：〈戰後研究明清時代人口與耕地之檢討〉[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台北：1989）。
- 王爾敏：〈清季學會匯表〉《大陸雜誌》24卷2期，26卷3期（台北：1962）。
-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台北：華世出版社，1976）。
- 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
- 王爾敏：〈官督商辦觀念之形成及其意義〉《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9編（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
- 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 王樹槐：〈清末江蘇地方自治風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期（台北：1977）。
- 王樹槐：〈清末民初江蘇省諮議局與省議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6期（台北：1978）。
- 王樹槐：〈清末民初江蘇省的財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期（台北：1982）。
- 艾森斯塔德：《現代化：抗拒與變遷》張旅平等譯（北京：中國

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卡爾·雅斯貝斯(Karl Jaspers):《歷史的起源與目標》 魏楚雄等譯
(北京: 華夏出版社, 1989)。

史全生主編:《中華民國經濟史》(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9)。

史全生主編:《中華民國文化史》(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左舜生:《中國現代名人軼事》(香港: 自由出版社, 1951)。

甘 陽:〈自由的理念:「五四」傳統之闕失面〉 林毓生等:《五四:
多元的反思》(香港: 三聯書店, 1989)。

石 錦:〈清末自強觀的內容、分野及其演變(1840-1895)〉《近代
中國——知識分子與自強運動》(台北: 食貨出版社,
1972)。

仲九:〈學生運動的過去和將來〉《星期評論》46號 (1920年4月
18日)。

全漢昇:〈甲午戰爭以前的中國工業化運動〉《中國近代現代史論
集》第9編 (台北: 商務印書館, 1985)。

吉爾伯特·羅茲曼(Gilbert Rozman)主編:《中國的現代化》 國家社
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 (南京: 江蘇人民出
版社, 1988)。

朱 英:〈清末商會「官督商辦」的性質與特點〉《歷史研究》第6
期 (北京: 1987)。

朱玉湘:〈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的田賦徵買與糧食徵購〉《山
東大學學報》第1期 (濟南: 1963)。

朱建華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
社, 1989)。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五) (北京: 中華書局, 1958)。

- 朱滋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民報」個案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50（台北：1985）。
- 朱滋源：〈1930年代廣西的動員與重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 下（台北：1988）。
- 江亢虎：《江亢虎演講錄》。
- 米慶余：《明治維新——日本資本主義的起步與形成》（北京：求實出版社，1988）。
- 西北區供銷合作社辦事處：〈陝西農村需求變化情況調查〉《人民日報》1955年2月28日。
- 何均：〈論全業合營——從上海私營工業的七個行業的情況看實行全業合營的作用〉《學習》3月號（北京：1956）。
- 何均：〈舊中國農村中的幾種經濟關係〉《近代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3）。
- 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余英時：〈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0）。
- 余英時：〈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二十一世紀》總第2期（香港：1990）。
- 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總第6期（香港：1991）。
- 吳虞：〈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新青年》第2卷第6號（1917年）。
-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述略〉《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
- 吳承明：〈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內市場〉《歷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4）。

-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57（台北：1989）。
- 呂實強：〈晚清時期基督教在四川省的傳教活動及川人的反應，1860-1911〉《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4期（台北：1976）。
- 呂實強：〈近代四川的農民生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台北：1978）。
- 宋光燁：〈怎樣改進蔬菜供應工作〉《人民日報》1956年7月30日。
- 李 林：〈從周學熙集團看官僚資本的轉化〉《二十一世紀》總第3期（香港：1991）。
- 李 侃、龔書鐸：〈戊戌變法時期對〈校邠廬抗議〉的一次評論〉《文物》226號（北京：1978）。
- 李 新：〈論抗日戰爭〉《中國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
- 李 鐸、林啟彥：〈辛亥革命時期的共和憲法〉《近代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2）。
- 李大釗：〈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新潮》2卷2號（1919年12月）。
- 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上、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2輯（北京：三聯書店，1957）。
- 李吉平：〈健全財務管理制度，實現勤儉辦社〉《人民日報》1956年4月15日。
- 李良玉：《動盪時代的知識分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 李炳南：《辛亥革命起因之分析》（碩士論文，台北：正中書局，1987）。

- 李恩涵：〈清季同光自強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比較〉《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自強運動》（台北：食貨出版社，1972）。
- 李健民：〈五卅慘案後的反英宣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期（台北：1981）。
- 李國祁、周天生：〈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嬗遞現象之量化分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2期（台北：1974）。
- 李國祁：〈清末民初閩浙地區人口流動與都市化的演進(1866-1916)〉《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5期（台北：1977）。
- 李國祁：〈中國近代民族思想〉李國祁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
- 李國祁：〈由上海、漢口與青島三都市的形成與發展論近代我國通商口岸的都市化作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0期（台北：1982）。
- 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台地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44（台北：1982）。
- 李國祁：〈清季的栽培經濟作物與改善農村經濟減輕人口壓力〉《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2期（台北：1984）。
- 李國祁：〈宋子文對廣東財政的革新(1924-1926)〉《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 李喜所：〈武昌起義後的農村變動〉《歷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2）。
- 李雲漢：〈中華革命黨的組黨過程及其組織精神〉《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冊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 李劍農：《戊戌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北京：中華書局，1965）。
-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74）。
- 李歐梵：〈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 周策縱等：《五四與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
-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走向未來》第1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 杜恂誠：〈從1883年上海金融風潮看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歷史研究》第6期（北京：1987）。
- 沈松僑：〈從自治到保甲：近代河南地方基層政治的演變，1908—193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8期（台北：1989）。
- 汪 熙：〈關於買辦和買辦制度〉《近代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0）。
- 汪叔潛：〈新舊問題〉《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
- 汪海波：〈略論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資本積累和消費在量的方面的若干特徵〉《江西社會科學》第4期（南昌：1983）。
- 汪朝光：〈論民初裁兵問題及其與資產階級的關係〉《近代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6）。
- 汪榮祖：〈論戊戌變法失敗的思想因素〉《近代史研究》第3期（北京：1982）。
- 汪榮祖：〈晚清變法思想析論〉《晚清變法思想論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 汪澍白：《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基因》（香港：商務印書館，1990）。
-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周策縱：〈五四運動的背景和歷史意義〉 鍾玲譯 周策縱等：《五

- 四與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
- 周策縱：〈新文化運動的擴展〉 周策縱等：《五四與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
- 周策縱：〈以五四超越五四〉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第12期（台北：1991）。
- 周善培：《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重慶：重慶人民出版社，1957）。
-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 楊慎之譯（北京：中華書局，1980）。
- 帕克斯.M.小科布爾(Parks M. Coble, JR.)：《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 蔡靜儀譯（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
- 易勞逸(Lloyd E. Eastman)：《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 陳謙平、陳紅民等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
- 林代昭主編：《中國近現代人事制度》（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89）。
- 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增訂再版本） 穆善培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
- 林增平：〈論民族資產階級上層與清末立憲派〉 《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 林德金：〈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經濟危機的特點及其根源〉 《湘潭大學學報》 第2期（湘潭：1985）。
- 肯尼思·J·奧林尼克(Olenik John Kenneth)：〈鄧演達與國民黨理論體系中的民眾革命思想〉 《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 第16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 金明橋：〈農業社幹部的補貼怎樣計算才合理〉 《人民日報》 1956

年8月15日。

- 金耀基：〈中共「反科層的組織型模」：歷史的與比較的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2卷 第1期（香港：1977）。
-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7）。
- 金耀基：《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8）。
- 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增訂本）（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
- 金觀濤：〈儒家文化的深層結構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影響〉《新啟蒙》2（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 金觀濤：〈中國文化的理性精神及其缺陷〉劉青峰編：《歷史的反響》（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0）。
- 金觀濤：〈中國文化的烏托邦精神〉《二十一世紀》總第2期（香港：1990）。
- 金觀濤：〈百年來中國民族主義結構的演變〉《二十一世紀》總第15期（香港：1993）。
- 姜鐸：〈略論抗戰時期國民黨經濟的作用〉《江海學刊》第1期（南京：1988）。
- 施拉姆(Stuart Schram)：〈毛澤東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和這個世界》（廣州：花城出版社，1989）。
- 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中國城市與地方系統的等級〉余羣青等譯《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第1輯（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 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北京：中華書局，1987）。
- 段雲章等：《陳炯明的一生》（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 段雲章、邱捷：《孫中山與中國近代軍閥》（成都：四川人民出

- 版社，1990)。
- 胡 華、林代昭：〈台港和國外中共黨史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第1期（北京：1982）。
- 胡 適：《胡適文存》（台北：遠東圖書，1953）。
- 胡 適：《胡適作品集》第1集（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
- 胡春惠：〈辛亥革命與地方勢力〉《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下冊（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81）。
-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台北：正中書局，1983）。
- 胡偉希、高瑞泉、張利民：《十字街頭與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胡漢民：〈孟子與社會主義〉《建設》第1卷第1期（1919年8月10日）。
- 胡漢民：《胡漢民先生文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
- 胡德坤：《中日戰爭史(1931-1945)》（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
- 茅海建：〈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軍與英法軍兵力考〉《近代史研究》第1期（北京：1985）。
- 若愚：〈與左舜生書〉《少年中國》1卷2期（1919）。
- 章政通：《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 唐文權：〈蘇州工商各業公所的興廢〉《歷史研究》第3期（北京：1986）。
- 唐蘇妍：〈1920至1926年湖南農業經濟狀況與農民運動的興起〉《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4期（長沙：1986）。
- 孫中山：《國父全集》第1、2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3）。

- 孫文學主編：《中國近代財政史》（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0）。
- 孫德中：〈五四與新文化運動〉《文星》第10卷1期（台北：1962）。
- 徐宗勉：〈關於資產階級從擁袁走向反袁的歷史考察〉《社會科學研究》第5期（成都：1986）。
-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
- 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魯奇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
- 耿起昌：〈新鄉專區是怎樣實現完全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的〉《學習》4月號（北京：1956）。
- 耿雲志：〈清末資產階級立憲派與諮議局〉《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
- 耿雲志：〈論諮議局的性質與作用〉《近代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2）。
- 袁世凱：《袁大總統書牘匯編》卷2（上海：廣益書局，1914）。
- 馬扎亞爾：《中國經濟大綱》（神州國光社，1933）。
-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 馬齊彬、陳文斌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 崔紅星：〈簡析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的土地政策〉《史學月刊》第4期（開封：1986）。
- 國家統計局：〈幾年來私營工業生產的巨大變化〉《人民日報》1956年3月21日。
- 常青：〈合理規定農業合作社工作人員的報酬〉《人民日報》

1956年5月26日。

康有為：〈康南海致北京政府書〉《時報》（1916年9月20日）。

張 研：〈清代族田經營初探〉《中國經濟史研究》第3期（北京：1987）。

張 鳴：〈中國近代軍閥政治性格的分野——軍閥團體維繫意識各論〉《走向未來》雜誌 第3卷第4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張 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

張 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

張 灝：〈形象與實質——再認五四思想〉《自由民主的思想與文化》（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

張一凡：〈民元來我國之地方財政〉周開慶主編：《民國經濟史》（台北：華文書局，1967）。

張一樵、高 華：〈農村工作隊必須依靠黨的支部進行工作〉《人民日報》1955年8月24日。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32（台北，1975）。

張玉法：〈清末民初山東的教育變革〉《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5期（台北：1977）。

張玉法：〈清末民初的山東社會——宗教信仰與人物崇拜的變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台北：1980）。

張玉法：〈清季山東地區的中外交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台北：1980）。

- 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台北：經世書局，1981）。
- 張玉法：《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43（台北：1982）。
- 張玉法：〈民初對制憲問題的爭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台北：1983）。
- 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49（台北：1985）。
- 張玉法：〈清末民初的官辦工業：1860-1916〉《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 張玉法：《中國現代政治史論》（台北：東華書局，1988）。
- 張玉法：《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1860-1916)》（台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1992）。
- 張亦工：〈第一屆國會的建立及階級結構〉《歷史研究》第6期（北京：1984）。
- 張仲禮：〈關於中國民族資本在二十年代的發展問題〉《社會科學》第10期（上海：1983）。
- 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李榮昌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 張廷貴：〈解放戰爭概述〉《黨史資料與研究》第4期（福州：1987）。
- 張朋園：〈民主政治的嘗試——清季諮議局議員的選舉及其出身之分析〉《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自強運動》（台北：食貨出版社，1972）。
- 張朋園：〈近代湖南的人口與都市發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5期（台北：1977）。
-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台北：食貨出版有限公司，

1978)。

張朋園：〈勞著「清代教育及大眾識字能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台北：1980）。

張朋園：〈湖南省地方傳統中的幾個方面：量化分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0期（台北：1982）。

張朋園：〈立憲派的階級背景〉[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武漢：1991）。

張厚安、白益華主編：《中國農村基層建制的歷史演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張晉藩：〈清律初探〉《法學研究》第1期（北京：1979）。

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1973）。

張鴻翼：《儒家經濟倫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曹聚仁：《中國近百年史話》（香港：創墾出版社，1953）。

梁濟：〈敬告世人書〉 梁煥鼎編：《桂林梁(濟)先生遺書》 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34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梁作繁：〈晚清之政治腐敗與社會騷亂：一個量化分析〉《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9卷上冊（香港，1978）。

梁作繁：〈就結構功能理論來看清代後期政府的旌表政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0卷上冊（香港：1979）。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

梁啟超：〈大中華發刊詞〉《大中華》第1卷第1期（1915）。

梁實秋：《梁實秋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

梅谷(Franz Michael)：〈十九世紀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食貨》月刊

- 復刊 第3卷第7期 (台北: 1973)。
- 畢仰高(Lucien Bianco): 〈安徽宿縣、靈璧縣農民抗煙稅鬥爭(1932)〉 張憲文、陳興唐、鄭會欣編:《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 檔案出版社, 1988)。
- 莫里斯·迪韋爾熱(Maurice Duverger):《政黨概論》 雷競璇譯 (香港: 青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1)。
-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譯組譯 (北京: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1989)。
- 莊吉發:〈同光年間的地方財政與自強經費的來源〉《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下冊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8)。
- 許道夫:《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許倬雲:〈春秋戰國間的社會變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期下冊 (台北: 1972)。
- 郭少棠:《德國現代化新論》(香港: 商務印書館, 1992)。
- 郭正昭:〈王光祈與少年中國學會(1918-193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 (台北: 1971)。
- 郭廷以:〈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台北: 時報出版公司, 1980)。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日誌》(北京: 中華書局, 1987)。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下冊 (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9)。
- 郭德宏:〈民主革命時期我黨對土地所有權的政策〉《近代史研究》第1期 (北京: 1983)。
- 郭穎頤(D.W.Y. Kwok):《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 雷頤譯

-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
- 郭穎頤：〈塞先生、德先生的轉形〉《二十一世紀》總第4期（香港：1991）。
- 郭翹然、李浩之：〈粵軍史實紀要〉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粵軍史實紀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
- 陳雲：《陳雲文選》（1926-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陳方正：〈毀滅與新生I——奧圖曼帝國的現代化歷程〉《二十一世紀》總第7期（香港：1991）。
-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60（台北：1990）。
- 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辛亥革命前後——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 陳旭麓主編：《五四後三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陳廷煊：〈近代中國農業僱傭關係的封建性〉《中國經濟史研究》第3期（北京：1987）。
- 陳克儉：〈試論國民黨政府時期工商稅收的特點、性質和作用〉《廈門大學學報》第4期（廈門：1984）。
- 陳君聰：《劉少奇的思想理論研究》（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
-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香港：三聯書店，1979）。
- 陳志讓：《亂世奸雄袁世凱》（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 陳志讓：〈現代中國尋求政治模式的歷史背景〉姜義華等編：《港台及海外學者論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
- 陳李順妍：〈晚清的重商主義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 上冊（台北：1972）。

- 陳春生：《新文化的旗手——羅家倫傳》（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
- 陳能治：〈黃埔建校初期中共分子的滲透活動〉《黃埔建校六十周年論文集》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4）。
- 陳訓正：〈民國十三年之北伐及總理北上〉 羅家倫編：《革命文獻》第10輯（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3）。
- 陳國祥：《新青年與現代中國》（台北：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
- 陳荷夫：《土地與農民》（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 陳萬雄：《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
- 陳萬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源流〉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等編：《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
- 陳萬雄：〈革命家和啟蒙者的雙重身分——五四時期的安徽知識分子〉《二十一世紀》總第5期（香港：1991）。
- 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香港：三聯書店，1992）。
- 陳詩啟：〈清末稅務處的設立和海關隸屬關係的改變〉《歷史研究》第3期（北京：1987）。
- 陳獨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1卷5號（1916）。
- 陳獨秀：〈舊思想與國體問題〉《新青年》3卷3號（1917）。
- 陳獨秀：《實庵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
- 陳獨秀：《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中冊（北京：三聯書店，1984）。
- 陳獨秀：《獨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 陸仰淵、方慶秋主編：《民國社會經濟史》（北京：中國經濟出版

- 社，1991)。
- 陸寶千：〈中國國民黨對總理遺教解釋之確定〉《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 陶英惠：〈蔡元培與大學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台北：1972）。
- 陶菊隱：《記者生活三十年》（北京：中華書局，1984）。
- 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北京：三聯書店，1957）。
- 勞思光：〈從「普遍性」與「具體性」探究儒家道德哲學之要旨〉《儒家倫理研討會論文集》（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1987）。
- 彭明：《五四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彭雨新：〈清末中央與各省財政關係〉《中國近代史論叢》第2輯第5冊（台北：正中書局，1963）。
- 彭澤益：〈論鴉片戰爭賠款〉寧靖編：《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續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景甦、羅崑：《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
- 程德全：《程雪樓先生書牘》上卷。
- 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 《統計工作通訊》資料室：〈我國商業網的發展和1955年的基本情況〉《統計工作通訊》第18期（北京：1956）。
- 華家徹(Herber Waltzer)：〈政治意識形態：政治中的信仰與行動〉《憲政思潮》第31期（台北：1975）。
-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 社，1985)。
- 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 劉尊棋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
- 費正清、麥克法夸爾(J.K. Fairbank & R. Macfarguhar)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 王健朗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費孝通：《江村經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
- 費維愷(Feuerwerker Albert)：《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 賀躍夫：《晚清士紳與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兼與日本幕末、明治士族比較》 中山大學博士生畢業論文（廣州：1992）。
- 馮友蘭：〈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觀和「村治」理論〉《人民日報》1955年5月11日。
- 馮自由：〈中國社會主義之過去及將來〉《社會主義與中國》（香港：社會主義研究會，1920）。
-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商務印書館，1945）。
- 馮爾康：《中國古代地主階級研究論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
- 馮爾康、韋建華：《清人社會生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 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89）。
- 黃如桐：〈試論洋務派企業的性質和作用〉《中國社會經濟史論叢》第二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 黃克武：〈民國初年孔教問題之爭論(1912-1917)〉《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2期（台北：1984）。
-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北京：中華書局，

1986)。

黃逸峰等：《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塞奇(Tony Saich)：〈正確的黨史從哪裏來？〉《二十一世紀》總第12期（香港：1992）。

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張岱雲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

薇拉·施瓦支(Vera Schwarcz)：《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李國英等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楊中美：《遵義會議與延安整風》（香港：奔馬出版公司，1989）。

楊天宏：〈咸同時期清朝權力結構的變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第4期（成都：1986）。

楊天宏：〈太平天國的租賦關係〉《歷史研究》第5期（北京：1987）。

楊幼炯：《中國政黨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69）。

楊君實：《現代化與中國共產主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

楊振亞：〈試析國民政府十年內戰時期的土地法〉《南京大學學報》第3期（南京：1984）。

楊肅獻：〈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李國祁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

楊鵬程：〈試析辛亥革命時的譚延闓政權〉《近代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5）。

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董志凱：〈土地改革與我國的社會生產〉《中國經濟史研究》第3期（北京：1987）。

- 董進泉等：〈國外對五卅運動的研究〉《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6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 賈士毅：《民國初年的幾任財政總長》（台北：傳紀文學出版社，1967）。
- 賈貴發：〈讓北京東曉市市場更加活躍起來〉《人民日報》1956年4月6日。
-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鄒魯全集》（三）（台北：三民書局，1976）。
- 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林啟彥譯（北京：三聯書店，1983）。
- 廖秀真：〈清末女學在學制上的演進及女子小學教育的發展（1897-1911）〉《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10號（高雄：1983）。
- 廖蓋隆主編：《新中國編年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趙岡：《中國土地制度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
- 趙岡、陳鍾毅：〈中國歷史上的城市人口〉《食貨》12卷3、4期（台北：1983）。
- 趙岡、陳鍾毅：《中國經濟制度史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 趙文林等：《中國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趙穗生：〈中國民主悲劇探源〉《知識分子》冬季號（紐約：1990）。
- 劉文：〈武漢市是怎樣整頓糧食統銷工作的〉《人民日報》1955年6月29日。
- 劉少奇：《劉少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 劉克祥：〈試論近代北方地區的分益僱役制〉《中國經濟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7）。
- 劉青峰：〈二十世紀中國科學主義的兩次興起〉《二十一世紀》總第4期（香港：1991）。
- 劉青峰：〈文化革命中的新華夏中心主義〉《二十一世紀》總第15期（香港：1993）。
- 劉紀曜：〈清季的政治權威危機與憲政意理的形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6期（台北：1978）。
- 劉健清：〈國民黨法西斯主義的泛起與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建立〉《南開學報》第5期（天津：1983）。
- 劉望齡：〈1896年—1906年間中國留日學生人數補正〉《辛亥革命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
- 劉創楚、楊慶堃：《中國社會——從不變到鉅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
- 劉翠溶：〈關稅與清季自強新政〉《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 劉鳳翰：〈論新軍與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
- 劉鳳翰：〈戰前的陸軍整編〉《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 劉廣京：〈晚清督撫權力問題商榷〉《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6編（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
- 劉廣京：〈關於晚清自強運動的幾點意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4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 劉瀾濤：〈正確地執行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人民日報》1955年11月20日。
- 德·希·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

- 宋海文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
- 歐內斯特·楊(Earnest P. Young)：〈現代的保守主義者——洪憲帝制〉李宇悌譯，傅樂詩(Charlotte Furth)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
- 潘公展：〈近代社會主義及其批評〉《東方雜誌》第18卷第4號（1921年5月）。
- 蔣介石：《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2（台北：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4）。
- 蔣緯國總編著：《抗日禦侮》（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
- 蔣緯國：〈中日戰爭之戰略評析〉《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4冊《抗戰建國史》（台北：中央黨史會，1981）。
- 蔡少卿：《中國祕密社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 蔡國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台北：商務印書館，1988）。
- 鄧子恢：〈一年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情況和今後工作〉《新華半月刊》14號（北京：1956）。
- 鄧元忠：〈新生活運動之政治意義闡釋〉《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 鄧元忠：〈科學主義在中國(民國20年-26年)〉《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0期（台北：1989）。
- 魯兵、石玉新、武永召編著：《新中國反腐敗第一大案》（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
- 黎志剛：〈輪船招商局國有問題：1878-188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7期（台北：1988）。

- 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 吳奔星編著：《錢玄同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 墨菲(Rhoads Murphey)：〈通商口岸與中國現代化：走錯了哪一步？〉《中國現代化歷程》（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
- 蕭效欽主編：《中國國民黨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 賴惠敏：〈清代山東孔府莊田的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台北：1989）。
- 穆光宗：〈中國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及評價〉《中國人口科學》第5期（北京：1989）。
- 錢玄同：〈保護眼珠與換回人眼〉《新青年》第5卷第6號（1918年）。
- 閻頤行：〈中國農村的農民貿易〉 天津《大公報》1955年6月3日。
- 戴逸：〈洋務歷史試論〉 阮芳紀等編：《洋務運動史論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戴)季陶：〈世界的時代精神與民族的適應〉《星期評論》第17號（1919年9月28日）。
- 戴緒恭、譚克繩主編：《中國現代史研究概覽》（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 繆全吉：〈抗戰前十年行政系統的變革〉《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 薛光前編著：《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台北：商務印書館，1978）。
- 薛暮橋、吳凱泰：〈新中國成立前後穩定物價的鬥爭〉《經濟研究》

- 第2期（北京：1985）。
-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戰士出版社，1983）。
- 魏明：〈論北洋軍閥官僚的私人資本主義活動〉《近代史研究》第2期（北京：1985）。
- 魏光奇：〈清代後期中央集權財政體制的瓦解〉《近代史研究》第1期（北京：1986）。
- 嚴中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
- 蘇梅芳：〈李鴻章與「官督商辦」〉《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16號（高雄：1990）。
- 蘇智良、朱華：〈民國史上最醜惡的一章——金圓券幣制改革與「打虎運動」〉《檔案與歷史》第4期（上海：1986）。
- 蘇雲峰：〈清季武昌學界的革命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台北：1973）。
- 蘇雲峰：〈民初之知識分子(1912-1928)〉《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研討會》下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台北：1982）。
- 蘇雲峰：〈民初之農村社會〉《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1912-1917) 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 蘇雲峰：〈張之洞的中國官僚系統民主化構思——對張之洞的再認識〉《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8期（台北：1989）。
- 顧卓新等：〈女中英杰——憶薛迅同志〉《黨史博采》第3期（石家莊：1992）。
- 顧鴻庭：〈都市群眾運動：上海的五卅運動〉[第十屆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大會論文]（香港：1991）。

顧關林：〈簡述地方實力派與中共的早期關係〉《中共黨史研究》
第1期（北京：1988）。

龔樂群編著：《黃埔簡史》（台北：正中書局，1976）。

二 報刊

《二十一世紀》

《人民日報》 1954—1956年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中共黨史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

《中國經濟史研究》

《少年中國》

《申報》

《史學月刊》

《民立報》

《民國日報》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近代史研究》

《走向未來》

《社會科學》

《東方雜誌》

《政府公報》 1912年

《政府官報》第37號 1907年

《星期評論》

《食貨》（復刊）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香港中文大學學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
《國聞週報》
《新青年》
《新華月報》
《新華半月刊》
《新潮雜誌》
《獨立評論》
《學術月刊》
《歷史研究》

英文部分

- Andrews, Wayne, ed. *Concis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er's Son's, 1962).
- Buck, David D. *Urban Change in China: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Shantung 1890-1949*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 Chan, Wellington K.K. *Merchants, 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Chang, Chung-li. *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2).
- Chao, Kang.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An Economic Analysis*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1986).
- Chao, Kang. "The Trend of Real Wages of Farm Workers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主辦：「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台北：1989)。
- Ch'i, Hsi-sheng.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Dardess, John W. "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Aspec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Late Yuan China", *Studies in Oriental Culture*, No. 9 (August 1971).
- Elvin, Mark. *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Fairbank, John 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 Franke, Wolfgang.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Galbiati, Fernando.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Geertz, Clifford.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 Hao, Yen-ping.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 Kennedy, Thomas L. *The Arms of Kiangnan: Modernization in the Chinese Ordnance Industry 1860-1895*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8).
- King, Ambrose Y.C. "A Non-Paradigmatic Search for Democracy in a Post-Confucian Culture, The Case of Taiwan, R.O.C.", in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ynne Rienna Publishers, Inc.).
- Landis, R.B. *Institutional Trends at the Whampoa Military School: 1924-1926*, PhD. dissert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9).
- Lary, Diana.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Meng, S.M. *The Tsungli Yamen: Its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Metzger, Thomas A.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 Legal Normative and Communication Aspec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Mohanty, Manoranjan.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Indian Communist Movement*.
- Perry, Elizabeth J.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Rawski, Evelyn Sakakida.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ry in Ching China*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 Rhoads, Edward J. M.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 Tung 1895–191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Seliger, Martin. *Ideology and Politic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Ltd, 1976).
- Sheridan, J.E.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ü-hsi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Skinner, William G. "Marketing and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4 (November 1964).
- Trotsky, Leon.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New York: New York Press, 1937).
- Wright, Mary C.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附錄三 索引

一畫

- 一體化 32
 一體化組織方式 38 85 117
 123
 一體化結構的三個層次 31
 38 81 126
 一體化與經濟的耦合 34 67
 一體化調節 123 126 423

二畫

- 人口—土地危機 37 364 437
 人口膨脹 364 389
 人均耕地面積 395 396
 丁日昌 89

三畫

- 三反五反 429 430
 三民主義 42 237 238 261
 270 302 307 311 313 345
 486

三民主義與政治結構一體化
 312

- 三民主義的儒家化 314
 工商業公所 81 104
 工運趨勢 286
 士大夫自強觀 112
 士階層的形成 49 50
 土地兼併 101 205 365 369
 394 403 437
 土地國有化 406
 大一統官僚機構 32 58 312
 大歷史觀 472
 小學生數 156

四畫

- 文化大革命 470
 文化深層結構和逆反價值結合
 249
 太平天國 37 74 101 388
 太平天國清除無組織力量 76
 支援意識 56 93 200
 五卅運動 304

- 五四運動 232
 中原大戰 326
 中國中心觀 23
 內捲化 368 402
 公私合營 430 455 457
 毛澤東 260 287 359 371 373
 377 409 411 423 434 464
 476
 毛澤東思想 374 378 379
 408 475 477
 反洋教群眾運動 114

五畫

- 立場中心主義 340
 立憲改革 46 99 116
 市場萎縮 428
 世界主義 262 264
 戊戌維新 93 95 117 485
 北伐 284 307
 甲午戰爭 39 87
 白話文報刊 246
 民族主義 263 264
 民國初年社會思潮變遷 266
 民國初年知識分子年齡結構
 224
 民國初年政治黨會 277

- 民國初年流行刊物 240
 民國初年財政困難 198
 民國初年稅收機構 176

六畫

- 共和幻象 170
 共產黨組織規模 380 381
 共產黨整合模式 411
 地方主義 118
 地方分權運動 145
 地主—自耕農經濟 369
 地主經濟 33 132
 地主鄉紳自治 29
 列寧主義政黨 42 275 290
 297
 光緒帝(載湉) 97
 同文館 90
 同治中興 79
 多元化思潮 266
 防衛現代化 82 108

七畫

- 汪精衛 120 307 315
 辛亥革命 46 145 146 165
 485

- 社會主義 254 255 256 433
 社會主義經濟倫理 256
 社會達爾文主義 93
 社會組織的鄉村中心 34
 社會基層組織 53
 社會整合危機 40 167 203
 社會騷亂 131
 抗日戰爭 328
 抗戰期間城市經濟過度動員
 330
 抗戰期間國營與私營企業生產
 能力 356
 抗戰期間通貨膨脹 332
 抗戰期間農村過度動員 330
 李大釗 216 252 258
 李鴻章 77 85 89
 村級惡棍 325
 批判紳權 215
 吳虞 220
 私塾改革 147
 延安抗大 379
 延安整風 378 407 408
- ### 八畫
- 宗法一體化結構 32 52
 宗法家族 31 52 58 130
 官紳合作 81 85 110 142
 官紳資本主義 137 160 161
 官督商辦 81 82 85 103
 134
 官僚人數 27 48
 官僚政治行政控制網 61
 官僚機構擴張 413
 官僚系統的倒砌金字塔式
 317
 官僚資本 161
 官僚資本主義 161 332
 官僚的資本 161
 官辦企業 80 82
 庚子事變 98 114 115
 非韋伯型的官僚機構 342
 東南互保 118
 林則徐 72
 直觀理性 235 250
 明治維新 82 106 113
 知識中心主義 376
 知識分子的邊緣化 295
 供銷合作社 441 442
 金融風潮 109
 周恩來 373 445
 周期性崩潰—修復的行為模式
 26
 建構新意識形態 245

九畫

洋務企業種類和資本 105
 洋務運動 39 46 79 82 113
 468
 洪憲帝制 179 182 242
 帝國主義論模式 22
 度支部 176
 突破倫理中心主義 221
 城市人口 67
 城市病態繁榮 419
 城市商品糧短缺 421
 城市新知識分子人數 128
 城市新學堂 127 128
 城鄉之戰 382
 城鄉對立 164
 城鄉隔離 423 424
 政見認同團體 277 299
 革命政黨 299
 胡林翼 79
 胡適 222 226 231
 胡漢民 260 315
 南京國民政府稅收 323
 南京國民政府社會結構 311
 南京國民政府經濟結構 326
 軍閥治軍思想 202
 軍閥的教育背景 186 187

軍閥的土地資財 205
 軍紳政權 183 187 202
 軍隊國家化 181
 科學主義 251
 科層組織 341 342 346
 保路運動 145
 烏托邦主義 260
 幽暗意識 258

十畫

馬列主義 42 237 258 302
 344 370 372 375 409
 馬列主義的儒家化 370 377
 409
 袁世凱 169 172 173 179 182
 215 242
 租佃地主 398
 倫理中心主義 214 228 241
 340
 華夏中心主義 262 263
 弱一體化結構 386
 弱一體化整合模式 324
 弱勢意識形態 42 307 385
 弱勢意識形態整合模式 382
 通商口岸人口 161 162
 通商口岸城市的快速成長 140

孫中山 174 238 264 277 278
289 299
留日學生人數 112 113

十一畫

- 清末女子教育 151
清末各種學會 96
清末革命團體 122
清末財務機構 197
清末政府財政收入 84
清末地方及中央政府財政收入
之用途 108
清代流民 403 404
清代科舉制 28
清代族田經營 54
清代圖甲制 30
清代識字率 155
淮軍 77
梁士詒 179
梁啟超 119 121 188 211 279
梁漱溟 362 423 445
章太炎 121
康有為 93 215
啟蒙與救亡 247
貧農經濟 368 369
理念調適 404
規範認同 171 172 192
控制農村基層社會的人員
325
國民黨社會結構 411
國民黨官僚機構 348
國民黨員的構成 318
國共合作與分裂 293
國共兩黨人員發展 279
國共兩黨社會動員能力 383
國防現代化 79 80 82
國防現代化企業的經費來源
107
國家資本主義 331
國會議員構成 191
唯物論科學主義 235 251
252
張之洞 115 125 151
張謇 119
張勳復辟 169
第一次意識形態認同危機
115
第一重調節機制 35
第二重調節機制 36 306
鳥籠社會 435
陳炯明 281
陳雲 421 422
陳獨秀 192 215 226 229 237

244 252 259
 紳士各類收入 60
 紳士社會活動參與 51 53
 紳士城市化 40 130 134 140
 145 152 153
 紳士總人數 30
 紳士鄉自治衰落 130
 紳商資本主義 134
 紳權與王權的對抗 140

十二畫

湘軍 77
 道光帝(旻寧) 72
 道德理想主義 236 253 257
 曾國藩 77 181
 黃埔軍校 282 283
 黃遵憲 88
 超級官僚社會 411 414
 超穩定系統 25 72 461 473
 超穩定系統應付外來衝擊的
 模型 469
 超穩定結構 25 45
 無地主的自耕農經濟 415
 無組織力量 36 73
 魯迅 167 223
 鄉村建設運動 362

鄉村重建 85
 鄉紳自治 58
 鄉紳地主 132
 統購統銷 418 422 443

十三畫

準列寧主義政黨 307
 準身分制社會 424
 新一體化結構 290 294 312
 315 338 339 355 414 434
 463
 新文化運動 41 46 211 212
 237 238 240
 新民主主義 433 434 475
 477
 新式企業創辦人的出身 157
 158
 新式教育 147
 《新青年》作者群年齡結構
 243 244
 新知識分子群體 217 245
 新軍總數 200
 新政 122 123
 新華夏中心主義 264
 意識形態 42 55 248 264
 285

- 意識形態更替 40 170 212
213 225 240 266 463
- 意識形態全面認同危機 92
211
- 意識形態局部認同危機 92
115 170 211
- 意識形態和經濟的耦合 43
461
- 意識形態強硬派 97
- 意識形態認同 32 55
- 意識形態認同危機 41 91
114 121 146
- 意識形態認同組織力 307
- 意識形態認同團體 276 299
308
- 義和團運動 95 485
- 慈禧太后 118
- 資本主義與地主經濟的混合形
態 326
- 農民負擔 393 415
- 農民運動 287 288
- 農村從業人員的成分 406
- 農村包圍城市 373
- 農村家庭手工業 395
- 農村基層組織的強化 447
- 農村脫產幹部收入 449
- 農村經濟結構的轉化 368
- 農業合作化 423 426 451 452
- 農業經濟中的僱農成分 367
- 農業經濟積累率 414
- 農業經濟結構 366
- 農業僱工工資 398
- 傳統一體化結構 38 338 411
412 462
- 「傳統—現代」模式 22
- 傳統社會人口發展機制 391
392
- 傳統社會城鎮分佈 62
- 傳統郡縣城市的衰落 163
- 群體主義意識形態 302
- 群體道德理想主義 236 257
- 經世致用 86 111
- 經營地主 133 154 155 366
367 399
- 經驗論科學主義 251
- 經濟倫理 253
- 經濟現代化與社會整合 466
467

十四畫

- 認同 55
- 認同危機 113
- 精兵減政 381 410

精英主義 230

十五畫

廣州國民政府的收入結構

352 353

遵義會議 374

蔣介石 315 316 323 345 360

382 385

蔡元培 220 338

價值逆反 229 231 249

選拔意識形態精英方式 150

劉少奇 377 476

劉坤一 118 119

「衝擊—回應」模式 22

十六畫

諮議局議員的功名背景 142

親貴內閣 144

整體性思想體系 91

「整體性反傳統主義」 225

226 376

鴉片戰爭 71

儒家意識形態 28 59 265

學生運動 271

錢玄同 216 231

十七畫

戴季陶 293 314

總理衙門 80 102

十八畫

糧食商品率 134 419

「斷裂說」 22

魏源 73

雙軌制經濟 429 432

雙重調節機制 37

二十畫

議會政黨 298

黨軍 280

嚴復 90 94

二十一畫

權威來源 170

權威危機 120

二十三畫

龔自珍 38 76 125